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毛泽东百周年纪念

全国毛泽东生平思想研讨会论文集
(中)



毛泽东百周年纪念——全国毛泽东生平和思想研讨会论文集（中）

毛泽东统一战线理论及其在新时期的发展

佟彦

毛泽东把马列主义关于统一战线的理论和策略，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同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实践相结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独创性的统一战线理论。

毛泽东统一战线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统一战线理论有丰富的内涵，具有完整的思想体系和严密的逻辑结构。邓小平关于新时期统一战线的思想是毛泽东统一战线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把毛泽东和邓小平的统一战线思想作为一个联系着的整体加以研究，是一个亟待加强的课题。本文拟从毛泽东统一战线理论的形成、发展和重要内容，邓小平对毛泽东统一战线理论的继承与发展这两方面进行分析、考察，试图在这方面有所进展。

一、毛泽东统一战线理论的形成、发展和主要内容

毛泽东统一战线理论是在漫长曲折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在总结我们党统一战线工作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毛泽东统一战线理论的发展，反映了党的统一战线实践的发展，也反映了党对统一战线认识水平和领导能力的提高。

毛泽东统一战线理论的形成、发展经历了三个时期：

（一）从党的成立到 1935 年遵义会议召开是第一个时期。

1921 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民主革命认识不深，对统一战线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党的一大认为，中共对现有各政党应采取独立、攻击和排斥的态度，不准与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中国共产党首先集中力量进行工人运动，在工人阶级中扎了根。不过，中国共产党人很快从实际斗争中，特别是从京汉铁路大罢工失败的事实中认识到：中国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工人阶级尽管有坚强的革命性，但人数较少，如果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党就不可能取得反帝反封建的胜利。正是在这个时期，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传入中国，对中国共产党制定当前阶段的革命纲领给予了正确的指导。中共二大决定同国民党及其他革新团体建立民主联合战线。中共三大作出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决策，同时指出共产党在国民党内应保持自己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中国共产党同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建立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结成了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和农民运动也蓬勃发展，形成了全国大革命的高潮。然而我们党建立统一战线的实践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大革命后期出现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对资产阶级一味迁就退让，放弃了无产阶级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让大资产阶级篡夺了领导权，使大革命归于失败，统一战线也破裂了。在土地革命时期出现了三次“左”倾机会主义。党的五大和及其以后反对民族资产阶级，特别是在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统治期间，这种政策发展到极点。“左”倾冒险主义，不利用一切机会争取同盟者，却把可以争取的同盟者推到敌人方面，使党处于孤军作战

的险地。右倾机会主义是一切团结，否认斗争；“左”倾机会主义则是一切斗争，否认团结。“左”和右的结果放弃了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使党和革命受到损害。

这个时期，毛泽东对统一战线问题有许多重要的论述，代表了党内的正确主张。早在1919年，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提出以民众大联合的力量实行社会政治改革，对抗强权者、贵族和资本家的主张。1920年12月，毛泽东在“致蔡和森等”的信中说：“我觉得创造特别环境，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大业，断不是少数人可以包办的……。”他主张：“不分男，女，老，少，士，农，商，只要他心意诚恳，人格光明，思想向上，能得到互助互勉之益，无不可与之联络，结为同心。”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从理论上解决革命中的同盟军等问题。他还分析了民族资产阶级对中国革命的矛盾态度，预见到他们在革命高潮时将要分化，“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毛泽东敏锐地看到了掌握统一战线领导权和掌握政权及枪杆子之间的关系。他在党的八七会议上指出：“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但是由中国革命的复杂性以及我们党尚处于幼年时期，毛泽东关于统一战线的认识并不为当时党的主要领导人所接受。

中国共产党人的成功与失败的比较中，认识了毛泽东，选择了毛泽东。1935年1月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瓦窑堡会议。这之前，从共产国际回来的张浩向中共中央传达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精神，传达了季米特洛夫在大会上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报告。这就为瓦窑堡会议的召开作了思想准备。瓦窑堡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过了两天，毛泽东在一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提出了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的统一战线策略，批判了关门主义、宗派主义的策略，着重阐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强调党和红军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毛泽东纠正了党在很长一个时期把民族资产阶级混同于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错误，批评了党内那种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中间阶级不可能和中国工农大众联合抗日的错误观点。在毛泽东正确主张指导下，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二）1935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第二个时期。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以马列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为依据，认真吸取历史上“左”右倾错误的教训，总结统一战线实践中的经验，提出了一整套统一战线的理论、方针和政策。1937年，毛泽东写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等文章。毛泽东深刻阐述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明确把民族资产阶级包括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制定了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毛泽东还论证了大资产阶级参加抗日的可能性，肯定了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政策的转变，把大资产阶级包括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1938年至1940年，毛泽东陆续发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论政策》，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策略原则和策略方针，主要有：关于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关于对资产阶级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总政策；关于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有理、

有利、有节”及“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孤立少数，各个击破”的斗争策略等。这里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他把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提出来。他提出，现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

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毛泽东系统地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经验，指出：“十八年的经验，已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正确地理解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毛泽东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政策，正确指导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践，保证了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战中，起了政治领导作用。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以全国人民为敌，发动了反革命内战，将全国各阶层人民推到饥饿和死亡的境地。在这种形势下，1947年毛泽东在《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蒋介石政府处在全民的包围中》、《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文章中，提出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转变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新任务。他指出，这个极其广泛的统一战线包括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其他爱国分子、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在内。毛泽东强调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要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不但如此，这个统一战线还必须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之下。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任何革命统一战线也是不能胜利的。”这个时期，毛泽东关于统一战线的论述，除了使全党明确了建立、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任务外，还起了两方面的作用：第一，帮助各阶层人民（包括中间阶层）认识到，这场战争不只是国共两党谁胜谁负的问题，而是几代中国人所要求的独立、自由、统一、富强的中国能否最终实现的问题；第二，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开辟了第二条战线。从1946年底开始，国民党统治区人民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爱国民主运动，逐步形成了配合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

（三）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是第三个时期。

当新中国的晨曦刚刚露出东方地平线时，毛泽东就注意到了统一战线在新中国建设中的地位、作用问题。他在建国前夕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强调：“我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在国内，唤起民众。这就是团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结成国内的统一战线，并由此发展到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人民民主专政在全国范围的建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胜利发展及其在国家政权上的表现。建国初，由于夺取了全国政权，党内一部分同志增长了以功臣自居的思想，他们看不起党外人士。针对这种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思想倾向，1950年3月，毛泽东依据《共产党宣言》的基本思想，概括提出“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是统一战线的根本指导思想。无产阶级之所以要建立统一战线，是由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所决定的。消灭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及产生这些现象的根源，是无比艰巨的任务，中国的工人阶级光求得自己的解放不行，必须求得四个阶级的共同解放。同年6月，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作了《不可四面出击》的重要讲话，指出：“全党都要认真地、谨慎地做好统一战线工作。要在工人阶级领导下，以工

农联盟为基础，把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团结起来。”只要“多少有点可能团结的人，我们也要团结。”我们不要四面出击，绝不可树敌过多，这样才能孤立主要敌人。毛泽东的这些论述，及时纠正了轻视统一战线工作的倾向。

在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过程中，毛泽东提出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包括两个联盟和与资产阶级保持统一战线、和平改造资产阶级的思想。1953年8月，毛泽东提出，现在有两种统一战线，两种联盟。一种是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这是基础。一种是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毛泽东提出过渡时期内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他同时认为，在我国具体条件下，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除了对抗性的一面外，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可以和资产阶级保持统一战线，和平改造资产阶级。毛泽东领导我们党成功地运用了马克思关于赎买和列宁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理论，开辟了经过统一战线，对资本上又工商业进行和平改造，把资本主义所有制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所有制的道路。

我国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民主党派工作方面提出了两个亟待解决的问题：第一，民主党派还有没有必要存在？第二，民主党派在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中处于什么地位？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了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他说：“在我国内，在抗日反蒋斗争中形成的以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为主的许多民主党派，现在还继续存在，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苏联不同”，“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第二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进一步阐述了这个思想，他指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是我国具体的历史条件的产物。各党派互相监督就是互相提意见，作批评。他说：“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大家知道，主要监督共产党的是劳动人民和党员群众，但是有了民主党派，对我们更为有益。”毛泽东提出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为社会主义时期巩固、发展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奠定了政策基础，对形成我国的独具特色的政治体制有深远的影响。

1956年9月，党的八大胜利召开。党的八大指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宣布了中国由革命到建设的转变。这个时期人民内部的矛盾突出出来。毛泽东认真总结了我国和苏联的经验和教训，于1957年2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提出了正确处理两类社会矛盾的学说。毛泽东在讲话中，全面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的根本利益一致，但人民内部还存在各种矛盾，必须严格区别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他指出，现在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这就需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和文化，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毛泽东系统地阐述了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提出了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和方针：在人民内部要在政治上实行“团结—批评—团结”；在经济工作中对城乡各阶层人民要采取“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和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方面利益的方针；在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关系上采取“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在科学文化工作方面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

针。毛泽东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对社会主义时期统一战线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当然也应当看到，1957年后，毛泽东在统一战线方面也有重大失误。在反右派斗争中，毛泽东对右派进攻的形势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造成反右斗争严重扩大化；1962年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发展了他在1957年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在中央统战部错误地开展了对所谓“投降主义、修正主义路线”的批判。“文化大革命”中这种“左”的错误更发展到顶端。但是，毛泽东的这些错误和他的历史贡献相比，是第二位的。毛泽东对统一战线的伟大贡献，远远超过他晚年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失误。

毛泽东统一战线理论具有丰富的内容，概括起来讲，主要内容是：

1.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夺取胜利的一个法宝，也是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法宝。单凭无产阶级自己一个阶级的力量，要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在革命胜利后，要取得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成功，也是不可能的。中国共产党必须在各种不同情形下团结一切可能的阶级和阶层，组织占全民族人口绝大多数人的统一战线。

2. 发展广泛的统一战线，建立两个联盟。第一个联盟是工人阶级同农民阶级、广大知识分子及其他劳动者的联盟。这是统一战线的基础。第二个联盟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全体劳动者同一切可以联合的非劳动者的联盟。这也是重要的不可缺少的联盟，这个联盟的中心问题是正确处理同资产阶级的关系。有了这个联盟，有利于我们党争取一切中间力量和可以合作的朋友，达到最大限度壮大自己和孤立主要敌人的目的。

3. 坚持共产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党的领导主要靠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和其党员的模范先锋作用，要争取团结各种不同的同盟者，照顾同盟者的利益，同时给以政治教育，提高同盟者。在统一战线中，与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是资产阶级。对资产阶级要又联合又斗争，既防只斗争不联合的“左”的错误，又防只联合不斗争的右的错误。要对统一战线中的不同势力作正确的分析，采取正确的政策。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任何革命统一战线也是不能胜利的。

4. 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统一战线是由不同的阶级、阶层、政党和集团组成的广泛联盟。在统一战线内部，既有在共同利益和要求基础上的联合，又有因各自不同的利益和要求而产生的矛盾和斗争。无产阶级政党在统一战线中必须保持自己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坚持党的纲领、路线和战略目标。但为实现党的纲领和目标而采取的方法步骤，则需要根据具体情况灵活运用。统战工作的原则性必须是坚定的，但也要有为了实现原则性的一切许可的和必需的灵活性。

5. 区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大规模群众性的阶级斗争结束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两类矛盾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人民内部也有阶级矛盾和非阶级矛盾两种，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凡属人民内部矛盾，都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去处理，即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

二、邓小平对毛泽东统一战线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我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在深刻总结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个方面经验的基础上，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党的领导集体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我国统一战线也随之进入一个新时期。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的统一战线理论，把它与走向现代化阶段的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创造性地、系统地提出新时期统一战线的理论、方针和政策，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邓小平对毛泽东统一战线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主要有八个方面：

（一）深刻揭示统一战线的本质，阐明统一战线的战略地位和作用。

邓小平在建国初期主持中共中央西南局工作时，就以一个政治家的深邃战略眼光来看待统一战线问题。他指出：统战工作包括：“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中立一切可能中立的人，分化敌人营垒中一切可能分化的人。”统一战线的本质，就是“团结大多数，孤立敌人。”⁽¹¹⁾“统战工作有其策略性，但更主要的是它的战略性，就是要广泛地团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社会各阶层人民。”⁽¹²⁾正是从这种高度的战略性出发，邓小平深刻阐明了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必要性和长期性，全党都要重视做统战工作。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后，邓小平提出，统一战线仍然是一个重要法宝，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应该加强，不是缩小，而是应该扩大。

（二）科学分析我国阶级关系的根本变化和统一战线内部结构相应发生的变化，明确新时期统一战线的性质、对象和范围。

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的开幕词中，邓小平提出我国社会阶级状况发生了根本变化，“我国的统一战线已经成为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广泛联盟。”⁽¹³⁾1979年9月，他听取第十四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情况汇报，又进一步指明：“统一战线的对象，清楚得很，顾名思义，是把一切能够联合的都联合起来，范围以宽为宜，宽有利，不是窄有利。”“统一战线的性质，叫革命的爱的统一战线，就是社会主义劳动者和爱国者的联盟。”他还提出了“社会主义劳动者之间也有统一战线”⁽¹⁴⁾的重要论断。邓小平的这些论述，对新时期统一战线具有根本性的理论问题作了回答，是对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的发展。

（三）适应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提出新时期统一战线的根本任务是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邓小平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指出：“新时期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努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心同德，群策群力，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¹⁵⁾把统战工作的重点转到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服务上来，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性转变，是我国统一战线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的一个重要标志。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与此相适应，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必须转移到发展社会生产力上来，统一战线工作重点也必须转移到为发展社会生产力服务上来。经济能否发展，现代化能否实现，关系到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全党全国的最大的政治，也是统一战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前进发展的根本条件。事实证明，围绕现代化建设，我们才得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新时期统一战线才开拓发展出一个蓬勃兴旺的新局面。

（四）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为和平统一祖国提供了基本方针和原则，也为新时期统一战线开辟了一个广阔的新天地。

“一国两制”，尊重历史，尊重实际，也照顾到国际现实，是中华民族政治智慧的伟大创造。实行“一国两制”，不仅两个制度之间要长期和平共处，同时在经济文化等方面还要长期交流与合作，共同为中华民族的振兴而奋斗。这样，它的提出，就不但为实现祖国统一提供了切实可行的途径，为解决某些国际争端提供了新方法，也为我们建立、发展同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国外侨胞的爱国统一战线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广阔的活动天地。“一国两制”伟大构想的提出和实施，新时期统一战线发展形成了两个范围联盟的战略格局：在大陆，以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为政治基础，团结全体劳动者和爱国者；在大陆外，以爱国和拥护祖国统一为政治基础，团结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国外侨胞。

（五）发展毛泽东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思想，提出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是我国政治制度的一个特点和优点。

邓小平根据新时期民主党派的实际状况，指出它“已经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¹⁶⁾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坚持和完善这项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邓小平提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多党派的合作，这是我国具体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所决定的，也是我国政治制度中的一个特点和优点。”⁽¹⁷⁾1989年，根据邓小平的指示，中国共产党经与民主党派协商制定颁布了《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邓小平提出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含义是十分深刻的。1980年他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一方面揭露了西方多党制的弱点，并通过比较西方多党制阐明了我国多党合作制的优越性；另一方面揭示了在共产党领导下实行多党合作的深刻蕴涵：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国家的统一和稳定，才能保障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大格局的顺利发展。

（六）提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为新时期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奠定理论基础。

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首先意识到知识分子问题的重大意义，对此进行拨乱反正。1977年他提出：“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18）}“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19）}1978年，在全国科学大会上，他正式作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我们党的一支依靠力量的科学论断。在世界科学技术迅速发展并向现实生产力迅速转化，愈来愈成为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和最主要的推动力量的形势下，1988年他又极富远见地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邓小平的这一系列论述，为新时期党和国家的知识分子政策提供了基本依据，对于调动广大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积极性起了巨大作用。由于新时期统一战线工作对象大多数是知识分子，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团结、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成为新时期统一战线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七）强调马列主义同中国实践相结合能够解决民族问题，提出发展团结友爱、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

1950年邓小平在《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一文中说：“在世界上，马列主义是能够解决民族问题的。在中国，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也是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20）}用这个思想来指导、解决当时西南地区的民族问题，他强调，必须搞好民族团结，消除民族隔阂。为此，要从政治、经济、文化上诚心诚意地帮助少数民族；要反对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首先汉族要抛弃大民族主义；要认真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提高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水平。进入新时期以后，邓小平指出：“我国各民族经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早已陆续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结成了社会主义的团结友爱、互助合作的新型民族关系。各民族的不同宗教的爱国人士有了很大的进步。在实现四个现代化过程中，各民族的社会主义一致性将更加发展，各民族的大团结将更加巩固。”^{（21）}当前世界民族宗教矛盾非常尖锐复杂，而我国在这方面却能保持一个比较团结稳定的局面，这充分说明，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解决民族问题是成功的。

（八）提出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充分发挥统一战线作用的思想。

早在建国前，邓小平就看到统一战线与民主有着密切关系。1941年他在《党与抗日民主政权》一文中说：“三三制政权的实质是民主问题。”并提出中国是一个半封建的缺乏民主的国家，共产党员一般缺乏民主的习惯，缺乏民主政治斗争的常识与锻炼。我们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尤要反对国民党“以党治国”的遗毒传播到我们党内来^{（22）}。建国后，根据我们党已成为执政党这一情况，他特别强调统一战线在监督方面能够发挥重要作用，指出党外人士“能够对于我们党提供一种单靠党员所不容易提供的监督”^{（23）}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后，他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更加重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24）}他热诚地希望，“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都以主人翁的态度，关心国家大事，热心社会主义事业，就国家的大政方针和各方面的工作，勇敢地、负责地发表

意见，提出建议和批评，做我们党的净友，共同把国家事情办好。”^{（25）}邓小平关于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发挥统一战线作用的思想，提出了新时期统一战线的一个突出特点和优点。建国以来，尤其是新时期以来，统一战线与发扬民主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发扬民主使统一战线充满生机和活力。同时，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因为统一战线获得了最广泛的社会基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因为统一战线扩大到空前的范围。统一战线愈益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个鲜明特色。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继承毛泽东、邓小平的统一战线理论，党的十四大肯定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依靠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必须依靠各民族人民的团结，必须依靠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在纪念毛泽东诞辰 100 周年的时候，认真研究毛泽东统一战线理论，认真研究邓小平对毛泽东统一战线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对于深刻理解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必要性和长期性，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各民族、各党派和一切爱国的同胞，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统一祖国、振兴中华而奋斗，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统战部）

注释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 38 页。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10 页。

1927 年 8 月 7 日中共中央紧急会议记录。

《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2 卷，第 606 页。

《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4 卷，第 1257 页，第 1437 页，第 1472 页。

《历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概况和文献》，档案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7 页。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23 页。

（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5）《邓小平论统一战线》，第 62 页，第 67 页，第 85 页，第 156 页，第 158、159 页，第 156 页，第 155 页，第 165 页，第 124 页，第 125 页，第 72 页，第 155 页，第 2—5 页，第 99 页，第 165 页。

（24）《邓小平文选》（1975—1982 年），第 154 页。

毛泽东关于多党合作的理论思想及新时期的发展

孙晓华 袁廷华

多党合作是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的重要内容，是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组成部分，在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学说，从中国国情出发，实行与民主党派的长期合作，确立了我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这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特殊贡献。

一、团结民主党派是一条坚定不移的方针

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这是毛泽东对《共产党宣言》的基本思想所作的高度概括，也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基本指导思想。

无产阶级要解放全人类，就要消灭一切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以及这些现象所由产生的根源。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深刻、最广泛的革命，它不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而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因此，无产阶级要完成这一长期的、无比艰巨的革命事业，就必须在不同的革命阶段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阶级、阶层，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战胜共同的敌人和实现社会主义而斗争。

从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的远大胸怀出发，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各个历史时期制定路线、方针、政策时，始终把团结民主党派放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战略高度来考虑，坚持和发展与民主党派的合作。

我国各民主党派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土壤中产生的，他们原来的社会基础是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同这些阶级相联系的知识分子以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他们不是单一阶级的政党，而是具有阶级联盟性质的政党。

毛泽东深刻分析中国社会，指出：“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无产阶级和地主大资产阶级都只占少数，最广大的人民是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的中间阶级。”在旧中国，经济文化十分落后，无产阶级人数很少，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大敌人的力量却十分强大。无产阶级如果不争取团结其他可以团结的力量，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大多数人口在内的广泛的统一战线，革命就不可能胜利。我国民主党派的阶级基础，基本上是由农民以外的中间阶级所组成，他们不同程度地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具有反帝爱国和争取民主的要求。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争取、联合民主党派的方针，通过他们成功地团结了所联系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为民主革命的胜利和建立新中国作出了重要贡献。

新中国的建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在工人阶级掌握国家政权以后，还需要不需要与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实行合作？毛泽东从人民民主专政的思想出发，明确指出：“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求我们党去认真地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同时也要求我们党去团结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它们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派别，以便在革命时期使反革命势力陷于孤立，彻底地打倒国内的反革命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因为这样，我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明确下来。”建国初期，共产党内有少数同志认为，对民主党派，不应在政治上去提高他们，在组织上去发展他们。一些民主人士也认为，新中国已经建立，他们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无须再存在下去。毛泽东郑重指出：“要向大家说清楚，从长远和

整体看，必须要民主党派”，“认为民主党派是‘一根头发的功劳’，一根头发拔去不拔去都一样的说法是不对的，从他们背后联系的人们看，就不是一根头发，而是一把头发，不可藐视。”根据毛泽东这些思想，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在人民民主专政条件下团结民主党派的总方针和各项政策，坚持并发展了同民主党派的合作，团结各民主党派参加了人民政协和人民政府的工作，同他们协商决定国家大政方针和重大经济文化建设问题，推动他们参加反帝爱国斗争和各项民主改革运动，参加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这对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彻底完成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顺利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和迅速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起到了重要作用。

1956 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成员转变成为社会主义劳动者，民主党派成为这部分劳动者的政党。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阶级斗争不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毛泽东确认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并总结了我国多党合作的历史经验，指出：“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同年 9 月，中共八大政治报告正式确定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是毛泽东关于多党合作思想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必然产物，它为社会主义整个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团结民主党派，实行长期合作奠定了理论基础。

遗憾的是，1957 年以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左”的错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在贯彻中受到严重干扰，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合作遭受重大挫折。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正确分析了我国阶级状况的根本变化，肯定了民主党派的社会基础和性质已随国内阶级状况的变化而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不再是阶级联盟性质。各民主党派“都已经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这一科学的概括，明确了民主党派在现阶段的性质，解决了如何看待民主党派的问题，为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团结民主党派提供了重要依据。根据这一思想，中国共产党把“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发展成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这一方针的贯彻执行，给我国多党合作带来深刻的变化：一、多党合作的性质由过去的阶级关系转变成为建立在劳动人民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同志式的合作关系，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一致性更加增强了；二、多党合作的政治基础由过去以《共同纲领》、《人民政协章程》为政治基础发展成为以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为政治基础，多党合作的基础更加巩固；三、多党合作的内容由过渡时期的为“一化三改”服务，民主党派的主要任务是接受教育和改造，发展成为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履行参政和民主监督职能。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方针的指引下，各民主党派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被极大地调动起来，广泛参加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努力开创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新局面。多党合作空前活跃，充满生机与活力，成为新中国建立以来最好的历史时期之一。

实践证明，把大多数人团结在共产党周围，结成包括民主党派在内的最

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强大力量源泉，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的一个巨大优势，它不仅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基本特点，也是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的一大特色。

二、确立和不断发展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这一制度，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经过多党合作的长期实践，特别是经过新时期的实践和理论总结，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合作，是在政权以外的合作。合作的目的，是要推翻国民党反动政权，建立人民的政权。

1949年，当国民党政权即将被彻底推翻的时刻，新中国应该建立一个怎样的政权来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作为一个重大理论课题提出来。按照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后，“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也就是说，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阶级的专政，专政的对象是资产阶级。列宁从俄国革命的实际出发，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含义作了新的概括，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是劳动者的先锋队——无产阶级同人数众多的非无产阶级的劳动阶层（小资产阶级、小业主、农民、知识分子等等）或同他们的大多数结成的特种形式的阶级联盟。”列宁对马克思的发展在于，无产阶级专政不只是一个阶级的专政，而是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建立的阶级联盟。

毛泽东从中国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向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道路这一特殊国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为新中国的政权建设奠定了理论基础。人民民主专政是由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它在阶级结构上实行两个联盟，即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工人阶级还与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建立联盟，组成四个阶级联合的政权。这在无产阶级专政史上是个创举。在毛泽东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合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成为国家政权中的合作。

对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权中的地位和作用，毛泽东指出：“民主党派是联系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政权中要有他们的代表才行。”“总结经验 and 决定方针的工作，是我们大家一起来做的，是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界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集合在一起来做的。”（11）在毛泽东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就重大方针政策与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实行政治协商，民主党派成员广泛参加国家政权，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创造了在国家政权中实行多党合作的基本经验，初步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基本格局。

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的阶级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第二个联盟逐步成为工人阶级与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爱国者的广泛的联盟。毛泽东总结了我国多党合作的历史经验，并汲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思想。这一思想提出的重要意

义在于，它突破了苏联一党制的政党模式，在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上作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选择，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得到确立。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邓小平和以江泽民为代表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总结继承了毛泽东关于在国家政权中与民主党派实行合作的基本思想和成功经验，并在新的实践的基础上作了重大发展：进一步明确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明确规定了民主党派在我国国家政权中的参政党地位；提出了民主党派参政的基本点和履行监督职责的总原则；提出了充分发挥民主党派参政和监督作用的各项制度措施。1992年，中共十四大把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之一。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载入宪法。这些标志着我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逐步走向完备。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我国，人民民主专政是国体，确切地表明了我国的政权性质和政权的广泛基础。与这一国体相适应的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这一国体相适应的政党体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两种制度相辅相成，构成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主制度的基本框架。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体现在我国政治运行的各个环节之中，即决策前的协商、决策、执行、监督的全过程之中。（1）共产党就将要提出的大政方针与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进行政治协商。（2）由人民代表大会——国家权力机关作出决策。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在人民代表和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占有适当比例，参与决策。（3）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时，同时举行人民政协会议，就国家大政方针和重大问题广泛听取民主党派和各族各界人士的意见。（4）人民代表大会作出决定后，由政府贯彻执行。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的一部分人在国家和各级政府有关部门担任领导职务，共同参与执行。同时，人民政协和各民主党派推动社会力量协助政府机关贯彻执行，并在贯彻执行中不断反馈，实行民主监督。这就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比较完整的政治运行机制。

邓小平充分肯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是我国政治制度的一个特点和优点，指出：“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制有什么好处？那种多党制是资本主义互相倾轧的竞争状态所决定的，它们谁也不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这种状况是它们的弱点而不是强点，这使它们每个国家的力量不可能完全集中起来，很大一部分力量互相牵制和抵消。我们国家也是多党，但是，中国的其他党，是在承认共产党的领导这个前提下面，服务于社会主义事业的。”^{（12）}从这些重要论述中，可以概括出我国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特点和优点。

我国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区别于某些国家的一党制，也区别于西方的多党制，其基本特点是：

第一、共产党在我国各政党中处于领导地位，各民主党派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领导是政治领导，既政治原则、政治方向和重大方针政策的领导。这种领导主要是靠正确的政治主张和自身的模范行动来实现的。共产党支持民主党派充分发挥各自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独立自主地开展活动。

第二、各政党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都以四项基本原则为共同的行动准则，以实现不同时期的总任务为共同纲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成为共同的奋斗目标。

第三、在国家政权中，共产党就是执政党，民主党派是参政党，参加国家政权，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选的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参与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

第四、共产党同民主党派之间实行政治协商、互相监督。政治协商是我国发挥社会主义民主的一大特点，不论政党大小都有平等的发言权，既尊重多数人的共同意愿，又照顾少数人的合理要求。互相监督，即双向监督。而首要的是民主党派对共产党的监督。

第五、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都是合法的政党，享有宪法范围内的政治自由、组织独立和法律上的平等地位。各政党都以宪法为根本活动准则，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护宪法实施的职责。

我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同西方多党制比较，具有明显的优越性。主要是：

第一、我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建立在消灭剥削阶级、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各个政党的活动都是人民行使民主权利的体现，民主具有极大的广泛性。而西方实行多党制的国家，各个政党无论怎样标榜自己“代表民意”，实际上都是在资产阶级内部实行民主，其本质是维护资产阶级统治，谁也不代表劳动人民。

第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反映在政党制度上，各个政党能够建立起共同的奋斗目标，政党之间是通力合作的关系。而西方多党制则是不同的垄断资本集团利益矛盾的产物，各个政党相互倾轧，争权夺利。在一定条件下某些国家的某些政党之间也可能建立起短暂的合作，但只是一时的利害结合，而没有牢固的基础。

第三、我国一党领导、多党合作的政党制度能够在广泛民主的基础上形成统一的意志，协调劳动人民内部的各种利益关系，实现广泛民主和集中领导的统一，充满活力和富有效率的统一，从而能够保持国家政治的长期稳定和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而西方国家不同垄断资本集团之间，由于私利的冲突，只能用政党轮流执政的方式维持其利益的平衡，各个政党彼此牵制，力量抵消，甚至互相拆台，常常出现政局不稳。

总之，这一制度是立足于中国土壤上的新型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它的形成和发展，生动地表明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决不照搬别国的政党制度，而是充分发挥我们自己的优势，创造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这是具有重大深远意义的。

三、实行多党合作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必然要求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历史上任何一种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建立和发展，都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历史和现实的必然性。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都深刻阐述过在我国实行多党合作的必要性。认真学习领会这些精神，对于提高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认识，自觉坚持和完善这一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邓小平指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行多党派的合作，这是我国具体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所决定的。”^{（13）}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这一格局的形成，是我国近代社会历史进程的必然选择，是我国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发展的必然结果。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我国民主党派虽然有着反帝爱国的要求，但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形成强大的政治力量，中国民主革命只能由无产阶级来领导。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实践中，确立了自己在全国人民中的核心领导地位；各民主党派在自己长期的政治实践中，选择了共产党的领导，成为共产党的同盟者和合作者。在社会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之所以能够存在和发展，是因为这一制度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符合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客观要求。

（一）实行多党合作是巩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需要

邓小平指出：“中国由共产党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由共产党领导，这个原则是不能动摇的；动摇了中国就要倒退到分裂和混乱，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14）}。

我国是一个拥有 11 亿人口的、多民族的、经济文化还比较落后的大国。在这样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有一个坚强统一的领导核心。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动员组织全国人民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目标共同奋斗。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所形成的强大的社会整合力，是实现安定团结和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要求和根本保证。如果违反这一国情，照抄西方多党制，必然会导致社会混乱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失败。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正是符合我国这一特定国情的政党制度，它既是以共产党的领导为前提，又通过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合作，广泛集中人民群众的意志和智慧，强化并完善共产党的领导，这是这一制度具有生命力和优越性的根本原因之一，这是这一制度的本质特征和内在规定性之实行多党合作，有利于加强共产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在多党合作中，民主党派的主要政治功能是：一方面反映所联系的阶层和群众的愿望和要求，代表他们参政议政；另一方面协助共产党和政府向他们做工作，帮助他们进步。通过民主党派组织把广大成员纳入我国政治体系之内，走参政党的道路，充分调动他们和所联系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性；同时通过有组织的自我思想教育，使其成员不断增强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这样就增强了共产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从而把民主党派及其所联系的群众紧紧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共同奋斗。

实行多党合作，有利于实行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集中群众的智慧和力量，使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更正确、更符合实际。正如江泽民指出的：“在我国这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多民族、多党派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广泛听取各党派、人民团体以及各族各界人士的意见，进行充分的政治协商，由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进行决策，由人民政府执行实施。这样一种体制，体现了我国广泛的人民民主，它对于我们实现决策民主化、科学化，避免和减少失误，保证各项方针的贯彻执行，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5）}

实行多党合作，有利于加强对执政党的监督。毛泽东指出：在我国内是民主党派林立，这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很有利。打倒一切，把其他党派搞得光光的，只剩下共产党的办法，使同志们中很少不同意见，弄得大

家无所顾忌，这样做很不好⁽¹⁶⁾。邓小平也指出：“党要领导得好，就要不断地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就要受监督，就要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如果我们不受监督，不注意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就一定要脱离群众，犯大错误。”⁽¹⁷⁾任何权力都不能离开有效的监督，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后，也不能例外。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是我国监督机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民主党派从自身特有的角度反映一部分社会群众的意见，能够对共产党提供一种单靠党员所不容易提供的监督，能够发现工作中的一些所没有发现的错误和缺点，从而对共产党和政府的工作作出有益的贡献。

（二）实行多党合作，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需要

邓小平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当然，民主化和现代化一样，也要一步一步地前进。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¹⁸⁾邓小平从我国国情出发，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指明了方向。

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的普遍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为之长期奋斗的目标。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当前，国际敌对势力以“人权”、“民主”为幌子，对我国实行“西化”、“分化”的战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和经济文化建设的发展，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参与意识日渐增强。在抵制西方“民主”的同时，如果不建立有效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民主形式，就难以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也难以保持社会的长期稳定。同时也要看到，一定的民主与一定的时代相联系，与一定的社会经济、文化水平发展相适应。我国经历 2000 年的封建社会，缺乏民主传统。目前，我国经济文化水平还比较落后，在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许多错综复杂的矛盾，这就决定了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必须从我国的实际出发，符合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必须在团结稳定的前提下进行，必须有利于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促进经济建设的发展。

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正是适应我国的这一国情，有步骤地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最好形式。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本质特征和内在规定性之一。这一制度已经和正在开辟各种有效的民主形式，使民主渠道畅通，满足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的愿望和民主的要求，也发挥宣泄、引导的功能。同时，通过这一制度，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始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从维护社会安定团结和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要求出发，循序渐进地进行。把人民群众的民主要求，纳入到我国政治体系之内，通过正常的民主渠道得以表达，既充分发扬民主，又实行有效的集中，形成安定团结、主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这样，民主政治建设为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条件，经济建设的发展又推动民主政治建设的发展。通过不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逐步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

（三）实行多党合作，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需要

毛泽东在 1957 年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思想，并把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作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重要方面。实践证明，社会主义社会由于还存在着不同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之

间在具体利益上的矛盾，必然要求一定的社会组织代表他们的利益，反映他们的要求，这是民主党派在社会主义时期能够长期存在并发挥作用的基本原因。

当前，随着改革的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在新旧体制交替的转型期，各种利益关系处于调整变动之中，社会结构必然有所变化，形成各种新的利益群体和代表人物，社会矛盾更加复杂多样。因此，正确处理和协调复杂多样的社会矛盾，保持稳定的社会局面，是关系到改革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

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有利于正确处理和协调各种社会矛盾。在共同利益一致的前提下，各民主党派及各界人士充分表达各自所联系的群众的具体利益，使各种利益要求通过正常渠道经常地、畅通地反映到决策部门，从而有效地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并将其转化为实现社会总体利益的动力。通过这些渠道，也可以使共产党和政府及时地了解 and 掌握其他渠道不易掌握的各种社会心理、社会动向及潜在的矛盾因素，采取有效的措施加以处理、充分发挥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这一反馈、自我调节功能，对于妥善协调和处理各种社会矛盾，为改革开放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促进经济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有着重要的作用。

毛泽东关于多党合作的理论思想以及在新时期邓小平和以江泽民为代表的新一代领导集体对这一理论思想的继承和重大发展，表明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典范，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典范。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要认真学习这些理论思想，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为进一步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而奋斗。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统战部）

注释

毛泽东在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期间的谈话，1950年4月22日。见《历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概况和文献》，第7页，第6页，第6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2页，第272页。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08页。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36—1437页。

（11）《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78页，第25页。

（13）（17）《邓小平论统一战线》，第155页，第165页，第105页。

《列宁全集》第29卷，第343页。（12）（14）（18）《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31页，第232页，第154页。

（15）江泽民在参加全国人大、政协两会的党员负责同志会议上的讲话，1990年3月18日。

（16）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报告，1956年4月25日。

毛泽东与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

阿吾提·托乎提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少数民族人口所占比例虽小，居住的地方却很大，占全国面积的 50—60%。我国各民族具有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从古代开始，我国各民族的祖先就共同生活、生息和繁衍在祖国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共同创造了我们伟大的祖国的灿烂文化和历史，为祖国的统一大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民族问题是影响多民族国家兴衰存亡的大问题。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国，我们党不但成功地领导了中国革命和建设，而且在解决中国民族问题上也取得了举世公认的重大成就。我们党不仅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制定并且贯彻执行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找到并坚持了有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道路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而且善于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族理论为指导，创造性地制定出符合我国国情的民族政策，实行了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就高度重视民族问题。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族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了正确的科学的民族理论和一整套民族政策，开创了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成功道路。这条道路就是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紧密团结，对外消灭帝国主义压迫，对内推翻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消灭剥削制度，同时进一步在各民族中实行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使各族人民获得真正的解放，努力实现民族间的真正平等和民族的共同繁荣。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各族人民紧密团结，英勇奋斗 28 年，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开辟了各民族平等的新时代。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和民族问题的基本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将其作为在我们多民族国家中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作为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一种基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权形式，从而成功地解决了我国的民族问题。这在我国历史上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都是一个创举，发展和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和民族问题的基本理论。新中国成立以来 40 多年实践充分证明，我们党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符合我国的历史和现实情况，有利于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是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的根本政治制度。

—

在阶级社会中，民族是由属于不同阶级的人所组成的，在对抗性的社会条件下，民族往往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民族的解放、民族的发展、民族问题的彻底解决，只有随着无产阶级革命获得胜利，在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过程中逐步得到实现。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确定，在我国民主革命时期，将民族问题放在团结各族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的范围内加以解决。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时期起，就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基本观点，把消灭民族压迫，实现各民族平等和团结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总任务的一部分，

多次宣布我国各民族应享有平等权利。1922年7月在上海举行的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根据列宁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和我们党成立后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分析，发表宣言，说明了国际国内形势，指出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和动力，规定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党的最低纲领，即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党的最高纲领，即建立劳农专政，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社会。这就是说，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纲领，并给中国各族人民指出了民族解放和民族发展的光辉道路。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随着党领导的红色政权的建立，产生了包括有关民族法律内容的革命法律。1931年11月7日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关于中国境内少数民族问题的决议案》，这是在我们党领导下制定的我国有关解决民族问题的第一个法律文件。该决议由五条组成，第五条第二款中说，居住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少数民族劳动者，虽然在汉族占多数的地区，仍与汉族劳动人民一样平等，享受法律规定的所有权利和义务，不受任何限制和歧视。这些原则规定，促进了各族人民的觉醒，在加强民族平等、民族团结上，在共同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巩固苏维埃政权上，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再加上“左”倾错误的影响，当时尚处在幼稚阶段的中国共产党对国内复杂的民族问题还在进行探讨，所以未能（也不可能）提出解决这一问题的道路和形式。1935年8月1日，工农红军在长征途中浴血奋战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共同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又一次强调了中国境内的民族一律平等的政策。1936年5月25日，发表了《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回族人民的宣言》。宣言中比较明确地提出了民族区域自治的思想：“我们根据自决的原则，主张回民自己的事情，完全由回民自己解决，凡属回族的区域，由回民建立独立自主的政权，解决一切政治、经济、宗教、习惯、道德、教育以及其他的一切事情，凡属回民占少数民族的区域，亦以区乡村为单位，在民族平等的原则上，回民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建立回民自治的政府。”

抗日战争期间，民族工作在革命根据地被放在重要的位置，我们的政府很好地执行了民族平等团结的政策。1938年9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举行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会上毛泽东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和会议总结，要求全党同志认真地担负起领导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责任。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批准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在会议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关于我国民族关系的以下问题：“第一，允许少数民族与汉族有平等权利，在共同对日原则下，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同时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第二，各少数民族与汉族杂居的地方，当地政府须设置由当地少数民族的人员组成的委员会，作为省县政府的一部门，管理和他们有关事务，调节各族间的关系，在省县政府委员中应有他们的位置”；“第三，尊重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宗教、习惯，不但不应强迫他们学汉文汉语，而且应该赞助他们发展用各族自己言语文字的文化教育”；“第四，纠正存在着的大汉族主义，提倡汉人用平等态度和各族接触，使日益亲善密切起来，同时禁止任何对他

们带侮辱性与轻视性的言语、文字与行动。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改善国内各族的相互关系，真正达到团结对外之目的……”毛泽东的这个报告，对于革命根据地的民族工作，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接着，毛泽东在1939年12月发表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稍后又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理论著作。在著名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在深刻研究我国历史和历上的民族关系的基础上指出：“我们中国现在拥有四亿五千万人口，差不多占了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在这四亿五千万人口中，十分之九以上为汉人。此外，还有蒙人、回人、藏人、维吾尔人、苗人、彝人、壮人、仲家人、朝鲜人等，共有数十种少数民族，虽然文化发展的程度不同，但是都已有长久的历史。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

“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他们赞成平等的联合，而不赞成互相压迫。在中华民族的几千年的历史中，产生了很多的民族英雄和革命领袖。所以，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从上面的论述可以清楚地看出，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肯定了：第一，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第二，我国各族人民都是“中华民族”的组成成员，他们赞成平等的联合，而不赞成互相压迫。第三，中华民族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历史遗产，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酷爱自由。同时指出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趋向是统一、团结。这就是我们党在中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在统一、团结基础上正确解决民族问题的理论基础。

1940年4月和7月，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先后拟订《关于回族问题的提纲》和《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题提纲》，并经中央书记处批准。这是当时共产党领导少数民族工作的指导性文件。抗日战争以来，各地党组织认真贯彻执行各民族一律平等和团结抗日的民族政策，动员和组织各族人民积极参加抗日战争。共产党员马本斋领导的冀中回民支队在战斗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内蒙古人民、朝鲜族人民、海南岛黎族人民和其他各族人民，在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中，作出了巨大贡献。新疆各族人民，特别是各族爱国青年在来新疆的共产党员的教育和指导下，也积极开展支援抗日前线的活动，使新疆成为抗日战争的巩固的后方基地。这两个提纲为党中央和毛泽东系统地完善地提出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理论和政策奠定了基础。此后，我们党把民族区域自治作为我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列入了1941年11月发表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在这个纲领中提出：“依据民族平等原则，实行蒙回民族与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权利，建立蒙回民族的自治区。尊重蒙回民族的宗教信仰、习惯。”根据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一贯提倡的民族平等、实行自治制度的原则，1947年5月1日正式成立了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这是我国根据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成立的规模较大的第一个民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的成立是我们党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胜利，为我们国家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二

我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解决民族问题的伟大创举。象我国这样的多民族国家在推翻了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制度以后，为了坚持民族平等团结，实现各民族共同发展和繁荣，根据自己的历史情况和现实条件，应该很

好地解决国家的体制形式问题。这是关系到保证各民族特别是少数民族平等地位和平等权利，能否调动各族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根本问题。

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和国家学说的基本原理，针对我国 56 个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情况，创造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并作为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和国家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理论与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和我国各族人民的伟大创造。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领导各族人民，通过长期探索 and 实际工作，逐步明确了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内适宜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形式，而不适宜实行其他形式。

早在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期间，与会代表通过深入讨论，认为由于我国情况不同于苏联情况，在我国不适合实行联邦制。两国的情况不同在什么地方？周恩来指出：“历史的发展使我们的民族大家庭需要采取与苏联不同的另一种形式。每个国家都有它自己的历史发展情况，不能照抄别人的。采取民族区域自治的办法对于我们是完全适宜的。”“我们是根据中国民族历史的发展、经济的发展和革命的发展，采取了最适当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而不采取民族共和国的制度。”“我们就根据马列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一般原则和我国民族关系的实际情况，采取了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我们不主张民族分立，也没有采用联邦制。我们采取这样的政策，主张合，不主张分，是适合我国的历史情况和社会环境的。”“我国为什么要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而没有实行民族自治共和国那样的制度呢？自治的形式在我国叫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还有民族乡；在苏联叫自治共和国、自治省、民族州。这不单是名称的不同，制度本身也有一些不同……这些不同，是从两国的历史发展的不同而来的，部分地也是由于中国和当年十月革命时代的形势不同而来的。”

这就是说，我国的历史与当时的俄罗斯情况完全不同。所以，这两个国家根据各自的历史和现实条件，采取了不同的方法和形式，这样做是因各自国家的情况决定的。具体他讲：

第一，在我国历史上，自秦汉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而俄国作为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历史，和我国比较起来则很短，直到十五、十六世纪之后才逐步形成，中亚一些国家加入俄国还未超过百年。在俄国十月革命时，由于许多民族实际上分立为不同的国家，为了统一他们，为了把各个国家用苏维埃组织统一起来，才采取了联盟制。而我国各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平等的基础上共同革命，在平等的基础上共同建立了民族大家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二，俄国在十月革命以前是帝国主义国家，俄罗斯民族是典型的压迫民族。“那个时候，在俄罗斯周围的一些民族，都是被沙皇这个俄罗斯政权统治着。这是一种殖民统治。”为了彻底粉碎这种殖民关系，反对沙皇压迫，争取独立解放，列宁曾指出，各民族具有分立权，即他们可以是独立共和国，也可以加入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只有这样，才能解除以前帝国主义基础上的政治关系，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的社会主义国家才有可能站住脚跟。当时的具体情况要求俄罗斯的无产阶级这样做。而我国解放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虽然国内存在着民族压迫制度，但是总的说来，我国各族人民都是受压迫的。正如周恩来指出的一样：“旧中国虽然有北洋军阀和后

来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压迫劳动人民，压迫兄弟民族，但是整个中国则是被帝国主义侵略的国家，成为半殖民地，部分地区则成为殖民地。我们是从这种情况下解放出来的。”在我国近代史上，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间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因此，反对帝国主义和他们的走狗的压迫，是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和斗争目标，是国家独立的民族解放的关键条件。所以，这样的共同命运使我国各族人民相互联合和团结起来。

第三，在俄国，少数民族人口在全国人口中占的比例大，十月革命以前，是 50%，再加上少数民族居住比较集中，内部关系比较紧密和单纯。而我国少数民族人口只占总人口的 6%，比被列宁称为具有纯民族成分的西班牙、丹麦、德国的少数民族的民族比例还小。我国少数民族的多数与汉族杂居或几个少数民族杂居，例如我国的几个自治区内汉族人口占多数（指内蒙古、广西、宁夏），在 29 个自治州里的 15 个中，汉族人口占多数或约半数，55 个自治县里的 24 个中，汉族人口占多数或约半数。

第四，革命的发展情况也和俄国不同。俄国十月革命的发展是从城市向农村、从中部地区向边疆地区发展，革命首先在中心城市获得胜利，然后向农村和边疆地区扩展。边疆地区资产阶级的民族政府和中部资产阶级政府一样反对社会主义。所以，他们在十月革命以后，陆续脱离俄国，宣布独立，同时与国际帝国主义相勾结，宣布反对工农社会主义政权和战争。通过 3 年的内战，红军联合各族劳动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白俄军队和边疆地区资产阶级民族政府的统治和反革命联盟，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将这些分散的国家通过联邦制重新统一起来。但是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非常软弱，少数民族中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很少或根本就没有资本主义经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早就失去了领导民族民主革命资格。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获得了胜利，与此同时，中国革命由农村向城市发展。在长期的农村革命斗争中，党和工人阶级与农民、许多少数民族人民（这也主要是农民）建立了巩固的联盟；中国各族人民的革命运动（除个别外）早就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下。所以，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结果，政权未落到资产阶级手中，而且在各民族地区普遍建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实现了各民族的空前统一。这就是说，我们没有经历由民族分立，然后再走向统一的过程，而是从平等、统一、团结基础上的革命统一战线，达到平等、统一、团结基础上的人民共和国。

总之，由于我国和苏联的历史和现实情况不同，在解决民族问题上采取的政策、方法、形式也不同。这正如周恩来指出的：“在中国适宜于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而不宜于建立也无法建立民族共和国，历史发展没有给我们造成这样的条件，我们就不能采取这样的办法。”“历史发展给了我们民族合作的条件，革命运动的发展也给了我们合作的基础。因此，解放后我们采取的是适合我国情况的有利于民族合作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我们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理论同我国民族实际相结合，制定和实行一整套民族政策，坚决而不动摇地实行民族平等的原则，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成功地在我国解决了民族问题。从 1947 年 5 月 1 日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到现在，在我国建立了包括 5 个自治区、30 个自治州、124 个自治县的 159 个民族自治地方，全国 55 个少数民族中 15 个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行使自治权。自治地方的面积占全国面积的 64%，人口占少数民族总人口的 78%。此外，还成立了 1700 多个民族乡。1984 年制定了《民族区域自治法》，这

是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40 多年来的实践证明，这样的国家机构和组织形式适应和促进了民族间的平等、互助、团结、协作、共同繁荣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的发展，更加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把民族团结和民族发展紧密结合起来，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建设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人民生活显著改善，民族的大团结和祖国的统一得到了保证。它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观。

三

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中国共产党把民族区域自治作为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和政治制度，不仅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理论，而且完全符合我国的情况。从 1947 年 5 月 1 日内蒙古自治区成立算起，我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已 40 多年了。到 1990 年底，全国 55 个少数民族中有 45 个成立了自治地方，行使自治权。

1984 年，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公布实施，标志着在我国民族区域自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现在全国有 25 个自治州、82 个自治县通过法律手续批准，公布实施了自治条例；一些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先后制定了 60 多个地方条例，属于多民族地区的四川、青海、甘肃、云南、湖北、广东、辽宁、湖南、河北等九省制定和公布实施了《关于民族区域自治法的一些规定》。这对彻底落实和进一步完善民族区域自治法，促进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文化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但是，在完全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工作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民族自治地方还没有完全享受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中规定的自治权，特别是在经济文化上更是这样。出现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国家机构和上级专业管理部门的一些干部，对彻底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保证民族自治地方充分行使自治权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有关民族事务的法规建设尚不配套。所以，要进一步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解放后 40 多年的实践证明，我们党实行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正确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根本政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获得了各民族人民的欢迎，经受了实践的检验，充分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

民族区域自治具有什么优越性？

第一，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把民族自治和区域自治正确地结合起来，把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正确地结合起来，这主要表现在民族自治地方的民族成分和区域差别上，其中着眼于保证民族平等权利，有利于实现民族团结和合作，有利于民族的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因此，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既符合我国民族分布的复杂情况，又能最大程度地满足少数民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

第二，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有利于把国家的集中统一和在民族平等基础上的自治结合起来，即有利于把集中制和分权制适当地结合起来。我国的宪法上和民族区域自治法上也明确规定：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部分，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构是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的一级政权机构。作为一级地方政权机构的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构，应该服从中

央集中的统一领导，保障国家政令在民族自治地方的彻底执行。与此同时，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构享受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上指出的各种自治权，最主要的是具有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彻底贯彻执行国家的政令的权利。这就是说，自治机构在国家的统一指导下，有权自己安排和发展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文化工作和其他工作。只有这样，才能使少数民族在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指导下，充分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按照符合自己的特点的方法和措施走社会主义道路，创造自己美好的生活。这有利于民族地区的具体利益。

第三，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有利于各民族的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国家和先进地区帮助和支持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实行民族间的相互协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当前民族自治地方利用本地区的资源优势，帮助了国家建设。民族区域自治为我国各民族的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开辟了广阔的发展道路。40 几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的十几年来，自治地方的建设突飞猛进地发展，民族地区的经济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90 年，民族自治地方的工农业总产值达到 2273 亿元，比 1952 年增长了 9.8 倍。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了 46.3 倍；城乡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到 780 亿元，比 1952 年增长 39 倍，1990 年和 1980 年相比，五个自治区的生产总值和收入增长了 1.3 倍。以前少数民族地区可以说没有现代化工业，现在建立了一大批工业企业，包括国家的一些重点建设项目，能源、交通、通讯等基本设施有了明显的改善。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边贸有了突破性的进展。1990 年，民族自治地方的农牧民人均收入达到 546 元，少数民族群众的绝大多数达到温饱水平。他们中的一部分开始过着相当富裕的生活。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教育、科学技术、文化、卫生、体育事业，也有很大的发展。特别值得指出的是，现在少数民族干部从 1950 年的 1 万多人增加到 228 万，形成了在党务、政务、经济、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方面有专门技能的一支广大的干部队伍。

事实胜于雄辩。上述的成绩和民族地区出现的巨大的历史性变化说明，我们党实行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确实是加强我国各族人民团结，巩固祖国统一，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和繁荣的正确政策。当前，我国各民族正从事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是一项非常复杂和艰巨的工作。50 年代，毛泽东曾指出：“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当前我们处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刻，应该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在巩固祖国统一，促进民族团结，促进少数民族地区改革开放事业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

当前，世界上民族问题已成为最突出的问题之一。多民族的国家都几乎存在着不同性质和不同程度的民族问题，国际上的民族问题势必影响国内。外国敌对势力把边疆民族地区作为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突破口。他们打着民族、宗教的旗帜，用各种方法进行渗透，进行破坏和制造事端，妄图把我国的民族问题搞得复杂化。国内一小撮民族分裂分子也加紧推行破坏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的罪恶阴谋。对此，我们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我们应该加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民族理论和党的民族政策的教育，深刻认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正确性和重要性，坚持和完善它，高度警惕和防止敌对势力打着民族、宗教、人权的旗号进行颠覆破坏活动，紧密依靠各族干部和群众，反对民族分裂，反对渗透，反对“和平演变”，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不断促进中华民族的大团结。

未来的 10 年是对我国现代化事业具有关键意义的 10 年，也是对我国民族发展具有关键意义的 10 年。我们应该更高地举起民族团结和民族发展的旗帜，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的现代化社会主义国家而共同奋斗。只要我们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所制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加快经济建设，就一定能实现各民族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的伟大理想。

（作者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会科学院）

注释

转引自《人民日报》1953 年 9 月 9 日第 1 版。

《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2 卷，第 622 页，第 623 页。

周恩来：《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1957 年 8 月 4 日在青岛民族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周恩来：《民族区域自治有利于民族团结和共同进步》，1957 年 3 月 25 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召开的广西壮族自治区问题座谈会上的总结发言。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伟大贡献

金炳镐

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发展。毛泽东在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提出了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理论和政策，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使中国各民族得到解放和发展，民族关系得到不断协调，民族团结不断加强和巩固，在世界上树立了多民族国家圆满解决民族问题的光辉典范。在当今东欧一些多民族的国家与原苏联，民族矛盾加剧，民族纠纷、冲突和战争不断的形势下，研究和重温毛泽东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理论和实践及其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贡献，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毛泽东关于民族、民族问题的论述对马克思主义民族问题基本理论的贡献

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自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民族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伴随着民族存在和发展，民族问题也

成了重要的社会现象之一。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对民族、民族问题的观察和认识也逐渐深入。毛泽东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活动中，提出了很多关于民族、民族问题的独特观点，对马克思主义民族问题基本理论的应用和发展，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仅举几例简述如下：

一、关于民族的理论

民族是历史发展中的社会现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已经阐明民族是具有一定基本特征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是一个历史范畴；在阶级社会里民族是由不同的阶级组成的等理论。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了关于民族主体的理论。指出：民族“包括两部分人。一部分是上层、剥削阶级、少数，这部分人可以讲话，组织政府，但是不能打仗、耕田、在工厂做工。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工人、农民、

小资产阶级，没有这些人就不能组成民族。”这就是说，工农等人民群众是民族的主体，他们代表民族，他们的利益，也就是民族的利益。这一理论对正确认识民族问题与阶级问题的关系、民族问题的实质、民族利益的真实含义、民族解放和发展的真正意义等，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世界上的任何一个民族，只有在主体名副其实地在政治上占统治（或主导）地位时，民族才能实现自主、自立、自治，才能获得健康、迅速的发展，民族间才能建立和发展平等友爱、团结合作的关系。

民族在发展阶段和水平上的差别是客观存在的现象。如何看待这种差别？原苏联有一种理论，把一些落后的、没有经过资本主义阶段的非俄罗斯民族称为部族，只把那些比较发展的民族如俄罗斯、白俄罗斯等称为民族。对此，毛泽东有不同看法。1953年，中共中央在讨论《关于过去几年内党在少数民族中进行工作的主要经验总结》中，当有人提出“部族”问题时，毛泽东指出：科学的分析是可以的，但政治上不要去区分哪个是民族，哪个是部族或部落。这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理论的体现。毛泽东的这一理论，在中国民族识别工作中得到了具体体现。在中国不论人口多少，分布地域大

小和社会发展阶段高低，只要是历史上形成的、具有明显特征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一律都称之为“民族”。中国的这一作法，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毛泽东的这一理论保证了各少数民族，特别是人口很少、发展落后的少数民族都享有和行使民族平等的各项权利。

毛泽东对民族消亡的论述，也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毛泽东说：“首先是阶级消亡，而后是国家消亡，而后是民族消亡，全世界都如此。”这一理论，进一步明确了民族消亡与阶级消亡、国家消亡的关系，阐明了民族消亡的时机、条件和过程。这一理论对正确认识 and 对待社会主义时期的民族和民族特点，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它告诉人们：社会主义阶段是民族发展繁荣的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充分发展和阶级区分的逐步消失，国家和民族将依次自行消亡。任何想在社会主义阶段人为地使民族消亡的言行都是不正确的、错误的。

二、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

民族问题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十分复杂的社会问题。正确认识民族问题及其与阶段问题、社会革命问题的关系，是无产阶级政党制定民族纲领的理论前提，对能否正确解决民族问题具有决定性意义。毛泽东通过对中国和世界民族问题现实的考察分析，进一步深化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

毛泽东在1934年1月指出：“民族的压迫基于民族的剥削，推翻了这个民族剥削制度，民族的自由联合就代替民族的压迫。”这一论述揭示了民族社会政治压迫与社会经济剥削的关系和民族压迫产生的根源，指明了消除民族压迫的途径，为中国各少数民族的解放事业指明了道路。

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指出：“阶级投降主义实际上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后备军”，“在民族斗争中，阶级斗争是以民族斗争的形式出现的，这种形式，表现了两者的一致性。”这些理论深刻地揭示了民族斗争的实质，即“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明确阐述了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关系，不仅对正确制定抗日战争的方针、策略，制定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起了理论指导作用，也对一切被压迫民族反对国内外民族压迫的斗争指明了方向。

在此基础上，毛泽东还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与社会革命的关系的理论，深刻地阐明了“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并把国内的民族问题看作是中国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始终非常重视国内少数民族问题和少数民族的革命斗争，对他们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认为“争取少数民族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苏维埃政权领导之下，对于中国革命胜利前途有决定的意义”。在谈到中华民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时指出：“少数民族，特别是内蒙民族，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直接威胁之下，正在起来斗争。其前途，将和华北人民的斗争和红军在西北的活动，汇合在一起。”在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高度评价新疆伊犁、阿尔泰、塔城地区的维吾尔等少数民族人民的革命斗争，指出三区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一部分。解放后，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毛泽东也非常重视民族问题，所有有关民族问题的重大决策，几乎都由他亲自作出，许多重大的民族问题如西藏的和平解放和社会改革，他都亲启处理。正是在他的关怀下，我们党采取了各种有效措施，妥善地解决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的民族问题，使各民族间的平

等、团结、互助的关系得以建立和发展。

很明显，毛泽东关于民族和民族问题基本理论方面的观点，具有根强的现实性、实践性。这些思想高瞻远瞩地洞察和把握了当代民族和民族问题的实质，具有时代的理论广度和深度，是观察和认识当代民族问题的理论指导。

毛泽东关于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理论和政策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贡献

毛泽东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提出了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一系列理论和政策，其核心内容，可以概括为民族平等、团结、自治、发展。民族平等团结是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根本原则和总政策；民族区域自治是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形式和基本政策；各民族共同发展是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根本宗旨和现实目标。毛泽东的这些民族理论和政策及其实践经验，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一、关于民族平等的理论和政策

民族平等，是各民族都梦寐以求的，也是应有的。民族平等问题，是古今中外民族关系中的根本问题，也是民族问题中的核心问题。民族压迫、统治、剥削、掠夺、歧视、限制、奴役、同化等，都是民族不平等的表现或其结果。马克思主义主张各民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完全平等，并把民族平等作为处理民族关系的根本原则之一。毛泽东根据中国“少数民族过去与现在生活的实质”^{（10）}，提出了民族平等理论和政策，其主要之点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对内求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平等”^{（11）}，“允许蒙、回、藏、苗、夷、番各民族与汉族有平等权利”^{（12）}；二是“承认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有平等自治的权利”^{（13）}；三是各民族在言语文字、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方面都有平等权利^{（14）}；四是在一切工作中要坚持民族政策^{（15）}。

民族平等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一贯主张，是毛泽东思想民族理论的主要内容之一，是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点。“民族是至尊的，同时，一切民族都是平等的”^{（16）}，这是毛泽东关于民族的一个基本思想，他一贯主张对国内民族，给予平等权利^{（17）}，明确宣布中国共产党和中国苏维埃政府“实行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政策”^{（18）}。毛泽东在50多年的革命活动中，始终为实现中国各民族平等而努力，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各民族也确实实现了社会主义的民族平等。

民族平等，对中国国内而言，是中国各民族都处在同等的地位，具有同样的权利。毛泽东特别强调少数民族与人口众多的汉族的平等。这是无产阶级彻底的民族平等思想，也是多民族大国中实现真正的民族平等的正确途径，是中国各民族在当今世界一些国家和地区民族分裂，民族关系紧张的环境中，之所以能和睦相处的一个根本原因。

民族平等是全方位的，是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中的平等。毛泽东十分重视“尊重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宗教、习惯”，“赞助他们发展用各族自己言语文字的文化教育”^{（19）}，制定了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以及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从而实现和保障了少数民族在各个领域中的平等、自由权利。

在一切工作中要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政策，这是毛泽东提出并坚持的民族工作的纲领性指导原则。这说明，毛泽东的民族平等理论，既坚

持了马克思主义处理民族问题的根本原则，具有理论上的彻底性，又坚持了在民族地区一切工作中加以实施，具有实践上的彻底性，是中国能够不断顺利解决民族问题的理论政策基础。

二、关于民族团结的理论和政策

民族团结联合是马克思主义处理民族关系的一个根本原则。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团结的理论，提出了民族团结的重要性，民族团结的基础、条件、实质、目标和民族内部团结与民族之间团结的关系，民族团结与反对民族主义的关系的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

毛泽东的民族团结理论是各民族人民“平等的联合”⁽²⁰⁾的理论。它包括三个层次内容：中华民族整体的即“全民族团结”；中华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即“国内各民族的团结”⁽²¹⁾；中华民族“联合世界上一切以平等待我之民族”⁽²²⁾。

毛泽东指出。“几百年来，中国各民族之间是不团结的”，“一这是反动的清朝政府和蒋介石政府统治的结果，也是帝国主义挑拨离间的结果”⁽²³⁾，也就是说，这是帝国主义和国内统治阶级的民族压迫、民族不平等的政策造成的。民族团结是使我们伟大祖国“走上独立、自由、和平、统一和强盛的道路”⁽²⁴⁾的前提条件和政治基础。中国各民族的团结是“兄弟般的团结”⁽²⁵⁾，“不论大的民族小的民族都要团结”，“只要是中国人，不分民族，凡是反对帝国主义、主张爱国和团结的，我们都要和他们团结”⁽²⁶⁾，“在这一团结基础之上，我们各民族之间，将在各方面，将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方面，得到发展和进步”⁽²⁷⁾，“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我国各民族间的团结，……共同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²⁸⁾。

毛泽东科学地阐明了党是民族团结的核心力量，“只有经过共产党的团结，才能达到全阶级和全民族的团结”⁽²⁹⁾，阐明了民族内部团结和民族间团结的重要性，强调既要“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我国各民族间的团结”，也要进一步加强和巩固各民族“内部的团结”⁽³⁰⁾。他又指出，在中国，要搞好民族团结，中心是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团结，“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一定要搞好。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克服大汉族主义。在存在有地方民族主义的少数民族中间，则应当同时克服地方民族主义。”⁽³¹⁾毛泽东把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作为一种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在无产阶级民族工作中开创了一个极为光辉的先例，并积累了丰富经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已成为社会主义的民族工作的主题。

毛泽东特别重视和强调搞好对少数民族的统一战线工作，把它作为加强各民族团结的一个重要途径。始终注意和重视发挥少数民族上层在民族团结方面的作用。值又是毛泽东民族理论中的一大特点，也是中国民族团结的一条基本经验。

毛泽东把民族团结看作是与中国革命和建设成败攸关的大事，也是一个伟大的创见，他指出：“只有经过全阶级全民族的团结，才能战胜敌人，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³²⁾，“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³³⁾。历史已经证明，我国各族人民正是在毛泽东民族团结理论和政策的指引下，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取得今天的解放和发展的。今后，我国各族人民也只有坚持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才能取得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的更大胜利。

三、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理论和政策

民族区域自治，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运用到中国民族问题实际的史无前例的创举，是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形式和重要制度。几十年的实践经验证明，民族区域自治是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成功道路。

各个国家的民族情况不同，历史发展不同，因而解决民族问题的方式也不同。但是，都以实现民族平等、联合、自主、自治、发展繁荣为主要内容。毛泽东和我们党从 30 年代起就明确提出让少数民族建立自己的自治区域的主张，1938 年毛泽东提出：我国各少数民族与汉族有平等权利，“在共同对日原则之下，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同时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34）}1945 年和 1947 年提出“允许各少数民族有民族自治的权利”^{（35）}，“承认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有平等自治的权利”^{（36）}。并且先后在陕甘宁边区等革命根据地和内蒙古为蒙、回等民族建立了一些民族自治区域，取得了宝贵的经验。建国后，在全国推行区域自治，大力训练少数民族自己的干部^{（37）}。目前，在全国各民族聚居地区已建立了 159 个民族自治地方，45 个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总人口的 80%，已经实现了区域自治的愿望。

我们党和毛泽东逐步确立民族区域自治的理论和政策，表明了我们党在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方面已走向成熟，表明毛泽东在实事求是地分析中国民族情况、民族关系情况和中国历史及革命斗争情况基础上，提出解决民族问题道路的严肃态度和客观真理性。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是民族自治和地方自治的正确结合，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的正确结合，既有利于各民族平等团结，又有利于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还有利于国家统一的巩固。近几年一些联邦制国家分裂的形势，更说明毛泽东民族区域自治理论的英明、伟大和正确。

推行民族区域自治，让少数民族人民当家作主，关键在于培养造就大批少数民族干部。这是民族问题本身的特点、民族干部的特点和特殊作用所决定的。毛泽东一贯重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工作。建国初期一再强调：“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从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38）}，“我们一定要帮助少数民族训练他们自己的干部”^{（39）}，并把训练少数民族干部作为建国初期两项中心工作之一，而且要求各“自治区要有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科学家、技术人才、文学家、艺术家等等”^{（40）}。在这个光辉思想指导下，建国 40 多年来，我国已培养了少数民族干部 200 多万名。从而为我国实行“真正的民族区域自治”创造了重要条件。

四、关于少数民族发展的理论和政策

发展，是历史和社会的永恒的主题，也是民族和社会追求的目标。民族问题是民族发展中出现的矛盾，也只能在民族发展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得到解决。毛泽东关于少数民族发展的理论是非常广泛的、丰富的，关于少数民族发展的政策是成功的。毛泽东关于少数民族发展的理论和政策的核心，是“让各少数民族得到发展和进步”，并把这看成“是整个国家的利益”^{（41）}，而“方针是团结进步，更加发展”^{（42）}。他认为，少数民族的发展，一是这些地区社会改革必须进行，二是国家和汉族人民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三是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要全面发展，特别是经济要发

展。毛泽东的这些光辉思想是他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宝库增加的新贡献。中国少数民族发展的理论和经验，将对当今世界各民族，特别是少数民族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毛泽东根据我国少数民族地区解放前还存在原始公社所有制、奴隶主所有制、封建主所有制等情况，指出“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是一件重大的事情”（43），强调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制度的改革必须实行”（44），并根据不同条件逐步完成了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社会改革，也同社会革命一样，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社会和民族各方面发展的动力。所以，社会改革是少数民族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当然少数民族的社会改革本身也是少数民族的一种发展，必须慎重稳进。

毛泽东根据苏联俄罗斯民族同少数民族关系很不正常的情况，提出我们应当接受这个教训，“我们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45），强调少数民族地区的物质因素是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因素，而且一切物质因素只有通过人的因素，才能开发利用。毛泽东从中国历史发展，少数民族的贡献，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在我国现实社会中的地位以及国际上的教训等角度，提出和阐述了“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的必要性、重要性。但他又指出：“不要以为只是汉族帮助了少数民族，而少数民族也极大地帮助了汉族”，“少数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国防上，都对整个国家整个中华民族有很大的帮助”，中国“没有少数民族是不行的”（46）。

毛泽东十分强调少数民族发展的全面性。他指出，少数民族的发展既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的发展，也包括人口的发展。而且指出“如果共产党不能帮助你们发展人口、发展经济和文化，那共产党就没有什么用处”（47）。他特别强调要搞好民族地区的经济工作，强调“中国国民经济没有少数民族的经济是不行的”（48），号召民族地区“努力生产，改善自己的物质生活；并在这个基础之上，一步一步地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49）。

毛泽东关于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理论和政策，是毛泽东民族理论的重心部分，是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根本原则和措施，是最具有中国特点的民族理论体系的核心部分。它过去在我国民族工作中发挥了根本的指导作用，今后仍将对民族工作发挥理论指导作用。

毛泽东关于民族工作的原则、方法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贡献

毛泽东在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过程中，提出了许多民族工作的原则、方法。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注意少数民族的特点、特殊性，正确处理民族问题上的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等，是具有特色的毛泽东民族理论的一部分，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重要发展。

一、原则性和灵活性，共同性和特殊性的结合，是毛泽东民族工作原则、方法的一大特点，“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有自己的特点”。“少数民族问题，它有共同性，也有特殊性。”（50）因此，“共同的就适用共同的条文，特殊的就适用特殊的条文”。民族自治地方“可以按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51），就是这一重要原则的体现。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民族工作原则、方法，我国在民族工作中充分注意了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殊性，制定了 100 多个自治条例和单

行的条例，正确处理了民族地区发展中的许多特殊问题。

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主义时期民族工作的主题，是毛泽东民族工作原则和方法的重要方面。毛泽东在 1957 年提出了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理论，并把它运用到了民族工作中，把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作为需要克服的一种人民内部矛盾。虽然大汉族主义思想是“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民族关系上表现出来的反动思想”（52），是有些地方民族关系很不正常的重要原因，但是，还是把它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加以处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做民族工作，搞好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处理民族内部的矛盾问题，主要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即使对敌我性质的个别事件的处理，对多数参与的群众也应按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加以处理，这既可以争取大多数，又可以孤立少数，使民族工作顺利开展。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期，在民族问题上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更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三、“按照各民族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进行工作”（53）。这是毛泽东民族工作原则和方法的重要方面。中国各民族的状况是不同的，无论是地理分布上，社会经济发展上，还是民族文化生活上都是这样。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分类、分步骤、分先后做，这是毛泽东在民族工作中的一贯做法。“有的地方可以做得快一点，有些地方可以做得慢一点，”（54）条件成熟了去做，一个条件成熟，其他条件不成熟，不进行重大改革（55）。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民主改革、社会主义改造），都是按照这种方法去做的，虽然经历的时间较长，但效果很好。在民族工作的其他方面，如经济上也采取了这种方法，社会反映和效果都很好。在当前的民族地区的改革开放中，也都采取这种工作方法，使各民族地区按自己的特点和优势各显其能，谋求自身的更快发展。

四、“商量办事”，“作好事也要商量着做”（56）这也是毛泽东民族工作原则和方法的又一大特点。毛泽东强调“商量办事，这是共产党和国民党不同的地方”（57）。中国共产党是代表各民族人民利益的，又是最尊重各民族人民的平等、自主、发展权利的，因此，做好事和商量办事是完全统一的。党和毛泽东在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制度改革、风俗习惯改革等问题，特别是在西藏的改革和发展问题上都这么做了，社会效果极好，受到各民族人民的赞同和欢迎。

五、“一切工作中要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政策”。这是毛泽东民族工作的根本原则，也是最重要的特点。毛泽东曾讲到“在西藏考虑任何问题，首先要想到民族和宗教问题这两件事，一切工作必须慎重稳进”（58）。也就是说，在民族地区无论做什么事，都要首先想到民族问题，要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政策。这已成了建国后毛泽东和我们党民族工作的传统。我国现有的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成果，是与毛泽东的这一民族工作原则和传统密切相关。

六、“要对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经常注意检查”（59）。这也是毛泽东民族工作的重要原则和做法。毛泽东一再强调“必须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60），“很好地处理我国各民族之间的关系”（61），多次指出党内和人民中存在大汉族主义的问题，多次提出反对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问题，特别是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要求经常注意检查民族关系情况，发现问题，认真处理，不要只口里讲。根据毛泽东的指示，1953 年、1956 年、1975

年进行过全国性的民族关系和民族政策执行情况的检查，发现和解决了许多问题。此后也进行了2、3次检查。毛泽东提出的这一做法，也作为我党民族工作的传统做法之一确定下来了。

七、“要广泛地持久地进行无产阶级的民族政策教育”。这是毛泽东高瞻远瞩地提出的、具有战略意义的民族工作原则和做法。毛泽东指出：“历史上的反动统治者，主要是汉族的反动统治者，曾经在我们各民族中间制造种种隔阂，欺负少数民族。这种情况所造成的影响，就在劳动人民中间也不容易很快消除。所以我们无论对干部和人民群众，都要广泛地持久地进行无产阶级的民族政策教育”⁽⁶²⁾。这一做法是中国民族工作的独创，在我国民族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政策，是需要经过经常宣传、教育、灌输，才会被人们所理解、掌握，才会影响到人们的言行中。我们党的新一代领导人，继承民族工作的这一传统做法，十分注意对干部、群众、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少年的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和党的民族政策的教育。这是党和国家进一步做好民族工作的重要保证。

毛泽东关于民族工作的原则和方法，是毛泽东民族理论和政策的体现，它是经过长期实践检验的、行之有效的民族工作原则和方法，对推动我国民族工作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学院）

注释

《毛泽东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纪要》，1970年12月18日。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58页。

转引自《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9年第5期，第19页。

(12)(16)(17)(18)(19)(34)《民族问题文献汇编》，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12月，第211页，第306页，第210页，第595页，第323页，第595页，第304页，第595页，第595页。

(11)(20)《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396页，第539页，第752页，第623页。

《呼吁世界人民联合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种族歧视、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美帝国主义种族歧视的正义斗争的声明》，1963年8月8日 转引自1963年8月9日《人民日报》。

(29)(32)《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51页，第278页，第278页。

(13)(22)(24)(36)《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38页，第1238页，第1464页，第1238页。

(14)参见《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内蒙古人民宣言》，1935年12月20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1938年10月，《民族问题文献汇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323页和第595页。

(15)《毛泽东书信选集》第349页。

(21)(31)(33)(39)(43)(44)(45)(55)(59)(60)(62)《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57页，第781页，第757页，第697页，第696页，第782页，第733页，第696页，第732页，第733页，第732页。

(23)(25)(27)《在庆祝和平解放西藏办法达成协议的宴会上致词》，1951年5月24日，1951年5月28日，《人民日报》。

(26)(41)(42)(47)(53)(54)(56)(57)《毛主席接见西藏国庆观礼团时的讲话》；1953年10月18日，转引自《新华日报》1954年7月号第23页。

(28)(30)《在庆祝藏历本羊年新年宴会上的致词》转引自1955年2月25日《人民日报》。

(35)《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64页。

(37)参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要点》，1951年2月18日。

(38)《对西北少数民族工作的指示》，1949年12月，转引自《人民日报》，1973年3月15日。

(40)参见《1957年夏季的形势》，1957年7月。(46)(61)《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55年3月。(48)《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1955年10月11日。(49)《复新疆喀什疏附县帕哈太克里乡全体农民的信》，1952年8月30日，转引自1952年12月8日《人民日报》。(50)(51)《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1954年6月14日。(52)《批判大汉族主义》，1953年3月16日。(58)转引自1977年9月23日《人民日报》。

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思想民族理论在内蒙古的实践

郝维民

中国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在历史上，尽管各民族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但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是国家逐步走向统一，各民族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这是因为我国各民族之间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有着不可分离的内在原因，到了近代，外国侵略者企图利用民族问题分裂中国、吞并中国、灭亡中国；而国内清朝、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府都对少数民族实行民族压迫政策，从而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民族问题。于是民族问题就成为近代中国的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

毛泽东在研究中国近代社会问题的时候，特别注意中国的民族问题。他在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应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从中国民族问题的实际出发，在民主革命的实践中，探讨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理论与政策，并取得了成功。这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内蒙古民族问题不仅是近代内蒙古的重大社会问题，是内蒙古革命的重要内容，而且是中国民族问题中最突出最典型的问题。这样，内蒙古民族问题就成为毛泽东研究中国民族问题的主要对象之一，并在这里进行了长期的实践。本文就从这个角度探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思想民族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以求教于同行。

—

从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到 1938 年 10 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对国内民族问题进行了反复的研究，探索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道路。

1920 年 12 月 1 日，毛泽东在致蔡和森的信中讨论中国革命和组建中国的无产阶级政党问题时，就提出了我国少数民族的解放及其与中国革命的关系等问题，他说既要“在中国做事”，也要“在世界做事”，“如帮助俄国完成它的社会革命；帮助朝鲜独立；帮助南洋独立；帮助蒙古、新疆、西藏、青海自治自决，都是很要紧的。”毛泽东既把帮助中国边疆少数民族的解放与帮助国际革命放到同等重要的地位看待，又把它与国际革命区别开来，作为国内民族问题，主张以自治自决的方式达到民族的解放。中国的少数民族问题已成为他思考中国革命问题的重要内容，而且把它与建党和社会革命联系在一起。这是中国的共产主义者首次论及国内民族问题。

紧接着，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中对国内边疆少数民族问题作了马克思主义分析，指出蒙古、西藏、新疆等处，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成为少数民族聚居的区域，而且在经济上与中国内地不同，也就是说既有民族特点，也有地区特点。中国军阀以武力统一这些经济生活与内地不同的少数民族，将“阻碍蒙古等民族自决自治的进步”，应当依据经济不同的原则，尊重边疆少数民族的自主，“促成蒙古、西藏、回疆三自治邦，再联合成为中华联邦共和国”。中共二大宣言对中国边疆少数民族问题作了言简意明的分析之后，在党的民主革命纲领中提出：“蒙古、西藏、回疆三部实行自治，成为民主自治邦”；“用自由联邦制，统一中国本部、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这是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

指导，从中国民族问题的实际出发，按照民族平等的原则制定的第一个民族问题纲领。毛泽东作为党的创始人之一，他对蒙古等边疆少数民族问题的主张，无疑在党的二大民族问题纲领中得到了体现。

内蒙古是中国共产党最早开展工作的少数民族地区。从 1923 年开始，在蒙古民族中产生了第一批共产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在内蒙古地区相继建立，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逐步形成，工农牧群众革命运动迅速发展，内蒙古也处在全国大革命高潮之中。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蒙古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成为这一时期内蒙古革命的突出特点。1925 年秋天，中国共产党专门作出《蒙古问题议决案》，分析了内蒙古的阶级、阶级关系、民族关系以及民族特点和地区特点，重申了党的民族政策，号召蒙古民族的解放运动要与全国的解放运动结合起来，蒙汉人民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仇敌大地主、王公、帝国主义、军阀，实现共同的解放。从此，蒙古民族的解放斗争就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一部分。

在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对国内民族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1931 年 11 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中国境内少数民族问题的决议案》，分析了中国民族问题的阶级根源、历史根源和少数民族遭受民族压迫的现状，庄严声明“反对一切对少数民族的压迫，而主张他们的彻底解放”；指出少数民族人民与汉族人民同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剥削，有着共同的命运，他们应当联合起来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共求解放；重申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则，消灭一切民族间的仇视与成见，反对大汉族主义的倾向。“决议案”宣布了关于民族问题的五点政纲，并将其主要精神写入了这次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各民族“在苏维埃法律前一律平等，蒙、回、藏、苗、黎、高丽人等，凡是居住中国地域内的，他们有完全自决权；加入或脱离中国苏维埃联邦，或建立自己的自治区域。中国苏维埃政权在现在要努力帮助这些弱小民族脱离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王公、喇嘛、土司等等的压迫统治，而得到完全的自由自主。苏维埃政权更要在这些民族中发展他们自己的民族文化和民族语言”。这次大会的决定使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更加具体化、法律化。

1934 年 1 月，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又专门阐述了“苏维埃的民族政策”。他列举了少数民族被压迫的事实后指出，蒙古等少数民族“都受着帝国主义和中国历来封建皇帝与封建军阀的剥削和统治”，少数民族内部的统治阶级也与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相勾结，压迫、剥削少数民族人民，甚至直接投靠帝国主义，把少数民族地区变为殖民地，“这是少数民族过去与现在生活的实质”。他深刻地阐明：“民族的压迫基于民族的剥削，推翻这个民族剥削制度，民族的自由联合就代替民族的压迫。”“共同的革命利益，使中国劳动民众与一切少数民族的劳动民众真诚地结合起来了。”他指出：“争取一切被压迫的少数民族环绕于苏维埃的周围，增加反帝国主义与反国民党的革命力量，使一切被压迫民族得到自由与解放，是苏维埃民族政策的出发点”。少数民族的解放“只有中国苏维埃政权的彻底胜利才有可能，赞助中国苏维埃政权在全国范围的胜利，同样是各少数民族的责任”。毛泽东的这一系列论断，深刻地揭示了我国民族问题的实质，精辟地阐述了我国各民族的共同命运和少数民族的解放与全国革命的关系。这是毛泽东思想民族理论的新发展，它成为中国共产党指导国内民族工作的理论基础。从此，毛泽东思想民族理论，在党的决议和苏维埃共和国

及红军的法令、条例中得到了体现。1935年8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会议上通过的《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

中专门制定了“关于少数民族中党的基本方针”，指出：“争取少数民族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苏维埃政府领导之下，对于中国革命胜利前途有决定的意义”，并重申了党和中国苏维埃政府的民族政策，特别强调“红军主力到甘陕青宁等区域后，对回、蒙民族须作更大的努力。”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工农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北以后，立即着手开展内蒙古的蒙古民族工作和西北回族工作。12月20日，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发表了《对内蒙古人民宣言》；1936年5月25日又发表了《对回族人民的宣言》。这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以蒙、回两个民族为对象，对国内民族问题和党的民族政策所发表的纲领性文件，在少数民族中，特别是在蒙、回民族中产生了巨大影响，对于党的民族工作和蒙、回民族的抗日救亡斗争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对内蒙古人民宣言》首先揭露日本帝国主义“欲占领全中国，必先占领满蒙，欲称霸于全世界，必先占领全中国”的侵略计划；指出内蒙古民族是首受其害者，日本侵略者“正在用各种欺骗手段，假借‘大蒙古主义’，来达到占领蒙古的整个土地财富，奴役整个内蒙古人民”，“最后消灭蒙古民族的目的”。同时揭露蒋介石为首的中国军阀在内蒙古设置行省，抢占土地牧场，“企图逐渐消灭蒙古民族”的罪行。“宣言”声明“中国红军战斗的目的，不仅是把全中华民族从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压迫之下解放出来，同样的要为解放其他的弱小民族而斗争，首先就是要帮助解决内蒙古民族的问题。我们认为只有我们同内蒙古民族共同奋斗，才能很快的打倒我们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蒋介石；同时相信，内蒙古民族只有与我们共同战斗，才能保存成吉思汗时代的光荣，避免民族的灭亡，走上民族复兴的道路”。“宣言”庄严宣布：原内蒙古6盟、24部、49旗、察哈尔和土默特二部，及宁夏三特旗之全域，均应归还内蒙古人民，作为内蒙古民族之领土，取消热、察、绥三行省；内蒙古人民有权解决自己内部的一切问题，“内蒙古民族可以从心所欲的组织起来，它有权按自主的原则，组织自己的生活，建立自己的政府，有权与其他的民族结成联邦的关系，也有权完全分立起来。总之，民族是自尊的，同时，一切民族都是平等的。”“宣言”最后热情歌颂“蒙古民族素以骁勇善战见称于世，我们相信你们若一旦自觉的组织起来，进行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军阀于内蒙古领域以外，则谁敢谓成吉思汗之子孙为可欺也。”

毛泽东《对内蒙古人民宣言》的发表，对于内蒙古革命运动的发展，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从1936年初开始，党从伊克昭盟入手，大力开展内蒙古的革命工作，使内蒙古革命运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伊克昭盟南部革命根据地的创建，百灵庙军事暴动，以归绥为中心的进步思想文化运动的兴起和抗日救亡斗争的发展，等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内蒙古革命运动的新高涨。

从建党到全面抗战爆发的近20年期间，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中，对国内民族问题和党的民族政策进行了不断的探索，形成了以下基本认识：一、认为中国的少数民族问题是中国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少数民族的解放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一部分；二、中国民族问题的实质是中国历来的统治阶级对少数民族的剥削和压迫，帝国主义对少数民族的侵略和奴

役；三、承认中国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则，主张各民族的平等团结，各民族有着共同的命运和共同的利益；四、尊重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自由；五、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文化和教育事业，使他们摆脱贫困；六、承认民族自决权，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或实行联邦制，或成立少数民族的独立国家，均由少数民族自己决定。在充分尊重少数民族的自主权的同时，对采取什么样的形式解决国内民族问题，仍在探索之中。这些政策在当时，对于团结各民族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国民党军阀的大汉族主义民族压迫，发动少数民族的解放斗争，起了极为重要的动员和促进作用。这是毛泽东思想民族理论和党的民族政策的探索阶段。

二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在内蒙古东部地区设置了隶属于伪满洲国的兴安四省，进而向内蒙古西部侵犯，并扶植起一个伪蒙古军政府。1937年七七事变后不久，内蒙古除了伊克昭盟、河套地区和阿拉善、额济纳两旗之外，都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日本侵略者在归绥策划成立了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建立起企图进军大西北，成立伪回回国的桥头堡。日本帝国主义以所谓满、蒙、回三个傀儡政府为旗号，煽动民族分裂，企图肢解我国东北、北部、西北边疆，吞并全中国。

在这国难当头，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时刻，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他在“全中华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中提出：“我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但是国内各个党派各个阶级的，而且是国内各民族的。针对着敌人已经进行并还将加紧进行分裂我国内各少数民族的诡计，当前的第十三个任务，就在于团结中华各民族（汉、满、蒙、回、藏、瑶、夷、番等）为统一的力量，共同抗日图存。”这实际上是抗日战争时期党的民族工作的总方针。毛泽东在报告中还提出了民族工作的四项基本政策：“第一、允许蒙、回、藏、苗、瑶、彝、番各民族与汉族有平等权利，在共同对日原则之下，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同时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第二、各少数民族与汉族杂居的地方，当地政府须设置由当地少数民族的人员组成的委员会，作为省县政府的一部门，管理和他们有关事务，调节各族间的关系，在省县政府委员中应有他们的位置。第三、尊重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宗教、习惯，不但不应强迫他们学汉文汉语，而且应赞助他们发展用各族自己言语文字的文化教育。第四、纠正存在着的大汉族主义，提倡汉人用平等态度和各族接触，使日益亲善密切起来，同时禁止任何对他们带侮辱性与轻视性的言语、文字与行动。上述政策，一方面，各少数民族应自己团结起来争取实现；一方面应由政府自动实施，才能彻底改善国内各族的相互关系，真正达到团结对外之目的，怀柔与羁縻的老办法是行不通了的。”

毛泽东在深入研究国内民族问题的基础上，针对日本帝国主义利用民族问题制造民族对立，煽动民族分裂，进而吞并全中国，最后灭亡中华民族的阴谋，针对国民党政府对国内少数民族实行大汉族主义民族压迫政策，除了重申保障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尊重少数民族的文化、宗教、习惯，禁止对少数民族的歧视，反对大汉族主义等政策外，特别提出各民族在统一力量、

共同抗日的原则之下，少数民族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这是中国共产党解决国内民族问题方针的重大转变，为以后党的民族政策的完善奠定了基础。

之后，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受中央委托，主持西北少数民族工作，成立民族问题研究室，专门对蒙、回民族问题进行调查研究，为中央制定民族政策提供资料和依据。蒙古民族问题研究组除了搜集有关图书资料外，还派人到伊克昭盟等地对蒙古地区的社会、历史、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日伪、国民党的活动等进行调查，并于1940年7月为中央起草了《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题提纲》⁽¹¹⁾，由西北工作委员会报中央，毛泽东亲笔签发：“基本上经中央书记处批准”。这是中国共产党对蒙古民族工作的又一个纲领性文件。

“提纲”首先以“蒙古民族的特征”为题，分析了国内蒙古民族的历史、经济、政治、宗教等各方面的情况，既热情歌颂蒙古民族在历史上是个强悍善战的民族，又以极大的同情分析了蒙古民族因受国内民族压迫和帝国主义的侵略而陷于贫穷落后的现状，指出：“蒙古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必须与中国革命结合起来才有可能。”其次，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对蒙古民族的侵略政策和阴谋手段，分析了伪蒙疆政权的傀儡性质。第三，从各个方面剖析了国民党对蒙古民族实行大汉族主义政策，进行残酷的经济掠夺、政治压迫、文化奴役，镇压蒙古民族的解放斗争，加深了蒙汉民族矛盾，并离间蒙古民族与共产党的关系，甚至把一部分蒙古上层推向了日本侵略者方面。第四，分析了蒙古民族对抗战的态度。指出由于日寇的拉拢和国民党的压迫，蒙古族中坚决降日者虽为数不多，但坚决抗日者也还是少数，大多数人是抱观望的中立态度；“蒙古民族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它居住于中日战争极关重要之战略地带”，所以“蒙古民族站在中国抗战方面？还是站在日寇方面？这就是现在蒙古民族问题的中心，同时也就是抗战中的严重问题之一。”第五，以“团结蒙古民族抗日的可能条件与基本政策”为题，阐述了团结蒙古民族抗日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因为日寇是蒙古民族的最大敌人，它对蒙古民族的欺骗是不会持久的；中国的抗战，特别是共产党和八路军在蒙古民族中的政治影响日益扩大；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存在与发展，对内蒙古抗日解放运动的影响；蒙古民族已有一部分抗日先进分子，广大蒙古人也在觉醒。所以，只要采取正确的民族政策，团结蒙古民族抗日是可能的。

“提纲”从9个方面提出了26项具体政策，除了采取必要措施唤醒蒙古民族坚定抗日的认识和信心外，蒙古民族在政治上应与汉族享有平等的权利，在敌后成立抗日政权和统一的蒙古地方政府，蒙古民族有管理自己事务之权，在蒙古地方设县治局，必须由蒙古人自愿自主，蒙古人有充分的参政之权；要开放民主，蒙古族人民享有抗战建国的自由，可以组织各种团体参加抗日；尊重蒙古民族的风俗、习惯、宗教、语言、文字与信教自由，反对歧视蒙古民族的言论与行动；帮助蒙古民族改善与提高人民生活，政府拨款救济，禁止强占蒙人牧场土地，废除一切苛捐杂税和徭役，禁止高利贷，实行防疫防空和免费医疗；帮助蒙古民族的抗日军队，组织抗日武装，并享有与国民革命军同等待遇；在蒙古民族中实行抗战教育，发扬蒙古民族优良文化与革命传统，培养抗战建国人才，设立各级免费学校；帮助蒙古族人民发展生产，提高蒙古民族的经济生活；改善各民族间的关系，巩固抗日团结，蒙古民族与国内各民族在平等原则之下共同抗日，并实现建立统一联合的三

民主义的新共和国。

《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题提纲》是对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的民族工作总方针和民族政策的具体化，它不仅对蒙古民族，对国内各少数民族的工作均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也是对毛泽东关于各少数民族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国家的方针提出的具体构想，它是毛泽东思想民族理论和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逐步完善的重要标志之一。

从此，内蒙古的民族工作有了巨大发展。1939年6月，当成吉思汗灵柩由伊盟迁往甘肃途经延安时，延安各界近两万人举行盛大祭典，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代表谢觉哉、滕代远、王若飞出席。以后又在延安建立了成吉思汗纪念馆，毛泽东亲笔题写了“成吉思汗纪念馆”7个大字。这在蒙古民族中产生了极大影响。同时在延安成立了蒙古文化促进会，吴玉章兼任会长；建立了蒙古文化陈列馆，宏扬蒙古民族的优秀文化；创办蒙民招待所，接待到延安参观的蒙古牧民；在中央党校、陕北公学先后开办的少数民族班、蒙古青年队、民族部中培养了不少蒙古族干部，1941年延安民族学院成立以后，蒙古族学员占有大多数。一大批蒙古族干部在革命圣地延安成长起来。延安成为蒙古民族解放事业的灯塔。

党对蒙古民族的政策，在抗日根据地逐步实施。1939年10月，曾在《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12）}中规定“实现蒙、回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与汉族的平等权利，依据民族平等的原则，联合蒙、回民族共同抗日”；“尊重蒙、回民族之信仰、宗教、文化、风俗、习惯，并扶助其文化的发展”。1941年5月1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13）}除重申上述政策外，特别规定“建立蒙、回民族的自治区”。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区域自治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主张正式提了出来。1938年，毛泽东亲自决策创建了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蒙古民族工作是党在这里的中心工作之一。当时，中共绥远省委下设蒙民部，由省委书记白如冰兼任部长，有关地县党委也设蒙古民族工作部门和人员，同时成立了中共土默特旗工委；在《绥察行政公署施政纲领》^{（14）}中规定，“保证绥察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并与汉族有同等参加政府之权”；“在民族杂居地区，抗日政府可设立蒙、回、满民族行政部门，专门处理民族自身问题”；“在纯一民族居住地区，帮助建立抗日政权，该政权之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设施，不随意加以干预”；“不推翻王公制度，而是扶助王公抗日”。绥察行政公署还设蒙政处，有关专员公署及县政府也没有蒙民部或科，在培养民族干部，建立蒙古民族抗日武装，团结蒙古王公上层抗日，争取伪蒙军反正等方面，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在伊克昭盟先后由中共绥蒙工委和伊盟工委领导，建立了伊盟南部革命根据地，在大部分旗建立了党组织；蒙古民族与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团结在抗日的旗帜下，形成了陕甘宁边区的北部屏障；特别是在伊盟南部进行了蒙古民族自治的试点，成立了蒙民自治区，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提出：“要求改善国内少数民族的待遇，允许各少数民族有民族自治的权利”^{（15）}。他指出：“国民党反人民集团否认中国有多民族存在，而把汉族以外的各少数民族称为‘宗族’。他们对于各少数民族，完全继承清朝政府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反动政策，压迫剥削，无所不至。……这是大汉族主义的错误的民族思想和错误的民族政策。”要求共产党人“必须帮助少数民族的广大人民群众，

包括一切联系群众的领袖人物在内，争取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解放和发展，并成立维护群众利益的少数民族自己的军队。他们的言语、文字、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应被尊重。”⁽¹⁶⁾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逐步形成了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以民族区域自治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方针和基本政策。

三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对蒙古民族以及各少数民族仍然实行大汉族主义民族压迫政策，在内蒙古也兴起了蒙古民族的“独立”、“自治”运动，成立了所谓“内蒙古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和各种形式的“自治政府”，掀起了“内外蒙合并”运动，形势极端复杂而紧迫。中国共产党不失时机地按照上述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方针政策，大力开展内蒙古的民族工作，引导正在兴起的蒙古民族运动向正确的方向发展。10月初，乌兰夫等奉中央指示，经过耐心细致的工作，解散了“内蒙古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10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内蒙工作的意见》⁽¹⁷⁾，分析了内蒙古在解放战争中战略地位的重要性，提出“对内蒙的基本方针，在目前是实行区域自治”，发动群众，开展自治运动，建立自治政府。11月8日，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向中央提出先成立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统一领导内蒙古自治运动，准备将来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的建议⁽¹⁸⁾。11月10日，中共中央复电同意上述意见，并指示目前各省区内之蒙民可先成立地方性质的自治政府⁽¹⁹⁾。11月26日，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成立大会在张家口召开，8个盟36个旗及有关方面代表79人出席，大会通过了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目前工作方针、会章、宣言等，宣布成立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乌兰夫当选为主席。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发动群众，开展自治运动的组织者与领导者，是建立内蒙古自治政府的桥梁，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内蒙古自治运动的旗帜正式树立起来了。这不仅是内蒙古民族民主革命斗争中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区域自治解决国内民族问题伟大实践的开始。

鉴于抗日战争胜利后内蒙古地区各种类型的“独立”、“自治”运动的兴起，中国共产党不主张立即成立自治政府，而是以自治运动联合会的形式，把一切能够争取的民族运动组织联合起来，统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内蒙古自治运动的旗帜下，尔后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再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这在政策上是正确的，策略上是英明的，实际上也是成功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成立后，一方面在内蒙古西部锡察盟地区开展自治运动，一方面积极开展东蒙工作，争取联合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和呼伦贝尔自治政府，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由于中共中央东北局和冀热辽分局、西满分局密切配合，经过与东蒙自治运动领导人的洽谈，1946年成功地召开了承德“四三”会议，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和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共商统一内蒙古自治运动的大业，通过了《内蒙古自治运动统一会议的主要决议》⁽²⁰⁾，确立了内蒙古实行平等自治（即区域自治）的方针，否定了“独立自治”的主张；树立了中国共产党对内蒙古自治运动的领导地位，决定解散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明确了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是内蒙古自治运动的领导机关，并扩大了联合会机构，决定解散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确定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统

一领导内蒙古的民族武装部队等等。“四三”会议不仅在内蒙古民族解放运动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对于中国共产党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方针也起了重要的作用，是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决定性的一步。

“四三”会议之后，内蒙古自治运动迅速地发展起来。由于农村牧区的民主改革，基层旧政权的改造和新政权的建立，民族武装部队的组建，各种民族运动力量向自治运动联合会的靠拢，成立统一的内蒙古自治政府的问题自然地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1946年12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准备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的指示；1947年3月23日，中央再次发出《关于内蒙古自治诸问题的意见》⁽²¹⁾，同意立即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并就内蒙古自治政府与内蒙尚未解放地区的关系，自治政府纲领问题，内蒙古自治区与各解放区的关系，成立内蒙古统一的党组织等问题，作了具体指示，特别指出“内蒙古自治政府非独立政府，它承认内蒙民族自治区仍属中国版图，并愿为中国真正民主联合政府之一部分”。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4月23日，在兴安盟王爷庙召开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各族各界代表392人出席，乌兰夫作政治报告，回顾了内蒙古自治运动的历史，总结了一年来自治运动联合会的工作，提出了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后的主要工作。大会讨论通过了“政治报告”、《内蒙古自治政府施政纲领》、《内蒙古自治政府暂行组织大纲》和《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宣言》，选举了内蒙古临时参议会和自治政府委员，向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出了致敬电，乌兰夫当选为内蒙古自治政府主席，5月1日内蒙古自治政府宣告成立。“施政纲领”明确规定：“内蒙古自治政府是内蒙古蒙古民族各阶层联合内蒙古区域内各民族实行高度自治的区域性的民主政府；内蒙古自治政府以内蒙古各盟（包括盟内旗县市）旗为自治区，是中华民国的组成部分。”⁽²²⁾5月19日，毛泽东、朱德电贺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指出“曾经饱受困难的内蒙同胞，在你们领导之下，正在开始创造自由光明的新历史。我们相信：蒙古民族将与汉族和国内其他民族亲密团结，为着扫除民族压迫与封建压迫，建设新蒙古与新中国而奋斗。”⁽²³⁾

内蒙古自治政府的成立，是毛泽东思想民族理论和中国共产党长期探索形成的解决国内民族问题基本政策的一次伟大实践，并且取得了巨大成功，是内蒙古革命和蒙古民族解放运动新的里程碑。7月：日，内蒙古共产党工作委员会成立，公开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对内蒙古自治区的领导。在内蒙古自治运动发展过程中，组建了内蒙古骑兵武装，开展自卫解放战争；在农村牧区进行了社会民主改革，解放社会生产力，发展社会经济。在全国民主革命胜利发展的形势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前夕，1949年9月下旬，内蒙古全境获得解放，内蒙古民族民主革命取得彻底胜利。

毛泽东和党中央为了实现内蒙古统一的民族区域自治，1948年决定将哲里木盟和昭乌达盟从辽北、热河两省划归内蒙古自治政府管辖。1949年2月，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期间，中央有关领导人专门讨论了内蒙问题。毛泽东提出要为恢复内蒙古历史地域积极创造条件，逐步实现内蒙古统一的民族区域自治，并将自治政府领导机关由乌兰浩特迁到归绥市，9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同时将内蒙古自治政府改称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1952年初，周恩来针对有人对蒙绥合并持不同意见指出：“推行内蒙古区域自治还有阻力，这就是我们的一些同志还没有真正理解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还不了解党中央解决内蒙古问题的意

图。毛主席对蒙绥合并有明确指示：蒙绥合并问题要开两扇门，一扇门是蒙人要欢迎汉人进去开发白云鄂博铁矿，建设包头钢铁企业；一扇门是汉人要支持把绥远合并于内蒙古自治区，实现内蒙古统一自治。内蒙古划进一些汉族，有利于蒙汉团结，建设边疆。蒙绥合并是中央已经定了的问题，毛主席也说过，要按中央定的、毛主席说的办。”^{（25）}1950年9月，中央曾批准将察哈尔省所辖多伦、宝昌、化德三县划归内蒙古自治区；1952年9月撤销了察哈尔省建制。1952年6月，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迁到归绥市。经过大量细致的工作，于1954年3月将绥远划归内蒙古自治区，撤销绥远省建制。1955年7月，又撤销热河省建制，将原属热河省的翁牛特、喀喇沁、乌丹、赤峰、宁城、敖汉等6个旗县划归内蒙古自治区。1956年4月，国务院决定将甘肃省巴彦浩特蒙古族自治州和额济纳蒙古族自治旗划归内蒙古自治区。至此，全部撤销了国民党政府于1928年在内蒙古设置的热、察、绥三行省，实现了内蒙古统一的民族区域自治，1954年2月28日《人民日报》曾为蒙绥合并发表了题为《中国历史上解决民族问题的重大措施》的社论，赞扬“这是中国历史上以民族平等、团结互助的精神解决民族问题的重大措施，是内蒙古自治区，也是全国各民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在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进一步解决民族问题，推进国家建设事业的正确的、必要的措施，是只有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人民民主的中国才可能出现的伟大事件。”^{（26）}

确实如此，内蒙古革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胜利发展，内蒙古自治区在轰轰烈烈的解放战争中宣告成立，又经过9个年头实现了内蒙古统一的民族区域自治，而且在每个发展阶段和每个重大问题上，都是毛泽东亲自作出英明的决断，进行正确的指导，直至取得圆满成功。周恩来曾赞扬内蒙古自治区是模范自治区。如果说内蒙古自治区的成立和内蒙古统一的民族区域自治的实现，是开辟了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道路，这无论如何是不过份的；说它为以后我国各个民族自治区、自治州、自治旗县的成立创造了经验，也是无可否认的事实。这一切都应归结到毛泽东思想民族理论和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的科学性、正确性及其伟大的成功。

（作者单位：内蒙古大学）

注释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3页。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2年7月。

《苏维埃中国》，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刊印，1957年7月，第11页，第17页，第286—289页。

（11）《六大以来》，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第687页，第732页，第764页，第1004页，第1118页。

转引自《民族政策文件汇编》第1编，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33—134页。

（12）《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实录》，1939年版。

（13）《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汇刊》，1942年版。

（14）《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资料选编》（上），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265页。

（15）（16）《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64页，第1083—1084页。

(17)(18)(19)(20)(21)(22)《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档案史料选编》，档案出版社，1989年1月，第1页，第5页，第6页，第51页，第171页，第231页。

(23)《乌兰夫研究》1993年第1期，第47页。

(24)《民族政策文件汇编》第1编，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页。

(25)王铎：《五十春秋》，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2年12月，第368—369页。

(26)《民族政策文件汇编》第2编，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63页。

毛泽东与新疆

朱培民

邓小平曾经说过：“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新疆各族人民的解放就是一个生动的明证。每当历史的关键时刻，总是毛泽东给新疆各族人民指明方向。

胸怀全局，关注新疆各族人民历史命运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公元前 60 年开始，中央政府就在新疆行施行政管理权，新疆各族人民都为中华历史和中华文化作出过重大贡献。

近代新疆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封建社会。新疆各族人民不仅遭受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而且遭受了封建势力的压迫和剥削；不仅受汉族反动统治者的压迫和奴役，而且受本民族内部封建势力的剥削和压迫。新疆各族人民为了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反抗反动统治阶级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长期以来曾经不断地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

毛泽东对新疆各族人民的历史命运极为关注。早在 1920 年 12 月，毛泽东在给蔡和森的信中就提到新疆，他在民主革命时期的著作和为党起草的文件中多次提到了新疆和维吾尔族。1933 年，苏联与新疆地方实力派盛世才结盟，建立了亲苏政权，共产国际指示中国共产党要重视对新疆的工作，从此，打通国际路线，解决革命根据地的战略依托问题，就成了中国共产党一贯的战略方针。1935 年 6 月 16 日，中央军委致电红四方面军领导人，“今后我一、四方面军总的战略方针应是占领陕甘川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红军东征是为了打通国际路线，因蒋介石、阎锡山的阻挠，为了团结抗日，党中央决定回师陕北。

西征目的也是为了打通国际路线。打通苏联的道路有二：一是宁夏及绥西，一是经甘、凉、肃州到新疆。为了实施宁夏战役计划，1936 年 10 月 25 日，中革军委命令红四方面军之三十军渡过黄河；随后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及红五军、红九军也渡过黄河。11 月，绥远抗战爆发，苏联方面通过外蒙援助红军的计划难以实施。不得已，共产国际决定改由新疆哈密向红军提供援助。为此，共产国际特派出陈云（化名施平）、滕代远（化名李广）、段子俊、冯铨（即何晓理）、李春田 5 人前往新疆，进行各项准备工作。11 月 10 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根据共产国际的意见，命令河西部队组成西路军，西进打通新疆。在 4 个多月的时间里，西路军以殊死的战斗谱写了英勇悲壮的史诗。毛泽东和党中央对西路军指战员关怀备至，多次指示行动方针，为援救西路军多方奔走。毛泽东电示西路军左支队“视情可向新疆转移，并委派陈云和滕代远同志迎接。”1937 年 4 月陈云、滕代远等五人，由盛世才派官员和专车从中苏边境接到迪化，迎接西路军左支队余部。

在苏联的推动下，1937 年，中国共产党与盛世才建立了统战关系，陈云任中国共产党驻新疆第一任代表。应盛世才的请求，党中央和毛泽东派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 100 余名中共党员来新疆工作。他们发展教育事业，

哺育新疆一代革命青年成长；开展新文化运动，传播马列主义和进步文化；办好《新疆日报》，大造抗战舆论；整顿财政，改革币制，稳定物价，发展经济；清除帝国主义势力，巩固边防；改革政治，加强民族团结，为各族人民办好事。在苏联和中共帮助下，六大政策的执行给新疆社会带来了新的生机，不仅创造了解放前新疆经济发展的最高水平，而且更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新疆各族人民服务的精神，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概，在新疆各族人民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播下了革命的种子。从此，闭塞的新疆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直接联系起来。

盛世才的本质是个军阀，为人阴险狠毒，惟利是图，野心很大，他不可能将六大政策坚持到底，当盛世才在新疆的统治巩固以后，当他看到人民群众觉醒了以后，他又举起屠刀将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 and 大批进步力量杀害，把新疆各族人民重新投入黑暗的深渊。毛泽东为新疆各族人民的解放牺牲了一位亲人。

英明决策，促成新疆和平解放

1949 年是中国革命在全范围内胜利的一年。新疆各族人民渴盼解放，如大旱之望云霓。毛泽东深切地了解新疆各族人民的心愿，运筹帷幄，英明决策，促成新疆和平解放。1949 年 3 月，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语重心长地勉励王震，要继续发扬英勇奋战，不怕艰苦的革命精神，准备带领部队进军新疆，去为各族人民多办好事。4 月下旬，国共和谈破裂后，国民党政府首席代表、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军政长官张治中留在北平。中共中央考虑利用张治中的关系促进新疆和平解放。4 月 28 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指出：用和平方法解决西北问题。看样子，此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张治中等人现在决定留平，并向我方靠拢。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北问题这件事，我们或须考虑通过张治中的帮助去做。

1949 年 7 月初，刘少奇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秘密访苏，与斯大林商讨建国的有关问题。在两党会谈中，苏方向我党谈到了新疆问题，并向我党提供了一些情况和建议。苏方谈到随着我党解放全国的形势，美国人在策动一个阴谋，即鼓动西北五马军阀（指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马步青、马呈祥）把部队撤退到新疆，成立一个“伊斯兰国”，与我们对抗。如果美国人的这个阴谋得逞，我们国内战争的问题，就将成为国际问题，那样事情就不好办了，所以苏方建议我们提前解放新疆。

原先中央军委决定“明春开始经营新疆”。中共中央得知苏联提供的情况后，再综合全国的局势分析，中央决定提前解决新疆问题。7 月 6 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描绘了解决西北和新疆问题的蓝图。电报指出：“除用战斗方式解决外，尚须兼取政治方式去解放，对此你们有何意见？我们认为，西北地区甚广，民族甚复杂，我党有威信的回民干部甚少，欲求彻底而又健全又迅速的解决，必须采用政治方式，以为战斗方式的辅助。现在我军占优势，兼用政治方式利多害少。其办法即为利用靠拢我们的国民党人和我们的人一道组织军政委员会，以为临时过渡机构。这样的国民党人就是张治中、傅作义、邓宝珊。”“陶峙岳现在动摇，有和平解决新疆的意向。我们认为应利用张治中组织新疆军政委员会，以张治中为主席，我们的人（是否王震去新疆）为副主席再加伊犁方面一人为副主席，以为过渡机关。”7 月 23 日，毛

泽东就打马战役及进军新疆问题致电彭德怀，指出：“如能于八月上半月完成打马战役，休整半月至一月，九月西进，十月占领兰州、西宁及甘、凉、肃三州，则有可能于冬季占领迪化，不必等到明春。辰兄（指苏联—引者）极盼早占新疆，彼可给以种种协助，包括几十架飞机的助战。少奇、高岗、稼祥现在彼处，只要你们进军计划确定，彼方即可考虑协助问题。”“照我想，只要平凉战役能歼两马主力，西北战局即可基本解决，往后占领甘、宁、青、新四省基本上只是走路和接管问题，没有严重的作战问题，辰兄又能用空军协助，则占领新疆是不难的。”

7月24日至8月11日，第一野战军发起陇东追击战（平凉战役），追歼马步芳、马鸿逵部，解放平凉、天水等大片地区。8月4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告知：自胡宗南主力被歼后，两马节节后退，我一路已占平凉固原，另路日内可占天水，接着向兰州进军。八月底或九月初可能占领兰州，那时即可准备进取新疆。同时，彭德怀发出关于攻取兰州、西宁的作战命令，决定集中优势兵力首先歼灭国民党军马步芳部。

为了配合人民解放军向西北的进军，苏联主动提出在新疆有三区革命，与国民党对立，建议我们进行联络，以牵制国民党，有利于新疆解放。中央考虑，如果再从国内派人去来不及，路也不好走，所以临时决定派代表团政治秘书邓力群，以中共中央联络员身份，从莫斯科赴伊宁。毛泽东认为：“解决新疆问题的关键是我党和维族的紧密合作，在此基础上迫使国民党就范，并使张治中、陶峙岳、刘孟纯等为我服务，使新疆能够和平地少破坏地接收过来并有序地改编国民党军队。”这可以说是中央解决新疆问题的基本方针。8月18日，毛泽东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主任的名义给阿合买提江写信，邀请三区派出新疆代表出席即将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高度评价了新疆三区革命，称三区革命是“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运动的一部分”。伊犁、塔城、阿山三区人民的奋斗，对于全新疆的解放和全中国的解放，是一个重要的贡献。又说：我们认为民族军是较有训练的维吾尔族的人民军队，在过去数年中以自己的革命行动钳制了国民党反动军队十万人，对于中国革命起了相当大的配合作用。

在人民解放军向全国和西北胜利进军的形势下，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新疆省政府主席鲍尔汉等爱国将领和爱国人士“认为国民党已无前途，无力再做军事抵抗，所以倾向和平，积极进行活动”，策划和平起义。然而陶峙岳等策划起义的工作是艰难的。因为，陶峙岳不掌握军队实权，当时新疆的国民党部队一部分是马步芳的（整编骑一师），大部分是胡宗南的（整编七十八、四十二师）。骑一师师长马呈祥，七十八师师长叶成，及七十八师所属一七九旅旅长罗恕人坚决主张反共战争。当马步芳没有被打垮时，马呈祥对马步芳的忠心是不会改变的，当胡宗南没陷入困境时，叶成、罗恕人也不愿动摇，陶峙岳都很难影响他们。所以策划起义的工作不能不经曲折的过程，不能不采取一步做好再走一步的步骤。

8月26日，人民解放军攻占兰州。9月5日，解放西宁，马家盘踞数十年的巢穴，全部摧毁。形势的发展更加有利于新疆和平起义。马、叶、罗迫于形势，一致同意和平转变，但不愿在新疆受伊犁方面的改编，而愿开到酒泉等候人民解放军改编。陶峙岳等找苏联驻迪化总领事萨维列也夫，保证对人民解放军方面不做任何抵抗，并且要求通过苏联方面与中共方面取得联系，开始具体谈判。9月6日，马呈祥、叶成驻绥来、奇台的军队开始撤退。

但是，因为历史上造成的民族隔阂，随着国军的撤退，回汉民族一部分人跟着国军向东跑，而其他少数民族一部分人则向特区跑，引起各族民众极度不安，家家惊扰，人人自危。马、叶、罗妄图乘机反扑，新疆处在危机之中。

为了加速促进陶峙岳、鲍尔汉和平起义，毛泽东针对新疆的情况作出几项重大决策：第一，根据迪化方面与三区存在的隔阂，针对群众中惊慌情绪，中央没有批准三区提出的派民族军跟着国军撤退接防的建议，并令陶峙岳所属部队应照原样在各区各县驻防，不要调动集中，待人民解放军入疆分别换防时再行调动集中编整，以免秩序混乱。第二，9月8日，毛泽东约见张治中，告诉他解放大军已经决定由兰州和青海分两路向新疆进军，希望他致电新疆军政负责人起义，还说，只要他去电，他们是一定照办的。张治中欣然同意。9月10日给陶峙岳、鲍尔汉拍发了电报，11日又给陶发了一封电报。陶峙岳接到张治中的来电觉得光明在望，一切行动增添了无穷力量，所以也就一往无前了。第三，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要求抓紧向新疆进军。9月10日，一野发起了河西战役。第二兵团司令员许光达率部沿兰新公路向西北追击。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王震率二军由青海取捷径进入河西。9月19日占领张掖，20日第一、二兵团在张掖会师，并继续向酒泉挺进，直叩新疆大门。第四，毛泽东致电邓力群，要求邓力群尽快进驻迪化。邓力群在苏联驻迪化副总领事叶谢也夫的陪同下，9月15日到达迪化，16日与陶峙岳、鲍尔汉会谈，并传达中央指示要陶、鲍立即派员至兰州与彭德怀洽商和平解决新疆问题。

此时，发生了一个小波折，苏联驻伊宁总领事阿里斯托夫对陶峙岳放马呈祥、伊敏等人出走一事提出异议，要求中共中央命令陶峙岳扣押马呈祥等反动分子。是放还是扣？9月19日，毛泽东致电邓力群指出：马呈祥、罗恕人、叶成及其他坏分子，只要有可能，应让他们乘飞机逃走，愈逃得多愈有利。

9月25日、26日，陶峙岳、鲍尔汉分别领衔发布起义通电。9月28日，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给陶峙岳、鲍尔汉及新疆军政起义人员发来电报，对他们和平起义表示嘉勉。与此同时，毛泽东命令一兵团向新疆开进，新疆实现了和平解放，从此掀开了新的历史篇章。

民族团结，解决新疆问题的关键

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进驻新疆后，怎样领导新疆各族人民建设新疆？当时百业凋敝，百废待兴，问题成堆，什么是解决新疆问题的关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认为，“解决新疆问题的关键是我党和维族的紧密合作”。10月23日，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新疆问题给彭德怀的电报》中再次强调：人民解放军只有和维吾尔族（以及其他民族）建立兄弟般的关系，才有可能建设人民民主的新新疆。新疆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维吾尔族是新疆的主体民族，因此，搞好民族团结至关重要，这是进行各项工作的前提和基本保证。人民解放军进疆后，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之下，执行共同纲领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根本上改变了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实行了民族平等团结，建立了各族人民友爱合作的新关系。

毛泽东认为：“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在新疆少数民族中，由于苏联的长期影响，一些人到苏联学习，又经过一定时期的斗争，故在少数民族

中已有一些先进的共产主义分子或同情者，他们以前组织过共产主义者同盟，后又成立保卫和平民主同盟，所以，在新疆少数民族中建立共产党的组织已有相当的基础。1949年10月15日，赛福鼎·艾则孜在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时，向中共中央写了入党申请书，并转达其他同志请求入党的坚强志愿。10月23日，毛泽东在赛福鼎入党申请书上写了批语：“同意赛福鼎同志入党。此信由赛本人带交彭德怀同志即存彭处。待新疆分局成立后，由赛同志向分局履行填写入党表手续。”1949年12月下旬，经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决定并报中央批准，首先吸收了赛福鼎·艾则孜（维吾尔族）等15名党员。这15名党员，包括7个民族，少数民族14人，其中维吾尔族8名。从1950年初开始，迪化市委和各区党委、地委开始直接吸收党员，截至1950年11月底，共发展党员995名，其中绝大多数是三区革命的骨干和进步组织的负责人。

为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毛泽东当时要求青海、甘肃、新疆、宁夏、陕西各省省委及一切有少数民族存在地方的地委，都应开办少数民族干部训练班，要求新疆在3年内要培养出1万名左右懂得政策又能联系群众的忠实于人民利益的民族干部。根据毛泽东的这个要求，新疆分局立即着手开办地方民族干部训练班，分局办的第一期地方民族干部训练班于1950年4月初开学。王震在开学典礼上把地方民族干部训练班比喻为“制造人民干部的工厂”。地方民族干部训练班不仅新疆分局办，区党委、地委、县委也办。地方民族干部训练班的学员毕业后，参加各种社会改革实践，在实践中锻炼，增长才干，表现好的则吸收入党入团。我党培养的第一代少数民族干部很快成长起来，成为各级领导班子的骨干。据1950年10月统计，全疆正副专员、县长165人中，少数民族干部为107人。

要解决民族问题，搞好民族团结，就必须为各族人民多办好事。驻疆人民解放军遵照毛主席关于你们到新疆去的主要任务是力各族人民多办好事，要以替历史上压迫少数民族的反动统治者还债的精神在那里工作的指示，发扬人民解放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生产队的优良传统，胜利地进行了剿匪平叛的斗争，保护了人民生命财产，稳定了社会秩序；参加地方建党、建政工作，结束了各族人民被压迫被奴役的历史，使各族人民真正成了国家和社会的主人。特别是驻疆人民解放军，在王震领导下，响应毛泽东关于军队参加生产的号召，弘扬延安精神，开展大生产运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王震明确指出：我们不是与民争食，相反地要助民求食，我们要以集体劳动、集体经济的优越性，示范于新疆人民。王震从长远的观点出发，把军队屯垦看成建设边疆，减轻新疆各族人民负担，加强民族团结，巩固西北边疆的战略措施。

部队参加生产，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按1950年1月计算，要解决部队19.3万人全年的粮食问题，除本省调运2万吨外，尚需从苏联进口2万吨，每吨3000卢布，粮价和运费至少需要人民币1620亿元（旧币）。由于部队生产，6、7月间粮食开始自己供应，没有再进口，为国家节省了一大笔钱。同时省内调运粮食也减少了。减轻了各族人民的负担。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农民交的田赋和附加负担是70余万石粮食，更沉重的负担是还要出“出差”，南疆的群众用小毛驴把军队的给养运到迪化，运到北疆，往返一次，疆的群众用小毛驴把军队的给养运到迪化，运到北疆，往返一次，少则一两个月，多则要半年，因此，老百姓把出“公差”看成畏途。解放后，由于部队生产

自给，1950年农民只交了44万石粮食，“公差”也免除了。这就是说，新疆的部队增加了一倍，而群众的负担却减少了将近一半。新疆各族人民从这里看到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本质，同国民党军队压迫、掠夺人民是根本不同的。对此，毛泽东曾经作了高度评价，他说：我王震部入疆，尚且先用全力注意精打细算，自力更生，生产自给。现在他们已站稳脚跟，取得少数民族热烈拥护。

慎重稳进，有步骤地进行社会改革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要真正解决民族问题，必须进行社会改革。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失。”“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那末，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应该采取什么方针呢？

1950年6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指出：“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是一件重大的事情，必须谨慎对待。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急躁，急了会出毛病。条件不成熟，不能进行改革。一个条件成熟了，其他条件不成熟，也不要进行重大的改革。”“没有群众条件，没有人民武装，没有少数民族自己的干部，就不要进行任何带群众性的改革工作。”

在北京参加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的王震、邓力群于6月12日致电中共新疆分局，电称：“中央对于新疆民族区域的社会改革事宜肯定推迟。目前工作中心是培养训练本地民族干部，举凡属于社会改革性质问题如反恶霸等均应立即停止。”中共中央认为，新疆是多民族地区，各项工作必须照顾民族特点，联系民族问题考虑，应充分估计新疆宗教问题的复杂性和群众的落后性。中央承认新疆的特殊性，因此，某些中央规定的法令，在新疆可以缓行，如果条件成熟，群众自动起来要求若干社会改革（如减租减息等），可以进行调解，实行若干改革，但必须经过请示，而且要征得少数民族中经过群众选择的领袖同意。1950年7月，中共中央再次指示新疆分局，在新疆进行社会改革必须采取稳重和谨慎的步骤，在今年除极少数地区进行试验性的减租外，一般不要进行减租，但应积极准备。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新疆从1950年9月至1951年10月，在全省各地的农业区的147个乡试办了减租。从1951年9月开始，在全疆农业区普遍开展减租反霸斗争。至1952年5月，在全疆9个专区的58个县，1500多个乡，近400万人口的地区完成了减租反霸任务，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减租反霸只是削弱了封建势力，并没有彻底改变封建的土地制度。许多农民群众说：地主阶级和封建土地制度是一座山，恶霸等反革命分子是山上的狼，减租反霸中把这批狼打倒了，可是这座山还挡着我们前进的路。这充分说明农民在减租反霸后，对于土地的要求是十分迫切的。

经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批准，1952年9月至1953年12月，在新疆农区分四期进行了土地改革，打倒了千百年来压在各族人民头上的地主阶级，彻底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使345万农民，分得737万多亩土地，使各族农民不仅摆脱了汉族反动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而且结束了本民族内部的以地主阶级为代表的封建势力的压迫和剥削，真正在政治上、经济上得到了翻身。各族农民欢欣鼓舞，他们更加热爱毛主席，更加信赖中国共产党。1952年3月23日，疏附县帕哈太克里乡维吾尔族农民在庆祝土地改革胜利的大会上，

以长诗形式给毛泽东写了一封致敬信——《献给毛泽东》，倾诉过去的苦难生活，描述土改翻身的喜悦，抒发他们对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无比热爱的深厚感情。8月30日，毛泽东复信给帕哈太克里乡全体农民，鼓励他们“在爱国丰产的口号之下，更加团结，努力生产，改善自己的物质生活；并在这个基础之上，一步一步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

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一项根本政策。1953年4月，中共中央同意新疆民族区域自治计划草案，并且指出，必须贯彻“慎重稳进”的方针，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过程还可以拉长一点时间，不要着急，以做好工作，进一步加强各民族的团结。1954年，新疆建立了行署级区域自治单位1个，专署级区域自治单位4个，县级区域自治单位6个。1955年10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民族区域自治的实现，是新疆各族人民生活中的一个具有历史性的巨大胜利。

到1957年，新疆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标志着在新疆基本上消灭剥削制度，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新疆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为实现各民族之间的平等互助、团结合作、共同繁荣和幸福生活，开辟了广阔的前途。

总的来说，在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我们的政策是比较稳当的，是比较得到少数民族赞成的。新疆各族人民由衷地感谢毛泽东给他们带来新的美好生活。和田地区维吾尔老人库尔班·吐鲁木决心要骑着毛驴到北京，去感谢毛泽东。这件事一时传为美谈，强烈地震撼人们的心灵。它充分表达了新疆各族人民对毛泽东的无比热爱和无限深情。

稳定和发展，当代新疆的两大主题

在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以后，民族地区的工作以什么为中心？或者说什么是民族地区第一位的工作？这个问题在较长一段时间里没有正确解决。不过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同样显示了他的理论智慧。

1962年，新疆发生了伊塔事件。1962年4月，伊犁、塔城边境地区6万余居民逃往苏联，5月29日，伊宁市少数暴徒又制造了暴乱事件。伊塔事件发生的原因，主要是苏联当局长期以来有组织、有计划地策动的结果。但我们对各族人民生活安排不好，照顾不够，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在党中央的领导下，自治区党委、区人委正确地、果断地处理了这一事件。为新疆的稳定，中央命令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对边民外逃地区遗留下来的农牧业生产和基层工作实行代耕、代牧、代管，并要求兵团沿中苏边界建立国营农（牧、林、矿）场带。

新疆发生的问题，引起了毛泽东的深思。1963年9月27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对新疆工作作了重要指示：在新疆，“第一，要做好经济工作，农业、畜牧业、工业要一年比一年发展，经济要一年比一年繁荣，人民生活要一年比一年改善”。“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要有积累，但积累不能过多；粮食要征购，但任务不能过重，征购不能过头。要减轻人民的负担，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二，要政治挂帅，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要注意搞好民族关系，增强民族团结”。

这是毛泽东生前对新疆广大干部和各族人民的殷切厚望和巨大关怀，它为解决新疆问题指明了方向。毛泽东的指示实际上提出了发展和稳定是当代

新疆的两大主题，是解决新疆问题的关键。民族团结，社会稳定是发展经济的前提条件，没有民族团结、社会稳定，一切都无从谈起，所以，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增强各民族团结。然而只有生产一年比一年发展，经济一年比一年繁荣，人民生活一年比一年改善，才会有真正的坚固的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发展是稳定的最可靠的保障。因此，发展经济又是新疆第一位的工作。

这是因为：第一，马克思主义最重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是一切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社会主义尤其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也必须靠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因此，把发展经济作为第一位的工作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第二，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这是新疆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新疆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建国以来虽然民族之间事实上的不平等正在消失，但是，无庸讳言，少数民族地区和内地汉族地区，西部地区与沿海地区经济和文化发展上的差距还是很大的。只有大力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才能逐步缩小这个差距，真正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才会有坚固的民族团结。第三，新疆地处祖国西北边陲，与原苏联、蒙古、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等5国接壤，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只有生产发展了，经济繁荣了，人民生活改善了，社会安定了，才会有巩固的边防，才能显示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新疆，经济是否发展，人民生活是否改善，不仅对内影响民族团结，而且对外直接有国际影响。当时毛泽东就曾提出，新疆各族人民生活改善，不仅要比国民党时期好，而且要比苏联好。

毛泽东的指示，是继1945年《论联合政府》中关于“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论述之后，又一次提出了生产力标准问题，并且对生产力标准作了一个重要的完善，即不仅要看生产力是否一年比一年发展，而且要看人民生活是否一年比一年改善。因为生产力发展了，虽然给人民生活的改善提供了物质保证，但并不是自然而然地就可以提高人民生活。如果高积累、高征购、乱摊派，加重人民的负担，即使生产发展了，经济繁荣了，人民生活也不能改善。所以，毛泽东把人民生活是否改善，作为生产力标准的一个重要内容，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要改善人民的生活，除了发展生产外，还要减轻人民的负担，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问题，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要有积累，但积累不能过多，粮食要征购，但任务不能过重，征购不能过头。减轻人民的负担，主要是减轻农民的负担，不解决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就不可能有持续的农业、畜牧业生产的发展，最终也不会有工业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

自治区党委和区人委坚决贯彻执行了毛泽东的指示，区党委向中央写了《关于贯彻执行毛主席对新疆工作的指示，加强做好经济工作的报告》和《关于贯彻执行毛主席对新疆工作的指示，加强政治挂帅的报告》，这两个文件抓住了发展和稳定两大主题，除去一些“左”的提法以外，基本上是正确的。因此，1963—1966年新疆经济取得较大的发展。然而在十年动乱中，由于“以阶级斗争为纲”，不可能真正做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毛泽东在世时，在新疆未能实现毛泽东的厚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

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给新疆带来了蓬勃生机，各方面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民族团结空前增强，“两个离不开”的思想深入人心，政治稳定，社会安定，真正开始实现毛泽东关于“农业、畜牧业、工业要一年比一年发展，经济要一年比一年繁荣，人民生活要一年比一年改善”的指示。然而在新疆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的任务是艰巨的。要实现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步骤，要缩小与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还得作长时间的艰苦努力。今后，毛泽东关于发展和稳定的指示仍然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作者单位：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校）

毛泽东民族思想在西藏的实践

丹珠昂奔

西藏问题是中国民族问题中较为突出而复杂的问题之一。西藏和平解放后的 40 年，是毛泽东民族思想在西藏实践的 40 年。总结这一伟大实践，有利于进一步解决好西藏问题，对于国内其他民族地区乃至国际民族问题的解决也有借鉴意义。

一、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和平解放西藏，让西藏回到祖国怀抱

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民族分裂往往是在外部势力的支持下进行从而得逞的。帝国主义觊觎西藏，与帝国主义分割中国的历史是相一致的。

1774 年，东印度公司派秘书波格尔由不丹进藏，企图“和平通商”；1779 年，英国驻印度总督赫斯定再次派忒涅·桑德潜入西藏活动。英帝国主义霸占西藏之心早已有之。自尼泊尔、布丹、锡金等国先后沦为英殖民地后，帝国主义刺刀已指向拉萨。继而发生了西藏人民保家卫国的隆吐山、江孜等战役，西藏人民同东南沿海人民一样加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浩浩洪流，产生了无数可歌可泣的故事。1904 年 9 月 7 日，腐败的清政府与英签订《拉萨条约》，严重地挫伤了西藏广大僧侣、爱国人士抗敌卫国的积极性，英军进入圣地西藏，13 世达赖流亡，西藏的形势日益复杂多变。1904 年至 1949 年，中国人民经历了推翻帝制的喜悦，经历了军阀割据、战火连绵的苦难。

北伐战争、8 年抗日战争，3 年全国解放战争，都程度不同地反映在西藏社会，西藏内部的独立与反独立势力也进行了长期的斗争。

针对西藏民族的特殊性和西藏内、外矛盾的特殊性，党中央和毛泽东制定了有利于长远的民族团结和藏民族利益的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毛泽东说：“西藏人民是爱祖国而反对外国侵略的，他们不满意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策，而愿意成为统一的富强的各民族平等合作的新中国大家庭的一分子。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必能满足西藏人民的这个愿望。”

毛泽东和平解放西藏方针的具体体现是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 17 条协议。17 条协议中明文规定了中央承认西藏现行的政治、宗教制度，和达赖、班禅的固有地位，要依据西藏实际情况发展农牧工商业，发展语言、文字、教育等，而第一条之第一句便是“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这一条很重要，西藏地方政府不彻底摆脱帝国主义的影响，就很难维持西藏的和平，也就不可能彻底抛弃“独立”主张，真正回到祖国怀抱。像 1950 年欲进藏劝说达赖的格达活佛（时任西康省政府副主席）遭到帝国主义分子及“独立”分子的忌恨，受阻昌都，后中毒身亡，便是突出一例。

事隔 40 年，我们再回顾毛泽东的这一方针，确乎英明伟大。西藏是个特殊的地区，藏、汉民族曾经有源远流长的友谊，同时也有过战争和隔阂，不承认这一点就是不唯物主义。倘若当初以战争手段解决西藏问题，其遗患是难以估量的，用和平的政治的方式解放少数民族地区，这是毛泽东处理民族地区的解放事业中成功而成熟的思想，这一思想的实现，为进行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推翻封建农奴制度，进行社会改造是西藏社会进步的基础

和平解放以前的西藏社会还处于封建农奴制时期，占总人口 5% 的官家、寺院、贵族三大领主占有全部的生产资料，广大农奴缺衣少食，没有人身自由。因此，要让西藏社会得到迅速发展，就必须首先解放生产力——让农奴获得解放。要使农奴获得解放，必须废除封建农奴制度。毛泽东针对当时西藏存在的各种矛盾冲突，提出了西藏革命分两步走的基本方针：“第一步，走民主的道路。第二步走社会主义道路。”在西藏革命的第一个阶段，毛泽东特别注意壮大爱国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1954 年 4 月 6 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西藏工作方针的指示》中说：“要用一切努力和适当办法，争取达赖及其上层集团的大多数，孤立少数坏分子，达到不流血地在多年内逐步地改革西藏经济政治的目的”。还亲自教育西藏宗教领袖说：“旧制度不好，对西藏人民不利，一不人兴，二不财旺。”并用释迦牟尼的故事来启发他们：“释迦牟尼也是贵族，是个王子，但他和人民一起搞改革，得到人民的拥护，因而人民就纪念他。”并说：“坐在农奴制度的火山上是不稳固的，每天都觉得地球要地震”。

同时毛泽东又针对西藏的特殊情况指示，西藏的民主改革到底在什么时候进行，要由西藏上层和人民群众共同商量解决。一面加强对上层的统战，一面做群众工作，通过修路、贸易、兴办学校，免费医病等方式，扩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如此，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为进行民主改革创造条件。

1959 年 3 月，西藏反动上层发动旨在维护封建农奴制度，反对民主改革的武装叛乱。实际上这是革命斗争的必然，反动上层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就会拼死地反对改革。而广大农奴为了实现自身的彻底解放，必须推翻封建农奴制度，来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只是农奴阶级用何种形式完成这一历史任务而已。旧制度不让位于新型的社会主义制度，西藏的社会生产力就得不到解放和发展。毛泽东说：“要准备对付那里的可能的全局的叛乱。乱子越大越好。只要西藏反动派敢于发动全局叛乱，那里的劳动人民就可能早日获得解放，毫无疑义。”历史的剧烈冲突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而这一冲突的发生总而言之是有利广大翻身农奴的。毛泽东说：“西藏问题总要来一次决战，才能彻底解决问题。边平边改，先叛先改，后叛后改，未叛的暂时缓改。”将平息叛乱与民主改革结合起来，把西藏上层分为左、中、右、叛，采取不同的政策：对参与叛乱的没收其生产资料，对没有参与叛乱的由国家出资赎买其多的生产资料，再将这些生产资料分给翻身农奴，极大地鼓舞了翻身农奴当家作主和生产的积极性。

西藏人民终于实现了历史上最伟大的变革，推翻了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在不到 3 年的时间里完成了民主改革，实现了毛泽东制订的西藏革命的第一步，而跨世纪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改造是民族进步的基础，毛泽东由民主革命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设想是解决西藏这种社会发展滞后民族的重要途径。

三、帮助发展滞后民族是大国中发达民族的历史责任

早在进军西藏时，毛泽东便指示：“一面进军，一面修路”、“一面进军，一面生产、建设”，“进军西藏，不吃地方。”进藏部队加速修通了青藏、川藏两条公路，保证了物资供应，同时开荒种田，生产自给，如此既解

决了部分的给养问题，也减轻了地方的负担。1952—1955 年间毛泽东多次接见来自西藏的致敬团、青年参观团等，并同他们进行亲切的谈话。毛泽东说：“共产党实行民族平等，不要压迫你们，而是要帮助你们；帮助你们发展人口、发展经济和文化。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就是要执行帮助你们的政策……如果共产党不能帮助你们发展人口、发展经济和文化，那共产党就没有什么用处。”帮助而不是掠夺，扶植而不是奴役，平等相待而不是压迫剥削，这是共产党与历代封建王朝和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根本区别，40 年来的实践证明，在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下，西藏社会之所以得到迅速发展，也与这种真诚的而不是虚假的，实际的而不是口头的帮助分不开。其一，在政治上，共产党领导西藏人民彻底摆脱了帝国主义的影响，广大农奴由农奴成为国家的主人，行使着自己的民主权利。据统计，1988 年召开自治区五届人大时，那曲、日喀则、林芝、山南、拉萨五地市共有选民 784754 人，参加投票选举的 736740 人，参选率达 93.88%。作为一级权力机构的自治区人大 11 名正副主任中，藏族 9 人，汉族 2 人；26 名委员中，藏族 17 人，汉族 3 人，白族、珞巴族、门巴族、回族、僜人、夏尔巴人各 1 名，藏族占大多数，充分体现了以藏族为主体的西藏自治区的民族自主权。在区域自治地方，民族干部的培养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毛泽东曾说：“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从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建国之初，党曾将培养、训练少数民族干部作为两项中心工作之一。40 年来，西藏的干部队伍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到 1989 年底，全区已有少数民族干部 37238 人，占干部总数的 66.6%，一大批符合“四化”条件的藏族领导干部走上领导岗位。其二，在经济上，投入大量资金修筑川藏、青藏公路，并积极发展农业、牧业，据统计，1952—1958 年中央给西藏的地方财政补助累计 3.57 亿元，1959—1965 年，累计达 5.9 亿元。1965 年全区粮食总产量达到 29.07 万吨，比民主改革前的 1958 年增长 66.1%；1965 年全区牲畜 1701 万头（只），比 1958 年增长 54.6%。到 1989 年，中央对西藏的补助累计达 133 亿多元，这的确是个惊人的数目。

不用我们进行全面、详细的统计，在党中央和毛泽东支援西藏，建设社会主义新西藏精神的鼓舞下，尽管底子薄，西藏在经济、交通、贸易、文化、教育等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这也是 40 年来，西藏之所以稳定发展的基础。西藏社会的迅速发展也使广大的西藏人民坚定了跟共产党走的决心，增强了凝聚力和向心力，从而对增强民族团结，反对西藏分裂，维护祖国统一，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让少数民族得到发展和进步，是整个国家的利益。”毛泽东是从整个国家的最高利益思考这一问题的，这也是毛泽东关于少数民族发展理论的核心。从东欧剧变和原苏联的解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理论所具有的普遍性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四、“慎重稳进”是解决复杂民族问题的重要方针

50 年代初，毛泽东即指示：在西藏考虑任何问题，首先要想到民族和宗教问题这两件事，一切工作必须慎重稳进。这一指示的确对西藏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西藏有何复杂性？我以为主要有五点：一是西藏自然环境与中国境内的

任何地区都不同，这里是世界屋脊，平均海拔 4000 米以上，缺氧、多雪、干燥、寒冷。这一高海拔特点，影响到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二是西藏基本上是单一民族生活区，占总人口 90% 以上的藏族人民生活于藏传佛教文化的特殊环境中，有独特的人文环境，生活习惯。三是西藏社会发展滞后，人民还生活于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下，既有浓重的宗教气氛，社会生产力又十分低下，工业、交通运输业等还处在起步阶段。四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插手西藏，西藏既在文化上被无数人当作“香格里拉”，又在政治上成为世界关注的敏感地区。五是历史以来，藏汉民族实际存在的民族隔阂和不信任。针对这样一个地区，其工作难度是不难想象的。

其实，早在 1950 年 6 月，中央就向全党发出了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必须首先了解具体工作步骤，防止机械地照搬汉区的工作经验，必须严格禁止以命令主义的方式在少数民族中去推行汉人地区所实行的各种政策的指示。对于西藏问题，中央更是慎之又慎。从毛泽东对西藏工作的一些谈话中我们可深切感受到这一点。

1952 年 4 月，对是否改编藏军一事，毛泽东说：“目前不要改编藏军，也不要形式上成立军分区，也不要成立军政委员会。暂时一切仍旧，拖下去，以待一年或两年后我军确能生产自给并获得群众拥护的时候，再谈这些问题。”这是一种让步，因为《十七条协议》之 8 款就明文规定：“西藏军队逐步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的一部分。”

1953 年毛泽东在接见西藏国庆观礼团时说：“团结起来，按照各民族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进行工作。有些地方可以做得慢一点，不论做快做慢都要先商量好了，大多数人赞成了，就慢慢地去做，做好事也要商量着做。商量办事，这是共产党和国民党不同的地方。”

此后的一些时间里，毛泽东也在不同的场合发表过类似的指示，中共西藏工委的领导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推行“慎重稳进”方针，也收到了多方面的效果。“慎重稳进”既是特殊环境下的办事方针，也是符合事物的辩证原则的，毛泽东对西藏问题也曾如此讲：“可做就做，不可做就等一等。能做的，大多数人同意了，不做也不好，可以做得慢一些，让大家都高兴，结果就反而加快了。”符合规律地稳定地发展，本身就是速度；一切从实际出发，西藏的实际要求慎重、稳进，盲目推进就会出漏子。比如 1956 年 4 月，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后，工委鉴于邻近少数民族地区都在积极准备进行民主改革，便向中央报告在西藏实行民主改革，增设机构、干部和职工。由于上马太快，工作脱离实际，问题也迅速出现，一些地方发生叛乱和反对改革的骚扰活动。中央对此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从工作基础、干部条件、上层态度看，实行改革的时机还没有成熟。1957 年 2 月 27 日，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说：“西藏由于条件还不成熟，还没有进行民主改革。按照中央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十七条协议，社会制度的改革必须实行，但何时实行，要待西藏大多数人民群众和领袖人物认为可行的时候，才能作出决定，不能性急。现在已决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不进行改革。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内是否进行改革，要到时看情况才能决定。”并提出西藏在六年内不进行民主改革的方针。

这样的实例是很多的，只要坚持“慎重稳进”的方针，西藏革命和建设的步子就走得顺畅；反之，不顾实际情况，盲目推进，就出偏差，就失去民心。比如仅“文化大革命”破坏寺庙一项，就为藏族人民深恶痛绝，尽管这

笔帐要算在“四人帮”头上，但投在西藏广大僧侣和教民心上的阴影是很难在短期内消逝的。稳进的基础是慎重，不慎重就很难实现“进”的目的；“稳”是针对特

殊环境中特殊问题所采取的态度，并不是左顾右盼，畏缩不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西藏自治区党委坚持走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对内搞活，对外开放，从西藏的实际出发，制定西藏长远发展的蓝图，西藏的经济得到了较快发展，1989年全区国民总产值21.1亿元，国民收入16.7亿元，分别比1979年增长了97.64%和324.36%（含中央巨额补贴）；人均收入397.25元，比1979年的159元增长了149.8%。

毛泽东离开我们已有18个年头了。尽管他晚年犯过错误，而他对西藏问题的宝贵指示，如今仍为西藏广大干部群众所称道，作为毛泽东思想体系一部分的民族思想在西藏成功的实践，进一步丰富了马列主义民族理论，至今仍是解决西藏民族问题的重要指导思想。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学院）

注释

《人民日报》1952年12月1日。

《人民日报》1973年3月15日。

《新华月报》1954年7月号。

《人民日报》1954年6月29日。

毛泽东的宗教观与有中国特色的宗教工作

张永庆

在毛泽东光辉的一生中，与宗教有过不少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在贫困闭塞的韶山冲成长的他，受母亲的影响，小时候相信神，信过佛教，并劝过父亲信佛。毛泽东曾回忆说：“我九岁的时候，曾经同母亲认真地讨论过我父亲不信佛的问题。当时和以后，我们试过很多办法想让他信佛，可是没有成功。”只是当他接触到一些现代科学以后，才逐步对神、佛的信仰发生动摇，以至完全背叛了对神、佛的信仰。周恩来在《学习毛泽东》里这样讲过：“一般他说，在那样的封建社会里，不管农民家庭出身的也好，工人家庭出身的也好，一下打破迷信是不可能的。毛主席生长在十九世纪末的农村里，不可能没有一点迷信。”

当毛泽东在实践中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成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人民的革命领袖以后，仍十分关注中国的宗教问题，对宗教问题和宗教工作有过许多重要而精辟的论述。他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一起制定了正确的比较完整的宗教政策。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是马克思主义的宗教理论同我国宗教问题的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十分成功的，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研究毛泽东的宗教观对丰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对做好有中国特色的宗教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科学地揭示了宗教的本质，在人类对于宗教的认识史上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列宁在俄国的大地上，对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如何认识对待宗教问题又提供了许多卓越的见解和精辟的论断。毛泽东在实践中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宗教理论，又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突出地强调了这样3个问题：

（一）从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全局上重视和把握宗教问题

马克思主义认为，宗教是支配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是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形式。在阶级社会里。阶级压迫和剥削制度所造成的社会苦难是宗教存在和发展的主要根源，统治阶级一般都利用宗教作为麻痹人民斗争意志的工具。旧中国的阶级对立和阶级压迫十分严重，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作为他们侵略中国的工具，封建剥削阶级则把宗教作为他们进行压迫和统治的工具。毛泽东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没有孤立地看待宗教，而是坚持用阶级斗争的观点认识和对待宗教问题，并对宗教徒进行具体的阶级分析。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将神权（即由阎罗天子，城隍庙王以至大地菩萨的阴间系统以及由玉皇上帝以至各种神怪的神仙系统所构成的鬼神系统）与政权、族权、夫权并列称之为“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因而主张中国人民的翻身解放离不开与反动神权的斗争，并认为破除迷信观念乃是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胜利以后自然而然的结果，而不是它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毛泽东把农民对神道的进攻和推翻城隍土地菩萨的神权，赞扬为湖南农民运动所做的好事之一。但他并没有简单地将一切宗教和宗教组织，尤其是宗教徒作为革命的对象，而是作出具体的阶级分析。在著名的

《寻乌调查》、《兴国调查》中对此有过十分具体而生动的描述，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更明确指出，我国的几种宗教在历史上都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在不同程度上为剥削阶级和中外反动派所控制，他们利用宗教作外衣，以达到他们反动的政治目的，但大多数教徒是纯朴的，有爱国心的；另一种情况是为一部分少数民族和一部分被压迫人民奉为团结反抗的纽带，这在近代民族、民主运动历史中可以找到不少事例。

新中国成立以后，通过宗教制度的重大改革，宗教矛盾的阶级背景已经起了根本性的变化。宗教已经基本上摆脱了剥削阶级和中外反动派的控制，宗教矛盾已经从既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又是敌对阶级的矛盾转化为基本上不是敌对阶级的矛盾。宗教矛盾主要表现为人民内部信仰或者不信仰宗教的矛盾，信仰这种宗教或者信仰那种宗教的矛盾，以及信仰这个教派或者那个教派的矛盾。虽然在某一个时候，某一个地区，它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阶级矛盾，具有阶级斗争的性质，但大量地经常地不是敌我矛盾而是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开始将宗教问题和宗教工作纳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总题目中来解决。“我们不能用行政命令去消灭宗教，不能强制人们不信教。不能强制人们放弃唯心主义，也不能强制人们相信马克思主义。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的这一著名论断，已成为我们党和政府在社会主义时期处理宗教矛盾和宗教工作的基本方针。

（二）从群众的觉悟和利益出发来认识和把握宗教问题

我国是一个有着多种宗教的国家，佛教已有 2000 年左右的历史，道教有 1700 多年的历史，天主教和基督教主要是在鸦片战争之后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也有 150 多年的历史。全国有 10 个少数民族基本全民信仰伊斯兰教，在藏、蒙古、傣等少数民族中几乎是全民信仰藏语系和巴利语系佛教。同时，由于旧中国是个封建主义时期极长而资本主义启蒙工作做得极少的社会，各种迷信思想非常发展，宗教与迷信交织在一起，在人民群众中有广泛的影响。所以，在我国宗教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宗教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群众问题，成为一个如何对待群众的问题。

毛泽东历来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把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原理运用到党的全部工作和活动中，早在 1927 年，他就既深刻地指出神权的严重危害，又强调要由群众自己来推翻神权，破除迷信。他指出：“菩萨是农民立起来的，到了一定时期人民会用他们自己的双手丢开这些菩萨，无须旁人过早地代庖丢菩萨。共产党对于这些东西的宣传政策应当是：‘引而不发，跃如也。’菩萨要农民自己去丢，烈女祠、节孝坊要农民自己去摧毁，别人代庖是不对的。”毛泽东来自农村，对中国农民有着非常深刻的了解，他深知要在农民群众中破除迷信思想和宗教观念将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在这个问题上越俎代庖，揠苗助长常常会适得其反。在他确立了一切为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以后，在宗教问题上采取更慎重的态度。1945 年 4 月，毛泽东在纲领性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把宗教信仰自由列为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之一。他指出：“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

“根据信仰自由的原则，中国解放区容许各派宗教存在。不论是基督教、

天主教、回教、佛教及其他宗教，只要教徒们遵守人民政府法律，人民政府就给以保护。信教的和不信教的各有他们的自由，不许加以强迫或歧视。”

正由于我们党认真执行信仰自由政策，切实保障公民的这项基本权利，所以宗教徒中许多人参加了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建国后又心情舒畅地投身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毛泽东多次告诫全党在贯彻执行群众路线过程中，既要反对命令主义，又应反对尾巴主义。他在宗教问题上同样强调既应尊重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又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尊重和保护人民群众不信教的自由。他明确地论述了共产党人在联系群众中必须划清政治上和世界观上的不同界限，他说：“共产党员可以和某些唯心论者甚至宗教徒建立在政治行动上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但是决不能赞同他们的唯心论或宗教教义。”

为了以唯物论战胜唯心论，毛泽东倾注了极大的精力在全党和全体人民中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在中国共产党内，始终坚持共产党员不能信教的原则。正由于我们党在宗教工作和统战工作中，从未放弃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指导地位，始终保持了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才使我们党牢牢掌握了统一战线的领导权，赢得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信心和拥护。

（三）从文化功能上看待和把握宗教问题

毛泽东不仅是一位大政治家，大军事家，而且是一位大学问家。他博通古今，对中国的历史文化有着非常深刻的理解与研究。而中国的文化无论是汉文化或各少数民族的文化都深受宗教的影响。经过数百年，一两千年的积累，一方面各个主要宗教的典籍都汗牛充栋，博大精深，另一方面宗教文化又渗透到哲学、文学、建筑、工艺等各个领域，对民族的心理、习俗、礼仪、价值观与审美观等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成为各民族文化的不可分割的重要内容。毛泽东曾说过：不研究宗教，就写不好哲学史、文化史、世界史。这就深刻地揭示了宗教在文化中的地位、宗教与其他意识形态及其载体之间的关系。

在我国，许多人常常把宗教与迷信混为一谈，这是一种严重的误解。宗教与迷信虽然均为有神论。但两者是有区别的。毛泽东将宗教与迷信严格区分开来。赵朴初讲过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在延安，有一星期天，毛泽东饭后招呼他的警卫员：“听说附近有寺庙，去看看去！”警卫员回答说：“那有什么好看的，尽是迷信。”毛泽东以手点着他说：“偏激！偏激！那是文化！文化！懂吗？”在认定宗教是唯心主义世界观的同时，将宗教视为一种文化而非一般的迷信，可以认为是唯物主义者对宗教属性认识上的一个重大进步。作为文化的宗教，就具有多种社会功能，不仅与宗教文物、宗教旅游等相联系，而且与伦理道德、发展文化教育和公益事业等相关。这就为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尤其为宗教与社会主义相协调提供了一个重要理论依据。

1952年，毛泽东接见西藏致敬团时指出：“共产党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信教的和不信教的，信这种教的和信那种教的，一律加以保护，尊重其信仰，今天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将来也仍然采取保护政策。”^{（11）}宗教所具有的广大群众性及其文化属性，可视为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的两个主要依据。毛泽东认为中国现时的新文化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的，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他主张对古代文化应“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12）}。毛泽东在世界观上严格区分唯物主义与唯

心主义的界限，但他对唯心主义没有采取一概排斥与否定的态度，而是寻求其合理的内核与民主性的精华，对宗教文化的载体如寺庙、诗文、典籍等更是给以重视与研究。毛泽东对宗教的这种科学态度，对我们党在社会主义时期全面正确地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促使宗教与社会主义相协调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使我们有可能去发现、挖掘、调动宗教有利于社会安定和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

着眼于全局、着眼于群众、着眼于文化发展，是毛泽东观察和处理我国宗教问题基本出发点，是我国宗教工作的“中国特色”之所在。一旦离开了全局，离开了群众，离开了文化发展，或在全局的指寻上出现偏差，观察和处理宗教问题就必然产生失误。

二

新中国建立后，党和政府仍十分重视继续正确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使广大信教群众不仅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获得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翻身解放，而且开始享受了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其中第8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为了切实保护信教群众的宗教信仰自由，在宗教内部清除了帝国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废除了宗教名义下的封建压迫制度和剥削制度。党和政府对宗教界人士实行了争取、团结、教育的方针，调动了宗教界上层人士和广大信教群众的爱国热情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对宗教如何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宗教界人士也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多方面的有益的探索和努力。

但是，我们党对宗教的工作经历了一段曲折的道路。自1957年以后，宗教工作中的“左”的错误逐渐滋长，60年代中期进一步发展起来，“文化大革命”期间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更遭到肆意践踏。毛泽东是从革命和建设的总体上把握宗教工作的，一旦他对形势判断失误，党内对宗教的认识和态度就会产生动摇和错误。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企图复辟，并认为资产阶级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由此反映在宗教问题上，就没有正确估计宗教界在清除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之后已经发生的根本变化。有些同志视宗教为社会主义的异己或敌对力量，错误地认为宗教方面仍然存在着严重的敌我矛盾，将宗教信仰当作剥削阶级意识，并夸大为意识形态领域里水火不相容的阶级斗争。党内个别别有用心的人竟提出“共产党的任务就是消灭宗教”等极左口号，使宗教工作中“左”的错误更加发展。“文化大革命”中从根本上取消了党和政府的宗教工作，从中央到地方的宗教工作部门统统被撤销，各宗教的爱国宗教组织被迫停止活动，有些地方宗教活动被迫从公开转入隐蔽。这种情况表明，宗教与宗教活动、宗教组织虽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但宗教工作却不是孤立的，它服从、依存于党的中心工作，只有党的指导思想正确，把中心工作搞上去了，同时做好宗教工作，党对宗教的工作才能健康发展。

宗教的长期性、民族性、复杂性与国际性，都与宗教的群众性密切相关。毛泽东的晚年严重地脱离了群众，背离了自己确定的党的群众路线，因而党内对宗教的群众性的认识也就淡漠了。在“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下，发生

了许多伤害信教群众的宗教感情，损害信教群众利益的错事蠢事。在“文化大革命”前就发生过有些地方干部动员信教群众退教，上交宗教用品的错误。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发展到强行禁止信教群众的正常宗教生活，把宗教界爱国人士以至一般信教群众当作“专政对象”进行批斗，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在少数民族地区，某些群众中的风俗习惯也被认为是“破四旧”的对象，给以禁止和冲击，严重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使信教群众对宗教政策产生了怀疑。值得注意的是，在力图超前消灭宗教的同时，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在党内和群众中逐步发展，一方面正常的宗教活动被强行制止，另一方面毛泽东又被推上“神坛”。这两种不正常的现象都是由于脱离群众和实际所带来的后果。经验证明，只有始终注意和把握宗教的群众性，看到宗教问题的长期复杂，才能慎重地对待宗教，既坚持贯彻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又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积极稳妥地进行正面教育，逐步克服和纠正部分群众中落后思想和陈旧观念。

宗教不仅是一种信仰，而且是一种文化现象。宗教文化包括哲学、思想史、语言、文学、艺术、绘画、天文、历史、医学、建筑等多种学科。在一些少数民族的民族文化中，科学与宗教往往混杂在一起。文化具有继承性，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并对这种文化加以适当地改造，才能建设起适应社会进步的新文化。若对宗教文化持排斥的态度，实际上就否定了民族文化的遗产，损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在“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中，将宗教等同于迷信的思想广为流传。毛泽东关于宗教也是一种文化的观点被完全摈弃了，各宗教的财物几乎被糟蹋殆尽，砸教堂、拆寺庙、焚经书、毁佛像、烧法器，连文物古迹也受到严重破坏。这不仅是宗教的灾难，也是民族文化和民族的灾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对建国以来的宗教问题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作了全面的总结，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重申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恢复和重建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统战部门和宗教事务部门。1982年，中共中央批发了《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明确指出“我们在宗教问题上能否处理得当，对于国家安定和民族团结，对于发展国际交往和抵制国外敌对势力的渗透，对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13）}，强调“使全体信教和不教的群众联合起来，把他们的意志和力量集中到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这个共同目标上来，这是我们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处理一切宗教问题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14）}。这个重要文件进一步阐明了党对宗教问题的一系列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并为宗教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与社会主义相协调指明了方向。经过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我国的宗教工作已重新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进入建国以来又一个最好的时期。

三

江泽民指出：“正确对待和处理宗教问题，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15）}。目前全国信教群众有数千万人，宗教教职人员有20万人，县级以上宗教团体有2000多个。这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这支力量引导得好，对维护祖国统一和社会安定，对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将产生积

极作用。否则就会产生消极或破坏作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能忽视和回避中国的宗教问题，而应尽量发挥其积极作用，防止、抑制和消除其消极作用，开创有中国特色的宗教工作。

包括前苏联在内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没有解决好自己国家中的民族和宗教问题，未能实现宗教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相协调。与之相反，我们的民族与宗教工作取得了举世公认的重大成就，初步解决了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问题，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又面临着一些新的问题，这就必须要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来指导宗教工作。一方面应当更好地按照新形势的要求贯彻落实这一理论有关的宗教工作的各项内容，另一方面是使宗教工作更好地为这一理论所确定的总任务服务，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作出更大的贡献。

作为我们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和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为制订正确的宗教政策做了大量的工作，作出了重大的贡献，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论述虽然直接谈及宗教工作的不多，但是它确已规定了宗教工作的基本方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它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的同时，也就回答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关宗教工作的许多带根本性的问题。其中主要的有：

第一，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正确认识和对待宗教问题，承认它长期存在的必然性及其与社会主义既相适应又相抵触的两重性，排除干扰，全面正确地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说过：“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依据。”^{（16）}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今天，同样应当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包括宗教问题在内的一切建设问题的基本依据。社会主义制度在一些国家先后建立后，大部犯有对本国国情认识不准，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条化和把本国社会主义现实理想化的失误，在宗教问题上不是操之过急就是失于引导，建国后我们所犯“左”的错误就是来源于对国情判断的失误，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以能取得举世公认的辉煌胜利，其重要原因之一正是由于科学地把握了“初级阶段”这个最基本的国情。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形成过程中，邓小平作出了极其卓著的贡献。他在1987年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的社会主义又是一个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从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17）}我们党在总结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曾经明确指出，对于社会主义条件下宗教问题的长期性，务必要有足够的清醒的认识。那种认为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经济文化的一定程度的发展，宗教就会很快消亡的想法是不现实的。那种认为依靠行政命令或其他强制手段，可以一举消灭宗教的想法和做法，更是背离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我国的国情。当我们进一步明确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后，就应当对宗教问题的长期性有更深刻的理解，并清醒地看到其与社会主义既有相适应的一面，又有相抵触的一面。正如江泽民所指出的：“民族、宗教无小事。”“对于民族宗教方面出现的矛盾和问题，要及时地妥善解决，不可掉以轻心。”^{（18）}

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在宗教问题上，一方面，党和政府要坚定不移地尊重和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保护宗教界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宗教界应坚定不移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原则，坚持在宪法、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的范围内开展宗教活动。排除“左”的和右的干扰，实现这两个方面的结合，全面正确地贯彻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既是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的宗教理论同我国宗教问题的实际相结合而得到的一条重要经验，又是促使宗教与社会主义相协调的政治保证。

第二，宗教工作也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应动员和组织信教群众和全国人民一心一意搞四个现代化，强调一切宗教活动都必须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并坚持以“三个有利于”作为衡量宗教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科学论断，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思想基础，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关键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经济是社会的基础，只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才会有雄厚的物质基础，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富裕，民族的团结互助，人民民主专政的巩固和发展，以及宗教问题的妥善解决才会有可靠的保障。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来开展宗教工作，既是宗教工作健康发展的需要，又是广大信教群众共同的迫切要求。宗教能否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问题，会大量地经常地反映在它能否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相适应的问题上。

邓小平倡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又为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为宗教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进一步发挥积极作用提供更多的机遇。从一定意义上讲，市场的作用就是群众的作用，各种社会力量的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以经济手段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最佳机制，通过它就可以充分调动不同信仰的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各宗教的寺院经济将有所发展，从而既壮大了市场经济的主体，又减轻了政府和信教群众的经济负担；宗教界可以促使宗教徒将现代的市场与竞争观念和传统的宗教伦理道德相结合，以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和社会秩序；支持广大教徒按市场经济的需要和教义的要求，发展文化教育和宗教旅游等第三产业；鼓励并大力发展各宗教的社会服务和社会福利事业，等等。所有这一切都可以提高宗教界的地位，减少不健康的宗教活动和由此造成的消费，使宗教与社会主义更加协调。

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把生产力标准、实践标准和人民群众观点有机统一起来，为我们确立了正确的社会主义价值观。我国的实践表明，宗教的社会作用的方向与力度，并不完全决定于信教人数的多少，而主要取决于它有利还是有害于社会的安定团结，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取决于宗教信仰者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如果宗教信仰并不妨碍甚至可以促进由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它就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起一定的积极作用。对宗教工作的评价必须以“三个有利于”来判断，并以此来引导宗教工作的健康发展。

第三，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积极稳妥地推进宗教工作的改革和支持宗教自身的改革，使宗教工作与宗教活动能适应和推进改革开放的进程。

关于改革开放的问题，邓小平有一整套的理论、方针、步骤和措施。这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来说，提供了许多全新的东西，改革和开放是全方位的，是系统工程，涉及各项工作的方方面面，宗教工作当然不能例外。我们既要研究新形势下宗教的变化和问题，进一步探索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尤其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协调的可能性和条件，提出兴利除弊的论点和政策性建议，进行必要的宗教工作的改革。同时，应鼓励和支持宗教自身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信教群众的需要而自愿进行某些改革，调整其宗教观念、宗教行为及对教义的解释，相应变革其宗教礼仪、制度与组织形式。当然，这种变革即不是背离宗教的根本教义，更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否定。改革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巩固，因此绝不允许以改革为名恢复已被废除的宗教封建特权和宗教压迫剥削制度，决不允许宗教干预行政、干预司法、妨碍国家教育制度，决不允许利用宗教反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对外开放和改革是紧密相联的，应利用宗教的国际性积极开展宗教方面的国际友好往来，进行民间的宗教文化交流，并以此来促进经济的交往。但应坚决反对国外势力干预我国宗教的内部事务，坚决防止和反对敌对势力利用宗教进行渗透活动。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是统一的。能否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决定着我国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决定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邓小平在1992年初南巡重要讲话中强调：“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因此，在宗教工作中也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全力维护稳定的政治环境，不能有任何的含混动摇。那种认为在民族工作和宗教工作中可以淡化四项基本原则的想法是十分错误和有害的。在意识形态领域中起指导作用的只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宗教教理教义和学说来代替马克思主义，不仅是荒唐的，而且必将涣散人们的意志，使革命和建设失去安定团结的思想基础。我们要坚持向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科学世界观的教育，进行科学文化知识的宣传，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第四，在新时期的宗教工作中应进一步学会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努力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宗教工作是党的统战工作的重要内容。邓小平对巩固和扩大新时期的统一战线有许多重要的论述。他强调要从实际出发，科学运用矛盾原理、正确解决统一战线的矛盾问题，实现战略和策略、原则性和灵活性的辩证统一，其目的“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努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心同德，群策群力，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局面，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20）}邓小平关于要正确认识和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对搞好新时期的宗教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我们应把宗教工作作为统战工作中的一项重要任务来抓，注意做好宗教上层人士和教职人员的工作。

在加快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有了许多新的内容和表现形式，不仅人民内部的物质利益矛盾以及由此引起的思想矛盾，变得越来越突出和复杂，而且在有的地区由于宗教问题或宗教内部矛盾而引发的纠纷时有发生。这些矛盾处理得好，可以增强人民内部团结，促进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处理得不好，矛盾就会激化，会出乱子。由于还存在着一定范围的阶级斗争和复杂的国际环境，就必须继续坚决打击一切在宗教外衣掩

盖下的违法犯罪活动和反革命破坏活动，以及各种不属于宗教范围，危害国家利益和人民生命财产的迷信活动。但不能将敌我矛盾扩大化，不能将宗教视为社会主义的异己力量，更不能认为“宗教徒是和平演变的社会基础”，用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在宗教与社会主义的相互关系中，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领导力量的中国共产党常常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因此，一定要下气力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把我们党自己内部搞好。一方面要继续坚持共产党员不能信教的原则。共产党员是工人阶级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是无神论者，只能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不得信仰宗教。共产党员信仰宗教，参加宗教活动，既违背党的性质，削弱党组织的战斗力和战斗力，又不利于正确贯彻执行党的宗教政策。另一方面，要切实端正党风，反对腐败现象，密切同包括信教群众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党内和社会上的不正之风与腐败现象，常常是某些人皈依宗教，扩大宗教影响的一个重要诱因。因此，从严治党，充分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增强党组织对全体党员和人民群众的凝聚力吸引力，就是正确处理宗教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促使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重要条件。

我国宗教历史悠久，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时间不长，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是全新的事业。因而宗教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相适应就是一个没有现成答案而迫切需要深入研讨和长期探索的问题。这个探索过程就是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和毛泽东的宗教观，充实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过程，也是开拓有中国特色宗教工作的过程。我们一定要在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指引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解决好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协调这个大课题，努力为社会主义事业和全人类作出新贡献。

（作者单位：宁夏回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

注释

《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第8页。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32页。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1页，第33页。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62页。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70页，第1092页。

（12）《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07页。

转引自《西北穆斯林社会问题研究》第20页，甘肃人民出版社。

1993年4月26日《光明日报》。

（11）1952年11月20日《人民日报》。

（13）（14）《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22页，第1226页。

（15）1991年1月31日《人民日报》。

（16）《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324页。

（17）（19）（20）《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论述专题摘编》第27页，第217页，第265页。

（18）1993年11月8日《人民日报》。

论毛泽东的“文化扬弃论”

降大任

“文化扬弃论”是毛泽东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又是毛泽东思想中一个相对独立的科学的文化思想体系，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丰富和发展。学习、研究毛泽东的文化扬弃论，对今天我们正确对待中外历史文化遗产，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一、文化扬弃论的提出及其基本内涵

文化扬弃论，是毛泽东根据人类社会一切文化形态在发展中不断扬弃自身，实现其新质对旧质不断超越的客观规律，所建立的一套系统的科学理论。所谓文化自身的扬弃，是指文化形态的发展具有否定之否定的普遍形式，它体现了随着社会主义生活实践的变化，人们创造了文化形态，并通过继承、批判和不断创新相统一的方式，推进文化的发展，使之实现新陈代谢的螺旋式上升的客观过程。文化扬弃论，就是对文化发展过程这一基本规律的科学总结和概括。不过，毛泽东没有明确使用文化扬弃论的概念，他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样，在论述文化问题时使用的是“批判地继承”这一提法，人们往往称毛泽东的文化思想是“批判继承论”。如果全面地理解和把握毛泽东对历史文化遗产主张“批判地继承”的有关理论，可以认为，批判继承论同这里所讲的文化扬弃论，是一回事。

然而，这里为什么要用文化扬弃论的提法呢？按照“批判地继承”这一提法原有的内涵，它本是指我们应对一切文化遗产既要继承，又要批判，即在继承中批判，批判中继承，使二者有机结合，而这种结合也就内在地包含有创新的意义。可是，不少论者谈论批判继承论时，往往将对文化遗产的批判地继承，理解为“一方面要批判，一方面要继承”，更进而把文化遗产分割为两部分，认为可承将其中好的拿来，坏的抛弃。然而，历史上的许多文化遗产却并没有这种可以截然分割的具体形态，而是好坏相参、利害揉杂的有机统一体。所谓分割取舍的办法，只是人们思维中的抽象，难以付诸文化发展的实践。毛泽东主张的观点不是这样。他在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中论及文艺的发展时指出，对丰富的中外文学艺术遗产，“我们是要继承的”，但旧的文艺形式“到了我们手里，给了改造，加进了新内容，也就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了”。这里，毛泽东主张的就是以继承、批判和创新三者相统一的方式，实现旧文艺向新文艺的本质的转化，即“推陈出新”。从文化观上看，这实质上就是一种文化扬弃论。毛泽东的这一论述，科学地把握了文化发展中继承、批判和创新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具有全面性、深刻性和普遍性意义。而上述一些论者对批判继承论的理解不仅是形而上学的，更忽略了对文化遗产的本质的改造和创新，容易引起误解，导致理论上的混乱。所以，笔者认为，采用文化扬弃论的概念更为合适，更具有理论的明确性。

作为系统的科学理论，文化扬弃论不仅内容十分丰富，而且构成了一整套论证严密的理论体系，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形态。这一理论有它自身产生与发展的过程，早在毛泽东青年时期，初步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后，文化扬弃论就已经萌芽。针对当时一些人提出的“中学

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口号，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是错误的，这口号实则是“以孔子为中心”，倡导“学问要新道德要旧”。针对另一些人主张的“全盘西化论”，毛泽东也提出尖锐批评。在给黎锦熙的信中，他引述老师杨怀中的话：“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在毛泽东看来，“中体西用论”的倡导者“很少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全盘西化论”同样“不切于实际生活”。从这些片断言论中，可清楚地看出，青年毛泽东关于中国文化发展的正确思路是，从中国社会生活的实际需要出发，在对中外文化遗产充分吸收的同时，要进行批判和改造，以创建新文化。在嗣后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投身革命事业，以至被公认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领袖时，毛泽东在从事艰苦卓绝的政治、军事斗争的同时，仍十分重视对文化问题的研究，关心和指导革命文化事业的建设，使文化扬弃论逐步形成成熟而完整的系统理论。特别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和《讲话》等著作，堪称这一科学理论的代表作。1949年以后，这一理论更有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

通观毛泽东文化扬弃论的全部内容，概括他说，其基本内涵就是，以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为指导，尊重文化发展的否定之否定规律，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需要出发，批判地继承中外历史文化的成果，从而创造性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新文化。

这些基本内涵表述了对文化遗产加以本质改造的全过程。这一过程包含有继承、批判、创新这三个有机联系的环节。就三者的区别而言，其第一层意思是继承。因为中国无产阶级新文化不可能凭空创造，所以，它首先要求应以开放的心态，了解、继承中外历史文化遗产。毛泽东本人的博学多闻，是人所共知的。这当然来自对文化遗产的广泛涉猎和认真学习，用他的话来说，他采用的是“古今中外法”，即“全面的历史的方法”。1938年，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毛泽东提倡“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1942年，在《讲话》中，他明确要求文艺家，“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我们决不拒绝和借鉴古人 and 外国人，那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1949年以后，毛泽东还强调，“中国的和外国的，两边都要学好。半瓶醋是不行的，要使两个半瓶醋变成两个一瓶醋。”这些论述，充分说明毛泽东对中外文化遗产，具有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的大家风范和一贯态度，正如列宁所说，“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

在学习和研究中外历史文化时，如何处理学中和学外的关系？毛泽东提出了以中国为中心的观点，也就是先中后西。早在1915年他在致湘生的信中，就明言为学之道应先中后西。1918年，他积极组织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国勤工俭学，声称自己主张大留学政策，提倡会员海角天涯都应当去人，但同时认为留学生先应懂得中国。他说，“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之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他也有赴法、赴俄留学的想法，但终于没有出国，认为“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主张先要对中国“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1942年春，他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中，更明确强调“研究中国党史，应该以中国做中心，把屁股坐在中国身上。世界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我们也必须研究，但是要和研究中国党史的关系弄清楚。”就是

“要坐在中国的身上研究世界的东西。”他坚决反对“一切以外国为中心，作留声机，机械地生吞活剥地把外国的东西搬到中国来。”毛泽东这里讲的是研究中国党史的问题，但其先中后西的原则同样适合于历史文化的研究。在此讲话的前一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就批评过党内一些人言必称希腊的数典忘祖现象，批评党内研究现状、研究历史的空气不浓厚，认为这是党风不纯的表现。可见他对这一原则何等重视。但毛泽东并不因此排斥学外国的东西，他说：“如果不把‘外’弄清楚。对于‘中’也就不容易弄清楚。”说明不应把先中后西原则绝对化。他用历史的观点看待中外文化的关系，外国的社会亦有古今之分。毛泽东如实地承认“近代文化，外国比我们高。”因此，“应该学外国的近代的东西，学了以后来研究中国的东西。”他引用马克思关于首先研究近代社会，就容易理解古代社会的观点，认为“这是倒行的，却要快些。”⁽¹¹⁾这就是说，一般而言，应当先中后西，对某些特殊的研究对象，也不妨先西后中。后来毛泽东将这些主张精辟地概括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他点出了继承历史文化遗产的目的和意义：“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入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¹²⁾这不仅反映了毛泽东是一位爱国主义者，也说明他在文化继承问题上是一位具有世界眼光的辩证论者。

以开放的心态，将中外文化遗产不拘一格地拿来，拿得愈多愈好。这只是文化建设的前提，更重要的工作是，拿来以后，不能食洋不化、食古不化，而是分析批判，有所鉴别。对外国的东西，他反对搬来套用，反对生吞活剥，为的是“快一点把中国的东西搞好”⁽¹³⁾。他比喻说，“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品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¹⁴⁾对中国古代的文化，同样照此办理，“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的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¹⁵⁾。总的说来，“中国人也好，外国人也好，死人也好，活人也好，对的就是对的，不对的就是不对的，不然就叫做迷信。要破除迷信。”“正确的就信，不正确的就不信，不仅不信而且还要批评。”⁽¹⁶⁾这就是说，对一切文化遗产，既要继承，又要批判，二者辩证统一。只批判不断承，就叫文化虚无主义；只继承不批判，就叫文化保守主义。这两种偏向，都要不得。

继承和批判，是毛泽东文化扬弃论的两层意思。还有第三层意思，就是创新。实现文化扬弃，直接目的便是建设新文化。没有创新，就很难谈得上建设，统言之，批判地继承本来即具创新意义。析言之，有了批判地继承，创新才有基础；有了创新，批判地继承才有现实的价值。毛泽东进一步指出，新文化既要有有益于革命和建设的内容，又要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¹⁷⁾这就是要求，在文化的内容与形式上都应有所创新。毛泽东认为，所谓创新就是实现古今中外的“有机地结合”，不是机械地拼合。这要有一个过程，他比喻说，“驴马结合是会改变形象的，不会完全不变”，即使是“非驴非马也可以”⁽¹⁸⁾，为的是“使我们自己的东西有一个跃进。”⁽¹⁹⁾就是要实现文化发展的本质的飞跃、升华，即全面的扬弃。毛泽东后来称之为“推陈出新。”

综上所述，毛泽东文化扬弃论的内涵，一是继承、二是批判、三是创新，三位一体，相互渗透，不可割裂。继承是肯定，批判是否定，创新是否定之

否定。这是文化发展和建设中辩证统一的全过程。

二、文化扬弃论的总原则

实现文化扬弃，对文化建设事业是一项极高的要求，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毛泽东曾评价“五四”以来新诗创作的得失，充分肯定新诗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同时又指出，它“迄无成功”。从一个角度说明了实现文化扬弃的难度。

为了使文化工作者有所遵循，能够知难而进，毛泽东又提出了实践文化扬弃论的两条总原则：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指导，二是坚持从中国的具体情况出发，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方向。

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真理，它科学地概括和总结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及思维运动的客观规律。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则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人类优秀文化的智慧结晶。人类的文化发展史本来就是一个在不断地批判继承中除旧布新的客观进程。为着科学地把握和积极地推进这一进程，所以毛泽东指出，“现时的中国新文化也不能离开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领导，即不能离开共产主义思想的领导。”^{（20）}

关于文化发展的规律，恩格斯曾有明确论述。他指出：“任何新的学说”都“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源深藏在经济的事实之中”^{（21）}，“任何意识形态一经产生，就同现有的观念材料相结合而发展起来，并对这些材料作进一步的加工”^{（22）}。就是说，意识形态文化的发展变化，从根本上取决于经济基础的进步，而意识形态自身的进步又必然要继承以往留下的思想材料，并根据社会现实生活的实际对之加以改造、扬弃，以符合历史发展的要求。恩格斯这里着重讲意识形态发展变化的规律，事实上，一切广义的人类文化形态莫不具有这种不断更新的必然趋势（人们从衣食住行等器用性文化的历史演变中，可以举出无数例证来说明这种规律性）。因此，毛泽东强调要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文化观来指导文化建设。

近年来，有人宣扬所谓“民族文化心理积淀论”，认为传统文化中的一些思想、观点渗透于人们的心理，直接影响人的行为方式，成为稳定的模式，有一种超时代的永恒性质。如果说，这种观点是指旧的思想文化残存在许多人的头脑中，发生着长期的社会影响，它是有合理性的。但如果认为旧文化可以超历史地延续，将永远制约后世一切人的思想和行为，却是不符合事实的。因为，看来似乎是超历史、超时代的文化观念，只反映人类文化的共性。它实际是一种抽象，从来就不能独立存在，而只能寄寓在具体的历史文化形态的特殊性中，而各种具体存在的特殊文化总是不断地新陈代谢的产物，绝没有永恒不变的神奇性质。这种“积淀论”夸大了旧文化的功能，否认了文化在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质的具体变化，陷入了形而上学谬论。客观上，也否认了人们对旧文化的主动改造。毛泽东则以“变”的观点看待文化的历史发展，他认为“中国的面貌，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都不应该是旧的，都应该改变。”^{（23）}也就是肯定文化形态将随历史的发展，不断地扬弃自身，有所创新。这才是符合文化发展实际的科学认识。

在以什么思想指导来建设新文化的问题上，理论界是有过争论的。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作指导的这条总原则，并非无的放矢。所谓“全盘西化论”和“中体西用论”，之所以不能有效地实现对旧文化的改造，很重

要的原因就在于这些理论不具备现代最先进的科学指导思想。近年来，又有人提倡“西体中用论”，要以西方文化做中国当代文化之“本体”。这种论调颇产生了一些影响。然而，什么是西方文化之体呢？如果说这个体，是指西方文化的共同本质，那么这个体也是一种抽象，不是具体的东西，不是独立存在的实“体”。它连“体”都没有，何来“本体”？如果要研究西方文化之体，那就要对西方文化中不同质的文化形态作具体的区分。倘若对现代西方文化做大体的分类，它除了非阶级性的通用文化如科学技术、先进的经济管理方法等之外，还有阶级性文化。而其中占统治地位的是资产阶级文化，如以私有制为核心的政治文化、意识形态中典型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之类。这些陈旧的文化形态，正是中国人民坚决反对的。难道要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引进做中国当代文化的本体？对上述非阶级性通用文化如科学技术、管理经验和方法，固不妨多多引进，为我所用。但是，这种文化既是通用性的，它本身便是用，而不是体，它本质上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这里谈不上什么体不体的问题。如果所谓体，是指西方无产阶级文化，那么代表这种文化的最先进的思想理论马克思主义早在 70 多年前就引进了，而且它与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已经不断得到丰富发展。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西体中用论者对此不会不知道。但他们置若罔闻，只是一味含糊其词地提倡以西方文化为体。这是什么缘故呢？说穿了，所谓西体中用论，如果不是主张者头脑糊涂、概念混乱，就是他们有意掩饰其无批判地引进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托词，实质上要以这种文化来排斥、冲击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建设中国无产阶级新文化。

毛泽东讲的实现文化扬弃的第二条总原则，是强调创造新文化，目的在于适应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需要，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里精辟地规定了新民主主义的性质，说它是“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这个新文化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这些新政治新经济的主体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新文化的建设要适应中国新政治新经济的需要，当然必须为这些新政治新经济的主体即人民服务。不仅新文化自身的性质是如此，而且新文化的来源也在于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包括新政治新经济的实践）中。在《讲话》中，毛泽东明白指出，“过去的文艺作品不是源而是流”，人民的生活才是一切文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批判地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是从“流”中汲取有益的东西，这并不能替代自己的创造。文艺不应拒绝“流”的营养，但更要溯流探源，到“源泉”去取得最新鲜生动的现实原料，才能创造新文艺。因此毛泽东鼓励文艺家，“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总之，“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可见，面向实际生活，为人民服务，不仅是关系到新文艺自身的性质问题，而且是新文艺建设的唯一出路和根本条件。在战争年代，毛泽东强调新文化要为新政治新经济服务，这无疑是正确的。在今天的现代化建设时期，我们党及时调整文化方针，提出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方向，纠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偏向，当然也是正确的，这是毛泽东文化观在新时期的发展。毛泽东提出的面向实际、为人民服务的总原则没有变，而且永远不会变。

近年来，在两个文明建设中，出现了“一手软、一手硬”的偏向。文艺

界有人再度拣起“全盘西化论”，宣扬文化虚无主义，如电视片《河殇》就主张要用“兰色的海洋文化”取代中华文化。这实质上是对西方文化盲目崇拜，对中华文化一笔抹煞。这是彻头彻尾的谬论。有的人热衷引进西方的腐朽文化，也有人则宣扬古代文化中的糟粕，使色情、暴力、吸毒、迷信之类的有害东西，泛滥不止。这都是文化建设中的逆流，是一种倒退。这些坏现象完全背离了现代化建设的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必须严加禁止。不如此，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就是一句空话。

毛泽东文化扬弃论提出的两条总原则，是分别从指导思想和服务方向两方面讲的。这两条总原则在根本上又是完全一致的，二者也是辩证统一关系。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本身就来自人民群众创造文化的社会实践，又必须回到新文化建设的实践中发挥指导作用，为人民服务，并要经过这种为人民服务的实践不断验证和丰富。新文化建设离开了这一指导思想，就成了盲目的实践；而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离开了新文化建设的群众基础，也就失掉了它的理论价值和生命力。因此，两条总原则的内在一致性，体现了毛泽东文化扬弃论的理论性、实践性和阶级性、人民性的高度统一。

三、文化扬弃论的方法论

毛泽东文化扬弃论不仅是一种理论指导，而且具有方法论意义。它针对不同性质的特殊的文化形态，提出了不同的扬弃法，具有切实可行的操作性，体现了文化扬弃论理论与实践、认识论与方法论的统一。

关于文化遗产的批判地继承问题，以往学术界曾提出“抽象继承法”，意思是对思想文化遗产可以现成地选用其抽象概念或符号的形式，但需改变其内容。这种方法对某些思想文化遗产可以奏效，有一定合理性。但它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却不能普遍适用。比如古代名家书法、名画、名曲，人们无法剥离其内容与形式，今人要继承和创新，就必得在学习、借鉴的基础上对其内容与形式均有改变，不能只继承其符号形式。再比如古人思想中的鬼神观念、君臣观念、私有观念等特殊观念（不是指词语），今天也不能原封不动地拿来。毛泽东的文化扬弃法不全等同于“抽象继承法”，而是抽象与具体相统一的本质扬弃法。毛泽东举例说，“音乐的基本原理各国是一样的，但运用起来不同，表现形式是各种各样的。”^{（24）}这就是承认音乐文化是多样统一的综合体，音乐的继承和创作有其特殊要求，音乐的基本原理要继承，但要通过创作各种各样新音乐的具体形式来体现。没有新创作，抽象继承音乐原理，这种继承就没有意义。

要实现抽象与具体相统一的扬弃，就要首先对历史文化遗产的形态加以具体分析，区别其不同性质、不同层次，把握其特殊性，然后采取不同的具体操作法。

毛泽东认为，有许多非阶级性的通用文化可以拿来现成地使用。如饮食文化，毛泽东引用古人的话说，“口之于味，有同嗜焉。”毛泽东还指出，“水是怎么构成的，人是猿变的，世界各国都是相同的。”^{（25）}“剖肚子，割阑尾，吃阿斯匹灵，并没有什么民族形式。”^{（26）}可见，凡属自然科学原理、科学技术之类的文化形态，都没有阶级性，均可现成地拿来。如果说需要改进、扬弃，那是通过科学研究，加深对科学原理的认识，对科技有所革新和发明创造。当然这里也有一个科技为谁掌握、为谁所用的问题，但科技

本身并没有阶级属性。更典型的例子是语言文字这种通用性文化。语言文字自身无阶级性，它的形式较为稳定，但随着历史的进步，其中某些词语及用法废止了，新的词语及用法产生了，有其一定规律，是一种社会性的自然扬弃过程，但其服务一切人的通用性没有改变。毛泽东就是一位语言大师，他尊重语言文字发展变化的规律，却又有创造性。毛泽东在语言文字方面造诣非凡，极其生动活泼，又精炼准确，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的理论语言，作为现代汉语言的一种典范，影响了整整几代中国人。这是毛泽东对这一通用性文化在运用上实行科学扬弃的杰出范例。

在非阶级性文化中也有少数利害相参的通用性文化，比如吃鸦片、注射吗啡针，可以用于治病，也可以使人中毒上瘾。对此类东西，就应严格执行医用规定，防止滥用，或者采用其他无害方法如针刺麻醉法取代之。这也是一种兴利除弊的适度扬弃。

像群众中一部分人中存在的迷信习惯、不文明陋习、多子多福观念，虽然其中杂有旧社会剥削阶级的思想行为的影响，但作为文化现象却不能等同于剥削阶级专有的文化。对这类旧风俗习惯，就只能采取思想教育方式，按政策原则，加以积极的正确的引导，启发自觉，让人民群众自己起来加以革除，使之向新风俗、新习惯转化。这又是一种弃旧图新的扬弃。还有自古至今长期存在的宗教文化，也不宜和剥削阶级文化等同起来。对之尤宜注意政策，审慎对待。无产阶级提倡无神论，不信仰宗教。但尊重人们的宗教信仰，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承认宗教文化存在的一定合理性，而且重视其珍贵的历史价值。宗教终将消亡，但需要有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现在却不应强行禁止。对宗教文化的扬弃应是一个长期的渐进过程。只要宗教文化不背离爱国主义立场，拥护社会主义，我们就要保护而且允许其适度发展。而这，也正是实现宗教文化扬弃的前提和正确起点。

对纯粹的剥削阶级文化，也要具体分析。对其中腐朽的思想文化和生活方式，比如赌博、色情文化、纳妾制度，鉴于其严重的危害性或反动性，就必须对之坚决排斥、禁止，要采用法律手段取缔。如果说拿来利用，只能是选取典型，当做反面教材，揭露其危害，作为社会主义文化教育的辅助手段。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叫做“化毒草为肥料”，即变害为利。这是一种转换功能的文化扬弃。

对于上述性质不同的文化形态，毛泽东生前领导党和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科学的文化政策，都具有行之有效的操作性，其目的都是要促进这些文化的具体扬弃，以利于创建社会主义新文化。在这方面，我们取得的巨大的历史性成绩，是有目共睹的。

在文化扬弃过程中，较为困难的是如何对待大量的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文化的问题。因为，这部分文化成果是精华与糟粕相互渗透的统一体，不可能采取一切两半，取优汰劣的机械方法。比如古代“孝敬”的伦理道德观念，既有尊者敬老的积极成分，又有封建家长制的本质特征；又如古代的爱国思想，既有热爱祖国、捍边御侮的正义精神，又往往与忠君观念、狭隘民族主义相联系。社会主义的伦理道德观念和爱国主义思想，既不能割断历史联系，全部另起炉灶，又不能现成取用旧的思想内容。这是一个难题，毛泽东深知对这一类文化形态实行扬弃的困难性，他比喻说，对这类东西应如食物一样，要首先经过消化、分解，尔后“吸取精华，去其糟粕”。那么，怎样对其消化、分解呢？如前所述，毛泽东以文艺为例，指出要利用旧形式，给以

改造，加进新内容，使之“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通俗地讲，就是“旧瓶装新酒”。比如今天我们在长幼伦理关系上，依然提倡“孝敬”老人，“孝敬”的观念形式没有变，但内容改造了。我们剔除了其中封建家长制的本质内容，加进了人与人平等关系的新的本质内容。对古代的爱国思想也是这样，我们剔除了其中的忠君观念和狭隘民族主义内容，代之以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维护社会主义事业并与国际主义相联系的新内容。这种“旧瓶装新酒”法，与“抽象继承法”颇为相似，即对旧文化的概念形式有选择地继承。如“孝敬”、“爱国”这类词语具有通用性，但用来作为概念的形式时，它却属于一定思想理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作为旧的概念形式，以往只能涵盖旧内容。将其作为新概念的形式，形式未变，它涵盖的内容却从根本上更新了。但这种继承并非只是“抽象意义”的继承，因为任何意义的真确表述，都是概念本身抽象与具体、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它们在现实中是不能割裂的。我们继承来的概念形式，是对现实生活中业已出现的新事物的具体内容的反映，不是仅仅在概念的抽象意义上继承旧形式。

在“旧瓶装新酒”的文化扬弃方面，毛泽东也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比如，“实事求是”这个命题，原出于《汉书·河间献王传》：“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古人颜师古的解释很简单：“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几乎没有解释，无甚精义。毛泽东却以马克思主义理论重作解释，他指出：“‘实’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²⁷⁾。这个命题的改造，与颜师古的解释就有本质的不同。它反映了人们把握真理、从事实实践的客观规律性。这就属于概念的抽象与具体、形式与内容相统一的扬弃。在毛泽东著作中，这类文化扬弃的实例举不胜举，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在文化建设实践上的创新精神。

不过，对旧的文化形式的利用也不是无条件的。有些旧形式虽亦不妨拿来，但因其历史局限性较大，却不宜照搬来普及推广。比如对旧体诗形式，毛泽东就指出，“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²⁸⁾可见，对文化旧形式的利用也要权衡利弊，适度掌握。这又体现了毛泽东在文化扬弃上的辩证观点。

综上所述，对一切历史文化遗产都必须首先按照文化扬弃的总原则，从本质上分清利害，权衡利害之大小，然后针对其不同性质、不同层次的特殊文化形态，采取具体的不同方法来加以分析、取舍、改造，进行科学的扬弃。一概肯定或一概否定的做法，都是不对的。

历史文化遗产是极其丰富多样的，但是所有这些遗产都只是建设新文化可供选择的材料。利用这些材料，往往不能全面反映新时代出现的新事物。在人民当家做主人的新中国，我们开创了前所未有的伟大事业。现实生活的巨变中，涌现了大量新的生活现象，为新文化的创造提供了崭新的丰富内容。这样，文化遗产中固有的有用形式就不敷其用。这就必然要求在文化建设中革新旧形式，或者创造全新的形式，以适应时代的要求。因此，毛泽东积极提倡要“标新立异”、“独树一帜”，勇于革新、创造。早在1944年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支持戏曲改革，更新其思想内容。到1964年之后，毛泽东又鼓励京剧改革，对京剧的旧形式进行多方面的革新，借以表现革命和建设的新题材。虽然京剧改革在“文革”中一度受“四人帮”干预，被利用为他们篡党夺权的政治资本，但京剧改革的许多实际成绩，却出于戏剧工作者的辛勤

劳动，其中有益的经验是应当肯定的。毛泽东重视和支持革新旧的文化形式的基本观点是正确的。

“标新立异”、“独树一帜”的另一层含义，是提倡敢于独创。毛泽东对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新事物，给予极大的热情支持和关注，对共产主义思想的萌芽尤其不遗余力地扶植、宣传。比如毛泽东亲自表彰的白求恩精神、雷锋精神，都是以往历史上没有的，都具有与传统观念和势力决裂的特征。这些精神当然也有历史文化的基础，但内容和形式上都是全新的，属于共产主义的先进意识形态。这些精神联系着党和人民共同奋斗的远大目标，它标志着无产阶级新文化对历史文化本质上的全面扬弃，既是立足现实的，也是面向未来的，因此更具有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毛泽东的文化扬弃论作为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伟大发展，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文化的建设理论，对当前我们从事两个文明的建设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尽管毛泽东在晚年犯了严重错误，他主持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变成了大革文化命，并导致了政治动乱。但是，他的文化扬弃论的基本理论、方法和实践，作为毛泽东文化思想的核心却是永放光芒的。

（作者单位：山西省社会科学院）

注释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363 页，第 86 页，第 363 页，第 86 页，第 2 页，第 474 页。

《如何研究中共党史（1942 年）》。

（13）（12）（13）（16）（18）（19）（23）（24）（25）（26）
《毛泽东著作选续》下册，第 页，第 748 页，第 752 页，第 751 页，第 713 页，第 752 页，第 751 页，第 752 页，第 750 页，第 748 页，第 746 页。

（14）（15）（20）《新民主主义论》。

（17）《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反对党八股》。

（21）（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56 页，第 4 卷第 250 页。

（27）《改造我们的学习》。

（28）《关于诗的一封信（1957.1）》。

批判地继承民族的文化遗产和吸收外来进步文化

应必诚

历史文化遗产的继承革新，各民族文化的相互吸收，是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早已揭示了这一规律。但是，揭示这一规律在近代中国的大变动中的表现，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的一般理论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在中国解决好新文化建设中的古今中外的相互关系，则是毛泽东文化思想的一项重大的贡献。今天，中国的革命和建设进入到新的历史阶段，毛泽东的这一重要思想以及在此基础上提出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仍然是适用的。继续坚持毛泽东提出的思想和方针，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和发展，仍然是我们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所面临的重要课题。

一、批判地继承历史文化遗产

早在 1938 年，毛泽东就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能割断历史。”

历史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根据这个观点，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进行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进行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从事创造。可见，任何一个历史时期作为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总是处在一定历史的传统之中，问题在于我们对历史的传统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法。中华民族的文化源远流长，在长期的文化发展的过程中，后一阶段的文化总是继承了前一阶段的文化，才能得到发展。但这一继承，在封建社会里，虽然也曾表现为儒、法、墨、道、佛种种文化思想之间的斗争，这之间的斗争有时也很激烈，但总的来说，它们都是在封建的经济基础上以及封建文化的范围内进行的，基本上是一种历史的自然的延伸。现在我们所说的对文化遗产的批判继承是在完全不同的经济政治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我们所面临的历史任务也与过去完全不同。以“五四”为开端的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它的一个重要的历史任务，就是推翻封建的经济政治制度，在文化领域用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文化来取代旧的封建文化。因此，新文化首先是新的政治经济的反映，而不是旧文化的自然延伸。这样就在用新文化取代封建主义旧文化的同时，提出了一个新文化的革命建设如何对待历史文化遗产的问题。能不能因为反对封建主义文化就对历史文化遗产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呢？如果不是全盘否定，那又应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这就是问题复杂性的所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科学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是毛泽东的历史功绩。

毛泽东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和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任务，首先指出所谓民族文化遗产，其中大部分是封建时代创造出来的。自周秦以来，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其政治是封建的政治，其经济是封建的经济，而为这种政治和经济之反映的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则是封建文化。中国革命基本任务，就是反对和推翻封建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统治，用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文化取代旧的封建文化。其次，毛泽东又指出，新文化是从旧文化发展而来的，新文化的创造不能脱离历史文化遗产。这就决定了我们对封建时代创造出来的文化既不能全盘否定，也不能采取无批判的兼收并蓄，而必须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对文化遗产予以分析，分清哪些是民主性的精华，对于

我们今天新文化建设是有用的，哪些是封建性的糟粕，必须予以抛弃。毛泽东把它称为批判地继承历史文化遗产。

在中国近代的历史上，资产阶级的新文化的领导者们曾经对封建阶级的旧文化作过斗争，但是只打了几个回合，就败下阵来。“所谓新学，就偃旗息鼓，宣告退却，失去了灵魂，而只剩下它的躯壳了。”康有为、梁启超，对西方哲学社会科学曾作过广泛的介绍，倡导思想启蒙，鼓吹维新改革，用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反对封建的旧文化；但在“五四”以后，又转而否定西方文化，提倡中国传统的精神文化。章太炎一生的思想和活动，更说明问题。他早年学习西方文化与科学知识，信仰进化论，积极参加戊戌变法和思想启蒙。他的思想超越了康、梁。他利用自己对于传统文化的深厚的造诣，反戈一击，公开和直接地批评孔学和孔子。因作《诂书》和邹容的《革命军》序，被监禁上海西牢。但不久，就对西方文化失去信心，又转而向传统文化寻求出路。提出：“第一是用宗教来发起信心，增进国民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晚年刻《章氏丛书》，自藏其锋芒，先前斗争的文字，多被刊落，“遂身衣学术华衮，粹然成为儒宗”，都是明显的例子。后来的东方文化派，则对西方文化采取排斥态度，力主回归传统。

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是彻底的反对封建文化运动，当时的一些领导人物和进步人士，对于封建思想和封建文化进行了空前猛烈的抨击，表现出冲决封建罗网，砸碎旧的精神枷锁的可贵的革命精神。但是，他们中许多人那时的思想还是以进化论为武器，还缺乏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对待历史的文化遗产常常表现出一种全盘否定的非历史主义的倾向。针对这样一种情况，毛泽东充分肯定五四运动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教条，提倡科学和民主的伟大功绩的同时，指出五四运动本身也是有缺点的。他说：

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他们反对旧八股、旧教条，主张科学和民主，是很对的。但是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的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这种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就影响了后来这个运动的发展。

应该指出的是，在近现代中国，古今之争，在某种意义上常常表现为中西之争。一部分人用形式主义的方法，把中国的文化说得一无是处，只有外国的东西好，一切皆好，提倡“全盘西化”，这是形式主义向右的方面的发展。另一部分人，毛泽东指的是党内的部分同志，他们马克思主义没有学好，只懂得希腊，只懂得外国，不懂得中国的历史和现状，不注意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犯了形式主义、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的错误。这是形式主义向“左”的方面的发展。

那么，什么是对待历史文化遗产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呢？毛泽东认为，首先，要克服和纠正对历史文化遗产的盲目崇拜、全盘继承和一概否定的形式主义态度和方法，对历史上存在的文化遗产进行历史的辩证的分析。经过分析，把遗产分成民主性的精华和封建性的糟粕两个部分，即“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而绝不能无批判的兼收并蓄。

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中，毛泽东提出了对于过去时代

的文艺要“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毛泽东提出的这个检查的标准，一般来说对整个历史文化遗产也是适合的。

一是对待人民的态度，一是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这两条检查历史文化遗产的标准是一致的。但明确提出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就给我们判断历史人物及其功过、判断历史文化遗产优劣，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历史标准。这就要求我们对文化遗产进行历史考察，反对一切非历史主义和形形色色庸俗化简单化的作法，坚持了人民性与历史观点的统一。根据这个标准，毛泽东对封建社会历史上许多主张改革，促进生产和社会进步，促进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进步的封建阶级的人物，都给以肯定的评价。他高度评价唐朝的二王（王丕、王叔文）八司马（柳宗元、刘禹锡等），清朝的魏源、龚自珍、林则徐，肯定他们在历史上起的进步作用。他对文化史文学史上有所创造，起过作用的作家作品也十分重视，肯定他们的历史地位和贡献。

建国以后，我们有可能在更大的规模和深度上对历史文化遗产进行清理、评价和吸取的工作。1960年12月，毛泽东对两个外国代表团的谈话中，对此又作了更加具体和深入的阐发。他说：

应该充分地利用遗产，要批判地利用遗产。所谓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是封建时代的文化，但并不全是封建主义的东西，有人民的东西，有反封建的东西。要把封建主义的东西与非封建主义的东西区别开来。封建主义的东西也不全是坏的，也有它发生、发展和灭亡的时期。我们要注意区别发生、发展和灭亡时期的东西。当封建主义还在发生和发展的时候，它有很多东西还是不错的。反封建的文化也不是全部可以无批判地利用的，因为封建时代的民间作品，也多少还带有若干封建统治阶级的影响，我们应当善于进行分析，应当把封建主义发生、发展和灭亡时期的文化区别开来，应当批判地利用封建主义的文化，我们不能无批判地加以利用。反封建主义文化当然要比封建主义的好，但也要有批判、有区别地加以利用。我所了解的是这样，我们现在的方针是这样。至于充分利用它们，我们现在还没有做到。

毛泽东在这里对封建主义时代所创造的文化作了更加具体的分析，提出三个区分，即：把封建主义的东西与非封建主义的东西、反封建的东西、人民的东西区分开来；对于封建主义的东西，又对不同时期创造的文化加以区分；就是人民创造的文化，也要加以分析，看它与当时占统治地位封建文化的关系和受影响程度。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批判地继承文化遗产的理论的新发展。毛泽东的这个分析，充分体现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闪耀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光辉。

批判地继承文化遗产的意义和目的是什么呢？这是毛泽东反复说明的问题，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认识中国灿烂的古代文化，提高民族的自信心。毛泽东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学习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发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可以激发爱国主义的热情，提高民族的自信心，鼓舞人民去完成打败帝国主义和建设新中国的历史任务。

第二，学习历史遗产，了解中华民族的民族的特点及其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对完成无产阶级所担负的历史任务有重要意义。毛泽东把学习历史，学习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看成是促进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结合，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方面。1938年9月29日至

11月6日，在延安举行的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首次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为了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的结合，毛泽东提出除了学习革命理论，了解实际以外，还要学习历史，学习和总结优秀文化历史遗产。毛泽东指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队伍中存在着一些严重的错误，是应该认真地克服的。”毛泽东在这里指的就是抗日战争初期王明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王明不了解中国的历史，不了解中国的民族传统和特点，不了解中国的实际，只知道机械地搬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搬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把共产国际的指示神圣化，完全忘记了“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的道理。而这种脱离实际，脱离历史以及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称它是抽象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基本上纠正了王明的右的机会主义的错误的影响。但这时，王明本人并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他针对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及学习历史文化遗产的思想，错误地提出“不能以旧中国文化学说来曲解”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能在‘民族化’的误解下，来忽视国际经验的研究和运用。”⁽¹¹⁾把提倡学习历史，学习历史文化遗产，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说成是用旧中国文化学说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又把我们对于国际经验的研究、运用和民族化对立起来，这正好从反面说明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第三，学习历史，学习历史的文化遗产，是为了创造新的文化。毛泽东多次指出，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继承和借鉴不能代替自己的创造。为了达到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目的，这就需要我们对于古人创造的文化遗产，不仅要联系当时的实际，科学地分析它的历史价值，肯定它的历史地位，而且还要从今天现实的情况和需要出发，研究它们对今天的价值和意义。我们只能吸收“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于我们有用的东西”，“中国人民实际需要的东西”，把古代有价值的东西，今天有用的东西，经过胃肠消化和吸收，成为新文化有机的组成部分。

继承和借鉴的目的是新文化的创造；而借鉴和吸收传统文化中有益的成分，又是从事新文化创造的必要的条件。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谈到文学艺术的创造与继承民族文化遗产时说：“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所以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¹²⁾毛泽东在这里说的文野、粗细、高低、快慢之分，前三者主要是指水平、质量来说的，后者则是从发展的速度来说的。总之，只有善于继承和借鉴文化遗产，才能使新文化更好更快地发展。

二、批判地吸收外来文化

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从中国的实际需要出发，吸收和借鉴外国的进步文化，这是毛泽东文化思想的又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早在公元1世纪，中华民族文化便开始了与各民族文化的交往。当时中华民族的文化在世界文化中居于先进地位。中华文化对世界文化关系常常表现为主动的吸取。世界其他民族异质文化与中华文化融合，曾经促进了中华

文化的创造和发展。

18 世纪，西方国家在经历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以后，文化、科学技术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机器所带来的生产力几年就超过了人类几千年发展的总和。资本主义比起封建制度来说，是历史的进步。但是，这个进步需要罪恶作为它的补偿和代价。帝国主义用极端野蛮的方式打开中国的大门，用大炮向中国输进了先进的近代的文化，这就造成了近代中国历史的悲剧和非常特殊的文化现象。一方面帝国主义日益加强对中国侵略，包括文化方面的侵略，在中国培植殖民的奴化思想；另一方面也开始了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历史。“别求新声于异邦。”其中先进人物，顺应历史的潮流，大胆地引进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和资产阶级社会政治文化学说，把它作为思想武器，批判封建主义落后腐朽的文化思想，用资产阶级的新文化代替封建阶级的旧文化。

中国人学习西方没有成功，国家天天坏下去，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改变了世界的历史进程。中国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作为普遍的科学原理一旦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使中国改变了面貌，也解答了人们“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的困惑，中国人民的精神也从被动转入主动。那么，我们还要不要吸收和借鉴外国文化呢？当时许多人，他们先是主张学习西方，而后又纷纷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去找寻出路；而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侵略者用大炮送来的西方文化，又多采取简单的否定态度。就在此时，毛泽东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解决了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与吸收、借鉴外国文化这样一个复杂又长期困扰我们的问题。

他首先肯定了资产阶级文化的进步意义，毛泽东不同意笼统他说中西文化“都很高”的观点，他认为，不是都很高，而是到近代，外国资本主义高于中国的封建社会。毛泽东用《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向全国人民系统他说明了

学习外国进步文化的重要性，他说：

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还做得很不够。这不但是当前的社会</PGN0153.TXT/PGN>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有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13）。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是一项重要的任务。根据新的建设要求，毛泽东在总结我国和苏联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 1956 年 4 月 25 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论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大关系，其中就包括中外关系，再次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他认为：

应当承认，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不然它为什么能存在？为什么能发展？同时，每个民族也都有它的短处，有人以为社会主义就了不起，一点缺点也没有了。哪有这个事？（14）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我们学习外国的长处，就可以弥补自己的短处，就可以克服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民族的片面性。基于这样的认识，毛泽东进一步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

接着就有一个用什么样的态度和方法对待中西文化关系的问题。毛泽东总结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与外国的文化关系的历史经验，多次论证了吸收和借鉴外国文化必须防止的两种偏向：盲目的排外主义和“全盘西化”论。

毛泽东说，西太后反对“洋鬼子”是错误的，就是指她的盲目的排外主义。当时以西太后为首的封建顽固派，他们对于世界的变化一无所知，闭目塞听，承袭着“神明华胄”的荣光，抱着天朝帝国四夷宾服万国来朝的幻想。对外来的文化采取一概的排斥态度，这种排外主义思想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一直以不同形式表现出来，始终没有根绝过。

中国近代历史上，魏源首先看到西方自然科学和技术的进步，提出“师夷之长以制夷”，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用以制止西方的入侵。但近代影响最大的还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口号的提出，用传统的“本末”、“道器”、“体用”之说来解释中西之间的关系。“中学为体”，就是要固守孔孟之道和封建的体系制度；“西学为用”就是要采取西方的科学技术，富国强兵。这个口号后来实际上成了洋务运动的理论基础。但它在当时就遭到来自两个方面的反对：封建顽固派从体用一致的思想出发，指出“西用”必然要危及“中体”，动摇中国封建立国之道、立国之本；而另一些先进人物则认为，如果不改变封建立国的“本”和“道”，只学来一些先进的科学技术，不能挽回大局，无补于存亡大计。当然，“中体西用”作为一定历史时期提出的口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它的客观的实践的结果是与提出者的愿望很不一致的。随着历史的发展，特别是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洋务派经营多年的北洋水师毁于一旦，“中体西用”的思想也就更加显出它的谬误。“五四”以后，就有人提出“全盘西化”论，他们一味称颂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否定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造成中国殖民地化这个事实，并且主张中国应该走英美式的资本主义道路。

毛泽东不赞成盲目的排外主义，不赞成“中体西用”，也不赞成“全盘西化”。从政治上看，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中国已无法实行资本主义，全盘西化的结果只能把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附庸，变成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这是中国人民所不能接受的。在文化艺术方面，“全盘西化”被接受的可能性也很少，就艺术而言，毛泽东说：

艺术有形式问题，有民族形式问题。艺术离不了人民的习惯、感情以至语言，离不了民族的历史发展。艺术的民族保守性比较强一些，甚至可以保持几千年。古代艺术，后人
</PGN0155.TXT/PGN>还是喜欢它（15）。

毛泽东在这里说的是艺术，但也适用于包括艺术在内的文化。在这里，毛泽东与“五四”以后某些论者不同，他把中西文化的关系不仅仅看成是先进与落后的关系、时间先与后的关系，还把它看成是民族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思想。民族性是民族文化赖以存在的根据，任何先进的文化思想只有和民族特点相结合，以一定的民族形式表现出来，才能被接受。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是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文化的思想。他们指出，除了封建文化，资本主义文化以外，还存在一个无产阶级的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他们在关于古今东西文化论争中，提出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和资产阶级腐朽文化的主张，表现出在文化上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精神。但是，他们中的不少人，还缺乏历史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对

待外国、西方的文化采取一种全盘否定的态度，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所谓坏的就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的就绝对的好，一切皆好”的形式主义看问题的方法，他们无法解释和处理复杂的文化现象。毛泽东特别注意的是这种形式主义的看问题的方法在党内的表现，认为它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发生在党内的另一种“全盘西化”论。其特点是照搬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照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延安整风运动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克服党内的“全盘西化”论。

吸收和借鉴外国进步文化的意义和目的是什么呢？毛泽东提出了“洋为中用”的思想。这个思想的内容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吸收和借鉴外国的东西，要从中国的实际需要出发。马克思主义认为，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理论是如此，文化也是如此。向外国人学习，不是全盘西化，也不是盲目排外，而是要从中国的实际需要出发，吸收外国文化一切有益的成份，为我所用，用以创造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新文化。

第二，毛泽东运用唯物主义辩证法原理，指出中西文化关系中存在着一个共性与个性的关系。这就从理论上解决了如何吸收和运用的问题。他认为中学与西学不是“体”“用”的关系，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口号作了新的解释：“学”是指基本理论，是“中外一致的，不应该分中西”，但中外的表现形式应该是多样的，这就是民族的特点、形式和风格。这也就从哲学上指出了“明华夷之辩”、“中体西用”以及“全盘西化”等主张的形而上学的偏颇。“华夷之辩”，片面强调中西的区别，抹煞中西文化有共同之处；“全盘西化”论则相反，它完全抹煞中西文化不同的民族特点；而“中体西用”说则把中西文化关系纳入体用、本末、道器的关系。这些主张，虽然具体内容有异却都是从不同的方面违反了中西文化关系中共性与个性的辩证关系。

毛泽东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一文中，集中地讨论了中西关系中的共性个性问题。

关于社会革命，毛泽东说：“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原则，各个国家都是相同的。但是小的原则和基本原则的表现形式方面是有不同的。”（16）接着，毛泽东从社会主义革命进而讨论文学艺术问题，音乐问题，他说：

艺术的基本原理有其共同性，但表现形式要多样化，要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有共性，也有个性，有相同的方面，也有相异的方面。这是自然法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法则。作曲、唱歌、舞蹈都应该是这样（17）。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向西方学习，并为我所用呢？毛泽东认为应该学习西方的一般科学原理并用来研究中国的问题，一般原理中西是共同的，但在各个国家的表现形式又总是带着各自的民族特点。

毛泽东认为，近代文化，外国比我们要高，“要承认近代西洋前进了一步”，因此，“要向外国学习科学的原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一般道理都要学。……艺术又怎么样呢？中国的音乐、舞蹈、绘画是有道理的，问题是讲不大出来，因为没有多研究。应该学习外国的近代的东西，学了以后来研究中国的东西。……马克思讲过，首先研究近代社会，就容易理解古代社会。这是倒行的，却要快些。”（18）

在这里，毛泽东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社会的一个重要的方法。马克思指出，关于人类生活形态的考察及科学分析，一般是与人类生活形态的现实发展，循由相反的道路。那总是从后面，总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就像“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在下等动物身上透露的预兆反而只有在已经认识了高等动物之后才能理解”⁽¹⁹⁾。根据马克思的这个思想，毛泽东倡导学习和研究外国近代的东西，用外国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一般道理去研究中国的东西，努力促进一般原理与中国的实际、特点的结合，使外国的东西在中国新文化建设实际需要的基础上，“交配起来，有机地结合”，用来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这样就可以产生出新的丰富独特的表现形式，就会使我们自己的东西有一个新的飞跃。

第三，学习外国的东西是为了发展中国的现代的民族文化。毛泽东特别指出，一般原理与中国实际、特点的结合，外国的东西与中国的东西在中国新文化建设实际需要基础上的融合，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搬’也是要搬一些的”；民族形式可以掺杂一些外国的东西；不中不西的也可以搞一些，非驴非马也可以。毛泽东举了一些生动的比喻：“骡子就是非驴非马。驴马结合是会改变形象的，不会完全不变。”⁽²⁰⁾洋为中用，就是在中国自己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西洋一切有用的成份，最后达到中国优秀文化与外国优秀文化的有机融合，创造出既不同于外国，又不同于古代的现代中国文化的新形式和新风格。

向外国学习，是不是就是洋化呢？我们的文化“还是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应该越搞越中国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向外国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化”。事实证明，中国的文化，在吸收外国的长处，克服自己民族的片面性以后，不仅不会失落而且还会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自己原有的特性，并且使民族性与现代性、世界性更好地统一起来，使我们民族文化更加光辉灿烂。

三、历史的反思和面临的任务

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的一般原理，使它与中国文化的革新与建设实践结合起来，提出了对待历史文化遗产和外国文化的正确理论和方针。实践这一理论方针，我们已经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是，在1957年后，在“左”的思想路线影响下，使得继承历史文化遗产和吸收外国进步文化的正确方针的执行受到极大的干扰。到了“文化大革命”，“左”的路线恶性发展，把传统文化遗产和外国文化不加区别地统统当作封、资、修加以批判，实行文化虚无主义和排外主义；另一方面，又以批判封建主义为名，把真正封建主义的东西在革命的名义下复活起来，从而极大地阻碍和破坏了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和发展。

历史已翻开新的一页。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要总结和牢记历史的经验教训，恢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关于批判地继承文化遗产和吸收外来先进文化的正确理论和方针，正确地认识传统文化，正确地认识西方文化，正确地认识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方向，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促进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的一般原理与中国新时期的现实在更高水平上的结合，有力地推进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建设。

继承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吸取西方先进文化两个方面，都是建设具有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要求，是缺一不可的。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我们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经济建设为中心”，商品、市场经济的发展，对内搞活对外开放方针的确立，以及思想解放运动的兴起，排除了“左”的干扰，进一步为继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吸收西方先进文化指明了方向。首先是对外开放的实行。不开放，闭关锁国，就不能发展自己，经济上是如此，文化上也是如此。拒绝接受外国的进步文化，任何国家，任何民族文化的发展和进步都是不可能的。由于实行对外开放，毛泽东提出的中国民族文化与外国先进文化的融合的思想，正在逐步得到实现。同时，我们也正以空前的规模对民族文化遗产进行发掘、整理、研究和传播的工作。发展优秀的民族文化是我们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要发展民族文化，就必须继承优秀的文化传统。在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它直接关系到中国文化的兴衰，同时也是增强我们民族自信心、自尊心，振奋民族精神，加强民族凝聚力的一个重要条件。把民族文化遗产，一律加以批判打倒的“左”的做法和民族的虚无主义思想，只会自我阻断我们民族精神命脉，自我毁灭我们民族文化生生不息的基础，我们的民族精神就会萎缩下去，我们的民族文化就有失去独立和生命成为一种毫无生气的依附性的文化的危险。

要做好继承优秀文化遗产和吸收外来进步文化的工作，我们仍然要坚持毛泽东倡导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克服和纠正一切形式主义的思想方法。新时期以来，面对世界和中国历史性的巨大变化，面临新的文化挑战，如何对待民族文化传统和外来文化问题，一次又一次地被重新提出来，其中就有全盘西化与回归传统，中体西用与西体中用，文化寻根与走向“蓝色”，哲学启蒙与以夏变夷，彻底重建与复兴儒学等主张。这些主张，既是历史上古今中西之争在新条件下的继续，又具有更加复杂深刻的时代内容。它们既是对中国长期以来古今中西文化冲突的历史反思，又是对中国文化面对新的古今中西冲突挑战的不同回答。他们的主张内容各异，甚至存在着巨大的差别，需要进行具体的分析，才能分别作出恰当的评价。但这些主张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他们的倡导者缺乏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缺乏共性与个性对立统一的辩证思想，对于民族文化传统，对于西方文化，采取一种形式主义的方法。这种形式主义看问题的方法，不能正确处理古今中外的文化关系，也会影响我们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健康发展。这也进一步说明，发扬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树立辩证的思想，克服和纠正形式主义的思想方法，对于我们处理好文化建设中的古今中外关系，对于从事民族文化遗产和外来先进文化的借鉴、吸收工作，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

我们还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我们继承优秀的文化传统的目的是什么？吸收外国先进文化的目的又是什么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理论的提出，进一步回答了这个问题。继承民族的优秀文化，并不是要回归传统，越搞越古，而是为了今天的文化建设。继承传统，推陈出新，超越传统，实现创造转化，把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与社会主义的时代精神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优秀的文化成果得以充分开发利用，获得时代的新生命。我们吸收西方先进文化，也不是全盘西化，越搞越洋，而是为我所用，为中国的文化建设所用。以我为主，兼取众长，相互融合，开拓创造，创造出既非古代又非外国的，融贯古今面向世界的社会主义的民族新文化。总之，继

承优秀民族文化遗产和吸收外国先进文化，要着眼于今天，立足于中国，

目的都是为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对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古今中西之辩，作出的历史结论，也是对我们文化面临新的古今中西冲突挑战的回答。我们坚信，顺着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道路，坚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目标，世界的文化将走向中国，中国的文化也将走向世界，中华民族的文化，必将重放异彩，在世界文化中放射出愈来愈灿烂的光辉。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

注释

（13）《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34页，第697页，第708页，第534页，第534页，第706—707页。

《民报》第六号所载的（演说录）。

鲁迅：《关于章太炎先生二三事》，见《鲁迅全集》第6卷第547页。

（12）《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31—832页，第869页，第860页。

转引自龚育之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200—201页，三联书店1986年版。

（11）王明：《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坚持持久战争取得最后胜利》（1938年10月20日）。

（14）毛泽东：《论十大关系》。

（15）（16）（17）（18）（20）《毛泽东：《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8页。

毛泽东与传统文化

张岂之

—

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需要作长期的研究，由许多同志分工合作来做。我正在学习研究，限于水平，写不出完整的心得体会。我想从一个方面，就是毛泽东阅读文史古籍的批语中看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毛泽东在其伟大的一生中，从青年时代开始直到辞世都在研究中国历史。这种研究是为了了解中国的特点，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这和纯书斋式的研究是不同的。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报告中说：“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基于这样的目的，他又说，中国共产党党员必须研究中国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要进行科学的总结，继承这一份宝贵的遗产。

关于历史，毛泽东讲过两个重要的观点。一个是：历史总的趋势是前进发展的；再一个是：我们不能割断历史。前者说的是历史的运动性、相异性；后者讲的是历史的联系性、相对稳定性。这两者在中国历史中既对立又统一。关于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史，毛泽东有个提法，称之为“中华民族开化史”。这个名词在今天的出版物中已经少见，但是它的内涵是十分丰富的，既含有历史上物质文明的创造，又包含精神文明创造。这二者的联系和结合，或者确切他说，以前者为物质基础的人类创造就是历史，也就是开化史。在毛泽东看来，从中华民族的开化史可以看出，“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所以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已有了将近四千年的有文字可考的历史。”这一段名言经常为人们引用。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首先提出农业和手工业，有了这个基础，才有杰出的思想家、科学家等，也才有各种物质的和精神文明的创造。

毛泽东在写这些文字的时候，关于中国史前时期的研究还缺少考古资料作为佐证。当时间过去了几十年，今天考古资料向人们说明了中华民族开化史与农业以及手工业有密切的关系。西安半坡公社遗存的发现，使我们知道距今6000年的先民们已经过着以农业为主的定居生活。早期的农耕物质基础产生了早期农耕文化，这是中华民族开化史的前奏。中国封建社会奠基于周秦时代。西周时期中国开化史进入稳定的农耕时期。战国时期，铁质的生产工具被广泛使用，标志着中国农业成熟时期的到来。这才奠定了后来统一的封建国家建立的物质基础。

综观漫长的中国封建制社会，一方面是小农经济和传统文化的发展，一方面则是阶级矛盾的对立和统一。对此，毛泽东早就作过这样的论述：“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而在这样的社会中，只有农民和手工业工人是创造财富和创造文化的基本阶级。”在新民主主义

革命时期，毛泽东依据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分析，确定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可靠同盟军，农民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力军，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革命。这些早已被证明为科学的真理。

依据以上简要的说明，可以看出历史（含传统文化）与现实的结合点。依据毛泽东的思路，以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看，人们研究历史必须把握住历史运动性和联系性的统一，并且把握住历史的物质文明创造与精神文明创造的统一。这两个统一便构成了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的特点。找到历史的特点，也就找到了历史和现实的结合点。

看中国封建制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必须分析农耕以及与此联系的农民问题，同样，要了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也必须如此。可以说，农耕和农民问题是中国历史的最主要的特点。不仅如此，中国封建制社会的农民不同于欧洲中世纪地主庄园的农民；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农民也不同于欧洲有些国家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农民，同样，中国农民不同于俄国农奴制度下的农民，以及 1861 年俄国农奴制废除后半资本主义农民。1958 年毛泽东在阅读史籍的时候，写下这样的批语：“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没有来得及将农民中的上层和中层造成资本主义化，但是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反动联盟，却在几十年中将大多数农民造成了一支半无产阶级的革命军，就是说，替无产阶级造成了一支最伟大最可靠最坚决的同盟军。”这个论断和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所写论著的观点完全一致，在这里用了三个“最”字再次加以肯定。这些就是历史（或传统）和现实结合点的最好说明。

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毛泽东探索在新中国如何才能使广大农民群众过起丰衣足食的生活？即或在阅读文史古籍的时候，他仍然在思考这个问题。他写的批语将历史感和现实感融为一体，再次找到历史和现实的结合点。这使我们从一个侧面看到毛泽东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例如，他不止一次地提到西汉初期政论家贾谊的名文《治安策》，要负责干部多读几遍。贾谊是一位有独立见解且敢于直言的年轻人，他敢于说：“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之危也，皆以积渐，然不可不察也。”他看到汉初社会风气侈靡相竞，豪强掠夺，造成“卑贱者”和“尊贵者”的对立，他要求从皇帝到百官，大家都做到“公而忘私”。同时抓住农业这个根本不放。这样，天下才能稳定，“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正是这两点，即百官清廉和农业为本，毛泽东认为在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仍然值得大家注意。

毛泽东读《新唐书》，对马周给唐太宗的上书，写下这样的批语：“贾生《治安策》以后第一奇文。宋人万言书，如苏轼之流所为者，纸上空谈耳。”

毛泽东对马周的思想和政治方略是肯定的。贞观五年（公元 631 年），唐太宗要百官言政治得失，常何为武人，谈不出多少道理，他让住在他家的马周针对时弊写出了若干条建议。当太宗知道是马周的意见，又找马周面谈。马周劝太宗要以忠孝为本，节俭持身，免除徭役。当时的情况是，社会风气渐趋浮华、靡丽，徭役很重，虽说有所减免，但往往不见落实。因而农民生活困难，“四五年来，百姓颇嗟怨，以为陛下不存养之。”马周强调，“凡修政教，当修之于可修之时，若事变一起而后悔之，无益也。”又说，“自

古以来，国之兴亡，不由积蓄多少，在百姓苦乐也。”马周又提醒太宗，对于宗室诸王、即对于自己的子弟不可“溺于私爱”，需制订长久之法加以约束，否则未来必将发生变乱。敢于直言而观察敏锐的马周，一直受到太宗的器重。马周去世，太宗怀念不已。

毛泽东读《新唐书》，除马周外，还赞赏姚崇，说他是“大政治家、唯物论者”。关于政事，姚崇向玄宗提出了十条建议，其内容是：

“……垂拱以来，以峻法绳下，臣愿政先仁恕可乎？朝廷覆师青海，未有牵复之悔，臣愿不幸边功可乎？比来壬倭冒触宪网，皆得以宠自解，臣愿法行自近可乎？后氏临朝，喉舌之任公闾人之口，臣愿宦竖不与政可乎？戚里贡献以自媚于上，公卿方镇寝亦为之，臣愿租赋外一绝之可乎？外戚贵主更相用事，班序荒杂，臣请戚属不任台省可乎？先朝褻狎大臣，亏君臣之严，臣愿陛下接之以礼可乎？燕钦融、韦月将以忠被罪，自是诤臣沮折，臣愿群臣皆得批逆鳞、犯忌讳可乎？武后造福先寺，上皇造金仙、玉真二观，费巨百万，臣请绝道、佛营造可乎？汉以禄、莽、阎、梁乱天下，国宗为甚，臣愿推此鉴戒为万法可乎？帝曰：‘朕能行之。’崇乃顿首谢。”

这十条政治纲领中最主要的内容是：当政者对于左右亲近的人应严格要求，不可以个人感情代替国之大事；对农人除应交纳的租赋外，不能巧取豪夺；要形成俭朴的社会风气，不可奢侈浪费等等。对于这些建议，毛泽东读史时给予很高的评价，写批语说：“如此简单明了的十条政治纲领，古今少见。”有趣的是，《新唐书》编撰者欧阳修、宋祁在写毕《姚崇传》后，写下这样的赞语：“姚崇以十事要说天子，而后辅政，顾不伟哉！而旧史不传。观开元初皆已施行，信不诬已。宋璟刚正，又过于崇。玄宗素所尊惮，常屈意听纳。故唐史臣称，崇善应变以成天下之务，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二人道不同，同归于治，此天所以佐唐使中兴也。”由此可见，《新唐书》编撰者颇有见识，发现了问题。毛泽东的史识远远超过以往史宗，不可同日而语，他在批语中纠正“二人道不同，同归于治”的话，说姚崇和宋璟“二人道同，方法有些不同”。经过这样一改，使人耳目一新，看出了本质。姚崇比较注意变易和柔道，讲出的道理使玄宗容易接受，而宋璟则侧重于刚正和义理。这些均属于方法问题，不影响他们相同的政治原则。

毛泽东喜读《南史·韦睿传》。韦睿为梁武帝时名将，长于军事韬略，爱护部众，艰苦朴素。《南史·韦睿传》说：“睿雅有旷世之度，莅人以爱惠为本，所居必有政绩。将兵仁爱，士卒营幕来立，终不肯舍，并灶未成，亦不先食。……”毛泽东读到此处，写下批语：“我党干部应学韦睿作风。”毛泽东对《南史·陈庆之传》评价很高。陈庆之也是梁武帝时的名将，善用兵，知己知彼，爱护部众，与士兵共甘苦。毛泽东再读《陈庆之传》时，挥毫写道：“再读此传，为之神往。”

今人读古书，是为了从历史中找借鉴。毛泽东倡导“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目的在此。建国以后，他经常思考的问题是如何保持公职人员的简朴廉政，和群众密切联系，不致成为站在老百姓头上的“官僚”。他对官僚主义深恶痛绝。除此，他十分关心农业生产力，希望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因此他从贾谊、马周、姚崇、韦睿、陈庆之等古人的言论和事迹里找到共鸣的音节。他谈的是历史人物和传统文化，而关注的焦点却是新中国的现实情况。

我们不能不看到事情的复杂面和多层面。大家熟知，1958年8月17日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这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决定。现在回顾这一历史事件，正如薄一波所说，1957年我国人均国民收入只有142元，农民相当贫困，“在这种情况下，轻言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和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问题，显然是一种超阶段的空想，离我们国家的实际太远了。”

1958年12月10日，毛泽东批印《三国志·魏书·张鲁传》，发给参加武昌会议的代表们。张鲁，汉末人，祖孙三代在蜀都（今四川成都）一带传“五斗米道”。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被任为督义司马，曾在汉中建立政权。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曹操进军汉中，张鲁避走，曹操遣人慰问，封他为阆中侯。张鲁在汉中主政，采用了民间道教的教规和措施，其内容，据《三国志·魏书·张鲁传》所记是：

“鲁遂据汉中，以鬼道教民，自号‘师君’。其来学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号‘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皆教以诚信不欺诈，有病自首其过，大都与黄巾相似。诸祭酒皆作‘义舍’，如今之亭传。又置‘义米肉’，悬于义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过多，鬼道辄病之。犯法者，三原，然后乃行刑。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民夷便乐之。雄据巴、汉垂三十年。……”

毛泽东关于《张鲁传》两次写了很长的批语。一次写于1958年12月7日，一次是同年12月10日。在两次写的批语中，他都分析了历史的发展和运动，说明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革命不同于封建制社会里的农民起义。他说：我国“历代都有大小规模不同的众多的农民革命斗争，其性质当然与现在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根本不同。”

同时，毛泽东也注意到历史的联系性、某些方面的相对稳定性。看来，他在这一点上作了更多的分析。例如他在批语中写道：

“我国从汉末到今天一千多年，情况如天地悬隔。但是从某几点看起来，例如，贫农、下中农的一穷二白，还有某些相似。”

又指出：汉末至今“有相同的一点，就是极端贫苦农民广大阶层梦想平等、自由，摆脱贫困，丰衣足食。”

还有：汉末至今“大约有一千七百年的时间，贫农、下中农的生产、消费和人们的心情还是大体相同的，都是一穷二白，不同的是生产力于今进步许多了。”

毛泽东在这里所揭示的关于历史（或传统）与现实的结合点，就值得推敲了。他想通过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具体说，张鲁在汉中建立的政权所采取的措施，来说明1958年中国大地上人民公社运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他在《张鲁传》的批语里说：“现在的人民公社运动，是有我国历史来源的。”又以《张鲁传》为例写道：“这里所说的群众性医疗运动，有点象我们人民公社免费医疗的味道，不过那时是神道的，也好，那时只好用神道。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

可以看出，毛泽东真诚地迫切地希望新中国广大农民群众较快地摆脱贫困，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但是在1958年的历史年代还找不到一条使农民脱贫致富的有效途径。《张鲁传》所表述的只是历史上农业空想社会主义，反映了古人对于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但是他们找不到通向“大同”的路。依

靠这样的资料，过分强调历史的联系性，相对稳定性的一面，而对历史的运动性多少有所忽视，因此在这个问题上就难以准确地找到历史（传统）和现实的结合点。

毛泽东力求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农业生产力，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带着这样的愿望从中国历史中寻找借鉴资料，给我们很多启示。但是，现在回过头去看，只采取调整生产关系的方法以解决中国农业问题，这是难以收到预期效果的。中国农业必须先走合作化后走商品化的路，才有可能实现农业现代化。新中国建立以后，经历了艰苦的探索，付出了很高代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准确地为中国农业的发展指出了方向。在我国农业生产力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农业上也出现了这样和那样的问题。党中央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已开始解决农民负担过重和其他重要问题。1993年秋季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又进一步为解决农业问题而规定了具体政策和措施。

三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科学地贯彻“古为今用”原则，准确地找到历史和现实的结合点，必须对历史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就是说，这和世界观与方法论有密切的关系。在这方面毛泽东同样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1939年他给张闻天的一封长信，分析并肯定孔子反对“过”和“不及”的“中庸”思想，就是很好的例证。

《论语·先进篇》有一则材料说：子贡问孔子，子张和子夏，哪一位更有贤德一些？孔子回答：子张有些“过”，而子夏有些“不及”。孔子要求他的学生按照“中庸”的原则去认识事物，去办事，去进行道德修养。孔子从认识论角度猜测到事物由量变到质变的界限，因此，他主张人们说话、办事应有限度，过头或者达不到应当达到的界限，那就不能正确认识事物，也不可能具有高尚的品德。可见孔子把认识论和道德修养联系在一起，要人们力求做到这二者的统一。很明显，孔子的“中庸”说是古代辩证思维的一种理论概括。毛泽东将此发掘出来作了新解，他说：“中庸”说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

毛泽东分析传统文化，不是对于古籍进行文字注释，而是为了将其精粹加以改造和发展，运用于现实生活。因而他由孔子“中庸”说引申出在政治生活和革命实践中都要作两条战线的斗争，防止和克服“过”和“不及”的错误。他在给张闻天的信中这样写道：

“‘过犹不及’是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一切哲学，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作两条战线斗争，去肯定事物与概念的相对安定的质。”又说：

“‘过’即是‘左’的东西，‘不及’即是右的东西。依照现在的观点说来，过与不及指一定事物在时间与空间中运动，当其发展到一定状态时，应从量的关系上找出与确定其一定的质，这就是‘中’或‘中庸’，或‘时中’。说这个事物已经不是这种状态而进到别种状态了，这就是别一种质，就是‘过’，或‘左’倾了。说这个事物还停止在原来状态并无发展，这是老的事物，是概念停滞，是守旧顽固，是右倾，是‘不及’。”

这个例子说明，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法对传统文化（含“中庸”说）进

行解剖，发现了它的真正含义和现代价值。

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含有丰富的辩证思维资料。可以这样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最有代表性的精粹就是渗透于古代文史和各种文化构成（如器物、书法、绘画、建筑、服饰）等等之中的辩证思维方式。这些堪称之为中国古代智慧或东方智慧的宝库。毛泽东博览群书，分析、吸收、消化、改造古代辩证思维，提到唯物辩证法的高度，与其在革命实践中总结出的政治智慧结合在一起，从主要方面看，使他对于问题的分析和解决达到高超艺术水平，科学性和革命性达到完美的统一。他关于进与退、成与败、得与失、强与弱、真与假、虚与实、安与危、祸与福等等辩证范畴的分析和运用，成为最有价值最富于智慧和启迪的精神遗产。

建国以后，毛泽东阅读文史古籍，很注意从中提炼出辩证思维的精粹，同时他对古籍的分析和三言两语的评论充满唯物辩证法精神，这些很值得我们仔细加以研究。这里想举些例子来看：

毛泽东于1957年8月1日夜读范仲淹词二首（《苏幕遮》、《渔家傲》），谈到词有婉约、豪放两派。范仲淹的这两首词介于婉约与豪放两派之间，基本上仍属婉约派。范氏《苏幕遮》全文是：“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黯乡魂，追旅意，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毛泽东在不眠之夜读到这首词，情不自禁他说：“既苍凉又优美，使人不厌读。”千百读者读过这首词以后都会有和毛泽东相同的感受。但是毛泽东的感受并不停留于此。他又说，“读婉约派久了，厌倦了，要改读豪放派。豪放派读久了，又厌倦了，应当改读婉约派。”并由此引发出哲学的道理，他写道：“人的心情是复杂的，有所偏但仍是复杂的。所谓复杂，就是对立统一。人的心情，经常有对立的成分，不是单一的，是可以分析的。”这样说来，对立统一存在于一切之中。分析政治大事需要有对立统一观点，这是无疑的。同样，分析人的爱好和兴趣等等纯属个人范围的事，也不能离开对立统一法则。唯其一切都受对立统一法则的制约，所以一切才是可以分析的。在这里毛泽东短短数语，说明对立统一既是客观的又是主观的，又说明它既是认识论也是方法论。他读范仲淹词引发出的关于“人的心情”的议论（属于对诗词的欣赏和人的爱好兴趣）是合情合理的，这和教条主义、公式主义之类完全不同。可见要真正领会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离开唯物辩证法则将寸步难行。

毛泽东读唐诗，很喜欢李白的《将进酒》。这首诗从一开始就以其豪放的气魄吸引了读者。请看：“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而在诗的后半李白倾诉了诗人的悲凉和寂寞心情，借酒浇愁，对他那个时代的抗议之音将留传千古：“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斤恣欢谑。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毛泽东读后，批语：“好诗”。李白的这首诗含蕴了世间的一切都在流逝以及失与得不断转化的辩证思维，给人以动态的艺术美感。毛泽东称它为好诗，很可能也包含有这样的因素吧！

毛泽东读清代项家达所编《初唐四杰集》，关于王勃（公元650—676年）等人独创的新骈、治骈，给予很高评价。同时也引发关于王勃生世的感叹，由此毛泽东写了很长的批语，他说，王勃“是七世纪的人物，千余年来，

多数文人都是拥护初唐四杰的，反对的只是少数。”毛泽东的兴趣并不在于探讨文学史，也不在于进行文体的比较，他关注的是关于辩证法的一个大问题，因此他接着写道：“以一个二十八岁的人，写了十六卷诗文作品（引者按：指王勃作品），与王弼的哲学（主观唯心主义），贾谊的历史学和政治学，可以媲美。都是少年英发，贾谊死时三十三，王弼死时二十四。还有李贺死时二十七，夏完淳死时十七。都是英俊天才，惜乎死得太早了。”毛泽东谈这些曾经在历史上作过贡献的人的辞世年龄，是为了提出一个哲学问题：“青年人比老年人强，贫人、贱人、被人们看不起的人、地位低的人，大部分发明创造，占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他们干的。百分之三十的中老年而有干劲的，也有发明创造，这种三七开的比例，为什么如此，值得大家深深地想一想。”毛泽东接着回答说：“结论就是因为他们贫贱低微，生力旺盛，迷信较少，顾虑少，天不怕，地不怕，敢想敢说敢干。”很明显，毛泽东是想通过历史来说明现实，他倡议中国共产党应当支持年轻人的发明创造，他在批语中着重写道：“如果党再对他们加以鼓励，不怕失败，不泼冷水，承认世界主要是他们的，那就会有很多的发明创造。”（11）毛泽东在这里讲的是辩证法和思想解放的道理。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新的胜过旧的，后浪推前浪，历史和文化史的总趋势是前进的、发展的。而历史上的许多发明创造都是思想解放、有勇气打破陈规陋习、具有不怕失败的人们所做的。毛泽东强调这些观点是必要的。但是历史的前进是很复杂的，不是直线的，而是螺旋形的上升形式，其中有曲折，甚至有暂时的倒退。在历史上做出伟大贡献的人们固然充满生气，但是，他们的创造发明又必须与客观实际的法则相符合。因此完整的提法还是我们党在经历了胜利和挫折以后，于1978年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相结合，则更加精确和全面。

毛泽东读《聊斋志异》，对于《小谢》一篇特别有兴味，笔锋满含感情地写下了这样的批语：“一篇好文章，反映了个性解放的强烈要求，人与人的关系应当是民主的，平等的。”《小谢》一篇所写两个妙龄女子由鬼变成人，变成爱人的人，变成具有同情心的人——这实际讲了辩证法关于矛盾转化的道理。从这一点看，就是毛泽东所说反映了个性解放的要求。也就是说，个性解放不是凭空出现的，需要有矛盾转化的过程，既要有客观条件，也要有主观努力。从《小谢》一篇中还可以看出，此篇的主人翁年轻后生，即陶生与二女的关系不是商品的买卖关系，不是人身依附关系，而是心心相印、相互了解、相互帮助、忠诚相待的民主和平等的关系。毛泽东的批语反映出他希望在新中国建立并巩固这样同志式的平等和民主的关系。

从历史学和文化学的角度看，毛泽东阅读文史古籍的批语含有丰富的内容，浸透着朝气蓬勃的辩证精神。这些批语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毛泽东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这是对中国智慧或东方智慧的提炼、发展和结晶，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加以发扬光大。从某种意义上说，毛泽东思想也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他的思想根植于中国的现实土壤，也根植于中国深厚的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有没有这样的历史传统，是大不一样的。有些西方评论家和研究家对于毛泽东非常崇敬，但是他们不讳言对于他的论著和谈话，他们不能完全理解，因为他们比较习惯于肯定与否定的形式逻辑的分析法，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丰富的辩证思维方式了解不深，或者缺少了解，因而也就限制了他们对毛泽东论著和谈话理解的深度。

事物的辩证法法则不可抗拒。对于伟大人物来说，如果他在某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或在某些问题上偏离了他所强调的实事求是和辩证地观察问题的方法，那么他在一定的时候也不可能全面地分析问题，甚至要犯“过”和“不及”的错误。毛泽东晚年在关于历史和现实结合点的问题上也出现过某些失误。

但是，从总体上看，毛泽东在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革命实践中，他善于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善于吸收消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推陈出新，古为今用；善于把深刻的道理用中国人喜闻乐见的形式加以表述；善于找到历史和现实的结合点，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不愧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发展者。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我们的精神财富。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

注释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22—623页，第625页。

（11）《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47—148页，第235页，第237页，第237页，第27—28页，第10—12页。

见《新唐书》卷一百二十四。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747页。

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44—149页。

论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发展

董学文

问题的提出

毛泽东文艺思想作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半个多世纪的中国革命过程中，特别是在现代中国文艺运动的进程中，起着十分突出的作用。几十年来，人们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研究付出了巨大努力，取得了丰硕成果，这是不能忽视的。但是，相比较而言，毛泽东究竟在哪些方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毛泽东文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史上的地位怎样，这些却是研究和探讨较少的课题。

邓小平在《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中曾指出：“不说毛泽东思想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说它是马克思主义的新阶段，这些都对。但是应该承认，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我们党在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过程中，的确有很多发展。这是客观的存在，历史的事实。”毛泽东在这方面的贡献尤其显著。1980年8月，邓小平在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时说：“他（指毛泽东——引者注）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各个方面，包括哲学、政治、军事、文艺和其他领域，都有创造性的见解。”这一评价无疑是公正的。

的确，作为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结晶的毛泽东文艺思想，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文艺实践经验结合起来，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宝库，毛泽东也成为了建设有中国风格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杰出代表。在这个结合的过程，毛泽东对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是极其自觉、极其主动、极其认真的。

早在40年代，毛泽东于延安整风运动中就批评了一些同志对待马列主义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态度。50年代，他又指出：对于经典著作要尊重，但不要迷信，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创造出来的，不能抄书照搬。60年代，他在谈到马克思主义问题时，再次指出：“要突破，要创造，不要只解释，……不能受束缚，列宁就不受马克思主义的束缚。要有新的论点，新的解释，新的创造，不然不行。”

毛泽东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力求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结合的过程中，走自己的路，发展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其意识十分强烈。

在文艺思想领域，毛泽东很早就接触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文艺观，这从“五四”过后、中央苏区以及延安时期的许多文献资料中都可得到证明。但人们发现，他不墨守成规，不是从书本里或教科书上寻找文艺问题的答案，而是从实际出发，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得出许多“新的论点，新的解释，新的创造”，这确是极为可贵的。

鉴于以往的研究从这个角度切入得不多，本文试图在这方面做些努力。

外国学者眼中的毛泽东文艺思想

为了说明问题，不妨先从外国学者的眼光谈起。

毋庸讳言，毛泽东的文艺主张及其见解在外国人那里评价是很不一致的。如果排除那些恶意的、诽谤的、攻讦性的看法，看一看大多数较为公正的学者的意见，那么，人们不难发见，认为毛泽东实现了文艺理论的中国化是一种普遍性的见解。

1986年美国格林伍德出版社印行了田纳西大学学者罗伯特·戈尔曼主编的《马克思主义传记辞典》，作为20世纪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被显要地列入其中。辞典编撰者认为，毛泽东最伟大的业绩是他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把马克思主义原理运用于中国革命，使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编撰者没有专门论述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问题，但其命题本身无疑是包含这一层意思在内的。

20世纪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期、发展期和经受考验期。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实质上是民族化，即它的普遍原理与本民族、本国度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的问题。固定的模式是不存在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在变化的条件下，根据现有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由此观之，毛泽东文艺思想所以具有世界性的意义，就在于它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而且又是典型中国的，并且二者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正是由于毛泽东从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诸种问题放在中国特殊环境中加以展开，并结合中国特点加以具体化，因而其文艺思想的内涵和价值也就获得了世界意义与中国特色的辩证统一。

美国学者梅·所罗门曾这样写道：“毛泽东在他的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中，强调大众化和现实主义的重要性。和这一过程相关联的，就是要求运用艺术中的民族性和人民性因素，通过群众的朴实的表达方式和他们自己喜闻乐见的形象，来打开联系群众的渠道。”英国学者戴维·克雷格在一篇文章中引述《讲话》中关于文艺家必须无条件全心全意地深入生活的论述之后说：“西方读者往往认为这仅仅适用于处在动乱状态的落后国家。他们应该思考这一事实：最优秀的小说家——托尔斯泰们、康拉德们、劳伦斯们——所过的生活使他们实际接触到他们社会中各种身份的人。”

德国著名女作家安娜·西格斯曾谈道：“谁要是慢慢地、彻底地读一遍这个《讲话》，一定会发现以前所不知道的、但希望知道的许多问题。谁要是把它读了两三遍，就会得到所有问题的正确的解答。”

此类材料还很多，别的方面暂且不论，仅从这些材料中便可看到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外国学者承认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在相当大的范畴内是具有普遍意义的。

著名“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家本雅明曾经说过：“革命的艺术家的家不应当毫无批判地接受艺术生产现成的力量，而应当加以发展，使其革命化；这样，他就在艺术家与群众之间创建了新的社会关系。”这个颇有震撼力的命题，毛泽东早在40年代初就圆满地解决了。

英国学者戴维·莱恩在他的《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理论》一书中曾说：“毛泽东也描述了艺术作品生产过程的一种模式，用普通的词语论及了它的原料和创作手段。”这位学者把毛泽东的理论作为艺术作品生产过程较为完整的“一种模式”——或曰理论体系——看待，显然是从整体上肯定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价值。他还讲过这样的话：“延安《讲话》也被证明具有一种生产力，一种不是提供现成的思想，而是激发读者思想的能力。”^{（11）}即是说，

以《讲话》为代表的毛泽东文艺思想，不仅是一种独特的理论系统，而且具有艺术世界观和艺术方法论的功能。

1980年，美国密西根大学出版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新译本。译者在为该书撰写的长达43页的“导言”中讲道：毛泽东作为“中国第一个把读者对象问题提到文学创作重要地位的人”以及在其他许多方面的文学论述，是高于他的西方批评者，也高于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有些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怀有很深的偏见，他们似乎认为只有一种艺术是值得讨论的，这就是有教养阶层的文化（或更狭窄些，只有西方有教养阶层的文化），也就是他们以之自居的文化。而小人物的、或无教养阶层的文化，在他们看来则是不足道的，毫无艺术趣味的。”而“毛泽东（还有鲁迅）虽然本人就是自己国家有教养的古典文化传统的自觉继承者，却仍然重视并能够鉴赏中国文学传统的多种潮流，并注意它们的艺术上的长处。这一点，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所没有见到的。而且，有意思的是许多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并不曾把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学批评包括在他们的研究范围之内。”^{（12）}这篇“导言”的撰写者未能全面客观地评价毛泽东及其文艺思想，总让人不免有隔靴搔痒之感，但有一点是可取的，即他——还有其他公正的国外学者也如此——那双属于不同文化的眼睛，往往能在人们熟视无睹的地方看出新意来。“他山有砺石，良璧愈晶莹”。人们从外国学者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评价中，是可以得到某些启示的。

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历史地位

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估价，最科学的办法还是把它放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系统中去考察，因为这里的可比性更多一些。荷兰莱顿大学教授、国际知名学者福克马在一部关于中国文学的著作中曾说：“毛的文学导师是列宁”^{（13）}。倘就1942年前后的状况而言，这个判断有一定的真实性。但是，若就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全貌来看，这个判断显然是有局限性的。

对于毛泽东文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史上的地位，笔者曾作过这样的比喻：如果把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发展比作一条奔腾不息的长河，那么毛泽东文艺思想无疑是这条河床中水面最为宽阔、流量最为宏大的一段^{（14）}。笔者的这一结论是从研究了一个半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发展的历史后得出来的，是在比较毛泽东与其他经典作家的过程中确定下来的。

马克思恩格斯在人类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摆正了文艺在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领域的位置；第一次科学地揭示了艺术的本质及其与物质生产、精神生产的关系；第一次从无产阶级立场总结了艺术掌握世界方式的基本规律，从而，为科学文艺学说的诞生奠定了稳实的基础。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新文艺观的19世纪中后期，欧洲乃至世界还没有形成大规模的独立的劳动群众的文艺运动，还没有出现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文艺新军。宪章派诗歌、巴黎公社诗作，以及象格奥尔格·维尔特这样“德国无产阶级第一个和最重要的诗人”^{（15）}的作品，都是当时零星的产物。因此，总结新时代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文艺运动经验的任务，历史地落到了后来马克思主义者的身上。列宁一生十分关心无产阶级和苏维埃的文艺事业，对无产阶级政党在思想文化战线上的工作做了许多宝贵的指示，并且担负起了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俄苏文艺运动结合起来的使命。他提出了“文学的党性原则”，提出了文学“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的思想，提出了“两种民族文化”学

说，提出了批判继承优秀文化遗产的睿见，并把辩证法、唯物史观、能动反映论出色地运用到对列夫·托尔斯泰、赫尔岑、印·阿尔曼德、阿·阿威尔岑柯、高尔基、鲍狄埃等作家及其作品的评论上，使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明显呈现出列宁主义阶段的面貌。尤其是列宁有六年多领导俄苏社会主义文艺运动的经验，初步探索了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规律，这是一笔难得的思想财富，但列宁一生毕竟很少有时间能比较集中精力地研究文艺问题，他说过：“我感到遗憾的是，过去没有时间，将来也不会有时间来研究艺术。”^{（16）}他太忙了。许多重大的理论和实践课题占去了他的主要时光。

斯大林经历了较长时间来领导苏联的文艺运动，对社会主义时期的艺术创作方法，文艺的内容和形式，作品反映新的生活，支持文学新生力量，以及开展文艺领域的思想斗争和理论探讨，都有许多好的论述。斯大林在领导文艺的实践中是有过失的。但他终其一生坚持和捍卫了无产阶级的文艺路线，对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发展是有功绩的。

相比较而言，毛泽东一生对文艺问题关注的持久和深入，涉及面的广泛和博大，著述和言论的数量之多，内容更具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和社会主义时期文艺运动经验总结的特点，并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民族的具体文艺实践结合起来，这在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发展史上，都是十分突出的。福克马曾指出毛泽东在战争年代那样紧张复杂的工作条件下来抓文艺理论，说明他十分重视文艺。并说，“在西方，还很难找到一位政治家对文艺有如此高的期望。”^{（17）}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经历了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到实践的多次反复，付出了惊人的代价。而这个过程，无论是历时之长久，问题之繁复，斗争之剧烈，还是为此花费精力之巨大，在国际共产主义文艺运动史上，都是仅见的。毛泽东晚年由于“左”的指导思想的膨胀在领导文艺运动中犯过严重的错误，发表过一些实践证明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言论和意见。但是，作为理论体系而存在的毛泽东文艺思想，却是经得起历史检验、具有科学形态的永恒价值的。毛泽东文艺思想，是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文艺运动和社会主义文艺运动规律的理性概括。正是这一点，决定了它在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发展史上的地位。

集中解决了文艺家与群众的结合问题

毛泽东在文艺理论上的功绩，首先表现在，当人民有了自己的政权之后，在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有条件进行大规模文化艺术活动的情况下，除鲜明地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为主体的人民大众服务的根本方向外，还鲜明地提出了作家艺术家“必须和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合”，“必须彻底解决个人与群众的关系”^{（18）}这个原则问题。就是说，毛泽东不仅进一步解决了文艺与群众这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心问题，使广大文艺工作者更充分认识到文艺与群众关系的极端重要性，而且，还创造性的找到了解决这一关系的具体途径——作家艺术家一定要和“新的时代”、“新的群众”结合起来。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突出贡献。

在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发展史上，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从来是重视文艺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的。马克思、恩格斯很早就希望无产阶级与革命的文艺运动结合到一块，并期望着“一个新的但丁来宣告这个无产阶级新纪元的诞

生”（19）。列宁提出“艺术属于人民”，艺术“必须深深地扎根于广大劳动群众中间”（20）的思想。斯大林对作家、诗人提出了要“把自己提高到能够担负起先进无产阶级的歌手的任务”（21）的标准。应该说，文艺为什么人这个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值得一提的是，意大利早期共产党人葛兰西，曾提出社会主义文学应当是“民族——人民”的文学，为了建立这种文学必须造就一大批新型作家，这些作家必须“跟人民的情感融为一体”，成为“人民的组成部分”和“它的代言人”，而新的文学又需要把自己的根子扎到“实实在在的人民文化的沃土之中”（22）。

毛泽东没有停止他的探索。在前人的基础上，他集中系统解决的是“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从而使这一问题达到了新的理论层次。这是一个关节点。正是围绕这个问题，毛泽东的诸多论述是有开拓性的，是以往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家所没有来得及仔细解决的。葛兰西虽然提出了必须“跟人民的情感融为一体”的命题。要求文学要扎根于“人民文化的沃土之中”，但他限于条件，未能指出实现这一方向的实际办法和有效途径。毛泽东恰恰从这个理论生长点入手，完成了自己全面独特的论证。只要我们稍加考察就不难发现，毛泽东论述文艺与生活、文艺与革命、内容与形式、普及与提高、作家世界与立场感情的转变、学习马列主义与学习社会，以及“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重视民间文艺时，几乎所有层面都是环绕着这个题目展开的。这个题目象一把扇轴，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整体面貌就是展开来的扇面。

笔者认为，从主张文艺与群众的结合发展到作家艺术家与群众的结合，集中力量解决作家艺术家与描写对象和服务对象之间的距离问题，这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深邃独到之处。引导并要求“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23），这正是从整体上把握和理解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一把钥匙。

马克思曾预言：“一个哲学的民族只有在社会主义里面才能找到适合于它的实践，因而也只有在无产阶级身上才能找到解放自己的积极因素。”（24）恩格斯从“美学和历史的观点”曾责备过歌德，“嫌他由于对当代一切伟大的历史浪潮所产生的庸人的恐惧心理而牺牲了自己有时从心底出现的较正确的美感”（25）。列宁劝说过高尔基摆脱神经失常到病态的旧知识分子的包围，“到农村或外地的工厂（或前线），去观察人们怎样以新的方式建设生活”，认为“在那里，单靠普通的观察就很容易分辨出旧事物的腐朽和新事物的萌芽”（26），可是，到底如何具体地可操作性地去缩小创作主体与描写对象、服务对象——广大工农群众之间在思想、心理、感情和审美趣味上的距离，他们的论述大多就语焉不详了。

很清楚，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按着中国国情，立足于中国的经验及其文艺运动的规律，又参考外国的经验教训，自觉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观。

毛泽东一面肯定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承认他们大都是革命者，是每次革命的先觉者和先锋队，一面又指出他们在没有跟工农大众结合起来之前，身上常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教条主义、文风不正、空想、空谈、轻视工农、好摆架子等特点。在《五四运动》、《青年运动的方向》等文章中，反复重申：“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他们的最后分界仅仅在这一点，而不在于口讲什么三民主义或马克思主义。”（27）在他看来，文学家艺术家只有下决

心，经过长期的甚至痛苦的磨练，把自己变成工农当中的一分子，并从感情上也移到工农方面来，这样，经过普及与提高的不断循环，文艺的“大众化”——这个文艺界争论多年的老课题——才能真正解决，文艺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志向才能切实得到实现。反之，如果心灵深处还有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独立王国，还把自己的作品当作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创作，那么，什么事情都将做不好，都会是格格不入的，文艺为人民服务也就变成一句空话。

显然，在文艺与群众、文艺家与群众的问题上，毛泽东既坚持了唯物论，又坚持了辩证法。毛泽东的这一思想精髓，在今天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同样是适用的。

重视世界观对创作的指导意义

作家世界观与创作的关系，这是中外古今都有争议的一道难题。这一问题的破解，包涵相当的复杂性，任何简单和片面地处理都是要不得的。

毛泽东很重视这一问题，他从战略家的高度，主张革命的作家艺术家必须悉心“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社会”，强调要把这二者自觉有机地统一起来，做到像鲁迅那样，既能“横眉冷对千夫指”，又能“俯首甘为孺子牛”，从而担负起新时代的历史重任，创造出各种人物形象，帮助群众推动历史前进。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同样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发展。

当科学共产主义的世界观还处在创立和传播的初期，一些倾向社会主义的民主主义作家，只是同情和关注马克思主义的命运和工人阶级的运动，他们还习惯于从外边或从上头观察和描写无产者的生活和遭遇、欢乐和痛苦。尽管有些进步作家企图以艺术家的勇气和现实主义的手法反映底层人民的生活，但他们缺少正确世界观和社会学说的指导，至多只能做到“简单朴素，不加修饰的”“如实地叙述”⁽²⁸⁾。因此，当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只能号召进步的作家艺术家向莎士比亚和巴尔扎克学习，只能要求文学作品“通过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来“动摇资本主义世界的乐观主义”⁽²⁹⁾，这是可以理解的。

列宁对托尔斯泰的研究，涉及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与世界观的关系，指出作家作品、观点、学说、学派中的矛盾与二重性因素，是由作家世界观——即托尔斯泰主义——的内在矛盾造成的。列宁给高尔基写信，希望他摆脱“造神说”的影响，走出彼得堡，到外地去感受“全心全意投入最激烈的斗争的人的情绪”⁽³⁰⁾，也是旨在要求作家在现实生活中学得活的马克思主义。列宁在《青年团的任务》讲演以及1920年10月为全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起草的决议草案中，曾明确提出“应该学习共产主义”⁽³¹⁾，指出过“只有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才正确地反映了无产阶级的利益、观点和文化”⁽³²⁾。但是，列宁没有能进一步详细阐述这一世界观与文艺创作的关系，就过早地去世了。

斯大林是较早论及无产阶级世界观与文艺创作文艺关系的人。在斯大林领导下，以高尔基为首的苏联文艺界最先提出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精神同创作原则挂起钩来，并回答了“怎么看待世界观在艺术中的作用”问题。1933年，斯大林在答复一位诗人的问话时讲道：“严肃他说，你们不应该用抽象的观点装满艺术家的脑袋。他应该知道

马克思和列宁的理论，但也应该知道生活。如果他真实地反映我们的生活，那末他在生活中就不可能不觉察到、不可能不反映使生活走向社会主义的东西。这就是社会主义，这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33）

可见，经典作家是一贯重视革命文艺工作者掌握先进世界观和艺术方法论的。不过，他们的议论带有简明性，象毛泽东那样，几十年内，系统地说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同作家艺术家和艺术创作的关系，全面地解释马克思主义在文艺创作中的作用，诚挚地号召作家艺术家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在同假恶丑的斗争中发展真善美，张扬马克思主义精神，这在革命文艺思想史上是不多见的。毛泽东是把马列主义作为“革命作家，尤其是党员作家”“必须有的知识”（34），作为他们“观察世界，观察社会，观察文学艺术”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作为克服种种有害的创作情绪，彻底解决思想感情问题的有效手段加以强调的。

1938年4月，毛泽东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成立大会的讲演中就谈到：“亭子间的人弄出来的东西有时不大好吃，山顶上的人弄出来的东西有时不大好看。”（35）虽然这里说的是内容和形式的问题，但也很明显地透视着作家世界观对创作方法的制约。

1938年4月28日，毛泽东到“鲁艺”做题为《怎样做艺术家》的演讲，谈到：虽然政治上、艺术上要实行统一的战线，“然而艺术上的政治独立性仍是必要的，艺术上的政治立场是不能放弃的；我们这个艺术学院便是要政治立场的，我们在政治上是马克思主义者。……每一派都有他的阶级立场，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劳苦大众方面的，但在统一战线原则之下，我们并不用马克思主义来排斥别人，那是关门主义，不是统一战线。但在统一战线之下我们不能丧失自己的政治立场——这是鲁迅先生的方向，你们鲁迅艺术学院要继续鲁迅先生的方向。”（36）毛泽东谈的是艺术上的统一战线问题，但不难看出，要求革命作家艺术家“艺术上是马克思主义者”，其中就包括着在政治上和艺术上要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绝不能因为创作方法上的多元性或多样性而忽视自身科学世界观的立场。

1942年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毛泽东把延安的“鲁艺”称为“小鲁艺”，认为工农兵群众的生活和斗争才是“大鲁艺”，广大的劳动人民才是“大鲁艺的老师”（37），完全也是从世界观与文艺创作的关系出发加以论述的。

建国以后，毛泽东对作家艺术家世界观问题的关注更是有增无减。1957年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召集新闻出版界部分代表开座谈会，会上讲了这样一段意见：“听说有些文学家十分不喜欢马克思主义这个东西，说有了它，小说就不好写了。我看这也是‘条件反射’。什么东西都是旧的习惯了新的就钻不进去，因为旧的把新的压住了。说学了马克思主义，小说不好写，大概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跟他们的旧思想有抵触，所以写不出东西来。”（38）显然。毛泽东是不赞成有人把具有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同文艺创作之间看成了二律背反的关系的。他主张，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还是提高马克思主义的修养：“要提倡大家学它十年八年，马克思主义学得多了，就会把旧思想推了出去。”“当然，学是要自愿的。”（39）总之，毛泽东把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放到了十分重要的位置。

毛泽东还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作为自己提倡的文艺创作方法的灵魂实质和有机成分，高度重视对艺术创作原则的指导作用。抗战

时期，他就提出“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40）。在他看来，“一种艺术作品只是流水帐式地记述现状，而没有对将来的理想是不好的。在现状中看出缺点，同时看出将来的光明希望，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精神。”（41）到1958年，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郑重提出“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应采取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42），这就把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文艺创作方法之间的关系，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不能不说是毛泽东贡献给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宝库特有的东西。

揭示作家审美感情实现的新途径

毛泽东是重视文艺的审美本性的。他明确指出“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43）。“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我们应该进行文艺问题上的两条战线斗争。”（44）

笔者以为，毛泽东对审美问题更具特色、更有创见、更为深刻的意见则是对作家艺术家如何才能达到内容和形式、真实性和倾向性统一的论述。他是要求把为工农大众服务的思想，把想表达的革命意愿，“转化”为对新的时代、新的人物、新的生活的审美感情，而这种审美感情又要体现在有感染力的艺术形象之中，体现在完善的艺术形式之中，作为审美的最高境界的。毛泽东从多方面对审美“转化”的阐释，说明他抓住了文艺的特质，并且找到了作家实现新审美感受的可靠途径。

文艺是一种特殊的审美的社会意识形态形式。它要诉诸欣赏者直接的视听感觉，用各种形态的艺术形象去唤起欣赏主体的愉悦感情。文学家要使自己的作品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一个必要的前提就是必须熟悉自己服务对象的心理、爱好、情感和语言。不仅要观察了解他们，而且要真心实意地体验他们。“不熟，不懂、英雄无用武之地”（45）。毛泽东认为这个了解人熟悉人的工作“是第一位的工作”（46）。正是由于高度重视这一点，他才使新文艺的审美特性有了可以实现的理论依托。这是深谙艺术创作规律的见解。这种见解，对从根本上杜绝文艺创作上的公式化、概念化，杜绝将艺术形式变成某种内容的化装宣传，将文艺作品当成演绎政治观念形象手段的倾向，是颇有好处的。

这里有一个思想倾向“转化”为主体情感体验的取向问题。毛泽东不赞成有些文艺家不爱工农兵感情，不爱他们的姿态，不爱他们的萌芽状态的文艺，有时也爱，但那是为着猎奇，为着装饰自己的作品甚至是为着追求其中落后东西而爱的不良取向。他希望文艺沿着工农兵前进的方向去提高，这就实际上规定了文艺家审美好恶的取向标准和美学方向。

英国“新左派”批评家伊格尔顿曾经说过：“确实可以把现代文学理论的发展史粗略地划分为三个阶段：专门研究作者（浪漫主义和19世纪）；专注于文本（新批评派）；近年来明显地把注意力转向读者。这三者之间，读者一直是最受冷落的——这是令人奇怪的，因为没有他或她就不会有文学作品的文本。文学作品的文本不是放在书架上：它们是表明作品含义的过程，只是在阅读的实践才能实现。”（47）

我们无须在这里详尽历数20世纪文学理论发展演变和递嬗的过程，只要看一看毛泽东对读者问题、“接受者”问题的关注比后来的“接受美学”、“读者反应理论”提早了20年，就足见他的智慧和敏感了。从某种意义上，

可以说毛泽东是现代文学理论发展第三个阶段的真正发端者。只要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为一种体系结构解析开来，人们就很容易发见其中蕴含着大量后来才出现的接受理论和读者反应批评的思想因子。

毛泽东不仅重视审美根本规律的把握，而且重视艺术其他规律的探索。他曾提出艺术美和生活美的关系问题，文艺源和流的关系问题，文学党性和个性的关系问题，艺术的民族保守性和革新性和关系问题；他还提出过艺术的典型化原则，中西结合原则，新诗歌创作的形式原则；他探讨过艺术的形象思维问题，美的阶级性与共同美感问题，优秀“民主文学”的“人民性”⁽⁴⁸⁾问题；他

对古典诗同曲赋、古典小说、笔记小说、诗话词话、近现代文学，都有精湛的研究；他主张按照艺术科学进行艺术的自由竞争，开展充分说理的文艺批评，学术问题上要民主，对一时“难下断语”的问题，可以“暂时存疑”⁽⁴⁹⁾……总之，毛泽东的文艺美学思想极其丰富，有待于我们从更深广的角度去作新的解释，新的开掘。

邓小平曾经指出：“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列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者。”⁽⁵⁰⁾以此为标准，人们可以说，毛泽东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家是相当杰出的。

历史已进入新的时期。新的时代条件为毛泽东文艺理论的发展又提供许多新的机遇。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祝辞》，以及新时期以来他的一系列有关文艺问题的讲话，正是这种发展的生动体现。现在，我们面临着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大好时机。我们要以毛泽东为榜样，在文艺理论上有所发明，有所发现，有所突破，有所创新。这，就是我们对毛泽东最好的纪念。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

注释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64页，第304页。

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转引自《社会经济问题研究》第19期（总第67期），第14页。

1966年3月20日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

参见罗伯特·戈尔曼主编：《马克思主义传记辞典》，格林伍德出版社1986年英文版，第211—216页。

梅·所罗门：《马克思主义与艺术》，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年版，第239页。

戴维·克雷格：《（马克思主义文学论文选）导言》。

（12）（13）（17）转引自《坚持与发展——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当代》，北京出版社1992年版，第77页，第79页，第77页，第77页。

伊格尔顿：《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第67页。

（11）戴维·莱恩：《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理论》，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7—98页，第97页。

（14）参见拙著《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历史地位》，载《北京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6页。

（16）（20）（31）《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第 422 页，第 435 页，第 103 页。

(18) (23) (34) (43) (44) (45) (45) 《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3 卷，第 877 页，第 851 页，第 852 页，第 870 页，第 870 页，第 850 页，第 850 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249 页。

(21) 《斯大林全集》第 13 卷，第 25 页。

(22) 《葛兰西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7 页。

(2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第 484 页。

(2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第 257 页。

(26) (30) (32) 《列宁选集》第 4 卷，第 60—61 页。第 61 页，第 361 页。

(27) 《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2 卷，第 559—560 页。

(2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461 页。

(2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6 卷，第 385 页。

(33) 转引自《苏联文学》1981 年第 1 期《苏联三十年代“写真实”口号提出的前前后后》一文。

(35) (40) (48) (49) 《毛泽东论文艺》(增订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1 页，第 14 页，第 116 页，第 172 页。

(36) 转引自《文艺报》1992 年 12 月 26 日《毛泽东谈文说艺札记》一文。

(37) 1942 年 5 月 30 日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报告。

(38) (39)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87 页，第 187 页。

(41) 1938 年 4 月 28 日在延安“鲁艺”做《怎样做艺术家》的讲演。

(42) 1958 年 5 月 8 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

(47) 伊格尔顿：《文学原理引论》，文化艺术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91 页。

(50) 《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论述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24 页。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贡献

张国民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贡献是多方面的。

（一）彻底解决了革命文艺方向问题

革命文艺方向是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灵魂，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核心。在毛泽东之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已经提出文艺方向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认为文艺应该表现、歌颂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列宁明确地提出：无产阶级文学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的。这就初步解决了革命文艺方向问题。

不过，问题尚未彻底解决。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一些文艺论著、尤其是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已被译成中文发表，我国许多革命文艺工作者已知道文艺要为劳动人民服务的道理，但并没有在实际上解决这个根本问题，所以鲁迅说：“我们战线不能统一，就证明我们的目的不能一致，或者只为了小团体，或者还其实只为了个人”。

在解决革命文艺方向问题上，毛泽东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四方面。

一、他进一步对革命文艺的服务对象作了具体分析，明确提出：“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这个分析，已经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中间等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同资产阶级斗争，都是为了维护他们这种中间等级的生存，以免于灭亡，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这个论断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历史条件来说是正确的；但中国社会历史条件却很不相同。毛泽东一向主张实事求是，他根据中国的社会性质、阶级状况、革命性质、革命任务、文艺实际来分析和解决革命文艺方向问题，所以他不是把农民看成“保守的”，而是看成重要的革命动力，主张农民是革命文艺的第二服务对象。他还认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也是革命的动力，因而也是革命文艺的服务对象。他也发展了列宁的文艺思想。列宁在谈革命文艺服务对象时没有提到知识分子，也没有提到兵。毛泽东不但把“知识分子”包括在革命文艺服务对象之内，使服务对象得到了扩大，而且根据中国革命的主要方式武装斗争而强调“兵”是革命文艺的第三服务对象。他主张革命文艺为人民大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既照顾了全面，又突出了重点，而且确立了革命领导阶级在革命文艺服务对象中的首要地位。还应看到，毛泽东是把文艺为人民和文艺为革命统一起来的，他在谈文艺“为人民”时指出文艺要“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可见，为人民包括为人民的革命事业服务。

二、他解决了革命文艺方向中的关键问题——文艺工作者的立场、思想感情问题。他从许多文艺工作者的“情绪”、“作品”、“行动”、“意见”、“兴趣”、“注意力”、“感情”中，发现“他们的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

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这样，为什么人的问题他们就还是没有解决，或者没有明确地解决。”所以，要真正解决革命文艺方向问题，就必须和解决文艺工作者的立场世界观问题有机地结合起来。毛泽东深刻地指出：要使我们的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文艺工作者“就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而不能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必须和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合”，“必须彻底解决个人与群众的关系”，使自己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这样才能正确表现工农兵，正确描写知识分子，歌颂人民的功德。他不但指出了文艺工作者转变立场和思想感情的必要性重要性，而且指明了这种转变的现实途径：“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把立足点逐渐“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如此明确、彻底地解决革命文艺方向中的关键问题，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史上始于毛泽东。

三、他发展了列宁关于艺术普及和提高的思想，进一步解决了如何通过普及和提高使文艺为人民大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问题。针对文艺界轻视普及、关门提高的倾向，他分析道：这表明还“没有明确地解决为什么人的问题”，“并且，因为没有弄清楚为什么人，他们所说的普及和提高都没有正确的标准，当然更找不到两者的正确关系”。他阐明了正确标准和正确关系，指出，我们的文艺应当用工农兵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去普及，沿着无产阶级前进和方向去提高；应当在普及基础上提高，在提高指导下普及；应当有直接和间接为群众所需要的两种提高；“无论高级的或初级的，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为工农兵的。”他还解决了教育工农兵和学习工农兵的关系、文艺专门家和文艺普及工作者的关系、“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关系等问题。这些也都是他对革命文艺实践正反两方面经验的科学总结。

四、他明确地揭示了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根本特点。这就是文艺必须按照自己的特殊规律创造出艺术美，向人民提供艺术美。他指出，既有生活美，也有艺术美，人民不满足于生活美而要求有艺术美，因此，文艺应向人民提供艺术美，以满足人民的要求，这也就是为人民服务。可见，毛泽东是把文艺能否提供艺术美和能否为人民服务视为一体的，他所提出的革命文艺方向本身就包含着文艺要以艺术美服务于人民的美学涵义。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史上，是毛泽东第一次明确地揭示了文艺服务的这种根本特点。

这都说明，毛泽东在解决革命文艺方向问题上确实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作出了重大贡献。正是他的这一贡献，为新时期党中央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社会主义方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制定了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一整套方针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论述过艺术发展问题，有不少精辟的见解；但由于他们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所以都没有把如何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作为一个现实问题加以论述。列宁在十月革命前为了说明无产阶级的党的文学部分不能和其他部分刻板等同起来，提出了两个“广阔天地”的论断。在十月革命后，他一方面指出艺术家“都能够有权利按照他的理想来自由创作”，同时也指出“我们必须有意识地努力去领导这一发展”。为了使社会主义文化艺术得

到健康发展，他坚决和搞虚无主义的“无产阶级文化派”作斗争，强调要批判地继承文化艺术遗产。可见，列宁有一些关于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构想，但尚未制定成一套明确的方针。斯大林提出“竞赛”的主张，认为“问题不在于禁止，而在于通过竞赛，创作真正的、有意思的、富有艺术性的苏维埃性质的剧本，来代替旧的和新的非无产阶级的低级作品，逐步地把它们从舞台上排挤下去”。可以说，“竞赛”是斯大林制定的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方针。

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也提出过“应该容许各种各样艺术品的自由竞争”的主张。在进入社会主义时期后，他制定了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一整套方针，这就是：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1951年和1952年，毛泽东两次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题词，作为我国戏曲事业发展繁荣的方针。这是他对自己在40年代两次提出的“推陈出新”的发展。对于我国戏曲事业来说，这是一个不可割裂的完整的方针。要发展戏曲事业，无疑需要“推陈出新”，它的实质是正确地对待和处理戏曲的改革与创造问题；但还必须同时提出“百花齐放”，其原因正如周恩来所解释的：“我们要发展自己的戏曲艺术，首先得承认‘百花齐放’，也就是首先要发掘我们民间的戏曲艺术，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够‘推陈出新’。如果不先‘百花齐放’，那你怎么去加以改革，怎么去加以发展呢？没有基础怎么改革，怎么出新呢？”因此，“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是发展戏曲事业唯一正确的方针。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毛泽东于1956年4月28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的。同年5月2日，次年1月18日和27日，他都阐述了“双百”方针。1957年2月27日，他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实行这个方针，“并不会削弱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领导地位，相反地正是会加强它的这种地位。”同年3月12日，他又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我们从他的一系列阐述中可以认识到，“双百”方针是按照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在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各种矛盾的基础上，在国家需要迅速发展经济和艺术科学文化的迫切要求上，为了正确处理艺术科学文化领域中的矛盾，促进其发展、进步和繁荣，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文艺界和其他领域的指导地位而提出来的。这个方针闪烁着唯物辩证法的光辉，包含着对我国历史上学术文化发展的经验和世界科学文化发展的经验的总结，包含着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和我们党领导艺术科学文化的经验的总结，而且具有深刻的美学意义。这是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艺术科学文化发展规律与实际有机结合起来成果，是指导我国社会主义艺术科学文化发展繁荣的正确方针。

早在1915年秋，毛泽东在致萧子升的信中提出：观西洋史，当注意中西之比较，取于外而资于内。后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论联合政府》中，他一再提出批判地继承文化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艺术的主张。1956年4月25日，他把批判地学习世界上一切民族一切国家文学艺术中一切真正好的东西作为“我们的方针”的内容之一。同年8月24日他指出：“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不要全盘西化。应该学习外国的长处，来整理中国的，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

族风格的东西。”1964年9月27日，他正式提出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可见，这方针是他经过许多年深思熟虑、不断总结实践经验以后才提出来的。

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繁荣的一整套方针，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史上是个创举。当然，这些方针无疑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文艺思想。例如，我们从“双百”方针中就可看到它和马克思提出的“应该用自己的风格去写”，“给作家指定一种风格……是错误的”的一致性，也可看到它和列宁提出的两个“广阔天地”、斯大林提出的“竞赛”的一致性；但马克思、列宁的都不是作为文艺方针提出的，斯大林的虽作为文艺方针提出，却远不及毛泽东的全面、完整、深刻、理论内涵丰富。所以，毛泽东提出的这套正确方针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大贡献。它们具有巨大的理论价值。

（三）提出了文艺和生活的辩证关系的科学原理

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能动反映论，为正确认识文艺和生活的关系奠定了科学的哲学基础。他们还主张文艺应真实地反映生活，小说应“通过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来打破关于这些关系的流行的传统幻想”，应“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不过，他们都没有对文艺和生活的关系作过全面的论述。

列宁坚持马克思主义能动反映论，提出：外部世界“在人的思想中的反映，应当了解为不是‘僵死的’，……而是在运动的永恒过程中，在矛盾的产生和解决的永恒过程中。”他还指出，“如果我们看到的是一位真正伟大的艺术家，那末他就一定会在自己的作品中至少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质的方面”。至于文艺和生活的关系问题，他也没有作过全面论述。

毛泽东在哲学上坚持和发展了能动反映论，在文艺理论上把能动反映论和艺术规律有机结合起来，全面地论述了文艺和社会生活的一系列关系，其原理主要包括以下四方面涵义。

一、关于文艺的源泉。他指出：“人类的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反映的产物。”这个论断完全符合于自产生文艺以来直至当今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实际。他不但根据文艺的一般规律阐述文艺源泉，而且根据革命文艺的特殊规律进行阐述，指出：“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毛泽东的文艺源泉论的深刻之处，不仅在于科学地解决了人类历史上从未得到解决的文艺根源问题，而且在于它为文艺家必须深入群众生活提供了理论根据。

二、关于文艺家深入群众生活。毛泽东对文艺源泉的论述，主要为了帮助文艺家认识深入群众生活的必要性。所以他接着指出：“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

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行创作过程。”这是由正确解决文艺源泉问题必然提出的对文艺家的要求，这个要求给文艺家指明了康庄大道。

三、关于文艺反映生活的能动性。毛泽东指出：“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文艺应该把日常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这既是能动反映论在文艺上的运用，又是对文艺客观规律的揭示，对古今中外许多优秀作品创作经验的理论概括。

毛泽东一向主张能动反映论，在此之前就已提出：“反映不是被动的摄取对象，而是一个能动的过程”，是“客观实际情况的能动的反映”。他强调人的头脑在反映过程中的改造功能，揭示了人脑对感觉材料“去”、“取”、“存”的自觉选择性，“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生发性、迁延性和指向性，造成“系统”的建构性、整合性和创造性，“从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的飞跃性。他还指出：“认识是能动的因素，起着改造世界的作用”。十分清楚，毛泽东所坚持的能动反映论不但根本区别于唯心主义认识论，而且和旧唯物主义机械反映论泾渭分明。正因为如此，所以他把能动反映论运用于文艺，结合文艺的客观规律，就必然提出六个“更”，主张“典型化”。

典型化是创造艺术典型的必由之路。只有创造出艺术典型、才能“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更高”即“更典型”，正如别林斯基所说：“艺术采用现实的材料，把这材料提高到……典型的意义上”。“更典型”，必是“更强烈，更有集中性”，鲁迅在谈创造阿Q等典型的经验时说，他那么写，是为了“使作品的力量较能集中，发挥得更强烈。”“更典型”也必是“更理想”，黑格尔在《美学》中讲的“艺术理想”即艺术典型；别林斯基说得更直截了当：“理想或典型形象”。艺术典型是独特个性（个别性）中蕴含一定代表性的艺术生命，所以，“更典型”的艺术形象不仅个性鲜明、独特、突出，而且必然反映事物本质规律，“更带普遍性”，更具普遍社会意义。这说明，在那六个“更”中，核心是“更典型”；它们都是典型化成果艺术典型的诸方面特征。

毛泽东认为不但“可以而且应该”达到那六个“更”，这表明他提倡典型化，倡导典型创造。他指出，通过“典型化”而创造出来的比实际生活“更典型”的艺术典型，就是“人民……要求”的艺术的“美”。这种创造，正是文艺反映生活的能动性的最高表现。

四、关于文艺对社会生活的作用及其特点。毛泽东高度重视文艺对社会生活的作用，他认为这种作用是通过对人的精神的作用而实现的，并区分了不同性质的文艺对人的精神的不同作用，指出政治上根本反动的作品起的是“毒害人民”的作用，有些坏作品起了“鼓动群众离心离德”、“拉着人们倒退”的作用，而有些好作品则起了“鼓励群众同心同德”、“促成进步”的作用，所以他要求革命文艺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精神武器。

作为杰出诗人的毛泽东、谙熟文艺的特性，懂得文艺怎样才能对人的精神起作用，才能帮助人民群众。他指出：“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他还对这种“创造”和“帮助”的关系作了阐释：通过典型化创造出艺术美的文艺作品，“能使

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这是对典型化的艺术美的功能和作用的充分肯定。“能使人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表明典型化的艺术美富有魅力，能陶情冶性，深深感染欣赏者的心，激励欣赏者的精神，这正是典型化的艺术美所发挥的美感教育作用的特点。毛泽东早年在致萧子升信中就谈过“美感教育”。在《讲话》中，他强调革命文艺应具有这种特点，认为只有这样的文艺才能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如果没有这样的文艺，那末这个任务就不能完成，或者不能有力地迅速地完成”。

毛泽东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文艺和社会生活的辩证关系的科学原理，从而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宝库增添了这个重要的新内容，这无疑是一大贡献。

（四）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创作理论

在毛泽东之前，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已对创作理论作出过贡献。例如，马克思提出作家在创造人物时不应把“作家本人的意图（这种意图决定作家使这些人这样行动，而不是那样行动）充作他们自己思考的结果，充作他们行动的自觉动机”的见解；恩格斯提出现实主义理论：“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提出戏剧创作应当达到“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的融合”；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悲剧艺术理论、典型理论；列宁提出“在小说里全部的关键在于个别的环节，在于分析这些典型的性格和心理”的见解；斯大林主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等等。

毛泽东也对创作问题提出了种种理论见解，除上节已谈者外，还有许多。他的艺术理论视野非常广，在考察了世界各国的艺术创造及其规律后提出，各个国家的艺术，也像其他事物那样，既“有共性，也有个性”，“艺术的基本原理有其共同性，但表现形式要多样化，要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以音乐而论，“音乐的基本原理各国是一样的，但运用起来不同，表现形式应该是各种各样的。”“音乐可以采取外国的合理原则，也可以用外国乐器，但是总要有民族特色，要有自己的特殊风格，独树一帜。”他非常重视艺术创造的规律，认为各国艺术有共同的规律，也有自己的规律，“说中国民族的东西没有规律，这是否定中国的东西，是不对的”，“中国的东西有它自己的规律”，“中国的语言、音乐、绘画，都有自己的规律”。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史上，像毛泽东这样地论述艺术创造规律、艺术基本原理、艺术民族风格，还是第一次。虽然斯大林早就提出文化的民族形式，但毛泽东在论文艺“民族化”时认为“民族形式可以掺杂一些外国东西”，则是新的见解。

毛泽东还从接受心理学角度论述艺术创造问题，指出：艺术“应该‘标新立异’，但是，应该是为群众所欢迎的标新立异。”“艺术上‘全盘西化’被接受的可能性很少，还是以中国艺术为基础，吸收一些外国的东西进行自己的创造为好”，“在中国艺术中硬搬西洋的东西，中国人就不欢迎”；当然“搬要搬一些，但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这和西医不同”，西医“并没有什么民族形式”，“艺术有形式问题，有民族形式问题”，“艺术离不了人民的习惯、感情以至语言，离不了民族的历史发展。艺术的民族保守性

比较强一些，甚至可以保持几千年。古代的艺术，后人还是喜欢它。”所以他提出，“要向外国学习，学来创作中国的东西”。

早在 30 年代，毛泽东就多次谈过“主体”、“客体”及其关系，例如他写道：“认识主体在社会的实践过程中起变化”；“认识的主体与客体的变化，在革命期中显得特别强烈，例如俄国无产阶级与中国农民”；“赫格尔（现译黑格尔——引者）把客体消解于主体中，把主客等同起来”。他还说：“学习和认识的对象，包括敌我两方面，这两方面都应该看成研究的对象，只有我们的头脑（思想）才是研究的主体。”等等。具体到文艺创作，也就有创作主体，创作客体及其关系问题。

毛泽东很重视创作主体在创作中的作用。他认为文艺创作是创作主体的“创造性劳动”，艺术美的创造是通过主体“头脑”来进行的，所以主体头脑是至关重要的，唯因如此，他希望创作主体要“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要“很虚心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要“清算”所受的“资产阶级的很深的影晌”，要“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要克服“种种非人民大众非无产阶级的创作情绪”，以正确的“态度”进行创作。他很清楚怎样才能使创作主体在创作思想和审美情感上发生这种变化，在此之前，他就在哲学笔记中写过：“在实践中实现主体和客体的辩证法的统一。改变外界，同时又改变自己。”所以他认为，创作主体要具有正确的创作思想创作情绪和审美情感，就必须投身到群众的生活斗争实践中去；而且只有这样，创作主体才能熟悉创作对象，获得深厚的生活积累，这对于文艺创作来说也是极端重要的。所以他又指出：“我们的文艺工作者需要做自己的文艺工作，但是这个了解人熟悉人的工作却是第一位的工作”。他认为，如果文艺家不深入群众生活斗争，不熟悉描写对象，“就只能做……空头文学家，或空头艺术家。”他很重视群众丰富生动的语言，认为“如果连群众的语言都有许多不懂，还讲什么文艺创造呢？”毛泽东毕竟是有许多创作经验的诗人，他懂得主体有无高度文化修养和艺术表现能力对于能否进行成功的艺术创造关系极大，所以他多次强调文艺工作者要批判地吸收文化艺术遗产和外国文化艺术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这些，都是他对创作主体的基本要求与希望。

关于创作客体，即艺术表现对象，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提出文艺应该描写工人阶级的斗争，歌颂革命的无产者。毛泽东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文艺思想，他根据中国革命的实际，主张文艺“表现工农兵”，歌颂“无产阶级、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歌颂“人类世界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歌颂革命人民的功德”，歌颂“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描写知识分子”，描写人民群众在斗争中“改造自己”的过程，暴露“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暴露敌人的“残暴和欺骗”与“他们必然要失败的趋势”。他希望革命作家能“告诉”广大读者“新的人物，新的世界”，也就是要创造出“新的人物”，描绘出“新的世界”。

关于创作原则创作方法，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倡导“现实主义”；斯大林倡导“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毛泽东主张“我们的文学应当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的结合”，这三者一脉相承，而又有所发展。毛泽东在 1958 年提出“两结合”的主张不是偶然的、即兴的。早在 1939 年 5 月 10 日，他和朱德、刘少奇等参加鲁迅艺术学院成立周年纪念活动时，就写了“抗日

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的题词，还在大会上指出：“我们的文艺创作要有抗日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他在社会主义时期提出“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的结合”，完全是合乎逻辑的发展。主张“两结合”的精神实质，是要求文艺把真实反映革命现实和深刻表现革命理想有机结合起来，以更好地发挥美感教育作用。这是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应当普遍遵循的一条原则。作为创作方法，革命浪漫主义不只是理想主义精神，而且还有常用的一些特殊的表现手法；就这方面而言，“两结合”并不是社会主义文艺必须运用的唯一的创作方法。

毛泽东还提出了一些其他见解，例如，“群众喜欢的形式，我们应该搞”；“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诗要用形象思维”；等等。这些，也都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创作理论。

（五）补充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理论

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史上，第一个提出文艺批评“标准”的是恩格斯，他先在评论歌德时说：“我们……只是从美学和历史的观点来责备他”，后来评论《济金根》时写道：“我是从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以非常高的、即最高的标准来衡量您的作品的”。

毛泽东则提出：“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他还阐明了“这两者的关系”。这究竟是不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理论的贡献？人们的看法颇为分歧。这里需弄清以下几个问题。

一、毛泽东提出的“政治标准”的涵义是什么？能否确立文艺批评的政治标准？毛泽东根据当时抗日战争的实际阐释道：“按照政治标准，一切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励群众同心同德的，反对倒退、促成进步的东西，便都是好的；而一切不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动群众离心离德的，反对进步、拉着人们倒退的东西，便都是坏的。”这“利于”、“不利于”是就其社会效果而言的。所以他又说：“检验一个作家的主观愿望即其动机是否正确，是否善良，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为（主要是作品）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1957年他提出六条政治标准时讲的仍是“有利”与否的问题。同年3月10日他还说：“文章的好坏，要看效果，自古以来都是看效果作结论的。”即然政治标准根本上着眼于作品的社会效果对政治有利与否，那么，不论作品有无反映政治生活，有无政治内容，有无表现政治观点政治倾向，都由于它们总会在社会中通过对人的精神的作用而对政治产生一定影响，因而也都可以用政治标准进行衡量。衡量的结果，可分为三大类：有益的；有害（不利）的；无害的。假如没有政治标准，又根据什么作这些区分呢？

否定政治标准，必然否定邓小平提出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因为它也是政治标准。邓小平在第四次文代会上指出：“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利还是有害，应当成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而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我们党的现阶段的政治路线”，“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可见，“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利还是有害”，就是对实现党的政治路线有利还是有害，对“当前最大的政治”有利还是有害，这样一个“最根本的是非标准”，无疑是政治标准。毛泽东在阐释政治标准时也谈到用它来判断根本的“是非”问题。只要肯定“最根本的是非标准”，就必然要肯定毛泽东提出的“政治标准”。

当然，这两者虽都是政治标准，但由于是在不同历史时期提出的，所以两者的历史内涵必有区别；而这种历史内涵变化的必然性，毛泽东在提出“政治标准”时就已指明了。

由于政治标准只管根本的大是大非，不管一般的是非，所以它既有高度原则性，又有最大限度的宽容性，只要不是那种“不利”或“有害”，都是容许的，因而在政治标准下不仅有许多有益的作品，而且可以有大量无害的作品存在。毛泽东既确立了政治标准，又主张“多样化”，这就可以有效地引导文艺在正确的政治方向下多样化地发展，实现政治方向一致性和艺术发展多样化的统一。

二、毛泽东在什么前提下提出政治标准第一位、艺术标准第二位？这是是否正确？毛泽东是在确认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相统一的前提下提出的。他说：“政治并不等于艺术”，“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因此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我们应该进行文艺问题上的两条战线斗争”。这些话都是在谈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的“关系”时说的，可见，毛泽东是重视艺术标准的，他没有把政治标准孤立起来，更不是后来某些简单化批评所搞的“政治标准唯一”。

毛泽东认为“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这并非毫无根据的臆断，而是对无数历史事实的深刻揭示。我们不必说古代的如《水浒传》等被查禁之类的事，单说我国解放前的左翼文艺所遭受的厄运。鲁迅揭露道：“统治者也知道走狗的文人不能抵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于是一面禁止书报，封闭书店，颁布恶出版法，通缉著作家，一面用最末的手段，将左翼作家逮捕，拘禁，秘密处以死刑，至今并未宣布”。毛泽东说：“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作品，不管其艺术成就怎样高，总是排斥的。”事实正是如此。

在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的统一中以政治标准为第一位，这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也不例外。邓小平的文艺批评实践充分证明这一点。他在批判《苦恋》、《太阳和人》时说：“对电影文学剧本《苦恋》要批判，这是有关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太阳和人》，就是根据剧本《苦恋》拍摄的电影，我看了一下。无论作者的动机如何，看过以后，只能使人得出这样的印象：共产党不好，社会主义制度不好。这样丑化社会主义制度，作者的党性到哪里去了呢？”他还指出：“有人说这部电影艺术水平比较高，但是正因为这样，它的毒害也就会更大”。显然，按照艺术标准，邓小平承认《太阳和人》的艺术水平较高；按照政治标准——“最根本的是非标准”，他认为这部作品起了坏的政治作用；假如不是以政治标准为第一位，他怎么会认为“正因为”作品的“艺术水平比较高”，“它的毒害也就会更大”呢？这和毛泽东说的“内容愈反动的作品而又愈带艺术性就愈能毒害人民”不正是完全一致吗？江泽民对小说《大兵营挽歌》的批判，同样是在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的统一中以政治标准为第一位的。

三、毛泽东讲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与恩格斯讲的“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的“标准”有无内在的一致性？恩格斯讲的美学观点标准相当于“艺术标准”，因为毛泽东在阐释艺术标准时也讲了作品是否“美”的问题。历史观点标准和“政治标准”虽不等同，但两者的基本涵义基本精神

有一致性和交叉性，这就是：历史观点包含政治标准，政治标准包含历史观点。

我们先看历史观点是怎样包含政治标准的。恩格斯分析歌德在作品中对当时德国社会的态度时说：“有时它对它是敌视的”，“有时又相反，……特别是在所有谈到法国革命的著作里，他甚至保护它，帮助它抵抗那向它冲来的历史浪潮。”这就把歌德反对法国革命、维护德国封建社会的政治态度作了否定。这种政治性评价，正表明在历史观点中实际包含了政治标准。此其一。其二，恩格斯在评论《济金根》时分析了剧本所反映的各种政治状况，如“农民运动”、“贵族的国民革命”能否“同城市和农民结成联盟”、“运动的领导权”、“解放农民”还是“压榨农民”等，而且他对这些政治状况和作品反映得是否正确都作了评论，这也表明在历史观点中实际包含了政治标准。其三，如果说恩格斯在评论历史上的诗人，历史题材作品时“历史观点”标准中包含了政治标准，那么，他在评论当代作家和现实题材作品时就更明显地运用了政治标准，例如，他在《格奥尔格·维尔特的 帮工之歌》一文中，认为写过不少反映工人农民贫困生活和揭露资本主义剥削的诗歌的维尔特是“德国无产阶级第一个和最重要的诗人”，“他的社会主义和政治的诗作，在独创性、俏皮方面，尤其在火一般的热情方面都大大超过弗莱里格拉特的诗作。”德国诗人弗莱里格拉特写过一些革命诗歌，参加过共产主义者同盟，后来脱离革命，而维尔特至死坚持革命。恩格斯对维尔特的评价以及对维尔特诗作和弗莱里格拉特诗作的比较，无不体现着政治标准。又如，恩格斯在评论德国画家许布纳尔描写织工向厂主交亚麻布的场面的画作时说：“从宣传社会主义这个角度来看，这幅画所起的作用要比一百本小册子大得多”，这里的政治标准是显而易见的。再如，恩格斯批评卡尔·倍克在《穷人之歌》中“一开始他就表现出他所固有的小资产阶级的幻想”，“歌颂胆怯的小市民的鄙俗风气”，“歌颂各种各样的‘小人物’，然而并不歌颂倔强的、叱咤风云的和革命的无产者”，这也不是明显表现出政治标准吗？

再看“政治标准”是怎样包含历史观点的。其一，毛泽东对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标准的历史内涵作了不同的阐释：在抗日战争时期已如上述；在社会主义时期，强调政治标准“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这无疑贯穿了历史观点。其二，他明确地“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政治标准”，这显然表明政治标准内含着历史观点。其三，他在阐释政治标准时还指出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作品要看其“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这同样表明政治标准内含着历史观点。

既然“政治标准”和“历史观点”标准具有一致性和交叉性，那我们就不能把两者对立起来，只肯定“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的“标准”，而否定“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其实，它们在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理论中具有互补性。应该承认，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理论也是有贡献的。

以上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所做的主要贡献。在他的这些贡献中，凝结着中国共产党的集体智慧。正是这些重大贡献，使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阶段。毛泽东之所以成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主要创立者，就因为他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作出了许多贡献，从而使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更好地指导革命文艺、社会主义文艺取得光辉成就。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毛泽东论文艺的民族特色

吴元迈

文艺的民族特色或民族性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和问题，也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对文艺的民族特色所作的精辟论述，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学习和探讨他的有关论述，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具有十分重大和深远的意义。

—

在人类文艺理论发展史上，文艺的民族特色并不是马克思主义首先提出的。

18 世纪德国启蒙主义者和文艺学家赫尔德（1744—1803）在《批评之林》、《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思想》等著述中，曾强调文艺创作的特点要受民族历史生活状况的制约。他在谈到各民族的民歌时指出：不应该把荷马的史诗《奥德修记》和《伊利昂记》看作人类的共同的法典和范例，而应该把它们看作回响于古希腊听众的耳际和心中的独具特色的民族诗歌。

从理论上和创作上提出民族特色或民族性的，则是 19 世纪欧洲浪漫主义。德国、法国、俄国、波兰等国家的不少浪漫主义作家，对自己民族的民间题材表现了浓厚的兴趣，从中吸取了丰富的养料，认为民间文学是真正的民族精神之所在。他们深入民间，收集和编辑了一些影响深远的民间创作集，如德国阿尔尼姆和布伦塔诺的著名民歌集《儿童的奇异号角》（1806—1808）等。不少浪漫主义作家，特别是那些被压迫民族的浪漫主义作家，表现了热爱祖国、热爱家园的创作倾向。英国诗人华兹华斯在《抒情歌谣集》（1800）的序言中写道：“我通常都选择微贱的田园生活作题材，因为在这种生活里，人们心中主要的热情找着了更好的土壤……因为在这种生活里，我们的各种基本感情共同生存在于一种更单纯的状态之下……人们的热情是与自然的美而永久的形式合而为一的”。作为德国浪漫主义运动和欧洲浪漫主义美学的代表人物弗里德希·施来格尔（1772—1829），则明确地提出了文艺的民族性问题，认为诗歌是民族及其独特性格的表现；古希腊文化“始终具有独特性和民族性”；而西班牙文学则是一切民族文学中“最富民族性”的文学；等等。从某种意义上说，浪漫主义运动与民族性是并肩前进的。

文艺的民族特色或民族性在 19 世纪现实主义创作和现实主义美学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和阐述。这一点并不难了解，因为具体地、真实地描写现实是 19 世纪现实主义的主要特征之一，生活中的民族特征就不可能不成为它的描写对象之一。俄国文学批评家和俄国现实主义美学奠基者别林斯基（1811—1848）是文艺的民族特色或民族性最热烈的倡导者之一。他的一些见解至今仍没有失去其意义和价值。首先，别林斯基认为，“在任何意义上，文学都是民族意识，民族精神生活的花朵和果实”。他还举例说，不管歌德在其作品中是怎样多种多样，怎样囊括万有，可是歌德的每一部作品都荡漾着德国人、并且还是“歌德式的”精神，虽然在普希金的大部分抒情诗作品中，甚至在普希金的某些抒情作品如《唐璜》中，无论是内容或是形式，主要都是欧洲式的。可是在这些作品中，普希金仍旧是真正的民族性的俄国诗人。什么是民族性，按别林斯基的看法，“那是民族特性的烙印，民族精神和民

族历史生活的标志”：是“对于某一民族、某一国家的风俗、习惯和特色的忠实描绘”。其次，在别林斯基那里，文艺的民族性成了现实主义美学和文学批评的基本概念和评价尺度之一。他提出“‘民族性’是我们时代的美学的基本东西”；“民族性变成了用来测量一切诗歌作品的价值以及一切诗歌荣誉的巩固性的最高标准、试金石”。第三，别林斯基指出，民族性是变化和发展的，“为了阐明‘民族性’一词的涵义起见，我们必须解释这个字眼所包含的概念的历史发展过程，必须指出人们什么时候开始考虑到‘民族性’，以前把它理解做什么，在我们今天应该把它理解做什么”。第四，别林斯基没有把民族性绝对化，把它和世界性对立起来。依他看来，这两者是辩证统一的。“人们在文学中仅仅要求写出‘民族性’，等于是要求某种虚无缥缈的、空洞无物的‘子乌虚有’，从另一方面说，人们在文学中要求完全不写‘民族性’，认为这样可以使文学为所有的人理解，成为普遍的东西，就是说，人类的东西，这也等于要求某种虚无缥缈的、空洞无物的‘子乌虚有’”。在19世纪俄国作家和文学批评家中，除别林斯基以外，果戈理、车尔尼雪夫斯基等都谈到了文艺的民族特色和民族性问题而且都有一些精辟的看法，这里就不再援引他们的言论。

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中，经典作家没有专门提出文艺的民族特色或民族性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这方面的论述。尽管他们的论述是零星的、不系统的，但对于理解民族特色或民族性则是重要的、具有原则意义的。恩格斯十分赞赏莎士比亚创作的民族特色，他说：“不管剧中的情节发生在什么地方——在意大利，在法国，或在纳瓦腊，——其实展现在我们眼前的基本上总是欢乐的英国，莎士比亚笔下的古怪的乡巴佬、精明过人的学校教师、可爱又乖僻的妇女全都是英国的，总之你会看到，这样的情节只有在英国的天空下才能发生”。至于恩格斯对易卜生创作的民族特色的论述，我将在后面叙述。列宁在论到“工人运动的国际文化”时，曾明确指出“国际文化不是非民族的”。1920年他还写道：“当每个国家采取具体途径来解决统一的国际任务……的时候，都必须考察、研究、揣测和把握民族的特色和特征”。

我想，列宁所说的“必须考察、研究、探索、揣测和把握民族的特色和特征”，也完全适用于文艺领域。如所周知，在列宁提出“国际文化”之前，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经典著作《共产党宣言》中，曾提出“世界文学”的概念，这个概念同他们提出的“世界历史”、“世界市场”、“世界贸易”是相呼应的。同列宁的“国际文化”一样，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文学”并不是非民族的，这如他们所表述的那样：“过去那种地方的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这段话表述得很清楚：第一，所谓“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并不是说民族特色从此不复存在；要知道，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同民族特色是两个性质不同的概念，不能相提并论；第二，“世界文学”的形成不是通过“民族文学”的消亡来实现，也不是说“世界文学”会凌驾于各“民族文学”之上，而是在各民族文学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中展现出来。

斯大林十分重视文艺的民族形式。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中是他最早提出民族形式问题。他说：“……社会主义内容的无产阶级文化，在卷入社会主义建设和各个不同的民族当中，依照不同的语言、生活方式等等，而采取不

同的表现形式和方法，这同样是对的。内容是无产阶级的，形式是民族的——这就是社会主义所要创造的全人类文化”（11）。毫无疑问，斯大林提出文化的民族形式，是很有意义的，也是很重要的。他的“内容是无产阶级的，形式是民族的”这个表述，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流传很广，几乎成了社会主义文化（文艺）的经典公式。问题是，社会主义文化（文艺）的内容是否全然与民族特色无关，看来，还值得研讨。

以上是对文艺的民族特色（民族性）的粗略的历史回顾。

二

列宁说：“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東西，而是根据他的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12）。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史上，毛泽东最突出最全面地论述了文艺的民族特色的问题。他多次谈到“民族特色”、“民族的特性”、“民族的特点”、“民族风格”、“民族形式”、“民族化”和“中国特点”、“中国的特性”、“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中国化”。这些提法贯穿于他各个时期的论述中，并且总是同他对其他事物和现象诸如哲学、历史、文化、经济、军事等的民族特色的探讨相呼应、相统一。这就是说，他不仅把民族特色看成是一个系统概念，而且从民族特色这个系统来考察文艺的民族特色。这是他探讨文艺的民族特色的优点和特点。例如，他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中认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3）。在《新民主主义论》（1940）中，他提出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又说，“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也是这样，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14）。在《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中，他说：“在学校的教育中，在在职干部的教育中，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教经济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经济的特点，教政治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策略，教军事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适合中国特点的战略和战术，诸如此类。其结果，谬种流传，误人不浅。”（15）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1956）中，他提出：“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原则，各个国家都是相同的，但在小的原则和基本原则的表现形式方面是有不同的。比如打仗的原理是一样的，都是攻、守、进、退、胜、败，但在打法上，怎么攻、怎么守，各有不同，有很多的不同……艺术的基本原理有其共同性，但表现形式要多样化，要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16）。从以上的叙述中可以看到，构成毛泽东探讨事物的特点及文艺的民族特色的依据和出发点的，是哲学中的一般和个别、共性和个性的相互关系及对立统一的原理，以及作为特殊意识形态的文艺的特殊规律。毛泽东在《矛盾

论》（1937）中论述“矛盾的特殊性”时写道：“对于物质的每一种运动形式，必须注意它和其他各种运动形式的共同点。但是，尤其重要的，成为我们认识事物的基础的东西，则是必须注意它的特殊点，就是说，注意它和其他运动形式的质的区别。只有注意了这一点，才有可能区别事物。”（17）又说：“每一物质的运动形式所具有的特殊的本质，为它自己的特殊的矛盾所规定。这种情形，不但在自然界中存在着，在社会现象和思想现象中也是同样地存在着。每一种社会形式和思想形式，都有它的特殊的矛盾和特殊的本质。”（18）正是从事物的“特殊的矛盾和特殊的本质”出发，毛泽东提出了一切事物的特点以及文艺的民族特点和特性问题。他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的这一段话充分体现了这一思想和逻辑：“一棵树的叶子，看上去是大体相同的，但他细一看，每片叶子都有不同。有共性，也有个性。有相同的方面，也有相异的方面。这是自然法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法则。作曲、唱歌、舞蹈都应该是这样”（19）。此外，毛泽东还经常结合中国革命、中国建设以及文化、文艺事业中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对那些只顾事物的共性而忽视事物的个性的教条主义作了尖锐批评。例如，他在谈到“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就是重复辩证唯物论的创作方法的错误，就要妨害创作情绪”这一观点时，曾提出：“学习马克思主义，是要我们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世界，观察社会，观察文学艺术，并不是要我们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写哲学讲义。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正如它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物理科学中的原子论、电子论一样。空洞干燥的教条公式是要破坏创作情绪的，但是它不但破坏创作情绪，而且首先破坏了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反马克思主义的。”（20）众所周知，“辩证唯物论的创作方法”是苏联“拉普”领导人于1929年提出的所谓的无产阶级文艺的创作口号。这个创作口号的严重致命伤在于抹杀了文艺的特点，把哲学领域中的东西机械地、庸俗地运用于文艺领域。没有过多久，它便遭到了苏联文艺界理所当然的反对。10年之后，1942年毛泽东重提此事，意在告诫中国文艺界特别是那个时候延安的文艺界要重视文艺的特点，不能搞任何形式的教条主义。

一切事物都有自己的特点，这大概已是没有疑义的，然而，包括文艺在内的一些社会现象还具有自己民族的特点，至今并不为所有的人所认同。毛泽东说：“西医的确可以替人治好病。剖肚子、割阑尾，吃阿斯匹林，并没有什么民族形式。当归、大黄也不算民族形式。艺术有形式问题，有民族形式问题。艺术离不了人民的习惯、感情以至语言，离不了民族的历史发展”（21）。文艺的民族形式的提出，这是毛泽东对作为特殊意识形态的文艺的本性的一个重要发展。毛泽东的这段话不仅表明文艺是极富民族特色的，而且表明它的民族特色是包括民族的语言、习惯、感情、审美趣味及民族的历史发展在内的。这也就是说，文艺的民族特色不是臆造出来的，不仅仅是一个为提高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问题，而是深深植根于生活之中，是生活对它的呼唤和要求。只要生活本身还存在着民族的特征，文艺就不可能不去反映和表现民族的特征。毛泽东还说：“地球上有二十七亿人（那个时候的统计——引者），如果唱一种曲子是不行的。无论在东方和西方，各民族都要有自己的东西”（22）。同时，他对那种民族虚无主义的观点提出了批评：“说中国民族的东西没有规律，这是否定中国的东西，是不对的。中国的语言、音乐、绘画，都有自己的规律”（23）。因此，那种认为文艺可以“超

越”民族性的世界性道路的观点，现在可以“清除”文艺的民族特色的观点，都是不合适宜的。可以这样说，只要现实生活中存在着民族的特征，文艺的民族“所有制”就不可能人为地被废除。

三

什么是文艺的民族特色，文艺的民族特色表现在哪些方面，毛泽东对此都作了十分深刻、全面、系统的论述。

文艺的形式是民族的，没有文艺的民族形式就没有文艺的民族特色。这是毛泽东一贯的思想和主张，也是构成毛泽东文艺特色论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毛泽东反复强调文艺应该具有“民族形式”、“民族风格”和“中国自己的有独特民族风格的东西”、“生动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等等。毛泽东如此重视文艺的民族形式，这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因为在他看来，优秀的文艺总是“标新立异”、“独树一帜”的，总是同一个民族千百年来形成的民族的语言、习惯、审美趣味、表达方式及历史生活的特点紧密相连，而且“艺术的民族保守性比较强一些，甚至可以保持几千年。古代的艺术，后人还是喜欢它”（24）。的确，象中国的唐诗宋词，直到今天人们还在喜爱它。此外，中国是一个具有几千年文明史的泱泱大国，“中国的东西有它自己的规律”。毛泽东曾风趣他说过：“中国的豆腐、豆芽菜、皮蛋、北京烤鸭是有特殊性的，别国比不上，可以国际化。穿衣吃饭也是各国不同。印度人穿的衣服就和中国人不同，它是适合印度的环境的。中国人吃饭用筷子，西方人用刀叉。一定说用刀叉的高明、科学，用筷子的落后，就说不通”（25）。

同时，文艺的民族形式并不是封闭的、静止的、纯粹的，而是开放的、变化的、发展的。一方面，它在同其他民族和国家的文艺交往中，在世界文艺潮流的冲击下，不可能不受到外来文艺形式的影响，不可能不借鉴外来文艺形式的有益成分。在吸收借鉴外国小说的艺术经验、追求外国小说的新形式方面，鲁迅堪称是20世纪中国小说界的卓越代表者，又是最富民族精神的作家。但是，鲁迅根据自身的创作经验说过：“我所取法的，大抵是外国作家”。正是从中国文艺的民族形式的历史演变这一客观实际出发，毛泽东主张利用外来的文艺形式，认为“民族形式可以掺杂一些外国东西，小说一定要写章回小说，就可以不必”（26）；“非驴非马也可以。骡子就是非驴非马，驴马结合是会改变形象的，不会完全不变”（27）；“不中不西的东西也可以搞一点，只要有人欢迎”（28）；“音乐可以采取外国的合理原则也可以用外国乐器”；“西洋一般音乐原理要和中国的实际结合，这样就可以产生很丰富的表现形式”（29）。其实，像音乐中的龟兹乐、高丽乐、天竺乐，乐器中的胡琴、二胡，舞蹈中的胡旋舞、破阵舞等域内域外的其他民族的东西，在中国文艺悠久的历史发展中早已成为中国民族自己的东西。近代从外国引进的话剧、电影、芭蕾、交响乐、油画等，也莫不如此。

语言是民族形式中的重要因素。中国的汉语在几千年的历史演变中，也是不断地从其他民族的语言中吸收了新的词汇和语法成分来补充和丰富自己。毛泽东说：“要从外国语言中吸收我们所需要的成分。我们不是硬搬或滥用外国语言，是要吸收外国语言中的好东西，于我国适用的东西……我们还要多多吸收外国的新鲜东西，不但要吸收他们的进步道理，而且要吸收他

们的新鲜用语。”（30）

另一方面，民族形式也会随着民族生活条件和民族审美意识的变化而变化。中国文艺的民族形式从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到明清小说，已发生了何等巨大的变化。“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小说已从文言文变为白话文，中国传统的小说模式章回小说已失去先前的主导地位。中国的诗歌也从旧体诗发展新体诗。毛泽东虽然喜爱旧体诗词，虽然他的诗歌创作主要是古典形式，但他反对青年人去摹写旧体诗词。当他的旧体诗词发表时，便明确表示：“我历来不愿正式发表，因为是旧体，怕谬种流传贻误青年”；“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31）。可见，毛泽东是赞成诗歌的这种变革的，亦即他是赞成民族形式的变革的。

文艺的民族特色应该包括它的民族形式（语言、叙述方式、体裁、结构等），也应该包括它的内容（题材、主题、思想、感情等客体和主体的方面）。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中，文艺的形式是民族的，一般说来，这似乎已不成问题，至于文艺的内容是否具有民族特色，特别是社会主义文艺的内容是否具有民族特色，好象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就值得加以研讨。毛泽东对文艺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谈论得很多，给人印象很深，但这并不说明他不重视或没有谈到文艺内容的民族特色问题。其实，他曾多次谈到民族的特性和民族的特点。这就不仅仅是民族形式的问题。尽管社会主义文艺的内容不完全是或主要不是民族的，但决不能说社会主义文艺的内容和民族特色全然无关。1944年4月2日，毛泽东致周扬的信中说：“‘艺术应该将群众的感情、思想、意志联合起来’，似乎不但是指创作时‘集中’起来，而且是指拿这些创作到群众中去，使那些被经济的、政治的、地域的、民族的原因而分散了的（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了政治原因，但其他原因仍在）‘群众的感情、思想、意志’，能借文艺的传播而‘联合起来’……”（32）（着重号系引者所加）。这段话表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国家中还存在“地域的、民族的原因”，是加以肯定的。而且在文艺中不可能没有反映。周恩来也说：“民族化主要是形式，但也关系到内容。要使广大工农兵看得懂，听得懂，能产生共鸣，必须民族化，大众化”（33）（着重号系引者所加）。

不仅如此，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认为新民主主义文化“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我们的文化是革命的民族文化”（34）。这里的“民族的特性”显然是指内容而言。我国社会主义文化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继续与发展。“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等民族的特性亦即民族的内容，不可能因为从新民主主义文化阶段进入到社会主义文化阶段而消失。随着中国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展开，我们今天不仅在生活中也在文艺领域内提倡发扬爱国主义的传统和精神，实际上，爱国主义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海内外炎黄子孙的共同心声。因而，它也不可能不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文艺富有民族特色的表现内容。毛泽东说：“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35）中华民族的这些特性以及其他特性诸如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不仅在汉族的《诗经》、屈原的《离骚》、施耐庵的《水浒传》、吴承恩的

《西游记》及藏族的史诗《格萨尔王传》和蒙古族的史诗《江格尔》中有了鲜明的反映，而且在我国社会主义时期的文艺作品中得到了继续发展。

关于文艺的内容与民族特色的关系，毛泽东在谈到《红楼梦》时说过：“十七世纪是什么时代呢？那是中国的明朝末年和清朝初年。再过一个世纪，到十八世纪上半期，就是清朝乾隆时代，《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就生活在那个时代，就是产生贾宝玉这种不满意封建制度的小说人物的时代。乾隆时代，中国已经有了一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是还是封建社会。这就是出现大观园里那一群小说人物的社会背景”（36）。这就是说，《红楼梦》中的环境和人物是我国那个特定历史阶段的民族生活和民族经验的艺术反映。它同《汉姆莱特》、《欧也尼·葛朗台》、《浮士德》和《安娜·卡列尼娜》一样，都是以其不可重复的民族内容而流传千古。恩格斯在评论挪威作家易卜生的创作时写道：“挪威的农民从来都不是农奴，这使得全部发展具有一种完全不同的背景。挪威的小资产者是自由农民之子，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比起德国小市民来是真正的人。同时，挪威的小资产阶级妇女比起德国的小市民妇女来，也简直是相隔天壤。易卜生的戏剧不管有怎样的缺点，它们却反映了一个即使是中小资产阶级的但比起德国的来却有天渊之别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们还有自己的性格以及首创的和独立的精神”（37）。列宁在论到列夫·托尔斯泰的小说时也说：“天才的艺术家，不仅创作了无与伦比的俄国生活的图画，而且创作了世界文学中第一流的作品”（38）；“由于托尔斯泰的天才描述，一个被农奴主压迫的国家的革命准备时期，竟成为全人类艺术发展中向前跨进的一步了”（39）。这表明，易卜生的戏剧内容和托尔斯泰的小说内容都和那个时代挪威与俄国的历史生活及其独特性紧密相连。如果没有内容上的这种鲜明的民族特色，他们的作品就很难走向世界，成为世界文学中的瑰宝。

由此可见，那种把文艺的民族特色仅仅归结于或等同于民族形式，而将它的内容绝对排除在外的观点，是狭隘的和偏颇的。值得注意的是，1843年别林斯基在谈到文艺的民族特色时，是把它的内容包括在内的。他写道：“既然艺术，就其内容而言，是民族的历史生活的表现，那末，这种生活对艺术自必有巨大的影响，它之于艺术有于燃油之于灯中的火，或者，更进一步，有如土壤之于它所培养的植物。枯干的、沙石的土壤是不宜于植物的；内容贫乏的历史生活也不宜于艺术”（40）。然而，别林斯基的这一思想在苏联文艺学中或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中并没有引起重视，在一个很长的时期里，似乎只有民族形式同民族特色有关。其实，形式是不能脱离内容而存在的。形式不能没有与之相适应的内容，内容也不能没有与之相适应的形式。如果文艺的内容和民族特色没有联系，那末一种非民族的内容为什么还一定需要一种民族的形式呢？毛泽东说得好：“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41）在文艺的民族特色这个层面上，也理应如此。

四

文艺的民族特色既是动态的概念也是动态的过程。它是稳定性和变化性的辩证统一。这如毛泽东所说：“中国的面貌，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都不应该是旧的，都应该改变，但中国的特点要保存”（42），中国的文艺自

然也不例外。中国文艺在其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不知经历了多少的沧桑和变迁，从先秦文艺、魏晋文艺、汉唐文艺、宋元文艺、明清文艺、“五四”新文艺到今天的社会主义文艺，都弥漫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和特色。

具体说来，文艺的民族特色的动态性总是同文艺的继承和借鉴、变革和创造处于千丝万缕的联系之中。

文艺的民族特色总是代代相承。每个时代的文艺都不可从头开始，都不可能割断同民族传统的历史联系，都不可能背离自己已有的规律去另辟蹊径。没有文艺的历史继承性，也就没有文艺的民族特色。在毛泽东看来，坚持民族特色和弘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始终是同步的、不可分离的。这因为，在一个民族的文艺的历史发展中，那些进步的、健康向上的、独树一帜的、具有生命力的东西，诸如毛泽东提到的“刻苦耐劳”、“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等等，乃是中国的民族特色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讲，民族特色是一个价值观念。毛泽东写道：“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⁴³⁾毛泽东的这个思想也完全适用于我们对待文艺的民族遗产和文艺的民族特色。后来，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进一步指出：“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⁴⁴⁾毛泽东在谈到我们这个民族数千年历史的许多珍贵品时，特别指出它“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这个看法是十分贴切的，同时，也为世界所公认。他并且认为“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时隔20年之后，他在1960年12月再次回到中国的“灿烂的古代文化”这个题目上来，要求我们“应该充分的利用遗产”，并指出：“所谓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是封建时代的文化，但并不是封建主义的东西，有人民的东西，有反封建的东西。要把封建主义的东西与非封建主义的东西区别开来。封建主义的东西也不全是坏的，也有它发生、发展和灭亡的时期。我们要注意区别发生、发展、灭亡时期的东西。当封建主义还在发生和发展的时候，它有很多东西还是不错的”⁽⁴⁵⁾。这是毛泽东对如何吸收和利用我国“灿烂的古代文化”中的“民主性的精华”这一思想的新发展，也是我们对待资本主义文化所应采取的基本态度。只有通过这种历史的、具体的和辩证分析，我们才能真正地、积极地、充分地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

坚持文艺的民族特色和反对无批判地吸收文艺遗产，在毛泽东看来，是同步的，不可分离的，这因为，在一个民族的文化的历史发展中，那些落后的、过时的、颓废的、反人民的东西，从来都不会作为一个民族的民族特色而保存下来。毛泽东在谈到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时，总是把“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和“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并提，总是把“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和反对“颂古非今”、反对“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并提，总是把“批判地继承”和“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并提。即使对那些反封建主义的文化，毛泽东也主张：“不是全部可以无批判地利用的，因为封建时代的民间作品，也多少都还带有若干封建统治阶级的影响”；“反封建主义的文化当然要比封建主义的好，但也要有批判、有区别地加以利用”⁽⁴⁶⁾。当然，应

该看到清理古代文化、文艺遗产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这如毛泽东所说：“历史总是要重视的。历史久，有好处也有坏处。美国历史短，也许有它的好处，负担轻，可以不记这么多东西。我们历史久，也有它的好处……但是要回顾那么久的历史，是有些麻烦的”（47）。这就需要我们根据毛泽东提出的那些原则和方法，实事求是地、以主人翁的态度审慎地去做。

文艺的民族特色是开放的、变化的，而不是封闭的、纯“血统”的。它在自己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总是不断地把其他民族其他国家的文艺精华熔铸于自身之中，化成自己的血和肉。世界文艺史表明，各民族的文艺除最早在某些时间以外，都不是孤立地、平行地在发展，而是在相互联系、相互吸收、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网状中向前演进。这几乎是世界文艺发展的普遍过程的普遍规律。灿烂辉煌的我国唐代文艺是如此，“五四”时期的新文艺也是如此；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文艺是如此，20世纪异军突起的拉美文学也是如此。毛泽东历来关心和重视文艺的吸收借鉴，反对文艺排外主义。他说，“象西太后反对‘洋鬼子’是错误的”；“要向外国学习”，“借鉴外国人”；“外国有用的东西，都要学到，用来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接受外国的长处，会使我们自己的东西有一个跃进”。1940年他在谈到文化领域的问题时说：“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还做得很不够。这不但是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有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48）后来，他又说“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当然各个民族的文艺发展是不平衡的，有时处于高峰，有时处于低谷，这是常有事。毛泽东经常谈到，由于我国历史和文化发展的种种原因，“近代文化，外国比我们高，要承认这一点，艺术是不是这样呢？中国某一点上有独到之处，在另一点上外国比我们高明。小说，外国是后起之秀，我们落后了”（49）。又说，“要承认近代西洋前进了一步，不承认这一点，只说他们教条主义，不能服人”（50）。毛泽东这样讲，是实事求是的，并非自谦之词。对于我们，这无异于说，吸收借鉴外国优秀文艺仍然是一个十分紧迫的课题。

然而，在毛泽东看来，坚持文艺的民族特色和吸收借鉴外国文艺的优秀成果，同反对盲目地照搬照抄、反对“全盘西化”，是一个统一的辩证过程。毛泽东根据我国在吸收借鉴方面的各种历史经验，一再要求我们：“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51）半个世纪以前毛泽东所说的这些话，在今天仍然保持着其新鲜的意义。后来，毛泽东又进一步提出要以我为主地进行吸收借鉴：“艺术上‘全盘西化’被接受的可能性很少”（52）；“搬要搬一些，但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53）；“应该是在中国的基础上，吸收外国的东西。应该交配起来，有机地结合”（54）。

最后，在毛泽东看来，文艺的民族特色同时代的创造精神息息相关。脱离民族特色的文艺作品必定缺乏魅力，脱离时代创造精神的文艺作品必定缺乏灵魂。继承和借鉴决不能代替自己的创造。毛泽东坚决地表示：“这是决不能替代的”；并且说，硬搬和模仿“乃是最没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学教条

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⁵⁵⁾。之所以要继承民族文艺的珍贵遗产和借鉴外国文艺的优秀成果，目的在于创造符合时代精神和体现时代要求的“中国独特的新东西”。这如毛泽东所说：“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代的活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⁵⁶⁾。这个看法同他主张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和“推陈出新”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这也就是说，文艺的民族特色既包括继承和借鉴，也包括变革和创造。它是一个不断地继承、借鉴和变革、创造的动态过程和动态概念。在20世纪的中国作家中，鲁迅的文学创作的民族特色是最完美地体现了继承和借鉴、变革和创造这一辩证的和有机的结合。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毛泽东说：“鲁迅是民族化的”⁽⁵⁷⁾。他既懂得中国的东西，又懂得外国的东西，他的小说“既不同于外国的，也不同于中国古代的，它是中国现代的”⁽⁵⁸⁾。同样可以说，毛泽东通过对鲁迅小说的民族特色的揭示，十分具体的展现了他自己所赋予文艺的民族特色的丰富的、动态内涵。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注释

《西方文论选》(下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第5页。

(40)《别林斯基论文学》，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第78页，第81页。

《别林斯基选集》第1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第107页，第190页。

《别林斯基选集》第3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第161页，第162页，第186页。

《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385页。

《列宁选集》第4卷，第246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5页。

(11)《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117页。

(12)《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52页。(13)

(14)(34)(35)(43)(44)(48)(51)《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33—

534页，第706—708页，第706页，第623页，第533—534页，第708页，第706—707页，第707页。(15)(20)(30)(41)(55)《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798页，第874页，第837页，第869—870页，第860页。(16)(19)(21)(22)(23)(24)(25)(26)(27)(28)

(29)(32)(42)(47)(49)(50)(52)(53)(54)(56)(57)

(58)《党和国家领导人论文艺》，文化艺术出版社，1982年，第15页，第15页，第16页，第17页，第15—16页，第16页，第17页，第20页，第23页，第23页，第17页，第8页，第23页，第201页，第21页，第23页，第16页，第22页，第23页，第22页，第20页，第23页。

(17)(18)《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08—309页。(31)《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20页。(33)《周恩来论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171页。(36)《毛泽东著作选读》(下)，第828页。(3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3—474页。(38)(39)《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202页，第210页。(45)(46)引自

《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三联书店，1986年，第200—201页，第201页。

毛泽东诗论与新中国诗歌

张炯

毛泽东是新中国的缔造者。作为伟大的革命家、理论家和诗人，他还以自己的革命文艺实践和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主张，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文艺的发展和建设，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毛泽东不仅以他的诗词创作，给新中国一代诗风带来巨大的影响，还以他的精到的诗论，擘划了新中国诗歌发展的基本格局和方向，而且深刻地阐明了诗歌创作的历史规律，为中国诗歌的未来走向指明了宽广而正确的道路。在纪念他的诞辰 100 周年之际，重新回顾和学习他的诗歌理论并审视其实际的影响，这对于建设和繁荣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和诗歌，应该说都是十分必要的、富有启示意义的。

—

1957 年《诗刊》创刊。毛泽东给《诗刊》的首任主编臧克家写了《关于诗的一封信》。其中除了表示同意《诗刊》发表他多年创作的旧体诗词 18 首外，还写了如下一段十分重要的话：

诗刊出版，很好，祝它成长发展。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这些话仅供你们参考。 </PGN0237.TXT/PGN>

臧克家后来在自己的著作《毛泽东和诗》中还转引了毛泽东的另一段话：

旧体诗词源远流长，不仅象我这样的老年人喜欢，而且……中年人也喜欢。我冒叫一声，旧体诗词要发展要改革，一万年也打不倒。因为这种东西，最能反映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特性和风尚，可以兴观群怨嘛，怨而不伤，温柔敦厚嘛……

前一段信是广为人知的，后一段话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却只在诗歌界的一定范围内流传。这两段话是互为补充的，它表达了毛泽东对新中国诗歌发展格局的极其重要的战略设想，即新体诗和旧体诗都要发展，但应以新诗为主。

中国是有着悠久诗歌传统的国度。旧体诗词自《诗经》、楚辞、汉魏乐府以迄唐诗、宋词、元曲，几千年来虽几经变革，但多以文言为诗，形式与格律到后来也趋于僵化。因而到了晚清之际已很难适应新的时代需要。梁启超、黄遵宪等倡导“诗界革命”，成为 19、20 世纪之交资产阶级文学改良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他们不独提倡新的文学思潮和价值观念，还清算正统诗坛传统诗派的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倾向，主张诗体解放，提倡“新派诗”，以白话口语入诗。而“五四”文学革命的兴起，突破旧诗格律形式，以白话自由表达情思的新体诗终于风靡于文坛。胡适曾说：“中国近年的新诗运动可算得是一种‘诗体大解放’。因为有了这一层诗体的解放，所以丰富的材料，精密的观察，高深的理想，复杂的感情，方才能跑到诗里去。五七言八句的律诗决不能委婉达出高深的理想与复杂的情感。”可见，他也认识到新体诗的产生不仅是诗体形式的革新，形式是从属于内容的，新诗形式的嬗变深深根源于社会历史变化所推导的时代需要，根源于表现人们日益丰富和

复杂的现代意识的需要。

当时，新体诗受到旧体诗维护者的激烈攻击，认为那不是诗。而新人对旧诗也往往采取决绝的态度，弃之如敝屣。在“五四”后现代文学发展中，新旧诗虽然对峙，但由于新诗迅速取得诗坛主流的地位，旧体诗江河日下，逐渐式微了。尽管仍不乏有人吟作旧体诗词，在青年人眼中旧体诗词似乎已成“遗老”、“遗少”们的专有物。

而毛泽东旧体诗词的发表和他有关诗歌发展格局的论述的公布，给新中国诗坛造成的影响是深远的。毛泽东既为旧体诗词注入了新的生命，以他那雄浑、壮丽的作品显示了旧体诗词在表现新的时代风云与革命情思上同样能获得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能产生激起读者广泛共鸣的高度审美魅力；而且他以诗词大家和具有精湛文学素养的文艺理论家的权威，在维护新体诗的主体地位的同时，从中国诗歌历史发展规律的深度和高度，明确指出旧体诗词存在的条件、价值和前途。这不能不使整个中国诗坛耳目为之一新。人们不能不承认，毛泽东的论述不仅符合诗歌发展的规律，也符合中国当代诗歌发展的实际。而且在实践上，他的主张也更能充分调动各种年龄层次、各种审美时尚的诗人的积极性，更有利于促进新中国诗歌的“百花齐放”。

据说毛泽东本人并不喜欢新诗，也很少读新诗。他对于旧体诗词的爱好远胜于新诗。他读过许多旧体诗词，特别喜欢李白、李贺、李商隐的诗和辛弃疾等的词，连到外地视察，他还要随身携带一些旧体诗词。尽管如此，他仍然充分肯定新诗，并认为新诗在中国诗歌的发展中应是“主体”，他还不赞成在青年人中去提倡旧体诗词。这种历史的眼光就很了不起。作为读者，他有自己的选择；而作为国家领导人，作为深谙文学发展规律的理论家，他具有全局性更为高瞻远瞩的胸襟与眼光。他深知旧体诗词由于讲究形式，格律严，“束缚思想，又不易学”，所以不宜广为提倡。他也不是完全不读新诗。在延安时代，他就不止一次读过肖三的诗作，并激励他写出更好的作品。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他对“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化运动的肯定，就包含对新诗成就的肯定。他也深知新诗自由、没有束缚、容易学的优点，深知新诗得以发展，应该成为“主体”，是符合历代诗歌变革的普遍规律的。他虽然曾一度认为“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却还是对新诗的探索抱有很大期望。这都说明，他决不因个人的偏好而无视文学发展的基本事实与规律。但他不赞成对于旧体诗词的笼统否定。他认为旧体诗词也可以经过一定“改革”而获得发展，并且进而认为它“一万年也打不到”。乍一看，这似乎正属“冒叫”！然而仔细考虑，毛泽东的“冒叫”性的诊断又并非没有道理。因为，他是从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形式的相互关系上，从中国人民的审美传统意识的积淀上来考察旧体诗词的生命力的。黑格尔曾经指出“心灵的旨趣决定了艺术内容的基础，尽管形式和形状可以千变万化”，但“不是每一个艺术形状都可以表现和体现这些旨趣，都可以把这些旨趣先吸收进来而后再现出去”；因为“一定的内容就决定它的适合的形式”。在中华民族的诗歌意识中，正如毛泽东所指出，“兴观群怨”，“怨而不伤”、“温柔敦厚”等等已成为传统的审美心理积淀，成为“人民的特性和风尚”。这些正是中国传统诗歌所培养起来的独特的审美旨趣，它弥布于民族的深层意识中，作为诗歌的内容基础，它从旧体诗词中寻找自己的适合的形式，正如现代人更现代更复杂的情思意趣要寻找新体诗的更自由的形式一样，难道不都有它一定的合理性么？

“五四”以来旧体诗词尽管失去诗坛主体的地位，似乎走向式微，但仍然有不少人写作，不独封建的遗老遗少，包括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董必武、陈毅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包括鲁迅、郭沫若、郁达夫这样的新文学的代表人物也都曾用旧体诗词写作过，这正充分说明旧体诗词的活力。形式虽然取决于内容，但形式又有它一定的独立性，就象旧瓶也可以装新酒，旧的形式也并非绝对不可以表现新的内容。毛泽东曾在探讨诗歌形式问题时也说过：“同样的形式，千百年来，真是名诗代出，佳作如林。固定的形式并没有妨碍诗歌艺术的发展。”这也是符合于诗歌史的事实和诗歌发展的规律的。

毛泽东关于新诗、旧诗一正一副，可以同时发展的主张，影响之大，可以说决定了新中国诗歌双水分流的基本格局。建国40年来，新诗固然是新中国诗坛的主体，产生了许多优秀的诗人和诗作。而旧体诗词也并没有进一步消亡，相反，除了老一辈革命家的旧体诗词作品取得很高成就，特别象毛泽东、陈毅的作品可谓脍炙人口，传播遍于海内外；还有象柳亚子、郭沫若、赵朴初等的旧体诗词，也以各自的特色，获得读者的广泛赞赏。甚至象何其芳这样的新诗人，晚年也投入旧体诗词的创作，写出不少的佳篇，新时期以来，张爱萍、魏传统等大批老将军更多投入旧体诗词的创作，各地诗刊、词刊纷纷登载旧体诗词的新作。这都使旧体诗词进一步获得旺盛的生命力。1976年“四五”天安门革命诗歌运动中涌现的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怒斥罪恶的“四人帮”的诗文中，格律不很严格的旧体诗词占了绝大部分。这也正说明它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有着何等深厚的根基，以及人民群众对于改革旧体诗词的现实愿望和需要。毫无疑义，新中国诗歌中新旧诗体一正一副、双水分流的格局，正是与毛泽东的诗词创作和诗论主张分不开的。

二

中国新诗如何发展，自“五四”以来一直是诗歌界争论不休、探索不止的一个重要问题。有主张自由体的，也有主张格律体的。新诗如何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为他们所喜爱所欣赏，也是诗歌界长期来所关注、所不能释然于心的一个重大“情结”。总之，新体诗向何处去？它的发展方向应该怎样去选择，这正是几十年来新诗人和新诗理论家孜孜以求，无不希望获得一个正确答案的历史性课题。

对中国新诗发展的方向，建国后毛泽东也有明确的论述。1958年他在成都会议的一次讲话中指出：

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是民歌，第二是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形式是民歌的，内容是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对立统一，太现实了就不能写诗了。

臧克家《毛泽东和诗》一书中还转引了毛泽东的另一段话：

新诗的改革最难，至少需要五十年。找到一条大家认为可行的主要形式，确是难事。一种形式经过试验、发展，直到定型，是长期的，有条件的。譬如律诗，从梁代沈约搞出四声，后又从四声化为平仄，经过初唐诗人们的试验，到盛唐才定型。

1965 年 7 月 21 日毛泽东致陈毅论诗的信中还说：

将来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引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

毛泽东的上述主张为新体诗的发展提出了三个问题：第一，新诗的改革应该找到一条“大家认为可行的主要形式”，或“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第二，新诗应该在民歌和古典诗歌的基础上去获得自己的发展；第三，形式是民歌的，或“从民歌中吸引养料和形式”，艺术内容则该是“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对立统一”。这三条是相互联系的。实际上其内在精神是一致的。这就是说，新诗尽管目前有多种多样的形式，但应有“一套”或“一个”为人们喜闻乐见、广为接受的“主要形式”；新诗尽管不同于民歌和古典诗歌，但它不应忘却从民歌和古典诗歌中去吸取好的传统，在此基础上发展创新；新诗应主要从民歌去吸取材料与形式，又不可太现实主义，而应结合浪漫主义。

毛泽东的上述主张也许不是所有人都能同意。但这些主张的深刻的理论启示意义又正是我们所不能忽视的。因为它不仅触及诗歌发展的深层规律，还提出新诗发展的方向性的问题。尽管，1958 年毛泽东提出新诗要在民歌和古典诗歌基础上发展，并号召诗歌界要收集民歌，后来被发展成为“人人写诗”的“新民歌运动”，这与当时“大跃进”的“浮夸风”相结合，使诗歌的浪漫主义走向“假大空”，但毛泽东的原意却正是基于对我国诗歌历史的深致的思考。

大家知道，新诗的兴起溯源于对传统的反叛。没有这种反叛便没有新体诗。而新体诗产生后又历来有两派主张，一派是自由体派，主张“不但打破五言七言的诗体，并且推翻词调曲谱的种种束缚；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有什么题目，做什么诗；诗该怎样做，就怎样做。”从胡适到后来的艾青，都曾标榜自由体。另一派是格律体派，主张不能没有格律，而必须“带着镣铐跳舞”，闻一多、徐志摩以迄后来的何其芳都属于这一派，虽然格律体派也有种种分支，有人倡 14 行体，有人倡民歌体，有人倡俳句……。80 多年来用白话写的新诗，虽非都如毛泽东所说“迄无成功”。但确实有大量过于自由，与散文几无差别的诗如过眼烟云，不能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不象旧体诗词那样语言精炼，音调顿挫有致，琅琅上口，可吟可唱，不易被人忘记。诗虽然不等于诗的形式，首先得有诗意的美，但形式毕竟不是不重要，倘若诗与散文无区别，人们就不会特意去创造诗了。所以，鲁迅在 30 年代便有鉴于新诗发展的得失，也提出“我以为内容且不说，新诗先要有节调，押大致相近的韵，给大家容易记，又顺口，唱得出来”的主张。1935 年，他又说：“诗须有形式，要易记，易懂，易唱，动听，但格式不要太严。要有韵，但不必依旧诗韵只要顺口就好。”

我国古典诗歌大多是韵律整齐、有一定格式的格律诗，而且追溯起来，又往往多从民歌升华、演变的。《诗经》的国风固采各国的民歌，楚辞中的《九歌》也何曾不深受楚地民歌的影响。汉魏乐府本多是民歌。六朝的民歌和唐代的竹枝词都给文人诗人以很大影响。宋词元曲也无不发端于民间。所以，以古典诗歌为基础。在精神实质上恐怕正求以民歌为基础。历代民歌形式最活泼、最接近口语而又有韵有调可吟可唱，也最能表现当代人民的情感、意识和心态。歌唱爱情或揭露现实的民歌虽然往往很大胆，但大胆中又不乏

含蓄，不乏怨而不伤，温柔敦厚，这大概是中华民族的民性使然。比喻、象征等手法自《诗经》起便被普遍使用。中国传统诗歌较少采用现实主义的白描手法，对现实生活的描写多以比喻、象征驰骋浪漫主义的想象，从而构造出中国诗所特有的种种诗美的意境。“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之讽刺剥削阶级：“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之喻男女求偶、就是古老的例子。只要简略回顾我国古典诗歌发展的历史，便不难认识历代诗歌无不从民歌获得富有生命力养份的发展规律，也不难认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确是我国诗歌绵延的优良传统，是我国传统诗美构造不可缺的内蕴。这样，我们便比较能够更好地理解毛泽东所提出的新诗要以民歌和古典诗歌为基础，汲取民歌的形式又努力体现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统一的主张。

诚然，今天的中国新诗要寻求一个大家都认可的主要形式很困难，无论“一个”或“一套”都需要时日。在众多诗歌形式的探索中，需要时间去淘洗，需要读者去选择。新中国建立以来，人们既看到曾在自由体诗方面做出过很大成绩的艾青、田间也不乏格律诗的尝试，更看到郭小川、贺敬之、闻捷、李季这些当年风华正茂的诗人在实践新格律诗方面作出巨大的开拓和创造，而李瑛、公刘、严陈、梁上泉、雁翼、流沙河、邵燕祥等大批新一代诗人在各种诗歌形式的尝试中，也先后走向创作句式大体整齐，有节顿也大体押韵的新诗，联想到唐诗、宋词、元曲在当时众多诗歌竞争中脱颖成为主要的诗歌形式，那么，历史的趋势在于从众多探索中寻找一个大家大体认同的一种或一套主要诗歌形式，这恐怕不仅是可能的，也会是必然的。

人们曾有一种误解，以为毛泽东主张寻找一种诗歌的主要形式并以民歌和古典诗歌为基础，又追求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这就表明他追求一种单一创作模式，有悖于他所倡导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文艺方针。其实，主要形式并不等于全部形式，只有在诗歌形式的多样化中才能有主要形式和非主要形式之分；民歌与古典诗歌为基础也并不等于新诗必须都去模仿民歌和古典诗歌，而且民歌的形式本就是多样的，陕北的“信天游”与甘肃、青海的“花儿”不同，维吾尔族的民歌与蒙古族、藏族的民歌也不一样。在民歌和古典诗歌的基础上去发展新诗，包括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而非仅仅限于形式。内容上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其实质是理想与现实的辩证结合，即既要求诗人扎根于生活现实，从中去汲取创作灵感的源泉，又要求诗人高于生活现实，用革命理想去照亮现实，创造出比现实更美、更理想、更典型的诗美境界来。而这种境界是可以用多种艺术形式和创作手法去表现的。这里也不存在什么单一的创作模式。郭小川和贺敬之、闻捷和李季都曾致力于在民歌和古典诗歌基础上去发展新诗，谁能说他们所创作的《甘蔗林——青纱帐》、《厦门风姿》（郭小川），《回延安》、《桂林山水歌》（贺敬之），《杨高传》（李季）、《复仇的火焰》（闻捷）是属于什么单一创作模式呢？

因而，我们应该认识到，毛泽东为中国新诗所指出的方向不仅正确，不仅符合历代诗歌发展的规律，而且道路也是宽广的。

三

一代诗歌在历史上的地位，不止取决于量，更重要的是取决于质。诗固然要有一定的形式，但具有诗的形式，并不一定就是好诗。因而对于诗美的

探求是历代诗人和诗论家所极端重视的。

毛泽东在致陈毅论诗的信中有段话论及诗美的本质，这对于纠正诗歌创作中的概念化，启迪新中国诗人提高诗作的质量，有着深远的意义。这封信在评论陈毅的诗作之后，接着指出：

又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赋也可以用，如杜甫的《北征》，可谓“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然其中亦有比、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韩愈以文为诗；有些人说他完全不知诗，则未免太过，如《山石》、《衡岳》、《八月十五酬张功曹》之类，还是可以的。据此可以知为诗之不易。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蜡……。

这里，第一，毛泽东反对诗、文不分，不赞成象韩愈那样每每“以文为诗”；第二，他还反对许多宋人那样以理为诗。其要义是点出诗的特质：不但要用形象思维，而且要重视比、兴的表现手法。

诗与文是两种不同的艺术体制。中国古代“文”的范围很广，大量说理之文都包括在内。比较起来，“诗”侧重形象思维这个特点，前人有过许多论述。刘勰指出：“是以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声附采，亦与心而徘徊。”他这种“神与物游”的见识，实际上已揭出诗人形象思维的基本特点。到了宋代严沧浪，更有“妙悟”之倡，他主张学诗要“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他认为“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像，言有尽而意无穷”（11）。他虽把诗的“妙悟”比作佛家的禅，但他推崇盛唐，所论也涉及诗的想象的特点。他主张诗的形象不仅要有声有色，还要如“水中之月，镜中之像”，让人感到“言有尽而意无穷”。明代李东阳在《麓堂诗话》中说：“诗有三义，赋止居一，而比兴居其二，所谓比与兴者，皆托物寓情而谓之者也。盖正言直述，则易穷尽，而难于感发，惟有所寓托，形容摹写，反复吟咏，以俟人之自得，言有尽而意无穷，则神爽飞动，手舞足蹈不自觉。此诗之所以贵情思而轻事实也。”他把“言有尽而意无穷”又与比兴联系起来。自然，从今天来看，文学艺术作品都要用形象思维，包括诗歌、小说、散文、戏剧。今天谈诗的特点不独要讲形象思维，避免许多抽象的义理入诗，还要仔细探讨诗的形象思维与其他文学作品的形象思维的区别。例如诗歌形象的含蓄性、朦胧性、象征性、比喻性、跳跃性等等。散文虽也可以抒情言志，但散文主要靠描写，靠直抒其情。而诗的语言要求比散文更精炼，主要靠象征与比喻的形象来达到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诗美境界（自然，这不是说散文就绝对不能为诗。今天写得精炼而又有诗意的散文诗就是。而诗意便离不开形象思维）。中国传统诗歌中的赋、比、兴的运用，正涉及诗歌形象思维的特点。所以毛泽东批评韩愈“以文为诗”，指出许多宋诗所以“味同嚼蜡”，原因就在“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他不但主张“诗要用形象思维”，而且进一步主张诗要用赋、比、兴的方法。这就触及到诗的本质特性，揭示了诗歌创作的最具普遍性的规律。

关于诗歌的特性，“五四”以来的许多名家也都曾论述过。比如郭沫若曾指出，“诗人的利器是纯粹的直观，哲学家的利器更多一种精密的推理。诗人是感情的宠儿，哲学家是理智的干家子”（12）。胡适也说：“诗须要用

具体的做法，不可用抽象的做法。凡是好诗，都是具体的；越偏向具体的，越有诗意味”（13）。他所谓“具体”就指的是具体形象。周作人曾讲到“象征是诗的最新的写法，但也是最旧，在中国也‘古已有之’，我们上观国风，下察民谣，便可以知道中国的诗多用兴体，较赋与比要更普遍而成就亦更好”（14）艾青把诗看作是“由诗人对外界所引起的感觉，注入了思想和情感，而凝结了形象”，他说：“形象孵育了一切的艺术手法：意象、象征、想象、联想……使宇宙万物在诗人的眼前互相呼应”（15）。他是用明确的语言对形象思维论述得最多的一位现代诗人。但是直到新中国建立后，到“文化大革命”前夕，中国的文学理论界仍然有人反对文艺创作要用形象思维，而且这种反对是打着拥护毛泽东《实践论》，拥护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的旗号（16）。因而，到那时为止，诗歌创作要不要用形象思维，要不要用赋、比、兴的问题，不仅在理论上仍没有统一的认识，在创作实践中也并没有真正解决许多标语口号式的概念化诗歌以及与散文白描相近，除了分行便无其他差别的诗歌曾充塞于文坛的问题。

所以，毛泽东致陈毅的信的发表和传播，不能不有极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我国新时期诗歌的发展，虽然五花八门，令人眼花缭乱，但毛泽东关于诗要用形象思维，要用赋、比、兴的理论主张无疑照亮了广大诗歌创作者曾经不无疑虑和困惑的心灵，使他们纷纷摒弃以往概念化标语化的创作斜路，迈向了通往真正诗歌艺术的康庄大道。不光艾青为代表的“归来派”诗歌是如此，以绿原、牛汉、曾卓等为代表的“七月派”诗歌，以王辛笛、唐祈、陈敬容、郑敏等为代表的“九叶派”诗歌，或是以舒婷、梁小斌等为代表的“朦胧派”诗歌，以杨牧、周涛、章德益为代表的“新边塞诗派”的诗歌，或是翟永明、马丽华等更年青一代的诗歌，都跟“文革”前的那种理胜于词的诗判然有别，显示了健康道路上风格各异的诗美创造。

自然，毛泽东作为伟大革命家、理论家和诗人对新中国诗歌的影响绝不止于他的诗论。他的理论和实践改变了整个中国，从而为新中国诗歌的发展提供了全新的历史土壤和思想文化背景；他的文艺思想更指明了包括诗歌在内的整个新中国文艺发展的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宽广道路；而他的诗词创作所展现的雄浑、壮丽、豪迈、奔放的风格，更影响了不止一代新中国诗人的诗风。毛泽东晚年犯有严重的错误，他的文艺主张和理论观点也不是全都正确，但在我国历史的发展上，他的正确的思想观点所作出的贡献还是属于第一位的。对他的理论主张采取分析的态度，坚持正确，扬弃错误，从而更好地促进我国诗歌和文学的健康发展与繁荣昌盛，这应是我们对他的最好的纪念。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注释

（12）（13）（15）《中国现代诗论》上编，第2—3页，第6页，第123页，第129页，第14页，第336、354页。

参见《毛泽东文艺思想全书》第2047页。

《致陈毅的信》，见注 第2052页。

黑格尔《美学》第1卷，第17—18页。

臧克家《毛泽东与诗》。

《鲁迅全集》第10卷，第250页，第281页。

刘勰《文心雕龙·物色篇》第 169 页。

(11) 严羽《沧浪诗话·诗辩》。

(14) 郭沫若《论诗三礼》，《沫若文集》第 10 卷，第 208 页。

(16) 参见《红旗》杂志 1966 年第 5 期郑季翘的文章《文艺领域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形象思维的光辉典范——读毛泽东诗词札记

蔡厚示

“诗要用形象思维”，这是毛泽东总结出的一条诗歌和文艺创作的基本规律。我们只须大致考察一下古今中外著名诗歌和文艺创作的经验，探索一下其成功的奥秘，便不难领会这一基本规律的无比正确性。

问题的关键在：什么是形象思维？要怎样用形象思维方法去进行诗歌和文艺创作？从前些年已讨论过的情况看来，有必要就这方面作更深一步的研究和探索。

毛泽东诗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形象体现，是反映近半个多世纪来的中国革命的伟大史诗，也是震烁中外、无与伦比的艺术珍品。对毛泽东诗词不懈地进行认真研究和细心探索，显然将为我们作今诗用形象思维方法提供一个良好的范本。

据我的领会，诗歌创作的形象思维方法至少包括下列两个方面：一、诗人的创作过程即形象思维的过程；二、诗歌应采用多种形象化的手法以创造生动感人的诗歌意境或艺术的境界。本文打算就学习毛泽东诗词的几点粗浅体会，分别谈一谈这两个问题。

一 诗人形象思维的过程

曾有同志认为：毛泽东诗词是采用“辩证的艺术表现形式”，是诗人“把斗争的本质化为绚丽多彩的艺术形象”的结果。根据这种理解，仿佛毛泽东写作诗词是先有某种对斗争本质的抽象认识，然后才用绚丽多彩的艺术形象把它谱写出来；或者为了要表达某种深邃的思考，才采用辩证艺术表现形式。这两种理解很可能都是受了“四人帮”宣扬的“主题先行论”的影响，它跟毛泽东一再强调的“诗要用形象思维”的理论是大相径庭的。

毛泽东早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准此，毛泽东诗词也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生活在他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正由于毛泽东在国内外、党内的斗争生活中亲自实践并领导了斗争，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了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的生动的生活形式，有着丰富的创作原始材料，然后才通过形象思维过程和采用形象化的方法写成诗词作品；有些作品甚至是即景口占，“在马背上哼成的”。如写《采桑子·重阳》词就是这样。当时，毛泽东在开辟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尖锐复杂斗争中有着深切的感受，因此面对着“寥廓江天万里霜”等景物，便采用“战地黄花”、“秋风劲”等艺术形象，大气磅礴地抒发了他的革命人生观。我们很难设想，如果离开了沸腾的战斗生活，离开了具体的景物感受，诗人能仅凭对斗争本质的抽象认识写出如此动人的诗篇来！钟嵘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诗品·序》）这话很有道理。它说明：首先是客观的“物”感动了作者，然后作者才通过形象思维把这种对“物”的感受表现为诗歌意境或艺术形象。我们认为：诗歌和文艺创作的特点之一就是只能从具体的生活感受出发，而不能从抽象的思维概念出发。诗人或作家即使处于对生活素材进行研究、分析等判断推理的过程中，也不应摒弃生活现象的具体感性特

征和细节；换言之，在诗人或作家的思维过程中，作为艺术概括前提的具体事物的映象不但被深刻地保留，而且应选择那些明显表现出某种斗争本质而又具有感性特征的细节，把它们特别集中起来。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出既有深厚的思想内容而又生动感人的艺术作品。

从许多追随毛泽东左右多年和熟知他写诗过程的同志们的大量回忆中，我们可以得知：毛泽东诗词中的绝大多数篇章都是根据亲自实践得来的材料写成。如《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据郭化若的回忆，不仅“雾满龙冈千嶂暗”写的就是当时的景色。连“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也是当时沿途听到通信人员和后送人员高兴叫喊的写真。类似这样的例子，我们还可以举出很多。如吴吉清著《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就有着许多这类的记述。但这决不意味着诗人仅靠拾掇现实生活中的感性材料就可以写诗了。在无穷无尽的现实生活材料中，作者选取哪些，摒弃哪些，首先决定于他的世界观。只不过在创作过程中，作家的世界观往往已化为他们活生生的感受的一部分，体现为某种强烈的爱憎感。诗人从自己的爱憎出发，总是把自己的感情融铸入客观的景物中去，正如王国维所说：“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人间词话》）因此同样的景物，在不同诗人的笔下可以见仁见智，判如水火；甚至在同一诗人不同时期的作品中也可以或喜或忧，区若霄壤。像同样一条长江和同是龟、蛇二山，在毛泽东不同时期的词篇中就表现为不同的形象。在《菩萨蛮·黄鹤楼》中的长江被涂上一层浓重的沉郁色彩；而在《水调歌头·游泳》中却给人以无限宽舒的感觉。在前首词中表现为妄图锁困长江的龟、蛇二山，到后首词中却变为驯服于人民意志之下的幽静景物。诗人就通过这类富有感情色彩的景物描写，创造出幽美的艺术意境，以直接作用于读者的感官，使他们产生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如历其境的种种感觉和印象，进而认识作品中所反映的生活和它的思想倾向。

当然，在创作过程中，诗人选择和集中的生活现象还必须经过一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还必须依靠逻辑思维的帮助。如毛泽东写《忆秦娥·娄山关》，词中“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在一手稿中原作“梧桐叶下黄花发。黄花发”。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揣测到：毛泽东在创作此词的过程中，先后进入思维中的景物除了长空、雁叫、霜晨、月等等之外，还有过梧桐叶、黄花等等。但经过一番改造制作之后，他终于摒弃了后者而选择了前者。显然，这里有一个推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诗人必然也借助于逻辑思维对以上景物进行过研究和分析，终于认为前者更符合主题的需要和更富有典型意义而舍弃了后者。但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在借助逻辑思维进行研究、分析的过程中，长空、雁叫、霜晨、月等等景物的具体感性特征自始至终被保留在作为诗人的毛泽东的脑子里，而且由于集中、概括的结果，这些具体感性的特征越到后来变得越鲜明了。这其间绝不存在反形象思维论者所说的从“表象”到“概念”再到“表象”那样的过程。在诗歌创作过程中，诗人可以“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刘勰：《文心雕龙·神思》），却唯独不见一个赤裸裸的抽象思维过程。要不然，诗人舍弃了生活中的具体感性特征，通过抽象的思维过程把生活用概念规定下来，然后再根据这些概念硬套某一类形象，就势必破坏诗歌意境的创造，以至于无法写出真正的好诗，而只能写出像钟嵘在《诗品·序》中批评过的那种“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的作品。

往往还有这样的情况：诗人在借助逻辑思维的过程中，一时用某种概念对丰富的生活现象作了较抽象的概括，但由于形象思维的结果，终于又用典型的生活场景取替了概念的叙述。如毛泽东的《七律·到韶山》，据周世钊和其他同志的回忆，在早几年传抄出来的这首诗的末句是：“人物风流胜昔年”（一作“人物峥嵘胜昔年”）。毛泽东经过几回修改，才定为“遍地英雄下夕烟”。周世钊说：“从这里，可以看出主席对写作的态度是十分严肃、认真的。我认为末句改得特别好。这样，才把新农村中劳动人民可爱的精神面貌表现得具体、生动和鲜明。我们读这篇末两句诗，仿佛就看到了：韶山公社的一群群勤劳健壮的男女社员在暮色苍茫中从生产工地上收工回家，当他们走过稻田和豆垄的时候，对着眼前一望无际、随风起伏的禾苗和豆叶的绿浪，引吭高歌，喜笑颜开的样子。”其实，“遍地英雄”四字给予读者的联想，又何只限韶山公社勤劳健壮的男女社员！祖国大地到处英雄辈出、峥嵘胜昔的景象，通过这一典型生活场面的描绘，不是更概括无遗了么！

据周立波在《韶山的节日》中的记述，毛泽东是1956年6月25日傍晚回到韶山的。周立波写道“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整整的三十二年，他没有到过这里。如今回来了，多少青年时代的记忆涌到了他的脑际呵。历史的长河，在他泛舟的这一段出现了澎湃的翻天的巨浪。一直到黎明四点，红绒幔子遮住的他房间的玻璃窗子的缝里还透出微弱的灯光。他一夜没睡，吟成了一首七律。”这就是毛泽东当年写《七律·到韶山》的生动情景。应该说，周立波的描绘是符合诗人形象思维的实际情况的。“遍地英雄下夕烟”这一典型画面，应该说也早在毛泽东改稿之前，就已映入他的眼帘和浮现于他的脑际了。

诗人借助逻辑思维对生活现象进行研究、分析和比较，除有利于深化诗歌的主题外，对艺术形象的完美表达也是有益的。如毛泽东写《卜算子·咏梅》词，“已是悬崖百丈冰”原作“已是悬崖万丈冰”。毛泽东把“万”改为“百”，说明不要把反面力量看得太大了。这样一改，就使艺术形象更加准确了。又如毛泽东写《七律二首·送瘟神》，“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二句，据郭沫若1962年4月19日在北京全国文艺界诗歌座谈会上所述，“随心”原作“无心”，“着意”原作“有意”，毛泽东后来改了。郭沫若说：“这一改，改得好极了，可见其锤炼字句的功夫。”事实上这何只是锤炼字句，更重要的是诗人把审美主体的感情更深地注入审美客体的形象了。像这类修改，诗人是需要借助逻辑思维进行研究、分析和比较的，但更重要的仍是遵循生活的规律和以有助于加强形象的准确性、鲜明性及生动性为前提。

诗人可不可以根据间接得来的材料写诗呢？当然可以。毛泽东诗词中有些篇章就是根据所闻而不是所见的材料写成的。如《西江月·井冈山》词，写的是黄洋界保卫战。虽然陈毅于1960年春解释此词的题记手迹中说“毛主席亲率一个营将敌击退”，但根据多方面的史实材料说明，毛泽东当时往湘南迎还大队，并未亲自参加这次战斗。他于此次战斗后近一个月始返回井冈山，根据井冈山军民的叙述才写成这首词。但词中所写的场景仍然是那么逼真。他正是用自己身经百战的丰富阅历作为血液注入了这首词。我们可以断言：如果是一位从未见过战阵的诗人，是绝对写不出这样气势宏伟而且宛似亲临的战斗场面的。

在《七律二首·送瘟神》的小序中，毛泽东谈了他写此诗经过情况：“读

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所谓“浮想联翩”，实际上就是一个形象思维的过程。诗人把新、旧中国许多具体、生动的社会图景，通过卓越的形象思维加以典型化。正如他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说：“例如一方面是人们受饿、受冻、受压迫，一方面是剥削人、压迫人，这个事实到处存在着，人们也看得很平淡；文艺就把这种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就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这段话，不正好可以用来作为“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两句诗的绝妙注脚吗？我们不妨设想：如果诗人不是用形象思维的方法写这两句，而是用抽象思维的方法把它写成“劳动人民多痛苦，剥削阶级好快活”，一类纯概念式的语句，那怎能使读者惊醒和感奋呢？“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这既是具体、生动的社会图景，又是旧中国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典型概括；既广泛地概括了千村万户的悲惨境遇，又形象地表明了穷富阶级的尖锐对立。这样的诗就“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

周世钊在谈到毛泽东的《七律·答友人》的写作情况时说：“大概在某一时间里，毛主席接到湖南一些友人的书信和诗词，这些书信和诗词反映了湖南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某些辉煌的成就和某些突出的表现，感到衷心的喜悦，因而‘浮想联翩’，想到湖南人民的现在，更想到湖南人民的将来；因而借题发挥，写成这首热情歌颂湖南人民美好的现在和祝愿湖南人民光明的前途的诗篇。”从诗里可以看出：毛泽东即使在祝愿湖南人民（应该说也祝愿全中国人民）的光明前途时，用的也仍然是形象思维方法，写出了“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这样既富实感，又富气势，色彩绚丽，光辉灿烂的美好前景。

总之，无论诗人用直接得来或间接得来的材料写诗，都必须通过创造性的想像，把脑子里原已储藏的各式各样具体的生活映象尽可能调动起来。用高尔基的话说，就是要“从知识和印象的蕴积中抽出最显著和最具有代表性的事实、景象、细节，并把它们包括在最确切、鲜明、家喻户晓的言词里。”

诗人的想像，在诗人所积累的大量生活印象的基础上进行，是形象思维的最高形式。没有想像，就没有诗歌和文艺创作。一个缺乏生活知识和印象蕴积的诗人，是不可能驾着想像的翅膀在诗国里自由翱翔的。但诗人的想像，不同于科学家的想像。科学家的想像，只是为求得某项最后逻辑结论而对某些事物所作的假设或猜想（如哥德巴赫猜想）；而诗人的想像，却可以“精骛八极，心游万仞”^{（11）}，“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12）}，它可以从一切感受中搜捕典型的生活映象，加以集中、概括，创造出各式各样的艺术形象和构制出各种各样的诗歌意境来。如毛泽东《蝶恋花·答李淑一》中杨、柳二烈士的形象，就是通过创造性想像获得最大成功的艺术范例之一。这首词虽然只有第一句是写实，但全词中，一切奇特、瑰丽的想像，无不以革命的现实生活为依据。烈士们虽然牺牲了，但在革命人民的心目中，他们的精神是永生的。吴刚、嫦娥虽是神话中人物，但原都是人民理想的化身，他们对烈士们的热情欢迎和隆重接待，正生动地表达了亿万人民对先烈的无限敬爱。当忽然传来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消息时，烈士们激动得喜泪迸涌，更是完全合乎情理的了。毛泽东正是充分动用了他无比丰富的“知识和印象

的蕴积”，才写出如此深刻、如此光辉的艺术作品来的。

二诗人的形象化手法

毛泽东说：“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赋也可以用，……然其中亦有比、兴。”这段话，我以为着重从形象化手法方面来谈的。

关于赋、比、兴，历来有各种解释。特别是兴的解释，分歧更大。毛泽东引了朱熹《诗集传》中的解释。因为从总的方面看来，朱熹的说法还是比较允当的。

毛泽东诗词中使用比、兴手法的范例是很多的，并很有特色。关于比：有明比、有暗比；有隐喻、有借喻；有拟人、有拟物。关于兴：有用于发端的，有贯串全篇的；有的融于景，有的托于物。而且大都兴寄深远。兴味无穷。本文限于篇幅，不可能殚分缕析，全面论及，只能稍举数例，以窥一豹。先谈比。

毛泽东诗词中有全用比法的，如《十六字令三首》的二、三两首：

山，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万马战犹酣。

山，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堕，赖以拄其间。

前一首写群山起伏、奔驰之势。诗人通过想像，把静态的群山描绘得仪态飞动：似波涛澎湃翻涌，似战马纵横破敌。后一首，诗人把山比成锋利无比的巨剑，刺破青天仍完好无缺；又比做巍然屹立的巨柱，支撑青天而不使坍塌。这些比喻都非常奇特、生动，不仅能状其形，而且能传其神。当然，这些词中还蕴含着某种象征意义：如前者象征中国工农红军的英勇奋战；后者象征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若这样理解，则这两首词就不仅是比法，而应该说是比而兼兴了。关于这一点，下文再说。

毛泽东诗词中的比法是多种多样的。有的为明比，像“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在被比喻物和比喻物之间标明了比喻词语。有的为暗比，像“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洒向人间都是怨，一枕黄粱再现。”“风云”暗指反动军阀之间的政治局势，虽句中并未出现被比喻物和比喻词语，但读者只须根据上下文稍作揣摩，就能明了它的喻意。

以上两种比法，都不难领会。至于说这些比中仍有深意，仍有兴味，那是另一回事，这里暂且不谈。

另有一些比喻，表面上是写景物或人事，实际上却隐指或兼指别的事物。像“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风物”一词表面上指自然界的风光景物，而实际上却隐指或兼指社会事物（按我的理解，在这里应是指新社会中的美好事物，而不应解作泛指社会上的任何事物，因为“风物”是个好字眼^{（13）}）。像这类比法，既不是明比，也不同于上述那种暗比，应称之为隐喻。

至于借喻，我以为应包括修辞学上所说的借代。它往往以部分代指全体和以具体代指抽象。如“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红装”一词，不应狭隘地理解为指涂脂抹粉和穿红着绿，而应理解为指一切贪图享受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武装”一词，不仅限于指军人的装束，而是作为一

种热爱革命斗争的标志。这种手法有助于形象的具体性、鲜明性和生动性，是很明显的。

拟人和拟物，我以为也属于比法。此种例子，在毛泽东诗词中很常见，毋须枚举。如《念奴娇·鸟儿问答》，就把这两种手法都用了。一方面把某些人比做“蓬间雀”，这是拟物；一方面赋予词中的雀儿以人的特征，又是拟人。只是这种比法往往容易跟以象征、寄托为主的兴法混淆，这一点，也待下文另述。

再谈兴。

关于兴的界说，最为纷坛。有人把兴理解得很狭，以为仅指咏物起兴一类。清人姚际恒就认为：“兴者，但借物以起兴，不必与正意相关也。”（《诗经通论·诗经论旨》）有人又把兴理解得很宽，如黄宗羲就认为：“凡景物相感，以彼言此皆谓之兴。”（《南雷文定四集·卷一·汪扶晨诗序》）我是比较倾向后一说的。我以为兴除了用于发端的“借物以起兴”之外，也有通篇为兴体的。举凡寄托、象征之类，都可归入兴法。刘勰《文心雕龙·比兴》说：“比显而兴隐”，即认为比法相对说来是较明显的，而兴法却往往“环譬以托讽”，用各式各样的景物为象征来委婉地寄托侍人的思想感情。释皎然在《诗式·用事》中说：“取象曰比，取义曰兴。义即象下之意。也就是说：凡着重从形象上打比方的为比法；着重用形象所包含的意义寄托诗人的思想感情的为兴法。因此钟嵘称兴为“兴托”（《诗品·卷中》），陈子昂称兴为“兴寄”（《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就是这个道理。

毛泽东诗词中的兴法用得很宽，有用于发端的，如“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表面上是写黄鹤楼头即目所见之景，却给景物染抹上浓厚的感情色彩，泄示出诗人的主观爱憎，使读者产生无穷的联想。有贯串全篇的，如《七律·冬云》，用一连串景物为象征，极为深刻地反映了当时国内外斗争的形势；热情地歌颂了敢于坚持斗争的中国共产党人；并辛辣地嘲笑了敌人和胆小鬼，形象地刻划出他们的虚弱本质和丑恶面目。这类兴法，往往容易跟以拟人、拟物为主的比法混淆。我以为：凡诗词中所写景物显然只是用作比拟，舍此外别无其他字面意义可求的属比法，如《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中的“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即属此类；凡诗词中所写景物虽象征含义亦颇明显，但字面上仍可视为写景赋物的应属兴法，如《卜算子·咏梅》，即属此类。

毛泽东诗词中的“兴寄”是很深远的。有的融于景，如《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中的“白云山头云欲立”；有的托于物，如《清平乐·六盘山》中的“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这些，我们乍一读来，觉得只是在写景物。但多读几遍，多想几番，就觉出其中兴味无穷。把“云”拟成人状站立起来，这是比法；但诗人的本意并不在写云，而在写红军的昂扬斗志。同时通过景的渲染，为一场激烈的战斗烘托气氛，让读者从中寻味出许多含义，这就比直说“一场激烈的战斗打响了，红军战士个个义愤填膺，从山头上猛冲下来”要生动、隽永得多。“南飞雁”是即目所见之物，看似寻常，但一经诗人加上“望断”二字，就使读者感到有无限深情寄托其中。因为雁飞向南，正是我红军当时所从来的地方，那里还有许多留下的同志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下坚持卓绝的斗争，还有广大的根据地人民正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过着非人的生活；同时也还有许多红军部队，包括一些伤病老弱的同志还在途中跋涉。诗人遥望南天，当时具体想了些什么，我们固不可得知，但我们联

想起古代鸿雁传书的故事，忖度诗人此时此境的无限深情，说他希望群雁给南方人民传去红军长征胜利的喜讯，传去红军北上抗日的决心，传去他对南方人民的关切和慰问，从情理上是完全说得通的。像这样兴寄深远、兴味无穷的例子，在毛泽东诗词中可谓比比皆是。这也就是毛泽东诗词为什么诗味浓郁、诗趣横生的奥妙之一。

毛泽东除惯用比、兴手法外，有时也用赋法。像《如梦令·元旦》词：

宁化、清流、归化，路隘林深苔滑。今日向何方？直指武夷山下。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

除词末用了个明比外，通篇都是“敷陈其事而直言之”。按我的理解：“敷陈其事”意即多方面的描写和叙述。这种手法，也同样需要通过形象思维捕捉那最富特征的典型场景，把它集中、概括起来，以表达诗人对生活的深切感受。《如梦令·元旦》只用了三个跳动的地名——宁化、清流、归化，交代这次行军的线路；用了三个并列的主谓结构短语——路隘、林深、苔滑，描绘了途中的典型场景；接着便急转直下，点明了进军的方向和目的地——武夷山下；然后融情入景，以极富诗意的画面，淋漓尽致地抒发了革命豪情的胜利信心。这样，就把红四军广大指战员在古田会议精神的鼓舞下，不畏艰苦，不惧险阻，高举红旗向前挺进的英雄气概和崭新面貌生动地刻划出来了。这有似一幅壮丽的行军图，展现在我们眼前，有似一支雄强的进行曲，嘹亮于我们耳际。因此，有的人认为赋体只须直说，毋须形象思维，也无诗味，那是大大的误解。

赋、比、兴三者，在诗歌创作中是不可偏废的。晋挚虞《文章流别论》说：“赋者，敷陈之称也。比者，喻类之言也。兴者，有感之辞也。”它们各有各的用处。用比、兴，固往往能引人入胜，给读者以无穷的联想和寻味的余地；但赋体用得好的，也能“体物写志”（《文心雕龙·诠赋》），极尽其巧；有时且直抒胸臆，以典型的感受感染读者。如宋代大诗人陆游的《示儿》：“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通篇都用赋体而感人至深，即是一证。

钟嵘《诗品·序》说：“若专用比、兴，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蹶；但若用赋体，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蔓之累矣。”像李商隐的某些诗，“为芳草以怨王孙，借美人以喻君子”（14），意则深矣，但有时就未免流于晦涩。而宋代许多诗人，一反唐人规律，“尚理而病于意兴”（15），不注重形象思维，其尤甚者，更以语录入诗，自然味同嚼蜡了。毛泽东有鉴于此，指出“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赋也可以用”，正是对古今诗歌进行了全面考察然后作出的科学结论。而毛泽东诗词在使用赋、比、兴等形象化的手法方面，为我们作出了光辉典范。

诗人写诗，往往把赋、比、兴三种手法交叉使用。有些赋中兼有比、兴；有些比中有兴，兴中有比，兴或类比，比或类兴。在这点上，姚际恒说得对：“分兴为二，一曰‘兴而比也’，一曰‘兴也’。……如是，使比非全比，兴非全兴，兴或类比，比或类兴者，增其一途，则兴、比可以无淆乱矣。”“其比亦有二，有一篇一章纯比者，有先言比物而下言所比之事者，亦分之，一曰‘比也’，一曰‘比而赋也’。”（16）实际上，又何只比、兴各分二种；细分之，亦当有“赋而比也”、“赋而兴也”、“比而兴也”、“兴而

赋也”之目。毛泽东诗词中也常出现这种情况。郭沫若在谈及《七律·到韶山》的“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等诗句时，就认为“前者是象征性的手法，所谓‘比而赋’也。”⁽¹⁷⁾这样，我们也可以回答前面已提到的问题：《十六字令三首》的二、三两首，是“比而兴”也；《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是“兴而赋”也，但其中亦有比（像“枯木朽株”、“飞将军自重霄入”、“横扫千军如卷席”都是比语）。《如梦令·元旦》整首为赋体，而“风展红旗如画”一语却又兼用比、兴。由此可见，有些人把赋和比、兴完全对立起来，认为用比、兴的才是形象思维，用赋的就会味同嚼蜡，那是不符合毛泽东原意的。

又诗的解释往往因人而异。姚际恒说：“古今说诗者多不同，人各一义，则各为其兴、比、赋。”⁽¹⁸⁾同一首诗，有人作这样理解认为是赋，有人作那样理解认为是比或是兴，是常见的事。像《沁园春·长沙》中“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两句，有人认为是“象征当时蓬勃发展的工农运动和大好的革命形势”，有人又反对作此猜测。因此是兴是赋，众说不一。这样是否意味着真如董仲舒所说“诗无达诂”了呢？那也不对。毛泽东曾指出：诗有达诂，达即通达，诂即确凿。我们要准确地领会毛泽东诗词的思想和艺术，就必须充分注意“通达”和“确凿”这两条。

总之，毛泽东在诗歌理论上和创作实践上都为我们留下了极丰富、极宝贵的遗产。让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引下，更好地继承这一优秀遗产，为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的新诗、创造出无愧于我们伟大的时代和人民的作品而不懈努力！

毛泽东诗词将作为我们用形象思维方法写诗的光辉典范。

（作者单位：福建省社会科学院）

注释

此词写作地点，曾有种种说法。上杭县革命纪念馆的工作人员根据多方面的调查材料推断，此词应作于上杭县城关临江楼。“寥廓江天万里霜”，即临江楼上所见实景。临江楼对岸为南冈，据说当年枫树很多，秋来枫叶变红，风光大好。

参阅郭化若：《红军从游击战到运动战的伟大战略转变——毛主席伟大革命实践回忆之一》，载《历史研究》1977年第5期。

周世钊：《对长沙市中学语文教师作的辅导报告》（1971年11月27日）。

见《人民日报》1978年3月23日。

转引自成都日报社编《毛主席诗词注释、参考资料》（1968年）。

见《诗刊》1962年第3期。

见文物出版社：《文物特刊》第24号（1977年1月31日）。

鬼唱歌：指瘟神得意洋洋地唱歌。

周世钊：《伟大的革命号角，光辉的艺术典范——读毛主席诗词十首的体会》，载《湖南文学》1964年7月号。

见高尔基《苏联的文学》，曹葆华译。引自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北京版高尔基著《论文学》第124页。

（11）陆机：《文赋》。

（12）刘勰：《文心雕龙·物色》。

（13）毛泽东诗词中，凡称“风×”的词，除指自然物的如“风云”、

“风烟”、“风雨”等外，绝大多数是褒义词，如“风华”

“风光”、“风景”、“风雷”、“风流”、“风骚”等等。由于《风》和《骚》历来被看作是中国古代诗歌的典范，因此冠“风”字的词用来指社会事物的大都含有美好的意思。

(14) 李商隐：《谢河东公和诗启》。

(15) 严羽：《沧浪诗话·诗评九》。

(16) (18) 姚际恒：《诗经通论·诗经论旨》。

(17) 郭沫若：《“芙蓉国里尽朝晖”》，载《人民日报》1963年

毛泽东历史观的若干问题浅探

李侃

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铜铁炉中翻火焰，为问何时猜得？不过几千寒热。人世相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

一篇读罢头飞雪，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五帝三王神圣事，骗了天涯过客。有多少风流人物，盗跖庄^周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歌未竟，东方白。

（毛泽东：《贺新郎·读史》）

这首词不但形象地概括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而且鲜明地表现了作者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古往今来，咏史的诗词之作可谓多矣，然而能象毛泽东这样，把人类社会几千年的变迁发展，运用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加以科学地概括和形象地描绘，可谓绝无仅有。称得起是千古的乐章、咏史的绝唱，生动地体现了这位革命伟人科学历史观和诗的语言艺术完美的统一。现在，就从这首词里得到的启示，简略而粗浅地谈谈毛泽东历史观的若干问题。

（一）

大凡读过毛泽东的著作，对毛泽东思想有所了解的人，都会有一个很深的感受，这就是他在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中，那种对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深厚的修养，广博的知识和真知灼见；对历史辩证法的尊重和对历史经验的运用自如，高度体现了理论、历史和现状的统一。从而切身体会到：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杰出的领袖毛泽东，真正是中国人民的毛泽东，是中华民族和中国历史的上光耀千秋的毛泽东。

说到毛泽东的历史观，这是和毛泽东一生的思想经历和革命经历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从青少年时代开始，他一生献身革命，一生酷爱历史。但是他从来不是为历史而历史，总是把历史作为认识中国国情的一个重要方面，把历史与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把历史与革命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

世界上没有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天生的革命伟人，没有天生的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毛泽东也不例外。一般地说，毛泽东一生的革命政治生涯，同辛亥革命以后许多爱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一样，经历了由爱国到革命，由非马克思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由唯心主义者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者转变过程。

在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以前青少年时代的毛泽东，是一位胸怀大志、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爱国者，同时又曾是深受传统儒学思想和某些资产阶级理论学说影响的唯心主义者。他读过很多中国古代的文化典籍，特别是有关中国历史和中国哲学的书籍，也读过曾国藩、康有为、梁启超等近代人物的一些著作和言论，以及一些外国学者的哲学和历史著作。他具有炽烈的爱国热忱，深沉的忧患意识，强烈的求知渴望，不倦的探索精神。但是，怎样才能挽救中国的危亡，中国究竟要走什么样的道路？对于这样的重大问题，他虽然竭尽心力，上下求索，然而，在当时湖南所处的具体条件下，却找不出明确的答案。对于中国历史，在开始的时候，他所读的史书还不外是《左传》、《史记》、《通鉴类纂》、《御批通鉴辑览》和稍后阅读的《读史方

舆纪要》、《资治通鉴》等等。他从这些历史古籍中不但得到了相当丰富的历史知识，对历史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同时也为后来更广博、更深刻地了解中国历史和借鉴历史经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稍后，由于受到梁启超史学思想的影响，他的历史观发生了由儒家的传统史观向着资产阶级的进化史观的转变。然而直到毛泽东成为坚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以前，他仍然是一个历史唯心主义者。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五四运动的洗礼，使得如饥似渴地追求救国救民真理的毛泽东的政治信仰和世界观发生了重大的、甚至根本的转变。在 1918 年和 1919 年这两年，毛泽东在北京、上海接触到李大钊、陈独秀、张国焘等人，并且深受陈独秀的思想影响。在回长沙以后，又创办了有名的革命刊物《湘江评论》。他回顾自己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情形时说“1920 年冬，我第一次在政治上组织工人，并开始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历史的影响来指导。我第二次赴京期间，读了很多有关俄国情况的报导，并热心地搜寻当时为数不多的有关共产主义的中文文献。有三本书对我的影响尤其深刻，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仰，一旦接受了它，把它视为对历史的正确阐释，我就再也没有动摇。这三本书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第一本译成中文的马克思著作；考茨基的《阶级斗争》；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到 1920 年夏天，我在理论上和一定程度的行动上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把毛泽东与斯诺的这段谈话与 1920 年 12 月他在给蔡和森等的通信中，明确表示同意蔡和森“对于中国的改造，以为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与方法。……先要组织共产党，因为它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的主张，和他与何叔衡等在长沙建立共产主义小组的思想行动相印证，完全可以判定，到 1920 年，毛泽东不但在思想理论和政治信仰上，而且在行动上，已经成为坚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并且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世界观的转变是根本的转变。一般地说，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当然，这并不是说一个人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可以在一个早上，一下子就“顿悟”形成；也不是说，一个人的世界观一经转变，他的历史观也就如影随形般地立刻跟着彻底改变。这种转变不但需要有一个认识过程，更需要有一个社会实践过程。毛泽东从幼年时代和早期崇尚孔、孟、程、朱的儒家学说；服膺顾炎武的“经世致用”之学；推崇曾国藩倡导的读书、做人、居官、行军“八本”；梁启超的“新民”学说和史学思想以及同意无政府主义的主张，到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从历史唯心主义者到成为一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者，是经过了一个相当长期的探索过程、认识过程和社会实践过程的。那末，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毛泽东、历史唯物主义者毛泽东，和早期历史唯心主义者的毛泽东，在历史观上，有些什么转变呢？

（二）

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还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解释历史，还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解释历史；是人们的思想观念决定历史的变动、推动历史前进；还是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以及反映这种矛盾的阶级斗争决定历史的变动、推动历史的前进；

是圣贤豪杰、英雄人物创造历史，还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对以往人类历史上所创造的文化遗产，是完全否定、全盘继承，还是尊重历史辩证法的发展，加以科学的总结和批判的继承。这些都是历史唯心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分歧。而只有在马克思、恩格斯发现了历史唯物主义之后，历史才变为科学。正是在这些基本问题上，随着毛泽东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的确立，他的历史观也发生了由唯心史观到唯物史观的转变。而这种转变不单是从理论原则和抽象概念上的转变，而且是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历史实际结合上的转变。在中国革命的实践过程中，毛泽东以高度的创造精神，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把历史和现实的斗争，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为正确地指导中国革命，指导历史科学的发展，提供了锐利的思想理论武器。这里，就毛泽东历史观的转变问题，作些简略的叙述和初步的探讨。

首先，什么是历史的主宰力量，什么是主宰宇宙和人类社会的真理。这是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殚精竭虑、孜孜以求的课题。他曾经赞佩过、敬仰过中国的“往圣先哲”和历代的英雄豪杰；探究过历史上历代王朝的盛衰兴亡。历史上的“往圣先哲”，虽然各自都有“立德”、“立功”和“立言”的所谓“三不朽”，但是在当时的毛泽东看来，许多英雄豪杰大都未能解决和回答人类社会的“大本大源”问题。他赞同泡尔生在《伦理学原理》中说的“全世界文明历史之生活，乃皆观念之所辖也”的论点，并且在批注中写道：“观念造成文明，诚然，诚然。”他还对曾国藩《圣哲画相记》中的32位“圣哲”作了“办事之人”和“传教之人”的区分，认为诸葛亮、范仲淹等属于“办事之人”；孔子、孟子、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等属于“传教之人”。从而又引伸到近代的曾国藩和左宗棠，认为左宗棠属于“办事之人”，而曾国藩则是“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也。”“传教之人”的成就重在“立德”、“立言”；办事之人”的成就重在“立功”；前者重在“内圣”；后者重要“外王”。前者与后者比起来更着重于“探求宇宙之大本大源”。由古人而推及对当时袁世凯、孙中山、康有为的评论。他说：“孙、袁吾不论，独康有为似略有本源。然细观之，其本源究不能指其实在何处，徒为华言炫听，并无一干树立、枝叶扶疏之妙。愚意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可见早年的毛泽东要努力寻求一种能主宰宇宙、决定历史、指导人生的“大本大源”的理论学说，也可以说是寻求一种永恒的、绝对的真理。然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寻来探去，仍然只能从朱、陆、王等宋明理学和心学，特别是从谭嗣同《仁学》的心力说等唯心主义哲学那里找到根源。他得到的一个结论是：“予谓人类只有精神生活，无肉体生活。试观精神时有变化，肉体则万年无变化可以知也。”这里的“肉体”，也就是指物质，变化的精神，支配不变的肉体（物质）。在毛泽东早期的文字中，类似的思想言论还有许多。显然，他认为是意识决定存在，精神决定物质，是作为人类社会和宇宙“大本大源”的“心力”决定历史。

毛泽东成为坚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以后，他早年的这种唯心主义的历史观，也随着开始向历史唯物主义转变，这时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视为对历史的正确阐释”。由于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作为党的创始人和重要的革命活动家之一的毛泽东全身心地投入革命的斗争实践，并且创造性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杰出的领袖。他的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不但体现在指导中国革命的理论与实践

践之中，也体现在他的大量著作之中。不过他再也没有时间和条件去专门阐述历史问题和专门撰写历史著作。对存在和意识，精神和物质，认识和实践的关系问题，他的唯物主义历史观表现得最透彻的是《实践论》。他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人的认识，主要地依赖于物质的生产活动，逐渐地了解自然的现象、自然的性质、自然的规律性、人和自然的关系；而且经过生产活动，也在各种不同程度上逐渐地认识了人和人的一定的相互关系。”“人的社会实践，不限于生产活动一种形式，还有许多其他的形式，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的活动，总之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都是社会的人所参加的。因此，人的认识，在物质生活以外，还从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中（与物质生活密切联系），在各种不同程度上，知道人和人的各种关系。其中，尤以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给予人的认识发展以深刻的影响。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大家对于社会的历史只能限于片面的了解，这一方面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偏见经常歪曲社会的历史，另一方面，则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人们能够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全面的的了解，把对于社会的认识变成了科学，这只是到了伴随巨大生产力——大工业而出现近代无产阶级的时候，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在这篇光辉的理论著作中，毛泽东还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在《实践论》以前，1930年5月，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毛泽东就已经明确指出：“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这就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彻底抛弃了早年的对所谓“心力”是决定宇宙和社会历史的“大本大源”的唯心史观。他的一系列理论著作都闪耀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光辉。而作为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为理论指导阐述中国近代史奠基性的著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更是把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近代历史实际相结合的典范。

其次，是圣贤哲人、英雄豪杰创造历史，还是人民创造历史。这不但是历史唯心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重大分歧，而且是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问题。早年的毛泽东由于深受传统儒学思想的影响，稍后又受到梁启超史学思想的影响，他十分景仰中国的“古圣先贤”和英雄豪杰，特别是对那些以儒家“道统”的继承者而闻名于世的所谓“传教之人”，更是推崇备至而心向往之。他相信社会的人们有“上智下愚”和“贤不肖”之分；有“君子”和“小人”之别。认为“圣人，既得大本者也；贤人，略得大本者也；愚人，不得大本者也。圣人通达天地，明贯过去现在未来，洞悉三界现象，如孔子之‘百世可知’，孟子之‘圣人复起，不易吾言’。孔孟对答弟子之问，后觉不能理，愚者或震之为神奇。不知并无谬巧，惟在得一大本而已。”而只有得到这种“大本大源”的圣贤，才能“使此愚人而归于智”。因此，早年的毛泽东就立志修身，要做一个通晓“大本大源”的“圣哲”和悲天悯人的“君子”。他说：“小人累君子，君子当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而对那些“可悯”的“小人”，“君子”“若以慈悲为心，则此小人者、吾同胞也，

吾宇宙一体也，吾等独去，则彼将益即于沉沦，自宜为一援手，开其智而蓄其德，与之共跻于圣域”，“立德、立功、立言以尽力斯世者，吾人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也。”^{（11）}很明显，在早年毛泽东的心目中，劳动群众只是愚昧可怜的芸芸众生，需要“圣哲”、“君子”去开化教导、解悬援溺，共享太平盛世之福和大同之乐。他很赞赏张载说的“为天地立心（志），为生民立道、为往（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认为张载的“为生民立道”是“相生相养相维相治之道也”；“为万世开太平”是“大宗教家之心志事业也。”^{（12）}

由于毛泽东受到梁启超“新史学”思想的影响，他在强调“圣哲”、“君子”决定历史、创造历史的同时，也对历史发展变迁的轨迹和历史与现实的关系，进行了新的探索。他认为“历史者，观往迹制今宜者也，公理公例之求为急。一朝伟人为一朝代之代表，将其前后当身之迹，一一求之至彻，于是而观一代，皆此代表人之附属品矣。观中国史，当注意四裔，后观亚洲史乃有根；观西洋史，当注意中西之比较，取于外乃足以资于内也。地理者，空间之问题也，历史及百科，莫不根此。”^{（13）}探求历史发展的“公理公例”，注意中外历史的比较研究，注意地理和自然、人文环境，这表明毛泽东的历史视野已大为开扩，不过这时他仍然认为，在“有数千年之历史，民智污塞，开通为难”的中国，只从政治、军事、法律、实业、教育改革等“枝节入手”，仍然不能解决问题，要想从根本上改造中国，振兴中国，挽救“苍生”，共享幸福，还需要“有大本大源”，以动“天下之心”。而他认为曾国藩就是颇得“大本大源”之人，并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14）}以救国救民为职志的毛泽东，满怀激情和信心地呼喊：“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故愚以为，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如此大纛一张，万夫走集；雷电一震，阴翳皆开，则沛乎不可御矣！”^{（15）}凡此都足以说明，早期的毛泽东虽然立下了改造中国、拯救中国宏愿伟志，但是直到五四运动以前，他并没有找到一条正确的途径，而且在历史观上也并没有脱出“圣哲”、“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的藩篱。

20 世纪初的 20 年间特别从 1914 年到 1920 年这 5、6 年中，中国和世界都处在激烈的动荡和剧变之中。在中国不但有北洋军阀的肆虐、割据和混战，而且发生过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发生过“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发生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在世界，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了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在这几年中，中国的思想界也空前活跃，各种政治主张，各种社会思潮，纷纷涌现。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在中国传播。并且很快就与中国的工人运动结合起来，随即产生了中国共产党。开始了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这时受过五四运动洗礼的毛泽东，毅然抛弃了从前种种不切实际的政治主张，改变了自己旧的思想观念，勇敢地站在时代潮流的前面，把拯救中国、改造中国的希望，从“圣哲”和英雄豪杰的身上移开，移到了“世界革命”、“人类解放”和人民大众身上。1919 年 7 月 14 日他在《湘江评论》的创刊宣言中，大声疾呼：“自‘世界革命’的呼声大唱，‘人类解放’的运动的猛进，从前吾人所不置疑的问题，所不遽取的方法，多所畏缩的说话，于今都要一改旧观，不疑者疑，不取者取，多畏缩者

不畏缩了。”“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¹⁶⁾这时的毛泽东虽然还是一个急进的民主主义者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主张要把“少数阶级专制的黑暗社会，变为全体人民自由发展的光明社会”，对于宗教的、文学的、政治的、社会的、教育的、经济的、思想的、国际的种种“强权”，“都要借平民主义的高呼，将他打倒”⁽¹⁷⁾。这种急进的民主革命思想，相信“民众联合”巨大力量的思想，与两年以前相信“圣哲”以“大本大源”、英雄豪杰以超人的事功济世救民、主宰社会历史的思想，简直判若天渊。如果说，《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所表现的急进民主主义的毛泽东，从历史观上还是比较抽象地扬弃了圣贤英雄创造历史的思想，那末，几天之后他写的长篇政论《民众的大联合》，就更为明确地表现了对“民众联合”的信念和对进步与反动、革命与反革命两种势力“联合”的对立所采取的立场。他说：“我们竖看历史，历史上的运动不论是哪一种，无不是出于一些人的联合。”“历来宗教的改革和反抗，学术的改革和反抗，政治的改革和反抗，两必都有其大联合。胜负所分，则看他们联合的坚脆，和为这种联合基础主义的新旧真妄为断。”又说：“古来各种联合，以强权者的联合，贵族的联合，资本家的联合为多。……到了近世，强权者，贵族，资本家的联合到了极点，因之国家也坏到了极点，人类也苦到了极点，社会也黑暗到了极点。于是乎起了改革，起了反抗。于是乎有民众的大联合。”他主张农夫、工人、学生、女子、小学教师、警察、车夫，各色人等“组成切于他们利害的小联合”，“许多的小联合彼此间利益有共同之点，故可以立为大联合”。在这篇文章的最后，毛泽东满怀信心地预言：“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愈深，反动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我敢说一句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¹⁸⁾从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毛泽东把改造中国的希望和力量，完全寄托在民众身上，他自己的政治立场也鲜明地站在人民大众方面。而且他认为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没有真正的“民众的联合”，“与我们民众的大多数，毫没关系。”与此同时，他热情地赞扬了“俄罗斯打倒贵族，驱逐富人，劳农两界合立了委办政府”的十月革命和中国的五四运动。这时，毛泽东的世界观虽然还没有完成到马克思主义的彻底转变。但是距马克思主义已经不远，选择马克思主义已经是必定无疑的了。在历史观上，再也看不见崇尚“圣哲”和“英雄创造历史”的观念了。

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之后的毛泽东，不但在政治思想理论上和社会实践上，发生了从急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质的转变，而且从历史观上也发生了从历史唯心主义向历史唯物主义质的转变。从此，在毛泽东毕生的伟大革命理论和伟大革命的实践中，始终贯彻了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才是真正的英雄，全心全意依靠人民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表现了一个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者的科学历史观。

1926年在毛泽东写的著名文献《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他在具体分析、论证“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革命的根本问题时，明确指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

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¹⁹⁾以后不久，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更加深刻具体地论证了农民在革命斗争中的作用和力量，明确指出：“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是贫农”、“乡村人口中贫农占百分之七十”，“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²⁰⁾1914年3、4月间，他在《农村调查》的序言中说“这些干部、农民、秀才、狱吏、商人和钱粮师爷，就是我的可敬爱的先生，我给他们当学生是必须恭谨勤劳和采取同志态度的”，“必须明白，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²¹⁾

作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者，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伟大实践中，越来越明确地认识到，必须坚持依靠人民群众、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和智慧，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并且倡导和创造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去、一刻也不脱离群众的优良作风和工作方法。这种思想观点贯穿在他整个革命实践和他的全部著作之中，成为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和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正是基于理论认识 and 实践经验相结合，他提出了一个十分明确而重要的结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²²⁾这里必须说明，在毛泽东提出人民创造历史这个历史唯物主义命题的时候，他并没有抹煞和否定英雄豪杰、杰出人物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这在他的许多著作和讲话中，在总结和运用历史的经验教训中，特别是关于对待历史文化遗产的科学态度中，都有明确的论述。而且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有不同的含义。对此，不应该作片面的绝对的理解。

第三，马克思主义认为：“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确切地说，自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²³⁾。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这个历史观点，在19、20世纪的西方，并不陌生，而在中国则是前所未闻的历史理论学说。尽管中国古代的历史著作浩如烟海，杰出的历史学家历代辈出，然而直到马克思主义传入以前，从来没有一位历史学家发现过和提出过这一历史发展的原理。这当然怪不得中国古代和近代的史学大师，因为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和社会历史条件，还没有可能为这种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产生提供可能的条件。在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和学者当中，对于封建时代豪强地主兼并土地、残酷盘剥农民所造成的社会贫富悬殊，乃至官逼民反，危及封建王朝统治的言论，屡见不鲜；提出缓和地主阶级和农民之间尖锐矛盾的议论和方案，也比比皆是。诸如主张轻徭薄赋、休养生息、舒解民困，甚至限田、均田以及“大同”思想等等。但从未有人提出过由于封建土地所有制造成了阶级剥削和阶级对立，也没有人提出过农民反抗封建剥削、压迫的起义和战争是阶级斗争激化的产物。早年的毛泽东，虽然怀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豪情壮志，但是他当时还不懂得阶级斗争，而是一个深受传统儒学思想和近代改良主义思想影响的“济世救民”论者。他虽然也对传统封建的伦理观念和剥削阶级的统治者表示强烈反对，认为“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而教会、资本家、君主、国家四者，同为天下之恶魔也。”⁽²⁴⁾但是他仍然把中国的贫弱落后归结为中国“愚人”太多，“缺乏高尚之智德”所致。因此，他特别强调“倡学”和“普及哲学”、“改造伦理学”，也就是主张从教育入手，开启民智，增强民德，端正“人心”，从这些“大本大源”上挽救和

振兴中国，而不赞成暴力革命。1916年7月他在致萧子昇的信中写道：“杀机一起，报复未已，法兰西之祸，最为可惧”^{（25）}。直到1919年7月他写的《湘江评论》创刊宣言，虽然提出要把“由少数阶级专制的黑暗社会，变为全体人民自由发展的光明社会”，高呼打倒各种强权，但是对于“打倒强权的方法”，他仍然认为在“急烈的”与“温和的”两种方法的选择中，“（一）我们承认强权者都是人，都是我们的同类。滥用强权，是他们不自觉的误谬与不幸，是旧社会旧思想传染他们遗害他们。（二）用强权打倒强权，结果仍然得到强权。不但自相矛盾，并且毫无效力。”^{（26）}毛泽东的思想和实践进程表明，直到他在1920年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前，他还不是一个阶级斗争论者，当然也不会把人类社会有阶级以来的历史看做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时隔半年，1921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中，他就果断地抛弃了改良的办法，而主张用“改造”即革命的办法改造中国和世界，并明确提出：“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27）}这时，共产主义者的毛泽东，在事实的教育下，经过深刻的思考，不但接受和赞成阶级斗争的学说，而且赞成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毛泽东世界观和政治思想的一大飞跃。同时也是从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向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飞跃。同年1月21日他在致蔡和森的一另封信中说：“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不象唯理观之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动摇。”^{（28）}树立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并投身于为新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实践中去的毛泽东，开始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观察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他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以及其他大量的著作，都鲜明地体现了这种科学的观点和方法。他把中国历史，看做是一部充满着活生生的阶级斗争的历史，对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伟大作用，给予高度和历史估价，指出“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29）}毛泽东在高度评价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时候，并没有把这种起义和战争绝对化、理想化，只是从阶级斗争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角度，肯定了它的历史作用。后来，在1958年12月，毛泽东在向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到会同志推荐《三国志·魏书·张鲁传》的时候，对历史上农民战争的性质又一次作了较为全面的科学评论，他说：“历代都有大小规模不同的众多的农民革命斗争，其性质当然与现在马克思主义革命根本不相同，但有相同的一点，就是极端贫苦农民广大阶层梦想平等、自由，摆脱贫困，丰衣足食。在一方面带有资产阶级急进民主派的性质。另一方面则带有原始社会主义的性质，表现在互助关系上。第三方面，带有封建性质，表现在小农的私有制、上层建筑的封建制——从天公将军张角到天王洪秀全。……（这种农民革命斗争）带有不自觉的原始社会主义色彩这一点，就最贫苦的群众来说，而不是就他们的领袖们来说，则是可能确定的。”^{（30）}这就既肯定了农民战争的历史进步作用，也指出了它历史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毛泽东作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不论在指导中国革命的理论、政策和策略上，在斗争的实践中，始终坚持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因为这是符合社会历史发展规

律和客观实际的观点和方法。毛泽东很少专门讲述历史理论问题，更没有去专门撰述历史唯物主义的教科书，他在谈到历史观点和历史理论的时候，往往是用非常简洁的语言，概括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例如，他在讲到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根本区别时，曾这样说过：“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31）}又说：“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我们是反对历史唯心论的历史唯物论者。”^{（32）}我们在理解毛泽东的历史唯物主义和他运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观察历史和观察社会的时候，需要从他的全部思想理论体系中，从他指导革命的实践中去理解，而不能从个别词句中去理解。更不能把历史研究过程中曾经发生过的简单化和公式化的弊病，归结为毛泽东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概括表述。

（三）

把中国的社会现状、中国的历史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把总结历史的经验与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对待历史文化遗产，这是构成毛泽东思想和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毛泽东思想的中国特色和中国气魄的生动体现。

毛泽东在与党内各种错误倾向，特别是在反对“左”的教条主义的斗争中，反复强调要学习和了解中国的社会实际和历史实际。他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的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又说：“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33）}这就从理论与实践结合上，从历史和现实的关系上，从指导革命斗争的高度上，强调了尊重历史、学习历史、正确地对待历史的重要性。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在中国近现代革命的历史上及其领袖人物中，还没有第二个人能象毛泽东这样，把重视历史、科学地对待历史，作过如此深刻、如此精辟的论断。正是在毛泽东的批评和提议之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历史，特别是研究中国近百年史的工作，才有了明显的开展，而且出现了一些开创性的研究成果。

毛泽东另一个重要理论贡献和历史贡献，就是科学地辩证地对待和处理历史文化遗产的问题。怎样对待历史文化遗产，或者说怎样对待传统文化，这是自清末“西学东渐”以来，特别是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思想理论界和学术文化界所面临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新学”与“旧学”之争，“西学”与“中学”之争，“全盘西化”与“本位文化”之争，长期辩论，争论不休，各执一说，莫衷一是。对传统文化，即“中学”和“旧学”

启幼有过深厚修养，对“西学”和“新学”也多方涉猎，而又受过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洗礼，成为坚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中国共产党最杰出领导者的毛泽东，在这个重要的历史和现实问题上，在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这个重大问题上，以他的高瞻远瞩和真知灼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阐明了基本原则和科学态度。

毛泽东在回顾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找真理的过程时写道：“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学了这些新学的人们，在很长的时期内产生了一种信心，认为这些东西很可以救中国，除了旧学派，新学派自己表示怀疑的很少。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34）}然而学习西方和“西学”的结果，并没有阻止帝国主义的侵略，更没有使中国富强，到了辛亥革命时期，有些学者例如“国粹派”的一些人们，虽然不反对学习西方文化，但是认为必须保存中国传统文化的固有精神，即所谓“国粹”。但是究竟什么是“国粹”，怎样对待“国粹”，并没有做出科学的回答。而到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尊孔读经、怀旧复古的文化逆流一度泛滥。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为代表的一批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以《青年杂志》（1915年9月创刊，从1916年9月改为《新青年》）为阵地，向封建的旧文化、旧礼教、旧思想发动了猛烈的攻击，并且把矛头直指封建时代被奉为“大成至圣先师”的孔子。从而展开了一场空前激烈和空前广泛的新旧思想文化论战。毛泽东评价这次运动“是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又是反封建的运动。”^{（35）}但在高度肯定五四运动的同时，也指出了它的缺点，指出：“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他们反对旧八股、旧教条，主张科学和民主，是很对的。但是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的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的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这种形式主义地看问题方法，就影响了后来这个运动的发展。”^{（36）}

毛泽东领导的伟大革命，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彻底推翻了一个旧世界，开创了一个新世界。然而他从来没有轻视过、否定过中国的历史和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可以说，他比任何一位马克思主义都熟谙地了解中国历史，深刻地认识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而这种了解和认识，又是建立在广博深厚的历史文化素养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基础之上的。对于如何对待历史文化遗产，他指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对于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主要地不是要引导他们向后看，而是要引导他们向前看。”^{（37）}这段话对当前关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关系的讨论和研究，还具有现实的重要指导意义。传统文化与现代或当代文化的关系，对传统文化的总体估价和对现代或当代文化的趋势和走向，是一个内容丰富、范围广泛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完全可以用毛泽东倡导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进行民主的、自由的研究和探讨。不过，不论怎样的新说高论，如果离开了或背离了毛泽东所阐明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和科学方法，都可能误入歧途。在这个问题上，

说来说去，无非是要反对和克服两种片面性：一种是历史的虚无主义和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把中国传统文化看得漆黑一团，一无是处，完全否定，彻底抹煞；另一种是凡古皆好，把传统文化看得是通体光明、永恒不衰的文化复古主义。而这两种历史观和文化观，直到现在，也不能说已经完全绝迹。只不过是另一种形式、另一种姿态，或隐或显地表现出来而已。毛泽东对有关这个问题的基本原则、基本方法，并没有过时，而且仍然是我们观察、判断和指导这个问题的锐利的科学武器。

毛泽东不止一次地说过：“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这话也适用于毛泽东自己，适用于包括毛泽东本人在内的历史观和方法论。毛泽东既不是“生而知之”的天生“圣哲”，或是作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历史观和对历史问题的论断也不可能完全正确、句句正确、一贯正确。如果我们把以往一段时间内经过人造而神化的毛泽东，从“神坛”上移到人间，放到一定的社会时代和历史条件去考察、分析，那末他的伟大和平凡、正确和失误，都是可以理解的。就毛泽东历史观和对某些历史的思想言论来说，我曾在一篇短文中做过简短的说明，现在移用在这里：“在毛泽东的晚年，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历史科学曾一度陷入了极端的形而上学和历史实用主义的泥潭，这不能不说是与毛泽东的有些说法，违背了他自己本来的科学历史观和方法论有关的。诸如他曾支持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和李秀成的批判，以及‘评法批儒’的某些言论，都明显地离开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且被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制造了令人痛心的历史悲剧。这也许是毛泽东自己所始料不及的。然而在历史领域这些一时的失误，并不能掩盖毛泽东在整个历史科学上的光辉。可以这样说，迄今为止，在中国还未见过哪一位革命领袖，能够像毛泽东那样深刻地、科学地洞察中国的历史，留下了如此珍贵的历史科学遗产。”⁽³⁸⁾现在，姑且就用这段话，做这篇粗浅文章的结束语吧！

（作者单位：中华书局）

注释

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07 页，第 116 页。

参见汪澍白《毛泽东早期历史观》及收入此文的《毛泽东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一书中的其他有关文章，厦门大学出版社，1987 年版。

（28）《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4—8 页，第 15 页。

参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18—25 页《致萧子昇信》；第 84—89 页《致黎锦熙信》及《（伦理学原理）批注》和《讲堂录》、《红星照耀中国》等。

（11）（12）（13）（14）（15）（16）（17）（18）（24）（25）（26）《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168 页，第 591 页，第 85 页，第 168 页，第 87 页，第 89 页，第 591 页，第 22 页，第 85 页，第 85—86 页，第 292 页，第 293 页，第 338、339、377、393、394 页，第 152 页，第 50 页，第 293 页。

（19）（20）（27）《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 10 页，第 20、21 页，第 3 页。（21）《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 466、467 页。（22）（36）《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3 卷，第 1031 页，第 831—832 页。（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250—251 页。（29）（33）（35）（37）《毛泽东选

集》第2版第2卷，第625页，第533—534页，第699页，第707—708页。

（30）转引自张贻玖著《毛泽东批注历史人物》第142页，鹭江出版社1993年4月出版。

（31）（32）（34）《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87页，第1515页，第1470页。

（37）见作者为张贻玖《毛泽东批注历史人物》所写的序言。

论毛泽东的史学理论贡献与实践运用

胡国枢

毛泽东与中国史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对中国历史的熟悉，得心应手运用之妙，对史学理论贡献之大，都是世所罕见的。渊博的历史知识，敏锐的历史洞察力，使他成为站在时代前列有雄才大略的伟人。人们称颂“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

其实，他又是卓越的历史学家。从他身上，可以看到尊重历史、学习历史的重要。恩格斯曾经说过：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比任何一个哲学学派，甚至比黑格尔，都更重视历史。”毛泽东正是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历史就是他的一切。他的科学的历史观，是毛泽东思想的不可分割的部分与基石。他的史学理论对引导中国走出近代历史低谷，起了重大作用。

一、毛泽东孜孜不倦地阅读史书，伴随着他的一生，和他的革命生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毛泽东从青少年时期起，就养成了读史与思考的良好习惯。“《隋唐》、《三国》、《精忠传》、《水浒传》、《西游记》”等中国历史小说，培养起他最早的史学兴趣，对他“影响很大”。读中学、师范时，他就读过《左传》、《史记》等许多历史典籍，对中国历史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来，他回忆说：“中国古代帝王尧、舜、秦皇、汉武的事迹，使我向往，我读了许多关于他们的书。”他也学习西方的历史，“我将诗、传奇、古希腊的故事和有关俄国、美国、英国、法国及其他国家历史和地理的严肃学习结合起来”，对世界著名人物如拿破仑、彼得大帝、卢梭、孟德斯鸠、林肯等，也很熟悉。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列强环列，蚕食鲸吞，亡国灭种，危在旦夕。他是怀着炽烈的爱国救亡思想与要求改变现状的迫切心态走向社会的，因此对古往今来中国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具有革新思想的人物推崇备至。开始，对康有为、梁启超十分崇拜；继则为孙中山的反清思想所吸引；1915年以后，毛泽东又受《新青年》的影响，热烈支持并参加新文化运动，这就为他接受马克思主义准备了思想与行动基础。更有决定意义的是他于1918年有幸进入北京大学，在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李大钊领导的北大图书馆工作，为他接受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1919年他第二次上北京，读到了《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史》、《阶级斗争》等著作，使他“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自此以后，他更自觉地“广收博览”，从经史子集到稗官野史，几乎无所不读。在井冈山时期，环境险恶，他仍如饥似渴地找书读；长征到陕北以后，他千方百计托人搜购历史书籍；新中国建立，他日理万机，更挤时间发奋读书，先后通读过《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纲鉴易知录》，还创览了各朝纪事本末。有目的、有计划的研究中国的历史与现状，从历史发展过程中认识中国，使他成为把历史科学作为理论武器的杰出的革命家。

毛泽东善于运用历史典故启发群众，有文可查记在《毛泽东选集》上的，即有中国历史事件300多起，世界历史事件40多起，中外历史人物一百余人，

因此他的讲话妙趣横生，百听不厌。他列举史实，总是那么得体，适合听者的接受水平，雅俗共赏，老少咸宜。不论多么深奥的哲理，经他比喻，就明白易懂，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不仅对一般人作宣传如此，对高级干部也常以史喻今，使人深受教益。如 50 年代末、60 年代初，正需各级干部提高领导水平以应付时艰，毛泽东不是泛泛说理，而给一些负责人念了成都武侯祠内一副对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这副对联作者是清代云南剑川白族人赵藩。上联讲诸葛亮平定南中，用“攻心”使孟获悦服，以此称赞诸葛亮是真正懂得用兵打仗而又不好战的军事家；下联用“审势”来说明孔明治蜀的指导思想，称赞他能审时度势制定宽严得宜的方针政策，以此提醒后来的执政者从中吸取教益。毛泽东古为今用启示干部，起了很好作用。“以史为鉴，可以明得失”，短短的一副历史对联，抵得上长长的一篇演说。毛泽东还善于借鉴先人的征战经验，丰富军事指挥艺术。对历史上许多有名战例如“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蜀吴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都了如指掌。他熟谙战国孙子、汉朝张良、三国诸葛亮⁽¹¹⁾等著名人物的高超谋略，结合实践运用自如。毛泽东远远高出他们之上，足智多谋用兵如神，成了能凭着“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的上面”的舞台，“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¹²⁾的军事家。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没有中国史学的熏陶，就不会有能对 20 世纪的中国举足轻重的毛泽东。正如在 30 年代已对毛泽东有所研究的斯诺说的：毛泽东对革命“绝对的自信”，“具有那种马克·吐温称之为据有四张王牌的基督徒那种镇静和自信”，并认为毛的王牌之一就是“他对中国和中国历史的渊博知识”⁽¹³⁾。

毛泽东爱读史书，成了他工作的必需，但他不是埋在故纸堆里不能自拔的人。他生长在中国近代历史的转折点，作为肩负改造中国、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奋斗的历史使命的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处在中国革命的旋涡中心，极其尖锐复杂的斗争之中。在这样的特定的环境里，为了寻求中华民族的出路，解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问题去了解中国国情，如他所说的“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与前天”⁽¹⁴⁾，而去研究历史，探索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与道路。这是他研究中国历史的出发点与目的，也是显著的特点。特定的条件虽然使他未能写出专门的历史巨著，而却对中国历史发展有精辟的见解，他对中国近现代史的发展规律的把握，以及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贡献，都有令人惊叹的成就。毛泽东著作从总体上、本质上说，就是一部丰富多采的历史巨著，关于中国人民现代革命史的光辉纪录。毛泽东因其饱学与特殊的政治地位，成为更具权威性的史学家。只有掌握这些特点，从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高度，才能正确理解毛泽东在历史科学上的成就与局限，及其对现实与后世的深远影响。

二、毛泽东为解决中国的革命问题而研究历史

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德国以前的几乎所有思想家“不是曲解人类史就是完全排除人类史”时，强调指出“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¹⁵⁾。李大钊在阐述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时也说：“横着去看人类，是社会；纵着去看人类，便是历史。历史是社会的变动”⁽¹⁶⁾，毛泽东把研究社会变动的历史科学提到世界观、认识论的高度，作为认识中国、改造中国、

推进中国革命的重要理论武器。他无论在了解国际、选择革命道路与制定斗争策略上，都得力于史学研究之功。对引导中国走出近代历史低谷起了积极作用。

一、毛泽东通过中华民族史的宏观研究，揭示了中国的历史也是走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道路，中华民族是一个刻苦耐劳、富有革命传统的民族，从而奠定了爱国主义、共产主义的深厚思想基础。

毛泽东在社会发展史与中华民族史的研究中，认清了历史发展规律与趋势，论证了马克思社会形态更替论的科学性，明确指出中国的历史也是走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的道路：“中华民族的发展（这里说的主要是指汉族的发展），和世界上别的许多民族同样，曾经经过了若干万年的无阶级的原始公社的生活。而从原始公社崩溃，社会生活转入阶级生活那个时代开始，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直到现在，已有了大约四千年之久。”^{（17）}对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发展共性的揭示，使人们认识到，人类从无阶级的原始共产主义，经过有阶级社会，随着社会产品极大丰富、人的觉悟的极大提高，共产主义社会是必然会到来的，“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18）}这就为共产主义思想在中国传播提供了历史前提。毛泽东对自己的民族有较全面的认识，并有强烈的自豪感。他指出我们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的优点：“我们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之一”，“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已有将近四千年有文字可考的历史。”^{（19）}他对中国古代文明史的正确阐述，无疑对民族虚无主义是最好的批判，其深远意义还在于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启示与激励。我们的老祖宗在不毛之地，开拓古代文明，并站在世界文明前列，今天我们有何理由不去攀登世界现代文明的高峰？毛泽东还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昂扬的民族精神作过总结，指出：“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中，产生了很多的民族英雄和革命领袖。所以，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20）}通过对祖国历史的研究，毛泽东不仅自己确立起民族自信心，而且不断向人们宣传，指出“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21）}可贵的是毛泽东这种民族自豪，不是对民族历史的盲目陶醉，而是建立在对民族发展史的深刻认识基础上的坚强信心。他寄望于未来，着眼于当前，十分冷静地指出：“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22）}，“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同样，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接收它，以利于推进中国的新文化。”^{（23）}毛泽东的民族自信心，经历了强敌入侵的历史考验，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日本强盗疯狂并吞半个中国，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他稳如泰山，指挥若定，满怀信心地预言：“只要百折不回地奋斗下去，最后的胜利必属于我们”^{（24）}。他还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已使中国近代加快了前进的步伐，“全部中国史中，五四运动以后二十年的进步，不但赛过了以前的八十年，简直赛过了以前的几千年。假如再有二十年

的工夫，中国的进步将到何地，不是可以想得到的吗？”⁽²⁵⁾还形象地说：“新中国航船的桅顶已经冒出地平线了，我们应该拍掌欢迎它，举起你的双手吧，新中国是我们的”⁽²⁶⁾。毛泽东一贯地、系统地弘扬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温暖着旧时代一颗颗被侮辱、被损害的中国心，唤起了人民新的觉醒，振奋民族精神。他的民族自信心，也经过了新中国建立后世界风云变幻的考验。60年代初，西方的封锁未除，北边的烽烟骤起，内忧外患，接踵而至，“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而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不怕压，不怕迫。不怕刀，不怕戟。不怕鬼，不怕魅。不怕帝，不怕贼”⁽²⁷⁾，以“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²⁸⁾的大无畏气魄顶住了逆流。毛泽东的坚定信念来自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深刻理解，对中华民族正确认识。

历史科学是崇高的爱国主义的一个重要源泉，也是共产主义世界观的重要认识根源。

二、毛泽东揭示了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生产落后、发展缓慢的本质特征及其原因，指明了中国反封建斗争的艰巨性与发展生产力的紧迫性，从而为制定革命长远目标、实现现代化，从深层次上埋下了理论基石。

毛泽东在揭示中国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以后，着重考察了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这一特殊现象，加深了对封建制度延续3000年之久的旧中国的认识。他从出土文物与文献史料中得出周秦封建说：“自周秦以来，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²⁹⁾。对中国封建社会经济与政治状况作了精辟的分析，指出其特征是：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二、封建统治阶级——地主、贵族和皇帝，拥有最大部分的土地，而农民则很少土地，或者完全没有土地。农民要将收获的部分甚至大部分奉献给土地所有者；三、地主阶级的国家又强迫农民缴纳贡税，并强迫农民从事无偿的劳役去养活官吏及主要是用来镇压农民的军队；四、保护封建剥削制度的权力机关是以皇帝为最高统治者的封建国家⁽³⁰⁾。这就大体勾画出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面貌与封建专制制度的本质特征。他还进一步指出：“地主阶级这样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所造成的农民的极端的穷苦和落后，就是中国社会几千年在经济上和社会生活上停滞不前的基本原因。”⁽³¹⁾对这一国情的认识至关重要，影响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整个过程中党所采取的经济、政治政策。毛泽东把它看作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的一切问题的出发点”⁽³²⁾。从这个“一切问题的出发点”着眼，他不断强调批判封建主义，在革命战争时期始终强调保护民族工商业，强调“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坚定不移地把改变我国“一穷二白”作为革命的目标。还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明智地提出二个极为重要又未被充分重视的论点。即：一、科学是武器。他说：“自然科学是人类争取自由的一种武器”、“人们为着要在自然界中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³³⁾；二、生产力标准。他说：“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³⁴⁾。生产和社会生活的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是中国长期封建制度留下的两个苦果，一直影响到中国的近代与现代。毛泽东关于科学是武器与生产力标准的论述，就是摘除这两个苦果的对症妙方，为中国现代化发展科学事业、提高社会生产力指明了正确的前途。毛泽东关于现代化的许多正确论述，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部分，可惜，由于长期战争环境，即使在新中国建立以后，他仍然把精力集中在政治运动上，因而未能作为主导观点而贯彻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始终，不然我们的弯路肯定会小得多。是邓小平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明确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35），“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36），捍卫与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拨正了中国现代化的航向。

三、毛泽东对中国近代史的系统研究，进一步明确了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主要矛盾，从而为确定中国革命的任务、目标，解决革命领导权问题，指明了正确方向。

毛泽东把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放在突出的地位。近代中国是古代中国的继续，又是未来中国的起点，要认识国情，了解中国也就不能离开对近代中国的研究。中国革命发生在近代中国社会，认清近代社会性质“是解决中国一切革命问题的最基本的根据”（37）。毛泽东说：“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38）弄清中国近代社会性质，不只是毛泽东一个人独创，但他对这个问题在理论上的系统概括与实践上的有效运用，却是别人无与伦比的。毛泽东说：“中国已经变化了。自从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自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中国以后，中国又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39）这种变化即帝国主义列强入侵，对我国影响有二个方面，“在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半封建的社会；但是另一方面，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的中国”。他接着指出近代中国社会的特点：一、封建时代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是破坏了，但封建剥削制度依旧存在，而且同买办资本、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成了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主要势力；二、民族资本有了某些发展，但它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是很软弱的，大部分与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都有联系；三、皇帝和贵族专制政权被推翻了，代之而起的是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的联合专政；四、帝国主义操纵了中国的财政、经济命脉，并控制了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五、由于中国在许多帝国主义的统治、半统治下，实际上处于长期的不统一与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上的极端不平衡；六、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双重压迫下，中国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破产，其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所少见的（40）。通过这样的分析，毛泽东对近代中国的了解有了新的飞跃，认识到“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伟大的近代和现代的中国革命，是在这些基本矛盾的基础之上发生起来的。”（41）这样一来，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革命对象与目标也弄清楚了。他还追述近代中国经历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战争、甲午中日战争、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各个阶段（42），从而使人们对中国近代史走向更为一目了然。毛泽东从以往中国人民斗争史实指出：“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的斗争此伏彼起，都是为了‘反抗外敌，或改革现状的’，都是为了解决这个主要矛盾的。”这些斗争虽曾取得过胜利，但“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

务并没有完成。”⁽⁴³⁾他又从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中、从十月革命后世界形势新的变化中，得出结论：“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⁴⁴⁾，这就为中国共产党制定“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的目标“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⁴⁵⁾，提供了理论基础，为我国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与紧随而来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指明了方向。同时，他又进一步提出了革命领导权、同盟军、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工农联盟与统一战线等许多重要的理论问题。万变不离其宗，毛泽东对我国革命一系列理论问题的解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的形成，即导源于他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正确分析与革命分二步走的结论。这一基本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制定的一整套中国革命的战略战术、方针、政策，正是毛泽东思想成熟的主要标志，于此我们不难看出，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史学的密不可分的血缘联系，同时也使我们加深理解毛泽东与党中央反复强调学习近代史的意义。

四、毛泽东从中国战争史、特别是农民战争史中吸取养料，为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解决中国革命道路问题报供了历史启示。

毛泽东亲自领导农民运动、进行农村调查、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骨干，是中国共产党的农运专家，他又对中国战争史、农民战争中非常熟悉，称得上是中国农战史权威。他在研究封建社会时，为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农民战争这一中国特有现象所吸引。他说：“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从秦朝的陈胜、吴广、项羽、刘邦起，中经汉朝的新市、平林、赤眉、铜马和黄巾，隋朝的李密、窦建德，唐朝的王仙芝、黄巢，宋朝的宋江、方腊，元朝的朱元璋，明朝的李自成，直至清朝的太平天国，总计大小数百次的起义，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⁴⁶⁾他肯定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农民战争的必然性与正义性，认为“中国人民历次推翻自己的封建朝廷，是因为这些朝廷压迫和剥削人民”⁽⁴⁷⁾，并认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⁴⁸⁾他同情农民造反，很喜欢看“农民起义领袖的传记”⁽⁴⁹⁾，还常以宋朝农民起义来比喻中国共产党人上山打游击是“逼上梁山”正义的事业。历史上的农民起义给他以很大的启迪，为解决中国革命道路问题提供了历史借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标、动力、领导权问题解决后，如何选择革命道路成了革命能否成功的突出问题。面对“中国革命的敌人异常强大的，中国革命的敌人不但有强大的帝国主义，而且有强大的封建势力”，“在这样的敌人面前，中国革命的主要方法，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不能是和平的，而必须是武装的”，“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⁵⁰⁾。历史与现实的经验都显示“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务。”⁽⁵¹⁾毛泽东把这个真理概括为一句名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⁵²⁾。他还说：“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⁵³⁾，“在中国，只要一提到武装斗争，实质上即是指农民战争”⁽⁵⁴⁾。正如马克

思说的“德国的全部问题将取决于是否有可能有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⁵⁵⁾。中国共产党人要取得胜利，也需要有以农民为主力军的革命战争，当然不能走旧式农民战争的老路。毛泽东深刻指出“历史上存在过的许多流寇主义的农民的战争，都没有成功”，这就要求克服旧式农民战争的弱点，“建立革命的根据地”⁽⁵⁶⁾。旧式农民战争受流寇主义、小生产的散漫性与平均主义的影响，往往不能成功，更根本的原因是“由于当时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就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⁵⁷⁾，即使胜利，也无非是改朝换代，翻不了封建皇朝的天，覆不了小农经济的地，皇帝换姓，农民仍在十八层地狱，在封建统治下苟延残喘。只有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的新型的农民战争，才彻底打碎了旧时代的铁锁链，取得革命的真正胜利。我们完全有根据这么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既是现代革命者的血的经验的结晶，又是历史上农民战争惨痛教训的升华。

五、毛泽东坚持与发展了唯物史观关于“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思想，为确立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与新中国的“人民本位”（人民主体）制确定了理论基础。

毛泽东早在中国共产党建立初期，就明确主张“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⁵⁸⁾。他在史学研究与革命实践中，坚持与发展了唯物史观，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也是在更高层次上对历史科学的贡献。

中国史学源远流长，向有“三千年史乘”之美谈，如从孔子编纂《春秋》算起，也已有2500年之久，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非常重要的部分。有了历史学，才使中国古代灿烂文化得以延续下来。数千年中，优秀史学家代有人出，他们曾有过闪光的思想与丰硕的成果。然而时代与阶级的局限，生产和科学发展的制约，历史上文化领导权又操纵在剥削阶级手里，所以以往的历史记载，在不同程度上充塞着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偏见甚至歪曲。封建统治者的“正史”，长篇累牍多是帝王将相的历史，社会主体人民群众反被排除在外。历代农民起义的领袖人物，大都被污蔑为“贼、匪、寇、盗”而无一个好人。毛泽东在史学研究中，贯彻了唯物主义路线，他对中国近代社会矛盾、性质的分析，解决中国革命的任务、目标、对象、动力等一系列问题，都闪耀着唯物史观的光辉。他与其他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一道，翻了历史旧案，恢复了“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⁵⁹⁾历史本来面目。他反复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⁶⁰⁾。并把“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逻辑地系统化为“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⁶¹⁾的思想，又把唯物史观与认识论、辩证法有机地统一起来，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人在一切工作中必须坚持的群众观点与群众路线。毛泽东说：“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组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⁶²⁾这就确立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一切为了群众、一切向群众负责、一切依靠群众与向群众学习的群众观点。把人民群众正确地看作是社会实践的主体，也即是承认群众是认识活动的主体。领导者只是群众中的一分子。共产党人在群众面前只有当好学生，才能当好先生与领导。毛泽东说：“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⁶³⁾，要求“和人民群众密切地联系在一起”⁽⁶⁴⁾，这就大大丰富了党的建设的学说。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党性的体现，是党的宝贵传统，也是毛泽东以唯物史观武装全党的结果。中国共产党人靠了它团结各族人民、巩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在长期斗争中与人民群众患难与共、生死相依，才克取了无数困难，战胜了帝国主义支持的中国近代史上最强大的敌人，取得了新民主主义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⁶⁵⁾，“从这时起”，“中国人民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⁶⁶⁾，中国人民开辟了自觉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的新纪元”⁽⁶⁷⁾。

三、毛泽东的史学研究，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给人以深刻的启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鉴古知今、推导未来，正确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的范例

毛泽东以唯物史观为指针，深刻地阐明了中国历史发展规律，替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在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而解决了中国革命问题、为中国指出了光明前程。在他的全盛时期整个意识形态从世界观到方法论唯物史观一统到底，践履了恩格斯说的“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作为一个时代的代表，毛泽东的思想、学说、史学成就，正是这一时代、中国这段英勇壮烈的历史的映照。他正确处理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使史学研究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向导。以事实雄辩地改变人们把历史与现实割裂、把历史研究当作“发思古之幽情”、“眼睛向后看”的偏见。人类社会与自然界都处在历史发展中，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哲学只是前者理论的历史的反映。轻视历史也就是轻视科学、轻视人类自身、轻视自己的未来。当毛泽东于1949年10月1日，以东方巨人的气魄，在天安门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人民站起来了”⁽⁶⁸⁾的时候，也宣告了唯物史观在中国的胜利，证明了毛泽东历史观以及他的历史预见的正确。中国共产党的威望与毛泽东个人的成就，这时都达到了新的高峰。他在1935年挥写的千古绝唱《沁园春·雪》中说道：“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⁶⁹⁾。“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此时得到了历史印证。而历史科学的社会功能，也在毛泽东手上发挥得淋漓尽致，达到了高峰。

毛泽东史学成功的经验告诉我们，历史学必须面向时代。毛泽东是革命家、理论家与史学家三位一体，首先是伟大的革命家。因为他是中国革命的实践者、领导者，亲自参加社会变革、推动历史前进的人，所以也就最能感受时代的脉搏，最迫切地需要听到历史的心声，最渴望得到人类已积聚的智慧与知识，为我所有。因此，他反复强调要“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帮助的。”⁽⁷⁰⁾他善于把中国当今社会放在历史长河中进行观察，从历史中得到启迪，从发展中探索规律，把握机遇，指导实践，使古老的历史与时代精神相沟通，与改造中国、建设中国的新的历史创造的实践相联结。毛泽东史学成功的经验还告诉我们有志改革、推动社会进步的人，不能割断历史忘了祖宗。而缅怀祖宗，还是为了造福子孙。不重视历史的人，决不会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不能成为好的领导者。正如一位外国历史学家说的，“对现实的曲解，必定源于对历史的无知；而对现实一无所知的人，要了解历史必定是徒劳的”⁽⁷¹⁾。历史学首先是一门记述科学求实科学，重史料、重考据、重事实。

秉笔直书、实事求是它的灵魂；彰往而察来、古为今用是它的功能。如毛泽东所云“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里引出正确的结论”⁽⁷²⁾。如果离开“实事求是”，也就失去了史学的灵魂。忽视史实，把历史当作主观随意性为所欲为的天地，这是对历史的亵渎，当然是任何严肃的历史研究者所不可取的。毛泽东与旧史家不同，在于他重视批判地继承历史财产，立意在古为今用、推陈出新。而他的优势在于社会实践与史学理论双向互补，相得益彰。是时代塑造了他，更是他几十年的辛勤耕耘的收获！

历史科学门类众多，内容广泛，在发挥社会功能上，不能一概而论；而且历史学者所处条件不同，也是不能划一要求的。研究成果有的直接应用，有的只是间接有益，有些甚至在当前的“无用的”，但却可能是无价之宝。对待这个问题也必须有历史的眼光，辩证地解决，防止狭隘功利主义的近视看法。

毛泽东的引路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李大钊对历史学说过一段发人深思的话：

“历史，恰如‘时’在人生世界上建筑起来的一座高楼，里边一层一层的陈列着我们人类历史相传下来的家珍国宝。这一座高楼，只有生长成熟脚踏实地的健足，才能拾级而升，把凡所经过的层级，所陈的珍宝，一览无遗；然后上临绝顶，登楼四望，无限的将来的远景，不尽的人生的大观，才能比较的眺望清楚。在这种光景中，可以认识出来人生前进的大路。我们登临过去的崇楼登的愈高，愈能把未来人生的光景及其道路，认识的愈清”⁽⁷³⁾。

“脚踏实地的健足”去登临历史高楼，“登的愈高，愈能把未来人生的光景及其道路，认识的愈清”。毛泽东的史学成就正在这里，给人的启示也在这里！

毛泽东的史学之功一言以蔽之：在于引导中国人民认清前进的道路，“走历史必由之路”⁽⁷⁴⁾。邓小平说得好：“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毛泽东为人民“指出了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⁷⁵⁾，“决不能忘记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的伟大功绩”⁽⁷⁶⁾。

今天，历史向中国人民展示更广阔、更灿烂也更复杂的前景与更大的机遇。展望未来，认识未来，看清前程，把握前程，越来越成为迎接与赢得世界与中国美好将来的必要前提，因而也更需把历史科学(广义的)作为人生必修课。勤奋攀登这座历史高楼——人类智慧的殿堂，“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作者单位：浙江省社会科学院)

注释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一)，第650页。

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第108页，

(49)龚育之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三联书店，1986年，第198页，第199页，第202页。

(12)(21)《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04页，第182页，第161页。

(11)权延赤《红墙内外——毛泽东生活实录》，昆仑出版社，1989年，第96页。

- (13)《斯诺文集》(一), 新华出版社, 1984 年, 第 194 页。
- (14)(23)(34)(60)(61)(62)(63)(64)(72)《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3 卷, 第 801 页, 第 1083 页, 第 1079 页, 第 1031 页, 第 1096 页, 第 1094 页, 第 899 页, 第 1094 页, 第 801 页。
-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三), 第 20 页。
- (16)(73)《李大钊文集》(下), 第 715 页, 第 763 页。
- (17)(19)(20)(22)(24)(25)(26)(29)(30)(31)(37)(38)(39)(40)(41)(42)(43)(44)(45)(46)(48)(50)(51)(52)(53)(54)(56)(57)(70)(74)《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2 卷, 第 622 页, 第 625 页, 第 623 页, 第 708 页, 第 382 页, 第 703 页, 第 709 页, 第 664 页, 第 624 页, 第 624 页, 第 646 页, 第 633 页, 第 626 页, 第 630 页, 第 631 页, 第 632 页, 第 564 页, 第 666 页, 第 683 页, 第 625 页, 第 625 页, 第 634 页, 第 544 页, 第 547 页, 第 692 页, 第 605 页, 第 418 页, 第 625 页, 第 534 页, 第 559 页。
- (18)毛泽东《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会议上的讲话》。
- (27)(28)(69)《毛泽东诗词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6 年, 第 158 页, 第 116 页, 第 61 页。
- (32)(47)(66)《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4 卷, 第 1430 页, 第 1510 页, 第 1516 页。
- (33)毛泽东在 1940 年延安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会上的讲话, 1940 年 3 月 15 日《新中华报》。
- (35)(36)《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述专题摘编》, 第 67 页, 第 60 页。
- (5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二十九), 第 48 页。
- (58)《毛泽东书信选集》, 第 15 页。
- (59)毛泽东《看了 逼上梁山 以后给延安平剧院的信》, 1967 年 5 月 25 日《人民日报》。
- (65)《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54 年 9 月 20 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 (67)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92 年 10 月 12 日)。
- (68)《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 第 689 页。
- (71)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技艺》,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2 年, 第 36 页。
- (75)(76)《邓小平文选》(1975—1982 年), 第 304 页, 第 243 页。

学习毛泽东编辑出版工作几个重要思想

袁亮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在坚持和发展马列主义，领导我国进行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进程中，非常关心和重视编辑出版工作。他对编辑出版作过许多重要论述，并亲自从事过许多重要的编辑出版实践。他的编辑出版的理论和实践活动，是他整个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活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当然，只是其中的一个侧面。但是，就是这个侧面，也是很平凡的。他的编辑出版实践活动是丰富多采的，他的编辑出版的论述是含义深邃的，其中包含着许多揭示编辑出版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就是这个侧面，也充分反映出他的伟大的思想和革命的精神，甚至反映出在他别的活动中不易发现的许多优秀品德和风格。人们认为，毛泽东不仅是伟大的革命家、军事家、战略家，而且也是伟大的编辑出版家。

要对毛泽东十分丰富、深邃的编辑出版工作的论述和实践，进行科学的研究和总结，从而阐明毛泽东的编辑出版理论体系，这是广大出版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的任务。但这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要经过长期的努力才能实现。我在这篇文章里，只就毛泽东的编辑出版活动中几个重要思想，作点初步的探讨和阐述，以供出版界的同志研究和学习时参考。

一、编辑出版要为人民服务，为革命和建设事业服务，以宣传马列主义和党的路线、方针、政府为己任

毛泽东关心和重视编辑出版工作，不是为了别的什么目的，而是要运用编辑出版这个工具，忠诚地为人民的利益服务，促进和推动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这是编辑出版工作的根本方向问题。

毛泽东强调编辑出版为人民服务，为革命和建设服务，是始终如一的，非常鲜明的，他不仅这样提出要求，而且他自己就是这样做的。在他直接主持或指导的编辑出版工作中，都坚持这个正确方向。

在新民主主义时期，他强调编辑出版要为人民服务，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服务，在大革命时，毛泽东在自己主编的《政治周报》上发表“发刊理由”说：“为什么出版《政治周报》？为了革命。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在中央苏区时，他指出：“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在什么地方呢？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他在同一个报告中，是把编辑出版工作包括在文化教育之内的。在延安时，他说：“我们的文化是人民的文化，文化工作者必须有为人民服务的高度的热忱，必须联系群众，而不要脱离群众。”为了纪念“出版事业模范”邹韬奋，他题词说：“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

他为延安《中国工人》月刊写的“发刊词”说：“《中国工人》的出版是必要的。”“团结自己和团结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而奋斗，这就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当前的任务。《中国工人》的出版，就是为了这一个任务。”他为延安《解放日报》写的“发刊词”说：“本报之使命力何？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一语足以尽之。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也就是本报的使命。”

在我国由新民主主义时期转变到社会主义时期后，毛泽东及时指出编辑出版工作要为经济建设服务，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全国解放前夕，他就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说，在城市中，“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肃反工作，通讯社报纸广播电台的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泽东说：“我国的艰巨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尽可能多的知识分子为它服务。凡是真正愿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知识分子，我们都应当给予信任”。他还说：“我们国家要有很多诚心为人民服务、诚心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立志改革的人。我们共产党员都应该是这样的人。”在旧中国，“有一些立志改革的人，他们无所畏惧，他们在各种困难的条件下面，出版书报，教育人民，组织人民，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这也告诉我们，编辑出版工作者要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贡献。毛泽东在谈到加强农村经济文化建设时也强调要发挥出版的作用。他说，还要“出版适合农民需要的通俗读物和书籍，发展农村广播网、电影放映队，组织文化娱乐等等。”

编辑出版工作怎样才能为人民服务，为革命和建设服务？关键就是要认真宣传马列主义，宣传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传播科学文化知识。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论述是很多的。他在延安时就多次强调，要普遍地深入地研究和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他提出：“中央须设一个大的编译部，把军委编译局并入，有二三十人工作，大批翻译马恩列斯及苏联书籍”⁽¹¹⁾。他在新中国成立后又说：“我们作宣传工作的同志有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任务。这个宣传是逐步的宣传，要宣传得好，使人愿意接受。”⁽¹²⁾毛泽东的积极倡导和关心，有力地推动我国马列主义的宣传和出版。毛泽东一直都强调报刊等出版物要宣传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他说，为了坚持抗战到底的方针，“必须动员报纸、刊物、学校、宣传团体……作广大之宣传鼓动，坚定地有计划地执行这一方针”⁽¹³⁾。他给苏北党的负责人说：“苏北报纸刊物请你抓紧，务使它们的宣传服从于党的当前政策。”⁽¹⁴⁾他说：“在报纸上正确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通过报纸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这是党的工作中的一项不可小看的、有重大原则意义的问题。”⁽¹⁵⁾毛泽东还非常关心自然科学的学习和出版。在延安时，他要求青年人“多向自然科学学习”⁽¹⁶⁾。全国解放后，他一直关心我国自然科学的发展。“文革”中还关怀《化石》、《动物学杂志》等科学刊物的出版工作。

二、广泛地密切地联系和团结著作界，即要尊重和鼓励他们的写作劳动，又要关心和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观点，克服写作中的实际困难

认真做好作者工作，充分调动作者的写作热情，争取有价值有质量的书稿源源而来，这是发展和繁荣出版事业的基本条件。毛泽东在这一方面有着许多光彩照人的论述和活动。当然，他是作为一个领袖来做思想界、著作界的工作，而不是作为一个编辑出版工作者来处理与作者的关系。然而正因为如此，对我们编辑出版工作者更加富于教育意义。

不论是新老作者，还是党内外的作者，毛泽东都尊重和鼓励他们的写作热情，肯定和赞扬他们的写作成就，同他们建立和保持深厚的友情。他看了郭沫若的《虎符》剧本和《甲申三百年祭》论文后，先后给郭沫若写信说，“收到《虎符》，全篇读过，深为感动。你做了许多十分有益的革命的文化

工作，我向你表示庆贺。”“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他看了范文澜的中国经学简史的讲演提纲后给范写信说：“提纲读了，十分高兴，倘能写出来，必有大益，因为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头一次”。他看了周扬写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的序言后给周写信说：“此篇看了，写得很好。你把文艺理论上几个主要问题作了一个简明的历史叙述，借以证实我们今天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一点很有益处，对我也是上一课。”他看了丁玲的《田保霖》、欧阳山的《活在新社会里》两文后给这两位作者写信说：“快要天亮了，你们的文章引得我在洗澡后睡觉前一口气读完，我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们两位的新写作作风庆祝！”⁽¹⁷⁾

有些作者没有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及存在其他缺点，毛泽东热情地同志式地给予启发和帮助，但对世界观已经固定了的老年人，则不强求。他看了李健侯写的《永昌演义》一书后，给李鼎铭写信指出：“此书赞美李自成个人品德，但贬抑其整个运动。实则吾国自秦以来二千余年推动社会向前进步者主要是农民战争，大顺帝李自成将军所领导的伟大的农民战争，就是二千年来几十次这类战争中的极著名的一次。”“此书如按上述新历史观点加以改造，极有教育人民的作用，未知能获作者同意否？”他看了吴晗的《朱元璋传》一书后，给作者写信说：“尚有一点，即在方法问题上，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倘若先生于这方面加力用一番功夫，将来成就不可限量。”后来吴晗表示，这些意见使他“在理论上得到了启发”。毛泽东看了陈寄生写的历史方面的书以后给作者写信说：“惟觉中国的历史学，若不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研究，势将徒费精力，不能有良好结果，此点尚祈注意及之。”他看了章士钊的《柳文指要》一书后给作者写信说：“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但此事不能求之于世界观已经固定之老先生们，故不必改动。”但要章士钊准备人家批评⁽¹⁸⁾。

有些作者在“文革”中身处逆境，无法进行写作。毛泽东及时给予关心和保护，改善他们的写作环境，保护他们的写作积极性。“文革”中，林彪、陈伯达、“四人帮”对史学家范文澜捏造罪名，横加迫害。毛泽东明确指示：要保护历史学家范文澜。1966年国庆时，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对范文澜说：“有人要打倒你，我不打倒你”。1968年7月20日，毛泽东派人给范传话说：“中国需要一部通史，在没有新的写法以前，还是按照你那种旧法写下去。通史不光是古代、近代，还要包括现代。”由于毛泽东的保护，范文澜才能继续他的史学的著作工作。史学家周谷城在“文革”中被关进牛棚，根本不能进行研究和写作。毛泽东得知后，在一次会议上明确说：“周谷城的《世界通史》还没有写完，书，还是要让他写下去。”这对周谷城改变当时的处境、继续著作工作，起了很大作用。小说家姚雪垠在“文革”中先后两次得到毛泽东的保护。1966年7、8月间，毛泽东委托一负责人转达他的意见：“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一卷上册，我已看完，写得很不错，你通知武汉市委，要对姚雪垠加以保护，让他把书写完。”姚后来说：“这是毛主席对我的第一次保护。”1975年底，毛泽东将姚雪垠写给他的信亲自批给政治局传阅。据说，毛泽东再一次肯定姚的写作计划，指示给姚提供条件把书

写完。姚后来说：“在我极端困难的处境下，毛主席第二次保护了我。”由于毛泽东的保护，使《李自成》各卷得以陆续出版⁽¹⁹⁾。

对待作者的创作成果和著作权益，毛泽东强调要从精神上给予尊重和保护，从物质上给予补贴和报偿。毛泽东对一些书稿文稿中不妥当的或错误的内容，要求进行修改，但是要同作者商量。他说：对征集到的稿件，“须加以选择修改，务使思想上无毛病，文字通顺，并力求通俗化。”“如有不合用之稿件，由编辑部退回负责征稿人，再行补征。如由编辑部作重要之修改，则应与征稿人商量一下。”⁽²⁰⁾毛泽东为出版艾青《秧歌剧的形式》一文给胡乔木写信说：“最好把文尾附注移至文前，并稍为扩充几句，请与作者商酌。”⁽²¹⁾毛泽东直接要求作者修改文稿时，也总是采取商量的态度，而不是强加于人。毛泽东还很重视给作者以物质上的报偿。1936年8月5日，他为出版《长征记》写的征稿信上说，来稿采用后，“备有薄酬，聊志谢意。”⁽²²⁾1939年1月23日，他在要周扬负责修改李六如、和培元写的《陕甘宁边区实录》书稿的信上说：“备有稿费(每千字一元五角)，当分致你与李、和三同志，借表酬劳之意。”⁽²³⁾1944年4月29日，他在评价《永昌演义》书稿的信上说：“并已抄存一部，以为将来之用。”不久，此书作者李健侯应邀到延安，毛泽东热情地接待了他，并奖励给他二百元边币⁽²⁴⁾。当时经费十分困难，毛泽东仍然不忘作者的稿费和报酬。

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对待青年作者，既热情地鼓励，甚至虚心地向他们学习，又及时给予指导，使其健康成长。1937年，哲学家艾思奇还是一个只有27岁的青年人。毛泽东读了他的《哲学与生活》一书，作了约四千多字的摘录，并给艾写信说：“你的《哲学与生活》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抄录了一些，送请一看是否有抄错的。其中有一个问题略有疑点(不是基本的不同)，请你再考虑一下，详情当面告诉。今日何时有暇，我来看你。”⁽²⁵⁾一个党的领袖对待一个青年作者，采取的是何等热情而又谦逊的态度。后来，毛泽东和艾思奇长期保持密切联系和友情。1954年，青年李希凡发表《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受到毛泽东的肯定和重视。李于1955年被调到人民日报社任编辑。1957年4月2日，毛泽东给人民日报有关部门负责人写信说：“李希凡宜于回到学校边教书，边研究。一到报社他就脱离群众了，平心说理的态度就不足了。”⁽²⁶⁾

三、精心审读、选择和修改书稿，认真做好序跋注释工作，“必须内容形式都弄妥当”方能出版

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做好编辑加工工作，这是保证各类出版物质量的关键环节。毛泽东亲自对许多重要书稿进行精细加工，反复修改，字斟句酌，力求书稿达到完善的程度。他在这方面的令人敬佩的言论和活动，是我们编辑出版工作者必须认真学习的。

1936年1月，毛泽东看了李六如、和培元写的《陕甘宁边区实录》一书初稿后，给当时边区政府教育厅长周扬写信说：“因关系边区对外宣传甚大，不应轻率出版，必须内容形式都弄妥当方能出版。现请你全权负责修正此书，如你觉须全般改造，则全般改造之。虽甚劳你，意义是大的。”⁽²⁷⁾此书经过修改后，于同年12月由延安解放社出版。

1937年和1941年，毛泽东组织出版《农村调查》一书，自己做了精细

的编辑工作。1937 年写了一篇序言，但是当时书没有付印，1941 年又写了第二篇序言和跋。他还在正文中写了六条按和注，针对一些需要说明的情况和一般读者不懂的方言，作了简明的解释。他在序言中一再申明，出版此书的目的，“在于指出一个如何了解下层情况的方法，而不是要同志们去记那些具体材料及其结论。”⁽²⁸⁾他还在序言和跋中阐述了党在当时的重要的政策和策略。此书，于 1941 年在延安出版了。

从 1950 年 5 月开始，毛泽东主持并亲自参加《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第一卷至第三卷的编辑工作，他不但参加选稿和确定篇目，对大部分文章进行精心修改，而且为一部分文章写题解和注释。这些修改绝大部分是文字性的，也有少数属于内容方面的。经过修改，无论内容还是文字，更加周密、更加完善了。例如《矛盾论》一文，他作过认真的修改。其中论形式逻辑这一部分，根据他自己的意见删去了。《矛盾论》起先未收入 1951 年出版的毛选第一卷，以后才收入 1952 年出版的毛选第二卷。毛选第二次印刷时，才按时间顺序，将此文改收入第一卷。毛选第四卷的编辑工作仍由毛泽东主持，在几个同志编好后，由他主持通读定稿。毛选一至四卷出齐后，根据毛泽东提出要修改注释的意见，从 1962 年 8 月起，开始对注释进行全面校订。由此可见，毛泽东对毛选的编辑工作是多么精细和严谨⁽²⁹⁾。

1955 年下半年，毛泽东亲自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当时，他几乎把主要精力倾注到这部书的编辑工作上。他对收集到的一百几十篇材料，每篇都看，有些看过几遍。他认真地精选材料，认真地修改文字。有的材料文字太差，毛泽东改得密密麻麻，象老师改作文一样。他为此书写过两篇序言，当年 9 月写过一篇，后来情况发生变化，他又于当年 12 月重新写一篇。他还为此书写了 104 篇按语，共 2.4 万多字，阐述了不少重要观点。他对大部分材料重新拟定了题目。把一些冗长、累赘、使人看了头痛的标题，改得鲜明、生动、有力，而又突出了文章的主题思想，引人注目。如一篇材料原题为《天津市东郊区詹庄子乡民生、民强农业生产合作社如何发动妇女参加田间生产》，毛泽东改为《妇女走上了劳动战线》。又如一篇材料原题为《大泉山怎样由荒凉的土山成为绿树成阴、花果满山》，毛泽东改为《看！大泉山变了样》。毛泽东不仅自己认真作编辑工作，还要他的秘书班子参加编辑工作，他给田家英写信说：“你和乔木各分一半彻底地作一次文字上的修改，包括题目改得生动些”。这本书共收材料 176 篇，约 90 万字。书后还有《简要注释》(298 条)、《本书编者按语索引》、《本书内容分类索引》，便于读者查阅。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还印了只有 27 万字的节本，供更多的人阅读⁽¹⁹⁾。

在毛泽东的倡导与鼓励下，1959 年文学研究所选编了一本《不怕鬼的故事》。毛泽东选了其中一部分故事，印发给参加一次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毛泽东要何其芳写序。序写好后第一次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约何当面谈修改问题。毛泽东说，对鬼除了讲战略上藐视，还要讲战术上重视。何其芳修改后第二次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亲自加写了一大段，还修改了好几处。其中有一处加了这样一句：“事物总是在一定的条件之下向着它的对方交换位置”。此后，毛泽东又一次约何当面谈序言的进一步修改，要求何再增加几句讲半人半鬼及其发展前景。这篇序言誊清打印后又第三次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将他自己加的上面引述的那句话改为：“事物总是在一定的条件之下通过斗争同它的对方交换位置”。毛泽东还给何其芳写信，要他将这篇

序言的清样，送给刘少奇等五位领导人阅，询问他们是否还有修改意见，并对序言先在哪些报刊上发表及全书的翻译出版问题，提出了具体的意见。事后，何其芳赞叹说，毛泽东是“多么细致、周密”啊！（31）

为了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马列主义，创造新的理论，毛泽东提出要为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写序、作注。1963年7月，毛泽东在要求组织干部学习30本马列著作时，提出要重新校对译文，并为这些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写序、作注，注释的字数可以超过正文的字数。1965年12月，毛泽东又重提写序的问题。他召集几位理论工作者到杭州进行这一工作。当时，毛泽东特别提醒，给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写序，要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可惜这件事刚提了一个头就被“文化大革命”打断了（32）。

四、认真改进文风，反对党八股，讲究文法和修辞，以生动和通顺作为写文章的最起码的要求

文风问题是我们全党也是出版界一个大问题。如果编辑出版工作者没有正确的文风，就不能很好地宣传马列主义、宣传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就不能实现为人民服务、为革命和建设服务的宗旨。毛泽东针对编辑出版工作中存在的文风问题，作过许多尖锐的也是语重心长的批评和论述，我们要牢记在心里。

他在1940年2月写的《中国工人 发刊词》中说：“我希望这个报纸好好地办下去，多载些生动的文字，切忌死板、老套，令人看不懂，没味道，不起劲。”（33）

1942年2月，毛泽东提出反对党八股整顿文风，作为整风运动重要任务之一。毛泽东说，一个人写党八股，“如果送给第二个人看，人数多了一倍，已属害人不浅。如果还要贴在墙上，或付油印，或登上报纸，或印成一本书，那问题可就大了，它就可以影响许多的人。”他开列党八股的八大罪状，如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无的放矢，不看对象；语言无味，像个瘪三；等等，毛泽东说：“党八股这个形式，不但不便于表现革命精神，而且非常容易使革命精神窒息。要使革命精神获得发展，必须抛充党八股，采取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他在引述鲁迅讨论写文章的意见后说：“我看重要的文章不妨看它十多遍，认真地加以删改，然后发表。”（34）

1948年4月，毛泽东在一次对编辑人员的谈话中说：“我们党所办的报纸，我们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当是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这是我们革命无产阶级应有的战斗风格。”（35）

1955年12月，毛泽东在为一篇文章写的按语中说：“在这里要请读者注意，我们的许多同志，在写文章的时候，十分爱好党八股，不生动，不形象，使人看了头痛。也不讲究方法和修辞，爱好一种半文言半白话的体裁，有时废话连篇，有时又尽量简古，好象他们是立志要让读者受苦似的。”“哪一年能使我们少看一点令人头痛的党八股呢？这就要求我们报纸和刊物的编辑同志注意这件事，向作者提出写生动和通顺的文章的要求，并且自己动手帮作者修改文章。”（36）

毛泽东在1957年3月同新闻出版界的代表作过一次谈话，其中又谈到文风问题。他说：“报上的文章‘短些，短些，再短些’是对的，‘软些，软

些，再软些’，要考虑一下。不要太硬，太硬了人家不爱看，可以把软和硬两个东西统一起来。文章写得通俗、亲切，由小讲到大，由近讲到远，引人入胜，这就很好。”⁽³⁷⁾

1958年，毛泽东提出写文章要具有“三性”的著名观点。他用概念和判断进行推理的时候又缺乏逻辑性；第四，不讲究词章。看这种文件是一场大灾难，耗费精力又少有所得。一定要改变这种不良的风气。”⁽³⁸⁾

五、对待书稿的校对和出版，要严谨精细，一丝不苟。要反复校对，“保证一字不错”；发现差错后，毫不含糊，公开予以更正

编辑出版部门的校对工作，是保证书稿文稿质量、消灭文字内容差错的最后关键。它是一项技术性的工作，也是一项有思想性和学术性的工作。毛泽东不仅不轻视这项工作，而用始终以严谨精细、一丝不苟的态度对待它。无论是在指挥百万大军的战争年代，还是在日理万机的和平时期，他都是如此。他在这方面的论述和活动，是感人至深的，是编辑人员的学习楷模。

他非常重视文稿书稿排印后和出版前的校对工作，不仅要求有关同志认真负责，而且常常自己亲自反复校对。1938年5月，他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的第一节修改好以后，给郭化若写信说：“第一节最后修改毕，可即付印。校对须注意，你自己至少校一次。二、三、四节抄好后送我再看看。”他还提出：“注意标点符号，不使弄错一个。”⁽³⁹⁾1938年6月，他在《论持久战》一文印行之前，亲自作了校对，并给出版科写信说：“都校了，第三部分请再送来看一次，”“第一第二部分请你们过细作最后校对，勿使有错。”⁽⁴⁰⁾1938年11月，他将在党的六届扩大的六中全会上的报告稿修改好排印，写信给徐冰说：“请你校第一第二次，我校第三第四次。”⁽⁴¹⁾1941年，在延安出版《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时，他在原稿上端作了批示说，请嘱同志们好好排，好好校对，同时好好拼版，保证一字不错⁽⁴²⁾。1948年3月，他为播发一篇通讯写给胡乔木的批示中说：“翻译时，文字和标点符号不要弄错。”⁽⁴³⁾

在著作发表或出版后，一旦发现其中有差错，哪怕是错一个字，毛泽东总是毫不含糊，严肃地公开地予以更正，有时还自己写更正启事，请有关报刊发表。1945年5月2日，延安《解放日报》登载《论联合政府》一文，毛泽东发现有几个错字，当天即以本报名义写了一个更正启事，在5月3日登出⁽⁴⁴⁾。1949年4月25日，北平《解放报》登载毛泽东的《五四运动》一文，他在当天发现文中脱漏两个字，多出四个字，即亲自写了有220多字的更正启事，并给该报编辑部写信说：“兹付上更正表一件，请予登载为盼！”⁽⁴⁵⁾1949年4月25日，新华社播发毛泽东和朱德签发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毛泽东发现其中错了两个字，将“当”字误为“均”字，将“村”字误为“民”字，第二天即为新华社写了更正启事，并指出：“务请各广播电台各报纸予以更正。各人民解放军政治机关印发这个布告时，务请更正为盼。”⁽⁴⁶⁾

他要求出版单位把消灭出版物上的错字，真正当作一件事情来办，不能停留在一般号召上。他说：“报上常有错字，就是因为没有把消灭错字认真地当做一件事情来办。如果采取群众路线的方法，报上有了错字，就把全报社的人员集合起来，不讲别的，专讲这件事，讲清楚错误的情况，发生错误的原因，消灭错误的办法，要大家认真注意。这样讲上三次五次，一定能使

错误得到纠正。” (47)

(作者单位：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

注释

(11)(13)(14)(15)(20)(22)(37)(38)(43)(45)(46)《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3页，第34—35页，第55页，第99页，第39页，第96页，第150页，第102—103页，第38页，第190页，第207页，第144页，第165—166页，第166页。(34)《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12页，第830、840、844页。

《以笔代剑的英雄邹韬奋》，第356页。

(33)《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27页，第728页。

(35)(47)《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28页，第1322页，第1319页。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79页。

(12)《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11页，第203页，第406页。

(16)(21)(23)(25)(26)(27)(39)《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66页，第232页，第138页，第112页，第524页，第138页，第126页。

(17)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21、241—242、163、228、233页。

(18)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30、310—311、386、602页。

(19)参见《毛泽东读史》，第171—172、189、193—195页。

(24)参见《毛泽东读史》，第178、180页。

(28)《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7页。

(29)参见《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第13—19页。

(30)《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第22—23页，《毛泽东书信选集》第498页，《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序言和按语。

(31)参见《毛泽东读书与写文》第9—12页，《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76页。

(32)参见《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34—36页。

(36)《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第1134页。(40)(41)(44)见《红旗》1983年19期《严谨精细，一丝不苟》一文。(42)《校对业务基础》，第11页。

毛泽东与大小“参考”

卫广益

毛泽东从红色中华通讯社(新华通讯社的前身)诞生的1931年,到他去世的1976年,在长达45年的漫长岁月里,一直非常重视参考报道。他把参考报道作为了解外部世界尤其是敌情的重要渠道,和培养与锻炼党内外干部的重要工具。他对参考报道的许多重要指示及在革命斗争中运用参考材料的高超艺术和典范,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思想财富。

新华社的参考报道是党中央的“耳目”。由于工作的内部性质和保密规定,其系列、层次、发展、变化,很少公开披露,人们了解甚少。本文根据各参考报刊的不同功能,分为“大参考”与“小参考”两大类来论述。“大参考”系《参考资料》的俗称,但本文是广义而言,还包含通过其他载体和途径提供给中央领导的各国通讯社的电讯和报刊材料,及新华社驻外记者采写的国际内参报道。“小参考”系指拥有广大读者的《参考消息》报。

一、大力支持创办参考报道

我党的参考报道创业于30年代初。战争年代,收讯电台是参考报道之本。中国工农红军在第一次反“围剿”期间,于1930年12月30日和1931年1月1日两次战斗中,缴获敌人可装一部半电台的器材,解放了6名电务人员。当时任红军总政委毛泽东和总司令朱德等,在紧张战斗的间隙,于1月3日下午抽出时间接见了这几位电务人员。毛泽东对他们表示热烈欢迎,希望他们“好好地红军建立无线电通信努力工作”。毛泽东等的接见和亲切谈话,使这几位尔后成为我党我军通讯事业领导骨干的电务人员深受鼓舞。很快,红军的第一部电台就于1931年1月6日开始工作,抄收“中央社”电讯和截抄敌军电台之间的联络通报。电台抄收到的这些外界信息和敌情,就成了最早的“参考消息”。不久,中央红军无线电队开设电训班培养电务人员,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极为重视和关怀,在百忙中,经常抽出时间给电训班作形势报告,上政治课。

红中社油印的《参考消息》于1931年11月7日,即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的同一天创刊,当天即送给与会代表参阅。创刊号的主要内容是红军电台抄收的“中央社”电讯。从这时起,到1934年10月长征开始的三年时间里,红中社每天把油印的《参考消息》送给毛泽东等中央领导阅读,为他们了解敌情、判断形势和制定政策,提供了大量有参考价值的公开信息情报。

1933年5月,党中央抽出红军的一部电台,专门抄收“中央社”的电讯,供编《参考消息》。在当时无线电器材奇缺,红军刚有为数不多的几部电台的情况下,专门抽出一部电台作为我党我军的第一部“新闻电台”,足见党中央对抄收参考消息多么重视。长征开始后,油印的《参考消息》停刊。“新闻电台”随军长征,坚持抄收“中央社”电讯。在党中央同外界几乎完全处于隔绝的状态下,这些电讯成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观察形势、指挥战斗的重要情报信息来源。

中国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1935年11月25日红中社恢复工作,《参考消息》同时复刊。在陕北期间,毛泽东、党中央非常重视和关心恢复与发

展参考报道事业。在物质上，克服困难，想方设法增加和改进新华社收讯电台的设备；在人力上，陆续调进外文翻译和编辑、中文译电和报务人员。当时从事参考报道的翻译、译电、编辑和电务人员，占了新华社工作人员的大多数。毛泽东多次指示新华社要重视搜集国内外的情况，尽可能多地抄收外电。

1939 年春天，新华社搬到杨家岭后不久的一天下午，毛泽东在沟口主动同新华社负责翻译外电的陈龙攀谈，关切地询问：“你们翻译工作中有什么问题？”陈龙谈了翻译人力不够，大量消息译不出来。毛泽东点点头，表示理解和关心。不几天，中央组织部就调给新华社几位外文翻译。大家心里都明白这是毛泽东关心的结果。

二、看作重要情报来源和决策依据

参考报道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重要的情报来源和决策依据。在延安时任新华社社长的博古多次说，“党中央要根据咱们抄收的新闻电讯决定政策”。毛泽东 1944 年 10 月 4 日看望新华社和解放日报社人员时说：“中央了解国内外情况有许多来源，但是主要靠你们。别的方面来的东西也有一些，但是不多，主要还是靠你们。你们的工作很重要。”

毛泽东、党中央根据参考报道作出重大决策或发表重要言论的例子不胜枚举，举其要者，如：

1935 年底，根据《参考消息》及时反映的“一二·九”学生运动情况，作出决定：派刘少奇到北方局恢复和加强地下党的工作，直接领导国民党统治区的抗日救亡运动。

1937 年 7 月 7 日晚 11 点左右，向仲华、左漠野快速把刚收到的“中央社”关于卢沟桥事变的几份电讯呈送毛泽东。毛泽东阅后立即查看地图，并指示：“你们今晚要继续抄收这方面的消息，不要遗漏，有什么消息，随时送来给我看。”第二天，党中央就发出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

1942 年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关键时期，《参考消息》关于战况的报道，对毛泽东研究这一重大事态来说，还不够充分。博古社长便把有关的外电电讯统统调去，供毛泽东作资料参考。《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中题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一文，就是毛泽东在对这些外电报道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写成的。

1945 年 8 月 10 日傍晚，新华社电台抄收到外电关于日本乞降的紧急电讯。吴文焘副社长立即快步跑到博古社长的住处，摇通电话，直接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听后指示吴文焘，有新情况继续汇报。中央领导立即在枣园开会，并作出重大决策：由朱总司令发布延安总部第一号命令，勒令敌伪军就地向日路军、新四军投降。中央还作出了许多具体部署。

八年抗战期间，毛泽东天天根据各国通讯社电讯，研究分析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军事形势和复杂的外交斗争，中国沦陷区的形势，特别是国民党的动向，等等，撰写了许多在国内外产生了重要影响的文件，文电、文章、谈话、评论和报道，在促成国内抗日统一战线的胜利、声援世界反法西斯斗争方面，起了重大作用。阅读《毛选》第三、第四卷时，只要留意一下，就可

发现，不少评论文章引用了许多参考报道材料，或者是针对参考报道提供的有关事体而发。

三、转战陕北令“耳目”紧随

抗日战争胜利后，参考报道作为党中央“耳目”的重要作用，更加突显出来。1945年8月13日，即日本宣布投降的第四天，毛泽东就发表《蒋介石在挑动内战》的评论。同日，他还起草并发出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给蒋介石的电报。8月15日又发表了《评蒋介石发言人的谈话》。这些文电和谈话，引用了大量“中央社”和外电的报道材料，对蒋介石策动内战作了具体而有力的揭露和抨击。

为了适应这场决定中国前途的斗争的需要，1946年春，毛泽东发出“全党办通讯社”的号召，党中央采取措施加强和扩大新华社的“耳目、喉舌”作用，对解放日报社和新华社进行了重大改组，工作重心放在新华社。这次改组中，新华社正式成立电务处，电务人员增加到70多人。在新的编委会讨论办通讯社的会议上，当时任新华社第一副社长的陈克寒谈了新华社担负的任务，第一项就是“抄收各国电讯”，也就是当好中央的耳目。

新华社的文字和口语广播，是传播党中央声音的“喉舌”。中央明确规定，在战争情况下，这两项广播都不能中断。毛泽东和周恩来在1947年3月撤离延安前，曾就此多次关照，并到新华社进行检查。

要保证“喉舌”正常运作，“耳目”——参考报道一天也不能停止工作。因为党中央要根据参考报道分析形势，制定政策，发表言论。

1947年初，中央决定由范长江带领一个新华社小分队，跟随毛泽东转战陕北。这个番号为“四大队”的“小新华社”的第一项任务，就是“抄译国民党‘中央社’电讯和路透、美联、合众等通讯社的部分英文电讯，供中央领导同志及时了解国内外情况”。“四大队”在转战陕北期间，克服重重困难，编辑出版《参考消息》，供中央领导阅读。但《参考消息》的报道数量和时效，对毛泽东研究分析形势远远不够。所以，“四大队”每天还送给毛泽东一大叠手写的电讯译稿，遇到大事和紧急消息则立即汇报。

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和胡乔木，对这些参考报道看得非常仔细，在这些稿件和电讯上，用毛笔、铅笔画了许多圈、点、线，写了不少眉批、旁注。他们通过这些情报信息，及时分析时局发展动向，并撰写出一篇篇社论、评论，如《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努力奋斗，迎接胜利》和《人民解放军大举反攻》等等。转战陕北一年，上述五位领导同志撰写的新华社社论、评论达70多篇。其中，毛泽东写的为数不少，其他同志写的，也多由毛泽东修改定稿。这些评论文章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各战场的军民，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

四、充分利用参考报道揭露美蒋反动派

1948年春，解放战争捷报频传，全国胜利在望。与此同时，在政治上同国民党的斗争也更加激烈和针锋相对了。在党中央转移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后，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的新闻、述评和评论等越来越多。在这些被誉为“射向国民党的重发炮弹”的评论文章中，毛泽东援引了大量的参考报道材

料。如《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中驳斥的南京国民党政府所谓“光荣的和平”论调以及合众社对这一论调的鼓噪；《评战犯求和》批驳的蒋介石元旦致词及外电关于上海对蒋致词反应冷淡的报道；《中共发言人评南京行政院的决议》中引用的决议内容；《四分五裂的反动派为什么还要空喊全面和平》中引用的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的谈话，等等，都来自“中央社”和外电报道。这些评论文章大都是毛泽东在夜间写成的，引用的许多参考材料是当天晚上《参考消息》刚刊登出来的。

为满足毛泽东、党中央日益增多的对外部情报信息的需要，这期间，新华社抄收的各国通讯社电讯不断增多，共计抄收 30 家的新闻广播。收集的信息内容范围也越来越广，更加注意配合斗争的需要。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后，1949 年 3 月，毛泽东、党中央即北上北平，新华社总社也随着进驻香山，从进北平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半年时间内，围绕着同国民党的军事、政治斗争，同美国的外交、政治斗争，毛泽东及时而充分地使用了大量参考材料。比如，在我军渡江前夕，同国民党进行的关于《国内和平协定》的谈判，关系重大，中外关注。毛泽东通过参考报道，及时了解国民党及尚在其统治下的地区各方的态度及反应，以及国际上，特别是美国的动向和反应。他撰写的评论《南京政府向何处去？》对南京国民党政府内三部分人的透彻剖析；谴责南京当局 4 月 1 日镇压要求接受中共八项和平谈判条件的示威学生造成伤亡一百多人的惨案，等等，其中引用的参考报道不少，而为写这些评论，他看的参考材料就更多了。

开国前夕，对美国关于中美关系白皮书的批判，有着重大的政治意义和深远的影响。毛泽东从 8 月 14 日起接连发表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和《“友谊”，还是侵略？》等五篇评论，深刻地揭露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帝国主义本质，指出国内知识分子阶层中一些人对美国存在不切实际的幻想，并从理论上论述了中国革命的发生和取得胜利的原因。这场批判的靶子——美国国务院 1949 年 8 月 5 日发表的关于中美关系的白皮书，及艾奇逊国务卿 7 月 30 日给美国总统杜鲁门的信，都是根据外电报道及时译编出来的。当得知毛泽东要写评论后，新华社英文翻译组又对译文作了反复认真的校对。

五、认真仔细阅读写下大量批语

新中国成立后，参考报道数量不断扩大。从 1955 年 3 月 1 日起，在继续出版《参考消息》的同时，创刊《参考资料》。毛泽东虽日理万机，异常繁忙，但对《参考资料》给予非同寻常的重视，除秘书从中挑选出重要文章推荐给他阅读外，他坚持亲自阅读这一每天多达 15 到 20 多万字的刊物。他在 1959 年 3 月说：“现在的报纸我只看一些消息，但是《参考资料》、《内部参考》每天必看。

毛主席阅读《参考资料》非常认真仔细。每每遇到重要之处，总是划线或圈点；有疑问处则打问题或写下质疑；有差错还认真地予以修正；对一些有重要参考价值的文章，作眉批旁注，并推荐给其他领导或身边工作人员阅读。在这些批注中，毛泽东鲜明的立场观点和对问题的透彻观察，跃然纸上，以他看过的 1958 年 9 月 24 日下午版《参考资料》为例，有 20 篇文章有他的眉批旁注，文内留下密密麻麻的圈圈点点和有长有短的杠杠线线。如在《梅

农说联大为充分讨论我代表权问题是违反世界大多数人民愿望的行为》的标题旁批注：“极好！要看。”对《阿登纳认为现在只有苏美两个大国有一天中国将加入大国行列》一文，他批注：“值得看！！”对《美联社说美在联大阻挠对我代表权问题的讨论甚为孤单》一稿，他批注：“极重大，值得看。”对《美联社透露美企图利用中美会谈阻挠我解放台澎金马这一阴谋如不得逞就打起联合国招牌来干涉我国内政》一稿，批注：“这是一篇极重要的文章，值得看。”

1958年11月他看了李普曼写的《苏联的挑战》一文，批示：“此件印发，值得一看。”

1958年12月，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将《参考资料》上刊登的三篇报道，亲自重做标题、重写提要，批示邓小平印发给与会中委阅读。

毛泽东对一些有助于了解世界形势、认清对手政策意图的参考报道，常常批示在更大范围的报刊登载，或者作公开报道。比如，1950年12月28日，他批求“可将胡佛演说以资料名义刊于人民日报第四版及世界知识上”。又如，1953年2月28日，他在《内部参考》上看到台湾新闻媒体关于我华东和南军力部署的报道，立即写信给新华社：台湾大道通讯社的两条消息，可移载《参考消息》，这是蒋介石向美国人说的，表明他无力进扰大陆和海南岛，和近几个月前蒋介石向美国通讯社发表的谈话为同一性质。1959年4月5日，《参考资料》刊出《印度新闻社报道西藏叛乱情况》和《印度新闻社记者报道西藏叛国分子谈几年来准备发动叛乱情况》，毛泽东在这两篇报道的目录旁边批以“可阅”，并指示：即送周恩来阅。这个新闻社的这两条报道，是不利于尼赫鲁的，我看可以全文发表，请与吴冷西一商⁽¹¹⁾。

毛泽东还一直把《参考资料》作为他增加知识的重要“教材”。他在1971年到外地巡视途中对各地负责人谈话时说：“我天天当学生，每天看两本《参考资料》，所以懂得点国际知识。”周恩来1972年8月1日在人民大会堂对各部门负责人讲话时说：“毛泽东说，他要学点新知识，主要靠两本《参考资料》。”

一生酷爱读书、知识非常渊博的毛泽东，在阅读《参考资料》时，也表现出强烈的求知好学欲望。由于读得认真仔细，他总是握有丰富的、新鲜的国际知识。同他交谈过的许多外国名人，对他关于世界局势的精辟分析和渊博的国际知识，都表示钦佩和惊异。

六、非常重视《参考消息》一再提出扩大发行

毛泽东一向提倡我们的同志关心时事，要为干部研究时事提供材料。早在1939年他就强调指出：“系统地研究时事问题，并为一切抗战干部供给材料，实在是必要与重要的了。”⁽¹²⁾1956年，他提出把只限党内外高级干部看的《参考消息》扩大发行到县委以上干部。1958年他又指示：“要把《参考消息》的阅读范围扩大到全国的高等院校学生。”三年困难期间，由于纸张严重不足，《参考消息》不得不大大压缩订数。当经济形势和纸张供应情况一出现好转，他便提出增加《参考消息》的发行份数。1964年6月，他在同外宾谈话中说：《参考消息》的订阅范围，“以后要逐步扩大，今后可以增加至50万份，80万份。只要纸张问题能够解决，做到每个公社、每个工厂都有一份，还可以发给个人。”一个月后，他又提出，《参考消息》发行

量今后增加到一百万份。

“文革”开始后，《参考消息》扩大发行受到影响。1970年夏，毛泽东指示，《参考消息》扩大发行到基层党支部。1971年6月，毛泽东批准《参考消息》刊登斯诺采访毛泽东、周恩来的一组报道后，订数猛增，到年底达到604万多份。

周总理1973年9月同蓬皮杜会谈时说：“《参考消息》数量很大，不是几十万份，而是几百万份。……毛主席说还太少。照主席的意见发几千万份才好。”

新华社和有关各方经过多年的努力，《参考消息》的订数到毛泽东去世的1976年，已达到870多万份。最高峰是1979年4月，达到910多万份。还不包括大字版(13)的份数、赠阅份数和各代印点的份数。

《参考消息》的发行份数，远远超出国内任何一家日报，在世界上也属少有。《参考消息》在20多年时间内，取得如此巨大的发展，毛泽东的英明决策和大力提倡，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参考消息》出版发行问题受到毛泽东如此重视和关心，在国内报纸中实属少见。

七、确立大小“参考”的报道思想

毛泽东特别重视参考报道，是出于指导革命、推进建设和开展外交斗争，以及锻炼广大干部、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战略的需要。

1. 毕生重视并大力倡导调查研究的毛泽东，把“大参考”作为对外部形势和问题进行调查的主要情报信息来源，作出决策、发表言论的重要依据和了解外界对中国反应的重要渠道。

毛泽东对“大参考”的报道，有许多指示和要求，概括起来，主要是：时效迅速，客观全面，切忌主观，如实反映，译编准确。

· 时效迅速 · 毛泽东要求“大参考”报道时效迅速，有重大事件和局势变化时，立即提供外电报道；中国采取重大举措时，及时提供外界反应，有的影响很大的行动，他指示等外电有了报道，再正式宣布。如1964年10月我国首次爆炸原子弹成功，根据他的指示，在外电反应纷至沓来后，才正式发布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抗美援朝、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等，也是这样。

毛泽东总是希望尽快尽多地看到外电报道。在延安时，由于条件所限，新华社每天的参考报道和传递方式，不能满足他及时研究国内外形势的需要，于是，他常常在晚上亲自到新华社看刚抄收并译出的参考电讯。有时在晚饭后独自走下凤凰山，信步直奔新华社；有时夜间11、12点钟，由警卫员提着马灯陪同前来。他到新华社看参考电讯一看就是一两个小时，并常就时事问题发表看法，提出需要注意的方面。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直接指导参考报道工作，他要求新华社一收到重大新闻，立即向总理办公室报告。周恩来除亲自告诉毛泽东这些重要的国际信息外，常常叮嘱新华社及时向毛泽东提供重要的参考材料。

· 全面客观 · 毛泽东曾多次指示要尽多地收集外部世界各方的情况，特别强调向中央提供参考报道要全面，正面的反面的、好的坏的都要反映。他很重视外界同我唱反调的言论。比如，他看了1957年6月24日《参考资料》刊登的美国《新共和》杂志的一篇文章，在给陈云的批语中写道：“17页有一句话，值得研究一下。这一句话是唱反调的，但也应当促使我们注意。”

(14)

· 切忌主观 · 毛泽东要求参考报道从选材到标题都不要带主观成份，尽量客观。他对《参考资料》上的标题倾向性太大，曾多次提出意见。“文革”期间，周恩来多次强调指出，“毛泽东交代过，《参考资料》不要自己标标题，原来怎么标就怎么标，让读者自己判断”；“《参考资料》编辑有时有些主观，标题作的不一定符合实际内容，其实可以不这样搞，按照毛主席的指示，用人家原来的标题。”

· 如实反映 · 1969年6月17日，毛泽东针对《参考资料》关于我党九大反应报道的标题批示说：“外国人，外国党评论九大，编者不要随意加‘妄评’字样，如实地向中央提供就可以了。”这里虽然是指的标题，但“大参考”要如实地、原原本本地反映外界关于中国的议论，是他一贯的思想。至于记者写内能，毛泽东说：中央给记者的任务就是如实反映情况。记者反映情况就是执行自己的职责。中央怎样判断，这是中央的事。他强调“我们的情报要真实，不要扯谎”⁽¹⁵⁾。记者要如实反映情况，必须作调查。对调查应持的态度，毛泽东说：“调查应本实事求是原则，有则有，无则无，多则多，少则少，力避主观夸大，但也不要故意缩小。”⁽¹⁶⁾

· 译编准确 · 毛泽东要求“大参考”的报道准确无误，发现译编差错便给予批评指正。在转战陕北期间，“四大队”提供的参考材料中，把一条“中央社”电讯的电头错为“合众社”。毛泽东发现后，把“四大队”负责人范长江召去，严肃地质问：“长江同志，你为什么造谣呢？……如果我党中央把国民党的报道当成美国的报道来批评，岂不让人家笑话吗？”1958年10月，《参考资料》关于台湾海峡地区局势报道未抓住美台矛盾加剧的动向，不符合中央政策，受到毛泽东的批评：“从最近《参考资料》上台湾海峡地区局势新闻的标题和编排可以看出，《参考资料》的编辑人员不了解中央在这方面的政策和方针。他们应该好好学习。”

2. 毛泽东把《参考消息》作为一个特殊的窗口和一种特殊的教材，让广大干部和群众透过这个窗口，了解和认识复杂的世界；有时还通过这个窗口就将要发生的重大事态选择外电外报有关的报道，向读者“吹风”；让党内外同志通过这张独特的报纸，接触反面材料，经受锻炼，健康成长。

中共中央确定，扩大发行的《参考消息》“选载当天收到的各外国通讯社、台湾国民党通讯社所播发的消息，和各国报刊、台湾香港报刊所发表的有参考价值的材料”⁽¹⁷⁾。毛泽东说，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的人“经常比较敌我两方的宣传，让他们知道世界是复杂的，每个问题都有对立面。这样才参培养他们思考问题判断问题的能力”。他强调《参考消息》“连那些骂我们的言论也登”，“不要封锁，封锁起来反而危险”。

毛泽东很重视反面教材的作用。他说：“发行《参考消息》以及出版其他反面教材，就是‘种牛痘’，增强干部和群众在政治上的免疫力。”⁽¹⁸⁾他还说，“没有‘蒋委员长’，六亿人民教不过来的，单是共产党的正面教育是不行的。”⁽¹⁹⁾他利用反面教材的一个常人不敢为的例子是：在西藏发生叛乱、印度反动派大肆进行反华宣传时，他指示《参考消息》刊登印报诬蔑中国、丑化毛泽东形象的漫画。这样做，诚如他提出由《人民日报》发表西方报刊污蔑他是“比希特勒更甚者”的言论漫画时所说的一样，是“让世界人民想一想，在西藏问题上和革命与反革命界限问题上闹清楚”⁽²⁰⁾。

毛泽东让《参考消息》刊登敌人攻击言论，包括诽谤他的材料，表现出

伟大的政治家气魄的宽阔的胸怀。但他对有关中国重大举措的外电报道的处理，则非常缜密、严谨。突出的例子有，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过鸭绿江这一重大行动，他当即写信给胡乔木：“外国通讯社如对志愿军有反映，请注意在四、五天内不要登载在《参考消息》上。”⁽²¹⁾从这一安排上我们可以领略到，在毛泽东作出重大决策时，《参考消息》作为全局中的一个棋子也在他的运筹之中。

毛泽东的一些批示表明，说得好听与不好听，不是登不登《参考消息》的界限。为了让人民认清帝国主义反共反华的面目，有时往往选登其具有代表性的诬蔑攻击言论。

毛泽东一再指示《参考消息》报道不要倾向性太大，标题要尽量客观，让读者自己判断。1972年10月7日，周恩来指示：“《参考消息》从今天起一概不要有倾向性，完全客观，毛主席已说过多次。”

毛泽东关于《参考消息》的一系列指示，体现了人民领袖对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关心和信任，以及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战略思想。

毛泽东、党中央出于革命斗争的需要，在形势将出现重大转折或将有重在举措时，便让《参考消息》选登一些有关的外电外报材料，向大家“吹风”，使人们在思想上有所准备。

1957年扩大发行《参考消息》，同当时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不无关系。1956年苏共20大后，世界共运内部矛盾发展，斗争加剧，相继爆发的波匈事件，在中国广大党员和干部中引起很大的震动。因为他们从报纸上只知道社会主义国家团结、进步等光明面，出了大问题便难以理解。所以，中共中央在1956年底发出的关于扩大《参考消息》订阅范围的通知中说，“有必要使我们的干部，及时地知道我们的敌人的情况和敌人的观点，以及我们的朋友的那些和我们有所不同的观点，以便避免他们在观察时事问题时的片面性和思想僵化现象”。《参考消息》报扩大发行后刊登了大量“兄弟党的通讯社和报刊的材料”，使广大干部对随后来临的共运大论战有了一定的思想准备。

这方面产生重大影响的一个突出例子是，毛泽东批准《参考消息》于1971年6月刊登斯诺采访毛泽东、周恩来的一组报道，为中美关系将出现重大变化和纠正林彪、江青一伙的极左行径，在群众中作了广泛的思想准备。

八、光辉的思想成功的创举

毛泽东关于参考报道的论断和指示，闪耀着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是他在指导中国革命和国际外交斗争中决策思想和新闻思想的重要内容，是对唯物论的反映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成功运用和发展。

（一）毛泽东长期坚持从客观实际出发来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他说，“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²²⁾，“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²³⁾。他把调查研究提到了决策的前提地位，采取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决策权的科学态度。他指出，“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主义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²⁴⁾。

毛泽东身体力行，亲自从事调查实践。他总是尽可能地掌握材料，以便作出正确的分析判断。在陕北期间，他就强调指出，“研究时事问题须先详

细占有材料”，认为这是科学方法论的起码一点⁽²⁵⁾。在他的倡导下，党中央1941年作出的《关于调查研究的规定》规定：要“收集敌友我三方关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的各种报纸、刊物、书籍，加以采录、编辑和研究”。党中央的这一决定和前述毛泽东的一系列指示和批示，可以说就确定了参考报道的基本来源与内容的广泛性，和它首先是为中央研究形势作出决策服务的职能。新华社参考报刊长期实行的及时、全面、客观、准确的报道方针，就是根据毛泽东、党中央的指示在实践中形成的。

毛泽东关于从调查实际入手的决策思想，他关于调查研究的理论和实践，是参考报道工作珍贵的思想财富和理论源泉。

(二)毛泽东把为党中央决策服务的参考报道，扩大到面向干部群众，创造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从未有过的新的新闻形态——参考新闻。这是毛泽东新闻思想的一个独特的内容。

新闻报道属上层建筑，是为一定的阶级服务的，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毛泽东关于新闻的论述自始至终都贯穿着这一观点。他在1957年的一次谈话中说：“什么是新闻？有各种不同的观点……西方通讯社的东西，凡是对我不利的我就不登，只选择一些事实报道，这是从阶级利益出发的。”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又多次推动扩大《参考消息》的发行范围，要求把它办成“天下独一无二的报纸”——一张“看样子”是“替帝国主义出版”的报纸。这看来似乎是矛盾的，其实是统一的，都是为了无产阶级的利益。

1957年春天，毛泽东在包括最高国务会议的几次重要会议上，接连阐述为什么扩大发行《参考消息》。他说：“这是为了锻炼我们。党内外都应该受锻炼，应该见世面，知道一点世界上的事情：敌人怎样骂我们，敌人家里的事情是怎样的。有人说这样会乱，不会乱的。”“就是要见世面，要经风雨，不要坐在暖室里头。暖室里长的东西是不牢固的。”他关于出版反面材料的“种牛痘”的论断，蕴含着深刻的辩证哲理，“种牛痘”似是“放毒”，实为“抗毒”，使读者“产生一种免疫力”。《参考消息》遵照“种牛痘”的思想办报，刊登资产阶级新闻媒体的材料，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取得良好效果。几十年来，在我国的政治风浪中，特别是最近几年面对苏联东欧剧变产生的强大冲击波，中国广大干部和群众表现出政治上相当强的免疫力，参考报道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而参考报道对人们开阔眼界、开放思想产生的直接的和潜移默化的影响，更是众所称道的。《参考消息》的历史被誉为“领先开放的光荣历史”。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努力学习和掌握毛泽东的决策思想和新闻思想，对参考报道更好地为贯彻党的基本路线服务、更好地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单位：新华通讯社)注释

在《参考资料》1955年3月1日创刊前的《参考消息》，和战争年代先后曾用《无线电材料》、《每日电讯》等名称出的参考报刊，因主要供中央领导干部阅读，故本文列在“大参考”范围。

据新华社史料记载。本文所引用的材料除具体注明出处者外，均来自新华社档案和有关记录，就不一一注释了。

据任质斌《回忆红中社》。任质斌曾为红中社负责人。

据左漠野《把卢沟桥事变的消息送给毛主席》。左漠野当时任新华社

编辑，向仲华曾为新华社主要负责人。

据吴文焘《纪念新华通讯社建社五十周年》。吴文素曾任新华社副社长。

《参考资料》1955年3月1日创刊后，曾每天出上午版、中午版和下午版，60年代改为上、下午版两册，80年代改为现在的每天一册。

(19)《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70页，第387页。

这三篇报道是：杜勒在西雅图商会发表的攻击人民公社和共产主义的演说，杜勒斯在美国基督教全国委员会上发表的全面分析国际形势的演说和美国“新教领袖们”通过的主张承认中国的声明。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740页。指的是美国前总统胡佛1950年12月20日在纽约发表的关于国际形势和美国对外政策的广播演说。

(1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第70页，第233页。

(1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200页。吴冷西当时任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总编辑。

(12)(15)(25)《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46页，第127页，第46页。

(13)《参考消息》大字版是为照顾年老同志用四号字排印的，内容与小字版一样，实即小字版的放大。

(1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523页。美《新共和》杂志的这篇文章题为《在我们的对华政策上的辩论》。文章在“垮台论”的小标题下，一开头便说：“‘一百万人委员会’说，‘北京政权现在并不能牢靠地控制住大陆。’工业产品、猪肉、棉花和煤的缺乏，反映出一种‘严重的经济危机’。”毛主席批示注意的即这句话。

(17)1956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关于扩大《参考消息》订阅范围的通知。

(18)毛主席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3月在最高国务会议和天津市党员干部会议上，先后就扩大发行《参考消息》发表重要讲话。本文所引他关于《参考消息》的谈话，未另加注释者，都出自这三次讲话。

(20)《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243页。

(2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580页，胡乔木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

(22)(24)《反对本本主义》，第2页，第5页。

(23)《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53页。

论毛泽东的科学技术政策思想

刘则渊

在毛泽东的思想遗产中，有关科学技术及其战略和政策方面的论述和思想，是不可遗忘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我们重新学习和重新认识，并加以继承和发展。新中国科学技术事业和巨大成就，是同中国共产党关于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和政策联系在一起的，其中毛泽东的科学技术政策思想为此起到开创性、奠基性的作用。

毛泽东的科学技术政策思想，是在我们党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在我们纪念毛泽东诞辰 100 周年之际，重温和研究毛泽东关于科学技术政策方面的论述和思想，对于进一步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对于学习和理解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都是很有意义的。

毛泽东关于科学技术政策思想的理论基石

制定正确的科学技术政策，必须以正确的科学技术观为理论根据和指导思想。毛泽东在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的过程中，对自然科学和技术的性质特点、社会功能和发展规律，做过许多理论分析和概括，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观，并以此作为科学技术政策与战略思想的科学基础。我认为，毛泽东的科学技术政策思想主要建立在两个理论基石上：一是关于科学技术双重性质的观点，二是关于科学技术双重功能的看法。

关于科学技术的本质属性，马克思通过对劳动过程中人与自然之间进行物质交换过程的深刻分析，认为科学技术本质上反映了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都属于生产力范畴。不过，自然科学是这种能动关系的知识形态，反映了人对自然的理论关系，属于潜在生产力；而技术则是这种能动关系的现实形态，体现了人对自然的实践关系，属于直接生产力。从这个角度看，科学技术具有自然属性。但是，科学技术又是在一定社会条件下产生和发展的一种社会现象，是人们适应社会需要经过社会劳动的一种社会产物，因此又具有社会属性。但具有社会属性的东西本身未必都有阶级性。毛泽东明确地指出：“自然科学分两个方面，就自然科学本身来说，是没有阶级性的，但是谁人去研究和利用自然科学，是有阶级性的。”自然科学作为知识体系，虽然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但不同于具有阶级性的一般社会意识形态，不属于上层建筑，而属于知识形态的一般社会生产力，因而没有阶级性。科学技术的研究与应用这种社会活动也可以分为两个方面：科学技术的研究开发本身，包括自然科学对自然界的研究和在生产中的应用，各种实验技术、生产技术和应用技术的开发与应用，都是没有阶级性的；只有在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利用，为某个阶级所控制，以其思想来支配，并用来为该阶级服务这个层面上，才表现出阶级性来。因此，随意给科学技术活动及其成果贴上阶级标签，并据以制定科技政策，对科技本身的学术活动与学派争论进行政治干预，必然妨害科学技术的发展。同样，以科学技术本身无阶级性，来否定党对科技工作的政治领导，否定马克思主义对科学研究的思想指导，也不利于科学技术事业的健康发展。

此外，毛泽东还分析了科学技术这一复杂社会现象的其他一些性质特征。他认为，科学技术的基本原理具有世界普遍性或国际性。“水是怎么构成的，人是猿变的，世界各国都是相同的。”他认为，技术在形式上还具有某种民族的或地域的特殊性，而且有些独具民族性的技术可以国际化，可以技术出口。他说：“中国的豆腐、豆芽菜、皮蛋、北京烤鸭是有特殊性的，别国比不上，可以国际化。穿衣吃饭也是各国不同。印度人穿的衣服就和中国人不同，它是适合印度的环境的。中国人吃饭用筷子，西方人用刀叉。一定说用刀叉的高明、科学，用筷子的落后，就说不通。”制定科技政策，不独要依据科学技术的本质特征，而且还要考虑科学技术多方面的性质特点。

毛泽东关于科学技术性质的科学分析，是其科学技术政策思想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石。如果说，毛泽东关于发展科学技术的“百家争鸣”和“洋为中用”的方针，主要基于科学技术本身的无阶级性和世界普遍性，那么，关于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科学研究的方针和科技队伍政策，则主要基于科学技术的社会属性方面。毛泽东把科学实验作为一项革命运动并提到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战略高度，也是基于他对科学实验和生产斗争等实践形式不同性质的科学区分。

毛泽东科学技术政策思想的另一个理论支柱，是他对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 and 价值作用的深刻理解。关于自然科学的功能作用，毛泽东提出“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的思想，指出：“人们为着要从自然界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自然界里得到自由。”而“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他认为“必然王国之变为自由王国，是必须经过认识和改造两个过程的”。这里，他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由和必然的辩证规律的充分发挥，深刻地揭示了自然科学具有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双重功能。但是他特别强调马克思关于“改造世界”的观点，赋予“自由”这一哲学范畴以新内容，因而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认识世界的哲学、更是改造世界的哲学观点看，更加突出自然科学改造自然的功能。一般认为，科学的主要功能是认识自然，而技术的主要功能是改造自然。的确，就科学和技术的直接目的而言，二者的主要功能有所区别。但就它们的最终目的来说，二者都履行着改造自然的相同功能。如果就人们把握必然、获取自由的过程看，科学和技术之间、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之间又是交叉渗透的。毛泽东曾举例说道，“你要知道原子的组织同性质，你就得实行物理学和化学的实验，变革原子的情况。”自然科学就是通过科学实验的技术手段从变革自然中认识自然，发现自然规律；当自然科学所揭示的规律进而转化为技术并应用于生产实践中，便达到改造自然的目的。这就是“从改造世界中去认识世界，又从认识世界中去改造世界”的辩证过程。这就是说，科学和技术都具有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双重功能，只是二者的主要功能各有侧重而已。这是毛泽东从哲学角度对科学技术的多重基本功能所做的精辟分析。

当然，科学技术还有更广泛的多种社会功能。毛泽东曾在许多论述中谈到科学技术对生产、经济、文化、军事、教育、思想和哲学等多方面的影响和作用。例如，在延安时期他就说过“自然科学是很好的东西，它能解决衣、食、住、行等生活问题，所以每一个人都要赞成它，每一个人都要研究自然科学。”解放后，他一再号召全党干部要学习自然科学、学习技术科学，

主张在全国人民中普及科学技术知识，在全国蔚成尊重科学、重视科学、学习科学、发展科学的社会风气。制定科技政策的目的，就是要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广泛的社会功能与价值作用，让科学技术造福于人民。可以说，重视和发挥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是毛泽东科技政策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

必须指出，在科学技术的多种功能中，最突出、最主要、最现实的功能是生产力功能。而制定科技政策的最根本目的，就在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于使科学技术的生产力功能充分发挥出来。毛泽东曾指出：“中国一切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科技政策思想的最根本的理论基石就在于此。我国在通过社会革命，改变生产关系，为生产力发展创造了先决条件之后，就要通过科技政策手段，进一步调整科技工作方面的技术性生产关系，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发挥科学技术的生产力功能，依靠科学技术来发展生产力，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经济技术的落后状态，为新的社会制度奠定强大的经济技术基础，使我国从落后的农业社会变为先进的工业社会。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指出：“民主革命的中心目的就是使中国人民从侵略者、地主、买办手下解放农民，建立近代工业社会。”从经济基础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厂（社会生产、公营的与私营的）与合作社（变工队在内），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从技术基础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我们现在还没有获得机器，所以我们还没胜利。如果我们永远不能获得机器，我们就永远不能胜利，我们就要灭亡。……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¹¹⁾在社会主义时期，他进一步指出，“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好，而且必须打好。过去我们打的是上层建筑的仗，是建立人民政府、人民军队。建立这些上层建筑干什么呢？就是要搞生产。搞上层建筑、生产关系的目的，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现在生产关系改变了，就要提高生产力。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¹²⁾他在这里明确强调了科学技术的生产力功能。他还从我国近代史上多次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沉痛事实，总结出“落后必然挨打”的历史教训，论证了发展科学技术，提高生产力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近代以来我国之所以多次挨打，他认为，“其原因，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因此，在社会制度改变之后，“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¹³⁾毛泽东和我们党有关发展科技经济的方针政策，正是站在这样的战略高度上提出来的。

毛泽东关于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的基本思想

科技发展战略是制定科技政策的指南和总纲，而科技政策则是实现科技战略的措施和保证。科学技术发展战略是关于科学技术领域全局性、长远性发展的指导原则与谋划，也可以说是科技发展的总方针和总政策。毛泽东关于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的基本思想，是他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曲折历程中逐步形成的。

50年代中，在社会主义改造进行中，毛泽东就提出要同时进行技术方面的革命。他说：“我们现在不但正在进行社会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正在进行技术方面的由手工业生产到大规模现代化机器生产的

革命,而这两种革命是结合在一起的。”⁽¹⁴⁾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1956年他提出要走适合国情的中国工业化道路,并提出要进行技术革命、革技术落后的命,要努力学习科学知识,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1958年,他再次提出要来一个技术革命,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放在技术革命上去,强调一定要鼓一把劲,一定要学习并完成这个历史赋予我们的伟大的技术革命。1960年,他批示了“鞍钢宪法”,提出有领导地、一环接一环、一浪接一浪地实行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城乡经济技术革命运动。同时,他还提出“在企业不断进行上层建筑、生产关系和生产技术的三大革命”⁽¹⁵⁾。1963年,他第一次把科学实验作为一项革命运动,指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

从毛泽东的这一系列论述中,可以看出,他把科学技术作为一种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伟大革命力量,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¹⁶⁾的思想。这些论述构画出以技术革命或经济技术革命运动和科学实验革命运动为主线的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的基本思想。

关于“技术革命”,毛泽东后来提出应当和技术革新加以区别,并对此作了明确的界定:一般小的技术改革,可以叫作技术革新;而在技术上带根本性的、有广泛影响的大的变化,叫作技术革命。他还举例说:蒸汽机的出现是一次技术革命,电力的出现是一次技术革命,当今世界的原子能(现在叫核能)的出现也是一次技术革命⁽¹⁷⁾。至于“经济技术革命”,从他的上述学说和马克思的有关论述看,既包含群众性的技术革新活动,又包括对技术手段和生产方式进行根本性变革的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众所周知,发端于欧洲的近代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是自发完成而事后追认的。毛泽东提出在中国有领导地自觉地开展技术革命或经济技术革命,的确是一个有创见的战略思想。

关于科学实验,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它是从生产实践分化出来的独立实践活动,是导致现代自然科学达到科学的、系统的和全面发展的实践前提。毛泽东在《实践论》中第一次把科学实验作为同生产斗争、阶级斗争一样重要的社会实践形式。1963年,他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从哲学角度重申了这三项实践,并在同一年从战略高度把科学实验作为一项革命运动,提出了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战略思想(细微的差别是阶级斗争的次序放在首位)。应当说,把科学实验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实践形式和革命运动,提到同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同等重要的战略高度上来,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贡献。毛泽东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战略家,他的战略思想总是以他的哲学思想为理论根据的。在他看来,在经济技术、科学文化十分落后的中国,不开展一场伟大的技术革命、经济技术革命和科学实验革命,落后面貌不可能根本改变。他特别强调技术革命,就在于它对改变中国落后的生产力具有最直接的作用。

毛泽东关于以科学实验和经济技术的革命运动为主线的科技发展战略思想,不是孤立的,而是他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总体战略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个战略总格局中,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分别成为社会政治、生产经济和科学技术三个领域的子战略。三个领域的战略又是相互联系、相互结合的。科学实验和生产斗争的革命,

通过技术革命而联接起来，而技术方面的革命又同阶级斗争即社会制度方面的所有制革命结合起来，从而达到三项革命运动三位一体、环环相扣，实现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战略目标。而且，全社会的三大革命运动又同企业的上层建筑、生产关系和生产技术三大革命相衔接，把宏观战略和微观战略贯通起来。可以说，这是我国在 50 年代至 60 年代的社会背景下，关于政治、经济、科技全面变革与发展的战略蓝图。这个总体战略构想的内容，从一般理论意义和社会意义看，同当今学术界科技界广泛谈论的相互关联的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产业革命和社会革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以科学实验和技术革命力主线的科技发展战略，是毛泽东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和科技发展道路的一种努力。为了实现这个战略设想，采取了两个方面的对策措施：一是制定全国长期科技发展规划并加以实施；二是开展群众性的科学实验和技术革新。1956 年，党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周恩来和聂荣臻直接领导和主持制定了我国第一个长期科技发展规划，即《1956 年至 1967 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这个“十二年科技发展规划”一方面根据我国工业化建设现实需要，提出 57 项重大科技课题；另一方面根据战后世界新技术发展趋势，在计算机、半导体、自动化、无线电、核技术和喷气技术等新技术领域采取六大紧急措施。这个规划经过实施并提前完成，使我国一系列新技术从无到有发展起来，带动了一系列新兴工业部门的诞生和发展，初步改变了我国科学技术落后的状况，缩小了我国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特别是在这个基础上“两弹一星”的成功，不仅是核技术和航天技术两大领域的重大突破，而且标志着我国在实施技术革命战略上迈出可喜的一步。同时，毛泽东倡导的群众性科学实验和技术革新，在企业 and 农村也开展起来。这项群众性科技活动，在“大跃进”期间虽然存在大哄大嗡等缺陷，但对于在工农群众中普及科技知识，提高技术水平，促进工农业生产技术进步，起到不可小视的作用，还从中涌现出一批象倪志福、李瑞环那样的工农技术革新家和发明家。今天，这项群众性科学实验和技术革新活动，在现代化建设的现实生活中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在探索中国工业化的道路中，毛泽东对与此相关的技术发展道路也很关注。他指出：“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大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¹⁸⁾这段加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文字，表示了毛泽东对周恩来在报告中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给予了肯定，尤其对四个现代化关键的技术发展道路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为了开辟一条中国自己的工业化道路和技术发展道路，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和后来一些论著、批示和信件等文献中，提出了同经济技术密切相关的产业结构、产业布局和技术选择等方面的一些战略方针和具体政策思想。例如：

在产业结构方面，他从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战略高度，提出要调整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投资比例，采取多发展农业和轻工业、满足人民生活需要、多积累资金，促进重工业更多更快发展的新路子，改变过去照抄苏联模式、片面注重重工业而忽视农业和轻工业的失调状况；要处理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民用工业和国防工业的关系，提出了降低军政费用比重、多搞经济建设、再支持国防建设更大进步的战略方针；他还敏锐地觉察到合作化后刚刚萌发的农村产业结构变化情况，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农村副业的发展、

特别是社队企业的初兴非常关注，认为中国光辉灿烂的希望就在这里。

在产业布局方面，他认为要处理好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在改变历史形成的工业布局不合理状况、大力发展内地工业的时候，不能低估沿海工业的老底子，提出要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来带动和支持内地工业发展的战略思路：同时在工业宏观布局中要处理好中央直属工业和地方工业的发展关系，只能在全国范围内而不是在各个地方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技术体系。

在技术选择方面，对于是采用先进技术，还是传统技术，发展天然石油还是走人造石油的技术道路，发展西医还是中医抑或是走中西医结合的道路，是否发展人造卫星、原子弹、氢弹，如何发展现代通讯技术、交通技术和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化肥化，以及手工业半机械化、机械化技术和工艺美术品、民族工艺技术等一系列具体技术政策上，毛泽东都很注意，并依据我国实际和专家建议，做出了具有现实性或带有超前性的决策。其中，农业技术政策是毛泽东最为关注、也研究得最为细致的一个领域，农业“八字宪法”便是他提得最具体详细的一项技术政策典型。

毛泽东关于发展科学技术的基本方针政策

为了保证科学技术事业的社会主义方向，必须坚持党对科技工作的领导。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领导，是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领导。毛泽东指出：共产党能管科学，我们能者是政治上能⁽¹⁹⁾。党对科技工作的政治领导，主要通过两方面来实现的：一方面通过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另一方面通过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保证科学技术工作按照自身的规律去发展，出成果出人才，为社会主义建设多做贡献。毛泽东在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力求把握科学技术的发展规律，来确定有关发展科学技术的各项方针政策。下面从政策思想角度来考察其中的四条基本方针。

关于发展科学技术的“百家争鸣”方针。这是毛泽东总结科技发展的历史经验和现实状况而提出的。自然科学不同学派、不同理论的矛盾运动，是自然科学发展的一条内在规律。由于认识自然的复杂性，自然科学不同观点、不同学派之间的学术争论是经常发生的，科学上的是非真伪并不是可以轻易做出判断的。毛泽东指出，“为了判断正确的东西和错误的东西，常常需要有考验的时间。历史上新的正确的东西，在开始的时候常常得不到多数人的承认，只能在斗争中曲折地发展。正确的东西，好的东西，人们一开始常常不承认它们是香花，反而把它们看作毒草。哥白尼关于太阳系的学说，达尔文的进化论，都曾经被看作是错误的东西，都曾经经历艰苦的斗争。我国历史上也有许多这样的事例。”⁽²⁰⁾这种事例在40年代的苏联和50年代的中国又重新出现。苏联曾在遗传学上强制推行米丘林学派，压制和批判摩尔根学派，还给一些科学理论扣上“资产阶级”帽子大加批判。我国也曾跟着苏联去批摩尔根学派，甚至给它贴上“反动”的标签。我国还一度把中医当成“封建医学”，提出要加以取缔，把西医看作“资本主义医学”，提出要进行改造。这种做法严重妨碍了科学的发展。鉴于这种情况，毛泽东于1956年提出“百家争鸣”的方针，把它作为促进科学进步的方针，作为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他提倡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反对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学派而压制另一种学派。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科学界的自由讨论

去解决，通过科学的实践去解决。他还亲自关心遗传学的百家争鸣问题，对行政干预学派争论的错误进行批判，鼓励受到压制的遗传学家坚持真理，从而推动了百家争鸣方针的贯彻执行。

关于学习国外科学技术的“洋为中用”方针。科学技术是没有国界的，科学技术的一般原理在世界各国是相同的。毛泽东认为，“基本理论，这是中外一致的，不应该分中西。”⁽²¹⁾因此，科学技术能够在世界各国各地进行传播与转移。历史表明，经济技术落后的国家在独立自主发展科学技术的同时，学习和引进已经成熟的国外先进科技成果，加以消化吸收，往往是发展科技、振兴经济的一条捷径，花费的代价较少，而且是可以逐步缩短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的。毛泽东指出，“自然科学方面，我们比较落后，特别要努力向外国学习。但是也要有批判地学，不可盲目地学。在技术方面，我看大部分先要照办，因为那些我们现在还没有，还不懂，学了比较有利。但是已经清楚的那一部分，就不要事事照办了。”⁽²²⁾他认为对外国的科学文化，一概排斥和全盘吸收，都是错误的。同时也不能把洋为中用和自力更生两个方针对立起来，学习外国科技成果，可以增强自力更生的实力；而自主研究开发的能力越强，吸收外国先进成果的能力也越强。他主张学习外国先进的科学原理，用来研究中国的东西，发展中国的科学技术，做到洋为中用。他还依据马克思关于“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的观点和方法，并以学习西医用以研究中医为例，阐明“洋为中用”的含义和作用：“如果先学了西医、先了解剖学、药理学等等，再来研究中医、中药，是可以快一点把中国的东西搞好的。马克思讲过，首先研究近代社会，就容易理解古代社会。这是倒行的，却要快些。”⁽²³⁾

关于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科学研究的方针。这是毛泽东基于自然科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之间的辩证关系而提出来的。他通过对这一辩证关系的考察和概括，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自然科学的思想。1940年，在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包含有自然科学，大家要来研究自然科学。”同时又指出：“自然科学是要在社会科学的指挥下去改造自然界。”⁽²⁴⁾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他进一步讲道：“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正如它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物理科学中的原子论、电子论一样。”⁽²⁵⁾正是根据这一思想，毛泽东一再号召搞自然科学的，要学会用辩证法，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指导科学研究。这一方针的目的在于提倡科学家自觉地用唯物辩证法去观察和分析自然现象，发现自然规律，避免错误的哲学世界观的误导和支配，在科学研究中少走弯路。但这种哲学指导作用并不能代替具体的科学研究，不能用抽象的哲学思辨和哲学套语的简单化、庸俗化作法去取代在科学实验基础上的科学分析，更不能以现成的哲学结论为标准去裁决科学上的是非。毛泽东非常关注科学技术前沿领域的最新进展，一方面是为了进行哲学概括去丰富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也是引导人们通过对科学技术问题的哲学分析，去指导科研工作更快地取得成果。例如，他对坂田昌一关于基本粒子模型研究的重视，对哈工大关于积木式机床矛盾分析的关注，都是如此。我国许多重大科技成果的取得，都是同科技工作者自觉地运用唯物辩证法分不开的。其中，我国科学家关于基本粒子结构的层子模型，就是用毛泽东哲学思想指导科研工作的一个例子。对科研的哲学指导作用，能否见成效，关键在

于科学家和科研人员对唯物辩证法是否融会贯通，自觉不自觉，运用灵不灵活，方法得不得当。唯物辩证法提供的只是开启智慧之门的钥匙，而打开科学真理大门的钥匙则是艰苦的科学实践。这就是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能够指导而不能代替自然科学研究的思想的真谛。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个方针并不是具有强约束力的政策规定，而只是一个软约束的指导性方针。

关于建立科学技术队伍的基本方针。发展社会主义的科学技术事业，没有庞大的科学技术人才队伍是不行的。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一贯重视知识分子问题，重视科学技术专家。1956年，他在《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一文中讲到：“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目标，决定一切的是要有干部，要有数量足够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²⁶⁾后来，他进一步从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战略高度上提出建立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他指出：“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的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这是一个庞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这是历史向我们提出的伟大任务。在这个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宏大新部队没有造成以前，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是不会充分巩固的。”⁽²⁷⁾从毛泽东的许多论述中可以看出，他把造就工人阶级的技术队伍放在非常突出的地位上。这是因为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工农业生产部门和其他经济部门及技术部门不断扩大，迫切需要大批技术人才，也是他提出的开展技术革命的战略思想的必然要求。但是他又是把技术队伍放在整个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的总战略方针中，作为其中的组成部分来看待的。为此，他提出了旨在造就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的一系列方针和政策。根据当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刚刚开始不久的社会背景，基于当时知识分子的现状和他对知识分子的估计，毛泽东提出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基本方针。这个方针把知识分子作为团结对象，通过说服教育的方法，使他们的思想得到改造。其目的在于充分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毛泽东关于建立工人阶级科技队伍的方针政策同知识分子政策是相一致的。就其主要内容而言：一是强调把政治与技术统一起来，走又红又专的道路；二是提倡结合科学实践学习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科学研究；三是鼓励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与生产实践相结合，用科技成果为工农服务、为生产服务。今天来看，虽然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方针已经过时，但他提出的造就工人阶级科技队伍的历史任务和关于知识分子政策的上述内容，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毛泽东在科技政策与战略上的贡献和失误

前面我们力求按照邓小平关于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观点，从散见于毛泽东著作中有关科学技术的论述，对毛泽东科技政策思想作出较为完整准确的概括。在开展这项研究中，我们发现存在三个反差：一是毛泽东关于科学技术的论述同毛泽东的大量著作相比，同他在政治、军事、经济、历史、哲学、文艺和教育等方面的著述相比，少而分散，不成比例；二是毛泽东在科技方面的论述同全党有关科学技术政策的文献相比，同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这方面的著述相比，同样显得少而零散，不成比例；三是

毛泽东在科技方面虽然论述较少，但份量很重、观点鲜明、见解深刻、言简意赅，论述虽然分散在许多著作、批示和信件中，但涉及面却很广，有关科技与哲学、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教育、政策和战略等许多方面的相互关系的问题几乎都谈到了。对毛泽东有关科技及其政策和论述在量和质两方面的分析，我们看到毛泽东在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他一生在理论和实践上的重点之所在，也看到他对科技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战略问题的思想，确实洋溢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智慧，散发着战略家的眼光，从中看到这位历史伟人在一定历史时代的条件下所能做出的贡献和无法避免的局限性与失误。

毛泽东对科学技术政策思想的主要贡献及特点，概括地说主要是：

其一，他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上，从科学技术的本质观、价值观和发展观上，尤其是从政策是否有利于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这个根本基石上，来确定科学技术的政策和战略的。这也为我们指明了研究科技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

其二，他是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战略高度上，把科学技术作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革命力量，提出以科学实验和技术革命为主线的科技战略思想的，并倡导群众性的科学实验和技术革新活动，力求探索出一条中国自己的技术发展道路。

其三，他提出了“百家争鸣”、“洋为中用”、“又红又专”等发展科学技术的基本方针和造就科技队伍的重要原则，既体现了党对科技工作的正确领导，又符合科技工作的特殊规律，并以人们喜闻乐见的民族语言形式来表征其政策内容，而使其家喻户晓，深得人心。

总之，毛泽东在科技政策思想上的历史功绩集中到一点，就是他为我们党和国家科学技术政策与战略的形成，起到开创性、奠基性的作用，为我们建立完整的科技政策体系和科技发展战略，提供了正确的观点、思路和方法。他对一些重大科技问题的正确决策，他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巨大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同历史上任何伟大人物一样，毛泽东也有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毛泽东在科技政策战略思想上也存在理论与实践上的失误。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战略实践上对技术革命的急躁冒进和用阶级斗争为纲对待科技工作，二是在政策理论上对包括科技人员在内的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错误估计。这种失误是同他晚年所犯的“左”倾错误联系在一起的。让我们分别做一些分析。

如前所述，毛泽东的科学技术战略思想，主要是在 50 年代中后期形成的。一开始他主张把社会制度方面的所有制革命同技术方面的生产力革命结合起来，但是在他的推动下原定 15 年实现的三大改造却用 3 年时间就提前完成了，这导致他认为可以加快技术革命的步伐，迅速赶上世界科技先进水平。尤其是 1957 年在政治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于 1958 年他提出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放在技术革命上(这当然正确)，并试图在“十二年科技发展规划”之外，用“大跃进”的方法，以“一环接一环、一浪接一浪”的群众运动方式高速度地完成技术革命。显然，这是试图超越经济和技术发展的必经阶段，使处在手工生产方式为主的中国，在短时间内毕其功于一役来完成西方发达国家经历二百年的两次产业革命和技术革命。这种对国情估计上的主观主义偏差、在技术革命上的急躁冒进和在经济建设上的急躁冒进一

起，随着“大跃进”的失败而告结束。可惜，他关于开展技术革命并把工作重心转到技术革命上的正确战略思想，也因此而未能坚持下来。由于他对国内形势和主要矛盾作出错误估计，把阶级斗争为纲作为党的工作中心，再也未能把发展生产力作为主要任务，因而科技工作也相应置于次要地位。60年代初尽管他提出把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项社会实践作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大革命运动的战略思想，但由于阶级斗争放在“纲”的最高战略位置上，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却当成“目”，从属于“反修防修”的阶级斗争之“纲”而在现实中被忽视，这不仅未能实现“纲举而目张”的设想，而且“抓纲带目”变成“以纲代目”。所以，当50年代后期关于以技术革命为重点的科技发展战略思想在“大跃进”的战略实践上遭受挫折后，60年代以科学实验的革命运动为内容的科技发展战略，实际上基本成为虽有战略思想而无战略实践，虽有战略高度却无战略地位的一种空想战略。这种以阶级斗争为纲统帅一切、统帅科技工作的思想，在“文革”中被“四人帮”加以利用而被极端化，在科技界造成阶级斗争决定一切、冲击一切的恶果。这也是毛泽东本人始料未及的。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未能适时引导全党把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转到发展生产力上；他本人一度想转移工作重点却未能如愿。从客观上来说，由于他大半生都生活在中国社会大变动的时代，形势迫使他主要致力于社会变革。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²⁸⁾这恐怕不是自谦，而是准确的自我评价。即使从这个角度看，由于他把注意力集中在阶级斗争上，因而也未能找到适合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具体的经济体制和科技体制。从他提出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加上工业“以钢为纲”和农业“以粮为纲”的“三纲”方针看，从他对科技是生产力这个马克思主义观点重视不够看（从他的一些论述看，对科学技术的生产力功能还是明确的、强调的），都说明他对生产力问题确实研究不够。这是他在科技战略的实践上既一度冒进而后又被搁置这种双重失误的一个主观原因。

毛泽东的另一个重大失误，是他对我国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左”倾错误分析与估计。前面曾经谈到毛泽东历来重视知识分子、重视造就工人阶级科技队伍，并且对旧中国知识分子状况做过相当精辟的分析和估计，并据此提出了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毛泽东在这方面的失误在于没有根据情况变化重新做出正确估计，并及时进行政策调整，而且当我们党贯彻执行这一政策，我国知识分子经过思想改造运动和社会主义改造运动，面貌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的情况下，1956年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宣布知识分子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时候，毛泽东却作出相反的估计。他认为，知识分子大多数虽然赞成社会主义制度，“但是就多数人来说，用无产阶级世界观完全代替资产阶级世界观，那就还相差很远。”由于“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²⁹⁾他不是用“为谁服务”的政治立场而是用世界观标准，而且以“完全”、“基本”属于什么世界观来划分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这就近乎用他自己一再反对的所谓“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这种“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的界值来苛求知识分子了。这种错误标准和错误估计，导致后来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而阶级斗争扩大化又使毛泽东否定党的八大对国内主要矛盾的科学判断，而认定阶级矛盾是长期的主要矛盾，并把知识分子一般地列入“第二个剥削阶级”。这严重伤害了广大科技人员和知识分子的感情。

1962年，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再次重申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而不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当中央对此出现争论，周恩来要求毛泽东表态时，他竟未置一辞。这表明他仍然坚持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世界观标准与“左”倾估计。其结果是科技界知识界在“文革”中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对象，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正确方针被改为知识分子接受“再教育”的错误方针。尽管毛泽东对科学家很尊重，同他们交朋友，却对整个科技队伍做出“左”的估计。他自己提出要建立的工人阶级科技队伍，已经初步形成并站在他面前的时候，他却断定基本上是属于“资产阶级”的，因为这不是他理想中的世界观“完全”是纯粹无产阶级的科技队伍。即使如此，绝大多数科技人员和知识分子始终同党风雨同舟、和衷共济，兢兢业业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证明了广大知识分子确实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毛泽东在上述两方面的失误，主要根源于他晚年的某些“左”倾理论观点，也说明他带百空想色彩的某些理想模式的碰壁，同时还反映出他急切改变我国“一穷二白”落后面貌的意愿上的主观偏差，反映出他探索中国自己的经济社会和科学技术发展道路的某些努力遭受挫折。因此，他的这些失误虽然是根本性的、战略性的失误，但毕竟是探索者在探索中的失误，是为变革梨子而尝试梨子滋味却尝到苦果的失误。他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贡献，同他一生对整个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贡献一样，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

毛泽东晚年出现了令人遗憾的失误，现在可以告慰的是，他在这方面的失误，已经早为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纠正过来了。邓小平以马克思主义战略家的气魄，从纠正毛泽东在科技战略与政策思想上的两大失误入手，以“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为出发点，在坚持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和知识分子队伍是工人阶级组成部分的两个理论基石上，对毛泽东的科技政策思想作了创新和发展，邓小平关于经济是中心、科技是关键、教育是基础的协调发展战略思想，关于经济体制、科教体制、政治体制相配套的全面改革战略思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关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思想，以及有关科技发展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使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战略和政策体系进入一个系统、成熟的新阶段，并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中的组成部分而日臻完善起来。我国科学技术事业也相应进入繁荣进步的黄金时期。毛泽东生前提出的彻底改变我国科学技术落后状态、迅速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伟大任务，无疑还需要做艰苦的努力，但光辉灿烂的前景已经展现在我们面前了。

(作者单位：大连理工大学)

注释

(14)(19)(27)(29)《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44页，第182页，第351、472页，第462—467页，第407、409页。

(13)(18)(20)(21)(22)(23)(26)(28)《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48页，第748页，第485页，第485页，第485页，第848—849页，第849页，第784页，第754页，第742页，第748页，第718页，第829页。

(24)《在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新中华报》1940年3月15日。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87~288页。

(25)《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79页，第874页。

(11)《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37~239页。

(12)转引自龚育之《一段历史公案和几点理论思考》，《自然辩证法研究》1991年第11期。

(15)转引自1977年9月14日《人民日报》。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75页。(17)转引自钱学森《关于新技术革命的若干基本认识问题》，《迎接新的技术革命》，湖南人民出版社1948年版。

毛泽东与自然科学

吴义生

从 19 世纪起到 20 世纪，地球上掀起了两股震荡世界的浪潮，一股是由自然科学急速发展而引发的技术革命浪潮，另一股则是由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广泛传播导致的社会革命浪潮。二者相互助长，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促进社会变革，冲击着世界上众多的民族和国家，连封建统治异常严密、长期闭关锁国的中国也没有能够避免。在世界革命浪潮的推动下，长期遭受民族欺凌和封建剥削的苦难中国人民已不堪重负，许多先进分子纷纷起来学习科学知识，接受新思想，探索救国救民真理。毛泽东是这个队伍的杰出代表，他以惊人的勤奋，刻苦学习，自觉实践，终于从一个普通农民的儿子成长为伟大的革命家，卓越的理论家，学识渊博的学者，从而领导中国人民缔造了共和国，成了新中国，对中国和世界作出了永远不可磨灭的贡献。

毛泽东能够成为历史伟人，是因为他有许许多多杰出之处，将自然科学与自己的读书生活、理论活动和领导工作紧密结合起来，一生尊重自然科学，自觉地学习和应用自然科学，也是一个值得高度重视的方面。毛泽东与自然科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的革命活动为自然科学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道路和创造了条件，而自然科学却帮助毛泽东成长，接受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领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当然不能说自然科学对毛泽东的革命生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是毛泽东从自然科学那里得到了从别处得不到的许多东西，这些东西对他进行革命活动和决策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是起了重要作用的。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对毛泽东的自然科学的理论和实践进行深入地研究。

自然科学帮助毛泽东认识世界，探索救国救民真理，走上革命道路，实现革命目标

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动荡、封建传统思想泛滥和西方思潮冲击的复杂局面下，能够拨开重重迷雾，找到马克思主义真理，确立人生目标，毅然走向革命之路，除了依靠社会实践之外，注意刻苦学习，广泛获取知识，在研究社会科学的同时，自觉地学习自然科学，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在社会实践中毛泽东感受到旧中国社会制度腐败，民不聊生，迫使他研究社会，寻觅救国救民真谛。他在求知中启蒙，从读中国四书五经转而广泛阅读世界各国社会科学书籍，比较系统地研究西方资产阶级启蒙学者的代表作，了解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社会政治学说。在此同时还研读了许多自然科学书籍，有达尔文的《物种原始论》、赫胥黎的《天演论》等，了解西方许多新的自然科学思想。由达尔文创立和被赫胥黎所坚持的进化论，所揭示的是生物界的物竞天择、优胜劣败、适者生存、进化无止境的客观规律。这种自然科学学说引入中国后，当时处于国破家亡困境的中国知识分子是把它作为一种社会学说，当作一种新兴的发展观和宇宙观来接受的。他们用进化论思想宣扬自强、自立、自治，冲破封建束缚，蔑视传统思想权威，解放思想，激发救国图存的热忱。但是毛泽东却没有只停留在这一步，而是像马克思那样把进化论当作社会上阶级斗争的自然科学依据，肯定斗争和革命对人类社会的巨大推动作用，提出只有革命和斗争才是民族生存之路，进化论思想成为毛泽东从民主主义走向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阶梯。毛泽东成为革命家后还经

常谈到，青年时代对他印象深刻的西方自然科学著作是达尔文的《物种原始论》。

进入师范学校以后，毛泽东虽然学了一些自然科学知识，但探索社会奥秘的强烈愿望，迫使他专修社会科学。但进一步的学习和实践却又使毛泽东认识到知识是一个体系，没有自然科学就学不好社会科学，学习自然科学有特殊重要的意义。毛泽东仔细研读了斯宾塞尔的《群学肄言》，看到斯宾塞尔将科学进行分类，认为逻辑学、数学、物理学、化学揭示自然界各个领域的变化和规律，教人以法则；生物学、博物学则教人学会运用综合方法寻找事物的内在联系，从整体上把握自然界。在治学过程中，只有学会运用分析综合的方法，才能穷理尽性。由此毛泽东深感研究社会科学的人，应该具有自然科学基础知识，掌握自然科学方法。从此下大决心纠正学有所偏、基础不牢的毛病，把学习自然科学，吸取自然科学的思想和方法作为读书生活的一部分。

毛泽东接到在法国留学的罗学瓚的来信后，特别重视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密切联系。深感自己研究哲学“缺乏数学、物理学、化学等自然科学的基础知识”，决心在较短的时间内“设法补足”。在组织《新民学会》时，他提醒会员注意学习自然科学。同时，毛泽东开始运用自然科学作为思想武器向封建势力展开斗争。他在主编的《湘江评论》杂志上，尖锐地指出社会的思想空虚、腐败和人民的愚昧、迷信，是“科学思想不发达的结果”。信科学则生，“不信科学则死”。学习自然科学是毛泽东求知的一个明确目标，自然科学成为他向旧势力斗争的武器。

经过建党和苏区斗争，结束万里长征到达陕北后，建立了以延安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革命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新的任务要求提高马列主义水平，增强领导中国革命的本领。毛泽东进一步发愤读书，埋藏在心底的对自然科学知识的渴求又萌发了出来。这时，已不再只是为了增长知识，而是把自然科学当成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基础，通过揭示自然科学的性质、功能和社会作用，自然科学与新民主主义、自然科学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来认识掌握自然科学的特殊重要性，把学习自然科学和应用自然科学结合起来。他特别提醒青年人，只有科学是真学问，要多向自然科学学习。毛泽东还告诫全党：“马克思主义包含有自然科学，大家要来研究自然科学，否则世界上就有许多不懂的东西，那就不算一个最好的革命者。”这段时间，他在日理万机之余通过多种途径学习自然科学，了解自然科学的新发展。除了通过读马列著作如《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中国和苏联的各种哲学著作学习自然科学外，还直接研究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期自然科学成果和许多自然科学名著，如汤姆逊的《科学大纲》，普朗克的《科学向何处去》，秦斯的《环绕我们的宇宙》，爱丁顿的《物理世界的本质》等等。在毛泽东的倡导和组织下，当时中央领导同志读书学习，钻研自然科学，提高科学知识素养和领导素质，蔚然成风。

建国以后，繁重的社会改造、经济恢复和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的任务，迫使毛泽东加紧学习自然科学。这时的学习内容既广又深，方法更加多样化，在繁忙的领导工作中，更加注意挤出时间把握中国和世界自然科学的新成就，了解自然科学的学术动态。既从书本、报纸和杂志上接受新知识，通过参观科技成果展览和工农业展览、到外地考察等方式联系实际学习自然科学和技术知识，还通过接见科学家与科技工作者讨论自然科学问题来学习。因

而对现代科学技术的新发展，诸如微观粒子结构、生命遗传、对称理论、原子弹、氢弹、火箭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等尖端科学技术知识都有所了解。正是通过学习，使他跟上了现代科学技术前进的步伐，认识到中国人民掌握尖端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向全国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

毛泽东确信，学习自然科学，坚持科学实验，是共产党人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推动社会进步的巨大精神力量。早在1937年，毛泽东就把“科学和艺术的活动”看成为社会实践的一种形式，到1963年则强调科学实验、阶级斗争、生产斗争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因此，毛泽东十分重视领导干部学习自然科学。

1955年，毛泽东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指出：“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就是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思考的、所钻研的，是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只要我们更多地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更多地懂得自然科学，一句话，更多地懂得客观世界的规律，少犯主观主义错误，我们的革命工作和建设工作，是一定能够达到目标的。”到1958年初，毛泽东又进一步提出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要转移到技术革命和经济建设上来。他说：“提出技术革命，就是要大家学技术，学科学。”“过去我们有本领，会打仗，会搞土改，现在仅仅有这些本领就不够了，要学新本领，要真正懂得业务，懂得科学和技术，不然就不可能领导好。”学习和掌握科学技术，提高领导者的自然科学素养，被毛泽东看成是在新时代做好领导工作所必须具备的一个重要条件。

二、研究自然科学，掌握马克思主义，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促使毛泽东加强自然科学学习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真正把握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冲破传统世界观的束缚，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高度，克服党内存在的严重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

毛泽东看到，马克思主义中包含自然科学，哲学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概括和总结，自然科学对于人们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只有认真研究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才能准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并进一步发展它，使之与实践相结合而发挥作用。

毛泽东广泛涉猎了近代和现代自然科学的许多领域，对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天文学、地质学、土壤学、人类学、农学、医学和科学史，对于水利、冶金、机床制造、核能、火箭、航天等技术科学部门，都有浓厚兴趣。他所了解的不仅有近代自然科学中牛顿的机械力学，哥白尼的太阳系和康德-拉普拉斯的天体演化理论，19世纪自然科学中的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细胞学说、进化论、元素周期律等等，而且对20世纪自然科学中的相对论、微观粒子结构、宇称守恒、对称问题、遗传理论等也有所了解。广博的科学知识使他插上理论思维的翅膀，得以在哲学世界遨游，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谛，为建立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打下牢固的科学根基，使之具有浓郁的时代气息和鲜明的时代特征。

自然科学帮助毛泽东成为一个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他相信，只有物质才是永恒存在的东西，精神现象不过是物质世界高级生物的伴生物；他将世界的物质性扩展到社会历史活动，使唯物主义更加完整和彻底。

毛泽东概括自然科学成果论证实践观念、实践与认识的辩证关系、认识发展的规律性。他扩展了实践概念，认为人的社会实践，不限于生产活动一种形式，还有其他多种形式，如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活动。而人的认识，主要地依赖于物质的生产活动，但要想获得对自然界的正确认识，还需要亲自参加到科学实践中去。例如，要了解原子的组织和性质，就需要参加物理学和化学的实验，变革原子，取得相关的知识。在取得这些知识之后，还要通过进一步的科学实验验证它们的真理性。这是对科学认识活动规律的揭示和对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原理的科学论证，也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丰富和发展。

在写《矛盾论》时，毛泽东不仅注意广泛引用自然科学成果论证辩证法规律的基本原理，而且特别注意通过分析现代自然科学的变革来丰富和发展唯物辩证法。他在应用自然科学知识剖析机械运动、电磁运动、化学运动、生物运动和社会运动论证矛盾的普遍性时，还依据事物按不同运动形式进行科学分类的思想，深入论述矛盾的特殊性。

对于自然科学知识的应用，毛泽东从不局限于个别事例和个别领域，而是从整体上概括自然科学验证宇宙的永恒运动规律，用科学事实来阐述唯物辩证法的基本思想。他指出：自然界和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停止的观点是错误的观点，因为它不符合大约一百万年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也不符合迄今为止各种自然科学史如天体史、地球史、生物史等所反映的自然界的历史事实。“地球上原来只有无生物，生物是后来才有的，是由无生物即死物转化而来的。生物都有新陈代谢，有生长、繁殖和宛亡。在生命活动的过程中，生与死也在不断地互相斗争、互相转化。”这样，就用自然科学材料有力地证明了新陈代谢、有生有灭是宇宙间普遍的永远不可抗拒的辩证法规律，将辩证法规律活生生地体现在我们面前了。

毛泽东很注意研究自然科学前沿的理论问题，从中吸收新的科学思想，从新的科学发现中概括出新的哲学命题。他关心物理学中微观粒子结构和对称问题，他再三找科学家交谈，探索其中的奥秘，认为这些问题与唯物辩证法有密切联系。他概括 20 世纪以来微观粒子物理学的资料，重新提出了物质是无限可分的理论观点。在 1957 年，他说：“你看在原子里头，就充满矛盾的统一。有原子核和电子两个对立面的统一。原子核里头又有质子和中子的对立统一。质子又有质子、反质子，中子又有中子、反中子。总之，对立面的统一是无往不在的。”到 1965 年，他又提出：宇宙从大的方面是无限的，从小的方面也是无限的，是无限可分的。这个理论结论丰富了唯物辩证法，反过来又给物理学家进一步探索“基本”粒子层次的以下的结构以强有力地思想指导。中国的高能物理学家运用这个理论观点提出了强子结构的层子模型，为夸克粒子的发现打下了基础。国外的微观物理学家很敬佩毛泽东物质是无限可分的见解，在 1977 年召开第七届粒子物理学讨论会时，著名微观粒子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金获得者格拉肖在谈到物理学家是象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地深入物质结构时，提出洋葱还有更深的一层吗？夸克和轻子是否都有共同的更基本的组成部分呢？许多中国物理学家是一直维护这种观念的。如果发现了这个层次的物质组成部分，格拉肖提议把它们叫“毛粒子”（Maons），以纪念已故的毛泽东，因为他一贯主张自然界有更深层次的统一。

可以说，正因为毛泽东善于从科学中包括注意从自然科学中吸取思想营

养和科学论据，他才能冲破中国传统哲学的束缚，走向马克思主义，并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推向前进，成为坚定的辩证唯物主义者。

三、运用自然科学，探索经济规律，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毛泽东通过研究科学和研究社会，看到自然科学和生产发展有着天然的联系，因而十分重视科学技术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的推动作用。

早在 1940 年，毛泽东就指出：“自然科学是很好的东西，它能解决衣、食、住、行等生活问题。所以每一个人都要赞成它，每一个人都要研究自然科学。”从建国初起，我们党就把自然科学与生产建设联系起来，把科学研究当作基本建设，肯定科学是对国防、经济和文化等方面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到 1963 年，毛泽东特别强调：“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过去我们打的是上层建筑的仗，是建立人民政府、人民军队。建立这些上层建筑干什么呢？就是要搞生产。搞上层建筑搞生产关系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现在生产关系是改变了，就要提高生产力。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因此，依靠科学技术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成为当时领导工作的指导思想。

毛泽东还指出，科学技术能够帮助我们懂得建设的规律。在 1955 年 3 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毛泽东指出：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我们所从事的、所思考的、所钻研的，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社会主义改造，钻原子能。只要我们更多地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更多地懂得自然科学，更多地懂得客观世界的规律，少犯主观主义错误，我们的革命工作和建设工作就一定能够达到目的。毛泽东十分注意应用科学和抓技术革命来改变经济面貌，技术革命成为毛泽东所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早在 1953 年在修改《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与学习提纲》时，毛泽东就提出“在技术上起一个革命，把在我国绝大部分社会经济中使用简单的落后的工具农具去工作的情况，改变为使用各类机器直至最先进的机器去工作的情况，借以达到大规模地出产各种工业和农业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着的需要……”。后来，他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文中指出：社会制度方面的革命与进行技术方面的由手工业生产到大规模现代化机器生产的革命是结合在一起的。“中国只有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彻底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又在技术方面，在一切能够使用机器操作的部门和地方，统统使用机器操作，才能使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观。”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还提出了将党的工作重点放在技术革命上去的思想。他在 1958 年 1 月写《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时提出：“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从今年起，要在继续完成政治战线上和思想路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这个想法虽然在“左”的情绪影响下当时未能实现，但它却为今天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奠定了思想基础。

毛泽东针对中国的具体国情，在剖析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时，揭示了农业在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产业结构中的地位与作用，确立了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

建国以后，毛泽东多次指出中国是一个农业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文化落后，农民占 80%，这种国情决定着我们的政策、策略和战略，全党必须十分重视农业。农业关系国计民生，对社会的影响极大。在建国初期，毛

泽东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工业和农业并举的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模式。到 60 年代初，毛泽东又进一步概括出“农业是基础，工业是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体战略思想，还强调“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这是一个普遍规律”。

毛泽东要求全党干部钻农业，学习农业科学技术，努力把中国农业生产提高到现代化的水平。他带头深入农村，钻农业科学技术，提出了著名的农业“八字宪法”。他要求在农业生产中注意抓“水、肥、土、种、密、保、工、管”等环节，使农业生产科学化。后来还向科学家请教，要将“八字宪法”加以修改，加上“气”和“光”二字。到 1962 年，他在党的七千人大会上进一步提出全体干部都要研究农业。他说：“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要较多地懂得农业，还要懂得土壤学、植物学、作物栽培学、农业化学、农业机械等等；还要懂得农业内部的各个分业部门，例如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等等；还有畜牧业，还有林业。我是相信苏联威廉斯土壤学的，在威廉斯的土壤学著作里，主张农、林、牧三结合。我认为必须要有这种三结合，否则对于农业不利。所有这些农业生产方面的问题，我劝同志们，在工作之暇，认真研究一下，我也还想研究一点。但是到现时止，在这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到今天，这些思想对我们党坚持毛泽东提出的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依靠现代科学技术，走调整和优化农业结构、高产优质高效的发展道路，促进经济加速发展，仍有很大的启示作用。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注意将科学技术应用于其他国民经济部门，对气象研究、水利科学、地质勘探、农业机械、邮电通信、铁路、建筑、冶金工业、机床设计等，都提出了许多重要指示，力图使这些部门提高到现代化水平，促使国民经济高速发展。

将科技与经济联系起来，充分发挥科技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抓技术革命促进经济发展，是毛泽东一直坚持的见解，虽然在一段较长的时间里，由于毛泽东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上述思想未能真正贯彻，给中国经济和科技发展带来很大损失。但他提出的上述思想对于帮助我们总结经验教训，真正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的轨道上来，迎接世界新技术革命，进一步把经济发展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繁荣经济，是很有教益的。

四、抓尖端科学技术，壮大国防，巩固社会主义

在国际局势急速变化，敌对势力对新中国虎视眈眈的情况下，毛泽东十分强调运用新兴科学技术加强国防建设。

1955 年 1 月，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正式作出发展原子能科学技术的战略决策。他强调：原子能事业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的时候了，该抓了，我们自己干，一定能干好。1956 年以后，在他的关怀下先后成立导弹研究院和原子能研究设计院，集中钱学森、钱三强等一批第一流的科学家进行研究和设计。

为了抓紧原子能事业，加快进展，毛泽东专门进行调查研究，找科学家座谈了解，研究原子弹、氢弹的原理，铀矿的生成情况等等。在一次有同志谈到核聚变产生出重要元素氦时，毛泽东即兴挥笔，写下了一个苍劲有力的

“氢”字，急于利用尖端科学技术壮大中国国防力量的迫切心情溢于言表。到1956年4月，毛泽东分析我国社会的十大关系，特别说明：“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为了促使我国原子能事业加速发展，有必要全面发展尖端科学技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我国制定了12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把原子能、火箭、喷气技术、电子计算机、遥控技术等科研项目作为重点，为国防尖端科学技术发展奠定了基础。1956年4月中央成立了航空工业委员会，1958年成立了国防科委。毛泽东审阅了中央军委向党中央提出的关于核武器研制情况的报告，在审阅时决断：“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还预言：“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十年功夫完全可能。”在前苏联单方面撕毁技术援助合同和撤走核技术专家，国内经济困难的紧急关头，毛泽东迅速作出了自力更生发展国防科学技术的决定。他批示：“对尖端武器的试制工作，仍应抓紧进行，不能放松或下马。”这使我国国防尖端科技工作后来得以坚持下来并取得成果。

1956年10月1日，毛泽东很自豪地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国产超音速喷气式歼击机。当时在世界上刚刚突破“音障”技术难关制造超音速歼击机的仅有美、苏等国，中国闯入了其列，令世界吃惊。人民空军驾驶这种先进飞机于1958年击落入侵敌机九架，大振国威。1960年11月5日，我国使用新的推进剂，第一颗导弹发射成功；1964年10月16日，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引起世界关注。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又及时提出：“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到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核潜艇是一个国家工业发展水平和科技进步的集中体现，在争取外援遭到拒绝的情况下，毛泽东毅然决策：“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在自力更生、勇攀高峰的精神激励下，只用了8年，中国就研制出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核潜艇下水，使国防科技又上了一个台阶。

毛泽东关心人造地球卫星的研究和试制。1970年4月24日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5年后第一颗返回式卫星发射成功，中国成为世界上一个航天大国。毛泽东在逝世前九天，还审阅了我国第六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的新闻公报。我国人造地球卫星和发射与毛泽东是密切相连的。毛泽东通过抓尖端科学技术来壮大国防力量的正确战略决策已为历史实践所证明，对于今天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五、重视科学技术研究工作，推动中国科技事业发展

毛泽东在重视自然科学学习和应用的同时，还重视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努力为科学技术发展创造条件，推动中国科学技术事业向前发展。

毛泽东努力推动科学技术发展，是建立在对科学技术的性质、功能和社会作用正确认识的基础上。在1940年2月，毛泽东就指出：“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人们为着要在社会上得到自由，就要用社会科学来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人们为着要在自然界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自然里得到自由。自然科学是要在社会科学的指挥下去改造自然界，但是自然科学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却被阻碍了它的发展，所以要改造这种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边区在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社会改造，改变了生产关系，……边区现在的社会制度是有利于自然科学发展的。”

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在建国伊始的1949年11月，就作出了建立中国科学院的决定，当时是把科学研究工作的经费当作基本建设的投资的。1956年1月，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强调知识分子的重要作用。紧接着，毛泽东召开最高国务会议，提出了用几十年时间在经济和科学文化上迅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目标，并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

毛泽东通过分析自然科学的性质，指明自然科学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要求全党注意将科学领域内部的学术问题与社会领域的政治问题和世界观问题区别开，不要用行政命令和政治手段去干涉学术问题，以便为自然科学研究创造宽松的环境。为了便于自然科学的健康发展，毛泽东总结国际国内对待科学研究的经验教训，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他指出：“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调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可惜当时在“左”的情绪的影响下，这个正确的方针没有很好贯彻，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这个方针的贯彻执行，才给科学技术事业带来了新的生机。

为了使中国科学技术事业在复杂形势下能够继续发展，毛泽东特别强调在科学技术研究工作中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探索中国式的科学技术发展道路。毛泽东认为，发展科学技术，也要把力量放在自己的基点上，独立创造，不能依赖别人，依赖别人是靠不住的。毛泽东说：“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当然，独立自主决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并不是盲目排外。科学技术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在强调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原则的同时，要特别注意学习世界各国的先进科学技术，做到洋为中用，通过国际间的交流和合作推动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所以，毛泽东还特别提出向外国学习，对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习的思想。他说：“自然科学方面，我们比较落后，特别要向外国学习。”“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毛泽东一生酷爱学习，对自然科学有浓厚的兴趣，在这方面堪称楷模，自然科学帮助他成长，领导好革命和建设，而毛泽东又促进了自然科学的发展。

他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和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的过程中，所提出的关于科学技术的性质、功能、作用和发展规律的理论，以及关于科技发展战略和政策思想，是十分宝贵的。虽然有一些思想没有实现和贯彻执行，因而延误了我国科技发展和经济建设的步伐，但毛泽东对于自然科学的正确态度和提出的许多宝贵思想，却为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和打下了基础。邓小平正是在这种基础上总结经验教训，提出了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强调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创造性地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使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科学事业走上了正确轨

道。因此，加强对毛泽东关于自然科学的理论和实践的研究，仍然有深远的意义，不可忽视。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

注释

《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2页。

《湘江评论》1919年7月28日第3号、7月14日创刊号。

《人民日报》，1964年12月31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48页，第498页，第388页。

《新中华报》1940年3月15日。

1963年12月聂荣臻等同志向毛泽东汇报科学技术规划时，毛泽东的一段讲话。

引自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64

毛泽东与中国医学文化发展的道路

张国新

毛泽东一贯重视中国人民卫生事业建设，曾对中国医学文化发展道路的问题，给予特别关注。

中国传统的医学文化，是数千年来中华民族与疾病作斗争的经验的结晶，属于中华民族灿烂的古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西医学文化，是随着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医学文化，也是人民群众同疾病作斗争的智慧的结晶，属于世界现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对整个卫生事业的关注，就包括着对中医中药文化和西医西药文化以及它们相互关系的关注。党在各个重大的不同历史时期，都要求自己的卫生事业能够完全适应于其中心工作，为中心工作服务并有一个重大的发展。因此，毛泽东长期都在探索怎样发展中国的医学文化，发展党的卫生事业，怎样使中医中药文化和西医西药文化从总体上更能适应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要求。

毛泽东有一个基本文化观点，即世界上事物总是以新的代替旧的，总是这样新陈代谢、除旧布新或推陈出新的。中国历史传给我们的文化许多都是好的，而在这些遗产中我们必须防止其腐败的东西，已不适合我们今日的中国而只会对国家有害的东西。在外国文化里，也同样有许多我们应该接受的优秀的东西，而在另一方面，也一定有腐败的东西，必须加以破坏。我们应该逐渐实现“东西文明会合”。受这种思想的支配，毛泽东在革命战争的实践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的实践中，就医学文化发展道路的问题，首先根据“组织军事的卫生疗治”原则提出“用中西两法治疗”伤病的主张，接着又针对中西医文化之间相互轻视的现象提出“打破宗派主义”、“中西医合作，开展群众卫生运动”的思想，然后则提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中西医应当团结合作”，借以“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文化的理论。毛泽东提出这样一个独特的基本思想，是对整个卫生事业的重要贡献。他的这种中国医学文化发展道路的思想虽然还未能完全变成现实，但是对于开创人民的卫生事业、创造新医学文化，却都起到了历史性的积极作用。就现实而言，毛泽东提出的上述思想如果能继续得到继承和付诸实践，无疑会对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文化的建立，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

用中西两法治疗伤病

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战争特别需要医学文化，群众迫切需要医学文化。在异常激烈残酷的战争中，在疾病横行的环境中，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清楚地认识到，为着革命战争的胜利，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必须尽一切努力保护劳动力，发展劳动力，保护战斗力，壮大红军队伍。而要做到这点，重要的一环是要想方设法发展自己的卫生事业。并且还据此制定了发展卫生事业的若干方针政策。

毛泽东认为，进行革命战争即以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是共产党人和红军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的根本任务。决定这场战争胜负的因素很多，但人的因素特别重要。现实状况是，战争的伤亡，横行的疾病即“苏区中一大仇敌”，严重地“减弱我军的革命力量”，因此，“组织军事的卫

生疗治”和“发动广大群众的卫生运动”，保障广大指战员和群众的健康，“同是对于革命战争有决定意义的事业”，是每个乡苏维埃的责任。在提出这一根本思想的基础上，毛泽东还具体地提出了建立和发展党和红军的卫生事业的重要作用。首先，他指出：“巩固此根据地的方法：第一，修筑完备的工事；第二，储备充足的粮食；第三，建设较好的红军医院。把这三件事切实做好，是边界党应该努力的。”这就阐明了发展革命卫生事业对于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的特殊作用。其次，他指出：“对敌军的宣传，最有效的方法是释放俘虏和医治伤兵”，“医治敌方伤兵，效力也很大”。这就阐明了发展革命卫生事业对于瓦解敌方的重要作用，说明敌军力量的减弱，也就是增强了我们自己的力量。然后，他还指出：解决好群众的疾病卫生问题，减少以至消灭疾病，这是“最能取得群众的方法”。这种方法，能够使我们真正成为群众生活的组织者，使“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从而使得我们红军的来源不成问题了。这就把发展卫生文化与争取和动员群众积极投入到革命战争中的重要作用的关系阐述清楚了，为了将这种思想变成行动，毛泽东针对当时卫生文化工作存在的具体问题，提出了对党的卫生文化工作的具体要求。他强调指出，卫生问题在战争中具有决定意义，因此，必须发展和搞好卫生事业。“军政机关对于卫生问题，再不能象从前一样不注意，以后各种会议，应该充分讨论卫生问题”，“卫生机关的组织应特别使之健全，办事人要找有能力的，不要把别的地方用不着的人塞进卫生队去。并要增加办事人，达到照料完备之目的。医生少和药少的问题，要尽可能设法解决。对于医生，应注意督促他们看病详细一点，不要马马虎虎”。他着重提出，除祈中共中央和有关省委送西医和一些碘片来外，根据地要举办自己的卫生学校，训练自己的卫生干部。并且要求医学文化工作者要“政治坚定，技术优良”。他还针对革命根据地病人多、伤员多，而西医生和西医药缺乏的情况，中医中药仍是广大群众赖以治病治伤的主要力量的现实，提出：医院要聘请中医师，要成立中医科，组织人员采中草药。并且着重说，草医草药要重视起来，敌人是封锁不了我们的，应该“用中西两法治疗”伤病员。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第一，毛泽东所讲的医学事业，就当时的实现情况看，包括了中医中药文化这个方面。第二，他在重视党的卫生事业建设的基础上提出了“用中西两法治疗”伤病员的观点。

将毛泽东上述卫生工作观点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联系起来看，可以得出这样一些认识：其一，在井冈山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根本的问题是探寻革命战争的正确道路，是进行革命战争，以战争求生存，以多种方式求得维持生命的基本条件。人们的注意力也在于此。因此，当时国内中心地区关于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的问题的争论，就没有能够影响到革命根据地，也没有影响到毛泽东。所以，从这个角度认识，虽然毛泽东提出了医学文化对于革命战争的重要作用的思想以及发展党的卫生事业的一些基本方针、政策，但是，关于中医文化和西医文化的关系的问题，便不可能是毛泽东思考的问题。其二，当时革命根据地医生少药品少与伤病员多的矛盾非党严重，从急功近利出发，党政领导和部门考虑的是，只要能处理这种矛盾，哪怕是暂时的，西医也好，中医也罢，都要用。所以，从这种角度认识，当时也不会存在明显的重视一方忽视一方的现象。那时毛泽东祈请中央和有关省委送一些西医和西药给革命根据地，乃不是瞧不起中医中

药的举动，而是根据许多病员急待抢救，某些西医西药医治某些伤病比中医中药见效快些所产生的合理举动。其三，有关毛泽东的资料显示，当时，毛泽东对中医学文化和西医学文化，具有的多是感性认识，没有更多的理性认识，没有进行过比较研究，也就是说他早年所提倡的“通国学大要”和“求西学大要”，“注意中西之比较”、“东西文明会合”之主张，由于战争环境制约，不可能进行。所以，由此可知，他提出“用中西两法治疗”伤病员，只是基于战争的急需，群众的急需，医学文化“同是对于革命战争有决定意义的事业”之思想。其四，“用中西两法治疗”的概念，本身不含有对“中西两法”关系的辩证思考，因此就不存在使“中西两法”融为一体的思想；“中西医结合”概念，“结合”一词，表明事物与事物之间发生着内在的密切联系，融为一体了。毛泽东历来用词考究，在那时使用“用中西两法治疗”概念，而没有使用“用中西医结合方法治疗”概念，就表明毛泽东还没有形成理性认识的中西医文化观。为此可以说，在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毛泽东具有某种中西医两法都要利用的思想，虽然从客观来说，这种思想及其实践具有蔑视北洋政府“废止中医，不用中药”法令的效果，具有对抗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中央卫生委员会“废止旧医，以根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提案的效果，但不能说具有明确的对中西医都同样重视的思想，更不可能产生中西医文化结合是中国医学文化发展的正确道路的思想。只可以说，战争的急需，开始产生这样的实践了。

中西医合作，开展群众卫生运动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中心任务，仍然是进行革命战争。这一时期，政治局势相对稳定，毛泽东思想已经最后形成并得到全面展开，革命根据地不断得到巩固、不断得到发展，中国共产党人除了继续领导人民群众开展革命战争外，还开始在革命根据地领导人民群众开展政治建设、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这种建设除要求共产党人首先明确回答是进行新民主主义建设外，还要求必须回答怎样进行新民主主义建设。这就促使共产党人开始着手对文化问题进行多角度、深层次地研究，包括对中医学文化和西医学文化以及它们的正确的关系的研究。此外，这一时期，大批大批经济中心地区的向往光明的文化人和知识青年涌入了革命根据地，他们的到来，将各种文化观也带进了革命阵营。这一方面对繁荣革命根据地的文化起到了积极作用，一方面也对革命根据地健康发展的文化带来了不利的影响，如本来不成问题的医学文化为什么人的问题也成了问题；如宗派主义的中医学文化观与宗派主义的西医学文化观，开始各自找阵地，独立山头，对发展党的卫生事业产生了不利影响。这种情况，就加快了共产党领导人对中医学文化和西医学文化以及如何处理它们之间的矛盾的研究。

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从“一切文化教育事业均应使之适应战争的需要”，从巩固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从关心民众疾苦等出发，在“用中西两法治疗”思想的基础上，对中西医关系及中国医学文化发展道路的问题提出了许多新的思想。

医学文化为什么人的问题，毛泽东认为是个核心问题，是决定医学文化发展道路的根本方向的问题。毛泽东在提出要创造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基础上又提出，医学文化及党的卫生事业，应当为革命战争服

务，为人民群众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思想。他明确指出：“专制主义者利于人民愚昧，我们则利于人民聪明，我们要使一切人民都能逐渐地离开愚昧状态与不卫生的状态，各地政府与党组织，均应将报纸、学校、艺术、卫生四项文教工作，放在自己的日程里面。”^①，“应当积极地预防和医治人民的疾病，推广人民的医药卫生事业”。他还说：“还有文化建设”，“要提倡卫生，要使边区一千多个乡每个乡有一个小医务所”。^②“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③（11）很清楚地阐明了党的卫生事业只有坚持为人民群众，首先是为了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使医学文化发展道路的问题同亿万群众结合起来，才能使医学文化更好地为保护社会上最重要的生产力和军队的有生力量服务，为革命战争服务，从而保证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

医学文化发展的正确道路问题，是关系到中国新医学文化能否创造成功的关键问题，是毛泽东倾心探讨的基本问题。中国客观上存在着中医学文化和西医学文化两种大医学文化。这两种医学文化，在中外大文化撞击中，自然也产生了撞击，有火花，也有负效应。为了党的卫生事业建设能够健康和顺利地发展，毛泽东从创造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基本纲领和中西医文化的客观情况出发，在中国共产党高层领导人中最先提出了发展中国医学文化的正确道路的构想。

毛泽东在注意医学文化“中西之比较”后认为，中国传统医学文化是在中华民族长期同疾病作斗争的实践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并且长期以来已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体系。西医文化，也是人类同疾病作斗争的智慧的结晶，同样有着自己的体系。此二者，各有所长，都对人类的健康有着巨大的作用。基于此种认识，毛泽东就如何处理中医学文化与西医学文化的关系的问题，一步步提出具有发展方向性的见解。1939年，为了消除中西医文化相互轻视的现象，他对卫生事业作了“打破宗派主义”的题词。1940年1月，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于中国古代文化，他指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这就阐明了共产党人对待中国古代文化的基本态度，清理传统文化的原则和吸收古代文化精华的目的。对于外国文化，他指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粮食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还做得很不够”。“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但是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这就阐明了，对于外国文化，排外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应当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鉴；盲目搬用的方针也是错误的，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全盘西化”论更是错误的，必须抵制。以上论述表明，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已形成，包括对待中西医学文化的基本观点。1944年4月，毛泽东正式提出“中西医合作，开展群众卫生运动”的思想^④（12）。10月，在《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中，他又说：“在医药方面，更是如此。陕甘宁边区的人、畜死亡率都很高，许多人民还相信巫神。在这种情形之下，仅仅依靠新医是

不可能解决问题的。新医当然比旧医高明，但是新医如果不关心人民的痛苦，不为人民训练医生，不联合边区现有的一千多个旧医和旧式兽医，并帮助他们进步，那就是实际上帮助巫神，实际上忍心看着大批人畜的死亡。”“我们的任务是联合一切可用的旧知识分子、旧艺人、旧医生，而帮助、感化和改造他们。”⁽¹³⁾在这里，毛泽东实际上初步提出了中国医学文化发展道路的问题。1947年3月至1948年3月，在转战陕北的岁月里，毛泽东仍然在对中医中药情况进行调查研究，他曾在访问农户中了解到黄河边的吕家坪地区出产一二十种中药材，乡间祖传中医也不少，群众看病抓药比其他地方要方便些等情况。由此可知，毛泽东是希望在实践中不断深化自己对中医学文化的认识的。毛泽东以上关于处理中西医学文化的思想和指示，对于积极地预防和医治人民群众的疾病，推广人民的医药卫生事业，促进中西医学文化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根据毛泽东这些思想，陕甘宁边区政府多次召开有关会议，通过了相应的提案，如“发展国医加强卫生案”、“提高中医地位以开展国医工作以济病民案”、“成立国医学校案”、“切实执行优待国医条例案”、“加强国医研究开发边区土产药材克服战时医药困难案”等；提出了“帮助、研究、改造中医中药”的方针；监督成立了中西医药研究会，劝中医师公开秘方，学习现代医学以改进业务。陕甘宁边区的三边地区，首先打破门户之见，实行中西医合作，为实践毛泽东“中西医合作”思想，创造了中国的第一。1945年3月，陕甘宁边区成立了中西医药研究总会，林伯渠、李鼎铭提出“实现中医科学化，西医中国化”口号。这些都对共产党人的卫生事业和发展起了重要促进作用。

由上述可知，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提出“中西医合作”的思想，是对“用中西两法治疗”主张的发展，这种发展，是探索中国医学文化发展道路的可喜成果，不仅丰富了毛泽东文化思想，而且在中国中医中药学文化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地位。不过，这种发展还是不够成熟的。毛泽东认为“新医”比“旧医”高明即西医学文化比中医学文化高明，甚至有时将巫医包括在中医学文化之中，并且主张以西医学文化来帮助、感化和改造中医学文化，就含有以西医学文化为主以中医学文化为辅来发展中国医学文化的意思，很值得商讨。1950年以后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中的《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一文里的“高明”一词，在1950年以前有的《毛泽东选集》的版本中是“科学”一词，可见，毛泽东有时是把“高明”一词和“科学”一词通用的。笼统言中医学文化没有西医学文化科学，这是只看到中医学文化没有使用现代科学的语言来说明它的道理，就从某种角度否认它的治疗的实际效果乃至其独立发展中所应当具有的重要地位的结论，具有相当的片面性。应当说，既然中医学文化数千年来在为中国民众的生存和发展的斗争中是曾经有过伟大的贡献，对人类是有用的，能收到较好的治疗的实际效果，就是科学，这中间就包含着科学的意义和科学的成分。中医学文化存在着许多西医学文化所没有具备的优点或特点，它的许多重要的经验是西医学文化没有能够全部包括进去的，西医学文化也不可能在一方面替代中医学文化。因此，笼统地说中医学文化不如西医学文化高明或科学，甚至有时将巫医和中医学文化混在一起谈，是不科学的。从以上分析可以知道，在延安时期，虽然毛泽东没有任何轻视、歧视中医学文化的思想，但是却也未能够完全用科学的观点去理解中医学文化内在的合理性。他的关于中国医学文化发展的正确道路的思想还不很清晰，对待中医学文化的认识仍需要继续发展。

中西医结合起来，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人民民主专政逐渐得到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为中国各族人民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国家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在政治建设和经济建设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在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也批判封建主义之错综复杂的去旧创新的斗争中，随着学习国外先进科学技术蔚然成风、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走向新阶段，轻视、歧视和排斥中医学文化的现象，有所抬头。“中医不科学”、“西医学中医是开倒车、向后看”、“中医中药没有科学根据”等思想，还产生着一定的社会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统一对中医学文化的认识，发掘中国医学文化遗产，使曾经对世界科学技术作出过重要贡献的中医学文化继续能对世界科学技术作出新的重要贡献，并创造出新的更高级的社会主义新医学文化，更好地为人民群众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促进中国科学文化的发展，乃至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发展中医学文化的新思想，并制定了一整套发展中医学文化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明确指出了中国医学文化发展的正确道路。

1950年8月，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召开。毛泽东表达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的中西医结合”是新中国卫生工作的三个基本原则的初步思想，并且作了“团结新老中西医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的题词。同年10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人民卫生工作的正确方向》的社论，说：“中医具有悠久的历史 and 宝贵的经验。但是它被旧中国神秘的五行说的外衣蒙蔽了生理学、病理学和解剖学的真理”。“在为人民服务的目标下，中西医团结合作，是发展我国人民医学的必要步骤”。对于上述观点，毛泽东持某些保留态度，没有表示都赞同。1952年12月，第二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召开，进一步确认了毛泽东提出的“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和团结中西医”三大卫生工作原则，并提出“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这样一个新原则。1953年底，毛泽东发表《对卫生工作的指示》，他针对卫生部门有关负责人的“中医是封建医”、“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应随着封建社会的消灭而消灭”的言论和有关部门制定的限制中医学文化发展的“规定”指出：“我认为中国对世界上的大贡献，中医是其中的一项。中医是在农业、手工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西医是在近代工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医宝贵的经验必须加以继承和发扬。对其不合理的部分要去掉。西医也有不正确的地方，也有机械唯物论。将来发展只有一个医，应该是唯物辩证法作指导的一个医。看不起中医是错误的。把中医提得过高了，也是不适当的。”进而，他在中央会议上还强调说：什么叫科学，有正确的、系统的知识叫科学。中西医都有科学，也都有机械唯物论。并且提出了办中医医院和中医进修等问题。在这里，毛泽东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的高度，对中医学文化和西医学文化进行了具体的而不是笼统的比较，其思想显然较之延安时期又有了发展，重要的是对笼统地说“新医”比“旧医”高明进行了反省，初步明确地提出了“中国应有一个医，不应该长久的有两医”这样一个中国医学文化发展的正确道路的思想。1954年，毛泽东再次对中医学文化问题作出重要谈话，他肯定说：中西医比较起来，中医有几千年历史，而西医传入中国不过几十年，直到今天全国人民疾病的诊疗依靠中医

的仍占 5 万万以上，依靠西医的则仅数千万(而且多半在大城市里)。中医对我国人民的贡献是很大的。中国有 6 万万人口，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我国人民所以能够生衍繁殖，日益兴盛，当然有许多重要原因，但卫生保健事业所起的作用必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这方面首先应归功于中医。接着毛泽东批评说：祖国医学遗产若干年来，不仅未被发扬，反而受到轻视与排斥。在很多方面对中医采取了不适当的限制和排挤政策，以致长时期在社会上存在的中西医对立和歧视中医的情况没有得到改变。如果长期存在下去，不但将使我国保健事业继续受到重大损失，我国这部分文化遗产就有散失的危险。中西医的真正团结未能得到解决，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首先就要各级卫生行政部门思想上要改变。毛泽东还具体提出：今后最重要的是首先要西医学习中医，而不是中医学西医。1. 要抽调 100—200 名医科大学或医学院校毕业生交给有名的中医，去学他们的临床经验。这样就可以把中西医界限取消，成为中国统一的医学，以贡献于世界。2. 各医院要有计划地请中医来院看病和会诊，允许住院病人用中药，并订出尊重中医的各种制度，从制度上加以保证。3. 中药应当很好地保护与发展，要作出具体的规定；对制药人员应按技术水平分别给予技术干部看待。4. 中医书籍应进行整理；时机成熟时中医应总结自己的经验，编出一套系统的中医医书来。⁽¹⁴⁾于此，毛泽东从卫生制度建设角度，提出了真正实现中西医学文化结合从而取消中西医界限而创造中国统一的医学文化的问题，以及中西医学文化结合的中心环节问题即“首先要西医学习中医，而不是中医学西医”问题。至此，毛泽东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文化的思想又有了重要发展。1955 年及其以后，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时期，毛泽东除强调上述思想外，还着重指出：几年来，都解放了，唱戏的也得到了解放，但是中医还没有得到解放。原因是中医在野西医当权。中医药是人民群众赖以防疾治病的主要力量，看不起中医药是一种极端卑鄙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应当看到中医有本事，要当专家来看，按专家接待和待遇。今后医科大学毕业生要学二年中医⁽¹⁵⁾。继而，他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当论及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时指出：学习外国的东西，是为了研究和发展中国的东西。……在自然科学方面，我们也要作独创的劳动，并且要用近代外国的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来整理中国的科学遗产，直到形成中国自己的学派。……学了西医的人，其中一部分又要学中医，以及运用近代科学的知识和方法整理和桥究我国旧有的中医和中药，以及把中医中药的知识和西医西药的知识结合起来，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当然，要把中国的东西和外国的东西很好地结合起来，是不容易的。这要有一个过程⁽¹⁶⁾。这就很准确地阐述了中国医学文化发展道路的问题，中西医学文化结合的基本原则。毛泽东这一思想，得到了中共八大的充分肯定。根据毛泽东这些思想，1955 年 12 月，成立了中国中医研究院和中医研究班；1956 年，中央召开了西医学中医的卫生厅局长会议；并且决定在上海、北京、广州和成都各建一所中医大学。这些措施，对于创造中国的新医学文化起着积极的作用，对于提高中国的医学科学水平、在全国范围开展一个群众性的西医学中医的活动起了促进作用。1958 年及其以后，毛泽东在艰辛地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又对中西医学文化结合的问题，阐发了许多重要思想。1958 年 3 月 10 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批判教条主义的时候，再次提出学习和研究中医文化的问题。同年 10 月 11 日，毛泽东致信杨尚昆，在谈到西医离职学中医的问题时指出：“我看如能在 1958

年每个省、市、自治区各办一个 70—80 人的西医离职学习班，以两年为期，则在 1960 年冬或 1961 年春，我们就有大约 2000 名这样的中西医结合的高级医生，其中可能出几个高明的理论家”。“这是一件大事，不可等闲视之”。

“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¹⁷⁾对西医学文化学习中医学文化的关键问题，提出了具体的实施意见。1959 年 1 月 21 日，毛泽东批发邓小平送审的《人民日报》社论稿《认真贯彻党的中医政策》，再次强调全党要认真对待中国医学文化发展的问题。1965 年，毛泽东在《六月二十六日对卫生工作的指示》中，在提出“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口号的同时，也从一种角度强调了西医学中医从而发展人民的卫生事业的思想。至此毛泽东关于卫生工作的基本原则，又增加了中西医结合、“通过医疗实践把农村的保健事业同城市的保健事业结合起来”这一原则，其中国医学文化发展道路的思想，得到了展开。

从以上论述可以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过程中，毛泽东不仅明确地阐述了中国医学文化发展应走中西医结合的道路并通过这条道路来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文化的思想，而且还清楚地具体地提出了走这条道路的正确方法、方针和政策。这表明他的中西医结合是中国社会主义医学文化发展的正确道路的思想已经最后形成并得到了全面展开。正是在毛泽东这个思想的指导下，中西医学文化在团结合作继承和发扬祖国医学文化精华方面，出现了新的面貌，取得了不可否认的成绩，从而促使人民卫生事业得到相当的发展。

中国民族医学文化是一伟大的宝库。毛泽东提出的中西医学文化应当团结合作，共同学习、研究和整理中国民族医学文化，并且互相取长补短、不断提高，促使中国医学文化产生质的飞跃，从而创造出一种统一独特的新医学文化之理论，实践证明，虽然在实施这一思想的过程出现过这样或那样的偏差，但是其思想本身是完全合乎科学发展规律的。它的正确实施，已经把中国的医学技术发展、社会主义卫生事业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对于生产发展，对于工作，对于学习，对于改造中国人民低弱的体质，对于社会主义事业的进一步发展都起到了应该充分肯定的重要作用。

毛泽东关于中国医学文化发展要走中西医学文化合流的道路的思想，是其“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思想的组成部分，是其一个重要的文化思想，是留给人类的宝贵遗产。这个思想确立了我国卫生事业发展的科学方向，奠定了我国制定卫生事业方针政策的基础，它的完全实现，会使我国产生一个崭新的集古今中外医学文化之大成的社会主义医学文化。这种新医学文化的产生，可以更有效地保障人民群众的健康，提高中华民族的素质，满足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对医学文化的要求，因此，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取得的可喜成绩的基础上，应当继续继承和发展毛泽东这一重要思想，促使我国的医学文化、人民卫生事业尽快出现一个更加十分丰富多彩和雄伟壮观的局面。

(作者单位：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注释

《长冈乡调查》(1933 年 12 月 15 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1934 年 1 月 1 日)。

《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54—54 页，第 67 页，第 65

页。

《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1929年12月)。

《对训练卫生干部的指示》(1931年)。

《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的演说》(1944年12月15日)。

(11)(13)《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83页，第1078页，第1012页。

《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的讲话》(1944年5月31日)。

(12)《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文献辑》，科学出版社，1958年10月版，第221页。

(14)参考《毛主席对卫生工作的指示》，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卫生防病指挥部编，1968年4月版，第83—88页。

(15)《在中央常委会上的讲话》(1955年春)。(16)《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1956年8月24日)。

(17)《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45页。

毛泽东的伦理思想及其传统文化背景

王凤贤

翻开中国几千年来的思想发展史，我们就会发现，伦理道德思想占着特殊重要的位置。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中国的古代哲学可以说是伦理型的哲学，而政治思想与伦理思想的联系更为密切，政治是伦理色彩的政治，伦理是以政治原则为中心的伦理。中国思想史的这个基本特点，也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早期中国共产主义者所继承，他们十分注重对旧道德的批判，并把它与革命政治斗争的需要紧密联系在一起。陈独秀在《吾人最后之觉悟》中指出：“伦理问题，影响于政治，各国皆然，吾华尤甚。”李大钊也重视道德与时代的政治、经济的密切关系，认为封建旧道德是“专制政治的护符。”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对伦理学很感兴趣，他不仅对中国古代各家伦理思想都有接触，而且对西方伦理思想也非常关注。他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认真听取老师杨昌济讲授的以“伦理学大要及本国道德之特色”为主题的修身课，还通读和钻研了德国学者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一书，写下了2万多字的“批注”。他十分强调道德问题的重要性，深感“吾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渴望“当今世界，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但青年毛泽东并不因此而否认中国传统伦理有其积极的一面，他在肯定新学之“可珍”的同时，仍然不忘“尚有其要”的国学，而“为人之学”的道德思想又是国学的重要内容。青年毛泽东的道德哲学和伦理思想，除了批判地汲取近代西方伦理学说以外，还直接受到儒家、墨家和管仲学派的思想影响，当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仍然能够把共产主义精神与优秀的民族传统结合起来，创立了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共产主义道德思想和道德准则。

一、道德与道德哲学

道德属于社会意识形态范畴，在中外思想史上，道德思想与哲学思想的关系异常密切。在西方，哲学与伦理学原来是不太分明的。在中国，虽有所谓“天道”、“人道”之分，但古代思想家多主张“天人合一”。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有关道德的基本理论问题，就称之为道德哲学。青年毛泽东非常重视哲学与伦理学这两门学问，对道德与道德哲学有不少精辟的论述。

何谓伦理学？青年毛泽东下过定义。他说：“伦理学是规定人生目的及达到人生目的的方法的科学。”又说：“夫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思想道德必真必实。”对伦理学的内涵和道德的特点作出了概括。

那么，道德是怎样产生的呢？对于这个中外伦理学说史上历来众说纷坛的问题，青年毛泽东也有自己的明确主张。他说：“道德起于道德哲学之先，故道德哲学之成，成于经验。”又说：“美学未成立以前，早已有美。伦理学未成立以前，早已人人有道德，人人皆得其正鹄矣。”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毛泽东明确指出：从历史看，道德“纯成乎经验，而非所谓先天直觉也。”这说明，在道德思想的来源问题上，青年毛泽东的经验论倾向，始终是很明显的。

对于道德哲学，青年毛泽东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在他看来，道德哲学是同整个宇宙观密切相关的。他曾经强调要探究“本源”之学，指出：“夫本

源者，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吾心之中。”“必须先研究哲学、伦理学，以其所得真理，奉为己身言动之准，立之为前途之鹄。”道德哲学之所以如此重要，还在于它是人的理想和信仰的理论基础。由于青年毛泽东认为“宇宙之真理”，“具于吾心之中”，因此，他完全赞同泡尔生《伦理学原理》中关于“全世界文明历史之生活，乃皆观念之所管辖”的论断，在《批注》中写道：“观念造成文明。诚然，诚然。”“新理想”，“生活理想。”同时，毛泽东指出：“夫所谓信仰者，必先之以知识，知之而后信之。”人们有了道德哲学作指导，就会坚定自己的理想信念和提高道德自觉。

中国古代伦理学家多把人性论作为其理论基础，而对于人性的看法又各不相同。看来，青年毛泽东对于中国古代传统的人性论没有作系统的研究，但他还是承认过人有“得于天之本性”，肯定“崇尚个性”是泡尔生的“好主张”。他还说过：“人类者，兽格、人格并备”。当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曾对“人性”问题发表过原则性的评述。他说：“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这就是说，当毛泽东接受了唯物史观以后，他明确地认为，包括道德思想在内的社会意识形态，都是一定社会经济基础和阶级关系的反映。“旧的社会关系，就是吃人关系！”因此，“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他还明确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包括无产阶级的革命道德。”

道德哲学的重要性，还表现在它可以揭示道德的进化趋势。道德是“千古不变”还是不断进化的，这历来是哲学与伦理学上两种对立的观念。青年毛泽东完全赞同泡尔生关于道德是随着时代与文化的变迁而进化的观点，即一定的道德适应于一定的文化背景和生活方式。进而，毛泽东对道德的普遍性和时代性作了论述。他强调“道德因社会而异，因人而异。”但“道德与时代俱异，而仍不失其为道德”。这是因为，道德虽具有时代性，但也具有普遍性。

既然道德是随着时代与文化的变迁而进化的，所以道德是不断更新的。泡尔生在转引德国哲学家尼采(1844—1900)“欲尽革青年时代之见解”的话后指出：“当今之时，无论其为思想、为道德、为生活之法式，一切舍旧而谋新。”对此，毛泽东强调说：“道德哲学在开放之时代尤要。”“吾国二千年来之学者，皆可谓之学而不思。”由此可见，毛泽东的进化观与发展观是一贯的，他曾经批评过：“学问要新，道德要旧”的谬说，指出“道德要旧”，就是“道德要从孔子的变语。”当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在《矛盾论》中，进一步深刻地批判了董仲舒所谓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传统保守观念。

二、功利主义与奋斗精神

在我国近现代史上，涌现了一批有志青年，毛泽东也是一位杰出的代表。他在青少年时代就壮志凌云，渴望成就一番大事业。所以，重事功，好奋斗的精神，贯穿在毛泽东一生的事业之中，是毛泽东政治伦理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说，在青年毛泽东时期，这种事功思想和奋斗精神，带有较为明显的个人奋斗色彩的话，那么，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就把个人

的命运完全溶化在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之中，从而使他的事功思想和奋斗精神，成了共产主义道德的一个重要思想基础和精神支柱了。

从小学时代起，毛泽东就有志于“富国强兵”、“改造中国”的意愿。小学时代的毛泽东读了《世界英雄豪杰传》一书后，曾深有感触地说：“中国要有这样的人物。我们应该讲求富国强兵之道”。“顾炎武说得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¹¹⁾1911年春，毛泽东曾抄录了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政治活动家西乡隆盛的这样一首诗：“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¹²⁾以此来表达自己少年时代所抱负的爱国壮志。

大概是在1912年的上半年，毛泽东写了一篇题为《商鞅徙木立信论》的作文，一开头就提出：“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试一披吾国四千余年之记载，而求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并竭力推崇商鞅“惩奸究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贫怠以绝消耗”等“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¹³⁾

青年毛泽东怀有一种“就良图，立远志”⁽¹⁴⁾，“改造中国”、“改造世界”的强烈愿望。他在与朋友商拟新民学会的宗旨和方针时就说到：“大家决定会务进行之方针在改造中国和世界。”“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为学会方针，正与我平日的主张相合，并且我料到是与多数会友的主张相合的。”⁽¹⁵⁾

为了承担起“改造中国和世界”的重任，青少年时代的毛泽东就十分注重“奋斗”精神。在听杨昌济的《修身》课时，毛泽东作了以下记录：“人情多耽安佚而惮劳苦，懒惰为万恶之渊藪。”“奋斗，……如此而欲图存，非奋斗不可。”“朝气，少年须有朝气，否则暮气中之。暮气之来，乘疏懈之隙也。”⁽¹⁶⁾大概是在1917年，毛泽东在一篇日记中写道：“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直到1937年，毛泽东曾热诚赞扬何香凝：“先生的画，充满斗争之意，我虽不知画，也觉得好。今日之事，惟有斗争乃能胜利。先生一流人继承孙(中山)先生传统，苦斗不屈，为中华民族树立模范，景仰奋兴者有全国民众，不独泽东等少数人而已。”⁽¹⁷⁾由此可见，毛泽东从少年时代起直到成为马克思主义者，都把为国家、为民族而建功立业、苦斗不屈的奋斗精神，作为中华民族的一种优秀道德传统加以继承和发扬。

毛泽东的这种奋斗精神，是同他的功利主义道德观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他从青少年时代起就是提倡事功和功利的。青年毛泽东曾经兴致勃勃地读过严复翻译的西方名著，在亚当·斯密的《原富》的中译本中，严复在“按语”中热烈赞扬以“义利合一”的功利主义道德观的提出是“计学家最伟之功。”看来，青年毛泽东和他的老师们都受到了这种思想的影响。在国文课中，毛泽东记录说：“君子谋道谋食，系对孳孳为利者而言，非谓凡士人均不贵夫谋食也。”又说：“志不在温饱，对立志而言，若言作用，则王道之极亦只衣帛食粟不饥不寒而已，安见温饱之不可以谋也。”⁽¹⁸⁾同时，毛泽东的国文老师还高度赞扬了商初大臣伊尹的事功，说“伊尹道德、学问、经济、事功俱全，可法。伊尹生专制时代，其心实大公也。尹识力大，气势雄，故能决破五六百年君臣之义，首倡革命。”⁽¹⁹⁾1915年7月，毛泽东在《致友人信》中说过：“黜其躬而有益于国和群，仁人君子所欲为也。”⁽²⁰⁾这就是说，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事功，青年毛泽东从来是持赞赏态度的。

然而，当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他就以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来对待功利主义的道德观了。他明确地指出：“唯物主义者并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但是反对封建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反对那种口头上反对功利主义、实际上抱着最自私最短视的功利主义的伪善者。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阶级的功利主义。我们是无产阶级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最广大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²¹⁾

这里，让我们结合谈谈毛泽东对孔子提出的“仁”这一道德范畴的态度问题。按照毛泽东的观点，“仁”是孔子观念论的一个道德范畴，“应给以历史的唯物论的批判，将其放在恰当的位置。”“义者事之宜”，“可说是‘知’的范畴内事，而仁不过是实践时的态度之一，却放在义之上，成为观念论的昏乱思想。”⁽²²⁾这就是说，毛泽东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仁”这个道德范畴，只是主张给以唯物主义的批判，并摆正其“恰当的位置”。其实，更重要的是毛泽东主张对“仁德”和“仁政”作阶级的分析。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过：“我们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决不施仁政。我们仅仅施仁政于人民内部，而不施于人民外部的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²³⁾后来，毛泽东又说过：“我们是要施仁政的。”“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设重工业。前一种是小仁政，后一种是大仁政。两者必须兼顾，不兼顾是错误的。那末重点放在什么地方呢？重点应当放在大仁政上。”“照顾小仁政，妨碍大仁政，这是施仁政的偏向。”⁽²⁴⁾这样的“仁德”与“仁政”，显然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彻底批判和改造了儒家“仁”学的本质，是一种既具有革命的内容又保持民族的形式的政治理论观念，也是无产阶级功利主义的具体体现。

三、道德理想与奉献精神

中国历史上的伦理学家，多半都注重道德理想问题，儒家的“大同世界”，墨家的“兼爱相利”，道家的“尊道”、“归朴”，都是讲的政治道德理想。同时，各家的道德理想又往往通过他们所崇拜的“道德化身”来体现。毛泽东的道德理想也不例外，在青少年时代，他曾经崇拜过儒家所谓的君子风度和圣人境界。

青年毛泽东通过听取老师杨昌济的讲课和自己的理解发挥，曾经完全接受了孟子关于“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的思想。杨昌济在讲授“大人”与“小人”、“大我”与“小我”的关系时，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曰为己，又曰无我，何也？”“试以毒蛇螫手，壮士断腕譬仁人”，“仁人何故以身为腕？”

对此，毛泽东在《讲堂录》中回答说：“毒蛇螫手，壮士断腕，非不爱腕，非去腕不足以全一身也。彼仁人者，以天下万世为身，而以一身一家为腕。惟其爱天下万世之诚也，是以不敢爱其身家。身家虽死，天下万世固生，仁人之心安矣。”

“断腕”之说，语出《墨子·大取》：“断指以存腕，利之中取大，害

之中取小也。”“遇盗人，而断指以免身，利也；其遇盗人，害也。断指与断腕，利于天下相若，无择也。”相传“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后来虽独创“兼爱相利”之说，但墨学与儒学在“大体”与“小体”、“大利”与“小利”、“大我”与“小我”的关系问题上，确实还有相通之处。

青年毛泽东根据杨昌济讲课的内容，进一步把“君子”分成“传教之人”与“办事之人”两类。按照《讲堂录》的记载，所谓“传教之人”，就是“如孔、孟、朱、陆、王阳明等是也。”至于“办事之人”，就“如诸葛武侯、范希文”等是也。实际上，“传教之人”就是所谓“圣贤者”；“办事之人”就是所谓“豪杰”者也。

青年毛泽东对“圣贤”和“豪杰”都很崇敬，但相比而言，他当然更崇拜“圣贤”。因为“圣人，既得大本者也，贤人，略得大本者也。”⁽²⁵⁾毛泽东曾回忆自己青少年时代“很相信孔夫子”，认为孔子是“古代圣人”，“最大的思想家。”同时，毛泽东十分赞赏圣贤与豪杰的“至伟至大之力”和“至刚至强”的品格，并认为这符合“孟子所论浩然之气及大丈夫”两章的精神。

然而，随着国际国内人民斗争的发展，青年毛泽东原先依靠希圣希贤的观念也有所改变，他逐步认识到了民众力量的强大。在1919年7月14日《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毛泽东明确回答说：“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在紧接着发表的《民众的大联合》中，毛泽东看到了当时“俄罗斯的貔貅十万，忽然将鸞旗易了红旗，就可以晓得这中间有很深的道理了。”这使他认识到“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²⁶⁾当毛泽东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以后，就彻底抛弃了“君子救小人”的观念，坚信“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²⁷⁾

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十分重视社会公德和共产主义道德的建设，强调革命者必须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奉献精神。在进行文化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中，毛泽东一贯主张要正确处理好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与当前的行动纲领、对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要求和对一般人民群众的的关系。

关于国民公德的内容，毛泽东在亲自主持制定的《共同纲领》中明确规定：“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国民的公德。”这种以“五爱”为内容的公德，后来就吸收在我国的宪法之中了。

道德问题的核心，是如何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的关系问题。对广大人民来说，毛泽东“提倡以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原则为一切言论行动的标准的社会主义精神。”⁽²⁸⁾并强调在政治平等和社会平等的前提下，实行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相统一的原则，做到“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²⁹⁾“损人利己，在本人道德上是不对的，在民族道德上是更加不对的。”⁽³⁰⁾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优秀道德传统，也是毛泽东一再提倡的道德情操。在他看来，“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看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来决定。”“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我们是国际主义者，我们又是爱国主义者，我们的口号是为保卫祖国反对侵略者而战。”⁽³¹⁾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所谓爱国，当然是要爱社会主义的祖国。不过，爱国主义的含义可以更为广泛，那就是一切拥护祖国统一的人们，都是爱国主义者。同

时，毛泽东还非常强调要有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强调在民众教育中应以提高“民族自尊心为中心”，“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来。”⁽³²⁾

发扬革命的人道主义，也是毛泽东道德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1941年，他为延安中国医科大学题词：“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宽待俘虏的政策，就是这种人道主义的体现。

在上述毛泽东所阐发的道德思想中，已经包含着某些共产主义道德思想的成分，但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共产主义道德还有更高的要求，这主要是要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个人利益要无条件地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要忠诚地为人类解放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也是共产主义道德的根本要求。毛泽东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应该使每个同志懂得，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³³⁾

共产党人的这个言论行动的最高标准，也可以说是共产主义道德的最高准则。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和《纪念白求恩》等著作中所提倡的共产主义精神，就是以这种思想理论为基础的。他说：“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³⁴⁾他要求我们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学习白求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认为“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³⁵⁾这种高尚的道德境界和道德情操，就是共产主义道德最集中的体现。共产主义的人生观和生死观，也是毛泽东共产主义道德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关于生死问题，青年毛泽东就有不少论述，他强调的是“精神不死”，但那是以庄周、张载的生力气之“聚”、死为气之“散”的“聚散论”和西方某些学者所谓的精神、物质皆不灭的“二元论”为理论基础的。当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就把革命者的生死问题与共产主义的光辉事业联系了起来。他说：“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³⁶⁾毛泽东为纪念革命烈士所书写的一些题词，诸如表彰刘胡兰“生得伟大，死得光荣”之类，都深刻地体现了共产主义者的生死观。

当然，共产主义道德还有其他更多的内容。1937年11月23日，毛泽东《为陕北公学成立与开学纪念题词》中指出：“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的远见，这些人充满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和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

神的人们。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地解决。”这里所说的革命的先锋分子的条件，实际上是对一个共产主义者在政治上、思想上、作风上、道德上的全面要求，这样的人，就是有共产主义高尚道德的人。

我们中华民族特别是其先进分子，历史提倡要有高尚的道德理想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柱。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远大的奋斗目标。党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候，就要求自己的党员心目中要悬着共产主义的理想。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理所当然地要把发扬共产主义精神作为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精神动力。可是，有人却曾经把“大公无私”、“毫不利己”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等精神作为错误的东西来批判；还有人认为，现在发展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就是“一切向钱看”，只讲实惠，不要讲贡献了，致使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泛滥起来。这种情况说明，在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中，学习和发扬毛泽东有关国民公德和共产主义道德的论述，有着十分迫切的现实意义。

四、道德评判与道德修养

道德标准和道德评判问题，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因为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何谓正义？何谓非正义？都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的，而且不同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各有不同的价值尺度。同时，道德标准中的动机与效果问题，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因此，对于道德标准和道德评判问题，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关注。

青年毛泽东非常强调道德评判的重要性。他说：“道德‘评判之功用大矣。”因为这是一个道德“舆论”问题。毛泽东明确主张对道德评判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他说：“吾人须致力于现实者，如一种行为，此客观妥当之实事。所当尽力遂行；一种思想，此主观妥当之实事，所当尽力实现。”“固应主观、客观皆满足而后谓之善也。”他竭力反对道德行为方面的“盲从性”和“虚伪性”，指出“盲从以为己志，乃出于一种模仿性。”只有掌握了真理，有了明确的道德理想和目的，“方为真志，而非盲从之志。”⁽³⁷⁾足见毛泽东对道德自觉的重视程度。

关于“善”、“恶”的价值评判问题，青年毛泽东发表了独特的见解。在他看来，“善”与“恶”的区分，本身就只有相对的意义，“善”固然有其价值，但“恶”也不能说无价值。他说：“恶也者，善之次等者也，非其性质本恶也。”意思是说，是“善”是“恶”都是有条件的，是随“时候”的变迁而改变的，是与“他物”相对而言的。正因为这样，所以毛泽东主张以当时之“事实”来评判是“善”是“恶”。他说：“吾人评论历史，说某也善，某也恶，系指其人善恶之事实，离去事实无善恶也。”至于历史流传其“善名”或“恶名”，“皆不应顾。”这可以说是一种实事求是的历史主义的态度。

动机与效果的问题，是道德标准中一个重要而复杂的理论问题，也是毛泽东在伦理学上作出了创造性理论贡献的一个重要方面。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就对动机与效果问题作出了论述。他说：“善恶之区别以何为标准——一说只论动机，一说兼论效果。”他把道德判断分为“客观判断”与“主观判断”

两个方面，认为应当把“客观”效果方面的判断与“主观”动机方面的判断结合起来。

当毛泽东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实践观以后，就对动机与效果问题作出了令人信服的精辟的论述。他说：“这里所说的好坏，究竟是看动机(主观愿望)，还是看效果(社会实践)呢？唯心论者是强调动机否认效果的，机械唯物论者是强调效果否认动机的，我们和这两者相反，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为人民大众的动机和被大众欢迎的效果，是分不开的，必须使二者统一起来。”“检验一个作家的主观愿望即其动机是否正确，是否善良，不是看他们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为(主要是作品)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38)毛泽东的这一论述，虽然是对文艺界讲的，但却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它既是检验作家创作的动机与效果的标准，也是检验人们道德动机是否善良，道德效果是否良好的标准。

关于道德修养的问题，毛泽东继承和发扬了中国传统道德修养论方面注重“践履”的优点。他说：“伦理学正鹄在实践，非在讲求。”“伦理学示人生正鹄之所在，有裨于躬行。”“空言无益。”同时，毛泽东还注意吸取传统道德学说重视“修养工夫”和“自省工夫”的优点，肯定这种“自省”、“自察”的工夫，就是中国传统的“克己与修养之方法。”

强调世界观的改造，是毛泽东的思想教育与道德修养理论的一个重要特点。他一方面重视“我们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修养。”(39)另一方面强调“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人人需要改造。”“拿我们这些人来说，很多人每年都有一些进步，也就是说，每年都在改造。”(40)同时，毛泽东把经常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作为革命者加强思想改造的道德修养的最有效的方法。

综观毛泽东的伦理思想，虽然也注意吸取近代西方伦理学说中的某些内容，但更重视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批判、改造和吸取，这是同他对中西两大文明潮流的基本看法分不开的。他说：“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41)他还明确指出：“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凡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42)正是从这种观点出发，总的来说，毛泽东一直非常尊重自己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他的伦理道德思想不管是青年时代，还是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都保持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特色。

(作者单位：浙江省社会科学院)

注释

(25)(37)(42)《致黎锦熙信》1917年8月23日，引自《毛泽东早期文稿》下引简称《文稿》。

《非自杀》1919年11月23日，见《文稿》。

(31)(35)(39)《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20页，第659—660页，第533页。

均引《伦理学原理》批注，见《文稿》，下引“批注”不再加注。

(21)(27)(33)(34)(36)(38)《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70页，第864页，第1031页，第1094、1096页，第1004页，第1004—1005页，第868页。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53页。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83页。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马列著作毛泽东著作选续》(科学社会主义部分)第518页。

《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1919年7月21日，见《文稿》。

(11)(12)萧三：《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与初期革命活动》第26页。

(13)《商鞅徙木立信论》，见《文稿》。

(14)《致黎锦熙信》1915年11月9日，见《文稿》。

(15)《给肖旭东蔡林彬并在法国诸会友的信》，见《新民学会会友通信集》第3集。

(16)(18)(19)《讲堂录》，见《文稿》。

(17)(22)《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06页，第147—148页。

(20)《致友人信》，见《文稿》。

(23)《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76页。

(24)《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和今后的任务》。

(26)《民众的大联合》(一)(二)，见《文稿》。

(28)《严重的教训》一文按语，见《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

(29)(40)《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30)《论新阶段》。

(32)《论十大关系》。

(41)《给周世钊的信》1920年3月14日，见《文稿》。

毛泽东人生价值理论及其现实意义

冯虞章 李崇富

在社会主义新时期，改革开放的洪流，市场经济发展的大潮，以及由此带来的中西文化的交汇和撞击，使得人生价值观问题，变得更为重要和突出了。最近一个时期，江泽民多次强调，要“加强正确的理想、信念、人生观、价值观的宣传教育”。他指出：“在实行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这方面的思想教育更加显得重要和迫切了，不但不能放松，而且必须大大加强。”结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研究和宣传毛泽东人生价值理论，坚持正确的人生价值导向，乃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迫切需要。

一、毛泽东人生价值理论的若干基本原则

毛泽东从青年学生时代起，就开始思考和探求“人生观”中的诸如“理想”、“信仰”、“真理”和人的“价值”等问题。毛泽东作为我们党的伟大领袖，在指导党和人民所进行的长期奋斗中，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成功地解决了中国革命中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是包括中国共产党人的人生价值理论在内的完整的科学的思想体系。尽管在毛泽东和我国其他老一辈领导人公开发表的著作中，很少直接使用人生“价值”的术语，但在毛泽东思想体系中，不仅对人生哲理和人生道路作了精辟的论述，而且还提出和阐发了关于正确理解和实现人生价值的一系列基本原则。毛泽东人生价值理论和千百万共产党人对它的实践，堪称是一部伟大的人生教科书。

毛泽东人生价值理论，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人生价值观。它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社会历史观作为理论基础，是中国千百万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的人生实践的科学概括，是无数革命先烈的青春、热血和生命的结晶，也是对我国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的继承、改造和发展。这一崭新的人生价值理论，根据于我国近现代历史和革命实践发展的客观逻辑，熔工人阶级的先进性和中国文化的特色于一炉，既具有求实创新、催人奋进、面向未来的科学和高尚的品格，又具有内容丰富、哲理深刻、感人肺腑的庄重和深广的历史内涵。这里，我们不能就毛泽东人生价值理论作出全面的论述，只就其中所包含的若干基本原则，即就这一人生价值理论的基本构架作点探讨。

（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崇高人生的出发点和归宿

人生价值观的问题，不仅是对人生意义和价值的理解与态度问题，更重要的是行动和实践的问题。毛泽东常说：“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毛泽东根据共产党人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科学信念和历史使命，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规定为党的根本宗旨和共产党人的根本出发点与归宿。这是他坚持唯物史观关于人民群众是社会的主体、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在人生价值观上的必然结论。以为为人民服务为出发点和归宿，是毛泽东人生价值理论的核心原则。

人生的出发点和归宿问题，亦即人生目的和价值目标问题，这是任何一

种人生价值观都不能回避的。只是“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为着绝大多数人谋利益，还是为个人或少数人谋私利，是无产阶级的价值目标与剥削阶级价值目标的本质区别。毛泽东认为：“为群众服务，这就是处处要想到群众，为群众打算，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这是我们与国民党的根本区别，也是共产党员革命的出发点和归宿。”毛泽东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正是要求共产党人在实践上，用实际行动表明自己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为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奋斗。这样的思想和行动是无产阶级人生价值观本质的真实体现。毛泽东在把为人民服务作为共产党人的人生的出发点和归宿的思想中，特别强调两点：第一要“全心全意”，“完全彻底”，而不能半心半意和虚情假意，反对沽名钓誉；第二要持之以恒，坚持不懈。他指出：“如果开头做点好事，后来又做坏事，这就叫做没有坚持性。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的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的有益于青年，一贯的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呵！”

强调发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奉献精神，并不否定党员和革命者的个人正当利益。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曾就必须善于爱护党员、干部和战士的问题作过许多专门的论述。刘少奇具体指出：“党在一切可能条件下还要帮助党员根据党的利益的要求，去发展他的个性和特长，给他以适当的工作和条件，以至加以奖励等。”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强调“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也就是我们过去常说的‘军民兼顾’、‘公私兼顾’”，而不能只顾一头。“无论只顾那一头，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毛泽东还要求“提倡以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原则为一切言论行动的标准的社会主义精神”。由于社会主义的整体利益与人民群众的个人利益在本质上是是一致的，因而为人民服务也就体现了社会主义条件下人作为目的和手段的具体统一。

（二）爱国主义——人生价值的基本主题

爱国主义就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培育和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深挚感情及其理性升华。我们的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炎黄子孙的巨大凝聚力的重要的源泉，也是我国人民的传统美德。在我们党的理论和实践中，将中华民族的这种优良传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和高度。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爱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中国的社会主义前途，以及同促进整个人类的进步事业联系起来，是我国历史上最没有民族狭隘性的、最忠诚的爱国主义者。

“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许多共产党人人生思想境界发展的轨迹。因此毛泽东把对祖国的态度、把爱国主义作为人生价值的基本主题。对于为祖国的独立解放、人民的自由幸福而英勇奋斗以至为之献身的人们，他怀着崇高的敬意，颂扬其人生价值的永恒意义。在为“人民英雄纪念碑”撰定的碑文中，毛泽东在缅怀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英雄的同时，满怀深情地写道：“由此上溯至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的重要体现，是要坚持中华民族的自尊、自主、自强的精神。对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进行批判性的总结，去其

糟粕，取其精华，并在现实生活的基点上继承、发展和弘扬中国文化，是提高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必要条件。据此，中国共产党人既反对民族虚无主义，又反对颂古非今；既反对迷信外国，又主张借鉴和吸收国外文化的优秀成果。应该看到，爱国主义是个历史范畴，“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看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来决定”⁽¹¹⁾。今天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是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的。这正如邓小平所说：“中国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¹²⁾他还指出：“必须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提高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就会被种种资本主义势力所侵蚀腐化。”⁽¹³⁾在我们社会里，一个只有热爱社会主义祖国，为国家的统一和现代化的大业而奋斗的人，他的人生才有明确的主题，才能找到人生的正确位置，他的人生才有真正的意义和价值。

(三)共产主义理想与当前阶段实践的统一——共产党人人生价值观的精髓

在我国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曾精辟阐明了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和指导与当前行动纲领实践的区别和联系。他指出，如果没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和指导，“不但不能引导中国革命到将来的社会主义阶段上去，而且也不能指导现时的民主革命达到胜利。”同时又指出：“应把对于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的宣传，同对于新民主主义的行动纲领的实践区别开来”⁽¹⁴⁾。在把这一重要思想运用于共产党人的人生实践时，他指出：“现在的努力是朝着将来的大目标的，失掉这个大目标，就不是共产党员了，然而放松今日的努力，也就不是共产党员。”⁽¹⁵⁾

共产党人人生价值观的精髓，就在于把今日的努力与将来的大目标有机地联系起来，亦即在为人民服务中，把人民群众的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很好地统一起来。既脚踏实地，为解决当前的任务而奋斗；又远见卓识，不失掉前进的方向。即顺应客观规律，逐步把社会引向未来的目标。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¹⁶⁾毋庸置疑，我们必须积极投身于“当前的运动”，十分重视今日的努力。否则，就没有了“运动的未来”，将来的大目标就成为一句空话。而如果脱离开“运动的未来”，丢掉了将来的大目标，“当前的运动”就失去了灵魂，今日的努力就会走偏方向。即使是正确的行动纲领，如果没有远大目标的指导，也会在实践中被扭曲和变形，从而无法实现整个运动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换言之，坚持共产主义理想和当前阶段实践的统一，就是要在实践中，从实际出发，立足于自己的国情，找到中国进行革命和建设，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并最终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规律性和具体道路，并不懈地为之奋斗。因此，这是“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在人生价值观问题上的重要体现。唯其如此，在毛泽东人生价值理论形成的那个时代，是要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与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实践相统一；而在今天，则是要把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同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践相结合、相统一。(四)投身于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实现人生价值的根本途径

毛泽东依据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实践的观点，阐明了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途径，要求人们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从而也为人生价值的实现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投身于人民群众改造和建设社会的实

践，通过实践发现、证实和发展真理，并依据真理性的认识指导自己的行动和实践，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办老实事)和自己的主观世界(做老实人)，在集体事业发展的艰苦奋斗中同时获得个人的发展。这就是人生价值实现的根本途径。

特别应当指出，“实事求是”这一毛泽东思想的根本观点和根本方法，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把这一思想路线引伸为做人的道理，作为对革命者的品格和作风的根本要求，这就是常说的要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什么是老实人？在毛泽东看来，具有实事求是的态度和作风，按照实事求是的要求办事的人，是老实人。而那种违反实事求是的要求，置党的原则和人民的利益于不顾，口是心非，表里不一，专营一己之私利的人，则是不老实的人。显然，具有实事求是品格的老实人，其价值是高尚的；而那种不老实的人，其价值是渺小的，可鄙的。毛泽东说：“我们应该是老老实实地办事，在世界上要办成几件事，没有老实态度是根本不行的。”对于那些不老实的人，毛泽东蔑视地说：“这种人的吃亏在于不老实”，“一切狡猾的人，不照科学态度办事的人，自以为得计，自以为很聪明，其实都是最蠢的，都是没有好结果的。”⁽¹⁷⁾周恩来曾指出：毛泽东“他自己的口号是实事求是”，“他是最老实的，是则是、非则非。”他号召青年要学习毛泽东的“老老实实、实事求是”的态度和作风⁽¹⁸⁾。邓小平也说：“在延安中央党校，毛泽东同志亲笔题写的四个大字，叫‘实事求是’。我看大庆讲‘三老’，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干老实事，就是实事求是。”在谈到选拔干部的标准时，他还明确地提出：“要选那些艰苦朴素，实事求是，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作风正派的人。”⁽¹⁹⁾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把“实事求是”的根本观点和根本方法引伸为人生实践的道理，从而为实现人生价值指明了根本方向。

针对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的特点，毛泽东还阐明了他们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必由之路：这就是与实践相结合，与工农相结合。对此，他一方面指出了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又指出，知识分子要不断进步，有所作为，就必须同工农相结合，同实践相结合。历史的经验表明，只有同工农群众和实践相结合，知识分子才能发挥自己的优势和克服自己的弱点；才能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才能深入体察中国的国情，明确肩头的责任；才能把书本知识和实际知识结合起来，增长和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成就一番事业。毛泽东告诫说：“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群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²⁰⁾。如果脱离实践脱离群众，就将永远找不到实现人生价值的正确道路。那种把人生价值的实现，说成是脱离实践、脱离群众的、根据于抽象人性的所谓“自我完成”、“自我设计”和“自我实现”的观点，不但不能引导青年知识分子实现真正的人生价值，反而会引导他们走到错误的方向上去。

(五)对社会历史进步的贡献——人生价值的基本尺度

关于人生价值的正确尺度或标准问题，毛泽东是从唯物史观的根本观点的高度来作出规定的。在毛泽东看来，人都是社会的人，是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活动着的、能动地表现着自己的个体。从根本上说，一个人的社会作用和价值如何，就是看他对社会历史的发展有无助益。他指出：“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第一等圣人。”“我们纪念他不仅因为他文章写得好，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而且因为他是一个民族解放的急先锋，给革命以很大

的助力。”⁽²¹⁾由此可见，毛泽东是把人们对社会历史进步的贡献，作为衡量人生价值的基本尺度的。关于这一尺度的应用，他还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把历史进步的尺度，同以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高标准统一起来，并把这种基本尺度具体化为功利性尺度和道德性尺度。对于功利性尺度，他强调社会历史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²²⁾；对于道德性尺度，他强调要提倡“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认为，虽然“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²³⁾。毫无疑问，以社会生产力为最终根据和基础的社会性的功利尺度，是根本性的尺度；而道德性的尺度则是社会功利关系和社会经济关系在伦理道德领域的反映。这两种尺度在毛泽东人生价值理论中是一致的，是社会进步尺度的两个侧面的统一。

其实，社会进步作为人生价值的基本尺度，包含着十分丰富的内涵。从生产力的发展到社会经济关系的进步与变革，从社会经济结构到政治的、思想的和道德的上层建筑的演进，都是社会进步所涵盖的层次或环节。由于立足于一定的生产力发展状况之上的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是“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²⁴⁾，而在阶级社会中，这种社会经济关系又表现为阶级关系，因此衡量人生价值的社会进步尺度，及其功利性尺度和道德性尺度，都具有阶级性。毛泽东指出：“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阶级的功利主义。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²⁵⁾这就是说，各个阶级都有自己的关于人生价值的功利性尺度及相应的道德性尺度。然而，在今日，只有无产阶级的以“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功利性尺度和提倡奉献精神道德性尺度，才是与社会进步的客观要求相一致、相统一的。因此，毛泽东把人们对于社会历史进步的实际贡献，作为人生价值的基本尺度，是普遍实用的科学规定。

毛泽东人生价值理论，是中国工人阶级的科学和系统的人生哲学。其中不仅包含着上述关于人生价值观的一系列基本原则，而且还包含着关于幸福观、苦乐观、生死观和荣辱观等等方面的许多熠熠生辉的人生哲理。正是以此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毛泽东人生价值理论，教育和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和大批的革命战士，培养出了象张思德、刘胡兰、黄继光、雷锋、焦裕禄等先进典型，从而使中国共产党保持和发扬了工人阶级的先进性和对于人民群众的政治感召力。也正是有了这样一大批具有献身精神的中国共产党人作为中华民族的脊梁，作为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我国人民才先后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才得以作为社会主义大国，雄立于世界的东方。毛泽东人生价值理论是我们的极为珍贵的思想财富。二、

毛泽东人生价值理论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生价值导

向毛泽东人生价值理论，主要是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在革命战争年代人生实践的产物。由于中国革命和建设都是共产党领导的、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终目标的连续和统一的社会变革过程，并且指导这一历史性变革的思想理论基础，都是同一个科学的思想体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因此，毛泽东人生价值理论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人生价值观，其基本精神和基本原则并没有“过时”，仍然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新时期，要坚持用当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来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就包括用毛泽东人生价值理论，来教育党员和人民群众。即要引导人们特别是青少年，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人生观和价值观，使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成为我们社会精神文明的主旋律。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尤其需要坚持这种正确的人生价值导向。

经济生活是思想道德生活的基础。由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场深刻的变革。这必然会引起人们思想观念的嬗变，也会给人生价值观的教育提出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例如，现在我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那末如何使市场等价交换原则同共产主义的无私奉献精神既相区别又相衔接；又如，市场经济要求强化企业和个人的利益主体地位，提倡竞争，优胜劣汰，这同集体主义，助人为乐，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如何统一，等等。对于这类正困扰着人们的问题，需要我们作深入的研究和科学的回答。

毫无疑问，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关系的基础上发展市场经济，这为人们思想观念和价值观的健康发展，提供了现实基础和推动力。发展市场经济，洞开国门，对外开放，公平竞争，优胜劣汰，就会使人们开阔眼界，摒弃因袭守旧，不图进取，安贫乐道，消极懈怠等积习，而大大激发人们的创新观念、务实观念、效益观念、质量观念、风险观念、竞争观念和平等观念等等。所有这些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要求的观念转变，对于长期纠缠着我们的官僚主义作风、封建等级意识和小生产者所固有的狭隘保守观念，无疑是动摇其根基的大扫荡，而且这也是社会主义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观的体系所要求的，或者是相一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带来的观念转变，正在改变着人们的精神面貌，在催生一种现代化和健康的生活方式。

但是也应该承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于思想观念和价值观的影响，具有“双重效应”。从其与公有制、宏观调控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相联系的一面看，它所引起的思想观念变革的正面效应，是基本的；而从其与市场自发调节相联系的另一面看，除有积极作用之外，还有负面效应。这是因为，即便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也具有某种自发性和盲目性。由于市场信号的滞后性和市场行为中某些难以避免的投机性，可能会衍生出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个人利益与社会及他人利益之间的矛盾。市场交换中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以及个别的商品交换中价格对价值的偏离，都是正常现象。但由此不仅强化了企业和个人的利益主体地位，而且会导致片面追求个人和局部利益、“一切向钱看”，甚至会诱使一些人专靠市场投机来谋取致富欲的满足。因此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和利益导向是一把双刃剑；除了有优化资源配置和激励开拓进取、求实创新的正面效应外，还有可能衍生出导致宏观经济活动无序及过分看重和追逐金钱的负面效应。对于这种负面效应的经济方面，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来加以补充和克服。但是，市场活动对思想影响的负面效应仍然无法完全避免，而这有可能产生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及其人生价值观的冲击，也可能使利己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等腐朽没落的人生价值观寻隙得以滋长和扩散。对于这种负面效应，我们应该予以重视和抑制。

目前在一部分人中，私欲横流，利己主义膨胀，拜金意识盛行，道德水准下降，有些人甚至利令智昏，违法乱纪，不择手段，谋取私利和金钱。出现这类消极腐败现象的原因是复杂的。但也不能忽视现存经济生活和某些市场活动的影响。虽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利己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的人生价值观之间，并无必然联系。但是，并不是一切市场活动都是合理的。在目前经济体制转轨变型时期，某些体制上的“真空”和不完善，乃至市场经济活动本身的负面效应，都可能为一些错误的人生价值观提供存在和传播的环境条件或土壤。值得注意的是，现在有少数人，不是去思考如何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充分发挥其对人生价值导向的正面效应，抑制负面效应，反而以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为由头，去宣扬错误的人生价值观和人生价值标准。其中，影响最为广泛的，就是拜金主义的人生价值观。

一些人所宣扬或奉行的“一切向钱看”或曰“拜金主义”的人生价值观，就是主张金钱至上，金钱万能，唯利是图，把金钱作为人生价值的标准。这些人片面地看待和曲解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认为“一切向钱看”是天经地义的，说“金钱是社会的奖章”。有些短期内暴富起来的“大亨”、“大款”和“大腕”，斗富比阔，一掷万金，追求所谓“潇洒的人生”，用占有和挥霍金钱，来显示其人生价值。这种把人的价值同其占有的金钱划等号的言行，虽然被一些人披上了“现代”的迷彩，但骨子里并不是什么新东西。

所谓以“金钱确定人的价值”，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早就揭露和批判过的资本主义原则。恩格斯曾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用以“判断整个人生的逻辑公式”，就是“金钱确定人的价值；这个人值一万英镑，就是说，他拥有这样一笔钱。谁有钱，谁就‘值得尊敬’，就属于‘上等人’，就‘有势力’，而且在他那个圈子里在各方面都是领头的。”(26)马克思曾多次引用莎士比亚在其名剧《雅典的泰门》中对拜金主义的辛辣讽刺，揭露拜金意识可以使黑白颠倒，美丑倒错，是非混淆，使神圣的东西失去光彩，邪恶的东西成为荣耀。这种迷信金钱万能的拜金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和它的商品货币关系的观念反映。拜金主义的人生价值观是对真正人生价值的扭曲和亵渎。因此，我们既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又要反对拜金主义。

应该指出，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金钱即货币的重要作用不应低估。现在，人们对金钱的谈论和追求已不象过去那样成为禁忌。金钱是社会财富的价值形态。金钱本身并不是坏事。问题是如何看待金钱和获得金钱。人们依靠自己的辛勤劳动和合法经营得到的货币收入是应予肯定的。一些对社会有重大贡献的人也理应得到社会的报偿，包括金钱的奖励。那么，今天是否可以把金钱的拥有作为衡量人生价值的标准了呢？回答仍然是“不能”。

在金钱的拥有和对社会的贡献之间，可能有几种情况：相一致的，不相一致的，完全相反的。由于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各行各业的特殊性和收益来源的多样性，实际上大量的情况是不相一致的。即金钱拥有少的不一定比拥有多的贡献小；反之，贡献大的也不一定比贡献小的拥有的金钱多。这种情况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致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都无法完全避免。在今天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许多人仍然默默地奉献着自己的青春和年华；同时也不乏巧取豪夺、非法经营和从事其它非法活动而暴富者。他

们人生价值的如此强烈反差，岂能用其拥有的金钱来衡量和解释？即便有些人拥有的金钱和所作的贡献大体是相一致的。那么他们的价值也只在于所作的贡献本身，以及由此产生的积极的社会效果，而不在于所得的奖励和收益。奖励和收益，只是对于这种贡献的多种鼓励和报偿形式的一种。如果以此为借口，把金钱的拥有当作了人生价值的标准，那就因果易位，本末倒置了。这无疑是错误的，不能成立的。

更严重的是，如果用金钱的标准取代了社会历史进步的尺度，就动摇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人生价值的根本观点。人生价值的崇高目标就不再是为人民服务，人生价值的基本主题就不再是爱国主义、人生价值观的精髓也就不再是共产主义理想和当前阶段实践的统一。所有这一切，都变成了一句话：“一切向钱看”。而如果“一切向钱看”，把金钱作为良心的天平，我们的民族和人民，就没有了理想和精神支柱，也就没有了灵魂。这种拜金主义扩散蔓延，会腐蚀人们的灵魂，毒化社会风气，会诱使人们不择手段地去追逐金钱。“君子言义不言利”是虚伪的。但也不能见利忘义、唯利是图，做金钱的奴隶。在我们社会里，金钱并不是一切，还有比金钱更宝贵的东西。如果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变成赤裸裸的金钱关系，让利己主义的冰水汇成一股逆流，汹涌地冲击我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这种情况扩散开来，就必将普遍性地引发各种腐败、混乱和丑恶现象，那将严重危害以至葬送整个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这决不是危言耸听。邓小平在 1986 年就指出，“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得相当有成绩，形势喜人，这是我们国家的成功。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所以，不能不讲四个坚持。”⁽²⁷⁾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提倡正确的人生价值导向，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不是绝然对立的，而且是相辅相成的。

首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需要正确的人生价值观提供思想保证。党的十四大确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这种市场经济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经济关系为基础，其根本目的，是要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是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并为最终过渡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技术基础。因此，毛泽东的以为为人民服务作为出发点和归宿的人生价值观，不仅没有“过时”，而且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所必需的。相反，借口要发展商品货币交换关系，而否定为人民服务、提倡奉献精神的人生价值观的种种说法，则是浅薄和错误的。

我们应该看到，商品货币关系并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全部。而社会主义商品货币关系和原则所立足的基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经济结构。所以我们应该用根植于公有制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来支持和扩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积极效应，而克服和缩小它的负面效应。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大力、有效地发挥工人阶级的人生价值观以及其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导向和教育功能，去反对和抵制错误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和侵蚀。对于工人阶级的人生价值观与市场经济的要求相一致的地方，要加以对接，提供精神的动力，既使自身从中获得新鲜的内容，又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对于相对立和矛盾的地方，要加以鉴别和抵制，使消极作用减少到最低程度；对于那种以发展市场经济为口实，为“一切向钱看”和极端个人主义张目的人生价

价值观，则应坚决地加以抵制和批评，以不断清除败坏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思想根源，使正确的人生价值导向占主导地位，从而保证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前进。

其次，正确的人生价值观的原则是以其特有的方式和功能介入和规范经济活动与社会生活的。现在社会生活中对人生价值观的诸多撞击，可以归结到如何正确把握共产党人人生价值观的原则与市场经济原则的区别和联系。如果不能正确把握这种区别和联系，就会把党性原则、集体主义原则与市场交换原则或者绝对地对立起来，或者简单地把等价交换原则引伸为人生价值观的原则。

共产党人人生价值观的原则，与党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针，都是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为指导的，它们在现阶段统一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之中。但二者又有着明显的区别。

一是直接的依据不同。我们所说的正确的人生价值观，是以历史合乎规律发展的根本趋势为依据的。共产党人的人生价值观的依据，就是当代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在总体上的根本趋势，即资本主义必然为社会主义所代替的历史总趋势。它是无产阶级对这种世界历史发展的根本趋势(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对国内公有制发展的长远趋势)，以及对自身的历史使命自觉认识的结果。而今天我们必须遵循的市场交换原则，虽然同样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其依据也存在于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之中。但是，这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在某一阶段、某一领域的要求，它同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在世界历史的总体上和国内深层的经济关系长远发展的根本趋势相比，既有相互联系的一面，又属于不同的层次，不能互相代替。二是功能不同。市场交换原则是从事经济活动所必须遵循的原则。它的功能，是通过规范、调节经济活动的正常运行，追求市场主体的自身利益，来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如果不遵循这种原则，就会受经济规律的惩罚，当然也就不可能使我国经济繁荣和发展。而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则是从思想和道德的层面上，来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起自觉的规范和调节作用。它要解决的，是要求自觉地以先进的社会理想和正确的人生态度来从事各项实际工作。共产党人的人生价值观是在经济活动中正确理解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并以此推进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三是它们适用的范围和起作用的方式不同。拿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等价交换原则来说，它只适用于经济领域，或者在涉及经济活动的问题上起作用。如果越出了这种范围，就会进入误区，例如，它不能进入政治生活领域，搞权钱交易，也不能简单地移植于伦理道德领域，把人格和良心与金钱相交换。正确的人生价值观，虽然它源于经济生活，但又高于经济生活。它由于其特有的依据和自觉的规范功能，是在所有领域、所有问题上都能够从一定的角度起导向作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按照社会主义的物质利益原则，来激励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又要有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为之提供精神动力和道德规范，更要有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和献身的一代又一代的“四有”新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单靠市场的利益导向不会自发地产生大批的自觉的社会主义者。只有正确的、革命的人生价值观，才能帮助人们解决人生旅途中遇到的各种复杂问题，指引人生通向崇高的目标；也只有正确的人生价值导向，才能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第三，毛泽东人生价值理论的基本原则，在一定的意义上具有超越自己

时代的特点，因而能够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继续发挥正确的人生价值的导向作用。例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人的崇高人生的出发点和归宿，共产党人人生价值观的精髓，是要把共产主义理想和当前阶段的实践统一起来，把人民的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统一起来。因而，属于这种先进的人生价值观的这类基本原则，对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的全过程来说，具有最广大、最长久的适用性和导向功能。

共产党人最高的人生价值目标，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但共产主义的实现，必然要经历一个长期的区分为若干阶段的历史过程。而每一阶段的实践任务，都只能根据生产力发展的状况和特定的国情来决定。所以为共产主义而奋斗，首先要为实现各个阶段上的具体任务而奋斗。同时，又要把实现一定阶段的任务作为通向未来目标的阶梯，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因此毛泽东人生价值理论要求共产党人和先进分子，坚持在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指导下，把今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努力，与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事业的大目标有机地联系起来，把当前建设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与其在未来向社会主义的更高阶段的转变很好地联接起来；在每个阶段上，都要履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这就决定了，毛泽东人生价值理论的基本原则，在我国革命和建设的一切阶段上都是适用的，它的真理力量是永存的。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坚持正确的人生价值导向，就必须对我们的人民进行人生价值观的教育。这种教育要坚持从实际出发，要分层次进行，要讲究方法。毛泽东人生价值理论，是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的人生价值观。它所包含的基本原则和思想境界的要求，直接地只适于共产党员和先进分子。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除了必须模范地遵守和执行党的现行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的法律外，还必须努力实践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一名无私奉献的“共产主义战士”，在群众中发挥骨干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对于一般群众则不宜提出过高要求，只要求他们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的领导，诚实劳动，遵纪守法，遵守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做一个好公民。但不以此为满足，还应该在社会上特别是青少年中，宣传和提倡先进的思想、人物和事迹，逐步引导他们(至少是其中的积极分子)树立远大的理想，健康的人格，高尚的情趣和追求更有意义的人生价值。因为党员干部也是来自群众，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所以，不能静止、孤立地作社会的群体和层次的划分，而应该着眼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当然，在向群众进行人生价值观的宣传教育时，必须是生动活泼和讲求实效的。要探索宣传教育的方法和艺术。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要坚持以正面教育为主，正面引导为主，寓教于乐，寓教于文。要使这种教育渗透到其他业务工作中，在许多情况下，还要力求渗透到各项经济活动之中。总之，既要形式多样，务求实效，又要反对形式主义。

一场伟大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既需要科学的理论指导，又能够产生和丰富伟大的理论。在今天，我国正在通过体制改革来实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我们在这场由此引起的社会变革中，坚持用毛泽东人生价值理论来教育我们的人民，来正确地回答和解决现实生活中提出的人生价值导向问题，就能够使这种人生价值理论得到丰富和发展，从而更好地发挥其指导功能。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

注释

江泽民在接见全国宣传部长座谈会全体代表时的讲话(1993年1月15日),载1993年1月16日《人民日报》。

参阅毛泽东:《伦理学原理 批注》(1917至1918年)。其中毛泽东写道:“必如是以说明历史之生活,始近真理、始有价值”、“有无价值人为之事也,是否真理天然之事也。学者固当于天然本质中求真理,有无价值抑其次也。”又写道:“宗教可无,信仰不可少。”等等。

(17)(22)(25)《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57页,第822页,第1079页,第864页。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2页,第284页。

《毛泽东选集》,东北书店出版,1948年,第891页。

毛泽东:《庆祝吴玉章同志60寿辰大会上的祝词》,载1940年1月24日《新中华报》。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35页。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72页,第275页,第244页,第11页。

(11)(14)(20)(23)《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20页,第706页,第559页,第660页。

(12)(17)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3—4页,第131页。

(13)(19)《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328页,第42、72页。

(15)《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62页。

(18)《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42—343页。

(21)转引自1981年9月22日《人民日报》。

(24)《列宁选集》第1卷,第6页。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66页。

试论毛泽东的知识分子观

唐秉仁

毛泽东的知识分子观，既是一个变化发展的曲折过程，又是一个包含矛盾的观念系统。从内容上看，可以分解为主体部分和非主体部分。主体部分，是指毛泽东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于中国具体实际，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提出的一系列正确的理论观点和方针原则，属于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组成部分，我们称之为毛泽东的科学知识分子观。毛泽东的知识分子观的非主体部分，指其晚年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失误，不属于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范畴。主体部分和非主体部分的对立统一，构成毛泽东知识分子观内容上的内在矛盾。下面，我们拟由动态而静态，从纵向到横向，对毛泽东知识分子观作一些具体分析。

毛泽东知识分子观的发展轨迹

毛泽东个人的知识分子观的发展轨迹，应以 1976 年 9 月 9 日毛泽东逝世为终点。但毛泽东是我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其知识分子观的主体部分作为毛泽东思想的构成要素在其身后为全党所继承和发展，非主体部分也为党所纠正。这两个方面都同现阶段党的知识分子理论和政策密切相关。为了说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对毛泽东知识分子观的继承、纠正和发展，有必要把毛泽东知识分子观的发展轨迹延伸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同时，毛泽东作为党的第一主要领袖，他的知识分子观总是这样那样地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及其实践相联系的，只有在这种联系中才能正确评价其是非得失。据此，我们对发展轨迹作如下描述。

第一阶段(1921—1927)，毛泽东知识分子观开始萌芽，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初期统一。这一阶段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基本正确，尽管幼年的党对于知识分子的认识尚处于探索之中，但到 1925 年党的四大已开始明确地把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一起看作三大革命力量之一。毛泽东 1926 年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把小知识阶层归入小资产阶级即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的范畴，看作是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最接近的朋友”，这种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和在革命中的地位的分析，同党的四大是一致的，这是毛泽东科学知识分子观萌芽的标志。

第二阶段(1927—1935.1)，毛泽东科学知识分子观开始形成，同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左”倾政治路线和知识分子政策处于分离和对立。《井冈山的斗争》、《反对本本主义》是这一阶段的标志。同其开辟的中国式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相适应，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中注意吸收知识分子参加革命，把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商人一起作为“深切明了社会经济情况的人”列入社会调查对象，把在学学生失业之忧和毕业学生无就业之望作为已经激化的社会矛盾的表现，据以分析“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革命形势发展的客观必然性，从而深化了第一阶段关于知识分子的观点。可惜当时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未能为全党所认识和接收，反而受到党内“左”倾路线的压制和打击。毛泽东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正确观点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这种分离和对立，是同党处在幼年时期，尚未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这一情况相联系的。

第三阶段(1935.1—1956),是毛泽东科学知识分子观正式形成、继续发展、日趋成熟并转化为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阶段。《五四运动》、《青年运动的方向》、《大量吸收知识分子》、《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论联合政府》、《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等科学著作和党的文献,集中反映了这一阶段的情况和特点。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知识分子的经济地位、阶级属性、思想特点、政治态度和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作用,指明了知识分子健康成长和发挥作用的正确方向和道路,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知识分子理论,并据此制定了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建国以后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知识分子政策。延安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批判了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关门主义倾向,专门作出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大量吸收知识分子”,遂成为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同党的总路线相适应的关于知识分子的基本政策。建国以后,党对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采取了“团结、教育、改造”的基本政策。实践证明,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前的整个过渡时期内,这一政策是完全正确的。

第四阶段(1957—1978),毛泽东的知识分子观在曲折中变化发展。这一阶段又分为三个小阶段。

(1)1957—1965年,毛泽东的知识分子观的变化呈现出一段向下的曲线。其间虽然提出过一些正确的思想观点,但未能坚持和落到实处,总的趋势是向“左”的方向发展。与此相联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情况也大体类似。从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到1963—1965年对理论界、文艺界一批知名人士的批判,使知识分子受到一次又一次的冲击。

(2)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知识分子观上“左”的错误和党对于知识分子政策的“左”的错误都达到极端。

(3)1976年10月—1978年12月,由于当时党中央主要负责人坚持毛泽东晚年错误,“左”的知识分子理论和政策又延续了两年。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关于文学艺术的几个批示以及“文革”期间中央的文件、毛泽东的谈话和批示,反映了毛泽东一生中最后20年的知识分子观在曲折向下发展的轨迹。

第五阶段(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拨乱反正,毛泽东晚年错误得到纠正,其科学知识分子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恢复、坚持和发展,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重新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轨道,“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充分发挥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成为党在新时期关于知识分子的基本政策。

综观毛泽东知识分子观形成和发展的轨迹,可以看出其中有两个“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发展周期:从第一阶段到第三阶段,是毛泽东知识分子观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由初期统一到互相分离再到科学统一,构成第一个周期,毛泽东科学知识分子观由萌芽、形成而达到成熟。第三阶段是第一个周期的终点,又是第二个周期的起点。从第三阶段到第五阶段,毛泽东知识分子观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由科学统一到错误统一再到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中央拨乱反正,对毛泽东科学知识分子观恢复、继承、发展而在更高水平上实现科学统一,这是第二个周期,反映我党经过曲折,在知识分子理论和政策上更加成熟。毛泽东知识分子观的形成和发展过程,给了我们有益的启示:

第一，党的知识分子理论和政策是以党的思想路线为思想基础的。什么时候党较好地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党的知识分子理论和政策就比较切合实际；反之，什么时候离开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党的知识分子理论和政策就会犯右的或“左”的错误。

第二，党的知识分子理论和政策，是受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制约的。党的总路线、总政策正确，知识分子理论和政策必定也会大体正确；反之，党的总路线、总政策错了，党的知识分子理论和政策也会发生错误。在后面这种情况下，党内仍会有人提出正确主张。这就出现了这些同志的正确知识分子观同占统治地位的错误政治路线和错误知识分子政策互相分离甚至对立的情况。只有经过相当长时间的实践检验，在错误路线和错误政策的有害后果明显暴露并为多数党员所认识之后，正确的主张才会克服错误的政策。

第三，党的知识分子理论和政策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兴衰成败。一般来说，哪个时期党的知识分子理论和政策正确，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发挥得好，党的建设就发展，党的事业就兴旺；哪个时期党的知识分子理论和政策出现失误，知识分子受到轻视甚至排斥、打击，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就受损失，甚至失败。知识分子问题当然不是影响和决定党的事业的唯一因素，但的确是诸多因素中不可忽视、不可缺少，从趋势看越来越重要的因素。

毛泽东科学知识分子观的基本内容

毛泽东的科学知识分子观，包含有多方面的内容，其主要的有：

(一)关于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

知识分子从来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而是一个分别依附于不同阶段的特殊阶层。毛泽东曾把知识分子同其所属阶级的关系比作“毛”与“皮”的关系，意在强调知识分子依附于某一阶级，就成了这一阶级的知识分子，不会同时依附于别的阶级。因此，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是由其所从属、所服务的阶级决定的。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为资产阶级剥削和压迫无产阶级服务，依附于资产阶级的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为无产阶级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从属于无产阶级的，就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

至于知识分子个人的阶级成分，则应由他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以及取得主要生活来源的方法来确定。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把脑力劳动者看作是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的雇佣劳动者，是“在这个特定意义上的生产工人”。毛泽东于1993年10月签署的《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中指出：“知识分子在他们从事非剥削别人的工作，如当教员、当编辑员、当新闻记者、当事务员及著作家、艺术家等，是一种使用脑力的劳动者。此种脑力劳动者，应受到苏维埃法律的保护。”1950年《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也规定：“凡受雇于国家、合作社的或私人的机关、企业和学校等，为其中办事人员，取得工资以为生活之全部或主要来源的人，称为职员。职员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并规定，以工资为生活之全部或主要来源的工程师、教授、专家等，称为高级职员，其阶级成分与一般职员相同。可见，即使在旧中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依其个人阶级成分也属于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可是，毛泽东在阶级属性上把旧中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明确归入小资产

阶级的范畴。这就出现了大多数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和个人阶级成分不一致的情况。这是由他们的家庭出身、受教育性质、社会影响的不同造成的。

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小生产者也变成集体劳动者。原来依附于剥削阶级的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顺应历史潮流，转而为工人阶级服务。原来在个人阶级成分上属于工人阶级而在阶级属性上属于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是旧中国知识分子中的大多数，也由于社会经济制度、阶级关系的变化和知识分子本身的进步，在阶级属性上也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了。何况在现有知识分子队伍中，90%以上是解放后党和国家自己培养的，70%以上出身于劳动人民的家庭。这样，就在知识分子的总体上，实现了阶级成分和阶级属性的一致。

正是基于知识分子的这种根本性变化，1956年1月，在根据毛泽东的提议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周恩来在其代表中央所作的报告中，首次作出了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重要论断。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根据毛泽东的讲话、周恩来的报告以及会议讨论的意见，同年2月2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在分析建国后知识分子队伍结构上的巨大变化和政治思想上的巨大进步的基础上，作出了以下的结论：“从这些情况出发，我们必须认识，知识分子的基本队伍已经成了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已经形成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联盟”。

(二)关于知识分子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

关于知识分子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集中体现在毛泽东1939年12月1日为中央起草的《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的一个著名论断中，这就是：“没有知识分子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第一，丢弃没落阶级而流向新兴阶级，是知识分子历史运动的基本趋势。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并且是越来越重要的生产力这一事实本身，就决定了知识分子是趋向于社会进步的，是社会革命的重要动力。没落阶级的腐朽统治使多数知识分子中的先进分子从自身的境遇和大众的疾苦敏感到现存制度的腐败，促使他们脱离没落阶级而投向新兴阶级。无论古今中外，每次社会革命都有出身于旧营垒的知识分子为新兴阶级服务。所以毛泽东说中国的知识分子，除去一部分接近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并为其服务而反对民众的知识分子外，一般地是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大资产阶级压迫，遭受着失业和失学的威胁。因此，他们有很大的革命性。他们或多或少地有了资本主义的科学知识，富于政治感觉，“他们在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中常常起着先锋和桥梁的作用”。

第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体力量吸引大量的知识分子。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必须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广大的传播和接受，首先也是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无产阶级政党需要自己的领袖，领袖只能是最先进最优秀的知识分子。毛泽东把马克思尊为“代表人类最高智慧的最完全的知识分子”，指出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都是知识分子，他说：“无产阶级有一批知识分子为它服务，头一个就是马克思，再就是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再就是我们这些人，还有许多人。”中国革命需要发动群众，组织力量，建立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而“革命力量的组织和革命事业的建设，离开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参加，是不能成功的。”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又指出中国革命有军事战线和文化战线两条

路线，知识分子就是文化战线的各级指挥员。他引证列宁“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的名言，说明革命文化运动对于革命的实践运动的重要性。

第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客观环境使知识分子问题更加重要。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文化十分落后，党及其所领导的军队的成员大多文化水平低。要战胜强大的敌人，必须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锐利的理论武器。但是“没有文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就学不进去。学好了文化，随时都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工农出身的干部、战士学文化，需要知识分子帮助。为了提高党和革命队伍的素质，毛泽东提出了工农知识化、知识分子工农化的目标。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知识分子人数很少。毛泽东指出，为着扫除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需要大批的人民的教育家和教师，人民的科学家、工程师、技师、医生、新闻工作者、著作家、文学家、艺术家和普通文化工作者。这种供需矛盾，使得知识分子在我国“特别宝贵”，是“国家和社会的宝贵的财富”。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是小生产者的汪洋大海。文化水平的低下和受小生产者狭隘眼光的束缚，使许多干部往往看不到知识、文化、科学技术和知识分子对于中国革命，对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重大作用。而敌人却在千方百计地同我们争夺知识分子，这就使知识分子问题显得更为重要。毛泽东1939年在《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中分析了军队、学校和地方党部中的许多干部，还没有注意到知识分子的重要性，还存着恐惧知识分子甚至排斥知识分子的心理的种种表现。这一分析表明，对知识分子的这种恐惧甚至排斥心理是党的“大量吸收知识分子”政策贯彻落实的主要思想障碍，而小生产意识的影响则是产生这种心理的主要思想根源。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客观环境给予我们的消极影响的一个表现。

(三)关于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以后，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的讲话中提出，党和人民的中心任务是“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这是同1956年9月党的八大的路线一致的。为了适应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形势，毛泽东提出了建立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宏大新部队的战略任务。他指出：“在这个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宏大新部队没有造成以前，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是不会充分巩固的”。又强调：“无产阶级没有自己的庞大的技术队伍和理论队伍，社会主义是不能建成的。”在这里，毛泽东明确地把建立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宏大新部队，看作是巩固革命事业、建成社会主义的决定性条件。在此以前，在新中国诞生前夕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毛泽东已经把广大革命知识分子同全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一起看作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此后，他又多次重申，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三支基本力量。

毛泽东之所以如此重视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是有其充分根据的。

首先，知识分子是实现国家富强的重要力量。毛泽东指出：“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制造的。”知识分子不仅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而且是新的生产力的创造者。实现国家富强，关键是科学技术

现代化，最重要的是人才问题。毛泽东向来把自然科学看作是人类向自然争取自由的武器，把社会科学看作是向社会争取自由的武器。早在 1941 年 1 月，他在给儿子毛岸英、毛岸青的信中，就建议他们“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说“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1946 年 1 月给蔡博等留苏青年的信中说：“新中国需要很多的学者及技术人员，你们向这方面努力是很适当的。”⁽¹⁰⁾1956 年 1 月，毛泽东在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讲话，提出现在是革技术的命，革没有文化、愚昧无知的命，所以叫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搞技术革命，没有科技人员不行，中国要培养大批知识分子，要有计划地在科学技术上赶超世界水平，先接近，后超过，把中国建设得更好。⁽¹¹⁾

第二，知识分子是社会改革的先锋和参谋。历代的改革都是知识分子发起的。社会主义社会是改革的社会。毛泽东在 1957 年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国家要有很多诚心为人民服务、诚心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立志改革的人”。他要求我们党更好地同党外的一切立志改革的志士仁人共同工作⁽¹²⁾。他是在分析当时的知识分子状况时说这番话的，这里所说的“诚心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立志改革的人”和立志改革的“志士仁人”，指的就是知识分子中的先进者。知识分子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丰富的科学知识，视野开阔，思想敏锐，比较早地觉察到现行社会体制的弊端而发出改革的呼声，成为思想解放的先驱，并能为复杂的社会改革提供理论武器和舆论准备，提出各种改革的政策设计和行动方案，供党和国家决策者参考选择，在社会改革中起着参谋的作用。

第三，知识分子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主力军。毛泽东生前没有明确提出或正式使用过“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概念，但对于精神文明建设的各方面工作十分重视。早在 1949 年 9 月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词中就预见到：“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¹³⁾这里实际上提出了建设高度精神文明的任务。精神文明建设，包括思想建设和文化建设。无论哪一项建设，都离不开知识分子的创造性劳动。知识分子是文化知识的传播者、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

（四）关于知识分子健康成长的方向和道路

知识分子怎样才能担当起历史赋予的重任呢？毛泽东为知识分子指明了正确的道路和方向，这就是：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朝着又红又专的方向前进。

毛泽东指出：“……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分子的最后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¹⁴⁾

为什么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民众相结合？毛泽东对此作了如下的分析。第一，工农是革命的根本力量。他指出，中国民主革命的完成依靠一定的社会势力。这种社会势力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和进步的资产阶级，而其根本的力量是工农，革命的领导力量是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只有同占全国人口的 90% 的工农大众这个主力军相结合，才能形成一支强有力的军队。单靠知识分子，要达到反帝反封建的胜利是做不到的。

社会主义建设与民主革命有所不同。知识分子成了工人阶级一部分，同

工人阶级一起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力量，同工人农民一起成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力军。但工人阶级中的脑力劳动者同体力劳动者相比仍存在差别，且在相当长时期内脑力劳动者只占少数。只有两部分劳动者相互结合，相互学习，共同努力，携手前进，才能建设社会主义。

第二，知识分子思想上的弱点只有在与工农相结合的过程中才能克服。毛泽东指出：“知识分子在其未和群众的革命斗争打成一片，在其未下决心为群众利益服务并与群众相结合的时候，往往带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他们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知识分子的这种缺点，只有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才能克服。”⁽¹⁵⁾他本人就是通过同工农相结合，改造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转变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毛泽东走过的道路，是中国一切知识分子革命化的必由之路。

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人人都需要改造。工人阶级、共产党人要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不断改造主观世界，知识分子当然也需要改造。诚然，今天讲知识分子同工农相结合，不只是为了克服知识分子的弱点。结合是相互的，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应当互相学习，在结合中克服各自的弱点，取长补短，共同提高。就知识分子而言，当然有一个学习工农的长处，克服自身弱点的问题，在一部分知识分子中，往往有一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倾向。要克服知识分子中的这些弱点，只有坚持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从长远看，只要社会上还存在着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始终有一个相互结合的问题，这是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必由之路。

第三，教育者必须先受教育。毛泽东指出，知识分子是教育者，有一个先受教育的问题。他又说，许多东西单从书本上是学不成的，要向生产者学习，向工人学习，向农民学习，在学校则要向学生学习，向自己的教育对象学习。知识分子同工农相结合，可以了解工人农民思想和感情、愿望和要求，使教育有的放矢，易于为工农所接受，收到更好的效果；又可以向工农学习丰富的实践经验，弥补自己知识之不足，是实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使知识分子获得比较完全的知识的必要条件。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才能又红又专，适合社会主义事业的需要。1957年10月13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13次会议上提出：“知识分子要同时是红的，又是专的。”⁽¹⁶⁾翌年1月，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进一步论述了红与专的关系：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是两个对立物的统一。一方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他还指出，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就是又红又专。毛泽东对知识分子又红又专的要求以及对红与专的关系的论述，为知识分子的健康成长指明了正确的方面，当代知识分子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担当起历史的重任，就必须继续沿着与工农相结合、与实践相结合的道路，朝着又红又专的方向，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毛泽东晚年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失误及其教训

在毛泽东革命一生的大多数的时间里，他的知识分子观是正确的，但晚年也发生过严重的失误。其理论上的失误主要表现在：

——在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上，放弃了知识分子大多数已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正确判断，把知识分子大多数归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范畴。

——在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的关系上，离开了他自己关于社会财富

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共同创造的正确论断，提出知识分子是“工人农民养活”的、工人农民“给知识分子饭吃”的观点。

——在知识分子基本政策上，把“团结、教育、改造”这个仅适合于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前的政策，扩大到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

——在知识分子前进的道路和方向上，改变了以前关于“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又红又专”的正确解释，片面强调知识分子接受工农再教育、工农改造知识分子，片面强调红而忽视专。

——在对建国后 17 年教育和文艺工作的估计上，推翻了他本人和党中央过去的正确观点，认为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专了无产阶级的政。

在实践上的失误，则表现为从 1957 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开始，政治运动接踵而来，知识分子首当其冲，往往是学术讨论演变成思想批判，思想批判又升级为政治斗争。“文化大革命”更使大多数知识分子受到程度不同的冲击，教育、科学、文化事业受到严重摧残。

毛泽东晚年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失误，留给我们深刻的历史教训。

首先，对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错误判断，导致政治路线上“以阶级斗争为纲”代替“八大”路线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就为把知识分子大多数划入资产阶级范畴，使阶级斗争扩大化提供了理论和路线前提。政治路线决定具体路线和政策。毛泽东晚年知识分子观上的失误，是总的指导思想和政治路线失误的必然产物。因此，只有正确认识基本国情，准确把握社会主要矛盾，据以制定出正确的政治路线，并且毫不动摇地坚持到底，才会有正确的知识分子理论和政策。

其次，把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绝对化，把阶级的思想政治表现同阶级的存在根据等同起来，是知识分子问题上发生“左”的错误的认识根源。阶级本质上是经济范畴，阶级的存在根据和划分标准只能是人们在社会生产关系中的地位。因而封建生产关系被消灭和资本主义私有制被改造，就意味着地主、资产阶级这两个阶级的消灭。阶级产生以后便有其政治、思想上的表现。一定阶级的思想并不随其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的改变而立即消灭，这就是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把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看成是绝对的，把阶级的思想、政治表现等同于阶级存在的根据和划分阶级的标准，因为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在社会主义社会长期存在便断定资产阶级依然存在，断定知识分子的多数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正是这种主观主义思维逻辑，导致了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左”倾错误。因此，坚持一元论的唯物史观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保证知识分子理论和政策正确性的思想基础。

再次，理论的真理性是理论的坚定性的前提，理论的坚定性是理论的真理性的条件。毛泽东的知识分子观在 1957 年以前总体上是正确的，他晚年所有失误之处，在此之前都曾有科学的论断。因而他晚年的错误不是一贯的错误，而基本上是离开了他革命一生中大多数时间都坚持的正确思想所造成的错误，是未能把自己的正确思想贯彻到底所造成的错误。当然，1957 年以前也有某些不甚完善甚至失误的成分，如建国后头几年开展的思想文化方面的批判就有某些不当甚至失误，这也是发展成后来“左”的错误的潜在原因。

毛泽东晚年的失误从反面证明了他的科学知识分子观的正确性，任何人（哪怕是他自己）一旦违反这些科学思想，会产生怎样严重的后果。同时证明了，一种理论，只有经得起实践的检验，才有生命力，才可能坚持。毛泽东的科学知识分子观，通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拨乱反正，终于得到恢

复。理论的真理性是理论的坚定性的前提。但正确的理论并不自然而然地就能坚持下来，在一定条件下，可能被人们甚至理论创立者本人所放弃。这时真理就会向谬误转化。在这个意义上，理论的坚定性又是理论的真理性的条件。坚持真理，要有巨大的勇气，要有为真理而斗争的精神，同时要坚持群众路线，注重调查研究，不断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接受新事物，总结新经验，使思想跟上时代的步伐。毛泽东晚年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失误的根本原因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状况和知识分子状况作了违反实际的估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制定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充分发挥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的知识分子政策，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恢复和发展毛泽东科学知识分子观的结果，也是否定和纠正毛泽东晚年在这一问题上的失误，总结其经验教训的产物。这一政策是在邓小平的知识分子理论指导下制定的。邓小平是在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正确分析现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逐步形成“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大前提下，提出自己的知识分子理论的，从而使之具有新的历史高度和时代特征。第一，他从社会主义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高度，论证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必要性。第二，他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具有“富强、民主、文明”全面规定性的现代化，而科学技术现代化是实现全面现代化的关键，知识、人才的竞争是当代国际竞争的关键的战略高度，论证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重要性。第三，他对“又红又专”、“与工农相结合”、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等关于知识分子的重大理论问题作了科学的解释和界定，破除了长期以来笼罩其上的神秘观念，又从彻底的唯物史观的立场出发作出在社会主义社会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的结论，从而为恢复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论断，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第四，他不仅提出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充分发挥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的基本政策，而且将其具体化为对知识分子“政治上一视同仁，工作上放手使用，生活上关心照顾”，又制定了一整套与之衔接、为之服务的具体政策，并同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教育科技体制的改革相配合，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战略相适应，从而保证了知识分子政策逐步落到实处。

邓小平的知识分子理论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知识分子理论以及以之为指导的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知识分子政策，是以毛泽东的科学知识分子观为理论基础的，又是对它的重大发展。这种发展不仅在于纠正了毛泽东晚年的失误，更在于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时代特征的新思想新观点，还在于在知识分子政策上更科学、更系统、更具体、更具有可操作性。因而研究毛泽东的知识分子观的内在矛盾，分清其主次，了解毛泽东知识分子观的变化轨迹及其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关系，有助于正确认识邓小平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对于毛泽东思想的历史性贡献，提高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知识分子政策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这正是研究毛泽东知识分子观的现实意义之所在，也是对毛泽东诞辰 100 周年最好的纪念。

(作者单位：长沙水利电力师范学院)

注释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6 卷第 1 分册第 444 页。 (14)(15)(16)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41页，第641页，第559页，第641—642页，第489页。

(12)(13)《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79页，第375页，第463页，第472页，第227页，第411页，第6页。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18页。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16、265页。

(11)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507页。

毛泽东的青年观

魏久明

毛泽东的青年观，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毛泽东在长期革命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分析、认识和总结中国青年的基本特点、中国青年运动的基本规律及其历史经验，提出的关于培养教育青年、动员和组织青年参加革命斗争、推动无产阶级青年运动发展的一系列重要观点。它是我国现代历史上青年运动蓬勃发展的指导思想。

毛泽东的革命实践，是从他从事青年运动开始的。1915年，他向长沙各校发出“征友启事”，提出以意志坚定、艰苦奋斗、随时准备为国捐躯为条件，结交青年朋友。1917年，他和友人步行千里，作社会调查。1918年，他发起成立新民学会，聚集革命青年的队伍，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他在湖南参加领导学生运动，组织二十多所学校举行总罢课。他主编的《湘江评论》，对湖南地区的五四运动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1920年，他创办文化书社、俄罗斯研究会，传播马克思主义，在长沙筹建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并与何叔衡等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

1921年，毛泽东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党成立之后，他积极从事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武装斗争。他在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过程中，亲身感受到中国青年“有很大的革命性”，重视青年这支新生力量，注意发挥他们在革命斗争中的积极作用。1935年，在北平爆发了一二九运动，毛泽东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一二九运动是伟大抗日战争的准备，这和五四运动是第一次大革命的准备一样”，“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1939年，五四运动20周年时，毛泽东撰写发表纪念文章《五四运动》、《青年运动的方向》，全面总结了五四运动以来青年运动的历史经验，对中国青年运动在整个中国人民革命运动中的地位 and 作用，中国青年运动的方向、任务和方法等问题作了深刻的论述。毛泽东关于青年运动是整个人民革命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军”；青年运动应该把实现党的总路线、总任务放在第一位；青年运动要和人民革命运动保持政治方向上的一致；工农是人民革命运动的主体，青年运动必须和人民革命运动相结合等观点，都是青年运动重要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和青年运动重要的指导原则。特别是他的关于知识青年必须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光辉思想，在当时就教育和激励了我国广大知识青年“脱下学生装，穿上粗布衣”，到根据地、到边区、到敌后去，同工农群众、同人民武装相结合，投身抗日战争，使一大批青年成为坚强的革命战士。《青年运动的方向》，是中国民主革命时期指导青年运动的纲领性文献。

解放战争时期我国青年运动进入鼎盛发展阶段。在1945年昆明爆发的反内战、争民主的一二一运动的推动下，广大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逐步形成了配合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二条路线。毛泽东赞扬“学生运动的高涨，不可避免地要促进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涨。过去五四运动时期和一二九运动时期的历史经验，已经表明了这一点。”蓬勃发展的学生运动，有力地支援了人民解放战争，加速了中国革命胜利的进程。

在中国革命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夕，1949年4月，在刚刚解放的北平，召开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亲笔为大会题词：“同各界青年一起，领导他们，加强学习，发展生产。”这为新组建的青年团提出了明确的任务，指明了新中国成立后青年团、青年运动的任务是带领青年

搞好学习和建设。为了探讨搞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青年工作的问题，1952年8月，毛泽东亲自找团中央的同志谈话，出了两个题目：一是党如何领导青年团的工作；二是青年团如何做工作。要求各级党委和青年工作部门进行调查研究。1953年6月30日，毛泽东在接见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时，回答了这两个题目，着重讲了青年团如何工作的问题。毛泽东这次以《青年团的工作要照顾青年的特点》为题的谈话，全面论述了社会主义时期青年工作、青年运动的方向、方针、任务和青年成长的规律及青年工作的基本方法。毛泽东强调要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开展适合青年特点的独立活动；指出青年时期是人的成长时期，是长身体、长知识、也是开始工作的时期，要求青年做到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要兼顾青年的工作、学习和娱乐、休息两个方面。《青年团的工作要照顾青年特点》，是社会主义时期指导青年工作、青年运动的纲领性文献。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时期青年的培养教育和青年的成长问题深为关注。他根据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需要，提出对青年的教育方针是：“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个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并指出在新中国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存在的弱点。他说：“不少青年人由于缺少政治经验和社会生活经验，不善于把旧中国和新中国加以比较，不容易深切了解我国人民曾经怎样经历了千辛万苦的斗争才摆脱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而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要经过怎样的长时间的艰苦劳动。”毛泽东强调必须加强对青年的思想政治教育。接着，他又提出关于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条件和要求。这些都是社会主义时期指导青年全面成长和青年运动健康发展的重要思想。毛泽东在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青年观。其主要内容是：

第一，关于青年地位和青年作用问题的论述。毛泽东认为：青年是人民革命队伍中的一支重要方面军，要重视和发挥青年人的作用。

青年作为社会群体的一种力量，有史以来就存在。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青年是人口中一个很大的群体。由于人口构成中工农是主体，所以工农青年也在青年中占主体地位。我国近代工业发展很迟，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产业工人才达到200万人左右。由于我国近代工业很“年轻”，这些产业工人中绝大部分是青年工人。中国工人阶级最革命、组织纪律性最强等特点，在这部分青年工人中都是具有的。随着我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家庭式的私塾被现代群体式的学校所代替，现代学校自然地把知识青年聚集起来，形成了传播和接受现代文化科学知识、现代文明和新思想的阵地，使青年学生成为社会中最敏锐、活跃、接受新事物快、能量超过自身数量的一部分人。我国近代以来民族苦难接踵而至，广大人民和青年备受帝国主义侵略和反动统治阶级剥削压迫之苦。在中华民族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文化传统熏陶下，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大批中国青年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敢于革命、敢于斗争的大无畏精神。

毛泽东在革命实践中，对中国青年的状况和特点有深切的了解。他高度地赞扬中国青年和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和革命的斗争性。1926年，他在湖南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上说：“中国的学生多半是很苦的，并且毕了业出来无处可用，故不得不革命”，因此，“中国学生尤多从事于革命运动的。”1929年，他在总结土地革命斗争经验时，指出：“劳苦青年群众占人口百分

之三十以上，在斗争中他们表现得最勇敢最坚决。” 1937 年，他同北方青年代表谈话时说：“北方青年是民族解放斗争的先锋。” 建国后，他称赞“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的一部分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他们最肯学习，最少保守思想，在社会主义时期尤其是这样。” 他要求“各地的党组织，协同青年团组织，注意研究如何特别发挥青年人的力量，不要将他们一般看待，抹杀了他们的特点。”

对青年在革命和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毛泽东也给予很高评价。他认为工农是革命的主力军，青年则是人民革命的“一个方面军，而且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军”。他说：“‘五四’以来，中国青年们起了什么作用呢？起了某种先锋队的作用”，“就是带头作用，就是站在革命队伍的前头。”

毛泽东多次讲过，不要忽视青年的力量，革命没有青年是不行的。1939 年 10 月 5 日，他为安吴青训班二周年纪念题词中写道：“带着新鲜血液与朝气加入革命队伍的青年们，无论他们是共产党员或非党员，都是可宝贵的，没有他们，革命队伍就不能发展，革命就不能胜利。” 在社会主义时期，他也说过：“工农青年、知识青年和部队中的青年，他们英勇积极，很有纪律，没有他们，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就不能胜利。”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一直很重视发挥青年人的作用。他多次强调要相信青年，争取青年，团结青年，组织青年，使他们在革命斗争中发挥某种先锋作用，在生产建设中发挥突击作用，在发展科学技术中发挥创新作用。他说：“从古以来，发明家、创立新学派的人，在开始的时候，都是年轻的，学问比较少的，被人看不起的，被压迫的。这些发明家到后来才变成壮年、老年，变成学问多的人。” 他对青年人敢想敢干、敢于创新的精神极为称赞。

共产主义事业是千秋大业，需要一代一代人不断奋斗才能实现。青年是保证这个伟大事业持续发展和最终胜利的承前启后的一代。因此，毛泽东和其他的伟大革命导师一样，总是把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他满怀深情地对青年人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世界是属于你们的。中国的前途是属于你们的。” 毛泽东到晚年，出于保证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的思虑，多次讲到要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事业接班人的问题。

第二，关于青年全面教育和青年成长问题的论述。毛泽东认为：要教育青年树立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造就全面发展的一代新人。

青年是从年龄阶段上确定的一个相对独立的人群。他们处在长身体、长知识和世界观形成的奠基时期，他们在生理、心理、思维、学识、从业、婚姻、家庭和兴趣、爱好、娱乐等方面，普遍有着共同的要求、特点、权益和成长规律。但是，在阶级社会中，从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上看，他们又属于不同的阶级或社会阶层，他们之间的思想、利益、追求和基本素质上，又有很大的以至根本的不同或差别。青年人受社会环境制约和各种社会思潮影响很大。因此，对青年的培养教育是一个艰巨复杂的社会工程。然而，青年时期是一个人成长、成熟和社会化的过渡时期，青年人又担负着继往开来的历史任务，这就要求必须把青年培养成为社会所需要的全面发展的人材。

毛泽东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和培养社会主义一代新人的要求，在 50 年代提出我国青年要成为在德、智、体几个方面都得到全面

发展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他要求青年人不仅有理想、信念、思想政治觉悟和良好的道德品质，而且还必须掌握现代文化科学知识和生产业务技能；不仅德才兼备，而且还要有健壮的体魄。

毛泽东十分重视加强对青年的思想政治教育，要求青年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他认为青年缺乏政治经验和社会经验，缺乏辨别是非的能力，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青年成长的基石，也是培养革命接班人的首要条件。1938年，他在陕北公学第二期开学典礼大会上的讲话中说，要给学员赠送两件“礼物”，其中第一件就是“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他在这篇讲话中提出的政治方向就是：坚持社会主义理想，走社会主义的路。1939年，他在延安模范青年颁奖大会上，明确地提出“青年应该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新中国建立后，他一再提出要加强对青年的思想政治教育，关心青年在政治上的进步。他针对一些青年中出现的“好像什么政治，什么祖国的前途，人类的理想，都没有关心的必要”的问题，严肃指出：“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

毛泽东要求对青年的教育采取科学的态度。他历来主张既要充分肯定青年的优点和长处，又要指出青年的弱点和不足。因此，他认为对青年既要严格要求，又要热情帮助。他主张对青年的教育要坚持正面教育，循循诱导的原则，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有的放矢的原则，坚持鲜明生动，循序渐进的原则；坚持民主讨论，以理服人的原则，等等。他说：“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¹¹⁾

毛泽东主张青年走又红又专的道路。他认为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政治和业务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¹²⁾。他反对做空头的政治家，也反对做迷失方向的实际家。

毛泽东对青年身心的健康成长极为关注。他说“十四岁到廿五岁的青年们，要学习，要工作，但青年时期是长身体的时期，如果对青年长身体不重视，那很危险。”他甚至对青年人“要多玩一点，要多娱乐一点”，一天要睡几个小时等问题都提到了。他说：“我提议，学生的睡眠时间再增加一小时。现在是八小时，实际上只有六、七小时，普遍感到睡不够。因为知识青年容易神经衰弱，他们往往睡不着，醒不来。一定要规定九小时睡眠时间。要下一道命令，不要讨论，强迫执行。”

毛泽东还强调要德育、智育、体育“三育并重”。他反对“详德智而略于体”。他早年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体育之研究》(1917年4月17日)就说：“体者，为知识之载而为道德之寓也。其载知识也如车，其寓道德也如舍。”他要求青年对学习、工作和睡眠、休息、娱乐这两头都抓紧，做到“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

第三，关于青年、青年运动基本任务问题的论述。毛泽东认为：青年、青年运动的任务可分为一般任务和特殊任务。

青年是人群整体的一部分，他们和人群的整体有着共同的利益和要求。在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中，青年只有和人民群众一道去奋斗、去创造，才能实现共同的利益，满足共同的需求。因此，青年和人民群众的整体，无论是在革命或者建设时期，都有着共同担负的任务。但是，青年又是人群整体中的一个特殊的部分，他们有着不同于人群整体的特殊利益和要求。因此，在无

产阶级革命事业中，青年在同人民群众完成共同任务的前提下，还要争取实现自身的特殊利益和满足自身的特殊要求，这就是青年的特殊的任务。

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与世界学联代表团谈话时就讲到：“中国青年们的任务，可分为一般的与特殊的。一般的任务……这是中国任何年龄、任何职业的人民之共同的任务，没有什么分别的。有分别的，是其特殊任务。中国青年们的特殊任务是什么？就是争取自身的特殊利益。”⁽¹⁴⁾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把“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民主共和国”当作青年的一般任务；把改良教育和学习，实行贫苦学生免费入学，组织学生和青年团体及救亡团体，争取青年的民主权利等，当作青年的特殊任务。

在处理一般任务和特殊任务的关系问题上，毛泽东强调首先要引导青年为实现人民群众的共同任务，即为实现党在各个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而奋斗。因为党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反映和代表了人民群众的共同利益和要求，实现党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就是完成人民群众的共同任务。毛泽东说：如果忘记了我党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将是一个盲目的不完全的不清醒的革命者，就会迷失方向，就会贻误我们的工作⁽¹⁵⁾。只有完成人民群众的共同任务，才能为完成青年的特殊任务奠定基础，才能从根本上实现青年的特殊利益和要求。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是执政党。党的中心工作任务，就是人民群众包括青年的共同任务。为了使青年人在完成共同任务的前提下完成自己的特殊任务，毛泽东强调青年工作“要配合党的中心工作，但在配合党的中心工作当中，要有自己的独立工作，要照顾青年的特点。”毛泽东提出的青年团和青年运动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开展工作和搞一些适合青年特点的独立活动，就是一般任务和特殊任务的内涵和作法在社会主义时期的新发展。

毛泽东还指出：在引导和组织青年完成一般任务时不能忽视带领青年去完成自己的特殊的任务。因为不重视青年的特殊利益和要求，就不能调动青年的积极性，也不可能团结广大青年为实现党的总路线和总任务而奋斗。毛泽东在对青年工作的指示中讲过：“要照顾青年的特点，要有自己的系统的工作。……这并不是什么新发明，老早就有了的，马克思主义历来就是这么做的。这是从实际出发。青年就是青年，不然，何必搞青年团呢？”他还说：如果不照顾青年的特点，不注意青年人的利益和要求，就会脱离青年群众，青年也就不会拥护你们⁽¹⁶⁾。

第四，关于青年、青年运动方向和道路问题的论述。毛泽东认为：青年、特别是知识青年和工农群众相结合，青年运动和人民革命运动相结合，是青年成长、青年运动发展的方向和基本道路。

工农群众占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是社会发展的主力军。主要由工农群众参加的人民革命运动，一般都代表了历史发展的进步的潮流。青年虽然是社会力量中一支最积极最活跃的力量，但是他们不能脱离占人民群众绝大多数的工农群众，不能离开成年、老年人的帮助，否则将一事无成。青年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特别是知识青年和工农群众相结合，能够使他们更好地把握历史发展的正确方向，能够从中吸取思想和政治的营养，能够更充分发挥他们自己在革命和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同样，青年运动同人民革命运动相结合，是青年运动坚持正确方向和健康发展的唯一道路。

毛泽东早就说过：“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

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¹⁷⁾毛泽东这一科学论断，主要是针对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讲的，当然也适合于其他青年。毛泽东把青年是否和工农群众相结合当成识别其革命、不革命或者是反革命的唯一标准，这是因为：

（一）在中国革命知识分子中，“除去一部分接近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并为其服务而反对民众的知识分子以外，一般地是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大资产阶级的压迫，遭受着失业和失学的威胁。因此，他们有很大的革命性。”青年学生中有“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子女，但是除了少数例外，都是爱国的。”他们的家庭出身不能选择，但前途是可以选择的。但也要看到，“知识分子在其未和群众的革命斗争打成一片，在其未下决心为群众利益服务并与群众相结合的时候，往往带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他们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¹⁸⁾知识青年和工农群众相结合，能够在革命的实践中得到教育、改造和锻炼，能够在革命中发挥某种先锋作用。

（二）应该看到，“没有工农这个主力军，单靠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这支军队，要达到反帝反封建的胜利，是做不到的。所以全国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一定要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和他们变成一体，才能形成一支强有力的军队。”⁽¹⁹⁾

（三）工农群众需要知识青年向他们传播革命道理，传播科学文化知识；革命也需要知识青年“到工农群众中去，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因此，“青年们一定要知道，只有动员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才能战胜帝国主义，才能战胜封建主义。”⁽²⁰⁾

进步的青年运动历来是人民革命运动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现代历史上许多成功的青年运动，都是和人民革命运动一道发动和发展的。青年运动和人民革命运动相结合，不仅有助于保持青年运动的方向和人民革命运动的方向的一致性，而且能使青年运动在促进历史进步方面起着更大的作用。历史事实表明，青年运动凡是和人民革命运动结合得好的，都在人民革命运动中起了先导或者中坚的作用。毛泽东曾经赞扬“‘五四运动’准备了舆论，准备了干部，准备了思想和准备了人心，到后来才有1925—1927年的大革命”，赞扬“‘一二九’是推动‘七七’抗战，准备了‘七七’抗战”⁽²¹⁾，赞扬一二一运动推动了解放战争时期的人民民主运动的高涨。

历史发展到社会主义时期，尽管社会条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毛泽东关于青年学生和工农群众相结合、青年运动和人民革命运动相结合的思想，并没有过时。广大知识青年只有和工农群众相结合，才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有作为；青年运动只有同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运动相结合，才能蓬勃发展。

第五，关于青年、青年运动的团结和组织问题的论述。毛泽东认为：任何时候都要最大限度地把青年团结起来，通过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来团结教育青年一代。

青年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希望和未来，只有把青年团结起来，组织起来，无产阶级才能胜利完成历史赋予的任务。因此，在各个历史时期，都必须注意做好对青年的团结和组织工作。在我国，共产党主要通过青年团来做好对青年的团结教育工作，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把青年培养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后备队和接班人。

毛泽东认为，把青年团结起来，组织起来，是党争取和教育青年的一个

重要方面的工作。他的关于“要照顾青年的多数”的观点，是团结教育青年的重要观点。他说，我们要注意先进青年，但应把“重点放在多数，不要只看到少数”；不能只依靠少数先进青年，而脱离群众的大多数；只有团结更多的人，革命才有力量。因此，他主张在青年中搞“大圈子”，不能搞“小圈子”⁽²²⁾。他说，有些人认为“似乎人越少越好，圈子越紧缩得越小越好”，这是不对的。必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并且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这个伟大的事业服务。”⁽²³⁾

要团结教育青年，必须做好对青年的保护工作，确保他们健康成长。毛泽东认为，青年缺乏自我保护能力。1940年2月，他在自己起草的《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的通电中，鲜明地提出要“保护青年”。他揭露国民党反动统治阶级对青年的残害，反对他们对青年思想的压制和对青年精神与肉体的侮辱、奴役之暴举。新中国建立后，他根据国内外政治和思想意识形态斗争的形势，提出要注意国内外敌对势力对青年的争夺，警惕帝国主义“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²⁴⁾，要“保护我国第五代十代永远革命，永不变质。”⁽²⁵⁾

我们党团结教育青年的纽带，在青年中发挥团结教育核心作用的组织，就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五四运动后，在我们党创立的同时，为了团结教育青年一代，相继建立了青年团的组织。毛泽东一直十分重视青年团的工作。1920年他就在湖南创建了团的组织。他对团的性质、任务，团的建设方针、路线，团的工作的要求和方法等问题，都作过许多重要指示。他的关于青年团要成为团结全国青年的“核心”的论述；团的组织建设“要巩固地向前发展”的论述；团的工作既要围绕党的中心工作来进行，又要开展适合青年特点的独立活动的论述；注意照顾多数，先进青年要做好团结教育中间的、后进的青年的工作，密切先进青年和广大群众之间的联系；积极培养和大胆使用青年干部，强调团的干部是“流水”，而不是“死水”的论述等等，都是团的建设和团的工作发展的重要指导原则。

我国共青团一直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先进青年的群众性组织，是青年学习共产主义的学校，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现在中国共青团已有5600万团员，是世界上最大的青年政治团体。中国共青团如此兴旺发达，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和中国青年运动胜利发展的辉煌成果。

第六，关于青年、青年运动的领导问题的论述。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党是青年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国历史上革命的进步的青年运动及其光辉成就，都是在党的组织和领导下发生和取得的。如著名的一二九运动，就是在当时的中共北京临时工作委员会领导下，由东北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大学等高等院校和部分中学的党组织、党员组织和发起的。运动爆发后，为了将它引向深入，党又组织南下扩大宣传团和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等，走出北平，开展大规模的宣传活动，团结广大青年，促进抗日运动的发展。一二一运动也是这样，由于党的发动、组织和领导，运动从昆明发展到全国，参加者由学生扩展到社会各界，形成声势浩大的爱国主义运动。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青年运动最好的领导者、组织者和保护者。

毛泽东说：“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是通过共产党的领导来实现的。在一切部门中，都必须实行党委领导的制度。”⁽²⁶⁾1957年，毛泽东在接见团的三大代表强调党的领导时说：“中国共产党是全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

“保证中国共产党对青年运动的领导”，毛泽东认为，这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直接从事青年运动的同志要增强党的观念，应认识到：在无产阶级已经走上政治舞台的时代，中国革命的领导责任，就不得不落到中国共产党的肩上。在这种时候，如果没有或者违背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是一定要失败的。⁽²⁷⁾在思想上认识接受党的领导的绝对必要性，在行动上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任何时候，青年运动都必须和党领导的人民革命运动相结合，共青团的工作必须围绕党的中心工作来开展，这是青年工作和青年运动健康发展的保证。二是，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不放弃或者不放松自己对青年的教育和对青年运动的领导责任，把青年工作放在党的工作应有的位置上，给予经常的关心和指导。在加强党的领导时，还要注意照顾青年的特点，尊重青年工作应有的独立性。

毛泽东的青年观，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青年观的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深化和发展了马克思关于认识青年和正确对待青年、关于青年全面教育和青年成长等问题的论述，深化和发展了列宁关于青年的地位和作用、关于青年的教育和培养方法、关于青年组织和共青团建设等问题的论述。毛泽东关于青年的特点和成长规律的论述，关于青年运动是人民革命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论述，关于青年、青年运动的一般任务和特殊任务的论述，关于青年、特别是知识青年必须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论述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青年观的重大发展，是我国青年成长和青年运动发展的理论指南。

毛泽东主要在他的晚年，在教育青年、指导青年运动上有过失误。为了防止复辟资本主义，他强调在青年中进行防修反修、反对和平演变的教育，防止青年运动滑向修正主义道路。他的出发点是好的，也有战略意义。但是，由于“他对社会主义阶段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认识，他对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错误估计”，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剥削阶级已经消灭之后，还提出“阶级斗争是青年的一门主课”。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支持的红卫兵运动，同他历来指导青年运动的许多正确的原则是背道而驰的。红卫兵运动的历史教训，从反面证明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所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的青年观，是正确的，光彩夺目的。在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变的今天，认真学习、继承和发展毛泽东的青年观，对于我们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进一步搞好青年的培养教育，推进青年运动的更加蓬勃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注释

(21)毛泽东：《在延安青年纪念“一二九”大会上的演讲词》，1939年12月。

(15)《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25页，第1316页。

(11)(23)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

月 27 日。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1929 年 12 月。

毛泽东：《对北方青年的希望》，1937 年春。

毛泽东：《中山县新平乡第九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青年突击队》一文按语，1959 年 9—12 月。

(17)(18)(19)(20)《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2 卷，第 565 页，第 566 页，第 641—642 页，第 565—566 页。

毛泽东：接见青年团二大主席团时的指示，1953 年 6 月。

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1956 年 5 月 8 日。

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见我国留学生、实习生时的谈话》，1957 年 11 月 17 日。(12)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1958 年 1 月 31 日。(13)(16)(22)毛泽东：《青年团的工作要照顾青年的特点》，1953 年 6 月 30 日。

(14)《解放》杂志第十卷第 45 期，1938 年。

(24)(26)毛泽东：《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1964 年 7 月 14 日。(25)引自《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1964 年 7 月 7 日。

(27)《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183 页。

试论毛泽东关于中国妇女解放道路的思想

丁娟

毛泽东妇女思想是毛泽东思想宝库的重要和有机的组成部分。

值毛泽东诞辰 100 周年之际，我们从中国妇女解放道路的角度探讨毛泽东对中国妇女解放学说的贡献，以此缅怀毛泽东，并就现阶段妇女解放的道路进行探讨，期中国妇女解放事业的发展。

一

在人类发展史上，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思想，首先是由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提出来的。与此同时，资产阶级学者或女权主义者也从方方面面论及了妇女解放问题。

但是，与形形色色的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平均主义或者资产阶级以“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为前提的所谓平等意识彻底决裂，将平等观植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则是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的巨大贡献。在平等问题上，恩格斯曾指出：“无产阶级平等要求的实际内容都是消灭阶级的要求。任何超过这个范围的平等要求，都必须要流于荒谬。”这一方面对所谓抽象平等进行了阶级性界定，另一方面也指出了阶级解放或者平等是人类其他平等的基础。在论及阶级平等之后也即社会主义平等时，马克思曾谈到：“生产者的权利是和他们提供的劳动成比例的；平等就在于用同一的尺度——劳动——来计量。”如果说“阶级平等是对平等属性的质的界定，那么劳动平等无疑是关于平等的量的或程度的衡量标准。当然，这一标准仍然不可能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范围，它会因为劳动者体力与智力的不同、家庭负担的不同而导致其实际生活水平的不同。马克思将这种不平等定义为“形式上的平等掩盖之下的事实上的不平等”，并指出了实际平等将与共产主义社会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相适应。马克思主义妇女观认为，实现妇女解放的第一步 必须走与阶级解放相结合的道路；第二步 则必须走全方位参与社会劳动的道路。

19 世纪末期，资本主义列强用枪炮轰开中国的门户之后，中国便被强行纳入世界资本主义的原料市场。外国资本的入侵破坏了中国传统的“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模式，促进了资本主义关系的成长。在由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的过程中，新经济关系开始形成，大批农民包括农妇被抛入城市产业大军。随社会经济与阶层的变动，西方进步思想包括男女平等的思想也开始了“西学东渐”的过程。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政治家在探索中国出路的同时，也开始触及到妇女解放的道路问题。如康有为、梁启超曾提出以教育促男女平等，以实业求男女平等的主张；孙中山、蔡元培等人则从民权与女权的角度谈到了妇女解放问题，认为妇女要求解放，唯走与民权相结合的道路不可。在这一过程，难能可贵的是秋瑾女士提出了妇女解放必须结全体妇人的力量去打碎旧体制的思想。上述探索虽在促进妇女觉醒和社会进步方面起了一定的历史作用，但是，他们并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提出妇女解放道路的问题。

在中国妇女被启蒙和觉醒的过程中，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使中国民族资本赢得了喘息的时间，也使世界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其间俄国十月革命

的胜利，使中国看到了黎明的曙光。在这一过程，中国工人阶级队伍有了发展，女工数量迅猛发展。到 1919 年，女工占到轻工业职工总数的 44.7%。女工走出家门与先进生产力相结合，家庭妇女向现代产业大军转化，致使原来潜伏在家庭内的妇女问题社会化，从而促成了妇女解放条件的发育。

1915 年，以《新青年》创刊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爆发。这一运动有力地评击了封建的宗法观与旧礼教。其中，对封建妇女观的批判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侧面。到中国五四运动爆发前夕，新文化运动已沐浴到十月革命的阳光，并与政治运动相结合。而 1919 年爆发的旨在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则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包括妇女解放实践的结合。

毛泽东妇女思想正是此背景下开始形成的。毛泽东最早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和男女平等思想，正是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五四”时期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妇女研究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从中国国情出发，以求平等之实现。立足实际，以唤起民众，唤起妇女为起点求社会与妇女之解放，是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早期妇女思想的特点。毛泽东早在《女子自立问题》一文中就指出，造成男女“政治、法律、教育、以及职业、交际、娱乐、名分”差别的原因，在于“社会罪恶”，因此，妇女解放要从社会入手，从教育入手，但最重要的乃是求经济自立。李大钊认为，经济利益的不同，使妇女运动被划分为无产阶级妇女运动和资产阶级妇女运动两大流派，无产阶级妇女解放首先要合无产者妇人的力量，去打破有产阶级专断的社会制度。陈独秀认为，女工受剥削是全中国的劳动问题，对妇女问题的解决，离不开社会主义。李达则认为，历史上女权衰落的根本原因是财产的私人占有制度，因此妇女解放不能走所谓“教育救国”或“开放女学”的道路，而必须和劳动界男女结合，对抗资本家。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将妇女解放纳入中国解放的系统工程之中，已经是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的自觉追求，并且这种追求已与中国国情以及妇女状况相结合。这无疑是中国共产党人从实际出发，研究男女平等道路的起点。当然，这时的研究还难免摆脱历史的局限，比如只是抽象地谈论妇女的解放或局限于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道路的书面理解。

第二，以“婚姻自由”为突破口，具有鲜明的反封建特点。“五四”时期，反封建特别是反对封建婚姻的斗争扣人心弦。其间，瑞典妇女理论家爱伦·凯的《恋爱与婚姻》被翻译过来，在中国引起巨大反响，使一代青年觉悟到恋爱自由乃是个性解放的前提，“没有恋爱的结婚是没有道德和堕落地格的。”1919 年 11 月，长沙青年女子赵五贞被父母强迫出嫁，反抗无效，在迎亲花轿中用剃头刀割破喉管自杀。此事引起巨大社会反响，长沙《大公报》为此先后发表了 20 多篇文章，毛泽东在 12 天中连续发表 9 篇文章，指出婚姻问题是个社会问题，赵五贞的死根源于社会，并号召人们向吃人的旧社会发动进攻。

以反封建婚姻作为反封建的突破口，是一种历史的选择。婚姻是最原始的两性关系，因此论及婚姻必然论及妇女，婚姻自由必然与男女平等相对应。此外，中国的封建家庭是社会结构的基础，也是内涵极深的封建堡垒。因此无产者求社会解放，必须首先冲破家庭的桎梏。

第三，强调经济独立和开放女子教育对于妇女解放的特殊作用。1920 年 11 月 25 日，毛泽东曾致信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向警予，“湘省女子教育绝少进步(男子教育亦然)，希望你能引起大批女同志外出”，以提高国民的素质。

教育的平等，为妇女职业的发展注入了强心剂。李达曾在《女子解放论》中提出女子也是人，当为生产者。认为这不仅是社会必须的经济要素，也是左右个人的重要问题。可见，抓经济独立，无异于抓住了妇女解放的基础；而抓教育则无异于抓住了解放主体的素质，此乃男女平等的百年大计。

第四，强调女界联合，主张建立专门的妇女组织。在中国共产党内毛泽东是较早注意到革命必须唤起民众和建立相应组织者。1919年，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指出：“要进行革命的活动，改造社会，不是少数人所能做到的，非有多数人的联合不可……妇女也要联合起来，齐向封建思想斗争”。强调了妇女要求平等，社会要求解放则非走联合的道路不可。在“五四”时期，妇女组织、妇女报刊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发挥了妇女运动火车头的作用，对唤起妇女的觉醒，提高妇女的觉悟，引导社会对妇女解放事业的关注作出了巨大贡献。至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后，党领导下的妇女组织进一步茁壮成长，对于促进中国革命的发展和妇女的解放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二

本世纪20年代，随着中国社会阶级与阶层分化的完成，中国妇女运动也分成资产阶级女权运动和无产阶级妇女解放运动两大流派。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后，无产阶级妇女运动便与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相融合，并在实践领域展开了寻求解放的斗争。在妇女界，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党的领导人向警予认为，中国妇女解放的必由之路是仿效俄罗斯，参加打倒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的国民革命。她认为，劳动妇女是妇女中绝大多数，生活最苦，所以求解放最迫切，她们是“妇女解放的先锋”、“反抗外国掠夺者的国民革命之前卫”、“妇女解放与阶级解放是天造地设的伴侣”。她的这些观点无疑使马克思的妇女解放学说形象化和具体化，对中国无产阶级妇女的觉醒起了巨大的推进作用。

但是，鉴于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对革命主体力量和革命道路的分析尚未成熟，对中国国情的了解也不够透彻，因此，曾一度强调“城市暴动”，忽略了农民革命问题。这一思想也反映在妇女解放领域，形成了在妇女解放道路选择上的误区。即借口“以女工为主体”，而将广大农村妇女排除在主体力量之外。为了打破妇女解放乃至整个中国革命的徘徊状态，党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其中，毛泽东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而使几经窒息的中国革命和妇女发展柳暗花明，绝处逢生。

毛泽东认为，中国是一个封建历史悠久、根深蒂固的国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特别是民族资本薄弱，城市仍是封建统治的中心；而工人阶级本身也不够强大，在政治上尚有待进一步成熟和发展。因此，中国革命必须走“以农村包围城市”和“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而中国的妇女，也只能在上述前提下选择寻求解放的道路。毛泽东对妇女解放与阶级解放接轨点的分析，一方面是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捍卫和继承；另一方面是基于对中国国情和妇女存在方式的透彻分析与把握，其思想脉络，主要体现在毛泽东的科学著作中。

毛泽东妇女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有一相通之处，这便是在分析整个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同时，把握和分析妇女问题，从而在战略上将妇女解放与

阶级的解放相结合和共决策。如果说《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是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形成的标志，那么，《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发表，则无疑是毛泽东妇女思想形成的开端。

毛泽东是中国革命史上较早将视野投向农村的先行者。1925年12月，毛泽东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解决了革命的敌友问题。1927年又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对农民运动的系统考察中，毛泽东阐述了中国的妇女问题，从七个方面对妇女问题进行了系统分析，并初步提出了中国妇女寻求解放的切实可行的道路。

第一，毛泽东将中国妇女所受的压迫形象地概括为政权、族权、神权和夫权。指出，封建“四权”是束缚中国人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绳索，其中，夫权压迫是妇女较男子更多承受的一重束缚，“男子支配”是妇女所受压迫的特殊性之所在。

第二，妇女是分层或分阶级的，而夫权压迫自在在贫农中就比较地弱一点。这是因为经济上贫农妇女不得不较富有阶级的女子更多参加劳动，所以她们取得的对于家事的发言权以至决定权就比较多一些。

第三，工业化的产生和资本主义关系的入侵，使中国“农村经济益发破产，男子控制女子的基本条件，业已破坏了”。因此，这就为社会寻求男女关系的变革奠定物质基础或可能性。

第四，在阶级利益与妇女利益的比较中，妇女利益要暂时服从阶级利益，农民对政治权力的进攻比起对“家族神道男女关系”的进攻，是更高的利益体现。

第五，妇女解放是自己的事情，也是全体农民的事情。“菩萨要农民自己去丢，烈女祠节孝坊要农民自己去摧毁，别人代庖是不对的。”

第六，妇女解放必须走组织起来的道路，“最近农民运动一起，许多地方，妇女跟着组织了乡村女界联合会，妇女抬头的机会一到，夫权便一天一天地动摇起来。”

第七，经济斗争（土地革命）是推翻封建政权、族权和夫权的基础。但革命顺序是先进行政治斗争，“期于彻底推翻地主权力。并随即开展经济斗争，期于根本解决贫农的土地及其经济问题。至于家族主义，迷信观念和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之破坏，仍是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胜利以后自然而然的结果。”

这是毛泽东早期著作中，关于妇女思想的比较集中和系统的阐述。从一定角度，可以说是毛泽东妇女思想形成的标志。这些思想在日后的实践中进一步发展，成为毛泽东妇女思想体系的基础。

在上述思想中，毛泽东关于夫权压迫与劳动妇女较富家女子更有发言权的认识，比马克思更具体地阐明了妇女受压迫与男女不平等成因的多重性。也就是说，毛泽东已经明确认识到，妇女受压迫不仅是私有制产生的结果，而且也与妇女在社会生产中的作用有着不可忽视的联系，这一分析可以说是选择中国妇女解放道路的基点。如果说，对私有制认识促成了妇女解放与阶级解放一体化的进程，那末，对妇女在生产中作用与其社会地位关系的认识，则成为中国妇女解放长期与生产实践相结合的基础。

同样，上述思想中，毛泽东对不同阶层妇女的分析，也使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更加具体化，更加符合中国国情。可以说，将农村妇女视为阶级革命与妇女解放的主体，是毛泽东在革命主体问题上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大发展。在马克思时代，国际共产主义曾认为从某种角度上讲，对于社会主义革

命而言，农民是一股消极力量；列宁在俄国革命中对此问题有所修正，提出了农民是革命的可依赖(利用)的力量。但二月革命时俄国社会党提出的口号仍是建立工兵政权。毛泽东在农民问题上无疑彻底地前进了一步，进而提出了苏维埃建设以工农兵为基础的思想，这便在主体高度上将农民视之为革命的主要力量。

在分析了中国的国情与妇女解放主体状况之后，毛泽东将劳动妇女求解放的道路具体化为斗争中求解放，生产中求平等。

斗争中求解放，体现了妇女解放与阶级解放的结合。促成这一结合的根本原因，其一在于在两个压迫即阶级压迫与性别压迫问题上，私有制是同一的根源；其二在于在两个解放即阶级解放与妇女解放的目标方面，废除私有制是同一的目标。这是马克思早已分析过的基本原理。具体到中国，妇女解放与阶级解放的结合，便从两个方面表现出来，一是与阶级斗争的结合，二是与民族解放事业的结合。而这两个结合，在中国革命史上所表现出的特色之一，则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与革命战争的结合。与革命战争相结合的方式，是由中国社会的殖民地属性与封建属性决定的。中国社会的这双重属性决定了革命的性质必然是水火不容的。一方面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的广大劳动人民与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对立；另一方面是人民大众与帝国主义的对立。在这两重矛盾中，任何一重都不可妥协或调和，而只能用暴力的方式寻求解决，这便决定了中国妇女运动长期与革命战争相结合的特点。1939年10月4日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战争。……我们党已经能够把武装斗争这个主要斗争形式同其他许多的必要的斗争形式直接或间接地配合起来，就是说，把武装斗争同工人的斗争，同农民的斗争(这是主要的)，同青年的、妇女的、一切人民的斗争，同政权的斗争，同经济战线上的斗争，锄奸战线上的斗争，思想战线上的斗争，等等斗争形式，在全国范围内或者直接或者间接地配合起来。”毛泽东认为，革命事业必须与妇女运动结合，否则便没有革命的成功。因为“妇女占人口半数，劳动妇女在经济上的地位和她们特别受压迫的状况，不但证明妇女对革命的迫切需要，而且是决定革命胜利的一个力量。”1940年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妇女的力量是伟大的。我们现在打日本，要妇女参加，生产要妇女参加，世界上什么事情，没有妇女参加就不成功。”毛泽东高度评价“妇女解放，突起异军，两万万众，奋发为雄。男女并驾，如日方东，以此制敌，何敌不倾，到之之法，艰苦奋斗，世无难事，有志竟成。”毛泽东还指出：“全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中国革命胜利之日。”毛泽东认为妇女也只有在与革命的结合中，才能得到自身解放。他说：“劳动妇女的解放，与整个阶级的胜利是分不开的，只有阶级的胜利，妇女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毛泽东在对中国国情进行深刻分析的基础上，透彻分析了中国妇女的状况及其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揭示了革命战争需要妇女，妇女解放需要革命战争的真理。

关于生产中求平等，实际上讲的是关于妇女全面参与社会问题。就妇女解放的主体而言，中国妇女与西方妇女的不同之一，在于西方妇女是在完成了由封建家庭向产业工人的转化之后，也就是在实现了与近代大工业的结合之后，才走向求平等的道路的。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妇女的大多数，仍生活在闭塞的农村，置身家庭四壁，为汪洋大海般的小农经济所包围。因此，对中国妇女来讲，实现由国家奴隶向生产主人的转化，乃是男女平等

的客观要求。因此，引导妇女走出家门，实现妇女与社会生产资料的结合，便成为妇女解放的必由之路。因为妇女的孤陋寡闻、素质低下、意志薄弱，无不与其长期脱离社会性生产劳动相关。而妇女视野的开拓、革命精神的培养、斗争觉悟的提高，都直接地发源于社会生产实践。同样道理，共产主义革命的目标最终也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因此，发动妇女投身生产斗争与发动妇女参与革命战争一样，都是为了调动占人口半数的妇女的力量，提高妇女的素质，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实现男女的平等。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发动妇女参加生产，在生产中求平等，首先是围绕解放区的经济工作展开的。1940年2月8日，毛泽东在给《中央妇委的指示信》中谈到：“妇女的伟大作用第一在经济方面，没有她们，生产就不能进行”。毛泽东高瞻远瞩地看到，妇女不仅是中国革命的主体力量，而且是一支不可忽视的社会生产力量。同时毛泽东还认为妇女也只有通过对社会首先是经济的全方位参与，才能向社会展示自己的力量和价值。毛泽东关于发动妇女参与生产的指示，在历史上也是针对性地提出来的。40年代初，王明主持妇委工作期间，妇女工作一度存在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倾向，严重地脱离了群众。如在苏区剪发、放足运动中就犯了一刀切的错误，伤害了部分群众的感情，还使一些妇女干部在日伪军扫荡中遭到不应有的损失。此外，在宣传婚姻自由，鼓励妇女向封建势力作斗争的过程中，也采取了过于激烈的手段，如在大会上批斗打骂妻子的丈夫，给虐待儿媳的婆婆带高帽子游街等。这些工作方法的失策，一度超越了社会心理的承受力，造成妇女工作与众关系的紧张甚至家庭矛盾的增多，也由此一度引起妇女工作者的困惑。起初，对于毛泽东的指示，王明主持下的中央妇委并不理解。直到后来(1942年)陕甘宁边区妇联据此到延安南区蹲点调查，发现妇女参加生产不仅增加了收入，而且开阔了视野，使精神压抑的妇女振作起来，扬眉吐气，家庭地位提高，学文化热忱提高，她们才终于体会到，抓妇女运动与生产实践的结合，才是抓住了妇女解放的命脉。在此基础上，中央妇委向中央起草了《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的方针的决定》，1943年2月，毛泽东亲自审改了这份《决定》稿，后在2月26日的《解放日报》发表。这便是著名的“四三”决定。这一《决定》，从战略上高度评价了妇女参与生产劳动的重要性，要求妇女干部“必须学会农村经济知识，了解妇女生产内容。”⁽¹¹⁾

在斗争中求解放，在生产中求平等，是经过历史检验的中国妇女求解放的道路或中国妇女解放的一大特色。中国妇女正是在与战争和生产的结合中找到了自身的发展方位，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一步一个脚印，走向解放的。

1949年9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主持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部具有代宪意义的纲领，提出妇女的解放必须将私有制与夫权制同时打碎，并确认中国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教育的，家庭的，社会的生活各个方面，均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到新中国成立，中国的劳动妇女首先获得了新生，中国妇女终于被从四条绳索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和人民共和国的主人。中国妇女解放的第一步即废除私有制，实现法律上的平等便获得实现，而中国的妇女解放道路也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

新中国成立之后，妇女同男子一样站立起来，旧的以歧视妇女和男女不平等为标志的封建立法被废除，广大妇女在政治上赢得了新生。在这种情况下，妇女运动曾流露出妇女已经彻底解放，男女已经完全平等的认识。为此有关方面曾就中国妇女解放的程度问题进行了专题讨论，认为制度解放尚是初步解放或解放的第一步⁽¹²⁾。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中国妇女运动提出了继续前进，以彻底解放妇女的口号。

社会主义时期妇女解放的道路将如何走？毛泽东于 1955 年指出：“真正的男女平等只有在整个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才能实现。”⁽¹³⁾明确指明了社会主义时期妇女运动必须继续走与社会主义革命相结合的道路。

妇女运动之所以要与社会主义革命相结合，在于这一革命在夺取政权之后继之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将完成社会生产资料由私有向公有的转化，以及由男性占有向男女共同占有的转化。促成这一转化，就等于从根本上或基础上动摇了男女不平等的大厦。这就是说，社会主义改造或革命的完成，将在理论上为新的男女平等提供制度保障。但是，毛泽东认为，仅此尚不够，要求得事实上的男女平等，还“要发动妇女参加劳动”；继续走与生产相结合的道路。这是因为，社会主义革命只是从制度上解决了财产占有方面的男女不平等，而妇女对于生产资料的支配权与使用权的获得则是占有权的另外两个方面，只有发动妇女投身社会主义建设，妇女才能切实掌握对于生产资料的支配权与使用权。毛泽东还认为：“中国的妇女是一种伟大的人力资源。必须挖掘这种资源，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¹⁴⁾从此角度，也可以说毛泽东已认识到，妇女参加社会生产，是在为自身生产着日益平等的物质基础。因为妇女解放不能一步到位，而只有“当阶级社会不存在了，笨重的劳动都自动化了，才能真正实现男女平等。”⁽¹⁵⁾反之，如果妇女脱离了生产劳动，则会减缓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从而也影响妇女自身的发展。

鉴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剥削阶级作为一个完整阶级已消亡，因此，妇女解放与社会发展的结合便日趋向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倾斜。同时，随着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第三产业比重的提高，妇女参与的范围也势必日趋拓展。在这种情况下，妇女运动便由发动妇女走出家门，求劳动数量之广逐渐向提高妇女素质和就业质量的方向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提出了要努力提高妇女素质问题，认为“没有扫除文盲，没有进小学、中学、大学，妇女还不可能彻底解放。”⁽¹⁶⁾在毛泽东妇女思想的鼓舞下，50 年代我国妇女运动曾出现了脱盲热，妇女识字班、夜校直至夜大学比比皆是，层出不穷。为鼓励妇女提高社会参与层次，毛泽东还鼓励妇女：“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事，女同志也能办得到。”⁽¹⁷⁾

毛泽东在分析妇女发展状况时，还特别关注妇女的政治参与问题。1956 年 10 月，毛泽东在和南斯拉夫妇女代表团谈话时曾指出“在中国，参加政府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工作的妇女毕竟是少数……我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女同志占 17%。在北京、上海、天津三个中央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中女同志占 20%。他认为提高妇女政治地位，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他提出“将来女同志的比例至少要和男同志一样，各占 50%。如果女同志的比例超过了男同志，也没有坏处。”在毛泽东以及党和政府的关怀下，中国妇女运动曾实现了 50 年代县县都有女县长，乡乡都有女乡长的发展目标，促成了 50 年代妇女政治参与的高潮。妇女参与之深之广都使西方妇女羡慕。事实再一次雄辩

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解放妇女，妇女只有在对社会的广泛参与中才能求得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妇女运动获得新的发展。但是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原有妇女发展模式也受到多方的冲击。这些冲击包括与人口危机相伴生的妇女就业危机；妇女就业保护与企业效益的冲突；国家保护妇女政策与企业家自主权的冲突；对女干部的比例保护与公民民主权的冲突等等。直至一些歧视、残害、虐待妇女的现象死灰复燃，如溺弃女婴、虐待生女孩的母亲，拐卖女性人口等等。于是，社会上一些人一度对毛泽东关于妇女问题的某些论述提出疑问，如说，“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是将女性男性化；女人要先做女人，而后再做人等等。持此观点的同志恰恰忽略了妇女运动几百年，其功绩正在于将女人由自然的、奴性的“第二性”——女人，变成了人——大写的人，将人的关系，还给了女人自己。至于女性的男性化，或男性的女性化倾向，也应具体分析，我国传统中医尚认为阴、阳只是相对的，实际上是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具体到两性的性别，⁽¹⁸⁾科学已认为性别(非性)是历史的范畴，而个性才是永恒的范畴。因此，不能借口“性别”而忽视人的个性发展自由。关于男女的价值，就其社会属性，本不应有优劣之分，就其自然(体力)属性，科学也正在研究。有人认为，虑及女性的寿命长于男性(我国是3岁，西方达7—8岁)，韧力大于男性，所以综合而言，男女的体力差别并无想象之大。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院曾就男女体力差别搞了一项研究，其研究报告指出：在过去的100年内，女运动员在运动场上正奋起直追，预计到1998年，她们将迎头赶上男选手。主持这项研究的生理学教授伯瑞·魏伯认为：“若保持现今的速度，6年内女选手便可望击败男选手。”他还指出，以200米、400米、800米、1500米为例，距离越长的赛跑，女性越易超过男性，原因在于女选手耐久力，抗疲劳能力比男选手强。如果将男女体力差别问题渗入职业，妇女保护的度，也还是尚待研究的新垦区。我们认为毛泽东的时代观与男女观，并非从生理上抹杀男女差别，(恰恰相反，他主张机械化现代化可抹平这种差异影响)其原意是从社会角度鼓励妇女的自信与进取心。其历史功德已为实践所证明。

还有的人认为强调妇女就业，是无视生产力的制约作用，主张用“妇女回家”或“阶段就业”的办法，求解决社会就业问题以及启动企业活力。这种观点也是站不住脚的。就生产力而言，它有客体与主体之分。因此生产力一方面是财富的积累(工具)，另一方面是生产者素质的增长。因此，发展生产力只有一条，即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所以社会主义时期发展生产力的关键不是使妇女劳动力退回家庭，而要靠发展社会生产，拓宽就业面的方式，解决就业问题。反之，用牺牲妇女的方式，不仅不会有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会因着对妇女的排斥从根本上扼杀生产力的发展。当然，妇女离开了与生产的结合，无异于脱离了实践的刺激，最终会蜕化为自然形态的人，为社会所抛弃。而社会背上一半落后女性的包袱，显然也无法启动发展活力。历史上，将妇女从家庭引向社会并非男性恩赐，恰恰是生产力(大工业)的强制作用，而今天让妇女回归，则是部分人的主观臆想。因此，妇女就业的大方向是对的，至于职业妇女身上与改革不适应的部分(男职工亦然)，也只能在参与中化解，这个新的机制便是市场经济，是竞争意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妇女运动继续以毛泽东妇女解放的思想为指导，发动妇女积极投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在推动社会发展的

同时，争取妇女自身的进一步解放。以江泽民为首的党中央积极支持妇女参与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1990年3月7日，江泽民在“三八”国际妇女节80周年纪念大会上，就“全党全社会都要树立马克思主义妇女观”问题发表了讲话，重申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关于妇女解放的原理，提出要“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为广大妇女参加社会生产、参政议政、接受教育、实现婚姻自由等等，不断创造良好的条件。”从而进一步明确了新时期妇女解放与改革相结合，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相结合的新思路。

党的十四大之后，中国经济已向市场经济的轨道启动。在经济转轨的过程中，社会利益的调整包括男女利益的磨擦将在所难免。这就需要我们继续运用毛泽东妇女思想这一理论武器，深入分析中国妇女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和新问题，推动中国妇女沿着毛泽东已经揭示出的妇女解放的道路，继续在改革中奋起，在参与中发展。我们相信，随中国经济的转轨，男女平等也一定会向更高层次发展。而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妇女思想将仍然是中国妇女发展的启航灯，并且它也将新的社会条件下不断丰富与发展。

(作者单位：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注释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46页，第11页。

指制度解放，标志是废除私有制，实现法律上的男女平等。

指由制度解放向实际平等(真正平等)的过渡，也称彻底解放。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09页。

(13)(14)(15)(16)(17)《毛泽东主席论妇女》第4页，第9页，第7页，第8页，第4页，第15页，第16页，第17页，第18页，第18页。

《中国妇女运动重要文献》第2页。

(12)其标志是废除私有制。

(18)性是自然存在，性别则特指男女的社会差别，它是后天形成的，因此也称“第二性”。

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建党思想

赵宗甬

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建党思想，是加强我们党的建设中的一个重大问题，也是马列主义政党建设史上的一个重大问题。在纪念毛泽东诞辰 100 周年之际，我想就此谈些个人看法。

一、毛泽东建党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立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思想的内涵是极其丰富的，毛泽东建党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 毛泽东建党思想的主要内容。毛泽东建党思想，是关于中国共产党产生、发展和自身建设规律的科学，是关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领导地位和如何实现正确领导的科学。毛泽东建党思想是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其内容极为深刻丰富。毛泽东关于党的建设的科学著作是这一理论体系的基石。

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在无产阶级人数很少而战斗力很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建设一个具有广大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是极其艰巨的任务。在毛泽东建党思想的指引下，我们党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党由小到大从弱到强的成长壮大过程，也就是毛泽东建党思想的成熟和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科学地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经验，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工人阶级政党的性质、纲领、指导思想、根本宗旨和组织原则的普遍原理，同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正确结合起来，提出一系列正确的建党原理和原则，诸如要以马列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坚持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和巩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密切联系党的政治路线和政治任务建设党；把党的思想建设放在首位；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以群众路线作为党的根本工作路线，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和集体领导制度；充分发挥广大党员的积极性和保持全党步调一致，保持党的严格的组织纪律性，反对党内的派别活动，维护党的团结统一；高度重视党的领导班子建设和革命接班人的培养，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和德才兼备的干部标准；高度重视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正确处理党内矛盾，强调党内斗争要执行“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正确方针，达到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目的，创造了在全党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的整风形式；依靠本国革命力量和人民群众的努力，把本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搞好，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建国前夕和建国以后，鉴于我们党成为领导全国政权的党，毛泽东多次提出要继续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作风，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反对和平演变等等。这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建党原则，为中国共产党的巩固和发展，

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从胜利走向胜利，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毛泽东的建党思想在毛泽东一系列著作中都有体现，有代表性的就有《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反对自由主义》、《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共产党人>发刊词》、《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论联合政府》、《关于健全党委制》、《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常委会的工作方法》、《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诸多著作。

2.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为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一方面，他们在党的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上作出了自己的理论贡献。如周恩来的《坚决肃清党内一切非无产阶级意识》、《托洛茨基反对派在中国发生的原因及其前途》、《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加强调查研究》、《说真话，鼓真劲，办实事，收实效》、《过好“五关”》；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做一个好的党员，建设一个好的党》、《论党内斗争》、《保持党的正确领导》；朱德的《加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邓小平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1956年9月)》、《马列主义要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执政党的干部问题》、《建设一个成熟的有战斗力的党》、《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陈云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健全党内生活》、《怎样使我们的认识更正确些》、《执政党的党内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等。这些论著，从不同方面丰富了毛泽东建党思想。同时，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还模范地实践着党的纲领、路线、宗旨、作风，用实际行动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建党思想，为全党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的率领下，我们党对毛泽东建党思想做了重要发展。新时期党的建设，是在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和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下进行的。怎样才能使党的建设符合新时期的需要，怎样才能使党能够担负起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责任，是党所面临的历史性的重大课题。邓小平以其开辟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巨大政治勇气和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巨大理论勇气，率领全党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努力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提出并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坚持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系统地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大国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等方面，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出了重大发展，成为指导党的各项工作的理论基础。邓小平对毛泽东建党思想，作出的贡献也是多方面的。比如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工作中心是经济建设；以党的领导为核心的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改革开放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党应该成为领导全国人民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前进的坚强核心，党的执政地位和领导作用不能削弱，同时也要适应形势的发展，加强党的建设和改善党的领导；越是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越要加强党的建设，越要用马克思主义教育全党，保持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在任何情况

下都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高决策的民主性和科学性，同时全党在政治上思想上必须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巩固党的团结统一；党要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又要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要从严治党，坚持不懈地反对腐败，加强党内建设和廉政建设，要按照“四化”方针，坚持德才兼备原则，进行党的干部队伍建设，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在执政条件下，更要注重健全和完善党的各项制度，党的制度建设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一系列理论观点，是我们党在新形势下加强自身建设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毛泽东建党思想在新时期的具体体现。

二、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建党思想的现实意义

在加快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建党思想，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1. 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建党思想是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改善党的领导的需要。邓小平 1965 年就讲过：“毛泽东同志确立的一套建党思想，在我们看来，对列宁的建党原则有很大的发展。好的党风要继承下来，要由接班人传下来。我们特别注意宣传毛泽东思想，使它在群众中扎根。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的问题，这不仅是我们这一代的问题，也是下一代、再下一代的问题。一个国家的革命，核心问题是党。有了一个好党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革命胜利后，搞社会主义也要靠一个好党，否则胜利就靠不住。”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小平在讲到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时，又一次谈到毛泽东的建党学说问题。他说，“在这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讲得不多，列宁有个完整的建党的学说。正是因为列宁建立了那么一个好的党，才能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把列宁的建党学说发展得最完备的是毛泽东同志。……他的完整的建党学说，是经过实践在延安整风时期建立起来的。毛泽东同志对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党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党的作风是什么，都有完整的一套。正是因为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整风中建立了完整的建党学说，并且用这个学说来教育我们全党全军和人民，使我们建立了这么一个好的党，所以才取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建国以后，党内生气勃勃生动活泼。毛泽东同志的建党学说以后又有新的发展。”

的确，毛泽东建党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的正确性已经为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几十年的革命实践所证明，它是全党团结、统一的基础，是指导党行动的旗帜。总之，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建党思想，对于搞好我们党的建设，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们应当象邓小平所指出的那样，把毛泽东建党思想一代一代地坚持和发展下去。

2. 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建党思想，是排除右的和“左”的错误思想的干扰，切实抓好党的建设的需要。前些年，国际上机会主义思潮和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曾使党的建设面对着严峻挑战。一些人利用党的历史上某些早已经被我们自己纠正了的失误，如以夸大歪曲，从而把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光辉历程歪曲为“‘左’祸”连绵、“左”灾不断的黑暗时代，煽动人们对党不信任，对社会主义前途丧失信心，公然否定党的领导，危害是严重的，对这种错误的东西我们进行过严肃的斗争，今后仍需警惕。在要不要加强党的建设，如何加强党的建设问题上，我们的同志

中间也存在一些模糊认识。诸如一些同志讲，“既然现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怎么还抓党建”；“经济建设上去了，就什么都有了”；“企业是经济组织，党是政治组织，企业里要党组织干什么”。有的同志把党的工作，基层党组织建设要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理解为放下党的建设，单纯直接抓经济，跑项目。还有的同志提出党的领导是需要的，但党只须提出纲领，有领导权就行了，不需要基层党组织。这些说法和做法都是十分错误的。无论是同否定党的错误思潮进行斗争，还是纠正那些糊涂认识，都需要我们进一步认真学习和领会毛泽东建党思想，从思想上理论上武装自己；只有这样，才能排除各种干扰，在毛泽东建党思想的指导下切实抓好党的建设，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建党思想。

3.党所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建党思想。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不仅发展速度要赶上发达国家，而且要尽快使生产力发展水平赶上中等发达国家。总结社会主义建设四十年之经验，发展必须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以阶级斗争为纲不行，搞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不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利于培养人的竞争意识、效率观念、效益观念、创造精神，也促进精神文明建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不妨碍我们加强党的建设，而且为党的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促使党建工作进一步改进方式方法，创造新的经验。比如在用人问题上既坚持德才兼备原则，又注重实绩，推动干部能上能下，清除“上荣下辱”的陈旧观念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会给党建工作带来积极影响，这是主要的。当然，也会带来消极的东西，如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利己主义等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会侵蚀党的肌体，滋生形形色色的消极腐败现象。我们务必保持警惕、并准备作坚决而持久的斗争。怎样既能驾驭市场经济发展，又不被市场经济带来消极影响所淹没，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不断加强党的建设，邓小平著作中多次强调这个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几次讲到这样的话：“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是否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是个要害”，在1989年同中央领导同志讲话中，邓小平甚至讲到“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而毛泽东建党思想就是指导我们胜利前进的法宝。

三、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建党思想

按照党的十四大加强党的建设的要求，我想应当着重解决好两个问题：

1.坚持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基本原则不动摇。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基本原则，如坚持党的领导问题，党的性质问题，党的最终目标问题，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问题，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问题，坚持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问题，围绕党的政治路线和政治任务加强党的建设问题，加强党的基层组织问题，党的三大作风问题，等等。这些经过实践检验的正确原则，在任何环境、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丢掉，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下去。

这里有两点我想强调一下：

一是关于加强党的基层组织问题。毛泽东在总结军队建设的经验时认为，“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

今天的中心任务是进行经济建设，是不是就可以不要基层组织了？当然不是。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建设工作的基础，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没有基层党组织，就会把党的领导架空。前不久大邱庄发生的事件，很值得我们深思。那个村的党支部完全丧失了战争堡垒作用，成为某些人实行封建专制统治工具。如果那个村的党组织能坚持党的原则，事情会不会发展到那种严重地步？这个事件也告诉我们，不仅要建立基层党组织，而且要按照《党章》规定的基层党组织的八项任务去做，真正发挥作用。我们必须建立起遍布广大农村、工厂、机关、连队、街道及各种事业单位的符合党章要求的党的基层组织，或者说凡是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地方就应该有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并在条件具备时建立党组织，在外商投资的企业中条件具备时也应该建立党组织。那里的党组织要在这些企业里的中国员工中起政治核心作用，教育中国员工努力工作，团结外方，履行合同，办好企业，维护中外双方的合法权益。有人说，经济组织里的行政领导也可以贯彻党的意图。是的，行政领导能够也应该贯彻党的意图，许多行政领导也是这样做的。但是，行政领导毕竟不能代替党组织的作用。

二是加强思想上建党。首先要抓好理论学习。搞市场经济，我们必须努力学习市场经济知识。毛泽东曾要求我们努力使自己成为经济工作的内行，号召我们“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这方面我们做得还很不够，要好好地学习。但是，目前在一些同志中间存在的淡化政治理论学习的倾向，应该引起注意。坚定的信念来自真理的力量。要想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必须以牢固的理论作基础。有人说，现在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要共产主义信念干什么。我们现在确实是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也只能办这个阶段能办的事，但为什么又要强调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呢？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是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在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指导下制定出来的。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说过，“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共产主义去指导是决不能成功的，更不必说革命的后一阶段了。”而我们目前正处在民主革命胜利以后的阶段，我们要忠实地执行现阶段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还要有远大理想指引航程，否则，就会迷失方向。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来自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真学习，要真正做到向毛泽东当年要求的“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联系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忠于马克思主义是每个共产党员都能够也应该做到的，这就要求我们不断提高理论学习的自觉性。

其次，强调思想上入党。共产党员要时时刻刻坚持党性原则，努力按照党章规定的党员八项义务和权利去做。有人认为发展市场经济，按价值规律办事，讲等价交换就行了，何必谈党性。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共产党不讲党性，就不成其为共产党了。这个问题，正是党建中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即如何既要发展市场经济，又要强调党性，或者说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怎么更好地坚持党性原则。我认为有四点必须引起重视，第一，坚持党性，集中表现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各项工作都要服从和服务于党的基本路线，要为贯彻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做出实绩。第二，要处理好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之间的关系，不损害群众利益，不以权谋私。不能因为发展经济了，就可以同错误的东西同流合污，更不能把等价交换原则引入党内政治生活，搞人格商品化。在生活水平反差较大的情况下，更要坚持革命的操守。第三，发扬无私奉献的精神。现在，有人把无私奉献精神看作是荒谬的，可笑的。这是极其错误的。党员可以有自己的个人利益，党

的组织也要关心党员的个人利益，有条件的也完全可以把自己的生活搞得好一点，但是生活来源只能通过合法的渠道获得。所谓无私奉献的，就是要以个人利益服从国家、集体利益，当国家、集体需要的时候毫不犹豫地牺牲个人利益直到个人生命。事实上，千百万共产党人正是这样做了的。今天，我们面临的环境与工作条件与过去相比有很大的不同，但是我们还会经常遇到党和人民的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矛盾，如职务上的进退，物质利益上的得失，这样的考验还是很多的。这就要求发扬无私奉献精神。第四，要求直接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党员包括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在生产经营当中守法经营，通过改善经营，加强管理，提高技术，降低成本，来取得利润，不搞假冒伪劣，损人利己的事。当然还要履行党员应尽的其他义务。

再次，关于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的问题。党内矛盾是客观存在的，为了使矛盾得到正确解决，向好的方面转化，必须经常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现在是一团和气多了一些，积极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少了一些。对解决思想问题，就事论事不触及思想、思想不见面。培训工作侧重知识传授，这些当然是必要的，但是世界观改造谈得不多。应当在组织生活当中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因为它与党的生命是密切相关的。正如毛泽东所说：“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会不会影响团结？毛泽东曾提出“团结——批评——团结”这样一个公式，经过思想斗争，实现后一个团结将是比前一个团结更高层次因而也更牢固的团结。提倡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绝不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党内生活中开展思想斗争，还有人怕遭报复、穿小鞋。这种情况可能会有，但不应过多地顾虑这个，要相信正确的东西经过斗争最终会被多数人承认。

2. 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从新时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新的实际情况出发，在丰富和发展毛泽东建党思想上，下大功夫。

要处理好坚持与发展的关系。对毛泽东建党思想，既要坚持，又要发展。坚持是发展的基础，如果丢掉了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基本原则，当然谈不上发展；同时，只有发展，才能更好地坚持，不发展，不使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基本原则同日新月异的实际相结合，它就会因脱离实际失去生命力。

当前，我们面临着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面对着执政、改革开放和反对“和平演变”的考验。新形势、新任务给党的建设和党建理论的发展提出了许多新课题。应当清醒地看到，党建理论已经滞后于党的建设的实践。党员群众和各地党组织创造的许多新鲜经验，需要去总结，许多新的问题，需要从理论上给予科学的回答。我们应当按照党的十四大精神，遵循党的基本路线，坚持党要管党和从严治党，结合新的实际，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包括加强党的理论建设，使毛泽东建党思想得到丰富和发展。决不能停留在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则、某些本本的教条式理解上，或者停留在对社会主义的一些不科学的甚至扭曲的认识上，或者坚持那些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正确思想上，而必须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去分析和解决问题。作为党建理论工作者和党的实际工作者，需要积极热忱地投身到这项工作中去，从实际出发，认真研究，大胆探索，敢于提出新见解，敢于回答新问题，为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建党思想作出努力。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组织部)

注释

《邓小平文选》(1938—1965 年), 第 326 页。

《邓小平文选》(1975—1982 年), 第 41 页。

《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1 卷, 第 66—67 页, 第 306 页。

《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4 卷, 第 1481 页。

《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2 卷, 第 686 页, 第 533 页。

试论毛泽东对执政党建设的理论贡献

孙道同

毛泽东曾指出：“中国和俄国的历史经验证明：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就要有一个成熟的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邓小平说过：“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的问题，这不仅是我们这一代的问题，也是下一代、再下一代的问题。一个国家的革命，核心问题是党。有了一个好党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革命胜利后，搞社会主义也要靠一个好党，否则胜利就靠不住了。”历史的经验证明，中国革命的胜利，取决于我们党的成熟和正确的领导。同样，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取决于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更加成熟和更加富有成效的领导。党的建设搞好了，党是坚强有力的，我们的事业就会无往而不胜。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半个多世纪中，极为重视和关注党的建设，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的建党理论，并创立了完整的有中国特色的建党学说。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关于党的建设学说，马克思、恩格斯讲得不多，列宁有个完整的建党学说，把列宁的建党学说发展得最完备的是毛泽东。“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整风中建立了完整的建党学说，并且用这个学说来教育我们全党、全军和人民，使我们建立了这么一个好的党，所以才取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建国以后，党内生气勃勃，生动活泼。毛泽东同志的建党学说以后又有新的发展。”毛泽东不仅为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的建设创立了完整的理论体系，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为社会主义时期执政党的建设同样作出了卓越的理论贡献。在纪念毛泽东诞辰 100 周年之际，认真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关于执政党建设的理论和实践，进一步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水平，提高党的各级组织的战斗力，使我们党理论上更成熟、思想上更统一、政治上更坚强、组织上更巩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充分发挥核心作用。

毛泽东关于执政党建设的理论，是毛泽东完整的建党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建国以前，我们党在部分地区已经是执政党，在建国以后，在全国范围内成为执政党。正因为如此，还在民主革命时期，特别是在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对执政党的建设就提出了许多精辟见解。在建国前夕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又集中地作了阐述，初步形成了关于执政党建设的理论。新中国成立进入社会主义时期后，根据我们党掌握全国政权以后的实践经验，同时鉴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在党的八大的文献以及《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著作中，提出了许多科学的理论观点，标志着毛泽东关于执政党建设理论的完全形成。毛泽东关于执政党建设的理论贡献极为丰富，因论文的篇幅所限，笔者着重就其中的几个主要问题作些论述。

理论贡献之一：毛泽东论述了执政党面临着新的更加严峻的考验，因而加强执政党建设极端重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成为领导全国政权的党。这个变化，邓小平说，是“党的情况所发生的最重大的变化”，执政党的地

位使党的任务、所处的环境以及党的状态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党成为执政党，是伴随着革命性质的转变而进行的。党实现了由人民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最好的最成功的转变。党领导的革命性质的转变，对党的建设的要求是更高了。我们党成为执政党，伴随着由战争环境转为和平环境，由农村工作为重点转为城市工作为中心，由武装斗争为主转为以经济建设为主。这种客观环境的转变，给党的建设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毛泽东深刻分析了上述这些重大变化，认为党在执政以后面临着新的更加严峻的考验。在全国解放前夕，他就告诫全党：“夺取这个胜利，已经是不要很久的时间和不要花费很大的气力了；巩固这个胜利，则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这是因为：第一，对共产党人来说，最危险最可怕的事，莫过于脱离群众，丧失领导权。由于我们党处在执政的领导者的地位，往往容易产生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危险。此外还容易产生滥用权力的危险。因为有相当多的党员当了干部，手中握有一定的权力，有人就怀着“入党做官”、“做官发财”的不纯动机加入党，他们不是为人民谋利益而是为自己“捞好处”，从而败坏党的声誉，严重地脱离群众。第二，由于我们党是胜利的党，有的党员包括某些领导干部经不起胜利环境的考验，骄傲自满，以功臣自居，贪图享乐，甚至蜕化变质。毛泽东指出：“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第三，国内外阶级敌人是不会甘心在中国的失败的，他们必然采取各种手段从事破坏和捣乱，妄图推翻共产党的领导，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当他们用武装侵略、军事颠覆、经济封锁等手段达不到目的时，就改变手法，推行和平演变战略，加紧政治、思想、文化的渗透，企图腐蚀党的干部，瓦解党的队伍，从而使党和国家改变颜色。第四，由于“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认识和掌握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使全党干部学会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本领，是要经历相当的过程和花费很大的力气的。况且，在建国初期，我们接受的是国民党遗留下来的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加之“资产阶级怀疑我们的建设能力”，“帝国主义者算定我们办不好经济，他们站在一旁看，等待我们的失败。”

正因为如上分析，毛泽东认为，我们在掌握全国政权成为执政党以后，任务不是更轻了，而是更重了，不是更单纯了，而是更复杂、更艰巨了。他明确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在严峻的考验和艰巨的任务面前，加强执政党的自身建设，既要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又要根据执政以后的新情况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就显得非常迫切和重要。只有把党的建设好了，才能担当起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重任。

理论贡献之二：毛泽东明确提出了执政党建设的根本任务

毛泽东说过：“我党规定了中国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又规定了各项具体的工作路线和各项具体的政策”⁽¹¹⁾，这是中国革命得以胜利的根本保证。各项具体的工作路线、政策、任务，是由党的总路线、总任务决定的。

因而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党的建设的根本任务是由党的总路线、总任务来确定的。

新中国成立后，我党的历史任务：一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完成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二是进行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建设，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化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¹²⁾正是根据建国后的新的历史条件和党的历史任务，毛泽东明确规定了执政党建设的根本任务，并多次加以阐明。1954年9月，他在《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一文中指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¹³⁾针对国际共运中否定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机会主义思潮，他在1956年4月所作的《论十大关系》报告中强调说：“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现在非有不可，而且非继续加强不可。……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决没有象有些人说的那样已经过时。”⁽¹⁴⁾1957年5月，针对国内出现的否定党的领导的右派分子的进攻，毛泽东重申：“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¹⁵⁾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建设理论，继承和发扬我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把我们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力量，这就是毛泽东提出的执政党建设的根本任务。

我们知道，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即马克思所说的，是“真正的工人阶级的战斗组织。”⁽¹⁶⁾列宁也说共产党是“革命阶级的先锋队。”⁽¹⁷⁾为了把我们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力量，首要的也是最根本的是使我党在执政后始终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这是毛泽东反复强调和抓得很紧的根本问题。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提出了防止腐败的方针，提醒全党要高度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建国初期，鉴于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和一些党员被资产阶级的糖弹所击中堕落成为蜕化变质分子的情况，他再次提醒全党加以严重注意。他还亲自领导了整党、“三反”和整风运动，既对全党进行了马列主义、坚持党员标准、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的教育，提高了全党的觉悟水平，又广泛发动群众揭露了许多违纪、违法事件，并将为群众所痛恨的违法乱纪分子加以惩处（直至判处死刑）和清除出党，保持了党的纯洁性。以后，他又多次号召共产党员要“立党为公”，坚决克服搞特权、谋私利等腐败现象。50年代末，针对帝国主义积极推行和平演变战略，毛泽东又及时提出防止和平演变问题。他把共产党执政后防止腐败和防止和平演变作为重大历史课题提出来，其根本目的就在于使我们党执政后始终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担当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任。60年代初，毛泽东对国际共运中出现的有人企图把共产党演变为“全民党”的错误观点作了深刻的批判，指出：“有些人说共产党是全民的党，我们不这样看。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战斗部队。”⁽¹⁸⁾

理论贡献之三：毛泽东阐明了执政党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强调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全党

恩格斯说过：“我们党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世界观

作为理论的基础。”⁽¹⁹⁾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全党，是把我们的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事业核心力量的决定性因素。放弃或者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党就要变质，就要堕落成为资产阶级政党。正因为如此，我党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毛泽东多次明确指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²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²¹⁾这是毛泽东对执政党的指导思想完整准确的论述。

毛泽东认为，要坚持马列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就必须用马列主义教育全党，这是执政党思想建设的根本任务。1949年9月10日，即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所写的《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详细阐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后所发生的伟大作用，打了四个大胜仗。他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²²⁾这篇论文的重要意义在于，引导全党充分认识对于即将胜利的执政党来说，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第一位的任务。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号召全党特别是党的干部要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马列主义水平。50年代初期，他号召全党学习马克思主义教科书，并带头认真研读，宣传辩证唯物论，反对唯心论。1956年他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提出，一定要继续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抵制和批判资产阶级的一切腐朽制度和思想作风。1957年初他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号召全党都要学习唯物辩证法，注意思想理论工作，并提出要建立一支宏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1957年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他再次要求党员和干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特别强调要“下苦功”。在总结社会主义革命特别是1958年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1963年他又提出，“对我们的同志，应当进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教育，以便端正思想，善于调查研究，总结经验。”⁽²³⁾以后，毛泽东还反复强调，要认真读马列的书，弄通马克思主义。在我们党成为领导全国政权的执政党以后，坚持继续用马克思主义教育党、武装全党的头脑，指导党的工作和党的建设，使我党成为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更加巩固的工人阶级先锋队，这是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胜利的根本保证，也是毛泽东关于加强执政党思想建设的重要理论贡献。

理论贡献之四：毛泽东科学地规定了执政党建设的基本原则

我们知道，党的政治路线是无产阶级政党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党的基本纲领和每一革命发展阶段的主要矛盾所规定的某一阶段内的总方针、总政策。毛泽东认为，要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²⁴⁾对于无产阶级政党来说，政治路线正确与否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它关系到革命事业的兴衰成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对党和建设关系也很大。由于党的政治路线决定党的建设方向、任务和内容，因此，党的建设必须紧密联系党的政治路线来进行。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党的建设过程，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过程，

是这样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地联系着”⁽²⁵⁾。组织路线要服从政治路线，保证政治路线的实现。这是毛泽东阐明的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建设的基本原则，也是执政党建设的基本原则。

联系政治路线进行执政党建设，必须紧紧围绕建国以后各个阶段党的中心任务来进行。这是毛泽东多次明确阐明和要求的。他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指出，民主革命胜利后，生产建设将成为全党的中心工作，党的建设在“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²⁶⁾。1950年，他提出要紧密配合“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这一中心任务进行整党。1953年，他提出要围绕实现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纠正党内各种错误倾向。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党的中心任务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展社会生产力。毛泽东又提出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开展整风运动，以便使党的本事更大，更好地担负起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任务。

联系政治路线进行执政党建设，必须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全党。毛泽东说过：“一个革命政党的任何行动都是实行政策。”“在每一行动之前，必须向党员和群众讲明我们按情况规定的政策，否则，党员和群众就会脱离我们政策的领导而盲目行动，执行错误的政策。”⁽²⁷⁾建国以后，我们党制定了总路线和总政策，又制定了一整套具体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毛泽东指出：要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当作教材去教育他们，使他们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和统一的行动，然后才有可能取得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的胜利”⁽²⁸⁾。

联系政治路线进行执政党建设，还必须注意纠正偏离党的中心任务和政治路线的各种错误倾向。由于认识上的差异，党内有时会出现急躁冒进情绪，有时又会出现落后保守情绪，甚至发生“左”或右的的偏向。党内的错误倾向不克服，就不能正确贯彻党的政治路线，也就不能顺利完成党的中心任务。所以，毛泽东经常教育全党要戒“左”戒右，反对“左”的时候要注意防右，反对右的时候要注意防“左”，避免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

理论贡献之五：毛泽东阐明了加强执政党建设的组织基础是坚持和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

历史经验证明，不仅要有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还必须要有健全的民主集中制，才能坚持和贯彻执行这条政治路线。民主集中制是无产阶级政党实现其组织统一的一种科学的组织制度，是党在组织建设中所必须遵循的根本原则。还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形成了一整套较完整的民主集中制的理论和制度。建国以后又有了新的发展。对于执政党建设，他十分重视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从而加强执政党建设的组织基础。1962年1月他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集中阐述了民主集中制问题，提出了许多新的思想和观点。突出反映在以下四个问题上：

第一，从能不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能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样的战略高度，论述健全民主集中制的极端重要性。毛泽东指出，在我国，没有民主集中制，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无产阶级专政也就不可能巩固。他说：“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²⁹⁾正如邓小平所说：“民主集中制执行得不好，党是可以变质的，国家也是可以变质的，

社会主义也是可以变质的。”⁽³⁰⁾可见，是不是坚持民主集中制，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绝不能掉以轻心。

第二，正确贯彻民主集中制，首要的是以高度的民主为基础。毛泽东指出：“无产阶级的集中，是在广泛民主基础上的集中。”⁽³¹⁾“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³²⁾他认为，如果不充分发扬民主，大家不敢讲话，尤其不敢讲真话，正确的意见集中不起来，群众的积极性调动不起来，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局面就无法形成。所以，毛泽东主张：要让群众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要放手让群众批评，虚心接受批评，勇于作自我批评；要正视错误，勇于承认和改正错误；要有民主作风，遇事同大家商量，反对个人独断专行，反对霸王作风；要正确开展党内斗争，坚持“三不”方针（即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允许别人保留意见，即使是错误的意见也要容许保留。

第三，正确贯彻民主集中制，还要以高度的集中作指导。毛泽东在强调充分发扬民主的同时，又非常重视高度的集中。他早在1942年就说过：“共产党不但要民主，尤其要集中。”⁽³³⁾他认为，共产党没有民主不行，但没有集中更不行。因为，没有集中，就没有统一的认识，统一的政策，统一的计划，统一的指挥，统一和行动，一句话，就没有集中统一的党，革命和建设任务就不可能完成。所以毛泽东强调，党的民主生活必须在集中的指导下进行。为了保证集中统一的指导，他提出：要注意克服分散主义、山头主义；要严格执行“四个服从”这一民主集中制的纪律；要加强党委领导，改变长期固定的“分片包干”、“各自为政”的领导方法。

第四，明确提出了政治生活的建设目标。对于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建设目标，还在1957年毛泽东根据党的历史经验，就作了科学的理论概括。他说：“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化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³⁴⁾在1962年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重申了政治生活这一建设目标。他强调说：“党内党外都应当有这样的政治局面。没有这样的政治局面，群众的积极性是不可能发动起来的。”⁽³⁵⁾而没有广大党员和亿万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社会主义现代化就将是一句空话。

理论贡献之六：毛泽东十分重视执政党的党风建设，强调必须坚决反对和防止官僚主义，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

“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能否始终保持和发展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盛衰兴亡。”⁽³⁶⁾建国以后，毛泽东根据执政党的特点和肩负的重任以及党内存在的问题，一直把反对官僚主义、密切联系群众作为执政党党风建设的一项重大任务亲自抓，反复抓，并坚持同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了长期不懈的斗争。

首先，为了提高全党对这个极端重要的问题的认识，毛泽东阐明了克服官僚主义、密切联系群众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他认为，由于我们党处在执政党的地位，掌握着全国各级党政军大

权，这是人民对我们的信任。如果我们的党员干部不能正确地运用权力，不能自觉地抵制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就会滋长脱离群众的危险；而如果“脱离群众，官僚主义，势必要挨打，”⁽³⁷⁾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不仅不会成功，甚至会危及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所以，在 50 年代初他就强调指出：“我们要进行大规模的国家建设，就必须克服官僚主义。”⁽³⁸⁾1956 年 11 月，他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又一次提醒全党：“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³⁹⁾

其次，毛泽东认为，反对和克服官僚主义，最根本的是要牢固地树立群众观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经常教导全党，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虚心向群众学习，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决防止把党群之间的鱼水关系变为猫鼠关系。1957 年 3 月，针对党内一些干部群众观点淡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精神减少的倾向，毛泽东在党员干部会议上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他再次强调指出：“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⁴⁰⁾他还说：“我们的同志应当注意，不要靠官，不要靠职位高，不要靠老资格吃饭。”“不摆老爷架子，不摆官僚架子，把架子收起来，跟人民见面，跟下级见面。”⁽⁴¹⁾

再次，反对和克服官僚主义，还必须改进领导方法。毛泽东认为，如果我们的领导方法有新的改进，危害群众的官僚主义就可以逐步减少。为此，他提出：要精简机构，在一不死人二不废事的前提下，大量精简党政机关；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每个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都要蹲点，深入一个单位，解剖麻雀，取得第一手资料；要建立和实行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制度；要发挥舆论作用，在报纸上广为揭发典型的官僚主义，同时宣传好的典型，以发扬正气，压倒邪气，等等。

理论贡献之七：毛泽东提出整党整风是加强执政党建设的有效形式，并初步奠定了执政党整党整风的理论基础

整党整风，就“全党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学习马克思主义。在整风中间，我们一定可以更多地学到一些马克思主义。”⁽⁴²⁾它是我们党和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建设上的伟大创造。毛泽东认为，我们党在执政以后经常开展整党整风，仍然十分必要，它是加强执政党建设的有效形式，是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1957 年 3 月，他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阐明了整党整风的必要性、方针原则以及根本目的。他强调指出：“要把我们这个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富裕的、强盛的、具有高度文化的国家，这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我们所以要整风，现在要整风，将来还要整风，要不断地把我们身上的错误东西整掉，就是为了使我们能够更好地担负起这项任务。”⁽⁴³⁾

毛泽东对执政党整党整风的突出贡献，是为整党整风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提供了正确的理论指导。1956 年底，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但阶级斗争仍然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作为阶级的剥削阶级虽已被消灭，但还有反革命分子、新生的剥削阶级分子等；国内虽然还存在敌我矛盾，但大量存在的是人民内部矛盾。1957 年 2 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这部光辉著作中，正确地分析了上述形势，创造性地提出了两类矛盾学说，特别是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他认为，人民内部矛盾是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是与敌我矛盾性质根本不同的是非问题。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只能用民主的方法，不能用专政的方法，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他还认为，党内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总题目，它的理论、方针和方法同样适用于解决党内矛盾。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提出和完整阐述，就为我们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整党整风提供了科学的强有力的理论武器。这对执政党的建设是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的。

毛泽东关于执政党建设的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建设学说的丰富和发展，也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党有今天，我们国家有今天，是与毛泽东的卓越贡献分不开的。虽然毛泽东在执政党的建设问题上犯有错误，他提出过一些错误方针和观点，采取过一些错误做法，使党的建设受到了损害；但从社会主义时期全过程看，从全局看，从一些关键问题看，毛泽东对执政党建设的贡献还是主要的、第一位的，其错误属于第二位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坚持和继承了毛泽东关于执政党建设的正确理论，纠正了毛泽东晚年一些错误观点和错误做法，并根据新的历史条件作了许多有益的补充，使执政党建设的理论更加完善了，从而极大地加强了我们的建设，在领导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坚强的核心作用。我们党在执政、改革、开放条件下加强自身建设的丰富经验已越来越被各国共产党人所注目。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注释

《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转引自《党的文献》1992年第4期。

《邓小平文选》(1938—1965年)，第326页，第230页。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41页。

(11)(22)(25)(26)(27)《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38页，第1438页，第1480页，第1436页，第1480—1481页，第1438页，第1439页，第1515页，第605页，第1432页，第1286页。

(12)(13)(14)(18)(20)(23)(24)(28)(29)(31)(32)(35)(40)(41)《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15页，第715页，第734页，第833—834页，第715页，第840页，第741—742页，第831页，第822—823页，第820页，第822页，第819页，第800页，第802页。

(15)(34)(37)(39)《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30页，第456—457页，第358页，第326页。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4页。

(17)《列宁选集》第4卷，第295页。

(19)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

(21)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

(30)邓小平：《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33)《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21页。

(36)《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

(36)转引自《新华月报》1953年第3号。

(42)(43)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毛泽东关于培养接班人的战略思想与新时期干部队伍建设

彭清华

培养接班人问题，是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一个重要问题。毛泽东关于培养接班人的一系列战略思想和我们党在培养接班人问题上的伟大实践，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不断走向胜利的历史进程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深入学习研究毛泽东关于培养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战略思想，认真总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干部队伍建设的经验，对于加强党的建设，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对于做好新时期的干部工作，从组织上保证党的基本路线的贯彻执行，是很有意义的。

—

从我们党诞生之日起，干部工作就是党的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把培养接班人 的问题作为党的干部工作的一个重要问题提出来，并逐步形成较为系统的思想理论，是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以后，特别是从抗日战争开始的。这是毛泽东和以他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一大贡献。

毛泽东关于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战略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抗日战争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是毛泽东培养接班人思想的形成时期，工作重点是培养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骨干，为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作干部准备。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步步升级。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领导人民抗战，挽救民族危亡，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的重任，历史地落到中国共产党肩上。由于遵义会议前党的领导机关所犯的的错误，革命事业遭到严重挫折，共产党员从 30 万人减少到 4 万人左右，主力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北时，只剩下 3 万多人。发展党的领导力量，壮大抗日骨干队伍，是党所面临的极其紧迫的任务。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 他提出：“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党依靠着这些人而联系党员和群众，依靠着这些人对于群众的坚强领导而达到打倒敌人之目的。” 在当时极为严酷的革命战争环境中，党把有计划地培养大批新干部，作为主要的战斗任务之一。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张闻天、陈云等党中央领导对此作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形成了一套较为系统的党的干部工作的战略思想。这一战略思想的确立和贯彻，推进了革命队伍的迅速发展壮大，到 1949 年，共产党员发展到 400 多万人，人民解放军发展到 200 多万人。为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也为民主革命胜利以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准备了充分的干部条件。

第二个阶段，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是毛泽东培养接班人的思想进一步发展时期，工作重点转移到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人才，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上来。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党所处的地位

和面临的任務发生了重大变化。党成为执政党，党的主要任务由夺取政权转变为巩固政权，由开展武装斗争转变为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毛泽东满怀信心地宣告，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他号召党的干部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习生产的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提出人民解放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要把 210 万野战军看成一个巨大的干部学校。根据党中央的部署，大批军队干部转业到地方，成为新生革命政权的骨干力量；迅速有计划地训练了大批军事、政治、经济、党务、科技、文化教育等方面管理工作的干部，同时起用了一些爱国民主人士担任各级政府及重要部门的领导职务，选派了一批政治、文化素质较好的青年知识分子到苏联学习，很多同志回国后在各条战线发挥了重要作用。

50 年代后期到 60 年代初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歧加剧，促使毛泽东从另一个角度考虑接班人的问题。他认为某些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问题，根本原因是其领导集团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因此，他提出：“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他号召全党“要上到下地、普遍地、经常不断地注意培养和造就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在实际工作中，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选拔一些有文化、有培养前途，但缺乏实际工作经验的干部，包括一些大学毕业生到基层任职锻炼，选调一些年纪较轻、政治素质较好，但文化较低的工农干部到大中专院校进修，提拔一批年轻干部参加省部级的领导班子等等。这些，是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自觉地、有计划地培养接班人的一种积极尝试。直到今天，有些办法还被广泛采用。到“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左”的指导思想影响，在培养接班人问题上发也生了严重的错误，如把一大批久经考验对党和人民忠心耿耿的领导干部打成“走资派”，而把一些“头上长角、身上长刺”，造反起家的帮派分子作为新生力量提拔上来，从根本上混淆了政治是非；采取由领导指定接班人的做法，违反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和群众路线的方法，给党的事业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其教训是值得认真记取的。

二

毛泽东关于培养接班人的战略思想非常丰富，概略地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培养接班人的意义：保证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后继有人。毛泽东认为，对于领导者来说，主要责任是出主意，用干部两件事；对于一个政党来说呢？就是要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同时培养好能够实现党的政治路线的干部队伍。“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他总是把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紧密联系在一起，把培养接班人的问题同完成党的历史使命，同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十分警觉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他认为，帝国主义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的，要使帝国主义的图谋彻底破产，保证我们党和国家永远沿着马克思主义的正确道路前进，就必须抓好培养接班人的工作。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毛泽东以无产阶级革命家

对共产主义事业的高度责任感和远见卓识，十分重视党的政治建设和思想建设，重视干部的思想教育，教育干部认真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树立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从思想上筑起防止和平演变的长城。在党的组织建设上，他特别提出干部队伍要做到老中青相结合，强调老干部对年轻干部的传帮带，使得党的事业和党的优良传统、作风能够代代相传。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欣慰地说：“我们有这么一套干部：有建党时期的，有北伐战争时期的，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有抗日战争时期的，有解放战争时期的，有全国解放以后的，他们都是我们国家的宝贵财产。东欧一些国家不很稳，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没有这样一套干部。我们有在不同时期经过考验的这样一套干部，就可以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联系到当今国际风云变化，我们能更加体会到党和毛泽东关于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战略思想的深远意义。

(二)培养接班人的标准：德才兼备，又红又专。1964年，毛泽东提出了接班人的五项条件：1.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2.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3.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4.模范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5.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这五条，是鉴于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提出来的，侧重政治方面的要求。但这并不表明毛泽东只讲德，不讲才。从他的一贯思想来看，是十分重视干部应当德才兼备的。早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提出培养“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指出：“共产党的干部政策，应是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这里既讲了德的要求，也讲了才的要求。毛泽东历来提倡干部既要学习马克思主义，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又要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掌握业务技术，提高领导本领，努力做到又红又专。他还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是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这一教育方针的制定和贯彻，对于从基础教育抓起，培养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三)培养接班人的途径：在革命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毛泽东根据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的观点，十分重视实践，认为实践是认识的源泉，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自己的主观世界也得到改造，干部只有投身实践才能积累经验，增长才干。“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

毛泽东指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是在革命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成长的。应当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考察和识别干部，挑选和培养接班人。”他提倡坚持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的制度，认为“干部通过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同劳动人民保持最广泛的、经常的、密切的联系。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他反对干部脱离群众，脱离实际，高高在上，做官当老爷，指出，我们的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都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提醒干部正确使用手中的权力，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抑制剥削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防止蜕化变质，毫不留情地同各种腐败现象作斗争，保持党的干部队伍的纯洁性。他提倡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相结合，在思想感情上打成一片，认为这是改造世界观的一条有效途径。同时，毛泽东也非常重视干部的理论学习和培训。在延安时期那样艰苦的条件下，党就创立了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中共中央党校和马列学院等培训干部的学校，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新

民主主义论》，刘少奇的《论共产党的修养》等，都是在这些学校所作的著名演讲。建国以后，省、地、县各级党委普遍建立了党校，干部的学习培训形成制度，这是我们党培养干部的一大特色。

(四)培养接班人的政策：任人唯贤。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因此，毛泽东指出，共产党的干部路线，就是“任人唯贤”的路线。

如何才能做到任人唯贤呢？从毛泽东讲到的这样一些观点中，我们可以得到启发：

——坚持公道正派的作风，反对任人唯亲，毛泽东认为，“任人唯贤”与“任人唯亲”是两条对立的干部路线，前者是正派的路线，后者是不正派的路线。在延安整风中，提出必须坚决反对宗派主义，包括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不团结等等，毛泽东还详细论述了如何处理好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老干部与新干部、党员干部与党外干部的关系，告诫全党在用人上必须以党的利益为出发点，要搞五湖四海，不能搞小圈子。

——要走群众路线。毛泽东一贯认为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必须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我们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

他还说：干部工作好坏，应以群众反映如何为断。

——用全面的、发展的观点看待干部，不仅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对犯错误的干部，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帮助他们改正错误，继续前进。

——关心、培养非党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毛泽东指出，“不但要关心党的干部，还要关心非党的干部。党外存在着很多的人材，共产党不能把他们置之度外。”他教育党员干部要善于和非党干部共事，真心诚意地帮助他们，用热烈的同志的态度对待他们，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毛泽东还十分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指出“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文化不发达，所以对于知识分子觉得特别宝贵。……没有革命的知识分子，革命就不会胜利。”(11)在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一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要造就大批知识分子以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他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我们的中央委员会能有许多工程师和科学家。

毛泽东关于培养接班人的战略思想贯穿于党在不同时期干部工作的路线、方针、政策之中，对党的干部工作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是毛泽东思想宝库的一个重要内容。

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党历史上一次具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标志着我们国家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本着对社会主义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认真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关于培养接班人的战略思想，使新时期的干部队伍建设出现了新的局面。

(一)把培养接班人提上全党工作的重要日程。经过十年浩劫，党和国家百废待兴，迫切需要大批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优秀干部，承担起领导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繁重任务。而此时干部队伍的状况是：随着揭批查工作的全面展开，一些“文化大革命”中提拔起来的帮派思想严重的干部被从领导班子调整下去；通过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一大批老干部重新走上领导岗位。但许多同志年事已高，难以承担繁重的工作任务。干部队伍普遍存在年龄偏大，文化偏低，青黄不接的严重状况。邓小平、陈云、叶剑英、李先念等老一辈革命家多次强调，解决好干部队伍的交接班问题，是摆在全党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这个问题不解决，或者解决得不好，共产主义事业在中国就有可能出现曲折。邓小平指出：“现在我们国家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不是四个现代化的路线、方针对不对，而是缺少一大批实现这个路线、方针的人才。”⁽¹²⁾他提出，老同志“第一位的任务，是帮助党组织正确地选择接班人。”⁽¹³⁾并指出，这项工作做不好，就要犯历史性的重大错误。这项工作做好了，我们的事业完全有把握继续下去，我们的老干部就再一次为党、为人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陈云在党的十二大的讲话中指出，提拔中青年干部进入各级领导班子，不能只提拔几十个、几百个，必须成千上万地提拔。“只有这样，才能使各级领导班子中退出的大批老干部的工作都能有人接替；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较大的选择余地，以便把班交给切实可靠的人；只有这样，才能使‘文化大革命’中提拔起来的那些兴风作浪分子在今后闹不起大乱子。”

为培养选拔中青年干部，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二大，不到4年时间共提拔了5万名年轻干部进县级以上领导班子。1983年，党中央进一步提出建立干部队伍的“第三梯队”，只用2年多时间，全国就建立了一支省部级1000多人，地厅级2万多人，县处级14万多人的后备干部队伍，初步改变了干部队伍青黄不接的局面。大批年轻干部走上领导岗位，使各级领导班子年龄普遍降低，文化明显提高，专业知识结构有很大改善，更加朝气蓬勃，加快了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步伐。

邓小平1992年春视察南方的谈话中指出：“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要注意下一代接班人的培养。”⁽¹⁴⁾邓小平的谈话，把培养接班人的意义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二)提出干部队伍“四化”方针，确立新时期的用人标准。这是我们党培养接班人战略思想一个有重大意义的发展。1980年，邓小平指出，“要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下，使我们的干部队伍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并且要逐步制定完善的干部制度来加以保证。提出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这三个条件，当然首先是要革命化，所以说要以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为前提。”⁽¹⁵⁾党的十二大把“四化”方针作为新时期党的干部队伍建设的指导方针，明确写入了党章。

干部队伍“四化”方针与我们党长期坚持的德才兼备原则是什么关系呢？江泽民对此作了论述。他说：“我们党制定的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方针，是一个有科学涵义的、相互联系的完整方针，是德才兼备原则在新条件下的具体体现。”⁽¹⁶⁾“四化”方针为德才标准赋予了新的内涵，革命化是德，知识化、专业化是才。“四化”方针还突出了年轻化的要求，这对于保持干部队伍的生机与活力，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是有重要意义的。同时，“四化”方针既然称之为“化”，就不只是对单个人的具体要求，而是对整个干部队伍建设总的要求。全面掌握和正确贯彻这一方针，就能够不断提高干部队伍的整体素质，建设一支政治坚

定，有专业文化知识和组织管理水平，年龄上形成梯次结构的干部队伍，而避免在选拔干部时片面地以年龄大小和学历高低取人的形而上学的做法。

如何按照“四化”方针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邓小平提出，要选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这里提出了二条：一条是要群众公认，而不能少数人说了算，搞“长官意志”，体现了群众路线的观点；一条是有工作实绩，光说大话，做表面文章不行，体现了实践第一的观点。这两条，在选拔干部、培养接班人工作中，是非常重要的。

(三)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创造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环境和条件。早在1979年，邓小平就指出：“我们要改革现行的干部工作制度，建立有利于提拔年轻干部的制度。”⁽¹⁷⁾他号召各级党委和组织部门“在这个问题上来个转变，坚决解放思想，克服重重障碍，打破老框框，勇于改革不合时宜的组织制度、人事制度，大力培养、发现和破格使用优秀人才，坚决同一切压制和摧残人才的现象作斗争。”⁽¹⁸⁾10多年来，为解决年轻优秀人才的培养选拔问题，干部人事制度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

——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党的十二大通过的《党章》明确提出：“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无论是由民主选举产生的，或是由领导机关任命的，他们的职务不是终身的，都可以变动或解除。”1982年，中央作出了《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结合机构改革和领导班子调整，对各级领导干部的任职年龄界限作了原则规定。对一些重要领导职务实行任期制。大批老干部为党的事业，光荣退出领导岗位，为年轻干部的成长创造了有利条件。

——实行干部能上能下制度。初步建立和完善了干部的选举、招考、任免、考核、评议、罢免等制度，使干部职务能上能下方面开始有了实质性突破。

——完善干部选拔程序。1986年，中央发出通知，规定了选拔任用干部的四道程序：1.群众民主推荐；2.组织部门考察；3.党委集体讨论；4.报上级党组织批准。这四道程序体现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从组织程序上消除了个人指定接班人的弊端。

——实行干部交流和岗位轮换制度。为使干部经受多方面的实际锻炼，扩大视野，增长才干，中央1990年作出了《关于党和国家机关领导干部交流制度的决定》，对干部交流的范围、原则、形式和要求作了明确规定。地区之间、上下之间、岗位之间的干部交流普遍展开，收到了良好效果。

——建立科学的干部分类管理体制。以《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的颁布为先导，党的机关、其他国家机关、各群众团体参照国家公务员制度，分别制定适合各自特点的人事管理制度，企业、事业单位则实行更加灵活多样的人事管理制度，从而彻底打破沿用已久的单一的干部管理模式，改变“一切以行政级别划线”、“官本位”的陋习，充分体现各类人员成长的不同规律，标志着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进入一个综合配套、科学规范的纵深发展阶段。

除以上所列，干部人事制度还进行了其他许多方面的改革。这些改革措施的实行，使干部队伍逐步形成了正常的新老交替和选优汰劣机制，使培养选拔接班人的工作逐步走上制度化的轨道。

四

能否解决好接班人问题，既是关系到党的盛衰兴亡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大

问题，也是一个党政治上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剧变，政治、经济陷入严重困境的情况下，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能够蓬勃发展，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党富有远见地培养造就了一支能够忠实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年富力强，堪当重任的干部队伍，成功地解决了接班人的问题。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形成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这个领导集体在复杂艰难的国际国内形势下，沉着应付，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表现了很高的领导水平和很强的驾驭全局的能力。党的十四大，进一步实现了党的最高领导机构的新老交替。邓小平 1993 年春节在上海视察时赞扬说：“实践证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工作做得是好的，是可以信任的。”

我们党能够解决好接班人问题，首先是因为党制定了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这是最重要的政治前提。组织路线是为政治路线服务的，政治路线决定组织路线。历史经验证明：组织路线不对头，政治路线的实现缺乏组织保证；政治路线错了，组织路线必然出问题，接班人的问题不可能解决好。我们党确立的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主要内容的基本路线，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要选好接班人，首先必须深刻领会和全面贯彻这条基本路线，严格按照党的基本路线的要求选拔干部，认真考察干部对待党的基本路线的态度和在执行党的基本路线中的实际表现。只有这样，才能把握住干部的本质和主流，避免出现片面性或者用人失察。

我们党能够解决好接班人问题，还因为党在对待毛泽东思想问题上，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继承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这是我们党成功地解决接班人问题最重要的思想基础。“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如何对待毛泽东思想问题上，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坚持完整准确地理解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同时，坚决顶住了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肯定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事求是地把经过长期历史考验形成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别开来，充分肯定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统一了全党思想。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提出了新的历史时期干部队伍建设的指导方针、基本原则和用人标准，特别是提出了党的制度建设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思想，使我们党在培养接班人的问题上实现了一个新的飞跃。

培养接班人的问题，既是一个理论问题，又是一个实践问题。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造就了一代又一代治党治军治国的优秀人才。这是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最深厚的土壤。应当看到，人才在实践中锻炼成长，与党组织有目标、有计划、有重点地对干部进行培养和训练是一致的。作为一个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这种培养训练对于高水平地造就领导人才是必不可少的。因此，要把对年轻干部的培养教育和选拔使用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

我们党和国家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培养接班人的工作，不仅要着眼于当前，更要着眼于长远。要在下世纪中叶实现“三步走”的战略目标，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从现在起，我们就要以高度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抓紧培养跨世纪的接班人。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组织部)

注释

“接班人”的概念，在不同情况下有不同的提法。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前，通常称提拔“新人”或“年轻的新生力量”（列宁多采用此提法），我们党在建国前多称培养“新干部”；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开始采用培养“接班人”的提法。如斯大林在俄共（布）十二大提出“培养新的接班人”，我们党从60年代起，也采用培养“接班人”的提法。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26页。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77页，第181页。 引自《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

引自《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的批语。

(11)《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97页，第815页。

(12)(13)(17)(18)《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93页，第281页，第198页，第286页。

(14)(15)《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0—381页，第320页。

(16)《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册，第817页。

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与当前干部理论教育的思考

卢文峰

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过程中，非常重视党的干部教育工作，并逐步形成了内容丰富的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体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学习、研究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对加强干部队伍的培养、管理，特别是干部理论教育工作，坚持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加强各级干部的党性锻炼，保证党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中，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加强干部教育是关系党的事业成败的决定因素

培养和造就一大批忠诚于马克思主义的干部队伍，是毛泽东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很早就提出的重要战略问题。毛泽东非常重视干部的作用。1937年5月，在《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文章中，就指出党的建设问题中迫切需要解决党的干部问题。毛泽东说：“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党的建设，至为重要的是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组织建设归根到底就是干部队伍建设。毛泽东充分认识到这一点。随着工农群众运动的蓬勃发展，革命形势的急剧变化，毛泽东先后主持了广州农讲所、武昌中央农讲所的工作，培养了一大批适应革命需要的，对中国国情有充分认识的工农干部。我们党之所以要培养一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是因为广大群众要靠党的干部去组织、领导，去从事革命和建设，同时党的干部也只有通过放手发动群众，到群众中去做扎扎实实的工作，才能使群众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据此，毛泽东说：“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毛泽东不仅论述了党的干部的重要作用和作用，而且论述了“我们的战斗任务”。就是要“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我们的责任，就在于组织他们，培养他们，爱护他们，并善于使用他们。”为此，他特别强调要对干部进行教育。除了要指导他们，检查他们的工作，帮助他们总结经验，发扬成绩、纠正错误外，重要的是“提高他们。这就是给以学习的机会，教育他们，使他们在理论上在工作能力上提高一步。”在干部教育中，毛泽东特别注重干部素质教育，他认为，我们的干部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者和执行者，又是革命建设的组织者、指挥者，他们的素质如何，直接关系到革命和建设任务的完成。因此，毛泽东在抗战期间就要求：“每个根据地都要尽可能地开办大规模的干部学校”，并规定其主要任务就是造就革命的先锋队，或“抗日先锋队”，这些人应该是具有政治远见，充满着斗争精神与牺牲精神；应该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应该是不谋私利的、唯一地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应该是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往直前的；应该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他们应该有知识、有能力、不务空名、会干实事。”按照毛泽东的干部教育思想，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培养和造就了数以万计的各级干部，并且依靠这些干部，团结和带领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取得了中国革命事业的胜利。毛泽东在

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说：“我们有这么一套干部：有建党时期的，有北伐战争时期的，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有抗日战争时期的，有解放战争时期的，有全国解放以后的，他们都是我们国家的宝贵财产。东欧一些国家不很稳，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没有这样一套干部。我们有在不同革命时期经过考验的这样一套干部，就可以‘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东欧、苏联剧变的事实，一方面说明毛泽东的预见无比正确；另一方面可以看出，毛泽东重视加强党的干部教育，的确高瞻远瞩，意义非同寻常。

二、毛泽东干部教育的主要内容、重点和方法

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包含着丰富的内容、鲜明的特点、明确的重点和科学的教育方法，在长期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干部教育思想体系。

（一）毛泽东干部教育的主要内容

首先，注重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是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的基本内容。

从我们党历史来看，每到一个重要的历史转变时期，毛泽东总是强调全党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统一全党的思想，以适应新形势，开拓新局面，完成新任务。

1942年，为了清理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毛泽东亲自规定高级干部都要学习《“左派”幼稚病》和其他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经济学著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号召“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看谁真正学到一点东西，看谁学得更多一点、更好一点。”1949年，在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之时，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定干部要学习十二本马列著作，并由毛泽东书题“干部必读”作为书名，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一直是干部学习马列主义的基本教材，从思想上武装了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在1958年“大跃进”出现严重失误的时候，干部中产生了某些混乱思想，毛泽东写信给党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建议读一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并要求“每人每本用心读三遍，随读随想，加以分析，哪此是正确的（我以为这是主要的）；哪些说得不正确或者模糊影响，作者对于所要说的的问题，在某些点上，自己并不甚清楚。”“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毛泽东不仅强调干部要认真学习马列著作，而且更重视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重视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反对死读马列的书本，教条式的生搬硬套，反对抽象的无目的地研究马列主义。他号召党的干部，“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运动结合起来。”“不凭主观想象，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列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毛泽东说，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的作风。

其次，进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教育，是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的核心内容。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宗旨，也是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伟大人格的具体体现，毛泽东过去经常告诫干部：我们的权

力是人民赋予的，人民赋予我们的权力，是要我们为人民谋利益、办事情的。所以他要求党的干部不论形势、任务、环境发生什么变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决不能改变。早在1944年9月8日，毛泽东在追悼张思德的会上就以“为人民服务”为题作了讲演。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要求国家机关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为人民服务。他还强调指出党员干部必须坚持以是否合乎人民的利益为价值标准，并以此来规范领导干部的领导意识和领导行为。他说：“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¹¹⁾这就要求党员、干部的所恩所想，所作所为，都必须应该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别无其他目的。

要很好地为人民服务，毛泽东强调，必须在工作中实行群众路线，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针，反对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虚心向群众学习，而不能脱离群众，更不能站在群众之上。只有这样，才能努力减少工作中的失误，把工作做得更好。即使发生某些失误，也能以人民的利益为标准而加以克服，“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¹²⁾。

在几十年的革命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正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教育广大党员、干部，使各级党员干部树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价值观，自觉地摒弃一切从个人及小团体私利出发的各种行为，始终保持同广大群众血肉相联，息息相关的紧密关系，因而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所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教育，是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的核心，他的整个教育思想都是围绕这个核心而展开的。

再次，加强党员干部的党性教育，这是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的又一重要内容。

毛泽东在干部教育中，历来注重党员和干部的党性教育。1941年，党中央专门作出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对全党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起了很大的教育作用，在以后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党中央和毛泽东一直把增强党性作为党的建设的一个重要问题来抓，使其成为党的优良传统。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党性教育问题上不仅有许多不朽著作和精辟论述，而且身体力行，堪称楷模。邓小平在1978年说过：“我们的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以身作则，严于律己，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成为我党我军优良传统和作风的化身。他们的感人事迹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中，发生了多么巨大和深远的影响！不仅影响到我们这一代，而且影响到子孙后代。”⁽¹³⁾

在干部的党性教育中，毛泽东特别强调“应该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他要求干部“思想上要有所进步，政治上也要有所进步”，要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在毛泽东看来，“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他亲自为抗大制定的“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为干部的党性教育规定了比较具体的内容。他形象地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比喻为“松树的本领”，把“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比喻为“柳树的本领”，指出，党员、干部应学会两种本领：一是不怕刮风下雨，严寒之中也能巍然屹立的松树的“原则性”；一是插到哪儿都能活，枝长叶茂，随风飘荡，十分可爱的柳树的“灵活性”。他认为共产党员就应该有松树的原则性和柳树的灵活性，二者缺一不可。

为了使全党保持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的性质，胜利地完成中国革命艰巨而光荣的历史使命，1941年，党中央不仅发布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而且紧密结合当时党员干部思想状况，开展了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延安整风运动。为使运动开展得更具针对性，在《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中，就指出了当时部分党员干部缺乏党性倾向的一些具体表现：“在思想意识上，是发展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来反对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一切从个人出发，一切都表现个人，个人利益高于一切，自高自大，自命不凡，个人突出，提高自己，喜人奉承，吹牛夸大，风头主义，不实事求是了解具体情况，不严肃慎重对待问题，铺张求表面，不肯埋头苦干，不与群众真正密切联系。”这段话，成了当时党员干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克服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增强党性锻炼的主要内容。毛泽东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正是通过延安整风运动，有力地纠正了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不良倾向，使广大党员干部增强了无产阶级的党性，从而对于战胜当时所面临的严重困难，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二)毛泽东干部教育的重点

在党的建设中，加强党的干部教育，特别是加强领导干部，尤其是高中级领导干部的教育，这是毛泽东干部教育的重点。我们党建党以来的全部历史表明，在党的整个建设中，党的各级领导班子尤其是高层领导班子的建设始终处在主导和关键地位，是决定党能否制定和执行正确路线，党会不会发生变质的要害所在。

在毛泽东看来，“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零碎地、实际地而不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¹⁴⁾。党的高级干部是党的事业的中坚，他们肩负重任，手握重权，事关全局，既参与党内重大问题的决策，又负责党的政策、策略的贯彻实施，因此，重点抓好领导干部、特别是高中级领导干部的教育，使之为广大群众做出表率，为群众拥护和爱戴，才能增强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才能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和落实。正因为高中级干部在党的事业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所以毛泽东在干部教育中，特别强调要重点抓好高中级领导干部的教育。他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明确提出：“此次整风是全党的，包括各部门各级干部在内，所谓各部门，就是不但有地方，还有军队，所谓各级，就是不但有下级，而且主要与首先的对象是高中两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只要把他们教育好了，下级干部的进步就快了。”基于这样一个明确的目标，延安整风就是先从党的高级干部学习理论、统一思想认识开始，扩展到全党普遍整风，然后再回到高级干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而结束的。整个运动期间，党中央和毛泽东始终抓住高级干部的学习与思想教育，同时，党的许多高级干部，无论在学习理论，开展调查研究、总结历史经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等方面，都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榜样，从而实现了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空前团结和统一。

建国后，毛泽东多次强调必须大力加强领导干部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根据形势任务的要求，党中央多次在高级干部中强调学习马列著作，学习毛泽东思想。毛泽东还多次为高级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圈定书目，要求大家真正读懂弄通。实践证明，注重领导干部的教育，对于确保我们党和国家各级领导权始终掌握在忠诚于马克思主义的人手里，确保党的基本路线的贯彻执

行，使党的各级领导班子真正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坚强领导核心，是我们党的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

(三)毛泽东干部教育的方法

理论联系实际，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是党的思想路线的主要内容，也是毛泽东干部教育的重要方法之一。

首先，毛泽东要求：“对于在职干部的教育和干部学校的教育，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¹⁵⁾在党的干部教育中，正是运用这种方法，大大提高了全党各级干部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使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的自觉性获得了极大提高，也为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走有中国特色的革命和建设道路，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

其次，毛泽东要求，理论联系实际要有行动表现。他认为这是最为关键的一环。他早就说过：“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么，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¹⁶⁾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毛泽东批评了主观主义学风，并要求干部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之“矢”去射中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之“的”。他风趣而又形象地比喻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有些同志却在那里‘无的放矢’，乱放一通，这样的人就容易把革命弄坏。”或者“仅仅把箭拿在手里搓来搓去，连声赞曰‘好箭！好箭！’却老是不愿意放出去。”这就不就是理论联系实际，所以他警告说：“如果只是口头上讲联系，行动上又不实行联系，那末，讲一百年也还是无益的。”⁽¹⁷⁾

如何才能真正做到理论联系实际，促进理论向实践的转化呢？毛泽东在不同时期，根据不同情况，向党的干部提出过许多方法，基本的有三种：

一是调查研究，在实践中做到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毛泽东曾经严肃指出：“现在我们很多同志，还保存着一种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作风，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却在那里担负指导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现象。”针对这种现象，他向各级领导干部提出：以调查研究作为基本方法，来了解国情民情，是一名合格干部的必修课和基本功。这是毛泽东干部教育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

二是领导与群众相结合。毛泽东指出：“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最基本的领导方法。”⁽¹⁸⁾他首先要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有“眼睛向下”的决心和兴趣，而不能“昂首望天”。其次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精神，要采取“恭谨勤劳”的态度和群众交朋友。同时告诫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¹⁹⁾因此，毛泽东要求党员和干部“无论在什么问题，一定要能够同群众相结合。”这是他教育干部联系实际的最有效方法。

三是一般与个别相结合。为了促进理论向实践的转化，毛泽东还总结出了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的工作方法。他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批评了“某些干部只是满足于工作任务的一般号召”而不注重善于在号召之后紧接着从事个别具体的指导，而使“号召停止在嘴上、纸上或会议上”的错误行为，强调各级领导干部都应该在工作中普遍地提倡将一般号召与个

别指导相结合的工作方法⁽²⁰⁾。这是毛泽东干部教育的又一重要内容。

毛泽东的一生，是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一生，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运用和发展，对推动中国历史前进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晚年的毛泽东却长期脱离实际，把马列著作中的某些设想和论点教条化甚至误解，对现实社会状况和许多问题不能作出正确的分析和估量，给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了严重损失。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他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就是象毛泽东这样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旦长期脱离实际，主观专断，也会偏离马克思主义的方向，这是必须记取的深刻教训！

运用整风精神，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加强领导干部的思想教育，这是毛泽东干部教育的又一重要方法。

从思想方面建党，历来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建党原则。毛泽东不仅重视而且是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在毛泽东看来，要取得革命事业的成功，必须有一个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党。而建设这样一个党，就要克服广大党员中首先是领导干部中存在的不正确或不完全正确的思想作风。要克服这种不正确的思想作风，就需要进行严肃的思想斗争，以达到全党思想上的一致。正如毛泽东所说：“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²¹⁾进行思想教育，一方面体现了毛泽东的民主思想，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思想发展的规律。毛泽东早在《矛盾论》里就分析说：“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任何事物内部都有这种矛盾性，因此引起了事物的运动和发展。”⁽²²⁾人的思想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事物或现象，它变化发展的根本原因也是它的内部矛盾性。它同外界的联系和影响要通过内部思想矛盾的斗争才能起作用。为此，外部的教育要采取说服、诱导的方法，促进内部的积极的思想斗争，推动思想的变化发展。所以，延安整风期间，为了正确分析和处理党内矛盾，增强全党在党性基础上的团结，全党进行了严肃、积极而又温和、适当的思想教育与思想斗争，创造和积累了富有特色的成功经验。一是为了增强党员干部的党性觉悟，开展了反对主观主义等不良倾向的积极思想斗争。二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用民主的方法，通过党内同志式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开展党内积极的思想斗争，达到了新的团结。三是对待历史上犯错误的同志，“不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的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所以延安整风为我们党运用自己的力量解决自身矛盾，统一全党思想树立了一个成功典范。

作为以普遍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和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来加强党的干部思想教育为基本特征的延安整风精神，将永存人间。毛泽东曾经说过：“中国的改革和建设靠我们来领导。……我们所以要整风，现在要整风，将来还要整风，要不断地把我们身上的错误东西整掉，就是为了使我们能够更好地担负起这项任务”⁽²³⁾。所以，每当党内状况不能适应革命形势发展和革命任务需要时，党中央和毛泽东总是用整风的方法，提高全体党员、干部特别

是领导干部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以保证革命任务的顺利完成。继延安整风以后，我党又相继进行了1947年的整风，1950年的整风，1951年至1954年的整风，1957年的整风等。由于革命形势和革命任务不同，各个时期的整风所要求解决的问题、侧重点和步骤也有所不同，但整风的基本精神却是一致的。从整风的基本内容看，都是以整顿思想为主，同时进行作风和组织整顿；从整风的方式看，都是在党内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通过学习与教育，开展批评和组织整顿；从整风的方针看，都是采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达到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党中央和毛泽东正是通过不断地整顿党员、干部的思想作风，既保持了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又培养和造就了一支忠诚于马克思主义的党的干部队伍。它不仅为我们的党员干部教育积累了丰富的成功经验，而且为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增添了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

三、当前干部教育的几点思考

学习、研究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对反思过去一段时间的干部教育，加强当前干部教育工作，颇有启发。

长期以来，我们党总是强调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并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立健全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制度，反复强调必须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根本原则，促进了理论向实践的不断转化。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同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与教育方面，也还存在着一些形式主义倾向：一是运动式。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左”和右的错误倾向常有发生，因而导致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时紧时松、时冷时热，降低了学马列的积极性和实际效果；二是重复性。虽然强调学习要联系实际，但在安排上，不分学习层次，忽视教育规律，使理论学习与教育在同一水平上不断反复。因而使一些人产生逆反心理；三是专业化。面对人数众多，层次复杂，范围广泛的党员、干部、群众，统统按专业工作者的要求，进行学习研究，这种专业化要求，不但没有达到预想的学习效果，相反却严重助长了学习上的形式主义。

这种形式主义的学风，在实践中导致了非常严重的后果，部分领导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指导地位认识不足，存在有重实干、轻学习，重业务、轻思想，重实惠、轻理论的状况，不重视或不十分重视提高干部的思想理论素质。即使学习，也是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求全不求精、求新不求深、求学不求用，只满足于照抄照搬书本上的某些现成的结论，使理论与实践脱节；有些领导干部则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理论学习摆不上位置，工学矛盾非常突出，党校调学困难重重，“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仍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种状况，同我国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的新形势以及建设和改革的新任务要求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构成了一个亟待解决的严峻课题。党的十四大提出，要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对各级党的干部来说，这是一个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这个战略任务完成得好坏，直接影响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现。

当前，学习、研究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引发了我们关于加强干部理论教育的几点思考：

思考之一：干部理论教育，出发点应放在提高党的各级干部特别是各级

领导干部的思想认识水平上。

毛泽东干部教育的重点是各级领导干部。因此，在新的形势下，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认识尤为必要。进入新的时期以来，邓小平和毛泽东一样，对学马列非常重视，他多次建议党中央作出切实可行的决定，使领导干部在繁忙的工作中，能够有时间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以加强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江泽民也说：“我们要在全党普遍深入持久地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党的干部特别是高中级干部，要努力学习和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紧密联系实际，加强调查研究，深入认识和把握中国国情，认真探讨和解决当代重大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问题。”⁽²⁴⁾建设和改革的实践，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迫切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一个缺乏马克思主义理论素质，不善于运用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解决问题的党员干部，不可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更不可能成为党的合格的领导干部。这些同志政治上不敏感，在重大政治原则问题上有时游移不定，遇到问题或一筹莫展，或拿不定主意，或畏首畏尾，或分不清是非；有的在复杂环境下抓不住根本，打不开局面；有的不善于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等等。这些都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不够有关。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提出，能通过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使广大党员干部坚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信念，不断提高政治素质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使精神力量变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巨大物质力量。”因此加强领导干部的马克思主义学习与教育，势在必行。当然，在新的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与教育，不能默守陈规，死守教条，而必须适应形势发展，进一步解放思想，实现四个方面观念的转变：一是克服只重视学习马列经典著作的传统观念，树立既重视学习马列著作、毛泽东著作，更重视学习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中发展了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即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新观念；二是克服只注重本本的传统观念，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树立向实践学习的新观念；三是克服学习内容靠上面制定、学习计划等上级安排的传统观念，树立围绕服务于“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进行理论学习的新观念；四是克服学习内容的“系统性”和求新求全的传统观念，树立“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新观念。

思考之二：干部理论教育，着眼点应放在“要精要管用”的教育原则上。

邓小平从党的历史经验出发，根据新时期党的干部肩负的历史重任，提出了“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教育原则，丁关根认为“精”就是精髓，“管用”就是理论联系实际。抓住精髓，联系实际学习马列主义，进行干部理论教育，是毛泽东一贯坚持的学习与教育方法，在日常工作中，他要求干部抓住主要矛盾，在不同历史时期规定干部学习马列主义的重点也不一样，强调学习要解决实际问题，这为我们干部理论教育提供了一个重要方法论。

学习马列要精，要管用。首先在学习内容上，要抓住重点学深。马克思主义作为揭示人类社会发规律真理，博大精深，容量很大。如果抓不住重点，就很难学深学透。党的十四大要求党员干部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心内容是学习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当前，就要抓住其重点，“认真学习邓小平同志的战略思想和理论观点，认真学习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科学态度和创造精神。”牢牢把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以更加积极的态度，投身于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之中。其次，在学习对象上，要区分层次学精，要针对不同的教育对象，选择不同的方式，进行教育，因循于老方法、老经验，不分对象特点进行千篇一律的教育，只能助长形式主义的泛滥。再次，在学习方式上，要联系实际学活。理论联系实际，这是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倡导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也是毛泽东干部教育的重要方法。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毛泽东根据当时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即武装斗争、夺取政权，要求党的各级干部“以革命问题为中心”来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今天，我们的中心任务是改革开放、进行经济建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就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现实问题为中心，这是当前干部理论学习与教育的核心。

在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上：一方面，实际是发展变化的，那么，理论联系实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围绕不同的中心任务，就有不同的重点，这就要求必须把马列主义同不断变化的实际相结合，这也就是毛泽东的实事求是。邓小平说：“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搞好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你不抓住四个现代化，不从这个实际出发，就是脱离马克思主义，就是空谈马克思主义。”⁽²⁵⁾学习马列主义如果不是主要地同经济建设、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相结合，不解决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问题，那就是脱离实际，那就是不管用。

另一方面，发展了的实践必须用发展了的理论去指导。理论同实践相结合的过程，既是运用理论、检验理论的过程，又是发展理论、指导实践的过程，僵化的理论是没有生命力的。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就是发展了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这个理在关于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都作出了符合当代中国实际的回答。党的十四大要求党员、干部认真学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并用以武装全体党员干部的头脑，就是用这个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去指导现实。没有探索，就没有创新，我们的事业也就没有生气。我们一定要发扬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和创造活力，在干部理论教育的实践中，大胆探索，突出“管用”，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前进。

思考之三：干部理论教育，落脚点应放在党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世界观改造上。

近几年来，党中央大力强调要加强党员干部的党性锻炼，强调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但有少数干部只是满足于背诵马克思主义的若干词句，并不打算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和指导自己的全部实践；也有少数干部，马克思主义的书读得不少，考试成绩及格甚至优秀，但在工作中，照旧以权谋私、违法乱纪、贪污受贿、道德败坏，甚至有的干部，则把参加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进党校学习，当作“升官”的阶梯，虽然这只是个别现象，但这种状况说明干部理论教育在改造世界观的问题上特别需要进行一番改造。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目的，不仅要指导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而且要用于塑造自己的灵魂。毛泽东曾说过，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既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在学习马克思主义过程中不断改造世界观，并通过改造世界观来促进马克思主义学习，这是毛泽东干部理论教育的一个重要思想。

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不可能自发形成，要靠学习和长期磨炼。首先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当前特别要学习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刻苦钻研马列经典著作和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论著，完整地、准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确立无产阶级立场、观点和方法，寓世界观改造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之中，努力使自己的主观世界马克思主义化。其次，要紧密结合工作和思想实际进行学习教育。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认真总结工作经验和教训，认真解剖自己的思想和言行。从经验教训中找出差距，学会具体、灵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解剖自己的思想言行中，清除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影响，扫除非无产阶级思想污垢，使学习理论的过程，变为提高自己、改造自己的过程。再次，要以增强党性锻炼为核心，严格按照党章、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来规范自己的言行，处处事事时时刻刻不忘自己是一名党的干部，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指导下，真正把自己改造成为具有高度思想觉悟、党性强、作风好的优秀共产主义战士，从而成为党和人民所需要的合格领导干部。

(作者单位：中共安徽省六安地委宣传部)注释

(16)(22)《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77页，第292页，第301页。

(14)《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26页，第526页，第527页，第728页，第533页，第533页。

毛泽东为陕北公学题词，1937年10月23日。

(23)《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27页，第411—412页。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52页。

(11)(12)(15)(17)(18)(19)(20)(21)《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01页，第1096页，第1004页，第802页，第819页，第900页，第790页，第900页，第1094页。

(13)(25)《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20页，第149页。

(24)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继承和发扬毛泽东倡导的艰苦创业、勤俭建国精神

王明哲 梁志刚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实践中养成了艰苦奋斗的作风。这种优良作风是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大力提倡和精心培育起来的。我们党凭借艰苦奋斗战胜了国内外敌人，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新中国建立以后，毛泽东又把艰苦奋斗提高到艰苦创业、勤俭建国的高度，定为一项基本国策，并且身体力行，率先垂范，长期坚持不懈。实践证明，艰苦创业、勤俭建国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人留给我们的传家宝。在纪念毛泽东诞辰 100 周年的时候，我们放眼当前的大好形势和存在的问题，更感到有必要大力提倡和发扬艰苦创业、勤俭建国的精神。

—

毛泽东提倡艰苦奋斗，不仅是一贯的，而且是不断发展的。本世纪 20、30 年代，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农业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以农民为主力军的。为了使红军不重蹈历史上农民起义军的覆辙，毛泽东非常注重以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世界观建设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在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中，他详细列举了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在红军中的表现，坚决反对享乐主义、个人主义，不愿意做艰苦工作建立革命根据地、不耐烦和群众在一起作艰苦斗争而只想打大城市以便大吃大喝一气然后逃跑的流寇思想。1934 年 1 月，在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指出：“财政的支出，应该根据节省的方针，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节省每一个铜板力着战争和革命事业，为着我们的经济建设，是我们的会计制度的原则。我们对于国家收入的使用方法，应该和国民党的方法有严格的区别。”这实际上是艰苦创业、勤俭建国思想的早期形态。而这一光辉思想，不仅成了我党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强大武器，而且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稳定的方针和基本国策之一。

经过长征的千难万苦，在抗日战争时期，艰苦奋斗的思想发展成熟，成为我党领导人民克敌制胜的法宝。40 年代初，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进入极其艰苦的相持阶段，日本侵略者实行野蛮的“三光”政策，加上国民党反共摩擦和经济封锁，抗日根据地军民遇到了严重的困难，“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冬天没有被盖。”在这样的条件下，毛泽东、党中央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实行了精兵简政，号召“自己动手，克服困难”，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我党领导人身先士卒，毛泽东开荒种地、周恩来纺线的佳话一直流传至今。靠艰苦奋斗，根据地军民战胜了严重困难，战胜了强大的敌人。中国革命的胜利来自艰苦奋斗，可贵的延安精神首先是艰苦奋斗精神。在延安，毛泽东经常去抗大讲课，对来自大后方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青年，讲行最多的话题还是艰苦奋斗。艰苦奋斗成了抗大校训，成了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革命胜利以后，靠什么巩固胜利，靠什么保持本色？毛泽东首先想到的是靠艰苦奋斗精神。全国解放前夕，他一再强调“进京赶考”。的确，进城对于我们这支从未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队伍是一个新的严峻考验。毛泽东

重新推荐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勉励共产党人绝不能当李自成。他要求党的高级干部以身作则，作到“几不”，即不做寿、不祝酒、不以活人的名字作地名、活人不上舞台。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告诫全党：“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他特别警告要预防糖弹的攻击，说“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因此，“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两上“务必”总结了历史的经验，突出了我们的政治优势，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永远记取。

在探索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党把毛泽东艰苦创业、勤俭建国的思想作为我们战胜贫穷走向富裕的强大武器，同时作为共产党人保持本色、防腐防变的强大武器，长期坚持，永不动摇，历史证明是必要的、正确的。建国以后，要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一方面要打退国内外敌对势力的进攻，清除革命队伍内部的腐败分子和不良作风；另一方面要大力领导经济建设。50年代毛泽东和党中央领导了“三反”、“五反”和多次增产节约运动。这样，产生于井冈山成熟于延安的艰苦奋斗精神又增加了新的内容。即把勤俭建国作为一条基本国策正式提出来了，日益深入人心。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为内容的“三反”运动和以打退不法资本家进攻为目的，以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为内容的“五反”运动，不仅打退了资产阶级进攻，为二大改造创造了条件，而且是我们党在执政条件下坚决惩治腐败，保持廉政为民本色的第一次成功的实践，刘青山、张子善的被处决，不仅在当时振聋发聩，而且使人们在几十年后仍然记忆犹新。1955年，毛泽东提出“勤俭办工厂，勤俭办商店，勤俭办一切国营事业和合作社事业，勤俭办一切其他事业”的方针，把勤俭的原则，节约的原则提到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原则之一的高度，要几十年长期坚持。在1956年11月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和其后一段时间的多次讲话中毛泽东反复强调要艰苦创业。他说：“要勤俭建国，反对铺张浪费，提倡艰苦朴素，同甘共苦”。“今年这一年，报纸上片面地、不合实际地宣传要改善人民生活，而对勤俭建国，反对铺张浪费，提倡艰苦朴素，同甘共苦这些东西，很少宣传，以后报纸的宣传重点要放在这方面来”。“根本的是我们要提倡艰苦奋斗，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强调艰苦奋斗是一个要坚持几十年的长期方针，他说：“要使全体干部和全体人民经常想到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但又是一个经济落后的穷国，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其中包括执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样一个勤俭建国的方针”。同年3月，他在南京党员干部会议上说：“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毛泽东的这些话，不仅在当时意义重大，时隔几十年，今天读来依然发人深省。

毛泽东不仅是艰苦奋斗的提倡者，而且是艰苦创业、勤俭建国当之无愧的楷模。他一生艰苦朴素，在世界大国的领导人中，是奉献最多，享受最少的典范。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他殚精竭虑，夙夜在公，吃的是粗茶淡饭，穿的是打了补丁的衬衣；他严格要求自己的子女，不许他们有一点特殊；他是劳动人民的领袖，又是劳动人民的儿子，他永远是普通劳动者的一

员。所以，全国人民永远怀念他。

二

诚然，由于党在一个时期指导思想的失误，从 50 年代后期开始，“左”的思想逐渐抬头，终于造成后来的十年内乱。在此期间，如同许多正确的东西被推向极端，造成曲解一样，“艰苦奋斗”作为一种精神，一种传统，也有同样的遭遇。那时候，精神的作用被夸大到不适当的程度，艰苦奋斗被曲解为不顾客观条件的蛮干，被曲解为穷过渡，甚至越穷越革命。物质利益原则和按劳分配被否定，社会主义被理解为普遍贫穷。作为问题的另一面，艰苦奋斗作风被败坏了，少数干部搞特殊化，严重脱离群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对艰苦奋斗的种种曲解也得到纠正。毛泽东长期提倡的艰苦奋斗作风，在 1981 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得到充分肯定。对我们党的这一优良传统全面继承并赋予了新的时代内容的是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

邓小平从革命战争年代起，就一贯提倡艰苦奋斗并在工作实践中身体力行。在《邓小平文选》里，《太行区的经济建设》(1943 年)、《克服目前西南党内的不良倾向》(1950)和《在全国财政厅局长会议上的报告和总结》(1954 年)就是突出的例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著名科学论断，同时力主恢复和发扬艰苦创业的传统。他坚决反对“穷社会主义”的反动观点，同时坚决反对不合国情的“福利国家”的错误主张。1979 年 11 月，他严肃批评了少数干部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的倾向。他说“我们必须恢复和发扬党的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并主张《关于高级干部生活的若干规定》，必须当法律一样坚决执行。1980 年 1 月，他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说，“要有一股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中国搞四个现代化，要老老实实地艰苦创业。我们穷，底子薄，教育、科学、文化都落后，这就决定了我们还要有一个艰苦奋斗的过程。”“林彪、‘四人帮’，提倡什么穷社会主义、穷过渡、穷革命，我们反对那些荒谬反动的观点。但是，我们也反对要在中国实现所谓福利国家的观点，因为这不可能。我们只能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生活。发展生产，而不改善生活，是不对的；同样，不发展生产，要改善生活，也是不对的，而且是不可能的。”

1982 年 5 月，邓小平在同外宾谈到我国的开放政策时强调：“必须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争取外援，主要依靠自己艰苦奋斗。”1989 年他又多次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和全国人民，“应该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坚持这个传统，才能抗住腐败现象。”邓小平的这些话，明白无误地指出艰苦创业是我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要途径，这是对毛泽东艰苦创业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我们在学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时候，切不可忽视了艰苦创业这一重要思想的指导意义。

有人说，艰苦奋斗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军事共产主义分配制度的产物，认为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再需要艰苦奋斗了。持这种观点的人没有看到，我党 70 多年的历史就是一部艰苦奋斗的历史，改革开放 15 年的历史，同样是一部艰苦创业的历史。因为，艰苦创业是我国的国情决定的：我们的国家大、人口多、底子薄，经济文化落后，人均资源占有率不高，而且发展很不平衡。要成为世界强国必须经过几代人长期不懈的努力。即使将来真正

富强了，艰苦创业依然是必要的。艰苦创业是我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党在新时期的中心任务是发展和提高生产力。艰苦创业、勤俭建国是发展生产力，提高生产力的必要条件，离开艰苦创业，便无法发展和提高社会主义生产力。我们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 100 年不动摇，不言而喻，艰苦创业精神也要坚持 100 年不动摇。

三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十分重视毛泽东、邓小平关于艰苦创业、勤俭建国的思想。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说：“我国底子薄，目前处在实现现代化的创业阶段，需要有更多的资金用于建设，一定要继续发扬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优良传统，提倡崇尚节约的社会风气。”李鹏在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指出：“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只有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经过几代人的埋头苦干，才能彻底改变经济落后面貌，使全国人民都过上富裕生活。”他号召“要深入持久地开展增产节约、增收节支活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综合国力有了很大的增强，生产力有了很大的发展，广大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我们有些地区还相当困难，还有几千万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要根本改变这种状况，仍需几代人继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改革，艰苦创业，对此，必须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我们还要和全国人民一起同甘共苦，艰苦奋斗。这是一个 60 多年前提出的老话题，尽管我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我们今天仍要同小生产者的短视和剥削阶级价值观念作长期不懈的斗争，坚持用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我们的干部和群众。因为这是关系到我们事业兴衰成败的根本问题。

要提倡艰苦创业，必须坚持反腐败斗争。少数公职人员经不起改革开放、发展商品经济的考验，贪污受贿，营私舞弊，大搞权钱交易，甚至打着改革的旗号搞腐败，既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又损害了改革的声誉；行业不正之风愈演愈烈，乱收费、乱摊派，甚至有的人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此外还有许多铺张浪费等等，虽然党和政府三令五申，仍然是屡禁不止，甚至有上政策，下有对策。所有这些已经引起广大群众的强烈不满。据报刊统计，去年全国吃喝旅游花掉的公款已突破千亿元，全国大中型饭店、酒家、宾馆的百分之六十点八营业额来自公款请客招待。每年全国用于吃喝旅游的公款可以开两次奥运会。而各行各业的各种浪费更加惊人。如此严重的问题不解决，党和政府的威信就树立不起来，艰苦创业就是一句空话。要解决腐败问题，当然不能再用过搞运动的办法。但必须充分发动群众，加强群众的监督作用，加强舆论导向，改进各种宣传教育工作。与此同时，一要靠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带头吃苦，保持奋发向上、艰苦创业的精神状态，以自身的模范行动向人民群众宣传党的宗旨，同腐败现象作坚决斗争；二要靠加速各种立法，以各种政策法律、法令规范来约束人们的行为，逐步树立起遵纪守法、靠正当劳动致富和廉洁奉公的道德观念；三要靠严肃法纪，严厉惩治腐败分子，震慑腐败行为，教育和挽救一批干部，非如此不足以杀住歪风，弘扬正气。

要提倡艰苦创业，必须旗帜鲜明地宣传共产主义人生观和价值观，坚决反对拜金主义、利己主义、享乐主义，抵制资产阶级人生观、价值观。要从

幼儿园和小学教育做起；一切宣传教育机关都要认真抓，长期坚持下去，100年不动摇。现在社会上崇尚所谓大款、大腕、大亨敛财挥金的心理抬头，追求豪华攀比高档，大操大办、大吃大喝、大吹大擂，奢靡之风日盛，高级消费一派繁荣。吃顿饭、点支歌、买条狗，动辄成千累万元，与我国的国情极不相称，的确是不祥之兆。唐代诗人李商隐说得好，“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¹¹⁾极少数亿万富豪纸醉金迷，助长了“一切向钱看”的社会风气。对于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要进行教育引导，发挥他们在共同致富中的带头、示范作用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制定和完善政策法规，防止少数人以非法手段大量攫取社会财富，同时加强税收工作，把他们的一部分高收入通过税收转化为重点建设资金和教育、公益事业基金。宣传舆论界要担负起舆论监督的崇高责任，切不可推波助澜，鼓励盲目攀比心理，要以正确的宣传导向帮助人们认识金钱的地位和作用，特别是帮助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要提倡艰苦创业，必须坚决反对铺张浪费，树立效益观念。当前，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猛，低水平重复建设严重，投资效益下降，结构也不合理。盲目上项目，乱铺摊子，违反国家产业政策，不顾客观条件，到处圈地搞开发区，在写字楼、渡假村、高级住宅过剩的情况下，仍在重复建设。还有的地区大搞地方保护主义，纵容包批伪劣产品，坑害消费者，造成原材料、能源、运力的巨大浪费。国家要加强宏观控制，运用经济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法律手段，清理在建项目，该停缓的坚决停缓以保证重点。严厉打击假冒伪劣产品，清除其保护伞。同时要加快投资体制的改革步伐，实现投资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迫使投资决策者以较少的投入追求较大的产出。

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我们正在从事的事业是极其光荣伟大的，越是如此就越是离不开毛泽东、邓小平亲自培养的艰苦创业、勤俭建国的精神。优良传统不是凝固的雕塑，而是奔腾的江河，其生命力在于不断汇入时代的内容。今天，如果把这种精神简单地理解为穿草鞋、吃忆苦饭，那是无知。在今天，艰苦奋斗是顽强拼搏的革命精神与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的有机结合，是一心为公的奉献精神与讲求效益经济思想的有机结合，是倡俭崇实的工作作风与勇于创新不断开拓进取的有机结合。在这方面，南京路上好八连、当代愚公李双良以及许许多多艰苦创业的开拓者和建设者，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他们是新时代的英雄豪杰。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正涌现出越来越多的好八连和李双良以及艰苦创业的开拓者和建设者。他们是耸入云霄的高山！相形之下，那些腰缠万贯专为自己的款爷们只是一抔黄土。

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高度重视，加倍珍惜伟大导师毛泽东留给我们的艰苦创业、勤俭建国这个传家宝，把它一代一代传下去，并不断发扬光大。它必将为我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走到世界前列提供强大的动力。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必能克能一切不良的东西，而领导中国人民从胜利走向新的更加伟大的胜利。

(作者单位：中央档案馆)

注释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34页。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558页，第796页，第800—801页。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38—1439页。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89—191页，第221—222页，第361页。《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0页。(11)《李商隐诗选》第43页。

论毛泽东的廉政思想及其实践

靳士信

建立廉洁政府，厉行廉洁政治，是中国共产党对全体党员和干部的基本要求，也是党的思想建设和政权建设的基本方针。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代表，为此而进行了毕生的奋斗和探索。他的廉政思想及其实践活动是留给我们的一笔丰厚的精神财富，在今天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认真地研究并很好地继承它，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尤其是对目前和今后的反腐倡廉斗争有十分重要的借鉴作用。

一、毛泽东廉政思想的内涵

毛泽东廉政思想的内涵十分丰富，它包括政府工作人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勤俭节约、艰苦奋斗，反对贪污和浪费，用民主制度保证廉政，加强执政党党风建设和防腐防变以及精兵简政、勤俭建国等内容。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4个方面。

（一）关于政府工作人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毛泽东认为，为人民服务 and 为政清廉是辩证的统一，要做好人民的勤务员，就要在政治上保持廉洁作风，而只有坚持廉洁政治，才能真正做到为人民服务。他指出：“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它的党员应该站在民众之中，而决不应该站在民众之上。”他还说：“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他在1944年作了著名的《为人民服务》的讲演，号召全体党员和干部向张思德学习，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和生死观。新生的人民政权在全国建立以后，毛泽东更进一步坚持和发展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工作人员提出了更为明确的要求。他多次强调指出：“我们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国家机关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为人民服务。”他把是否为人民服务作为衡量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称职与否的标准和行为规范。

关于政府工作人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是毛泽东廉政思想的基础和核心，它是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新型人民政权性质的科学总结、提炼和升华。它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各级人民政府是广大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其宗旨只能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决不允许利用人民所给予的权力谋求任何私利。因此，以权谋私、贪污浪费等腐败行为都是与此所格格不入的。相反，为政清廉、廉洁奉公才是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政权应具备的本质特征。正是在毛泽东这一科学思想指导下，我们党才形成了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建立了一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军队，成立了一个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人民共和国，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英模人物。

（二）关于勤俭节约、艰苦奋斗和反对贪污浪费的思想

在毛泽东的廉政思想中，有关勤俭节约、艰苦奋斗和反对贪污浪费的论述最多，这是他一生部始终强调的问题，从而形成了他的廉政思想体系的主要内容。其论述之深刻，见解之精辟，至今还有使人振聋发聩的作用。

毛泽东亲眼目睹过中国封建社会行将没落时的种种丑恶和腐朽现象，也亲身感受过国统区“贪污遍地，特务横行，捐税繁重，物价高涨，经济破产，百业萧条”的黑暗与腐败。他曾在《向国尺党的十点要求》中愤怒指出：“抗战以来，有发国难财至一万万元之多者，有讨小老婆至八九个之多者。举凡兵役也，公债也，经济之统制也，灾民难民之救济也，无不成为贪官污吏者借以发财之机会。国家有此一群虎狼，无怪乎国事不可收拾。”他大声疾呼：“为挽救国家崩溃之危机起见，亟宜断行有效办法，彻底取缔一切贪官污吏。”由于他对旧社会的种种腐败现象深恶痛绝，所以他决心要“铲除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府。”在如何厉行廉洁政治，勤俭节约，反对贪污问题上，毛泽东有许多深刻论述。

他从党的宗旨和人民政权的性质出发，要求历届人民政权及其工作人员廉洁奉公，坚决反对贪污和浪费。在1934年1月召开的全国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强调指出：“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反对贪污和浪费的斗争，过去有了些成绩，以后还应用力。”

在以他为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41年5月1日批准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规定：“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在建国初期由毛泽东亲自主持起草的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中，更进一步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国家机关，必须厉行廉洁的、朴素的、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工作作风，严惩贪污，禁止浪费，反对脱离人民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

他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提倡勤俭建国，厉行节约。在革命战争年代，当根据地的财政十分困难的时候，毛泽东指出：“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为着我们的经济建设。”建国之初，在经济形势比较严峻的情况下，毛泽东告诫全党和全国人民：“我们要进行大规模的建设，但是我国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这是一个矛盾。全面地持久地厉行节约，就是解决这个矛盾的一个方法。”当国民经济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以后，毛泽东仍然认为：“要提倡勤俭持家，勤俭办社，勤俭建国。我们的国家一要勤，二要俭，不要懒，不要豪华。懒则衰，就不好。”⁽¹¹⁾因为“我们的国家现在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并且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根本改变这种状态，全靠青年和全体人民在几十年时间内，团结奋斗，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一个富强的国家。”⁽¹²⁾毛泽东之所以一再强调勤俭建国、厉行节约，是因为他对中国“一穷二白”的国情有深刻的了解，同时还因为“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¹³⁾

他从党的最终奋斗目标出发，号召全体党员和干部永远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实现共产主义是党的最终奋斗目标。对共产党员来说，只有坚定了共产主义信念，才能焕发出高度革命热情，脚踏实地，艰苦奋斗，朝着党指引的目标不断前进。毛泽东从这一观点出发，针对革命在全国胜利后一部分同志斗志衰退、追逐名利的现象，反复强调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革命精神的重要性。1949年10月26日，他在《给延安及陕甘宁边区同志们的复电》中希望：“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¹⁴⁾1957年3月间，他分别在济南、南京党员干部会上的讲话中尖锐地指出：“因为革命胜利了，有一部分同志，革命意志有些衰退，革命热情有些不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少了，过去跟敌人打仗时的那种拚命精神少了，而闹地位、闹名誉，讲究吃，讲究穿，比薪水高低，争名夺利，这些东西多起来了。”“我们要保持

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¹⁵⁾勤俭节约，艰苦奋斗，反对贪污和浪费，是我们党的政治本色和优良传统。我们党在每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中所培育的诸如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穷棒子”精神、大庆精神等，就是共产党人艰苦奋斗、为人民无私奉献精神的具体体现。依靠这些精神，党领导人民群众战胜了强大的敌人，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依靠这些精神，党领导人民群众战胜了各种困难，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

(三)关于用民主制度保证廉政的思想

在长期领导廉政建设的实践中，毛泽东认为，不受监督的政权，势必会导致腐败。要彻底克服政府被少数人“所得而私”的现象，真正做到政治廉洁，只强调党员、官员克服利己之心，破除利己之念是不够的，只依靠揭露、打击和惩处腐败也只是治标不治本。必须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才能为廉政提供有力保证。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就提出，全国各级人民政府应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而且“只有民主集中制的政府，才能充分地发挥一切革命人民的意志，也才能最有力量地去反对革命的敌人。”⁽¹⁶⁾他还强调指出：“‘非少数人所得而私’的精神，必须表现在政府和军队的组成中，如果没有真正的民主制度，就不能达到这个目的，就叫做政体和国体不相适应。”⁽¹⁷⁾因为，“只有这个制度，才既能表现广泛的民主，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高度的权力；又能集中处理国事，使各级政府能集中地处理被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所委托的一切事务，并保障人民的一切必要的民主活动。”⁽¹⁸⁾由于毛泽东认识到只有“民主制度”才能真正解决廉政问题，所以当1945年7月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访问延安，和他谈及历代王朝“其兴也浚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表示对“政怠宦成”、“人亡政息”的担忧，并希望中共能找到新路、跳出这周期率时，毛泽东胸有成竹地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¹⁹⁾我们党所创建的中华苏维埃政权、抗日民主政权以及建国后实行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正是党在不同历史阶段对民主政治的实践，也是毛泽东用民主制度保证廉政思想的运用和发展。它为反腐倡廉斗争提供了有力的保证，是我们党和政府廉政建设的重要经验。

(四)关于加强执政党党风建设和反腐防变的思想

党风问题关系到执政党的生死存亡，关系到它所领导的人民政权的性质问题。因此，毛泽东历来十分重视党风建设，并注意把党风建设与廉政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他认为廉政建设是党风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否廉洁奉公是衡量党员道德素质高低的重要标准。早在1929年12月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案”中，毛泽东就把有关廉洁奉公的内容写进了党员的五项条件，并规定凡有政治观念错误、吸食鸦片、发洋财及赌博之行为而屡戒不改者，不论是否干部一律清除出党。后来他还多次强调：“必须保证共产党员在政权中占领导地位，因此，必须使占三分之一的共产党员在质量上具有优越的条件。”⁽²⁰⁾号召“共产党员在政府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²¹⁾要求“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指出：“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

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²²⁾为了使党永远保持谦虚谨慎的优良作风，毛泽东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吸取历史教训，戒骄戒躁。在中国历史上，历代王朝的衰亡基本上都是由于它的首领们居功自傲，生活腐化，不思进取而导致的。最为典型的便是明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入京一年时间就由于这些原因而陷于失败。1944年，为纪念李自成领导的起义军推翻明王朝300周年，郭沫若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了著名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对其失败的原因和教训进行了深刻的总结。毛泽东指示将该文在延安《解放日报》上转载，并要求各解放区印成单行本，让大家作为整风文件认真学习，以使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²³⁾1949年3月，全国解放在即，中国革命的胜利已成定局，毛泽东清醒地估计了民主革命胜利后的国内外阶级斗争的新形势，敏锐地预示了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将成为无产阶级的主要危险。因此，他及时告诫全党：“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中国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²⁴⁾

毛泽东关于执政党党风建设和反腐防变的论述，是他廉政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他对马克思主义政党作风建设理论的丰富与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三大作风的理论基础。今天重温毛泽东在几十年前的这些教诲，他严肃的神态如在眼前，亲切的声音犹在耳际，促人警醒，发人深思。

二、毛泽东廉政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毛泽东的廉政思想是实践的产物，是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廉政建设实践的科学总结。它是随着我党领导下的历届人民政权的建立、发展而逐步形成和发展的，这如同他的军事思想是随着中国革命战争的进展而逐步形成和发展的一样。笔者认为，毛泽东廉政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基本经历了3个阶段：

（一）瑞金时期——毛泽东廉政思想的萌芽阶段

1931年11月7日，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宣布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担任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新型的革命政权诞生以后，以崭新的姿态和风貌出现在中华古老的土地上，它与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和国民党的腐败作风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使中国人民耳目一新，为之振奋。但由于几千年封建剥削阶级思想的影响，革命政权内部也不可避免地逐渐产生了一些贪污、浪费等腐败现象。在如何遏制和惩处贪污腐败、建立廉洁政府问题上，毛泽东开始了积极地思考和探索，他的廉政思想由此萌芽，其主要标志是：

（1）1933年2月，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民主政府主席身份签发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并指出：如发现苏维埃工作人员中

有贪污腐化、消极怠工及官僚主义分子，民众应立即揭发，苏维埃政府应立即惩办，决不姑息。这个训令是毛泽东试图用制度和纪律保证、监督廉政的初步尝试。

(2)在瑞金期间，毛泽东还亲自领导了苏区的反贪污腐败斗争，查处了熊仙壁贪污腐化等案件，清除了一些腐化变质分子，表明了他在廉政问题上的坚决态度和严正立场。

(3)1934年1月，毛泽东撰写了《我们的经济政策》和《关于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两文，从理论上对廉政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和论述，提出了“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的著名论断以及“人民政府必须关心群众生活并为群众谋利益”等思想和观点。

(二)延安时期——毛泽东廉政思想的形成阶段

1937年9月，根据国共两党协议，中共中央决定正式成立陕甘宁边区政府，首府设在延安。在此后的10余年间，陕甘宁边区是中国革命的总后方，边区政府成为我党领导人民民主政权建设的“试验田”。由于这一时期基本处于相对稳定的环境中，所以毛泽东能在这里集中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进程中的一系列问题。他的廉政思想也在这个时期逐步得以形成，其主要标志是：

(1)在政府的廉政制度建设上，毛泽东开始了进一步探索，从而形成了一整套比较完备的民主制度。在他的亲自主持下，先后制定了《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等纲领性文件和法规以及“普选制”、“三三制”等民主制度，在这些文件、法规和制度中，对廉政问题都作了明确而严格的规定，如《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的第十一条和《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的第八条都是专门针对廉政问题而制定的。由于边区政府实行廉洁政治，所以边区民主空气浓厚，人民革命和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到处充满着奋发有为、积极进步的盎然生机，它和国民党统治区萎靡颓废的情景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利用抗战发国难财，官吏即商人，贪污成风，廉耻扫地，这是国民党区域的特色之一。艰苦奋斗，以身作则，工作之外，还要生产，奖励廉洁，禁绝贪污，这是中国解放区的特色之一。”⁽²⁵⁾正因为如此，陕甘宁边区代表着中国的前途和希望，它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有志青年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汇集到了宝塔山下。

(2)为了加强党风建设和廉政建设，毛泽东还亲自处理过黄克功逼婚杀人等案件，发动并领导了以延安为中心的整党整风运动，克服了党内严重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抵制了人们从国统区带来的一些腐朽生活方式和腐化作风，从而保证了党的思想和组织的纯洁性，也保证了边区政治的清明廉洁。

(3)毛泽东在理论上对廉政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论述，从而形成了他的廉政思想的科学体系。毛泽东在延安撰写了大量的马列主义著作，其中许多都论及廉政问题，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新民主主义论》、《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为人民服务》、《论联合政府》等文中，毛泽东比较系统地阐述和论证了“政府工作人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厉行节约、反对贪污浪费”、“共产党员在政府工作中应是廉洁奉公的模范”以及“精兵简政”、“用民主制度保证廉政”等观点和思想，从而比较完整地形成了他的廉政思想的科学体系。

(三)建国前后——毛泽东廉政思想的成熟与发展阶段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在全国取得最后胜利的前夕，在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在全国执政的严峻考验面前，毛泽东对廉政问题进行了更深刻的思考，在理论上也进行了更深层次的论述，使他的廉政思想得到了成熟与发展。其主要标志是：

(1)在理论上毛泽东提出了反腐防变的思想。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报告。在《报告》最后一部分，毛泽东高屋建瓴地系统阐述了关于加强执政党党风建设和反腐防变的思想，号召全党要克服骄傲情绪，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永远保持谦虚谨慎和艰苦奋斗的作风。他科学预测了无产阶级执政后所面临的主要危险，深刻论述了克服这些危险的方法，揭示了反腐防变的深远意义，为全党加强党风建设和廉政建设指明了方向。建国初期，他撰写了许多文章、书信论述廉政问题，使他的廉政思想得到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2)在廉政制度建设上，毛泽东开始了全面探索。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明确规定：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制止一切歌功颂德现象。建国之初，毛泽东亲自主持起草了《共同纲领》，在其中的第18条，明确规定要“严惩贪污”，这就把廉政制度用法律的形式写进了新中国的临时宪法中，1952年4月1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14次会议批准并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该《条例》对贪污腐化、行贿受贿等罪行，根据不同情况，分别规定了明确的处理办法。以上这些规定、法律条文以及条例，对反腐倡廉斗争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保证作用。在以后的实践中，毛泽东虽然过多地强调用群众运动的办法解决廉政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制度建设，但他在建国前后所进行的这些探索，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它为我们党后来制定一系列关于廉政方面的政策、条例和法规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依据。

(3)毛泽东的廉政思想在实践中得到了充分地运用和发展。建国之初，毛泽东高度重视党风建设和廉政建设，他发动并领导了大规模的全党全军整风运动、整党运动和“三反”、“五反”运动以及禁烟禁毒和取缔卖淫、赌博等全国性的群众运动，使旧中国的种种污泥浊水在短短几年间便被荡涤干净，新中国的政治面貌和社会风气焕然一新。

实践证明，毛泽东的廉政思想是对我们党几十年廉政建设实践的科学总结，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对我们党目前所进行的反腐倡廉斗争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

三、毛泽东是全党廉洁奉公、反腐倡廉的光辉典范

毛泽东毕生为民族求解放，为人民谋幸福，他个人不仅勤俭朴素，廉洁奉公，对自己的亲属故友严格要求，而且对全党的反腐倡廉斗争常抓不懈，堪为全民楷模，全党典范。他的廉政实践活动十分丰富，在这方面感人至深的事例不胜枚举，本文不可能尽述，概其要者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身体力行，率先垂范

毛泽东一生对自己的要求都非常严格。无论在生活艰苦的战争年代，还是在解放后颇有条件享受的情况下，他在生活上从不搞特殊化，并非常注意用自己廉洁奉公的模范行为影响和教育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在他去世已

经 10 余年的今天，国内仍不断掀起“毛泽东热”，人们用各种形式来表达他们对毛泽东的无限敬仰之情，这除了因为他对中华民族的巨大贡献以外，他廉政为民的优秀品质和崇高无私的伟大人格力量也是主要原因之一。

早在井冈山时期，身为红四军政治委员的毛泽东和红军战士一起吃红米饭和南瓜汤，都是每天五分钱的“伙食尾子”；在长征路上，他患有足疾，但经常把配给自己的担架和军马让给伤病员，在“高原寒、炊断粮”的情况下，他同样和战士一起忍冻挨饿；三年困难时期，他常常“几月不知肉滋味”同全国人民一起勒紧裤带，共度难关。

毛泽东以天下为己任，轻名淡利，反对一切特权思想，尤其反感突出个人、脱离群众的做法。据在他身边工作过的同志回忆：解放初的一天，中央机关的行政处长拿来一份图纸，要给毛泽东翻修房屋，他当即予以严厉批评：“全国人民捐钱捐物支援前线，你为什么就不想想前线只想到我的房子？我在这里多点一盏灯都舍不得，你就敢花那么多钱？”⁽²⁶⁾1950 年 5 月 20 日，沈阳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决定在市中心修建一座开国纪念塔，并拟在塔上铸毛泽东铜像。为此市政府致函中央新闻摄影局，请求代摄毛泽东全身像。毛泽东在来函“修建开国纪念塔”旁批：“这是可以的”；在“铸毛泽东铜像”旁批“只有讽刺意义”；并在新闻摄影局的公函上正式批复“铸铜像影响不好，故不应铸。”⁽²⁷⁾1950 年 9 月 20 日，毛泽东得知要在他的家乡建别墅、修公路的事后，立即给湖南省党政负责同志写信说：“据说长沙地委和湘潭县委现正在进行在我的家乡建筑一所房屋并修一条公路通我的家乡。如果属实，请令他们立即停止，一概不要修建，以免在人民中引起不良影响。是为至要。”⁽²⁸⁾毛泽东投身革命几十年，领导过世界上最大的国家、最大的政党和最多的人口，但他却没有留下任何家产。他留给人民和子孙后代的是为人民无私奉献的精神、廉洁奉公的公仆形象和“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无产阶级领袖气派。这是一笔最为宝贵的精神遗产，值得我们今天的共产党人很好继承并使之发扬光大。

(一)严格要求亲属故友做人民的公仆

作为党和人民的领袖，毛泽东对封建社会那种“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及“封妻荫子”等腐朽做法十分厌恶，一直要求亲属故友真正做人民的公仆，不允许他们利用自己的权力和地位谋取任何私利。

他对子女严格要求，勤加教诲。当年毛岸英从苏联回到延安后不久，毛泽东便送他到杨家岭拜劳动模范为师，去中国的“农业大学”接受再教育，要求他深刻了解劳动人民的疾苦，以使他真正成为劳动人民的一员；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他又毅然将毛岸英送往朝鲜前线，仅仅一年后，毛岸英将自己年轻的生命献给了朝鲜人民的解放事业。李讷是毛泽东的小女儿，生于陕北，从小受过不少苦。三年困难时期她正上学，却连饭也吃不饱，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建议让她回家吃饭，毛泽东坚持说“我是国家干部，国家按规定给我一定待遇。她是学生按规定不该享受就不能享受。还是各守本份的好，我和我的孩子都不能搞特殊。”⁽²⁹⁾

他对亲戚朋友严格要求，公私分明，从不用自己的职权给他们办私事。解放初，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欲进京工作。毛泽东得知后给时任湖南省委第一副书记的王首道去信说：“杨开智等不要来京，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适当工作，任何无理要求不应允许。”同时还在转杨开智的信中说：“希望在湘听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湖南

省委派你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不要使政府为难。”⁽³⁰⁾1950年5月，毛泽覃夫人周文楠的儿子周起鹗曾去信给毛泽东，要求调换工作，毛泽东去信说：“先生仍以在现地工作为好，虽不适意，犹胜于失职(业)者，尚希安心从事，然后徐图改进。”⁽³¹⁾毛泽东深知他的权力是人民给的，作为党和人民的领袖，应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所以他绝不利用权力谋取任何个人私利，不搞政治上、生活上的特殊化。这正是他所倡导的“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党的领袖应该有的性格和作风。”

(三)领导全党同一切贪污腐败行为作坚决的斗争

毛泽东历来主张，同党内和政府内的各种消极现象和腐败行为作斗争要毫不留情，绝不能心慈手软，要坚决把那些违法乱纪、以权谋私和贪污腐化分子从党内和国家政权机关中清除出去，特别是对其中那些位高权重和资深功高者更要严肃对待，从重惩处，以引起全党的警醒和全社会的重视。

早在1934年和1937年，毛泽东就亲自处理过熊仙壁贪污腐化案和黄克功逼婚杀人案，这俩人虽然参加革命很早，对敌斗争也很坚决，但最终还是受到了严厉的制裁。这充分显示了毛泽东在惩治腐败问题上的严正立场和坚强决心，对全党、全军震动很大，教育极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了纠正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改进党风，纯洁组织，毛泽东还亲自发动并领导了三次大规模的整党整风运动，清除了一些腐败分子，收到了良好的教育效果。

建国以后，我们党面临执政的严峻考验，毛泽东把廉政建设更进一步提到议事日程，专心致志地领导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据当年在中央主持“三反”运动常务工作的薄一波回忆：“毛主席当年抓防腐的斗争，真是雷厉风行，至今历历在目。他看准的事情，一旦下决心要抓，就抓得很紧，一抓到底，从不虎头蛇尾，从不走过场。他不仅提出方针，而且亲自督办；不仅提出任务，而且交待办法，在‘三反’紧张的日子里，他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听取汇报，甚至经常坐镇中节委，参加办公会议，亲自指点。”⁽³²⁾为指导“三反”运动，毛泽东批转了大量的报告，写了许多指示、批语和书信(仅收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的就有50件)，认真阅读这些文献，可以看出毛泽东反腐倡廉的巨大决心与魄力。

“三反”运动是我们党执政后自觉抵制和克服资产阶级对党的腐蚀，保持共产党人廉政为民本色的一次成功实践。运动中共查出大小贪污分子及有贪污行为的人120万，其中有900余人因贪污数额巨大或顽固不化而受到法律制裁，被判处极刑者40余人⁽³³⁾。特别是对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的处决，不仅在当时起到振聋发聩、扶正祛邪的良好效果，而且在几十年之后，人们还记忆犹新。它用实际行动向全社会表明，我们党决不会做李自成第二，决不会放任腐败现象蔓延滋长，决不会让成千上万的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江山改变颜色！

在今天新的历史条件下，研究毛泽东的廉政思想及其实践，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保持廉洁朴素的革命本色，对我们党和国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我国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水平低，资源相对有限，教育、科学、文化都比较落后，在这样的条件下，我党只有艰苦奋斗、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励精图治，并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带领全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创业，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这条古训今天仍然值得我们认真记取。我们应很好地继承毛泽东等老一辈无

产阶级革命家廉洁奉公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全党筑起反腐防变的思想堤坝，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推向前进。

(作者单位：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党史研究室)

注释

(18)(23)(25)《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09页，第1096页，第1057页，第948页，第1048页。

(11)(12)(13)(14)(15)《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64—366页，第398—399页，第213页，第386页，第329页，第12页，第419420页。

(24)《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37页，第1438—1439页。

(16)(17)(20)(21)(22)《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42页，第355页，第677页，第677页，第742页，第522页，第522页。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34页。

《陕甘宁边区概述》，第16页。(19)(27)(28)(33)《党的建设七十年纪事》，第204页，第278页，第260页。

(26)(29)《毛泽东的语言艺术》，第144页，第145页。(30)(3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32—33页，第356页。(32)《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回顾》，第142—143页。

略论毛泽东与延安精神

田东阳王平民

延安精神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它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思想体系与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风范相结合而产生的。它的内容丰富、源远流长。人们对其内容的表述方式虽不尽相同，但它包括以下几个主要方面，却是大家公认的事实，即：为崇高革命理想自觉献身的精神；紧密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精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民主、团结的精神；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它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所形成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结晶，是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的继承和发展。毛泽东与延安精神的形成有着最直接的关系，他不仅是延安精神的缔造者，也是延安精神的实践者，是延安精神的杰出代表。

一、毛泽东一贯重视民族精神作用的观点，是他倡导培育延安精神的基础

任何新的先进的民族精神形态的出现，都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必然扎根于传统的民族精神形态之中，既是对传统民族精神的一种继承和发扬，又是对传统精神的一种批判和扬弃，从而超越传统精神，升华为一种新的民族精神形态。而这种进步的民族精神的萌生，总是在一个先进的思想理论指导下进行的。延安精神正是毛泽东在 19 世纪 30 年代后期和 40 年代前期，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的指导下，对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精神文明继承、扬弃、提炼、升华的结果。所以延安精神既有着强烈的时代性，又有着明显的民族特色。

首先，毛泽东从哲学的高度强调了精神力量的巨大作用。在物质和精神的关系上，他既肯定物质的第一性，即“ 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 ”；又十分重视精神对物质的反作用，即“ 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 ”。他把这种规律概括为“ 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 ”。中国革命要取得胜利，中国共产党人不只要运用“ 武器的批判 ”，而且还必须掌握“ 批判的武器 ”，二者缺一不可。正如马克思说的：“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 ”。毛泽东历来十分重视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先进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挖掘民族精神的精华，使之上升为一种富有民族特色的革命精神，作为战胜敌人的精神武器。从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到延安精神的培育和发扬，无不渗透着毛泽东的心血。他一再强调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指出作为无产阶级的政党，“ 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 ” 他认为，中国人民普遍觉醒之日，也就是反动派灭亡之时。

第二，延安精神是毛泽东对中华民族精神的科学总结和升华。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必然是爱国主义者，毛泽东更是如此。他为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传统和灿烂文化而十分自豪地说：“ 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

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所以，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毛泽东热情赞颂了中华民族发达的文明和刻苦耐劳、酷爱自由、富于革命精神的光荣传统。从毛泽东所缔造的延安精神的各个方面，我们都可以看到毛泽东对上述中华民族优秀精神文明挖掘、继承、提炼、改造的痕迹。

第三，毛泽东在孜孜搜寻着中国新人格。延安时期的张思德，解放战争时期的刘胡兰，建国后的雷锋都是毛泽东肯定了的“中国新人格”的典型。而他认为作为中国新人格的最完美的典型，当推被誉为“民族魂”的鲁迅先生。1937年10月19日他在陕北公学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大会上，作了《论鲁迅》的著名讲话，肯定了鲁迅先生的政治远见，以及他的斗争精神、牺牲精神。指出“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两句侍：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1937年10月23日毛泽东给陕北公学题词说：“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的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与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地解决”。在这里毛泽东明确地勾画出了自己所期望的中国新人格的形象，其目的就是要造就一大批使中华民族崛起的新人，使其成为中华民族的解放斗争的脊梁。

第四，毛泽东对共产党员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成员，不是一般的老百姓，因此毛泽东对其有更高的要求，指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又说：“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毛泽东认为，广大党员的带头作用将对一种新的革命精神的形成起十分巨大的推动作用。

综上所述，毛泽东从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立场出发，结合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实，站在哲学的高度，以大文化的视野努力地探索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渊薮，深刻地总结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科学地提出了理想人格的标准，为延安精神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和文化基础。

二、毛泽东是延安精神的倡导者、培育者

延安精神的形成，是毛泽东在先进认识论的基础上，在领导中国革命的

实践中，精心地培育和敏锐地捕捉了广大革命干部和人民群众中闪烁着时代光芒的精神火花，并且从理论上及时、认真、系统、科学地予以总结。延安精神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的事，其内涵博大而精深。从抗日战争开始到抗战胜利为止，前后 8 年时间，是延安精神从孕育到逐步形成以至自成体系的时期，期间它的方方面面无不体现着毛泽东苦心孤诣的惨淡经营，浸透着他无量的心血。

“抗大精神”：即为崇高理想英勇奋斗的精神，这是毛泽东构建的延安精神的主线与灵魂。为了给抗日战争造就一大批杰出人才，延安时期，我们党曾先后创办了 20 多所院校，而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以下简称“抗大”)是其突出代表。毛泽东把办好抗大作为具有战略意义的大事来抓。1938 年 3 月。他为抗大亲笔题词，规定了“抗大的教育方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¹¹⁾对此，他又作了深刻的阐发，指出：“共产党历来更提倡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这种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与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不能脱离的，没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就不能激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没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也就不能执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¹²⁾要求人民军队的干部，在军事政治斗争中，要善于依据敌我具体情况的变化，采取与敌人斗争的各种不同的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毛泽东还运用了我国古典小说《西游记》中人物作比喻，充分肯定了唐僧去西天取经的坚定意志，猪八戒的吃苦精神，孙猴子的机动灵活性以及唐僧那匹小白马任劳任怨、朴素、踏实的作风。从而生动地说明了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毛泽东的这些理论，为抗大建设指明了方向。而“抗大精神”既体现了科学的共产主义社会方向，又体现了为共产主义的实现而献身的精神，以及这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精神。

延安整风精神：它包括言之有理的科学精神和行之有效的务实精神，即理论联系实际，言行一致的实事求是精神。这是延安精神的思想理论基础和重要内容。毛泽东亲自领导了从 1941 年 5 月开始到 1944 年 4 月结束的历时 3 年的延安整风运动，其主旨是整顿“三风”：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其中主要是反对主观主义，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全党，宣传学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树立实事求是的权威。实事求是毛泽东借用中国原指治学态度的一句古语，对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基本要求的通俗表述。他说：“‘实’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¹³⁾这里毛泽东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角度，精辟地表达了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毛泽东“实事求是”的光辉思想贯穿于延安整风的全过程中，使共产党人在整风中实事求是地修正了错误，实事求是地整顿了“三风”，实事求是地兴起了调查研究之风。从而使延安时期成为我党历史上最光辉的时期之一。

南泥湾精神：即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主体精神和创造精神。这是毛泽东注入延安精神的根本特色。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特别是 1941 年和 1942 年，日本帝国主义集中其侵华的主要军事力量打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惨绝人寰的“三光”政策；国民党则一次又一次地搞反共摩擦，掀起反共高潮，从 1940 年冬天起完全断绝了我党我军的抗日经费，对陕甘宁边区进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使陕甘宁边区“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

冬天没有被盖。”⁽¹⁴⁾面对如此严重的困难，为了坚持持久战，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了著名的大生产运动。1939年2月，毛泽东在延安生产动员会上尖锐地指出：在困难面前是“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他还说：“从古以来的人类究竟是怎样生活着的呢？还不是自己动手活下去的吗？为什么我们这些人类子孙连这点聪明都没有呢？……总之我们是确信我们能够解决经济困难的，我们对于在这方面的一切问题的回答就是‘自己动手’四个字。”⁽¹⁵⁾毛泽东又要求：不论党政军民男女老幼全体一律进行伟大的生产运动，增加粮食和日用品，准备同灾荒作斗争，将是继续坚持抗日根据地的物质基础。为了指导这场关系解放区生死存亡的大生产运动，在此期间，毛泽东发表了《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论合作社》以及《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等一系列文章。在毛泽东“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指引下，边区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其中一二〇师三五九旅开垦南泥湾最为典型，全体官兵经过两年奋战，创造了“陕北的好江南”。毛泽东表扬说：“在边区留守兵团各部队中，以三五九旅的生产自给做得比较好些”。他还给旅长王震题词：“有创造精神”。1943年9月，毛泽东视察南泥湾时高兴地说：困难并不是不可征服的怪物，大家动手征服它，它就低头了，大家自力更生，吃的、穿的、用的都有了。目前我们没有外援，假定将来有了外援，也还是以自力更生为主。南泥湾精神充分体现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奋发图强的精神。

延安县精神：即布尔什维克精神(马列主义精神和无产阶级精神)。1941年2月毛泽东对延安县的工作进行了表扬，并对延安县同志的精神进行了全面的阐述。他指出：“延安县同志们精神完全是布尔什维克的精神。他们的态度是积极的，在他们的思想中、行动中，没有丝毫消极态度。他们完全不怕困难，他们象生龙活虎一般能够征服一切困难。……这种精神对于那些一遇困难就唉声叹气的，就缩手缩脚的人们，对于那些办事不认真，得过且过，敷衍了事的人们，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在这种精神下，延安同志们没有一件事不是实事求是的。他们对于他们所领导的延安全县人民群众的情绪、要求及各种具体情况是充分了解的，他们完全和群众打成一片，他们有很好的调查研究工作，因而他们就学会了马克思主义的领导群众的艺术，他们完全没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与党八股”。毛泽东“希望全边区的同志都有延安同志这样的精神，这样的工作态度，这样的和群众打成一片，这样的调查研究工作，因而也学会领导群众克服困难的马克思主义的艺术，使我们的工作无往而不胜利。”⁽¹⁶⁾在这里毛泽东首次提出了延安精神的基本概念。

白求恩精神和张思德精神：即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毫不利己，专利利人的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精神。白求恩和张思德是延安时期知名度相当高的两个模范人物。他们两人都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毛泽东为他们都写了纪念文章。在1939年12月写的《纪念白求恩》一文中，毛泽东称赞这位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以身殉职的加拿大共产党员的牺牲精神、工作热忱、责任心“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的表现，号召“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¹⁷⁾1944年，在追悼因烧炭时炭窑崩塌而壮烈牺牲的张思德的会上，毛泽东作了著名的《为人民服务》的讲演，称“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

还要重的”。白求恩、张思德的共同特点，就是在他们身上都闪烁着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道德精神。毛泽东号召“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¹⁸⁾经毛泽东的表彰和提倡，白求恩和张思德成为延安时期人们学习的两面旗帜，建国以后，更是全国人民家喻户晓的学习榜样，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延安精神这五个主要基本组成部分，经过毛泽东从理论上的系统总结，融合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延安精神就实际形成了。到了1945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对延安精神又作了高度的概括，他说：“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¹⁹⁾延安精神成了中国共产党宝贵的精神财富和克敌制胜的强大精神武器，也使饱经忧患，备受艰苦的中国人民看到了光明、未来和希望。

三、毛泽东是延安精神的身体力行者

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履践笃行，言传身教，以无量的心血，创造培育了延安精神；并以榜样的力量，躬行实践，成为延安精神当之无愧的身体力行者。

毛泽东不仅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倡导者，而且是这一思想的践行家。延安时期，毛泽东在处理党政军民大计的繁忙工作中，总是挤出时间接触群众。在田畔、街头，在杨家岭故居，他经常与群众交谈，询问人民的衣食住行问题；在生产季节，他多次领导中央机关的同志帮助附近农民收割、耕种。即使在转战陕北，戎马倥偬的战斗生活中，也处处关心群众利益，指示身边同志帮助群众生产，组织群众安全撤退与转移。毛泽东坚持与农民交朋友，多次为农民祝寿。他为枣园乡群众拜年的故事，至今还为陕北人民津津乐道。

毛泽东是十分重视人民群众批评意见的光辉典范。1941年6月，安塞一农民对征购公粮过重不满，散布了攻击毛泽东的言论。一些同志对此十分反感，主张抓起来。而毛泽东却从这些言论中看到了问题的实质，提出减轻征粮任务，并派出秧歌队去安塞慰问演出。同年11月，李鼎铭先生提出精兵简政的议案后，毛泽东十分高兴地予以采纳，并把这个主张作为我们党克服当时困难的十大政策之一。

毛泽东是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杰出代表。在其革命生涯中，他一贯重视调查研究，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在延安时期，他先后撰写了《(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关于农村调查》、《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光辉篇章，系统地阐述了调查研究的意义、目的、态度和方法，使我党调查研究理论更加系统完备。在实际工作中，他更是处处注重调查研究，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处理问题。1941年秋，毛泽东在一次农业展览会上会见了劳动模范郝光华，毛泽东问他一些农业生产方面的知识，郝光华一时没回答出。毛泽东就和蔼地将他从别的老农那里了解的情况仔细地告诉郝光华。郝又惊又喜，打心眼里敬佩毛泽东。

毛泽东也是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楷模。延安时期毛泽东省吃俭用，艰苦朴素的故事很多。建国后，作为领导这一伟大时代跨越的胜利者毛泽东，

毫不羡慕封建帝王的一套物质和精神享受，一生过着一个普通人的生活。进京后至 1966 年，他长期住在中南海丰泽园一所简单的四合院里，房内没有豪华的摆设，唯有老式的家具和大量的书籍，四张用了十几年的沙发，绿色灯芯绒的坐垫和靠背早已磨光，木架扶手的油漆已经脱落，盖了 10 多年的毛巾被上层层叠叠的缀满了 60 多块补丁。据说他进城后一直未用过香皂，就连一个空火柴盒也舍不得扔掉，涂上磷硝水继续使用。

毛泽东是带头参加大生产运动的表率。大生产运动时，毛泽东坚持要给自己分一亩开荒地的任务。一些同志考虑到毛泽东日理万机，肩负领导全党的重任，不主张给他分配开荒任务。毛泽东却坚持在自己办公门前划出一亩荒地，他每天在办公疲劳休息时用镢头垦地，结果还多垦了几分地。从以上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延安时期缔造延安精神的毛泽东本人，可以说就是延安精神的化身。至今他之所以还受到中国人民无限的崇敬和深切的怀念，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在他身上更多地闪烁着延安精神的火花。

四、毛泽东论延安精神是革命的“传家宝”

没有自觉的社会革命，社会是永远不会前进的。而这种自觉的社会革命正是在一个正确的思想理论指导和一种进步的精神作用下进行的，否则，任何社会革命也是不会成功的。毛泽东及其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所领导的延安时期，正是延安精神形成并发扬光大的时期，从而使延安时期堪称我党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之一。1935 年 10 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时，兵员不过 3 万，根据地仅存一处，且是方圆不足百里的一小块武装割据区，面临着十分严重的危机。1948 年 3 月，当党中央和毛泽东离开这片黄土地时，前后仅仅 13 年的时间，我们已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人民解放战争已进入战略进攻阶段，人民解放军发展到 200 多万，全国各解放区已连成一片，面积达 200 多万平方公里，统治中国 22 年之久的蒋家王朝的覆灭已成定局。在这一连串伟大胜利面前，毛泽东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度和战略家的眼光，高瞻远瞩，敏锐地看到在革命胜利后保持和发扬延安精神的极端重要性。1949 年 3 月在西柏坡村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尖锐地指出：“夺取这个胜利，已经是不要很久的时间和不要花费很大的气力了；巩固这个胜利，则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要花费很大的力气的事情。……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²⁰⁾会上毛泽东提议：不作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并列。毛泽东的这个提议得到一致拥护，被作为 6 条重要规定。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以后，党中央机关将要离开西柏坡进北平了。他把党中央进驻北平看作是对全党的一次严重考验，语重心长地对身边工作人员说：同志们，我们就要进北平了，我们进北

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平，他们进了北平就变了。我们共产党这是进京赶考，我们不当李自成，我们一定能考上，我们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实现共产主义。要教育战士不要中了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1949年10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诞生不到一个月，毛泽东在给延安的同志们和陕甘宁边区的同胞们的复电中就提出：“我并且希望，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²¹⁾在电影《开国大典》中，有这样一个故事：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仪式后，毛泽东回到家，心情很不平静。毛岸英走来点支烟送给他说：“你应当高兴才是”。毛泽东说：“当然高兴，不过心情从来没有这样沉重”。接着毛泽东谈到心情沉重的原因是他想起了他在延安时期和黄炎培先生的一次谈话。熟悉这段历史的人都知道，毛泽东当时对黄先生说，中国共产党已经找到了一条跳出周期律（指一个国家其兴也浚焉，其亡也忽焉的兴亡现象）的道路，那就是民主。也就是在延安时期形成的那种优良的作风。其“心情沉重”的内涵不是很值得我们的深思吗？

毛泽东强调的“永远保持”的延安精神，成了建国以后共产党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中国共产党正是依靠这种精神力量，战胜了帝国主义的封锁，迅速医治了战争的创伤，恢复了国民经济，并夺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巨大胜利。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无数事实充分证明，毛泽东亲手缔造和亲身实践的延安精神，起到了凝聚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统一步调，经受并战胜各种困难和考验，争取胜利的历史作用。的确是中国人民革命的“传家宝”，它的作用是永恒的。

五、纪念毛泽东，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弘扬延安精神

真正根深的东西，才有希望叶茂，才能经得起风吹雨打，永葆青春。延安精神正是因为根源于中华民族的精神渊薮，又经过了毛泽东的精心培育，所以有着极强的生命力，不管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任何时期，都表现出旺盛生命力。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时期，在目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延安精神有无存在价值呢？回答是肯定的。这是因为，尽管我国已明确宣布了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条道路也初步显示了勃勃生机，经济繁荣了，财富巨增了，人民生活水平也有了明显的提高。这当然是大好事。富，才可以变成强盛、强大，富而致强，富是强的必备条件。但是，如果不积极引导，富，也可掌生出腐化，腐败，甚至腐朽，富而变腐。防腐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永远保持和发扬延安精神。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是一个人口多，底子薄的大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只是刚刚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门槛，还很需要加速资金的积累，还不能对生活水平的提高寄予过高的期望。在这样一个还较落后的东方大国里建设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不发扬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和独立自主、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是根本不可能的。这是其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对人们的思想道德产生严重的冲击，使之发生嬗变。这种嬗变固然会促进人们的观念更新、思想道德进步，又很容易使人们狂热地追求金钱，一切向钱看，金钱至上，进而导致拜金主义思潮泛滥，侵蚀人们的身心，造成社会风气败坏，道德沦丧，精神滑坡。当前这种苗头已有所显现，引起了党中央和全国

人民的高度警惕。遏制这种消极现象的有效手段，就是继续保持和发扬延安精神。这是其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认真加强执政党的廉政建设，是一个关系中国共产党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当前党中央大抓反腐倡廉，就是加强党的廉政建设的有效举措。只有继续保持和发扬延安精神，才能切实搞好廉政建设，促进党风的根本好转。这是其三。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和平环境下，国际敌对势力仍不甘心，继续对我国玩弄“和平演变”的鬼蜮伎俩，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与之配合，妄图改变我们党和国家的性质，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我们只有高举延安精神的伟大旗帜，才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保持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所以大力弘扬延安精神，也是反对和防止“和平演变”的有力举措。这是其四。可见，那种认为延安精神已经过时的论调是毫无道理的，也是十分错误的。邓小平多次指出：“一定要宣传、恢复和发扬延安精神”。江泽民于1989年9月视察延安时强调说：“延安精神没有过时，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艰苦岁月要发扬延安精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离不开延安精神，否则，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很难建成的。”⁽²²⁾不久前在全国人代会期间，江泽民两次讲到，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还处在创业时期，在全党和广大干部群众中，应该积极倡导这样一些现代化建设所要求的创业精神：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积极探索，勇于创新，艰苦奋斗，知难而进，学习外国，自强不息，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同心同德，顾全大局，勤俭节约，清正廉洁，励精图治，无私奉献。他说，这是“八八六十四字赠言”。江泽民的赠言，不正是新形势下的延安精神吗？我们一定要按照邓小平和江泽民的这些指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普遍地倡导和大力地弘扬延安精神。只有这样才能育一代新人，兴一代伟业，也是我们对毛泽东的最好纪念。我们坚信，伟大的延安精神将以其强大的生命力伴随我国人民以巨大的步伐奔向光辉灿烂的明天

(作者单位：中共陕西省渭南地委党史研究室)

注释

上述引文均见《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第383—384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22—623页。

(13)(14)(19)《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94页，第877页，第1096页，第801页，第892页，第1093—1094页。

(17)(18)《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22—623页，第698页，第522页，第659页，第659页。

《人民日报》1981年9月22日第1版。

《延安文艺运动纪盛》(艾克恩编纂)，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第36页。

(11)《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第116页。

(12)《在延安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上的讲话》，见1939年5月10日《新中华报》。

(15)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于1948年编印的《毛泽东选集》下册，第805页。

(16)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于1948年编印的《毛泽东选集》下册，第762—763页。(20)《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38—1439页。

(21)《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2页。

(22)《江泽民在视察陕北革命老区时强调发扬延安精神》，见1989年9

月 15 日《人民日报》。

试论艰苦奋斗的时代意义

张照庆

艰苦奋斗是中华民族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内容。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历史环境中，艰苦奋斗虽然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其内涵是相同的，本质是一样的。这就是知难而进，奋发向上，勇往直前的工作作风；不畏艰险，顽强拼搏，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自强不息，埋头苦干，开拓进取的革命风格；励精图治，克勤克俭，公而忘私的奉献精神。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今天，深刻理解毛泽东关于艰苦奋斗的思想理论，对于强化艰苦奋斗的意识，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振奋艰苦创业的精神，实现党的宏伟目标，仍是颇有裨益的。

一、毛泽东关于艰苦奋斗的思想理论是变革中国社会的精神动力

艰苦奋斗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发展的巨大精神支柱和推动力量。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经历过无数战乱，屡遭严重灾难。但它始终用艰苦奋斗的铁肩铁臂去承受和征服千难万险，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毛泽东曾盛赞中华民族历来有一种艰苦奋斗的作风。他还用“愚公移山”的故事，形象地概括了中华民族的艰苦奋斗精神，并与中国革命实际相联系，号召中国共产党人和各族人民要把它看作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极其优秀的光荣传统，世代继承和发扬。毛泽东从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中汲取了艰苦奋斗这一宝贵的精神财富，并把它置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之中，紧紧围绕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任务，不断地在理论上加以总结和提高，在实践中加以提倡和发展，使之结出硕果。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毛泽东艰苦奋斗思想理论产生和形成的沃壤，是它得以发挥指导威力的环境。而毛泽东又把中华民族艰苦奋斗的优秀传统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使它在空前范围内发挥了巨大作用。

毛泽东是我党积极倡导和推广艰苦奋斗精神的光辉典范。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就肩负起变革旧社会，推翻旧制度的历史重任。但是，由于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凶残，国内反动势力的强大，革命力量的弱小，斗争环境异常艰苦，要取得革命胜利，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领导下的革命人民必须作出艰苦的努力，甚至要付出沉重的代价。毛泽东正视了这种现实，并始终把发扬艰苦奋斗精神作为团结人民，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变革社会的重要法宝。

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初创时期，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对红色根据地实行疯狂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使根据地军民的斗争与生活处于极度困难之中。然而，在根据地里，党和红军内上上下下风雨同舟，同甘共苦，“什么人都是一样苦，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创造了在物质菲薄，战斗频繁的恶劣环境中，红军仍然能维持不敝的人间奇迹。1930年初，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分析批判了党内一些人认为红军力量弱小，革命处于低潮，做艰苦的工作是徒劳的错误观点和怀疑红旗能打多久的悲观失望情绪，统一全党思想，振奋斗争精神，多次挫败敌人的围剿，为以后胜利完成长征任务奠定了思想基础。1935年12月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总结红军在异常困难的情况下取得长征胜利的经验时，进一步讴歌了艰苦奋斗精神，并精辟地指出，“中国共产党，它的领导机关，它的干部，它的党员，

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1939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发扬艰苦奋斗精神。要把现在许多人中间流行的那种自私自利，贪生怕死，贪污腐化，萎靡不振的风气，根本改变过来。“共产党历来更提倡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这种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与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不能脱离的，没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就不能激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没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也就不能执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从而深刻地阐明了发扬艰苦奋斗精神与执行正确政治方向之间的辩证统一、相互促进的内在关系。不久，毛泽东便把艰苦奋斗确定为抗大的教育方针，从理论到制度上成为我党建军的重要原则和造就革命军人不可缺少的条件。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经过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前赴后继英勇奋斗，中国革命的发展趋势逐渐变好，一些人便忽视眼前的困难，盲目乐观起来，针对这种情绪，毛泽东及时指出：“世界上没有直路，要准备走曲折的路，不要贪便宜。”“我们面前困难还多，不可忽视。”1945年12月，为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东北局的指示中一再强调：“建立这种根据地，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必须经过艰苦奋斗”，“必须人人下决心，从事最艰苦的工作。”“干部中一切不经过自己的艰苦奋斗，流血流汗，而靠意外便利，侥幸取胜的心理，必须扫除干净。”从而为我党领导下的东北军民克服主观障碍，夺取解放全东北的胜利打下了牢固的思想基础。新中国诞生前夕，毛泽东科学冷静地分析了当时中国政治经济形势及党内外一些同志的思想变化，在党的七届二次会议上更加明确地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全国解放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了伟大成就，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有了较大改善，毛泽东又多次提醒人们：“我们的总目标，是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1956年11月他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指出：“根本的是我们要提倡艰苦奋斗。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

并且批评当时的报纸上片面地、不合实际地宣传要改善人民生活，而对勤俭建国，反对铺张浪费，提倡艰苦朴素，同甘共苦这些东西，很少宣传。并要求以后报纸的宣传重点要放到这方面来。1957年他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强调：“要使全体干部和全体人民经常想到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但又是一个经济落后的穷国，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其中包括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样一个勤俭建国的方针。”针对一些干部革命意志衰退、骄傲自满、贪图享乐思想滋长的问题，他又明确指示：“要经过整风，把我们党艰苦奋斗的传统好好发扬起来”，“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

毛泽东关于艰苦奋斗的思想理论，不仅展示了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深刻的政治远见和彻底的革命精神，而且体现了他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这一思想理论强化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总结了我党发展壮大的成功经验，武装了中国人民，成为我们改造主观世界和推动中国社会不断发展的精神动力，使我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无处不闪耀着勤劳勇敢、

艰苦奋斗的崭新风貌和灿烂光辉，显示着中华民族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英雄气概和创造精神，展示着中国人民改天换地的光辉业绩和伟大成就。

实践证明，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军民坚持长期艰苦奋斗，才使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成独立自主的新中国，使“一穷二白”的贫困国家走上了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在这种历史性的变革中，在毛泽东关于艰苦奋斗思想理论培育形成的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大庆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等等已经使中华民族艰苦奋斗优秀传统融进了全新的政治内容，成为中华民族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并将继续推动着中国社会向前发展。

二、毛泽东同志关于艰苦奋斗的思想理论是推动我国现代化建设迅速发展的力量源泉

建立在科学态度上的艰苦奋斗，必将推动现代化建设的巨大发展；现代化建设的成果，又为艰苦奋斗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综观人类历史，古今中外的任何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振兴崛起，经济腾飞，兴旺发达，都是在曲折中奋斗、在困难中拼搏、在艰苦中创业所取得的。同时，经济的发展又为艰苦的创业实践创造了更有利的物质条件，增强了艰苦奋斗的积极性和持久性，推动现代化建设向更高层次发展。世界发达国家经过几十年、几百年自强不息的艰苦创业，走上现代化经济强国所创造和总结的人类文明成果和有益的成功经验，充分证明了艰苦奋斗精神在现代化建设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党的十三大根据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制定了我国经济建设分三步走的重大战略目标。党的十四大对今后五年争取国民经济再上一个新台阶做出了具体布置和规划，即要使国民经济以平均每年百分之八至九的速度增长；要力争加快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积极发展各类市场，抓紧价格、劳动工资的改革；大力推动社会保障和城镇住房制度改革；改善和加强宏观经济管理；要围绕转变政府职能这个中心环节，用三年时间基本完成各级政府机构改革；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等。实现这样的宏伟目标，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任务艰巨，困难很多，时间紧迫。靠唱高调，显然实现不了；指望天上掉下一个现代化，也不可能；企求发达国家发善心，也不可靠；幻想地上长出金币，更是痴人说梦。唯一的途径就是发扬务实作风，老老实实在地艰苦奋斗。正如毛泽东所说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达到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的辛勤劳动。”“在社会主义事业中，要想不经过艰难曲折，不付出极大努力，总是一帆风顺，容易得到成功，这种想法，只是幻想。”所以党的十四大报告中尤其强调：“现在大政方针已定，关键在于真抓实干，切不可丧失发展的机遇。”由此可见，全民奋起，艰苦创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将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旋律。那种认为在新的历史时期艰苦奋斗精神“过时了”的观点显然是毫无根据的，是十分错误的。

现代化建设不是一个静止的观念。因为社会的发展是不停顿的，人类的进步是无止境的。因此，不论社会发展到那个阶段，艰苦奋斗都将是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动力。诚然，建国以后，党领导全国人民经过长期艰苦

奋斗，特别是近十五年来实行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得到发展，国家财力显著增强，物质基础日渐丰厚，人民生活明显改善，为加速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也使人们依托已有的成果，在新的起点和新的层次上更大地发挥创造性，去实现更高层次的理想。但是，由于我国尚处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起步阶段，人口众多，家底很薄，资金短缺，经济发展极不平衡，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仍然很大。这些矛盾和问题与加速现代化建设形成强烈反差。在这样的条件下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我们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和代价，需要我们立足于自立更生、艰苦奋斗的基础上，凝聚全民族的智慧和力量，一步一步地开拓前进，坚韧不拔地拚命苦干，用聪明的才智和勤劳的双手改善现代化建设的条件，需要通过艰苦创业的劳动换取事业的成就。如果不全面理解艰苦奋斗与现代化建设的相互关系，满足于已有的成绩，不再普遍地提倡艰苦奋斗，勤俭节约，要在本世纪末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就不能达到，到下个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也是不可能的。因此，艰苦奋斗精神永远不能丢。任何时候，它都是我们民族的强大精神支柱，是我们实现经济腾飞的基本保证。

艰苦奋斗不是抽象的口号，而是具有具体的、丰富的、科学的内涵，而且伴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历史的前进，不断充实、丰富和发展自身。战争年代，由于环境残酷，战斗频繁，艰苦奋斗精神主要表现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冲锋陷阵，勇敢杀敌。建国初期，由于百业待兴，整个国家处于迅速恢复国民经济阶段，艰苦奋斗精神主要表现为艰苦朴素，勤俭节约，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艰苦奋斗精神主要表现为脚踏实地，埋头苦干，不计名利，任劳任怨。在今天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艰苦奋斗不再是被动地在贫困中挣扎，或者消极地忍受苦难的折磨，而是一种积极主动的革命性和创造性相结合的进取意识和开拓精神。它蕴含着崭新的表现形式和时代特征：

其一，就是解放思想，勇于改革的创新精神。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的改革，是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模式的改革，是再次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神圣的开创性的事业，是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诸多方面的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要实现确有实效的改革和具有发展的创新，并在世界激烈竞争的舞台上站稳脚跟，跻身于先进行列，就必须树立必胜的信心，抓住历史的机遇，解放思想，敢闯敢干，敢冒风险。在改革的实践中发现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学会一切自己不懂的东西，汲取人类先进的经验，走出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探求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新途径、新境界，从而，使生产力要素活跃起来，为经济建设注入活力和增强后劲。然而，创造的花环是用荆棘编成的，崭新的成果是用血汗浇灌的。其中不乏要历尽千辛万苦，经受失败、挫折和痛苦的考验和磨炼。如果离开了百折不挠的艰苦奋斗，必将一事无成，甚至要被飞速发展的历史所淘汰。

其二，就是知难而进，刻苦攻关的进取精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是实现经济腾飞的关键。随着社会的发展，脑力劳动将逐渐取代简单劳动。这就要求劳动者，一方面要提高科学文化素质，掌握现代科学知识，采用最先进的技术装备，实行科学生产，科学管理，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同样数量的劳动力和同样时间的劳动，生产出比过去多几十倍、几百倍的高质量产品。另一方面要加强新科技的开发研究，在消化吸收

现有的先进技术的同时，不断创新，开辟新的高科技领域，并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然而，任何一项新科技的创造发明，都是在充满艰辛和困苦的奋斗中实现的。例如 60 年代，我国核工业和航天工业部门的广大知识分子和科技工作者牢记毛泽东艰苦奋斗的教导，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自力更生，废寝忘食，拚命苦干，艰苦创业，填补了我国高科技的空白，打破了外国核垄断的局面。这一光辉的业绩，既展示了我国知识分子知难而进，刻苦攻关，无私奉献的英雄气概，又证实了艰苦奋斗精神在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中的地位和作用。“艰难玉成”正是这种实践的精辟概括。

其三，就是兢兢业业，埋头苦干的献身精神。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干出来的，不是喊出来的。坐而论道唱高调不能解决问题。我们的社会主义脱胎于经济羸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要实现许多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工业化和生产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为社会主义的完善和发展，为解决落后的社会生产同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矛盾，创造丰厚的物质技术基础，任务相当艰巨，不是短期内轻而易举办得到的。这就需要人们在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发扬“老黄牛”精神，勇挑重担，任劳任怨，全身心地投入；在深化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奉献聪明才智和青春年华；在真抓实干的奋斗中，创造财富，造福人类；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服从整体，顾全大局，甚至牺牲个人利益乃至宝贵的生命。那种习惯于来“虚”的，不愿意干实事，把艰苦奋斗只看作他人的事的思想是万万要不得的。如果没有亿万人民在工作中埋头苦干，在困难中艰苦创业，在利益上不怕吃亏，在改革中锐意进取的意识和实践，现代化建设便不可能取得成功。

其四就是崇尚节约，克勤克俭的节俭精神。古人讲“成由勤俭败由奢”，的确是精辟的经验之谈和至理名言。虽然我国经过近 15 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实力今非昔比，但是并不富裕，同发达国家相比，长时间形成的差距还远未消除。贫穷仍然象一座大山沉重地压在我们肩上。改变这种状况固然需要外援，而且利用国外资金和技术可以加快现代化建设的速度。但是，借的钱是要还的，技术也要用钱去买，国内方方面面的改革都需要大量资金投入。这些资金只能靠努力生产来换取，靠全体人民勤俭节约来积累。所以讲艰苦奋斗，离不开节俭精神。

节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原则之一，是毛泽东艰苦奋斗思想理论的重要内容。当然今天讲节俭，不是再当苦行僧，更不是要求人们在过去的低水平上形式主义地搞那些吃“忆苦饭”之类的小动作。而是要在生产上用最少的投入争取最大的产出，用尽量少的物质消耗生产出尽量多的符合社会需要的产品；要在工作上不推诿、不拖拉，增强时间观念，以高度的责任感、紧迫感，努力提高单位时间内的劳动生产率；要在生活上发扬勤俭节约的美德，精打细算，量入而出，节约开支，不搞脱离生产发展水平的超前高消费，把节省下来的钱用于现有生产技术的改造和扩大再生产上来。实践证明，把节俭的精神长期坚持和发扬起来，资金就会积少成多，国家就会由穷变富。

总之，艰苦奋斗是现代化建设的力量源泉。在艰苦奋斗中求发展、求富强是我们的基本原则。江泽民在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提出的六十四个字的艰苦创业精神，既是对中国共产党的艰苦奋斗精神的精辟概括，也是对毛泽东关于艰苦奋斗思想理论的新发展。这是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创业实践中所需要的精神支柱和遵循的行动准则。

三、毛泽东关于艰苦奋斗的思想理论是指导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向高层次发展的理论指南

用毛泽东关于艰苦奋斗的思想理论教育全体人民、武装全党，不仅是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而且是以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培养“四有”新人，抵制资本主义腐朽思想侵蚀为中心内容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指南。只有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自觉地用艰苦奋斗的思想理论规范人们的道德行为，才能建立更高层次的与现代化物质文明相适应的精神文明，才能使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更加成熟，更加完善。

然而，目前我国的精神文明的社会化程度还不高，给物质文明建设提供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还有限。特别是由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和党的政治思想工作一度削弱等等原因，在我国改革开放取得很大成绩，商品经济有了较大发展，生活条件稍有改善之后，一些人淡化了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观念，滋长了奢侈腐化、铺张浪费的歪风。他们盲目地用我国的低收入与世界发达国家的高消费相攀比，甚至醉心于“能挣会花”，生活上大肆挥霍。有些党员干部经不起权和利的诱惑，道德观念沦丧，精神支柱错位，理想信念崩溃，热衷于以权谋私，权钱交易，以至陷入贪财、贪色、贪物、胡作非为的境地，严重地败坏了社会风气，挫伤了群众的创业精神，损害了“两个文明”建设。因此，党中央一再强调要发扬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并把它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这是十分英明的战略决策。

发扬艰苦奋斗精神有助于克服腐败之风。腐败是人类的大敌。一切腐败现象都是相悖于艰苦奋斗思想理论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尽管其表现形式不同，但其本质特征都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道德原则，丧失了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如果在执政党内腐败之风盛行，势必影响到民心向背和安邦定国。固然在实行改革开放、发展商品经济的过程中，执政的地位容易滋生腐败现象，掌权的干部容易被权、钱腐蚀，但是，这并不是产生腐败现象的必然和任腐败行为泛滥的借口。应该说，改革开放和发展商品经济，是给执政党的党员和干部提供了带领群众艰苦奋斗干四化、做贡献的舞台，而不是提供了贪得无厌地疯狂吃四化的机会。艰苦奋斗是党的世界观的外在表现。它体现着党的性质和宗旨，关系着国家的形象和事业的兴衰。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如果不把立足点放在致力于艰苦创业、发展经济、造福人类上，而是为政不廉，以权谋私，甚至巧立名目，把有限的财富糟蹋掉，挥霍掉，那还有什么希望呢？怎么能得到群众的信任和拥护呢？从历史上看，革命战争年代，条件那么艰苦，人民群众始终支持共产党；60年代初，生活那么困难，人民群众没有与党离心离德；“文化大革命”期间，形势那么严峻，人民群众没有失去对党的信任。究其原因，就是我们党始终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生死与共。当前我国正在从深层次上进行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在新旧体制转轨，两种体制相互交叉的时期，腐朽的东西往往会千方百计依附于新生事物而滋生蔓延，并伴随着发展变化的情况而改变其手段和方式。腐败之风的花样、手法，也会不断变化和翻新，而且有很大的欺骗性、破坏性和腐蚀性。腐败作风，极大地损害了中华民族艰苦奋斗的传统文明和党在群众中的威望，是没有志气的一种表现。只有广大党员、干部树立以艰苦奋斗为荣，以奢侈腐败为耻的思想，自觉地清除腐败，为政廉洁，才能赢得众望所归的领导威信，在全社会抓艰苦奋斗的教育才能有说服力，惩治并遏制腐败之风才能取得成

效，人民群众才会振奋精神与党和衷共济，充分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为“两个文明”建设尽心尽力，尽职尽责。

发扬艰苦奋斗精神有助于抵制拜金主义。拜金主义是资产阶级世界观和道德观的集中表现。其核心就是“金钱第一”。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在资产阶级看来，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为了金钱而存在，连他们的本身也不例外，因为他们活着就是为了赚钱，除了快快发财，他们不知道还有别的幸福，除了金钱的损失，也不知道还有别的痛苦”⁽¹¹⁾。

诚然，金钱是人类社会发展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国家的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的改善都离不开钱。财力匮乏引发的后遗症，让人们吃尽了苦头。改革开放强化了人们的功利意识，带来了经济领域的空前活跃，生产力的极大发展。以致富为荣，贫穷为耻已是人们的共识。金钱并不总是散发着铜臭，它可以成为一把通往更高殿堂的钥匙。然而，用什么方式挣钱和怎样用钱，不能不是我们探讨问题的关键，不能不是我们衡量精神文明程度的一把尺子。真理向前迈进一步便成谬误。应该看到，在发展商品经济，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金钱至上，拜金主义也沉渣泛起，并滋生蔓延。它污染着社会环境，腐蚀着人们的灵魂，扭曲着生命的价值趋向。一些人把金钱万能，“有钱能使鬼推磨”视为人生哲学；把“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奉为恪守的信条；把损人利己，唯利是图，巧取豪夺当作理所当然的事。在他们的眼里，自身的价值是以金钱的多少来衡量；一切活动是以金钱作酬码；人与人之间真挚的情感完全变成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和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这种金钱的刺激和滋润，导致一些人在经济活动中，不惜慷国家、企业之慨，以收取贿赂；有的人千方百计坑集体，坑人民，捞油水，肥自己；有的人则多拿钱多干活，少拿钱少干活，把无私奉献看作痴人之举；有的人利用金钱拉关系、通关节、开绿灯，以求逍遥法外；甚至有的人为了金钱不顾国格不要人格。这些恶疾的萌发，破坏了人们生存的环境和人类的自身利益。

社会发展既要讲功利价值，又要讲奉献价值。不求功利，只讲奉献，人类社会就会失去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奉献也只能是“虚”的东西。而只讲功利，不讲奉献，人的精神就会萎缩，社会生产力将得不到充分发挥。因此，我们所提倡的是通过艰辛的创业和诚实的劳动获取必要的合法的收入，它与资本主义凶恶残酷的原始积累有着本质的区别；我们所提倡的是把更多的资金用于办实业，搞教育，丰富物质文化生活，创造更高的社会文明，而不是贪图享乐，挥霍无度；我们所提倡的是在辛勤劳动中实现绝大多数人的共同富裕，而不是拉大贫富差距，造成社会分配不公，给一些否定改革开放，怀疑现代化建设的人以种种口实。

承认物质利益，并力获得更多的物质利益而奋斗，这是毛泽东艰苦奋斗思想理论的一条原则。但是承认物质利益和功利价值，并非提倡唯利是图，损人利己。正如邓小平所说的“每个人都应该有他一定的物质利益，但是这决不是提倡个人抛开国家、集体和别人，专门为自己的物质利益奋斗，决不是提倡个人都向‘钱’看。”⁽¹²⁾要批判和反对资产阶级损人利己、唯利是图、一切向“钱”看的腐朽思想。反对“一切向钱看”腐朽思想的有效办法就是教育和动员全社会发扬大公无私，服从大局，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精神，打击那些见利忘义，不劳而获的不法行为，弘扬共产主义的道德情操，树立勤劳致富文明发财的思想观念，加速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舍此，别无他途。

发扬艰苦奋斗精神有助于培养合格的“四有”新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既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保证，又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基本任务之一。因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长期、艰苦的任务，需要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一代一代坚持不懈的奋斗。中华民族的文明传统和优良作风能否继承，成千上万共产党人浴血奋战的共产主义信仰和理想能否传下去，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和建设新中国的成果会不会丢失，关键在于能否造就千百万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新人。

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离不开青年一代的奋斗拼搏和无私奉献。正如江泽民曾指出的：青年是社会中最富有活力的部分，是我们事业的希望。社会主义祖国的美好未来需要青年一代去创造。所以，青年一代能不能成为党和人民期望的“四有”新人，能不能坚持和发扬老一代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将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前途和命运。

艰苦奋斗的创业实践，是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中的主观能动性的体现，是人们一定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反映，是创造社会文明的巨大精神动力。同样，艰苦奋斗的创业实践，离不开崇高理想和正确人生观的驱使和指导。只有树立起无产阶级的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高尚的道德情操，才能激发人们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建功立业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才能为造就“四有”新人奠定基础。

无产阶级世界观和人生观的确立，“四有”新人的培养，不可能在温室里形成，只能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在艰难困苦的斗争中磨砺，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锻炼，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中拼搏，在艰苦创业的实践中，经风雨，见世面，换脑筋，长才干，逐步确立起来。从而努力“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模范，做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模范，做脚踏实地、勤奋工作、忠于职守的模范，做反对各种腐败现象、发扬社会主义新风尚的模范。”⁽¹³⁾真正成为懂得马克思主义，有政治远见和工作能力又富于牺牲精神，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党的事业奋斗不息的成熟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所以，艰苦奋斗的社会实践是“四有”新人成长的必要的客观条件和环境。而一代一代“四有”新人的茁壮成长，又能保证艰苦奋斗精神代代相传，使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断升华。

综上所述，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形成的艰苦奋斗思想，既蕴含深刻的政治意义，又有极强的实践意义，而且至今仍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艰苦奋斗永远是我们时代的旗帜，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基石。今天我们提倡和强调发扬艰苦奋斗精神，不是引导人们重走“穷过渡”的老路，不是甘愿死守贫困再过苦日子，而是振奋精神，积极主动地向艰难困苦作斗争。固然奋斗不是为了吃苦，但是奋斗必须吃苦。只有在这种艰苦奋斗的创业中陶冶道德情操，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才能不断提高我国富裕和文明的程度。可以相信，全社会崇尚和发扬艰苦奋斗之时，就是中国社会腾飞之日。愿艰苦奋斗精神蔚然，两个文明建设结出硕果。

(作者单位：中共青海省委党史研究室)

注释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65页。

《在延安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上的讲话》(1939年5月1日)。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163页，第1179、1181页，

第 1438—1439 页。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130 页，第 329 页，第 419—420 页，第 386 页，第 379 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 564 页。

(12)《邓小平文选》(1975—1982 年)，第 297 页。(13)江泽民在 1993 年纪念“七一”座谈会上的讲话。

毛泽东、邓小平的艰苦奋斗观

宋易风

艰苦奋斗是毛泽东倡导和培育的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也是象征革命情操的延安精神的特色。毛泽东、邓小平从艰苦奋斗精神的作用、内涵，到如何发扬这一精神的途径，都有系统、深刻地阐述，形成了完整的共产党人的艰苦奋斗观。在经济转轨、社会变革的今天，学习和继承这两代伟人艰苦奋斗的思想，对于坚持党的优良传统，振奋革命精神、倡廉反腐、端正党风、政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共产党人必须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

毛泽东、邓小平历来号召共产党人要继承和发扬党的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这一号召和要求是建立在对国情的科学分析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基础之上的。

第一、艰苦奋斗的精神与作风，是由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所决定的。

在经济、文化落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反动统治，进行中国革命是一个十分困难和艰巨的事业。由于中国革命敌人的强大和长期占领中心城市，革命力量只能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农村才能生存和发展，中国革命只能以农村根据地为依托，在与敌人军事进攻的反复较量中，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中国革命的客观环境和独特的道路，造就了党和红军不怕牺牲、英勇作战和艰苦奋斗的精神，并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作风和革命传统。在革命战争年代，它是中国共产党战胜一切艰难险阻，一往直前的精神支柱。

在经济、文化落后，商品经济极不发达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需要上百年的比革命更为长期、更为困难和艰巨的事业。受落后经济和生产力的制约，短期内不可能满足人民的需求，大幅度提高人民生活。毛泽东指出：“要使全体干部和全体人民经常想到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国，但又是一个经济落后的穷国，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邓小平也指出：“中国搞四个现代化，要老老实实地艰苦创业。我们穷，底子薄，教育、科学、文化都落后，这就决定了我们还要有一个艰苦奋斗的过程。”“我们是个穷国、大国，一定要艰苦创业。”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是中国国情特点的反映。这个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要求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要继承和发扬党的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这一精神既是国情的产物，又体现了时代的需要，仍然是璀灿生辉的时代精神。那种认为艰苦奋斗只适用于革命年代，现在已经过时的观点，是对中国国情和时代精神的严重曲解。

第二、艰苦奋斗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本色。

毛泽东、邓小平倡导继承和发扬艰苦奋斗精神，还在于这一精神体现了共产党人的风貌和特征。以人类解放和共产主义为根本目标的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与无产阶级优秀品德的辩证统一。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指出：“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

私利可图。”为此，他躬行倡导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革命精神，要共产党人争当多做工作、少取报酬、廉洁奉公的模范。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论述解放区与国统区的对立和区别时指出：“利用抗战发国难财，官吏即商人，贪污成风，廉耻扫地，这是国民党区域的特色之一。艰苦奋斗，以身作则，工作之外，还要生产，奖励廉洁，禁绝贪污，这是中国解放区的特色之一。”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之后他又指出：“我们要提倡艰苦奋斗，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邓小平继承发展了毛泽东这些思想，他在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历史时期指出：“我们必须恢复和发扬党的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要有一股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在他们的论述中，艰苦奋斗已成为体现共产党人先进性的标志，是衡量是否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尺度，是与其他政党相区别的主要特征。在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今天，邓小平号召全党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就是要利用市场经济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生产发展的功能和作用，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同时又要保持共产党人的理想和政治本色，抵制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影响和侵袭，以避免重蹈历史上出现的一些革命阶级腐化堕落的覆辙。

第三、艰苦奋斗是革命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功的保证。

邓小平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时深刻指出：“我们的历史经验是，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关心群众。只要你关心群众，同群众打成一片，不仅不搞特殊化，而且同群众一块吃苦，任何问题都容易解决，任何困难都能够克服。”

这就言简意赅地阐明了艰苦奋斗与密切联系群众的关系，包含了只要与群众一起艰苦奋斗，就能克服革命与建设中一切艰难险阻，取得成功与胜利的思想。他这时还指出：“我们大家都是从苦里过来的，经历过不少困难的时期。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抗美援朝的时候，也是很艰苦的啊！为什么过去很困难的局面我们都能渡过？根本的问题是我们的干部、党员同人民群众一块苦。”这是对艰苦奋斗的精神与作风在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作用的实事求是、质朴无华的科学总结。回顾党的历史可以看出，正是由于有了与大家一块苦的艰苦奋斗的精神，井冈山时期，红军战士才能发扬不怕牺牲、英勇作战的精神，在战斗频繁、物质待遇菲薄的条件下，“不出怨言”；正是由于有了艰苦奋斗的作风，党和红军才能经受常人所不能忍受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困难考验，完成了人类历史上这一罕见的英雄壮举；正是由于有了艰苦奋斗的精神与作风，党才能干抗日战争时期领导解放区军民战胜了1941至1942年的严重困难。建国后，也正是由于依靠和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才迅速恢复了千疮百孔的国民经济，团结和依靠人民群众渡过和克服了1959至1961年三年的严重困难局面。1989年，邓小平在总结新时期历史的经验时进一步指出：“一九八〇年元旦，我在政协讲话，讲了‘四个保证’，其中一条叫‘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¹¹⁾。把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视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保证，是认识上新的升华，指明了这一精神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地位和作用。

第四、艰苦奋斗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

在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时，毛泽东从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实际情况出发，把体现艰苦奋斗精神的勤俭建国作为社会主义的建设方针。他说：“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其中包括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样一个勤俭建国的方针。”从此，艰苦奋斗突破了

思想、品德的领域，上升到政治层面和大政方针的范畴了。

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的上述思想，把艰苦奋斗的精神升华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高度，成为这一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

第一，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1981年11月，邓小平在接见美国财政部长里甘时指出：“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我们的新提法就是建设一个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所谓高度文明，就是人民要有理想，要个人利益服从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要守纪律，要有道德，要坚持我们历来的艰苦奋斗的传统。”⁽¹²⁾他把艰苦奋斗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并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目标联系起来，成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

第二、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手段和途径。邓小平多次指出：我们有各种有利条件，一定能够赶上世界上的先进国家；但是也要认识到，为缩短和消除两三个世纪至少一个多世纪造成的差距，必须下长期奋斗的决心，在一个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不能不提倡和实行艰苦奋斗。他还指出：“中国如果不普遍地提倡艰苦奋斗、勤俭节约，要在本世纪末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就不能达到。”⁽¹³⁾根据这些思想，党的十二大首次概括和党的十三大进一步完善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明确写进了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把这一精神作为实现党的战略目标、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手段和途径，成为党的基本路线的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因此无论是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全党，还是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都应当坚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应有之意。

二、艰苦奋斗精神的内涵和时代特征

在毛泽东、邓小平的论述中，艰苦奋斗被赋予了多方面的含义。它首先是一种革命精神，又是中国共产党治国兴邦的基本路线和方针，也是共产党人在战斗、工作和生活上的作风，具有丰富的底蕴和内涵。

从思想范畴看，艰苦奋斗主要是拚搏、进取、创新、胜利。是不怕困难，压倒一切敌人和障碍的英雄气概。也就是毛泽东号召的：“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拚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¹⁴⁾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艰苦奋斗与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创业精神是联系在一起的，江泽民在八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指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积极探索，勇于创新，艰苦奋斗，知难而进，学习外国，自强不息，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同心同德，顾全大局，勤俭节约，清正廉洁，励精图治，无私奉献，这些都应该成为新时期我们推进现代化建设，所要大力倡导和发扬的创业精神。”这六十四个字可以说是对中国共产党七十多年艰苦奋斗传统的历史总结，它赋予了艰苦奋斗以新的时代内涵，是新时期创业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政治范畴看，艰苦奋斗体现着共产党人的政治追求，是共产党人为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必须坚持的政治品质，是革命和建设必须遵循的基本方针，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艰苦是成事之本，奋斗是胜利之师。共产党人如果丧失了艰苦奋斗的精神，在政治上不仅会脱离群众，而且将永远丧失走向既定目标的正确途径。从这一意义上说，艰苦奋斗是中国

共产党战胜一切艰难困苦的政治法宝之一。

从作风范畴看，艰苦奋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是与其他政党相区别的根本标志之一。共产党人在工作和生活中必须保持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以身作则、无私奉献的特色，不奢侈、不腐化，反对任何形式的特权，自觉与人民群众同甘苦，这是党永不脱离群众、永远获得人民群众支持的重要保证。

艰苦奋斗精神在上述领域的反映，说明它是思想、政治、作风的有机统一，是开拓创新与艰苦朴素的辩证统一，也是艰苦与奋斗的辩证统一。在这里，艰苦朴素是条件，其内涵随环境、条件的变化而不同，因而对艰苦朴素的要求是相对的。提倡艰苦奋斗并不是要继续战争年代物质极端匮乏的艰苦生活。奋斗是艰苦的目的。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人没有饿死，就要做革命工作，就要奋斗。一万年以后，也要奋斗。”⁽¹⁵⁾因此，奋斗是绝对的，无止境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这才是艰苦奋斗的根本目的。

毛泽东和邓小平关于艰苦奋斗的论述，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艰苦奋斗是民族精神的弘扬和升华。艰苦奋斗来源于中华民族勤俭节约、刻苦耐劳、自强不息的美德。在我们民族的历史上，上古时期即有“汝贤，克勤于邦，克俭于家”的格言，汉唐以来又有“后世贤，师吾俭”和“历览前圣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的感叹。艰苦奋斗是我们民族几千来的文化积淀和民族象征，是民族文化中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中国共产党倡导的艰苦奋斗精神，不仅继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而且突破了民族文化中时代和自然经济的局限，把它与共产党人的远大抱负和政治信念结合起来，有了更加科学、坚实的思想基础，成为凝聚中华民族的精神要素。这就把民族精神上升到一个新高度，使民族精神跟上了时代的节拍，绵延了几千年的民族精神，跳动着共产党人强国富民的时代脉搏。

艰苦奋斗是时代精神的体现。新时期的时代精神，精髓在于开拓创新。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革命和建设都不能照搬别国的模式。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都要在实践中探索和开辟符合中国特点的道路。这就需要积极探索、勇于创新的精神。没有艰苦奋斗的勇气和作风，不可能有伟大的革命和建设实践，在困难面前不是成为可耻的逃兵，就是左顾右盼而却步成为懦夫和懒汉；没有艰苦奋斗的勇气和作风，就不能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特殊矛盾，只能因袭守旧绝不可能找到适合自己特点的正确道路。因此，艰苦奋斗是开拓进取创新精神的基础，是时代精神要求的载体和条件。

艰苦奋斗反映了我国现阶段的基本特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创业和发展的阶段。艰苦奋斗反映了创业和发展这两个基本特点的双重要求。作为创业阶段，古今中外历史都证明要完成任何大业宏图，都要提倡艰苦奋斗，不如此就不能建立任何基业，建设有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开创事业，尤其艰巨辉煌，更需要艰苦奋斗。作为发展阶段，除艰苦创业外，要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逐步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改善和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毛泽东、邓小平的艰苦奋斗观就在于既提倡艰苦奋斗，又号召改善物质生活，它是创业精神与物质利益的兼顾与统一。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指出：“在有根据地的条件下，不提倡发展生产并在发展生产的条件下为改善物质生活而斗争，只是片面地提倡艰苦奋斗的观点，是错误的。”⁽¹⁶⁾在这一思想指引下的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廉政建设，在倡导艰苦奋斗的同

时，又“实行俸以养廉的原则，保障一切公务人员及其家属的物质生活及充分的文化娱乐生活。”在历史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后，邓小平进一步指出：“发展生产，而不改善生活，是不对的”⁽¹⁷⁾。“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¹⁸⁾在1992年初的南巡讲话中，他又把这一思想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任务联系起来，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就阐明了艰苦奋斗的目的、实质和这一精神的时代含义。

艰苦奋斗是执政党加强自身建设的一面旗帜。自1958年美国原国务卿杜勒斯提出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策略后，毛泽东就把反修防变作为党的建设的主题，并把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当作反修防修的支柱。尽管毛泽东在反修防修的理论判断及其实践方面是错误的，但反修防修的理论命题无疑是正确的。中国革命胜利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执政党的地位和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使我们党面临着执政、改革开放和敌对势力和平演变的三重考验。也确有一部分共产党员未能经受这种考验，滋长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等资产阶级思想，产生了以权谋私、贪污受贿、权钱交换等消极腐败现象。这说明坚持共产党人的标准，倡廉反腐仍然是一个严重的任务。邓小平认为在这场严肃的斗争中，“提倡艰苦创业精神，也有助于克服腐败现象。”⁽¹⁹⁾因此，艰苦奋斗的时代特征还在于它是与目前党内状况和国际形势密切联系的，是当前斗争所需要的，是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和挫折及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总结。有了艰苦奋斗精神这面旗帜，就增强了抵御错误思想侵袭的自身免疫力，就能够胜利地经受现实中的三个考验；它是党和政权建设的思想理论基础，应当成为党的建设中必须高举的一面时代旗帜。

三、关于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精神的途径

剖析艰苦奋斗精神的内涵，论述艰苦奋斗精神的作用，目的是继续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精神，这是毛泽东、邓小平艰苦奋斗观的落脚点。

第一、要把艰苦奋斗作为思想教育的重要内容。

向全党进行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思想教育，是使党经受考验，建设社会主义的一项基础工程，也是保持革命传统的基本途径。在党执政前夕，毛泽东就指出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此，“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²⁰⁾新中国成立不久，他在给陕甘宁边区的复电中又指出：“我并且希望，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²¹⁾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之后，他又强调：“要使全体青年们懂得，我们的国家现在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并且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根本改变这种状态，全靠青年和全体人民在几十年时间内，团结奋斗，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一个富强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达到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的辛勤劳动。”⁽²²⁾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特别是1989年以来，邓小平在总结一手硬、一手软，政治思想工作薄弱的教训时指出：“我们最近十年的发展是很好的。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教育发展不够。最重要的一条是，在经济得到可喜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

改善的情况下，没有告诉人民，包括共产党员在内，应该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有了这个传统，我们就能抗住腐败现象，老干部就能管好他们的子弟。我们经过冷静考虑，认为这方面的失误比通货膨胀等问题更大。”⁽²³⁾他还强调说：“建国以来我们一直在讲艰苦创业，后来日子稍微好一点，就提倡高消费，于是，各方面的浪费现象蔓延，加上思想政治工作薄弱、法制不健全，什么违法乱纪和腐败现象等等，都出来了。”⁽²⁴⁾“艰苦奋斗是我们的传统，艰苦朴素的教育今后要抓紧，一直抓六十至七十年。”⁽²⁵⁾他们都认为进行艰苦奋斗的思想教育是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长期任务，经济越是发展，越要进行艰苦奋斗的教育。要依靠坚持不懈的思想教育，增强全党的艰苦创业意识，继承和发扬艰苦奋斗的传统。要把正确处理工作与生活、劳动与享受的关系，作为艰苦奋斗教育的重要内容。全党和人民一定要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和科学的消费观念，警惕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侵袭，制止盲目攀比、斗富摆阔、奢侈浪费等歪风的蔓延。特别重要的是，要把进行艰苦奋斗的教育，提高到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的新高度，并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联系起来，使全党取得这样的共识：要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就必须用艰苦奋斗精神武装全党；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就必须坚持艰苦奋斗精神不动摇，艰苦奋斗传统的坚持与发扬关系着党的存亡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败。

第二、把健全法规、严惩腐败作为发扬艰苦奋斗精神的关键。

一手抓艰苦奋斗的思想教育，一手抓打击贪污盗窃等经济犯罪是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也是毛泽东、邓小平的一贯思想。邓小平认为解决党内不正之风，既要解决思想问题，更要解决制度问题。因而在实践中我们党制定了一系列惩治贪污与经济犯罪的条例，并依法对犯罪分子进行惩处。早在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制定了反对和惩治党员贪污的条例；1933年苏维埃政权建立后，苏维埃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了由毛泽东主席、项英副主席签署的《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其中规定贪污公款在300元至500元之间者，处以2年以上5年以下的监禁，贪污公款在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对玩忽职守、造成严重浪费而使国家蒙受损失者，一方面依照财政条例进行罚款，一方面视其浪费程度处以警告、撤职以至1个月以上3年以下不等的监禁。陕甘宁政府时期各项法令、法规进一步健全，《陕甘宁边区政务人员公约》、《陕甘宁边区政纪总则》，都把公正廉洁、奉公守法、不贪污、不受贿、不赌博、不腐化、不堕落作为对政府工作人员的基本要求。1939年边区政府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条例》，规定对贪污数目在1000元、500元、100元以上者和100元以下者，分别处以死刑、有期徒刑或苦役。建国初期，面对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党领导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运动中政务院连续发布了《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据法量刑，在十余万贪污分子中，判处徒刑的共9942人，判处无期徒刑的67人，判处死刑的42人，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9人。这些条例和法令对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防止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起了长远的积极作用。历史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后，根据以上历史经验，党多次制定了有关惩治贪污、盗窃等经济犯罪的专门法令，多次在经济领域打击犯罪活动，从党和政府机关中清除了一批腐化堕落分子。据统计，为纠正不正之风，只就中央下达的带有法规性质的文件来看，从1980年2月公布《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算起，至 1991 年底，就有 100 多件。1992 年，国家有关方面又发布了 36 个不准用公款吃喝的文件，这时端正党风、惩治腐败起了好的作用。当前的问题是继续健全必要的法规，建立有利于人民监督的有效制度和防范以权谋私及腐败现象的约束机制，进一步深化改革，逐步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建立有关贪污、贿赂调查的专门机构等等。一方面改变当前法律滞后的状况，一方面要坚决克服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枉法现象，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尊严，这是发扬艰苦奋斗精神的物质保证。

第三、领导带头，躬行实践。

为倡导和坚持党的艰苦奋斗的作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莫不躬行实践率先垂范，以自己的表率行动为全党树立了榜样。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朱德等红军领导人与战士一起过苦日子，每天只有 5 分钱的菜金，分享一样的伙食尾子。延安时期，毛泽东、朱德不仅发动和领导全党全军的大生产运动，而且亲自开荒种地、背篓拾粪；周恩来、任弼时 also 认真捻棉纺纱，成为纺织能手。党的领导人的俭朴作风和模范行动是坚持和发扬艰苦奋斗作风的无声命令，直接影响着党风和当时的时代风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邓小平又指出：艰苦创业，首先要我们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带头。我们的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一定要努力恢复延安的光荣传统，努力学习周恩来等同志的榜样，在艰苦创业方面起模范作用。他特别强调：“只要高级干部带头，这个事情就好办了。”⁽²⁶⁾他还明确指出，艰苦奋斗精神是接班人必须具备的一项条件，要老同志为他们树立榜样。这既是对我党 70 多年经验的总结，也吸取了古今中外执政者兴衰荣辱的教训。执政党和领导者一定要记取公生明、廉生威的古训，进一步坚持与发扬时代需要的艰苦创业的革命精神。

(作者单位：中共陕西省委党校)注释

(14)(15)(22)《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 796 页，第 800—801 页，第 800 页，第 781 页。

(17)(18)《邓小平文选》(1975—1982 年)第 221 页，第 222 页，第 189 页，第 221 页，第 200 页，第 189 页，第 222 页，第 123 页。

(16)《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3 卷，第 809 页，第 1048 页，第 912 页。

(21)《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329 页，第 12 页。

(11)(19)(23)(24)(25)(26)《邓小平论党的建设》第 264 页，第 263 页，第 265 页，第 264 页，第 72 页。

(12)(13)《邓小平同志谈高度文明和发扬延安精神》，载《文献和研究》1985 年第 5 期。

(20)《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4 卷，第 1438—1439 页。

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演变

迟爱萍

毛泽东是举世闻名的战略家，他在领导党和人民缔造并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进程中，根据世界各种基本矛盾、政治力量及国际格局的变化，根据中国的历史和现状，提出一系列国际战略思想。这些思想对我国外交方针和政策的确立起着重要指导作用。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包含极其丰富的内容。本文仅将新中国诞生后，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并依照历史发展顺序试析三个阶段国际战略的确立、演变、基本内容和得失。

一、联苏抗美的“一边倒”的国际战略

新中国诞生前夕，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明确提出站在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之内的“一边倒”的国际战略。毛泽东为什么作出如此抉择？这与新中国面临的国际格局有直接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严重削弱，美国成为超级大国；社会主义由一国胜利扩展到多国胜利，形成以苏联为核心，不仅在政治上、经济上，而且在地理上也连成一片的社会主义阵营；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很多国家相继取得独立。由于各种国际政治力量对比发生变化，世界形成了以美苏为中心两大阵营对抗的新格局。面对这样的国际格局，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如何着手建立外交关系，能否在对抗的两大阵营面前不作倾向性的选择？中国的历史和现状表明，这种可能性是不存在的。

第一，要么走社会主义道路，联合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要么走资本主义道路，依附于帝国主义阵营；此外，中国没有第三条道路可供选择。“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治方案早已被中国的历史所淘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又决定了胜利后必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种政治信仰和社会制度上的倾向性，决定了新中国外交战略上的倾向性，必然是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

第二，面对美苏对峙的态势，要获得强有力的国际援助，必须表示明朗的外交态度。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从战时的盟国走向敌对，成为主要竞争对手。面对美苏的尖锐对立，想采取左右逢源的外交政策，显然行不通。保持中立，在美苏激烈竞争的国际舞台上，也难以立足。只有明朗的外交态度，才有可能赢得强有力的国际援助。

新中国需要国际援助，对此毛泽东十分明确。他认为：中国是大国，但还不是强国，经济十分落后；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首要的任务是进行经济建设，但我们对经济建设不熟悉，应该向外国特别是社会主义苏联学习；建设需要有稳定的和平环境，而新中国诞生后，帝国主义不甘心失败，有可能进行武装干涉。这些情况便决定了中国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方面获得援助的必要性。没有这种国际援助，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不能巩固。这是新中国安全和建设所提出的客观要求，也是毛泽东在外交上提出与苏联盟的一个重要依据。

第三，第二次大战后，中国与美苏的实际关系决定了新中国在当时只能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

鉴于中苏美英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合作背景，中国共产党曾一度真诚希望各抗日盟国、尤其是美国能帮助中国避免内战，促进战后中国的和平民主建设，然而，这种愿望很快被美国采取的扶蒋反共政策所打消。伴随美国对国民党政府大规模的援助和国共内战的持续发展，中国共产党同美国进入了一个深刻的对抗时期。1949年春夏，中国共产党又一次怀着希望同美国外交官进行短暂接触，仍因美方的无理而以失望告终。由于美国长期顽固地坚持错误的对华政策，把中国推向与美国对抗的地位、倒向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与之相反，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奉行共同的意识形态，自建党以来一直在外交上采取与苏友好的立场。对于苏联采取的和平外交政策，以及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援助，毛泽东念念不忘。他曾例举说：“在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先生召集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和在其后进行北伐战争时，苏联是当时唯一援助中国解放战争的国家。在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开始以后，苏联又是第一个援助中国反对日本侵略者的国家。”新中国成立后，也是苏联第一个承认中国并互派大使的。可以说，“一边倒”的国际战略正是中国共产党与苏一贯友好关系发展的必然结果。

显而易见，毛泽东提出联苏抗美的“一边倒”的国际战略，绝非主观臆断，而是根据当时国际格局及中国历史和现状作出重大决策。应该说明的是，这一国际战略在政治上的倾向是十分明朗的。正如建国后，毛泽东和周恩来在谈及此举意义时所说：“我们提出‘一边倒’，是意味着在政治上必须同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团结起来，同社会主义国家站在一边，不能一脚跨在社会主义方面，一脚又跨在西方资本主义方面。所以‘一边倒’就表明我们在政治上同资产阶级国家断然分开，打消一切西方国家的幻想。”但对此绝不能作出形而上学的理解，即理解为无条件地倒向苏联一边，或是与美的绝对对抗。事实上，中国在联苏的同时，始终没有放弃独立自主的原则立场；在抗美援朝时，也存在一定条件下讲和的一面。“一边倒”的国际战略所包含的外交方针和政策是全方位的，毛泽东并没有把这一时期的外交方针和政策仅仅局限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之内，而是分为三个层次：

一是巩固同苏联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这是我们的基本方针，基本利益所在。”根据这一方针，新中国不经谈判即同各社会主义国家建交，并在此基础上同它们发展友好合作关系。

再就是对亚非国家以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我们应当巩固和发展同它们的团结”。毛泽东认为，有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和亚非国家两种力量的团结，“我们就不孤立了”。为此，新中国在建国初期，十分注意与新兴的民族独立国家，尤其是邻近的民族独立的国家建立和发展关系。

“至于帝国主义国家，我们也要团结那里的人民，并且争取同那些国家和平共处，做些生意，制止可能发生的战争，但是决不可以对他们怀抱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因考虑帝国主义决不会很快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中国，毛泽东主张在同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时，要和我国同社会主义及新民主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在办法上有所区别：一是不急于和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二是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在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以前均须经过谈

判。其中与国民党断绝外交关系是与新中国建交的一个基本条件。但是，对于平等互利的经济往来，我们并不拒绝。毛泽东还提出要学习资本主义在经营、管理上的长处。

对于美国，毛泽东一直主张采取灵活的斗争策略。建国前夕，他曾明确指出：“如果美国(及英国)能断绝和国民党的关系，我们可以考虑和他们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以后毛泽东在与外宾谈话中几次谈到，对美国，一方面我们要争取主动，公开主张与他们和平共处，建立外交关系，解决台湾问题，欢迎他们来中国；另一方面，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坚持斗争。

毛泽东明朗的“一边倒”国际战略和全方位的和平外交方针是不矛盾的，二者统一于为新中国创造较长时期和平环境这一战略目标，这是新中国根本利益所在。建国后，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是严峻的。美国采取敌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除支持国民党蒋介石盘踞台湾，阻止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之外；还入侵朝鲜，扬言要把战争扩大到中国；并干涉印度支那国家内政，支持法国殖民主义者镇压印度支那人民，对中国南方边陲的安全构成重大威胁。面对来自朝鲜半岛、台湾海峡和印度支那半岛三个方面的战争威胁，新中国必须在国际上寻找强有力的支持，同时又要广交朋友，坚持独立自主的立场，以免受制于人。毛泽东“一边倒”的国际战略和全方位的外交方针，正是基于维护国家安全和独立自主外交地位两种客观需要而相结合的产物。事实表明这种结合是恰到好处的。

总之，毛泽东提出联苏抗美的“一边倒”的国际战略，符合国家安全和建设的内政需要，是正确的。依据这一国际战略，我们成功地建立和巩固了同以苏联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从而在艰难的条件下，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赢得了一个相对有利的国际环境。1956年9月毛泽东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代表团时非常坦率地说：“苏联给我国的援助是非常大的。苏联革命成功后遭十几国干涉，而我国革命胜利的时候，帝国主义并未干涉我们，并不是怕我国人民，主要是有苏联存在，这对我们鼓励很大。当时若无苏联存在，美国一定要来的。它不仅在台湾，还要到大陆来。”另外，中国在同苏联的合作中，得到了急需的资金、技术、人才、管理知识及各种机器设备和原材料，这对我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当然“一边倒”的国际战略作为特定时代的产物，也有一定的消极作用。由于明确了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在对外关系上就不可能不受该阵营的制约，所以在独立自主的行动上多少受到限制。另外，这一国际战略的实施，事实上也形成了中国在外交、外贸和争取经济技术援助上倚重苏联的局面。

二、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反帝、反修”统一战线的国际战略

从50年代末到60年代，毛泽东逐步改变联苏抗美的“一边倒”的国际战略，提出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反帝、反修”统一战线的国际战略。这一时期，从国际上来说，美国仍继续推行其敌视中国的政策。从国内来说，社会主义建设正处于艰难探索时期。当时的国际国内情况表明，中国仍需继续为自己创造一个安定和平的建设环境。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改变原来的联苏抗美，而不惜同时和美、苏相对抗呢？这与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关系恶化有关。

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中苏两党对马列主义一些理论问题、国际共运某些原则问题以及当代世界形势若干重大问题，出现一些不同看法。对于这些分歧，毛泽东始终主张通过内部讨论来解决，而不应影响两国正常关系。但赫鲁晓夫从追求同美国平起平坐共同主宰世界的外交战略出发，一心想把中国纳入他的战略体系，并为此不断对中国施加种种压力，致使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中苏之间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日趋激烈。

面对苏方不尊重中国主权的对抗态度，为了维护国家主权，民族尊严，毛泽东不再争取同苏联维持友好关系，他毅然放弃联苏抗美的“一边倒”的国际战略，逐步把苏联作为当时所称的修正主义确定为中国的对立面，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反帝、反修”统一战线的国际战略。

1960年12月，毛泽东在会见委内瑞拉加拉加斯市议会代表团时，第一次把修正主义、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列在一起斥为“三个鬼”，以后又作为“三种坏人”和“国际上有三个口号”，把上述三者加以罗列。1963年9月，毛泽东在同日共中委竹中恒三郎谈话时指出：目前有两种力量，一种是革命力量，是革命的工人阶级同革命人民的重新组合；另一种是以美国为首的世界反革命联盟，即帝国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修正主义者在逐步靠拢或迅速靠拢他们。同年12月毛泽东在会见秘鲁共产党左派代表何塞·索托马约时，进一步指出：修正主义要同帝国主义一起共同对付马列主义。但至此，毛泽东还没有明确提出反对修正主义的具体对象；这一具体对象是在1964年1月毛泽东会见日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听涛克己时提出的。他说：在反对修正主义问题上，我们的矛头主要对准赫鲁晓夫；在反对帝国主义问题上，我们集中力量反对的是美帝国主义。同年3月，毛泽东在会见朝鲜外相朴成哲和日共访华代表团的谈话时，先后提出“两条战线”和“两条统一战线”的概念，即“反帝”的统一战线和“反修”的统一战线。

总之，为了与美、苏压力和威胁相抗衡，中国必须在世界上寻求广泛的支持，拓宽外交局面，这便是毛泽东在世界范围内实施建立“反帝、反修”统一战线的国际战略的必要之所在。

毛泽东认为“反帝、反修”统一战线的国际战略所以有可能提出还有着深刻的理论依据。

1. “两个中间地带”的理论。早在1946年毛泽东就提出“中间地带”的概念。到60年代，国际战略格局发生新的变化。美苏两国都力图保持两极格局，但在他们的盟国中，独立自主的倾向开始有所发展。亚非拉民族独立运动空前高涨，越来越多的新兴国家在赢得独立后陆续走上中立的道路，不结盟运动应时而起并日益壮大。根据变化的世界格局，毛泽东提出“两个中间地带”的战略思想。这一理论表明美苏之外的国家都属中间地带；中间地带按照经济发达与不发达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指亚非拉广大经济落后的国家，一部分是指以欧洲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两部分与美苏之间都有矛盾，而且随着自身力量的发展，矛盾日益加深。事情很清楚，中间地带发展的趋势将是独立于美苏之外，并能与美苏抗衡的一支强大国际政治力量的产生。这种世界格局为毛泽东实施建立世界范围内统一战线的国际战略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

2. 对于美、苏当局本质的清醒认识。在美苏夹击的严峻形势下，毛泽东毅然提出建立“反帝、反修”统一战线的国际战略所表现出来的大无畏的民族气概，绝不是盲目的，而是建立在他对美、苏当局本质深刻认识基础之上

的：第一，美国的扩张政策决定它必然要灭亡。美国是各帝国主义中最强的，也是最弱的，因为它控制的地方太多，力量分散。毛泽东形象比喻说：美国是十个指头按十个跳蚤，哪个指头也动弹不得。所以美帝并不可怕。第二，苏联处于美国和中国之间。有一条规律，每当苏联要同美国搞政治交易时，总要搞我们一下，目的是要让美国知道，他们同中国不好，同美国好。但美、苏都想称霸，根本利益互相冲突，矛盾不可解决。所以美苏合作打中国的可能性很小，因为使它们分开的东西比使它们合在一起的东西要多得多。第三，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都是纸老虎，它们内部各自都有许多矛盾，四分五裂，并不是铁板一块，貌似强大，其实很虚弱。据此毛泽东论断：美、苏孤立中国的政策是行不通的。从而为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实施“反帝、反修”的国际战略树立了坚定的信心。

为了顶住美、苏的压力，毛泽东一方面寻求建立国际统一战线，另一方面则侧重于增强本国实力，以加重中国与苏、美抗衡的战略地位。这一时期他在国内先后提出了“多、快、好、省”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和旨在探索本国建设道路的“十大关系”。毛泽东希望中国甩掉经济弱国的帽子，成为工业化强国的心情，在这一时期与外宾的谈话中，表现的尤为强烈和迫切。

应该说明的是，毛泽东在这一国际战略中，所强调的“反帝”和“反修”的分量并不是平行的。由于他认为：美帝国主义已代替英、日，法帝国主义，全世界大多数人民都受美帝的压迫；美国想变中国为它殖民地的梦想始终没有放弃，它在中国周围建立许多军事基地包围我们。而中苏主要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中苏两党不团结有利于帝国主义，不利于世界革命，对中苏两国本身也是很大损失。所以，在“反帝、反修”两条统一战线中，毛泽东把侧重点又放在反帝统一战线上，明确提出主要斗争对象是美国。

现在有的西方学者和政治家把这一阶段中国的外交格局说成是中国“以我为中心的、内向型的思想传统的影响”，是“中国把自己推向双重的对抗之中”⁽¹¹⁾。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两反的外交格局实际上是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同中国为敌的严峻国际形势下被迫形成的。它是毛泽东不畏强暴、自主自强的民族气概的产物。这一国际战略的实施对中国这一阶段的对外工作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加强和发展了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从1957年2月到1965年7月，中国先后同23个亚、非、拉国家建交；并同周围一些国家解决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若干问题，发展了睦邻友好关系。第二，积极开展同西方发达国家的外交工作。在这段时期内，中国加强对西欧和日本的工作。其突出成果是中法建交，这使美国孤立中国的图谋在西欧打开一个缺口。对日本，通过民间外交保持和增进了两国人民间的交往和友谊，为最终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奠定了基础。由于这两方面外交工作局面的打开，使中国顶住了美苏两家的威胁，捍卫了国家的独立主权和尊严，并逐步发展成为独立于美苏两大集团之外的一支重要力量。

在这一时期特别是后期，由于受到强大的外部压力以及当时国内“左”倾思潮的影响，毛泽东在对国际形势的估计和与西方国家发展关系的问题上也有些“左”的偏向。比如：对第三世界的革命形势和世界战争危险估计偏高；而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新特点、新技术革命的兴起和世界经济的大发展则了解注意不够；在国内批评“三和一少”，强调不能和帝国主义和平共处，认为“所谓和平共处事实上只适用于中立国家”⁽¹²⁾。这些“左”的偏向对当

时的外交工作，是有一定消极作用的。

三、联美遏苏的“一条线”和“一大片”的国际战略

自新中国诞生，我国对外一直是以反对美帝为主。直至1970年毛泽东发表的五·二〇声明，主要矛头还是对着美帝。但在这之后，我们的提法逐渐变化，虽仍然提反对两霸，但主要是指向“苏联社会帝国主义”。1973年2月17日毛泽东在会见美国基辛格博士时，提出“一条线”的思想。1974年1月5日毛泽东在会见日本外务大臣大平正芳时，又提出“一大片”的思想。所谓“一条线”是指从中国、日本经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到美国都在这条线上；“一大片”是指这条线周围的所有的国家。“一条线”和“一大片”的思想是毛泽东新的国际战略。其主旨就是要团结这“一条线”和“一大片”中的所有国家，即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反对苏联霸权主义。这是毛泽东根据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苏战略态势和中美苏三国关系的变化所作出的新的国际战略抉择。这一抉择有着重要的现实依据：

第一，美苏争霸态势易位，呈苏攻美守；在两强争霸世界的矛盾斗争中，苏联处于主要矛盾方面。

进入70年代，美苏军事力量对比发生重要变化。1974年苏联战略核武器的数量赶上美国，在核武器运载工具和投掷重量方面已取优势，其近海防御性海军也发展成为一支能对美国造成威胁的远洋海军。这种军事力量的巨大变化，构成70年代美苏争夺态势变化的基础。面对这一变化，美国在战略上没有迅速作出调整。仍把很大一部分力量用在亚洲方面。而苏联则凭借增强的军事实力，利用美国陷入印支战争的困境，加紧在欧洲和中东地区同美国进行争夺。至使美国从70年代一开始便处于同苏联争夺的战略被动地位。美苏态势的变化，引起毛泽东的注意。他逐步把视美帝为主要敌人的注意力移到苏联方面。在60年代末的外宾会见中毛泽东曾几次指出：美国现在困难很大，日子不好过。进入70年代后毛泽东更明确地指出：在苏美争夺中，苏取攻势，美取守势；苏联野心很大，想霸占欧洲、亚洲，甚至非洲北部；苏联是当今世界的主要威胁。

第二，苏联在中苏边界大量增兵，挑起武装冲突，成为中国安全最大的威胁国。

在赫鲁晓夫当政的最后4年中，中苏边界虽发生过一些事件，但相对来说比较平静，还未大量增兵。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对华政策比赫鲁晓夫走得更远，尤以对中国施加军事压力和进行军事遏制最为明显。1969年发生的苏军侵入我黑龙江省珍宝岛地区 and 新疆铁列克提地区两起武装流血冲突，是当时中苏边境最严重的事件。在苏联日益严重的军事威胁的情况下，毛泽东在国内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口号，并在会见外宾中多次指出，苏联想控制中国；中国要准备打仗；现在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第三，美国放弃长期奉行的僵硬的对华政策，为中美两国的接近提供了回旋余地。

1969年尼克松入主白宫后，特别感到苏联已成为美国最强有力的竞争者。于是，急迫地想通过改善同中国的关系以增强美国对苏联的力量，进而维持全球均势，保持美国的领导地位。毛泽东作为一个富有远见的政治家，

当然注意到美方所作出的姿态，在经过慎重考虑之后，毛泽东不失时机地作出恰如其分的反应。1970年10月1日，毛泽东引人注目地在天安门城楼上会见了他的老朋友、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及其夫人。次日会见的照片赫然出现在《人民日报》上。这种事情的发生当然不是偶然的。同年12月18日，毛泽东再次会见斯诺，向斯诺透露了欢迎尼克松来华的意思，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翌年2月尼克松亲访中国，并在上海签订了《联合公报》。中美关系的逐步恢复，不仅使双方放弃了敌对立场，而且为两国联合抗苏提供了现实的基础。

上述情况表明：中国对外关系中的主要矛盾已发生变化，由于美国的削弱和与中国关系的改善，中美矛盾已从主要矛盾降到次要矛盾；而苏联的扩张和武装挑衅，则使它与中国的矛盾激化，由次要矛盾升为主要矛盾。为此，毛泽东改变了60年代“反帝、反修”而主要是“反帝”的国际战略，适时地提出联美遏苏的“一条线”和“一大片”的国际战略。这一国际战略的总体构想是：以苏联为主要对手，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争取同第二世界国家的联合，建立包括美国在内的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统一战线。它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 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这一国际战略的指导思想。帝国主义阵营的分化，与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亚非拉新独立国家的出现，使世界政治经济力量出现新的组合，形成既相互联系又相互矛盾的三个世界。毛泽东根据这一世界形势的新特点，于1974年2月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明确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这一理论的一个重要意义即明确了苏联霸权主义的地位。毛泽东将苏联与美国一起划为第一世界，使人们易于明确当前国际舞台上苏美军备竞赛和战略对峙，主要是为了争霸。进而明白了反对苏联霸权主义同反对美国霸权主义一样，都有利于国际无产阶级和世界各国人民。这个问题的明确，对于中国有效地开展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斗争是十分有利的。

2. 联美遏苏，是实施这一国际战略的重要一环。60年代末至70年代，毛泽东虽然在国内错误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使中国陷入长期内乱，但他始终警觉地注意维护国家的安全，密切注视着国际形势的发展。来自苏联的威胁，引起毛泽东深深的思索。为避免两面作战，毛泽东高度策略地运用苏美之间的矛盾，形成和美国的联合。应该指出的是，毛泽东与美国的接触是很有分寸的。他始终把握住三点不放：一是明确中美联合的目的就是要整垮苏联的霸权主义。二是不留情面的揭露美国在与苏争霸抗衡中想打“中国牌”的阴谋。三是坚定不移地坚持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毛泽东在中美关系问题上显露出来的胆识和远见，不仅维护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也为后来中美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而且对当时的世界战略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 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是实施这一战略的主要内容。第三世界是中国在世界上反对霸权主义可以依靠的基本力量，毛泽东对于发展同第三世界的关系始终是十分重视的。他多次指出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他反对当时世界上把美国、苏联、中国称为“大三角”的说法，他对第三世界的朋友说：“我们另一个三角，叫作亚、非、拉。”⁽¹³⁾毛泽东对中国属于第三世界的界定，实际上是确立中国在国际政治格局中的位置。这为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产生了积极影响。

4. 大力开展同西方国家的友好合作，也是实施这一战略不可缺少的部

分。西方国家主要是指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这些国家从其历史，从其继续保持殖民剥削残余，以及从其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来看，都说明继续保持着帝国主义特征。但是，它们现在同样受到霸权主义的控制、威胁和欺负，是制约战争的和平因素。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引导人们看到这些国家同霸权主义之间的矛盾：一方是为了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另一方是霸权主义的侵略扩张。正因如此，西方国家理所当然地属于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统一战线中的同盟军。

“一条线”、“一大片”的国际战略的实施，对于建立国际斗争新格局，促进中国同更多的国家建立和发展外交关系，改善中国的国际环境，提高中国的国际威望，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在这一时期，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结束了中美两国 20 多年的敌对状态；与日本正式建交；几乎改善了同所有西方国家的关系；继续发展了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友好合作。可以说整个 70 年代，是中国外交大踏步前进的时期。这与毛泽东国际战略的指导和影响是分不开的。

但毛泽东在联美遏苏的国际战略中对于来自苏联的威胁估计过于严重。他当时认为苏联业已变质，不再是社会主义，而是社会帝国主义，是最危险的世界战争策源地，也是最危险的敌人。因此，在决策上把备战放在第一位，立足干旱打、大打、打核战争，国防上处于临战状态，对国际上的和平与裁军持消极态度。在同第三世界某些国家的关系中存在“以苏划线”的现象。所有这些，都使中国的对外形象和对外关系受到了损伤。

四、毛泽东国际战略所含基本思想的现实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基本上是按照毛泽东的国际战略开展外交工作的。中国的外交实践表明，毛泽东制定的各个时期的国际战略，虽然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总的来说是顺应国际政治经济潮流和国际形势及世界格局变化的，也符合国内政策的需要。成绩是主要的。

毛泽东的国际战略根据国际形势和世界战略格局的演变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但是在大的轮廓的变化中，也有始终未变的基本政策和观点，这些政策和观点可以说是毛泽东外交思想中的精华，对于我们今天的对外工作仍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第一，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毛泽东国际战略中的基本立场。旧中国遭受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长达一百多年，从清朝到国民党政府的外交都是屈辱外交，中华民族受尽了丧权辱国之苦。历史证明，没有独立自主，就没有一切。对此，毛泽东是刻骨铭心的。早在 1945 年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就郑重地指出：“中国如果没有独立就没有个性。”建国前夕，毛泽东又明确指出：“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有一丝一毫的干涉。”⁽¹⁴⁾毛泽东把这一基本立场渗透到他各个阶段的国际战略中去。在政治上，他始终反对依附美苏任何一方，强调独立自主处理本国事务，反对大国的控制和干涉。在经济上，他主张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强调建立不依赖大国的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认为只有经济上的独立，才有政治上的独立。在对外学习上，他主张独立思考，反对生搬硬套；认为对外国经验的学习，必须结合本国的实际，必须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加以研究。这些思想仍然是

我们今天对外工作应该遵循的原则。正如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所说：“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

第二，为新中国创建和平的国际环境是毛泽东国际战略中始终一贯的国家目标。列宁依据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将长期并存的客观规律，提出了和平共处思想，目的在于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创造一个和平环境。毛泽东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坚持并发展了列宁这一思想。在理论上他反复强调中国的建设需要和平环境的重要性。认为“保持和平环境，这是大家最大利益”⁽¹⁵⁾，是我们对外工作的主要目标。在对外交往中“应该把思想体系上的分歧和政治上的合作分别开来。思想体系上的分歧不应该妨碍一国与另一国在政治上的合作。”⁽¹⁶⁾中国应该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基础上，同所有国家谈判建立外交关系。从实践上来看，毛泽东三个阶段的国际战略的实施无不是以反对霸权主义、争取国际和平环境为目标的。当今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这决定了中国仍然要把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作为外交的根本目标。

第三，支持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正义斗争，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合作是毛泽东国际战略中的主要内容。毛泽东认为：中国同亚非拉国家在历史上都遭到过西方帝国主义的压迫，有着类似的历史遭遇；独立后又面临着发展经济，防止帝国主义颠覆的相同历史任务，因此中国应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合作。中国人民要为建设一个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并且要帮助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人民，完成我们应当担负的国际主义的伟大义务。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我国在外交工作上，依然坚定不移地奉行毛泽东一贯倡导的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的方针。邓小平在1984年5月会见外宾时明确说：“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这是我们对外政策的一个基础。”“中国永远不会称霸，永远不会欺负人，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

第四，密切关注世界形势和国际战略格局的变化，及时调整本国的对外政策，是毛泽东制定国际战略的基本方法。纵观新中国对外关系的历史，人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十分重视国际形势的变化，注意分析国际政治力量之间矛盾关系的演变，并依此精辟地概括国际格局，适时调整本国的国际战略。这一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形势的发展，制订出战略策略并不断加以调整的方法，为中国提供了在国际舞台上生动活泼地施展身手的可能性。面对当今风云变幻，扑朔迷离的国际局势，我们更需要很好借鉴毛泽东制定国际战略的辩证科学方法，及时调整外交政策，以使国家主权、民族利益不受侵害。

第五，团结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建立广泛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这是毛泽东国际战略中的主要策略手段。毛泽东在国际战略的制定中，很注意在认识世界格局和战略格局的同时抓主要矛盾，组织统一战线。新中国建立后长时期里的反对美帝的统一战线和70年代后的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统一战线，都是这方面的突出实践，收到了好的效果。进入80年代，由于我们正确执行与两个超级大国都不结盟，并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分别同它们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的外交政策，显然，已谈不上什么组织固定的反对它们的统一战线。但这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统一战线这种外交斗争形式了。在当前同发展中国家结成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统一战线，仍是我国一项重要的外交策略。然而现在所说的统一战线，不是针对哪一个国家或哪一个国家集

团的，也不是要我们出面组织，更不是要我们来当这个统一战线的“头”。而是在一定的国际场合，针对一定的问题，自然形成的一种联合行动；反对的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行为。现实情况表明，毛泽东建立国际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进入 80 年代国际国内形势出现了转折性变化。全世界面临的主要问题：一是和平，二是发展。与此同时，国内形势也起了变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把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我党对国际战略又作出一次重大调整，其核心是实现两个根本转变：一是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经过综合客观分析，转变了对战争危险估计过高的看法，作出了和平可以维护的切实判断；二是转变了外交战略路线，不同任何大国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这次重大调整是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在新的形势下对毛泽东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坚持和发展。它表明中国的外交在成熟的道路上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注释

《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4 卷，第 1472—1473 页。

参见张小路：《关键时刻的努力：1949 年中共对美政策分析》，《新华文摘》1991 年 1 期第 62—66 页。

《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2 卷，第 1085 页。

1956 年 11 月 15 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

《毛泽东同志国际问题言论选录》第 234 页。

1949 年 4 月 28 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关于对英美侨民及外交人员态度等问题给总前委、粟张、刘张的指示。

在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援建的大型项目共有 156 个。根据中国第二个五年计划的需要，1958 年 8 月和 1959 年 2 月，双方先后又达成再援建 125 个企业的协定。苏联援助建成的项目，涉及包括军工在内的众多大型工业企业，填补了许多空白，从而奠定了我国工业的初步基础，增强了我国的经济自立能力。

“反帝”、“反修”是毛泽东当时采用的提法，这一提法在国与国关系上实质表现为反对美国、苏联霸权主义，为了保持与毛泽东的说法一致，所以本文仍保留当时的历史提法。

(11)《伟人与大国——施密特回忆录》第 300 页。

(12)1961 年 12 月 5 日毛泽东会见委内瑞拉加拉加斯市议会代表团谈话记录。

(13)1970 年 6 月 19 日毛泽东会见索马里最高革命委员会副主席艾南希谈话。

(14)1949 年 6 月 15 日毛泽东《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

(15)1959 年 6 月 11 日毛泽东会见秘鲁议员团谈话记录。

(16)1954 年 9 月 15 日毛泽东关于英国工党在华活动情况给赫鲁晓夫的信。

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基本来源于本世纪 60 年代毛泽东在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世界形势中形成的几个主要观点。

一是对苏联霸权主义的抵制及认识。从 50 年代后期以后，苏联领导集团即开始凭借本国在战后迅速恢复和发展起来的国力推行同美国合作主宰世界的方针，并逐渐向霸权主义的方向演变。为此，他们不断干涉别国别党的内政，要求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都要受苏联“指挥棒”的驱使，服从苏联的全球战略。对于坚持独立自主，反对苏联控制的国家和政党，则不断施加压力，甚至进行军事威胁，终于导致了社会主义阵营的破裂。毛泽东一直警惕和关注着苏联领导集团的演变，坚定地维护着中国的独立和主权。对于苏共领导人提出的有损中国主权的要求，如建立长波电台、联合舰队等等，毛泽东都毫不含糊地予以拒绝；对苏联为迫使中国屈服而施加的种种压力，如单方面撕毁合同，撤走援华专家，逼迫中国还债，增兵中苏边境等等，毛泽东都领导中国人民以大无畏的气概坚决顶住；当苏共领导集团把中苏两党的分歧公开化，对中国共产党发动全面攻击时，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同苏共领导集团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公开大论战，开展了对于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全面批判。诚然，由于受当时“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这些批判中固然有不妥之处，对于修正主义的概念也缺乏科学的解释。但毛泽东坚持使中国保持独立自主地位，宁可蒙受损失也不向任何压力屈服，则不仅完全正确，而且意义深远。随着这种斗争的深入和苏联演变的发展，毛泽东逐渐得出了苏联已蜕变为霸权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结论，认为这个曾是“老大哥”的国家，已堕落成富有侵略性的危险敌人。

二是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的认识。作为战后资本主义世界头号强国的美国，由于 50 年代侵朝战争的失败，和 60 年代长期陷于侵越战争的消耗，自身实力和对其盟国的控制力都大为削弱，但仍能凭借其实力上的优势维持着对盟国的控制。而这些盟国则随着自身力量的恢复和发展，越来越不甘心受美国的摆布。离心倾向逐渐增长，甚至公开分庭抗礼，从而使帝国主义阵营内部的矛盾也日益尖锐。对这一情况，毛泽东早有预料。早在 1956 年中东发生苏伊士运河事件时，他就根据美英两国暴露的矛盾指出：现在冲突着的，有“两类矛盾，一类是帝国主义跟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即美国跟英国、美国跟法国之间的矛盾，一类是帝国主义跟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矛盾。三种力量，第一种是最大的帝国主义美国，第二种是二等帝国主义英、法，第三种就是被压迫民族。”他还认为，在这些矛盾着的力量中，“帝国主义之间闹，互相争夺殖民地，这个矛盾大些。”1964 年，毛泽东进一步指出：“美帝国主义甚至对它在西欧、北美和大洋洲的盟国，也实行弱肉强食的政策，力图把它们踩在自己的脚下。”为此，他号召“所有受到美国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负的国家要联合起来，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保卫世界和平。”以后，毛泽东又对他曾经提过的“中间地带”的看法作了重新解释，把西欧、日本称为第二中间

地带，亚非拉称作第一中间地带。显然，毛泽东在当时已经把西欧、日本同美国作了明确区分，把他们看作是可以争取、联合的力量。

到 60 年代末和 70 年代初，美国由于自身力量的衰落和中国的发展壮大，已难以继续维持其不同中国交往的僵硬政策。因此，尼克松出任美国总统后，明智地作出了改善中美关系的表示。毛泽东及时地抓住这一契机，推动中美关系开始了正常化的进程。同美国关系的解冻，也为中国同受美国控制的西方国家之间改善关系创造了条件。

三是对亚非拉地区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持。60 年代是世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革命运动风起云涌的时期。一大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宣告了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瓦解。对此，毛泽东非常振奋，并多次代表中国对各国人民的反帝反殖斗争给予坚决支持和高度评价。他在 60 年代曾先后指出：“世界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都得到并将继续得到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的坚决支持。”“中国人民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反帝国主义斗争的胜利看作是自己的胜利，并对他们的一切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的斗争给以热烈的同情和支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风暴，定将给整个的旧世界以决定性的摧毁性的打击。”对被压迫民族和人民革命斗争的前途，毛泽东充满了信心。他在 1970 年 5 月 20 日发表的声明中指出：“无数事实证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小国人民只要敢于起来斗争，敢于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就一定能够战胜大国的侵略。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在 60 年代毛泽东关于国际问题的论述中，对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持和评价占了相当大的份量；世界各地几乎所有的反帝爱国斗争，毛泽东都发表谈话或文电表示支持。这不仅体现了毛泽东对人民反帝斗争的重视，而且还说明他早已把共同进行这一斗争的广大亚非拉国家看作是一个整体。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毛泽东当时已经把世界各种政治力量看成为三个部分，即：企图主宰世界的美国和苏联；在反帝反殖斗争中日益崛起的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以及处在两者之间的一批发达国家。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便是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形成的。

二

70 年代初，世界政治力量的格局在动荡中开始趋于明朗化，毛泽东上述关于“三个部分”的认识得到了完全证实，在此基础上，1974 年 2 月，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第一次阐述了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指出：“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1974 年 4 月 10 日，经毛泽东批准，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的发言中，对三个世界的战略划分作了更为确切的阐述，指出：“从国际关系的变化看，现在的世界实际上存在着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着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此后，毛泽东又从不同角度论述了三个世界的各自特征及其相互矛盾，使之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思想。其主要内容包括：

1. 当前世界的主要矛盾是争霸与反霸，主要危险是霸权与战争。争夺世界霸权的只有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苏联既要充当超级大国，就不能不走同美国争霸的道路；美国要保住其昔日世界霸主的地位，也不能不同苏联激烈争夺。正如毛泽东指出的：“美国在世界上有利益要保护，苏联要扩张，这个没法子改变。”为了在争霸中压倒对方，双方必然要拼命扩充军备，必然要在全球争夺势力范围。这样就使战争的危险不可避免地降临到世界人民头上。因此，毛泽东认为，美苏争霸，必有一战。由于一旦战争爆发，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毫无疑问都将是受害者。因此，为免受战争灾难，大多数国家和包括美苏两国人民在内的全世界人民必然要坚决反对苏美两国的霸权主义和战争政策，这一矛盾也就成为具有突出地位的主要矛盾。毛泽东当时还认为，在苏美争霸中，由于苏联采取战略攻势，所以具有更大的侵略性和危险性，是世界人民的头号敌人。

2. 以经济和军事实力以及对霸权和战争的态度为标准，将所有国家划分为三个世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自不必说，毛泽东把他们划为第一世界。中国和广大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尽管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各异，相互间也存在着各种矛盾，但历史遭遇和维护民族独立、摆脱贫穷与落后、反对霸权主义和战争威胁等现实任务却是共同的。因此，毛泽东把我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都列为第三世界。处于两者之间的一批欧洲国家及日本、加拿大等国，经济上虽都比较发达，但军事上实力不如甚至依赖于美苏两国，政治上也受着这个或那个超级大国的控制，因此都具有维护国家主权和独立的要求。他们既无力发动战争以谋求霸权，又害怕因发生战争而蒙受损失。因此，毛泽东把西欧各国和美国相区别，把东欧国家同苏联相区别，将他们划为第二世界。这里，毛泽东改变了以往用社会制度和阶级属性为标准划分世界政治力量的传统做法。因为这种做法已不能够准确地反映变化了的客观实际，而三个世界的划分则比较准确地反映了新的世界格局，也有利于制定正确的外交方针和政策。

3. 世界人民的主要任务是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第三世界是反霸斗争的主力军。这不仅是因为第三世界国家人口众多，分布广阔，而且还由于他们在历史上曾长期受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压迫，在现实中又饱受超级大国的欺负和侵略威胁，甚至成为超级大国在争霸中任意宰割的对象，因此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和开展联合斗争的要求。事实上，这种斗争也从未间断，到70年代，则出现了明显的联合反霸的趋势，如拉美国家发起的反对超级大国海洋霸权的斗争；阿拉伯国家和其他石油输出国维护石油权益的斗争；七十七国集团为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而进行的斗争等等，都给超级大国的强权政治以沉重打击，成为国际反霸斗争的主要力量。

4. 第二世界是反霸斗争中可以联合的力量。这些国家并不甘心于受超级大国的控制，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他们有时不得不参加超级大国之间的角逐，但总是力求摆脱超级大国对他们的控制。其中一些老牌的帝国主义国家虽然同第三世界有着深刻矛盾，不愿放弃旧的殖民统治。但是美苏两国的霸权主义和战争政策对他们的威胁则更直接、更现实。从而使联合第二世界共同反霸，不仅有必要，而且有可能。因此，毛泽东指出：“要争取他们，如英国、法国、西德等。”⁽¹¹⁾

5. 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因为政治、经济各方面，中国不能跟富国、大国比，只能跟一些比较穷的国家

在一起。”⁽¹²⁾这不仅是因为中国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有着类似的经历，又共同面临着反对霸权，发展经济，摆脱贫穷的长期任务，而且还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要求。大国沙文主义、霸权主义，同社会主义的原则是不相容的。中国既然要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也就永远不会谋求世界霸权，做超级大国。不仅现在经济落后时不称霸，就是将来经济发达了，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也仍然不称霸，仍然属于第三世界。正如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庄严宣告的那样：“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¹³⁾

以上内容体现了一个明确的指导思想，就是以第三世界为主体建立最广泛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当然，由于历史的局限，这一战略思想中也存在着某些不尽符合实际的认识，比如对欧洲国家的划分就过于笼统，没有把东欧和西欧作区别。但是其总的方面和联合反霸的指导思想，则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它不仅为人们正确认识国际形势提供了思想武器，而且也为我国在“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的条件下，排除“左”倾错误的干扰，适时地调整对外政策，搞好外交工作，提供了正确的指导思想。

三

在三个世界划分战略思想的指导下，我国在对外政策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必要的调整。

首先是缩小了打击面，用建立联合反霸统一战线的方针取代了反帝反修的方针。在 60 年代，面对美国的敌视政策和苏联逐步升级的反华行径，我国曾采取了既反美又反苏的对外方针。这在当时确实有迫不得已的因素。因为我们必须为维护国家主权，捍卫领土安全而斗争。问题是这种斗争同时又受到了党在处理国内问题时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影响，致使打击面不断扩大。到“文化大革命”初期，我们在对外宣传中竟提出“打倒帝、修、反”的口号。作为马列主义政党，“帝修反”当然要反对，但当时在极左思潮的干扰下，我们实际是根据这一口号，在外交工作中推行了一系列强加于人，四面出击，不顾政策的做法，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毛泽东发现这一情况后，从 1968 年起屡次对上述做法提出严厉批评，并指出这是“因为中国内部有人搞大国沙文主义，搞极左”。在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中，他又十分明确地把追随或依附于美苏两国的国家，同美苏两国本身作了区别，只把超级大国作为对立面；在超级大国中，又把处于攻势地位的苏联和处于守势地位的美国加以区别，把苏联当作最危险的敌人。从而极大地缩小了打击面，扩大了联合面，纠正了一度向“帝修反”全面进攻的“左”倾做法，并根据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这一当代世界人民的主要任务，确定了建立最广泛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的对外工作方针。

二是加强了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合作。“文化大革命”初期，我们党在极左思潮干扰下，曾片面地把支持世界革命同保持国与国之间的和谐关系对立起来。结果使我们疏远了同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也给我国的外交工作造成了不少困难。三个世界划分战略的提出，纠正了脱离实际地追求世界革命的“左”的倾向，把联合第三世界共同反霸作为外交工作的重点。为此，我国作为第三世界中的一员，努力加强了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合作，

坚决支持第三世界国家捍卫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反对外来侵略和干涉的正义斗争。同广大发展中国家一道，为打破大国欺负小国，富国压榨穷国的国际旧秩序，建立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国际新秩序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从而使我国在第三世界国家中威信日益提高，影响不断扩大，朋友愈来愈多。从 1970 年到 1982 年，同我国建交的第三世界国家达 56 个，比 1968 年以前增加了将近 1 倍。其中在 60 年代同我国外交关系一度中断或发生波折的 7 个非洲国家，都在此期间先后同我国恢复或改善了外交关系。可以说，70 年代是我国同第三世界国家关系大发展的年代。

三是积极改善了同第二世界国家的关系。这些国家不是一些老牌的帝国主义，就是曾被我们认定的“修正主义”。其对华政策又分别受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左右，而我国原来又把反帝反修作为国际斗争的首要任务，从而使我们很难同这些国家进行正常交往。1972 年中美关系解冻后，使中国同日本及西欧国家改善关系的障碍开始得到克服。而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由于论证了争取和联合第二世界共同反霸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从而进一步排除了我国同第二世界国家正常交往的障碍，为我国的外交工作提供了新的发展余地。70 年代中国外交最引人注目的成就，可以说就是同第二世界国家关系的改善。1969 年以前，西欧、北欧和南欧只有 6 个国家同中国正式建交。英国和荷兰只同中国互设有半建交性质的代办处。而到了 70 年代末，除了安道尔等 4 个国家外，中国已同这个地区所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另外，和欧洲共同体，及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也先后建立了外交关系。在广泛建交的同时，我国同西方国家在经济贸易方面的合作也有了实质性进展。从 1973 年到 1977 年，经毛泽东批准，在周恩来的推动下，我国陆续同日本、西德等国签约、成交了一批价值达 39.6 亿美元的引进技术项目⁽¹⁴⁾，为后来的对外开放政策作了一次重要尝试。在此期间，我国同东欧几个国家的关系也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善，贸易、科技交流、人员互访，都有所恢复。因此，当后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对外开放的决策时，中国面向第二世界的大门，事实上已经打开了。这不能不归功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与实践。

当然，由于“文化大革命”尚在继续，我国的外交工作此时还不可能根本摆脱“左”倾错误的影响。特别是江青一伙把同外国的正常交往别有用心地诬蔑为“崇洋媚外”、“卖国主义”，推行闭关锁国政策，给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贯彻和外交工作的开展造成了极大困难。但尽管如此，我国的外交工作在 70 年代还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挽回了“左”倾错误破坏的后果，而且也在事实上促成了广泛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这固然同周恩来、邓小平等人抵制“左”倾错误的努力分不开，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及由此产生的方针政策则起了至关重要的决定性作用。正象邓小平后来指出的：毛泽东在他晚年为我们制定的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对于团结世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改变世界政治力量对比，对于打破苏联霸权主义企图在国际上孤立我们的狂妄计划，改善我们的国际环境，提高我国的国际威望，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¹⁵⁾

四

上述一系列外交成就的取得，还为我们更加全面、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理解党在新时期的对外政策，应付各种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提

供了十分重要的启示。

首先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观察和分析形势的思想方法。如果我们在 70 年代仍然固守那种以社会制度和阶级属性为标准划分世界政治力量的思想方法，那就不可能对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后的世界形势作出清醒的、正确的判断，更不可能作出三个世界的战略划分。三个世界划分战略思想的提出，再一次体现了毛泽东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也说明毛泽东尽管晚年由于思想脱离实际，犯了严重错误，但还并未完全抛弃他曾身体力行多年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如果说他对于国内形势的分析和判断是愈来愈脱离实际的话，那么他对于国际形势的分析和判断则愈来愈接近或符合实际。三个世界划分战略思想的提出，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虽然，如前所述，这一战略思想当中也包含有某些不切实际的认识，但只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观察和分析形势，这一缺陷是不难弥补的。这也说明了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主导作用。

其次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孤立少数，集中打击最主要的敌人的策略方针。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又一次体现了毛泽东在长期对敌斗争中形成的这一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在当时世界存在的多种矛盾中，毛泽东准确地抓住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同世界各国人民的矛盾；同时又深刻地洞察到美苏两霸之间存在着的尖锐矛盾，以及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采取攻势的苏联。从而使国际反霸统一战线对依靠谁、联合谁、打击谁，有了明确的策略方针。由于这一方针的贯彻，有效地粉碎了超级大国主宰世界的企图，壮大了维护和平的力量，制约了战争危险的增长。这一成功的实践再次证明，任何敌对势力，不论多么强大，都不会是铁板一块，总有矛盾可以利用；任何中间势力不论多么动摇，都可以也应当努力争取；作为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先进政党，不论任何时候，都应该坚持依靠进步力量，争取尽可能多的同盟者，尽量缩小自己的对立面。这一点，在今天的国际斗争中仍然有着现实意义。

再次是对于战争危险的警惕与判断。不可否认，毛泽东确曾过分强调过战争爆发的危险，认为美苏争霸必有一战，而且战争危险迫在眉睫，并要求国内一切工作都要服从战备的需要。而战备工作则要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从而挤掉了一些必要的经济建设。这在军事对抗加剧，侵略威胁临近的情况下，是不可避免的，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必要的。正是由于对战争危险的重视，我国及许多国家才保持了对战争的高度警惕，加强了反侵略战争的准备，从而制约了战争危险的增长。同时，还应当看到，毛泽东在预测形势发展时也曾认为：不是战争引起革命，就是革命制止战争。70 年代初他还认为：“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¹⁶⁾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不仅继续指出了美苏争霸所产生的战争危险，而且也明确指出了第三、第二世界联合起来，反对霸权主义，制止战争爆发的紧迫需要与现实途径。这说明，随着形势的发展，毛泽东也认为世界战争并非不可避免，问题在于制止战争的途径。事实证明，毛泽东设想的通过革命制止战争的途径是不切实际的，而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所开辟的通过联合反霸制止战争的途径则是现实可行并卓有成效的。70 年代以来世界和平局面的得以维持，以第三世界为主体的联合反霸斗争是起了重要作用的。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联合反霸所产生的威慑力，并不仅限于军事力量的增强，而主要是体现在经济与政治力量的发展。这一点，对于人们根据形势的发展，再对战争危险作出新的更加符合实际的判断，

无疑是十分有益的。

上述几点启示，实际上比三个世界划分战略思想本身的指导作用更有价值。因为正是这些宝贵的启示，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外交政策的进一步调整奠定了成功的基础。

五

世界进入 80 年代以后，形势的发展出现了某些新的特点，一方面苏美仍在激烈争夺，战争危险依然存在。但另一方面，双方之间大规模的军备竞赛又产生了一种制约力量，以致于双方谁都无法制胜把握，谁都不敢轻启战端。与此同时，作为反霸主体的第三世界不断发展壮大，特别是中国作为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因素，作用日益突出，成为谁都无法忽视的、既独立自主、又足以同两个超级大国抗衡的重要力量，从而形成了所谓“大三角”的战略格局。对这一格局的发展趋势作出判断并采取对策，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在 80 年代面临的新任务。而中国共产党此时也恰好具备了胜任这一任务的条件。这不仅是因为我们已经有了三个世界划分的正确战略思想及其成功实践可以作基础，而且还由于江青反革命集团已经被粉碎，十年动乱已经结束，从而排除了外交工作中最大的破坏因素。更为重要的是，1978 年底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邓小平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方针，纠正了长期以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指导思想，决定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为全党全国的头等大事和中心工作。这些具有全局意义的重大转变，无不为我们党制定正确的对外政策提供了保证。

在这一背景下，从 80 年代开始，我们党在对外政策方面逐步进行了又一次调整和充实。指导这一次调整的，正是为形成和实践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作出过重大贡献的邓小平。1982 年 9 月，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上提出：“加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我国人民在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务。这三大任务中，核心是经济建设，它是解决国际国内问题的基础。”⁽¹⁷⁾从而为我国新时期的对外政策确定了依据和方向。围绕这一依据和方向，中国共产党从对国际形势的认识到的外交工作的实践，都发生了一系列变化。

首先是在继续警惕战争危险的同时，提出了关于世界战争可以避免的新论断。1980 年初，邓小平在谈到国际形势时曾指出：80 年代“是非常动荡、充满危机的年代”，但是，“如果反霸权主义斗争搞得好，可以延缓战争的爆发，争取更长一点时间的和平。这是可能的，我们也正是这样努力的。”⁽¹⁸⁾随着形势的发展，到 1985 年，邓小平更加坚定了他的上述判断，明确指出：“过去我们的观点一直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这几年我们仔细地观察了形势”，认为“世界战争的危险还是存在的，但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由此得出结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¹⁹⁾通过发展和平力量，树立战胜霸权主义，避免世界大战的信心，这既是对三个世界划分战略思想的发展，又成为我们党在历史新时期制定国内外政策的一个重要出发点。

第二，同对于战争与和平的认识相联系，邓小平又进一步提出了关于当代世界两大主题的新论断。战争可以避免的前提是，要把反对霸权主义的斗

争搞好。这就要求和平阵营的力量必须不断增长，必须使这一力量的主体——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尽快地发展强大起来，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缩小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第三世界越发展、越强大，世界和平就越有保证。基于这一认识，邓小平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的论断，他指出：现在世界上问题很多，但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有两个，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因此，两大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²⁰⁾由于80年代美苏两国限制军备谈判取得了进展，缓和气氛出现，和平希望增加；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同少数发达国家的贫富差距却在拉大，发展经济、摆脱贫困，已成为广大第三世界国家面临的日益严峻的课题。因此，邓小平指出，在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中，核心是发展问题。不仅第三世界国家要发展，就是发达国家也面临着如何继续发展的课题。解决这个问题，既要靠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团结合作，也需要推动发达国家从人类发展的高度来给予合作和支持，改变旧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也就是通过南南合作，推动南北合作。从上述认识出发，坚决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为推动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的解决而努力，就成为历史新时期我国外交工作的主要任务。同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相比较，邓小平关于两大主题的论断更侧重于从经济角度去把握政治问题。从反霸、维护和平的目标来讲，二者是一致的。但就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来看，两大主题的论断所指出的通过经济发展来促进和平、保证和平的道路，则更为现实，更加符合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在历史新时期的又一重大发展。

第三，更加坚定和全面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80年代“大三角”的世界格局中，中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不论倒向哪一方，都将打破已有的力量平衡，影响世界局势的稳定。同时也有可能使中国最终成为超级大国的附庸，丧失经过多年奋斗才取得的独立地位。因此，邓小平反复强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外交政策的调整，就是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²¹⁾“我们奉行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外交政策。谁搞和平，我们就拥护；谁搞战争和霸权，我们就反对。”“我们这种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最有利于世界和平。”⁽²²⁾同以往相比，我国在新时期所奉行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具有两项重要发展：

一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起，我们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确定和实施了对外开放的方针，并努力使二者相辅相成。邓小平在总结中国的历史时谈到：“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当然，象中国这样大的国家搞建设，不靠自己不行，主要靠自己，这叫做自力更生。但是，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还需要对外开放，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来帮助我们发展。”⁽²³⁾在邓小平的推动下，我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得到了坚定的贯彻和不断的扩展，取得了显著成效。不仅促进了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而且还极大地增强了中国自力更生的能力和独立自主的地位。这是毛泽东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的进一步发展。

二是在坚持反对霸权的同时，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积极发展同一切国家的友好关系，开展同世界各国的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作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创始国，

中国一向把这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对外关系的准则。三个世界划分战略的提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于现代化建设总任务的确定，以及改革开放方针的实施，为我国根据这一准则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障碍，同世界各国和平共处提供了更加充分的条件。为此，邓小平不仅反复强调“我们应当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²⁴⁾而且还多次向国际社会推荐这一准则，并得到了广泛的赞同，从而使我国的外交工作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表现了更大的灵活性，既坚持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又努力争取同一切国家和平共处，友好合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得到了继续巩固和加强；同美国、苏联先后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同西欧、东欧国家的关系得到了不断改善。特别是对于东欧国家，邓小平代表中国共产党主动承认了过去我们对“东欧各国各党所处的特殊环境理解得不够”⁽²⁵⁾的缺点，作了自我批评，为双方关系的恢复和发展扫除了障碍，使我国与东欧各国各党的关系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从而弥补了作三个世界划分时对于东欧国家的认识不够符合实际的缺陷。经过一系列努力，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国际上得到了越来越多的理解和赞赏，同我国正式建交的国家逐年增加，至今已达 150 多个。我国的国际威望和地位，也得到了空前的提高和加强。

通过上述回顾，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我国的对外政策从 70 年代起，就开始摆脱“左”的影响，逐步走向成熟和完善，终于开创了我国外交工作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赢得了极为有利的外部环境。为此奠定了坚实基础的，是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而使之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则是邓小平的历史贡献。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注释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341 页，第 342 页。

《支持巴拿马人民反美爱国正义斗争的谈话》，见 1964 年 1 月 13 日《人民日报》。

1960 年 5 月 9 日《接见伊拉克、伊朗、塞浦路斯的朋友的谈话》，见 1960 年 5 月 10 日《人民日报》。

1961 年 4 月 23 日接见亚非外宾的谈话，见 1961 年 4 月 29 日《人民日报》。

(11)摘引自 1977 年 11 月 1 日《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

见 1974 年 4 月 11 日《人民日报》。

1976 年 2 月间的一次谈话，引自 1977 年 11 月 1 日《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

(12)毛主席 1974 年 2 月的一次谈话。引自 1977 年 11 月 1 日《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13)引自 1974 年 4 月 11 日《人民日报》。(14)参见房维中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第 505 页。(15)(17)(18)《邓小平文选》(1975—1982 年)，第 146 页，第 372 页，第 205 页。(16)1970 年五·二〇声明。(19)(20)(21)(22)(23)(24)《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127 页，第 105 页，第 57 页，第 156 页，第 78 页，第 283 页。(25)《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1987 年 2 月—7 月)，第 20 页。

学习毛泽东关于党际关系的思想，积极发展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关系

钟柯迪

今年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毛泽东诞辰 100 周年。毛泽东在他波澜壮阔的非凡一生中，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建立了永不磨灭的历史功勋，在中国历史上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对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为争取世界和平，作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他在光辉的一生中，始终坚持伸张正义，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以强凌弱、以富压贫，对被压迫国家、民族和人民的斗争事业积极地给予同情和支持，把毕生的精力奉献给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事业，因而在世界人民中赢得了崇高的威望和尊敬。他不愧为 20 世纪的世界性伟人。

一、毛泽东一向重视发展我党我国的对外关系

毛泽东历来认为，一个国家的革命和建设，离不开世界各国人民的同情、支持和帮助；一切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压迫的人民都是相互支持的。中国革命和建设，主要靠的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本国具体实践相结合，靠的是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靠的是本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斗争，同时我党从成立之时起，就十分重视发展同国外的联系和交往，并且得到了各国人民广泛的同情、声援和支持。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国经济建设事业的发展，也推动了人类进步事业，有力地支持了世界人民的正义斗争。

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很重视我党同外国政党和进步组织的关系，努力争取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人民革命的支持。革命胜利后，我们党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执政党和领导党，他强调为国内社会主义建设争取一个有利的和平的国际环境，更需要扩大对外交往，广交朋友。建国前夕，毛泽东就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明确提出：“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1954 年，他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致开幕词中谈到我国的总任务时，强调要“团结全国人民，争取一切国际朋友的支持，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长期担任党的主席职务的毛泽东，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亲自接见来自五大洲的各国政府、各种党派、各个阶层和各种不同意识形态的朋友，包括对我持敌视态度的人士。他说：“我的工作的一部分，就是同国外的同志、朋友谈谈。连敌对的人，我也见见谈谈”。从新中国成立至 1976 年 9 月毛泽东逝世，在这 27 年间，据不完全统计，他先后 700 多次会见应我们党和国家邀请的来自五大洲 100 多个国家的各种客人达 3000 多人。

毛泽东在他的全部著作中，在同外宾的谈话中，在指导我党我国的对外工作的实践中，不仅为我党我国制定了对外关系的基本路线，而且提出了人民外交的崭新思想，强调对外工作要着眼于人民。认为，党也好，国家也好，总是朋友越多越好；革命是这样，建设也是这样。要交朋友，就要同各种不同政治倾向的人士打交道，各式各样的朋友都要交。他说：“中国人民需要和平，需要建设自己的国家。我们需要许多朋友，许多外国朋友的帮助，不管这些朋友是什么国家的，包括美国人和日本人，只要他们愿意来中国看一

看，我们都是欢迎的”。“没有朋友是不行的。”

毛泽东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愿意同资本主义国家不同意识形态的政党求同存异，发展合作。早在1954年10月23日，他在同印度总理尼赫鲁谈话时就表示，“尽管思想和社会制度不同，两个政党或两个国家是完全可以合作的。如果邱吉尔的党愿意的话，我们也可以同它合作。我们也愿意同美国合作，只要美国愿意。”由于种种原因，毛泽东当年关于同西方国家不同意识形态的政党发展关系的主张没有能够及时实现。70年代末期以来，随着国内形势的变化和党的对外政策的调整，毛泽东的这一愿望才逐渐得到实现。现在我们党已同世界上许多各种类型的政党建立了不同形式的联系，其中大部分是意识形态不同的政党。这是对毛泽东这一思想和愿望的继承和发展。

二、毛泽东关于党际关系的主导思想

毛泽东关于发展我党与外国党关系的思想是极为丰富的。总的说来，他强调即使是与意识形态相同的政党发展关系，也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反对“老子党”和强加于人；反之，与意识形态不同的政党，只要在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下，也可以求同存异，发展合作。毛泽东的这些光辉思想，奠定了我党同外国党发展关系的原则基础，也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至今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毛泽东一贯主张不要照搬外国模式，必须从本国实际出发，对于一切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外国人，不要求他们承认中国人的思想，只要求他们承认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该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一个基本原则。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强调他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列宁说：“马克思的理论所提供的只是一般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运用，具体他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正是由于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本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花了巨大的精力，不断纠正党内的教条主义倾向，才使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并使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实践证明，如果违背了这一原则，革命和建设就会遭受挫折和失败。基于我们党的这一基本经验，毛泽东对于来华访问的外国党的朋友，当他们赞扬并说要学习中国的经验时，总是劝告他们说：“任何外国的经验，只能作参考，不能当作教条”。“不能硬搬，硬搬就危险，我们曾经因为硬搬而吃了大亏”。他指出：“马列主义基本原理是一致的，但各国具体情况不同，马克思主义者要善于独立思考来运用马列主义”。“各国应根据自己的特点，决定方针政策，把马克思主义同本国特点结合起来”。

毛泽东提出的这些观点，在当时是非常有针对性的、具有重大意义的。因为在党与党的关系问题上，特别是在国际共运中，长期以来存在一些错误要求和作法：譬如，有的以“老子党”自居，脱离别国实际瞎指挥，对别国党发号施令，硬要别人什么都听它的；有的又对马列主义采取教条主义态度，迷信大党的经验，不顾本国实际情况，照搬照抄。这些倾向、要求和作法，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严重损害了共产党之间关系的正常发展。毛泽东针对这种情况，根据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明确地指出了在共产党之间的关系中，只要求承认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本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而不要求承认别的什么思想、别人的指令。其历史功绩和意义是十分巨大的。

(二)毛泽东一贯主张党和国家都要独立自主。他历来认为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不同的历史条件和地理环境，各国的党应根据本国的情况和自身的条件，独立自主地决定该党的一切事务。他说：“一个国家的党要领导革命走向胜利，不通过自己的路线、自己的经验、自己的头脑、自己的手，而靠别国帮助就不行。”“革命是自主，建设也是自主”。

国际共运 100 多年来的实践证明，虽然任何一国的革命和建设都离不开国际上的同情、支持和帮助，但是，首先它是在一国范围内进行的。一些国家的革命能否胜利，胜利后能否保住成果，主要的、决定性的因素，还是这些国家的党和人民。毛泽东在领导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中，经历了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建立了新中国，使倍受外国势力凌辱的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建国后，他又为维护国家的独立和自主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他强调，我们的方针要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自己找出适合我国情况的发展道路。我们一定要有自己奋斗到底的决心，要信任和依靠本国亿万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否则，无论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取得胜利，胜利了也不可能巩固。在对外关系中，他非常强调“独立自主”。1957 年 11 月，他在出席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时，曾与各党领导人就有关各党独立自主的问题交换看法，反复宣传独立自主。在讨论《宣言》稿时，毛泽东明确要求把“独立自主”的意思写进去。他对外国党的领导人说：“在这次会议的宣言上，我们提出加上一句话，各国党的事由他们自己决定。这样对各党就没有束缚了。”毛泽东把“独立自主”作为党际交往的一条重要原则，使党与党之间的关系能够正常发展有了基本前提。毛泽东的这一思想，现在已成为国际交往的一个重要准则。

(三)毛泽东认为，各国党不论其历史长短、党员多少、执政与否，都应一律平等，相互尊重，绝不允许存在凌驾于各国党之上的“老子党”、“领导党”。

他在同外国党的朋友交往中，非常重视党与党之间的平等关系，认为各国党应平等相处，求同存异。各国党有自己的民族传统和历史发展条件，所以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尊重各国的人民，由他们自己去探索、去解决，绝不能强求一致，不要强加于人，更不允许由别的党充当“老子党”来发号施令，甚至因不赞成自己的主张就进行干涉、颠覆或更换人家的领导。他说：“国有大小，党也有大小，都要平等相处”。党与党之间的关系“应当完全是平等的，相互吸收对方的经验，包括反面的失败的经验”。

毛泽东特别强调党与党之间要相互尊重，谦虚谨慎，不干涉别党内部事务。古往今来，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富压贫，大国称霸的现象屡见不鲜。对此，他旗帜鲜明地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一个党对另一个党的干涉和控制；对于遭受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欺压的国家、民族和人民，毛泽东总是表示极大的关注、支持和同情。主张不论大国小国，大党小党，都应该是平等的、民主的、友好的和互助互利的关系。应相互尊重，彼此学习，而不是不平等的和互相损害的关系，任意干涉别人的内部事务。他指出：一个国家或是一个党对另一个国家或一个党的控制，“我看，到最后都控制不了。他当父亲来控制儿子，儿子长大了，照例不听父亲的话。一个家庭都如此，何况一个国家、一个党。”

毛泽东还严格要求我们党的同志在对外事务中，要谦虚谨慎，彻底干净消灭大国沙文主义。他说我们自己曾是被人欺侮的，知道受欺侮的滋味不好

受。“我们决不可有傲慢的大国主义的态度，决不当由于革命的胜利和建设上有了一些成绩而自高自大”。他强调：“中国人在国际交往方面，应当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大国主义”。即使将来物质力量发展起来，也不做超级大国，不干涉人家的内政，不搞强加于人。与此同时，毛泽东还要我们虚心向外国学习，认为任何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要学习世界上一切好的东西。他说：“世界各国，什么地方有好东西，统统学来。这是件好事。”“资本主义在经营、管理上有许多地方比我们好，我们也要学习他们好的东西。”我们党在新时期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是同毛泽东的这些思想一脉相承的。

(四)毛泽东也非常重视发展我党与意识形态不同的政党的关系，认为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不同，不应成为彼此合作的障碍，只要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是可以求同存异和相互合作的。他还强调，我们既不把自己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强加于人，也不允许别人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强加给我们。1959年，他在会见智利激进党领导人时说：“你们大概不信仰共产主义。你们信仰你们的，我们信仰我们的，但是我们有共同点，可以合作。”1961年他在会见法国社会党的一位领导人时，客人对毛泽东说：“法国虽离中国很远，那并不要紧，但有一堵墙把两国隔开了”。毛泽东回答说：“墙有各种不同的墙：有意识形态的墙，有社会制度的墙，有外交关系的墙，有经济关系的墙，这是暂时的现象，人民终究是要把墙拆掉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墙，只要在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下，是可以拆掉的”。30年以后，再回头来看看，世界各国和各政党与我党我国之间长期存在的各种“墙”，慢慢地被突破了。毛泽东当年所预言的“这是暂时现象，人民终究是要把墙拆掉的”，终于逐渐变成了现实。

三、毛泽东关于党际关系的思想在新形势下的继承和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世界形势和国内形势的变化，我们党逐步调整了对外关系。邓小平在关系中国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的重大历史关头，敏锐地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和契机，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以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一理论，用一系列新的思想观点和科学诊断，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新成果，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在国际问题上，邓小平洞察和分析了国际形势的新变化，提出了关于在长时间内有可能避免世界大战的论断；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关于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建立国际关系新秩序；关于对国际局势要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等新的战略思想。在党的对外关系方面，他回顾了国际共运中纷繁复杂的历史，提出了如何处理我党与外国党关系的指导原则，继承、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关于党际关系的思想。邓小平指出，党与党之间的关系，有两条原则一定要坚持。第一条原则是，党与党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关系，不是父子党关系；第二条原则是，任何国家的事情只能由那个国家的党和本国人民去判断。他在总结过去处理党际关系的经验时指出：“有一点最重要，就是任何大党、中党、小党，都要相互尊重对方的选择和经验，对别的党、别的国家的事情不应该随便指手划脚。对执政党是这样，对没有执政的党也应该是这样”。

我们党根据毛泽东历来的思想以及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时期就我们党如何处理同外国党关系所作的一系列新的论述，全面、系统地提出了党际关系“四项原则”，即独立自主、完全平等、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我们党还主张党际关系不以意识形态的异同为条件。各国不同性质的各类政党，只要遵循这四项原则，都可以进行接触、交往，建立友好联系，增进了解，求同存异，在和平和发展等共同关心的事业中谋求合作。近十几年来，正是在这些原则和思想的指引下，我们党的对外关系开创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目前与我党建立和发生联系的政党，不仅有共产党，还有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工党、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民主政党以及发达国家的其他政党。党的对外交往其范围之广泛，形式之多样，内容之丰富，都是历史上不曾有过的。现在，我们党已同世界上 100 多个国家的 280 多个政党建立了不同形式的联系。近年来，国际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但是我们党的对外交往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是路子越走越宽，朋友越来越多。我们的朋友遍布五洲四海。

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的执政党和领导党。党的对外关系和对外工作是国家总体外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对外工作同其他外事战线一样，都服从于和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个中心任务，为国内争取一个有利的和平的国际环境。我们要进一步学习毛泽东关于党际关系的思想，学习邓小平在这个问题上的继承、丰富和发展，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为进一步发展中国共产党与外国政党的关系而努力奋斗。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

注释

《列宁选集》第 1 卷，第 203 页。

毛泽东与抗战前期中国共产党的对美关系

张琦置

身于 90 年代的中国,人们常常会有感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给中国带来的勃勃生机,因而对毛泽东时代经历的封锁与反封锁的斗争进行种种反思。然而追溯历史,人们又发现,不仅正是毛泽东在晚年亲自开启了中国通向西方世界的大门,而且也正是这位伟人在半个多世纪以前,亲自会见了第一位美国记者,从此揭开中国共产党对美关系史上的第一页。中国共产党与美国最初建立起民间关系,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后;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党逐步积累了对美工作的经验,最终确立了以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为核心的对美政策。毛泽东作为党中央的最高决策者,无疑对这一政策的形成及实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国际反日统一战线的提出与抗战初期的对美政策

制定什么样的对美政策,离不开对美国有什么样的认识。而对美国的认识往往与对帝国主义的总体认识是分不开的。中国共产党从坚决主张同时反对所有帝国主义,到主要反对法西斯帝国主义;从提出利用帝国主义矛盾,到承认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即使是帝国主义国家,也有可能与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面对共同的敌人,经历了一个认识上的发展过程。

中国共产党从创建之初便明确宣布,它所领导的革命目的之一是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这一任务的提出,既根据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又由于中国当时处于被多个帝国主义国家同时统治这一国际环境。从这一任务出发,中国共产党在革命的开始阶段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作为宣战的对象。对美国这样一个打着“自由主义的假面具”、靠实行“门户开放”政策跻身于瓜分中国行列的帝国主义,毫无疑问也一直视为革命的对象之一。不过,当时中国共产党在反对一切帝国主义时,更突出反对英日帝国主义,把美国则视为潜在的危险。

1931 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对中国的入侵不仅给中国带来严重的民族危机,也刺激了日美矛盾的增长。本来日本已成为中国的头号敌人,但当时的中共领导人受共产国际“第三时期”理论严重影响,对内继续实行打倒一切中间势力的策略,对外继续实行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策略。这时中共中央领导人虽然多少看到了日美矛盾的加剧,但却认为假如中国想在抵抗日本侵略时利用美日之间的矛盾,那是荒谬的,因为“美国也同样是帝国主义国家,是中国民众的敌人,希望美国来反对日本,等于引狼入室。”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人甚至认为西方列强对日本的政策越强硬,那也就意味着它们“愈益成为中国之再分割与瓜分之积极的参加者了。”

1935 年 1 月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结束了中国共产党内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左”倾错误的领导,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这一变化成为中国共产党得以改变其内外政策,摆脱教条主义束缚的最重要的内部条件。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开始用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观察世界事务、指导中国革命战争。面对德意日法西斯的崛起,苏联和共产国际改变策略,要求各国共产党与本国的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统一战线,反对目前正在挑起战争的法西斯帝国主义国家。刚刚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不久便得到共

产国际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新的策略精神，这与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对时局的分析基本一致，所以很快实现了内外政策的转变。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不仅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而且确定了建立国际反日统一战线的策略原则，决定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政策是“同一切和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相反对的国家、党派、甚至个人，进行必要的谅解，妥协，建立国交，订立同盟条约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确立新的内外政策后很快付诸实施，积极开展上层统战工作。美国记者斯诺从中共与东北军签订秘密停战协定的消息中受到鼓舞，决定进入陕北共产党所在地区进行考察。对于斯诺的来访，中共中央十分重视，并在1936年5月15日的政治局会议上进行了专门研究。当时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洛甫、博古、王稼祥，以及吴亮平等。会上明确中国共产党当前主要的目标是反日，从反日统一战线的立场出发，需顾及到其他帝国主义及其人民之利益，并把这些利益与中国人民的利益联系起来。为此，中共在确立对外建立反日统一战线方针时，积极寻求国际援助并准备在废除不平等条约等问题上向英美作出让步。对美国可能对中国抗战所起的作用抱有较大希望。

两个月以后，斯诺冲破国民党的重重封锁，来到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受到苏区人民的热烈欢迎。毛泽东时常搁下大堆报告和电报，取消一些会议，与斯诺谈话。在以《中国共产党和世界事务》为题的谈话中，毛泽东全面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时期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总政策，表示中国苏维埃和中国人民要同要求和平的各国人民、各党派和各群众组织团结起来，组成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毛泽东还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进程中希望得到更多的援助，但并不依赖援助。希望各友好国家不要帮助日本帝国主义，至少采取中立的立场。毛泽东还指出，与友好国家的联合不仅限于战时，对那些曾在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战争中给予援助或未曾反华的国家可以享有同中国亲密友好和互利的关系。在这里，毛泽东第一次提出战时最大限度地利用国际各种力量有效地反抗外来侵略，战后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与各国建立友好关系的外交原则。

毛泽东还具体分析了对美国抗日可能采取的态度，断定美国政府要对中国和日本的未来起非常积极的作用，因为“美国的东方利益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紧密连结在一起。”同时批评一些目光短浅的美国政治家以为中国的灭亡与他们无关的错误认识，希望他们放弃“孤立主义政策”。毛泽东在这里首次从积极方面分析美国在远东的作用，并明确将美国列入反日统一战线之内，这说明中国共产党在观察国际事务的能力上有了很大提高，一方面坚持以往对美国帝国主义本质的根本认识，一方面从策略上注意区分帝国主义利益的不同。虽然或许对美国抗日的决心和能力估计过高，但从坚决主张同时反对所有帝国主义，到强调主要反对法西斯帝国主义，从提出利用帝国主义矛盾，到承认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即使是帝国主义国家，也有可能与被压迫民族面对共同的敌人，无疑是认识上的一次飞跃。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与美国政府之间没有任何联系，连起码的相互了解的渠道都没有。由于国民党对红军的“围剿”和封锁，外界对中共红军的了解，是被丑化了的“共产共妻的土匪”形象。斯诺在92天里，遍访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和红军的领导人。他返回西安后，仅在一个月里，

就在英美最有影响的报刊杂志上，发表了数十篇有关访问的报道，引起国内外的轰动。1年后，斯诺将苏区见闻写成《红星照耀中国》(又称《西行漫记》)。在中国共产党急于冲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向外部世界宣传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策略的时候，斯诺充当了出色的媒介，他把中国共产党人提高到一个生机勃勃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改革者的地位”。

历史进程表明，如果没有1935年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的转变，就不可能有1936年斯诺的西北之行，如果没有斯诺的西北之行，中国共产党的对美关系的发展进程至少将被推迟；如果没有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具有的献身精神和卓越才能对斯诺产生深刻的影响，也就不会有《西行漫记》的问世，以及它带来的如同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一样“震撼世界的成就”。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通过国民党亲英美派向英美表示联合的愿望，是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过程中实现的。半年后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共中央立即提出“实现抗日的积极外交，拥护国际和平阵线，反对法西斯阵线，同英法美苏等国订立各种有利于救国的协定”，明确表示赞成中国在抗日的问题上与包括美国在内的一切反侵略国家合作。从西安事变到1938年国共正式建立统一战线期间，许多外国记者都试图赶上和超过斯诺的成就，至少有十几位西方记者陆续访问了各抗日根据地。毛泽东腾出时间接待了几乎每一位来访的外国记者，使他们无一例外地对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产生良好印象，并通过他们的笔客观地向国内外进行了报道。

与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成功地在延安会见西方记者的同时，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活动也先后在设立八路军办事处外事小组的武汉和重庆开展起来。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博古等中共领导人，利用其合法或半合法地位，积极开展外交活动，及时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主张，了解英美的对华政策，收集有关国际形势的情报，使武汉和重庆先后成为战时中共国际活动的中心。

这一时期是国共合作的最佳时期，国民党放松对中共的封锁，中国共产党利用这一有利时机成功地开展了最初的对美外交活动。虽然还仅仅限于民间接触，但却使中国共产党与美国从原来完全封闭的状态，走向相互接触和了解的阶段。了解是认识的起步，认识是制定政策的依据。尽管这一时期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从抗战的实际状况出发，有了联合美国共同反日的愿望，但毕竟还是一厢情愿。美国究竟能采取什么样的对日方针和援助中国人民抗日的实际步骤，还有待于在抗战发展的进程中得到证实。

建立反日统一战线过程中出现的复杂情况及对美政策的相应调整

抗战之初，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基本上把美国看作一支同情与赞助中国抗战的力量，并希望美国在支持中国抗日力量和制约日本侵略能力两方面做出积极努力。但是美国毕竟是帝国主义国家，它制定对日对华政策的出发点是为了维护美国统治阶级的利益。抗战爆发后国际形势的发展表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虽然使英美等国的在华利益受到严重威胁，但它们却仍然准备对日妥协，企图牺牲中国的某些利益，把中日战争限制在一定范围内。这样既可以阻止日本法西斯“瘟疫”的肆虐横行，又可以防范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的迅猛发展。到1939年前后，英美两国对中国抗战奉行“不干涉”政策不但没有收敛，反而出现绥靖日本、制造远东慕尼黑的倾向。这使毛泽东与

中国共产党强烈感到英美等国无意制止日本的扩张，却是在“纵容侵略战争，自己从中取利。”为此，中共中央于1939年6月向全党发出“关于反对投降危险的指示”。毛泽东在《反投降提纲》中指出：中国目前面临的最大危险之一，就是新的慕尼黑的可能。英美法自抗战以来一直保持“中立”，不过是“坐山观虎斗”的阴谋计划，是鹬蚌相争渔人得利的政策。中国共产党目前的任务就是要动员国内外的进步力量来反对英美帝国主义的绥靖政策。

在制定对外政策时，中国共产党人首先要考虑为中国的抗战争取一个有利的外部环境，但同时也要考虑内部环境。作为一个拥有独立武装和政权的非执政党，其对外政策与对内政策是密不可分的。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在制定国际反日统一战线策略之初，就考虑到国际反日统一战线与抗日民主统一战线两个统一战线相互促进的关系，希望英美等国能影响它们在华利益的代表国民党政府，坚持抗日联共的方向，避免走上降日反共的道路。抗战开始阶段，国民党与中共在军事上携手合作，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疑虑相对减弱。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日本加紧对国民党政府政治上的诱降，蒋介石把战略重心移向防共限共反共，国共之间的摩擦和冲突逐渐增多，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对美国暗中支持国民党进行反共活动的疑虑也随之增加。特别是1939年底至1941年初，蒋介石乘德意日与英美两大集团最后形成之时，发动两次大规模的反共高潮，中共面临十分险峻的局势。中国共产党在打退国民党发动的反共高潮的同时，加紧了对英美对华政策的抨击。

从以上看出，中国共产党自提出与美国建立反日统一战线策略之后，美国在援助中国人民抗日和赞成国共合作抗日两方面的表现都令中共感到失望，不仅如此，简直就是在起相反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调整了自己的对美政策，将重心移向反对英美的绥靖政策及其破坏国共合作方面。

1939年4月至8月，英法同苏联就共同抵抗德国侵略进行缔结互助条约的谈判，未达预期目的。其间希特勒竭力利用英法同苏联的矛盾，主动调整和改善对苏关系。苏联为了打破英法绥靖政策和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于8月23日与德国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希特勒乘机向英法及其附从国开刀。9月1日德军入侵波兰，欧洲战争爆发，英法等国立即处于与德意尖锐对立的状态。苏联对外政策的转变必然对共产国际产生重大影响。共产国际判定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战争，目前存在的是德意日和英法两个帝国主义阵线和超脱于帝国主义战争之外的苏联和平阵线，因此要求各国共产党人，目前必须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反对反动势力的基础上”重新调整政策。共产国际放弃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策略，重新回到反对一切帝国主义战争的反帝统一战线策略，既不符合当时国际政治的现实，又不符合各国共产党的实际，因而立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引起极度的混乱。

中国共产党在接到共产国际关于改变策略路线的指示以前，已对英美等国采取了猛烈的抨击，因此，也不再强调建立国际反日统一战线。在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性质的时候，毛泽东指出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同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一样，都属于“非正义的掠夺战争”，因为不论是德意日，不论是英美法，都只有“掠夺人民”这一个帝国主义的目的。甚至认为“以为英法波方面总多少带有一点进步性，这是极端糊涂的见解”。基于对战争性质的这一认识，毛泽东强调过去关于法西斯国家与民主国家的划分，“已经失掉了意义”⁽¹¹⁾。争取所谓民主国家的资产阶级及其政策，同苏联，同各国人

民，同各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一道，建立统一战线的时期“已经过去”⁽¹²⁾。因而，新的统一战线可能的组成部分就“少了一个所谓民主国家的资产阶级”⁽¹³⁾。

由于中国共产党此时将对美政策的重心从联合转向防范和斗争，因此自1939年9月斯诺再次访问延安后，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几乎没有什么英美记者能够进入中共控制的地区。这固然同国共关系再度紧张，国民党加紧了对中共地区的封锁有关，但中国共产党为了抵制国民党政府与英美结盟，避免与西方记者接触也是原因之一。中共中央当时认为，“英美记者及各种人员系政治情报员，……彼等政治态度依英、美政府对华政策为转移”，“在报章杂志中发表挑拨国共关系和不利于我之言论”⁽¹⁴⁾，因而一度关闭了延安的大门。

联合英美等国是为了实现共同抗日的目的。当联合的对象不能实现这一目标甚至与这一目标相悖时，联合就失去了意义。争取联合不等于不进行必要的斗争。正像中国共产党在处理与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中，坚持以斗争求团结的愿望一样，对英美这一时期的对日对华政策进行必要的斗争，正是为了推动它们尽早放弃牺牲中国人民利益讨好日本的错误政策，转向积极抗击日本侵略、维护中国国内团结统一的正确立场。但是，在国际局势发生重大变化和受到苏联、共产国际放弃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策略的强烈影响下，毛泽东与中共中央一度对是否能继续联合英美产生较大疑虑，这不能不使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工作受到影响。不过，这一时期虽然中国共产党对英美两国的政策大体一致，但也有些区别。对英政策侧重反对其对日妥协，对美政策侧重防范其支持蒋介石反共。对这一时期美国逐步采取的一些制裁日本的措施，中国共产党仍在不同程度上给予了肯定。

值得提及的是，尽管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对外政策上受到苏联对外政策的较大影响，但是并没有因此在对内政策上产生连锁反应。即使在国民党一再发动反共高潮、中共处境十分险恶的情况下，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进行了以不破裂统一战线为限度的必要的斗争，从而维护了国共合作抗日的局面。不过，对外政策与对内政策之间出现的矛盾，很快就成为毛泽东及中共领导人必须加以解决的问题。

走出两难境地，重新强调国际反日统一战线策略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定后，共产国际一面要求各国共产党放弃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策略，一面允许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共产党继续采取民族统一战线策略，这使中国共产党陷于内外政策相矛盾的两难境地。但是40年代的中国共产党已不像30年代那样听任共产国际摆布了。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在一般接受共产国际指导的同时，更多地是从中国抗战的实际状况出发决定自己的对策。

1940年德国在占领波兰后，相继占领欧洲西部国家，苏联则建立起自己的东方战线，形成德苏相对峙的局面。欧洲战局的演变，使苏联和英国都受到德国的牵制，它们在东方对日妥协的倾向明显增长。与此相反，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对日本却采取了威慑行动，因而使本来就存在的日美矛盾相对突出。6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关于形势和党的任务的报告。他在分析国际形势时虽然仍基本以帝国主义战争为理论依据，但也注意到现实

状况中英法在欧洲的失败及日美矛盾的扩大，因此提出不要再强调英美法搞东方慕尼黑的危险性⁽¹⁵⁾。7月7日，中共中央在党内指示中明确指出：英美法已不再是引诱中国投降的重要因素⁽¹⁶⁾。13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讨论时局的会议上重新强调，“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尚有可供革命利用之矛盾。”8月2日，中共中央打电报批评南方局和新华社在宣传中未能把握住国际形势的特点，指出必须把一般地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政策与外交政策区别开来，“不要去鼓励帝国主义的军备‘迎头赶上德意日’，也不要英美改变对日对华政策后（即在放弃东方慕尼黑政策后）去反对利用英美外交”⁽¹⁷⁾。

以上看出，这一时期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在总体上沿用共产国际关于国际问题理论的同时，并未忽视自己对瞬息万变的局势的独立判断和分析，而当这种分析的结论与共产国际的看法不完全吻合的时候，他们采取了一种灵活的办法，即把理论原则同现实政策分开，以避免在实际工作中出现大的失误。这说明毛泽东与中共中央此时在处理国际事务时，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冲破了以苏联为中心考虑问题的模式。

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对美政策的制定除了受美国对日政策的影响，更重要的还取决于美国对中国内部事务的态度，或者说，取决于国民党对中共的态度。因此，当皖南事变一触即发之际，毛泽东曾估计最困难、最危险、最黑暗的可能性“莫过于美国参战后迅速击败日本，在日本投降后把中国英美派从财政上军事上武装起来，中国由日本殖民地变为美国殖民地，国共合作变为大规模内战”⁽¹⁸⁾。这里说的是时局发展的最坏的一种可能性。当处于外事工作前沿的中共南方局领导人向中央汇报了他们对时局的不同看法后，毛泽东及党中央迅速改变了他们的上述认识。毛泽东在11月6日给周恩来的电报中指出：蒋加入英美集团有利无害，加入德意日集团有害无利，我们再不要强调反对蒋加入英美集团了。

12月25日，毛泽东在《论政策》的党内指示中，第一次全面总结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党制定对外政策方面的经验。毛泽东指出，必须在具体分析和有所区别的基础上制定党的对外政策，总的原则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共产党是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的，但是既须将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和现时没有举行侵略的其他帝国主义，加以区别；又须将同日本结成同盟承认“满洲国”的德意帝国主义，和同日本处于对立地位的英美帝国主义，加以区别；又须将过去采取远东慕尼黑政策危害中国抗日时的英美，和目前放弃这个政策改为赞助中国抗日时的英美，加以区别⁽¹⁹⁾。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毛泽东在这里详尽地区分了国际上各种政治力量对日态度的变化，并以此作为或者联合或者反对的依据。特别是毛泽东第一次将国内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原则运用于处理国际事务，这不仅为中共中央调整对外政策找到科学的依据，而且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对中国共产党制定外交政策产生深远的影响。

与重新解释对外政策原则的同时，中共中央专门对如何评价英美的对华政策、如何对待英美记者等问题发布党内指示，要求对于来接洽访问等英美人员应采取欢迎与招待之态度，一方面把他们当作情报人员看待，另一方面把他们当作外交代表人员看待，“以便经过他们形成我们与英美之间的一定程度的外交关系。”⁽²⁰⁾中央这一指示的发表，标志自《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定以来一度关闭的延安的大门，又开始向西方开放了。中共与美国之间恢

复直接接触的渠道，无论对于中国共产党掌握美国对华政策的脉搏，还是对于美国认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都提供了便利条件。

中共中央调整对外政策直接推动了南方局的外事工作，南方局领导人正是通过对英美记者的联络工作，才冲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将皖南事变的真相公布于世，引起国际舆论对国民党政府的抨击，终于导致美国政府的直接干预，其结果是使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在走得很远的反共道路上有所收敛。皖南事变为中国共产提供了一个能够深入了解美国对华政策的机会。主要负责外事工作的周恩来通过与美国特使柯里的会晤，了解到美国政府的政策是力图控制中国以牵制日本，为此不会赞成中国内战扩大；美国将继续支持蒋介石政权，但对他又有所不满，想施加一些压力促使蒋改革。周恩来据此向中央进言：中共在外交方面将有广阔的活动余地，可以大有作为⁽²¹⁾。

虽然通过皖南事变，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已意识到在制约国民党政府的各种国际力量中，美国越来越起到重要作用，不过当时还没有立即重新考虑联合美国，毛泽东强调的是要进一步利用美日矛盾，使蒋介石难于投降和反共。真正促使毛泽东与中共中央重新强调建立国际反日统一战线并以此为基础开展对美外交的重要国际背景，是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的爆发。德国对苏联的突然袭击，宣告苏联依靠孤立自保来维护自身安全的政策是行不通的。苏联面临的严重形势迫使斯大林迅速改变政策，共产国际随之重提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口号。苏联和共产国际改变以往的错误策略，得到各国共产党的积极拥护。至此，对全世界共产党人来说，帝国主义战争理论与反法西斯战争现实之间的矛盾终于得到解决。本来就在具体的外交工作中注重区分帝国主义现行政策的不同，善于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矛盾的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立即于6月23日作出《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的决定，明确表示支持苏联反对德国法西斯侵略的战争，拥护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事态的发展表明，与英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策略是完全正确的。在德国法西斯进攻苏联的当天和次日，英美相继发表尽其可能支持苏联抗击法西斯斗争的声明。面对英美与苏联立场的迅速接近，中共中央迅速大幅度调整了对英美的政策。7月6日毛泽东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明确指出：“不管是否帝国主义国家，凡反对法西(斯)者就是好的，凡助法西(斯)者就是坏的，以此来分界限，不会错的。”几天后，毛泽东还以同样口气专门写了一个党内指示，他在是否反法西斯这一唯一标准下，重新判断英国的对德战争、美国的援苏、援华、援英行动及可能的美国反日反德战争，“都不是帝国主义性质的，而是正义的”，中共均应表示欢迎，均应联合一致，反对共同的敌人⁽²²⁾。毛泽东在此显露出超乎寻常的决断口气，说明困扰于他头脑中处理国际事务中的矛盾终于得到了解决，他可以用是否反法西斯这一唯一标准来评估当时国际上的各种政治力量了，而不必首先考虑苏联的利益。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虽然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世界被压迫人民的利益，但有时也常常以牺牲他国利益换取自身的安全，所以苏联的利益并不一定完全代表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毛泽东与中共中央自此明确在国际事务中划分是与非、正义与非正义的界线，预示它将以此为出发点，制定出更加符合中华民族、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利益的对外政策。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更坚定了中国共产党执行国际反日统一战线策略的决心。当日本袭击珍珠港、美国对日宣战后，中共中央立即

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和《关于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指示》，正式向全世界宣布中国共产党确立与英美等国建立反日统一战线的策略，明确指出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是为了侵略英美及其他国家，英美抵抗日本是为了保卫独立自由与民主的正义的解放战争。中国应与英美和其他国家“缔结军事同盟”，实行配合作战，建立太平洋一切抗日民族的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要求每一个中共党员在各种场合与英、美人士作诚恳坦白的通力合作，以增加英美抗战力量，改进中国的抗战状况⁽²³⁾。从此，中国共产党不仅在下层，同时也在上层和美国政府之间，放手大胆地与英美人士进行情报和军事等方面的合作。

可以看出，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决定大力开展对美统战工作，此时已并非一厢情愿了，它既符合中国革命的利益，又符合美国的远东战略和在华利益。毛泽东与中共中央看到美国已成为日本在远东的劲敌，与日本的最后决战非美国莫属。美国则认识到要打败日本，需要与中国军队协同作战。因此，不赞成国民党政府的反共内战政策，希望国共两党团结，并要求国民党政府实行民主改革。美国对华政策中包含的这些积极因素，既反映了美国对日作战的需要，也反映出世界民主潮流的必然趋势。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到一个月，即 1942 年 1 月 1 日，美英苏中等 26 个国家签署《联合国家宣言》，标志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正式建立，争取民主与民族独立从此成为一股不可抗拒的政治潮流。中国共产党愿与美国进行合作，不仅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且找到了双方利益的共同点。有符合人类进步潮流的共同利益，才有反日统一战线建立的前提和发展的前景。这种在处理国际事务中“求同存异”的思维方式，在今天看来仍有现实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今天我们遵循的平等互利的国际关系准则，正是战争年代在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求同存异”的策略原则的延续。

结束语

在考察了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抗战前期对美政策和对美外交的形成过程后，我们不难发现，影响中国共产党对美政策的变化及最终确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的是国际局势和中国战局的变化；苏联和共产国际采取的反法西斯策略，美国对日本侵略所持的态度，美国对国共合作采取的态度。在受到多方面因素制约的情况下，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在制定对美政策时，必须正确处理以下几方面的问题，给我们留下宝贵的历史经验：

一、必须正确处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与殖民地国家理论同中国抗战现状之间的关系。

根据列宁关于帝国主义与殖民地国家相互关系的理论，我们知道帝国主义国家与殖民地国家在本质上是压迫与被压迫、侵略与被侵略的关系，它们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从这一理论和中国革命的总目标出发，无论发动侵华战争的日本帝国主义，还是未采取直接侵略行动的英美帝国主义，都是帝国主义国家，它们在实行对外扩张，奴役弱小民族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但是，在中日战争特定的条件下，它们又产生了利益分配不均的矛盾，这一矛盾有时表现为不同军事大国之间严重的利害冲突。这就使反对和抵制日本侵略势力的英美派帝国主义国家，客观上站到反抗日本侵略的中国人民方面。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就不单纯表现为以中国人民为一方，与以日本帝国主义为另一方的军事对抗，而是出现以中、苏、美、英等国为一方，与以日本为另一方相对峙的战略格局。在这一新的格局下，中国人民的反日斗争就有了联合英美等国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正是基于对中国抗日局势的科学分析，毛泽东与中共中央提出了建立国际反日统一战线的正确主张，将中国革命的长远目标和现实任务结合起来。但是，英美等国虽与日本有尖锐的利害冲突，并不等于它们就会采取果断的行动去制止日本的侵略。英美出自自身利益的考虑，完全可能采取抵抗或者绥靖两种不同的做法去缓冲它们与日本的矛盾。这就使能否实现对英美的联合最终不取决于中国共产党，而取决于英美所采取的对日方针。抗战战局的发展证明了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对英美提高警惕的必要性。中国共产党并未因提出建立包括英美在内的反日统一战线策略，就忽视对英美绥靖政策的批评。这表现出毛泽东及中共中央在处理国际事务中具有的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灵活性的统一。

二、必须正确处理接受共产国际策略指导与保持中共解决国际问题独立性之间的关系。

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抗战局势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反法西斯战局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当时作为共产国际所属的一部分，组织上还要接受共产国际的直接领导。而苏联既是世界上反法西斯的重要国家，又在共产国际中处于支配地位。这就决定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在制定对外政策时不能不受苏联对外政策的影响，不能不接受共产国际的策略指导。一般来说，苏联是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它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所处的地位是任何一个国家不能替代的。苏联同时面临来自德意和日本两方面的夹击，将战略重点放在欧洲，对日本取守势不是没有一定道理。问题是苏联将自己对国际局势的判断与世界战争的定性强加于各国共产党，要求各反法西斯国家完全服务于苏联民族利益的需要，在是否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问题上表现出极大的随意性和不稳定性，这就使中共在判断时局和制定对

外政策时处于十分复杂的境地。他们一方面要拥护共产国际的策略路线，一方面又要面对中国抗战出现的危局。这就是毛泽东与中共中央为什么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一度不再强调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但不久又必须重申利用帝国主义矛盾的原因。抗日战争毕竟是中国人民的当务之急，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矛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反对当前最大的敌人，毕竟是中国抗战的题中应有之义。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务实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共产国际改变方针给中国抗战事业带来的消极影响。

三、必须准确判断美国的对华政策，区别美国对中共与国民党对中共政策的异同。

美国作为蒋介石国民党统治中国的支柱，在本质上与国民党有着共同利益。当时中国共产党与美国完全没有官方联系，甚至民间接触也微乎其微，所以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判断美国对国共合作的态度，主要取决于国民党对中共的态度。当国共关系较为融洽时，他们对美国的评价就高一些，当国共关系紧张时，他们对美国的批评就多一些。这毕竟不是很科学。因为美国与国民党政府之间并不是铁板一块，它们既相互利用又相互制约。另外美国对中国抗日力量也有一个认识过程。美国基于其在华利益和远东利益的考虑，赞成中国抗战，但起初美国政府认为只有国民党政府及其军队，才是抵抗日本的力量，因此在军事上装备上全力支持国民党政府。但通过与国民党政府的交往，美国逐渐发现国民党军队并不是中国抗日的唯一力量，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也是抗战不能忽视的一股力量。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也日益引起美国对它的不满情绪。因此美国希望维持中国内部的统一局面，并督促国民党政府进行必要的改革。这就使美国的对华政策与国民党一味限共反共的心理形成距离。皖南事变后，中共看到了美国对华政策的这种变化。随着战局的演变，中国共产党逐步将美国视为牵制国民党降日反共的重要力量，加紧与美国进行军事及政治上的合作。直到抗战胜利前后，美国取代日本，逐渐成为支持国民党蒋介石政权反共反人民的外来势力，中国共产党才放弃了联合美国的政策。

抗战前期是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特别是对美政策形成的重要时期。这段经历对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是十分宝贵的。正像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处理国内问题的经验日臻成熟是从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到抗日战争中期一样，他们处理国际问题的经验也是在这一时期开始积累的。这不仅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得到壮大和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也为其从延安走向世界大舞台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注释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卷，第426页。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卷，第97页。

《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第62、67页。

《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第125、128页，第130—131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美)肯尼斯·休梅克：《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第48页，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卷，第297页。

(19)《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80页，第764页。

《季米特洛夫文集》(中译本),第373页。

(11)(12)(13)毛泽东:《论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1939年9月14日。

(14)(20)《中央关于对待英美籍新闻记者态度的指示》,1940年12月25日。

(15)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政策》,1940年6月25日。

(16)《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1940年7月7日。

(17)《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目前国际形势与我党的宣传方针》,1940年8月2日。

(18)1940年10月25日毛泽东给周恩来的电报,另见《皖南事变》第34页。

(21)袁明、哈里·哈丁主编《中美关系史上沉重的一年》,第24、2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22)《中共中央关于对于内外势力联合或反对的标准的指示》,1941年7月12日。

(23)《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1941年12月9日。

小炮击孕育大战略——对 1958 年毛泽东决策炮击金门的历史考察

廖心文

1958 年的炮击金门是毛泽东围绕台湾问题处理对外关系的一个重大决策。它是一场以军事斗争为表现形式的政治、外交之战。这场斗争“直接对蒋，间接对美”，集中反映了毛泽东作为一个战略家的过人胆识和智慧。斗争的结果不仅有力地支持了中东人民的解放斗争，破除了对西方的迷信，更重要的是对中国共产党争取台湾当权派，发展海峡两岸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海峡两岸关系出现转机后，毛泽东不失时机地提出对台关系的重要原则，为后来邓小平形成“一国两制”的构想，提供了思想依据，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炮击金门“直接对蒋，间接对美”

1958 年夏，中东事件发生后，毛泽东从国际战略的高度和解决台湾问题的根本目的出发，作出了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决策——炮击金门。他明确指出，斗争的性质是“直接对蒋，间接对美”。毛泽东这样提出问题有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

从历史原因来讲，台湾问题本来属于中国内政。但是，1950 年，在朝鲜战争爆发的同时，美国以武力侵占台湾，随后，同盘据在那里的蒋介石集团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美国的介入，使台湾问题严重复杂化。此后，中国人民争取台湾回归祖国的斗争包含了性质不同的两种内容。一种是，坚决要求美国放弃对台湾和台湾海峡的侵略和干涉，这是国际性的斗争；另一种是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这是内部斗争。当时，前一种斗争表现得更尖锐、更突出。1954 年日内瓦会议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后，毛泽东曾及时把台湾问题提到全世界人民面前，要求美国从台湾撤军。在中国的努力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压力下，1955 年 8 月美国不得不同意用谈判的方式来解决台湾问题。但是，由于美方缺乏诚意，1957 年底谈判中断，当时，中国已经进入全面建设时期，希望创造一个有利于和平建设的国际环境，谈判中断，预示美国准备进一步在这个地区制造紧张局势，这对中国的和平将形成很大威胁。因此，毛泽东一直寻找机会使台湾问题引起国内外关注，将美国逼回谈判桌旁。1958 年夏发生的中东事件，使他下决心“利用这个机会在国内外搞点东西”。毛泽东抓住这个机会提出台湾问题有种种考虑，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可以把台湾问题同支持中东人民反美斗争的国际战略意图密切地结合起来，使两个地区的斗争互相支持，互相配合，互为后盾。这是毛泽东作为战略家的高明之处。

从现实情况来看，中东事件发生后，美国在入侵黎巴嫩的同时，积极支持蒋介石集团向大陆沿海地区骚扰，使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面对蒋介石集团的疯狂挑衅，毛泽东明确提出两条方针：第一，要斗争；第二，要讲策略。

从表面看，中国政府斗争的对象是蒋介石集团，但是，蒋介石集团向大陆的挑衅是在美国支持下发生的，因此，这场斗争实际上是中美蒋三方的矛盾斗争。而当时下决心同美国人斗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对比中美两国的情况，中国存在着几方面不利的因素：第一，美国在经济、军事等方面有较

强的实力。如果打起仗来，不仅有登陆作战的力量，而且还有原子弹、导弹等现代化武器装备，足以摧垮战争对方的工业中心。这一点曾经令许多对手害怕；第二，社会主义阵营中最强大的苏联不支持中国采取强硬方针。他们认为，如果中国采取斗争的方针，势必引起美国人参战，而美国的力量是“可观的”，“力量表现在导弹上”。他们告诫中国政府，“目前不宜于打”，社会主义阵营也没有必要投入这场战争；第三，中国国内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局面刚刚开始，经济、军事等方面都比较落后，不具备打现代化战争的条件，也不具备登陆作战的能力。

在种种不利因素面前，毛泽东所以能够下这个决心是建立在他对形势合乎实际的分析与判断上。当时，对形势，国内外人们普遍关心，而又认识各异的有这样几个问题：第一，中美之间会不会打起来？毛泽东认为，不会打起来。原因是，中国不希望打仗，美国也害怕同中国打仗。他分析说：“我总是觉得，它(指美国)是霸中间地带为主。至于我们这些地方，除非是社会主义阵营出了大乱子，确有把握，一来，我们苏联、中国就全部崩溃，否则，我看他是不敢来的。”第二，如果打起来怎么办？毛泽东认为，万一打起来也不可怕，他说，“我看还是横了一条心，要打就打，打了再建设。”“每天总是怕，在干部和人民里头不鼓起一点劲，这是很危险的。”第三，如何比较中美双方的力量？毛泽东承认美国有实力，特别是拥有原子弹，认为这是美国的优势，也是中国无法比的。但是，他强调，力量不仅仅表现在这个方面，还应该看到：“人心就是力量，我们这边的人多一点，他们那边的人少一点”。从这个意义上比较，美国“力量有限，困难甚多”。毛泽东认为美国的困难主要表现在5个方面：第一，美国的军事基地遍布世界各地，因此，造成力量分散，处处兵力不足；第二，美国国内厌战空气甚浓，人民反对政府的战争政策；第三，资本主义世界中也下支持美国的政策；第四，全世界都在反对侵略，反对战争；第五，世界各地蕴藏着革命力量，反帝斗争一触即发。这些分析破除了对西方的迷信，这是毛泽东在战略上蔑视帝国主义的具体体现。

同时，毛泽东也清楚地看到中国面对的毕竟是一个强大的敌人，在具体斗争中稍有不慎，就有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因此必须讲究策略，寻找最有利的斗争方式来取胜。这是中东事件后毛泽东一直考虑的重要问题。1958年8月17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会议，毛泽东作出炮击金门的最后决定。18日，毛泽东致信彭德怀，亲自部署准备打金门。他提出，要“直接对蒋，间接对美”。这8个字，包含了毛泽东决定打金门而不打台湾的极重要的策略思想，也是他妥善处理中美蒋三角关系的绝妙之笔。

毛泽东的考虑很有道理。蒋介石败逃大陆后占据着中国两部分地区，一部分是金门和马祖等沿海岛屿，一部分是台湾和澎湖列岛，这两部分之间隔着公海，统称台湾地区。当时，台湾驻有美国军队并受到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的保护，如果打台湾，会为美国参战提供口实，也会引起一些中立国家的不安与误解。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则不同。那里没有美国驻军，也不受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的制约，我们打金门可以不和美国人直接交锋。如果美国出面干涉，只能在全世界面前暴露它的侵略立场，使其政治上陷于被动。毛泽东后来谈到这个问题时说：“我们整金门，我们是整家法，这是我们国内的事。当然，整台湾也是整家法，不过，那个地方有你美国兵，那我还是暂时不去”。由于执行了打金门的重要决策，中国围绕台湾问题同美国的

斗争在政治上始终处于主动。

从7月中旬到8月中旬，毛泽东为打金门做了大量艰苦细致而周密的准备工作。毛泽东后来谈道：金、马局势那么严重，“每个环节都是我和(周)总理搞的。美国第七舰队护航，杜勒斯战争边缘政策，这样的事不能粗枝大叶，要很准确，很有纪律。”“那时，每天两大本参考资料都要看完，不然你不了解情况，如何决策？全世界一切舆论都要了解。”⁽¹¹⁾在短短一个月中，前线部队根据毛泽东提出的“不打无准备之仗这个原则，必须坚持”⁽¹²⁾的指示，完成了空军的紧急战斗转场，及海军舰队和岸炮部队的人闸集结。

8月23日，毛泽东选择联大紧急会议讨论通过阿拉伯各国要求美国从中东撤军提案的第二天下令对金门展开大规模炮击，这是毛泽东独具匠心的选择。因为，美国从中东撤军的提案通过后，中东局势将缓和下来，这样，国际关注的热点就会转向台湾地区。有助于中国人民的斗争。

二、逼英国走向谈判桌旁

金门炮响后，各方面作出的反响证明，毛泽东对形势的判断极富预见性。

在美国政府方面，表现十分恐慌，立即从地中海、旧金山、日本、菲律宾等地调舰队和飞机集结于台湾海峡，准备协防金、马。中国向金门开炮的第四天，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发表谈话，重申美国将不放弃它已经承担的，以武力阻止解放台湾的“责任”，并授权国务卿杜勒斯于9月4日发表声明，公开威胁要把美国在台湾海峡地区的侵略范围扩大到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

但是，在世界范围内，美国的战争叫嚣并未得到多少呼应。除南朝鲜李承晚集团外，几乎都不赞成美国的作法。即使像日本、英国这些美国的盟友都表示出反对意见。日本有关人士表示，金门沿海岛屿属于中国内政，美国最好不要干涉；英国在中东问题上与美国互相配合共同行动，而在远东即台湾地区问题上则反对美国“介入”；在美国国内，反战空气甚浓，甚至像赫尔利那样敌视中国的人都认为，美国政府在执行一种“自杀政策”。

还需要看到的是，苏联虽然不赞成中国在台湾问题上采取强硬态度，但在得到中共方面关于不拉苏联“下水”的承诺后，公开表示：美国对中国的侵犯就是对苏联的侵犯，苏联不会“无动于衷”、“袖手旁观”。苏联的态度对美国的行动起了一定的制约作用。

在国内外种种压力下，美国政府不得不重新审慎地考虑对中国的政策。9月4日，杜勒斯声明后，在备忘录中透露出这一信息：一，国民党可以自己与中共交战，美国将保护运输；二，希望中共不会认真打起来；三，美国不放弃和平谈判的希望⁽¹³⁾。这三条表明：美国不想与中共直接交战。

从8月23日至9月4日将近两周的时间，毛泽东炮击金门的目的基本达到：第一，警告并严惩了蒋介石集团；第二，减轻了中东人民的压力；第三，调动了国内人民的积极性；第四，试探了美国对台湾地区的态度。最重要的是第四点，正如周恩来所说：“打炮就是试验他，这回试验出来了，杜勒斯这张牌出来了。”⁽¹⁴⁾

美国的底摸清了，方针也就有了。毛泽东根据新的情况，确定采取边打边谈，以打促谈的方针，逼美国重新回到谈判桌旁。

具体办法是：一面继续炮击金门，并向全世界正式宣布，中国领海的宽

渡为 12 海里，未经中国政府许可，一切外国飞机和军用船舰不得进入中国的领海和领海上空。一面积极呼吁恢复中美和谈。9 月 6 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谈话，可以看作是对杜勒斯备忘录的答复，用周恩来的话说，毛泽东向杜勒斯又打出一张新牌。毛泽东在谈话中说：“我们这一打，打出美国想谈了，他敞开了这张门了，看样子，他现在不谈，也是不得了的，他每天紧张，他不晓得我们要怎样干。那好，就谈吧，跟美国的事就大局说，还是谈判解决，还是和平解决，我们都是爱好和平的人嘛。”⁽¹⁵⁾同一天，周恩来发表《关于台湾海峡地区局势的声明》，他在强烈谴责美国侵略行径的同时，代表中国政府公开倡议“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谋求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消除”⁽¹⁶⁾。

在毛泽东谈话期间，金门守军的海上补给线被截断。美国军舰以为蒋军运输船护航为名侵入我国领海。福建前线指挥部请示毛泽东是否开炮。毛泽东指示坚决打击，但是叮嘱“只打蒋舰，不打美舰”。我方一开炮，美国军舰立即丢下蒋军运输船向台湾方面遁去。这更增加了毛泽东以边打边谈方针取胜的信心。曾任这次炮击总指挥的叶飞后来回忆：“事后我才明白，原来毛泽东命令只打蒋舰，不准打美舰，并且规定如美舰向我开火，我军也不予以还击，这一切都是在试探美帝国主义所谓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的效力究竟有多大，美军在台湾海峡的介入究竟到了什么程度。经过这一次较量，就把帝国主义的底全部都摸清楚了。”⁽¹⁷⁾

毛泽东的谈话和周恩来的声明立即引起美国政府的注意。周恩来后来说：“美方对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反映很快，非常重视关于和谈问题的几句话”⁽¹⁸⁾。当时，艾森豪威尔立即召集国防安全委员会会议，表示中美之间可以“立即恢复谈判”。同毛泽东所提“准备恢复谈判”一语相比，美国人的心情更为迫切。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美国处境的困难，它不得不按照中国人民的意愿回到谈判桌旁。

毛泽东依据形势变化提出的“边打边谈”方针得到国内外称赞。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傅作义参加最高国务会议后致信毛泽东，高度赞扬“我们党在主席英明的战略思想指导下，对这个战略的运用可以说达到了艺术的境地，在这个战略面前，从杜鲁门到艾森豪威尔都不得不让我们牵着鼻子走。”⁽¹⁹⁾

中美大使级谈判是 1955 年 8 月 1 日在日内瓦开始的。中方代表是驻波兰大使王炳南；美方代表是驻捷克大使约翰逊。当时，中国的方针是通过这个会谈，解决一些具体问题，并为中美之间和缓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高级谈判做准备。但是，尽管中国为推动谈判向前发展作出了各种努力，但美国方面不肯接受中国方面的任何建议，致使谈判陷入僵局。1957 年 12 月 12 日，美国方面在第 73 次会议上竟以约翰逊调任为由，委派非大使身份的代表参加会谈，企图降低会谈级别。在这种情况下，中美谈判不得不中断。

1958 年 9 月 15 日，中美两国大使级谈判在炮击金门的背景下于华沙复会。毛泽东清楚地看到，我方要取得主动必须先了解美方的态度。而美国不会轻易托底和提出具体方案。因此，在谈判开始的前两天，毛泽东从武汉致信领导这次谈判的周恩来，提出谈判的原则是：“三四天或者一周以内，实行侦察战，不要和盘托出，彼方亦似不会和盘托出，先要对我们进行侦察。”⁽²⁰⁾当天，周恩来复电说明，已电告我方谈判代表，“先与美方周旋，逼其先我露底。”⁽²¹⁾事情果然如毛泽东和周恩来所判断的，在第一次会议上，美国不肯拿方案，而是一再提出，先停火，再讨论各种具体措施的提议。当时，

中方代表为抓紧时机、争取主动，在休会 10 分钟后就提出了希望双方停止敌对行动的五条方案。这使美国产生一种错觉，认为中方急于达成协议，因此态度立即强硬起来，要求台湾地区立即停火，说什么美国不能容忍和坐视与它有“共同防御条约”的盟友的领土被武力侵犯。与此同时，杜勒斯在纽约召开的联大会议上遥相呼应，要求中国先停火，然后再进行中美谈判。这使中国方面在谈判初期一度陷于被动。毛泽东发现后，立即予以纠正。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指示我方代表，“应该采取积极进攻的方针”，即在美方不正面回答我方提案，而继续主张停火的情况下，立即提出要求美国从台湾海峡撤出它的一切武装力量，停止向中国领海领空的一切军事挑衅和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以缓和消除目前台湾海峡紧张局势的反建议(22)。这一反建议确定了中美谈判的根本原则，扭转了谈判中的被动局面。9 月 19 日，毛泽东十分兴奋地致信周恩来，指出：“我们这种新方针、新策略是主动的、攻势的和有理的。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是我们外交斗争的必须形态。”(23)

为配合华沙谈判，福建前线指挥部认真研究了毛泽东 9 月 13 日指示中关于对金门“白天黑夜打零炮，每天二十四小时，特别是黑夜，使敌昼夜惊慌，不得安宁”的意见和周恩来的有关指示后，决定采取三条措施：一、继续进行炮击；二、实施对金门轰炸，增加蒋军压力；三、采取陆空炮联合攻击，全面开花。毛泽东同意周恩来关于“在目前形势下，对金门作战方针，仍以打而不登，断而不死，使敌昼夜惊慌，不得安宁为妥，海、空、炮联合作战确不易配合很好，且有触及美舰美空军的可能”的意见，并指出：“照此办理，使我们完全立于不败之地，完全立于主动地位。”(24)

由于毛泽东正确运用“边打边谈”的方针，由于美国国内愈来愈多的人反对政府的战争政策，美国政府不得不进一步调整对台湾问题的政策。9 月 30 日，杜勒斯在答记者问中声明：我们没有保卫沿海岛屿的任何法律义务，我们不想承担任何这种义务。今后我要说，如果美国认为放弃这些岛屿不会对可能的保卫福摩萨(台湾)和条约地区的工作产生任何不利的影响，我们就不会考虑在那里使用部队。这份讲话标志着美国对金、马的政策从“协防”转为“脱身”，目的是以放弃金、马，换取长期盘踞台湾的合法地位。然而，令美国政府始料不及的是，这一变化却给了毛泽东一个机会，促进海峡两岸关系向有利于祖国统一的方向发展。

三、联蒋抵美，维护“一个中国”

美国准备从金、马沿海岛屿“脱身”，中国政府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收回这个地区了。这是当时国内外大多数人的想法。但是，令人意外的是，毛泽东却改变了初衷。对金、马究竟采取什么样的方针，毛泽东的认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而变化的。最初，毛泽东准备分两步解决台澎金马问题，即先解放金、马沿海岛屿，再解放台湾。毛泽东的基本观点是：台湾是我们的，那是无论如何不能让步的，由我们自己解决。但是，如果美国能说服蒋集团从金、马撤退，我们可以在一段时间内对台湾不使用武力⁽²⁵⁾。这是毛泽东在金门炮战开始后，中美谈判恢复之前的想法，他的这个想法当时没有公布。

毛泽东重新考虑这个问题是在杜鲁门声明之后。杜的声明发表后，激化了蒋介石集团同美国的矛盾。当时，驻守金门的军队有 11 万，占蒋集团军队

总数的 $\frac{1}{3}$ 。军队的成员多来自大陆，如果蒋介石放弃金、马，不仅会影响军

队的士气，而且会影响政权的稳固。因此，蒋坚决反对美国放弃金、马的作法，并同美国的矛盾日益尖锐。蒋介石对美政策的两重性，引起毛泽东的重视。在这种情况下，究竟是先收复金、马，联美反蒋，还是把金、马暂时留在蒋介石手中，联蒋抵美呢？毛泽东后来在各党派负责人座谈会上谈到这个问题时说：开始我们想打金、马，后来一看形势，金、马收回就执行了杜勒斯的政治路线，还是留在蒋介石手上好。要解决，台、澎、金、马一起解决，中国之大，何必急于搞金马？⁽²⁶⁾毛泽东的意见在党内取得共识。周恩来后来会见苏联驻华大使临时代办安东诺夫时解释说：我们的方针，简单来讲就是要使台、澎、金、马仍留在蒋手里，不使之完全落到美国手里。清朝统治阶级的方针是宁予外人不给家奴，我们则是宁予家奴，不给外人⁽²⁷⁾。

把金、马留在蒋手里拖住美国，这就是毛泽东提出的著名的绞索政策。它的含义是说，台湾及美国在外国的一切军事基地，都是套在美国脖子上的绞索。这个绞索，不是别人而是美国自己制造的。它把绞索套在自己的脖子上，然后把绞索的另一端交给了中国人民及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反侵略的人民。美国在这些地方停留的越久，套在它头上的绞索就越紧，总有一天要被全世界人民处以绞刑。10月初，经中共中央讨论后，这个方针确定下来。

当时，毛泽东调整对金、马的方针主要是考虑到，如果逼蒋介石撤退金马，形式上是我们收回了沿海岛屿，实际上是我们对美国让了一步。这样，美国首先会把台湾孤立起来，造成“两个中国”的局面。然后制造“台湾地位未定”，“托管”台湾，把台湾变成美国的永久殖民地。另外，蒋介石撤离金、马后，中立国会出来劝说，我们将在政治上、国际舆论上陷入被动境地。调整后的方针的好处是：第一，保护了蒋介石的民族性，使台湾不落到美国人手里。如果蒋介石让出金、马，使台澎金马分开，台湾就离大陆更远了，便于美国搞“两个中国”。第二，金、马留在蒋介石手里，保留了一个大陆同台湾对话的渠道，否则双方将长期处于隔离状态。第三，台湾归还祖国，实际上是一场政治、军事、经济力的竞争。晚一些时间收回，有利于动员国内人民搞建设，增强国防力量。

大陆和台湾要求保持“一个中国”的出发点是不同的。但是，在对美态度上找到了某种共同点。为进一步加深美蒋之间的矛盾，进一步促进海峡两岸关系向有利于祖国统一的方向发展，毛泽东决定暂时停止炮击，开展政治攻势。10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起草的，以国防部长彭德怀名义发布的《告台湾同胞书》。文告中，毛泽东提出了几点重要思想。第一，“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这一条指出了统一是大陆和台湾的根本方向；第二，台湾问题要由国共两党“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这是中国内部贵我两方有关的问题，不是中美两国有关的问题。美国侵占台澎与台湾海峡，这是中美两方有关的问题，应当由两国举行谈判解决，目前正在华沙举行。美国人总是要走的，不走是不行的。”这一条严格划清了台湾问题的性质。第三，“从十月六日起，暂以七天为期，停止炮击，你们(指蒋军)可以充分地自由地输送供应品，但以没有美国人护航为条件”⁽²⁸⁾。这给美国人出了难题，如果它停止护航就等于接受了中国命令，如果它继续护航就在全世界面前暴露了干涉中国内政的面目。这份国防文告震动了世界，它标志着金门炮击已远远超出了军事斗争的意义，而进入包含政治、外交斗争

的新阶段。

为使金门军民得到充分补给，以求固守，10月13日，毛泽东又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命令，宣布“金门炮击，从本日起，再停两星期”，目的是对付美国人。命令称：“这是民族大义，必须把中美界限分得清清楚楚。”⁽²⁹⁾10月21日，杜勒斯和美国防部长麦克耳罗伊访台，逼迫蒋介石撤离金、马，双方发生激烈争执。为配合蒋介石同美国的斗争，在杜勒斯到达台湾的前一天，毛泽东下令恢复炮击金门，及时帮助了蒋介石，使其获得拒绝从金、马撤兵的口实。当时，台湾有人背后说：“这个炮打得好”。甚至有人说笑话：“毛主席是台湾最好的代理人”⁽³⁰⁾。

此后，根据毛泽东的命令，福建前线炮击金门形成规律，逢单日打，双日不打。打是为了给蒋军拒绝美国要其撤离金、马一个理由，不打，是为了使蒋军运输补给获得一段时间，而且双方炮击时只打沙滩，不打民房与工事。叶飞后来回忆：“美蒋完全被毛主席的高明策略牵着鼻子走，打炮也演变成美蒋我三方之间一种特殊的对话，一种不在谈判桌上进行的，这真是古今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观。”⁽³¹⁾由于大陆、台湾之间的“默契配合”，共同维护了“一个中国”的局面，为实现祖国统一奠定了政治基础。这是炮击金门决策最重大的收获。此后，海峡两岸关系突破了军事对抗的局面。蒋介石集团逐渐明白了中共的意图。1959年3月底，蒋介石集团外交部特别规定，今后对外提及大陆时，不再用“红色中国”或“共党中国”等语，而称“中共政权”。提到他们自己时，不再用“自由中国”，而称“中华民国”。

海峡两岸关系出现转机后，毛泽东立即抓住时机，对台湾回归祖国问题提出许多重要的原则。毛泽东曾表示，台湾如果回归祖国，照他们（蒋介石等）自己的方式生活，水里的鱼都有地区性的，毛儿盖的鱼到别的地方就不行。但是美国不要蒋时，蒋可以来大陆，来了就是大贡献，就是美国的失败。毛泽东还请人转告台方：蒋介石不要怕我们同美国人一起整他。毛说蒋同美国的连理枝解散，同大陆连起来，枝连起来，根还是他的，可以活下去，可以搞他的一套。关于军队问题，毛泽东表示可以保存，我不压迫他裁兵，不要他简政，让他搞三民主义⁽³²⁾。毛泽东的这些思想，后来由周恩来归纳、概括为“一纲四目”。一纲是台湾必须回归祖国；四目包括：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由蒋决定；所有军政及建设经费不足之数，由中央拨付；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协商解决；双方互约不派人进行破坏对方团结之事。这是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祖国统一大业绘制的一幅蓝图。由于种种原因，毛泽东生前没有实现这个愿望。但是，他所提出的这些思想对今天的工作仍然发生着影响，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后，邓小平根据海峡两岸的新形势，把毛泽东曾经提出的对台工作的重要原则，进一步系统化，理论化，形成独具特色的“一国两制”构想，这是他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从“一纲四目”发展到“一国两制”的历史充分地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对台湾问题的立场是始终如一的。

作为一个伟大的战略家，必须能够准确地判断形势作出决策，并根据形势的不断发展变化，调整方针政策，不失时机地把斗争引向胜利。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位伟大的战略家。1958年，他所作出的炮击金门的决策，以及这一

决策产生的深远影响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注释

(12)(20)(28)(29)《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348页，第393页，第390页，第384页，第326页，第416页，第439—440页，第454页。

毛泽东与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谈话记录，1958年7月21日。

毛泽东与赫鲁晓夫谈话记录，1958年8月1日。

(15)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9月6日。

(11)(26)毛泽东在各党派负责人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9月15日。(13)周恩来会见苏联外长葛罗米柯谈话记录，1958年9月6日。周恩来关于《台湾海峡地区局势的声明》的说明，1959年9月6日。

(16)《人民日报》，1958年9月7日。

(17)《叶飞回忆录》，第661页、662页。

(18)周恩来会见曹聚仁谈话记录，1958年9月10日。

(19)傅作义致毛泽东的信，1959年9月9日。

(21)周恩来致毛泽东的信，1958年9月13日。

(22)周恩来致毛泽东的信，1958年9月17日。

(23)毛泽东致周恩来的信，1958年9月19日。

(24)周恩来致毛泽东的信，1958年9月22日；毛泽东致周恩来的信，1958年9月22日。

(25)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言记录，1958年9月8日。

(27)周恩来会见苏联驻华大使临时代办安东诺夫谈话记录，1958年10月14日。

(30)周恩来在中宣部报告会上的发言记录，1958年11月10日。

(31)《叶飞回忆录》，第675页。

(32)毛泽东会见曹聚仁记录。1958年10月13日。

